

中国大文学史

上册

柳存仁 陈中凡 陈子展 杨荫深 柯敦伯 吴梅 宋佩韦 张宗祥 著

ZHONGGUO DA WENXUESHI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中国大文学史

下册

柳存仁 陈中凡 陈子展 杨荫深 柯敦伯 吴梅 宋佩韦 张宗祥 著

ZHONGGUO DA WENXUESHI

上海书店出版社

ZHONGGUO DA WENXUESHI



中国大文学史

下册

柳存仁 陈中凡 陈子展 杨荫深 柯敦伯 吴梅 宋佩韦 张宗祥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大文学史/柳存仁等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4

ISBN 7-80622-274-X

Ⅰ. 中… Ⅱ. 柳… Ⅲ. 文学史—中国 Ⅳ. 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2247 号

书　　名	**中国大文学史**
作　　者	柳存仁　陈中凡　陈子展　杨荫深 柯敦伯　吴　梅　宋佩韦　张宗祥
责任编辑	徐力励
出版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福州路 424 号)
印　　刷	昆山市亭林印刷总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27.125
字　　数	700 千
版　　次	2001 年 4 月第一版　2001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0001—3000
书　　号	ISBN 7-80622-274-X/I·78

定　　价(上下册)：53.00 元

目　　录

上古秦汉文学

（柳存仁）

汉魏六朝文学

（陈中凡）

唐代文学

（陈子展）

五 代 文 学

（杨荫深）

宋 代 文 学

（柯敦伯）

辽金元文学

（吴　梅）

明代文学

（宋佩韦）

清代文学

（张宗祥）



上古秦汉文学

柳存仁著

原名“上古秦汉文学史”

据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重排

第一章 绪 言

“文学”一词之解释，在古籍中所称引者，与吾人今日所习闻而正确之文学观念，未能尽相符合。考“文学”二字最早见于载籍者，厥为《论语》“文学，子游、子夏”(《先进》)。“文”字据马融注，指为“古之遗文”，同书又有“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之语，则文学为《诗》、《书》、《礼》、《乐》，同于典籍文献。《墨子》言“今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公孟》)，《荀子》谓“子赣、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大略》)，而《韩非》复云“人主顾渐其法令而尊学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学也”(《问辩》)，均可为先秦时代指文学为博学与文献之证。迨及两汉，更以文学泛指一切学术而言。《汉书·儒林传》记武帝时官迁留滞、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者，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补郡太守卒史，先用诵多者。此一艺盖指一经言。诵经书者众，当时即美之为“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故其时之文学观念，实与学术相淆混而不可分辨。魏晋而后，风气略有改变。有倡言文学应自有其特殊之范畴，而与“玄”、“儒”、“史”分称四科者，自宋文帝始。其前，则范晔《后汉书·文苑传》赞、陆机《文赋》已肇其端。其后，则梁昭明太子萧统亦尝举“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者，为其纂辑《文选》一书之纲领，尝云：“词人才

子，则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缃帙。”（《文选序》）此一时期之文学，虽极倾向于骈俪绮靡、穷妍辞藻之一途，然衡以今日之文学观念，亦渐相类似。吾人固非主张文学专以堆砌藻饰为务者，然文以明道或载道之说，究未能包罗文学之全体。北宋周敦颐为理学之开创大师，尝谓“文所以载道也，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通书》），苟细研其意，可知其非绝对排斥美文之作用，惟讥当时俗文之过于襞积故实、雕绘语句者，无裨于实用而已。故其心目中之文学观念，亦必与学术殊指，有承认“文辞”、“文艺”之倾向。此则认识甚清，较之汉儒以“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谊，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汉书·儒林传》）为文学者，其思想之进步亦区以别矣。清儒顾炎武固痛斥文人求古之病者，谓“夫今之不能为二汉，犹二汉之不能为《尚书》、《左氏》，乃剿取《史》、《汉》中文法以为古，甚者猎其一二字句用之，于文殊为不称”（《日知录》卷十九）。又云：“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势也。”（同书卷二十一）其时代观念认识之透彻，贤于当时诸儒远甚，然仍主张“无关于经术政理之大则不作”，而谓“韩文公文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毁》、《争臣论》、《平淮西碑》、《张中丞传后序》诸篇，而一切铭状概为谢绝，则诚近代之泰山北斗矣，今犹未敢许也”（《与人书》十八），则载道之言，实为一般学者矫枉过正之通弊，未可持其一端而议论其对文学认识之全体也。挽近则章炳麟云“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其说未免过于广泛，然又云“凡云文者，包络一切著于竹帛者而为言。故有成句读文，有不成句读文，兼此二事，通谓之文。局就有句读者，谓之文辞。诸不成句读者，表谱之体，旁行邪上，条件相分，会计则有簿录，算术则有演草，地图则有名字，不足以启人思，亦又无以增感，此不得言文辞”（《国故论衡》中《文学总略》），则文学亦必属诸启人思增感情

者，彰彰明甚。

西文之释“文学”，最早盖源出于拉丁语之Litera，衍变而成Literature一字，实含有文字、文法及文学等三种意义。近来西人著述中对“文学”所下之定义，亦有广义、狭义之不同，而采用狭义者较多。如美国韩德氏(Hunt)于其所著《文学原理及其问题》中，阐述其个人对文学之解释为：“文学为思想之文字表现，藉想象、感情与趣味为之媒介，使人易于理解及发生兴味，而复出于并非专门之形式。”此种解释最为平易而正确，常为各国书籍中所采用。综合其定义中所列举之文学要素，则想象、情绪、思想、形式四者，不可缺一。故优美之文学作品，亦必以启人思智、增人情感为能事，此盖中外通儒所论者，体要大致相同，实不偏不倚之论也。

以上所述为“文学”之解释，而“历史”二字之解释亦复有新旧说之不同。吾国旧说以为历史者，推往古觇未来者也，故其所重视者为兴亡盛衰、循环不断之因果关系；今说则于探索历史之因果关系而外，复着重于各时代社会现象之考断与说明。最初发生历史之形式，无非为对一区域、一民族、一国家过去生活现象及社会状态之记载不复加以论证及解释，其后史家乃渐能分析其事迹之异点及特征，而为将来研求其他事迹或问题之根据，更进则着重演进之历史过程诸情态之变化，及各种事迹之因果关系，与一事迹对其地方性、民族性或国家性之影响，此以前历史学逐渐进步之程序也。而更新之史学家所希冀之新历史观念，复有异于是。如鲁滨孙氏(James Harvey Robinson)于所著《人类之剧》(The Human Comedy)中提倡研究及发育历史之心理，即多与前人论列有所不同。根据其所主张之学说，则吾人所当研求之新历史，已非朝代兴亡、帝国废立、战争成败之记载，亦不仅为一国家、一民族、一朝代之叙述。此种新历史之对象既不以民族国家为界限，故常依全人类之生活活动区域为其范畴，复以吾人所习知之有史时期为时至短，而人

类在地球上之历史实逾五十万年，故亦不能以吾人旧日所划分之所谓时期为研究之对象。此外，则此种新历史置重于推求文化演变之迹、追索事物进化之来历，及研究社会现象之真相，使历史成为一和谐体，而熔过去、现在、将来于一炉。此种新历史之共同趋向，据歉纳氏(Edward P. Cheyney)所列举之历史定律，实包括一、历史延续性，二、民族国家之变更，三、人类之普遍和谐与相成，四、人类之趋向民治，五、自由范围之扩张，六、人类暴虐心之减少与同情心、仁爱心之扩张六项。因其较现在已有之历史学为更进一步之追究，重在研究现存之人类信念、风俗、习惯等之来源，俾能寻求更精确之历史规律，故实为历史学上之一大贡献。惟此种新历史学在今日尚处萌芽时期，未臻成熟，故吾人研究历史虽以此种新趋向为共同努力之目标，然在此过渡之时期，吾人所记叙之历史，仍以记载过去所发生事物之真相、原因及影响三者为必不可少之鹄的。

根据上述对于历史之解释，可知文学史应为历史之一部分，而以叙述各时代文学之演变为其原则。坊间所流行之文学史，多仅罗列各时代作家之姓名而略不叙及其个性环境、作品内容，有类辞典，直《录鬼簿》之不若，不知文学既为生活之表现，且为演进中之活动历史，故文学史之作，不惟对于文学作者之个人生活须有精细之探讨，即对于产生某一时期文学之时代精神、社会环境、文化氛围，亦应有确切之认识，再依据事实认识而考察其所发生之影响。根据上述之原则，吾人今更可缕述文学史之任务如次：第一，文学史宜特别注意各时代文学演变或交替之痕迹、原因及其影响；第二，文学史宜详叙作家之个性、环境及生活全貌与其作品成就之关系；第三，文学史宜研究文学作品之本身，并介绍优美作品，以供学者之欣赏与参考。

吾国旧无文学专文，正史中与文学史有关者为《艺文志》(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等)、《儒林传》(如《汉书·儒林

传》等)、《文苑传》(如《后汉书》、《晋书》等)、《文学传》(如《齐书》、《梁书》、《陈书》、《南史》等)、《文艺传》(如《新唐书》、《金史》等),或为文学典籍之记载,或为文学家之传记,仅足为著述新文学史参考之资料。史书而外,如诗文评述、诗文集序、文话、诗话、词话,以及笔记、考订、杂纂之属,亦时与文学史有密切之关系。西汉末刘歆作《七略》,有《诗赋略》,为议论纯文学最早之叙述。然其书早佚(后世颇有辑本,不全),班固《汉书·艺文志》即源本《七略》加以删节而成。《汉志》分诗赋之类为五,复从历史演变上而略叙其变迁之大势曰:"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春秋之后,周道寖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读此可略窥诗赋略之性质。魏晋六朝间有挚虞之《文章流别志论》(已佚,后世亦有辑本)、刘勰之《文心雕龙》、钟嵘之《诗品》,以及依托任昉所作之《文章缘起》,并唐宋以后诸相类似之书籍,均约略近于文学史之性质,而体裁容有繁简异同。迟至清季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英人翟理斯氏(Herbert A. Giles)所著之《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始告出版,其书用英文写成,内容荒谬错误之处,出人意外者极多;日本笹川种郎之《支那文学史》(日本博文馆《帝国百科全书》本)亦几于同时问世,而国人自著之本仍未出现。复后三年(光绪三十年,1904),北京优级师范馆教习林传甲始著《中国文学史》成,是为国人自著文学史之嚆矢。又二年,窦警凡亦著成《历朝文学史》(日本东京弘文堂印行)。其书以今日之眼光读之,亦皆芜杂不堪。民国以来,文学史之著作风起云涌,除通史性质者外,更多分体或断代史之著作,据个人见闻统计所及,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止,为数已有七十四种。

本书分章叙述,着重于我国各种文学之发生及发展,先釉上古迄汉范围为限。任何文体之产生,其发展常如有机体之生长,往往

自雏形而茁壮，而发展极盛，而渐老渐衰，以迄于僵化消灭。如以整个中国文学史证之，四言诗盛于春秋，至汉代而衰颓；五言诗成于魏晋，唐以后作者亦稀；词始于唐末五季，南宋后遂一蹶不振，清词虽独树一帜，多半模仿，究不能出宋词之范围。此种形势，盖为历史演变之自然发展，即词以后之南北曲、戏文、传奇之衍化，亦莫不然。故本书之所叙述者，即特别注重各体文学自民间产生、文人袭用以后，由长大扩张而渐趋衰老之整个历史，而尤当说明其产生及演化之原因。

中国文学史之时代最为悠久，自东周迄清末已逾二千四百年，而西周及更早时期之记载尚不计入。兹编拟先略述吾国文字之起源，而以商以后甲骨、金文之文辞记载为最早信史之根据。其他传说或与古代神话相糅杂之文学作品，虽不能据以为准确之客观史料，然推寻传说之所从出，亦必有其一时代之社会现象及环境背景为之根据，仔细寻求，转足为考研古代民情风俗之资。故本古人“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之语，别述为传疑文学一节。昔美人摩尔根氏(Morgan)曾以其毕生之精力研究美洲土人之生活而成其《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 1877)一书，至今犹大受学术界之推崇。则吾人今日研究古代传疑文学，苟能以社会学之眼光重新加以估价，亦未尝无重要之新线索可以发见也。然本书究为历史性质，取材要尚谨严，各时代伪托或有疑义之作品，仍加以精审之选择与考证鉴别。此则为研究各种文学原来之真相起见，不容讹舛混淆，与远古传疑作品自又不同，非编著时自乱其例也。

第二章　中国文学之起源

中国文学之起源，究竟始于何时，殊未可知。当吾人类远祖生活于邃古之世，彼等是否能以语言表达意志，在有铜器记载之时代以前，至今亦仅能悬为疑案；然则语言文字孳乳之未能，遑论乎文学作品之发展？要之，古代人类最初能通达语言、交换意见之时，端有赖乎其手势变化或姿态表情之动作，此种动作渐经习惯，与夫动作时自然而联成之喜怒哀惧等感念之音声相合，遂成为语言之起源。语言者，兼音、义两方面言之，而文字则更赋有字形方面之特点。吾国文字初起时之表现，原非为单独之字体，而为绘图或刻画式之文字画。此种文字画之作用，与原始之语言，盖同为表达意志之一种新工具。近人沈兼士尝申论之，谓："中国文字在象形以前，当有一时期为绘画式之记述，已具文字之形式，而无固定之形、音、义。绘为某事物之形式，点画之间可随音变化，意义亦有引申转变之可能，且无固定之音读，即旧日金石家所谓殷商钟鼎中之图形，若牺形、兕形、鸡形、立戈形、立旗形、子执刀形、子荷贝形之类，吴大澂《说文古籀补》所不采者是也。其与象形字、指事字之区别则在文字画近绘画，复杂而流动不居；象形、指事字则为符号，单简而结构固定。"（参看沈氏《从古器款识上推寻六书以前之文字画》一文，刊在《辅仁学报》一卷一期，及日本《考古学论丛》第一册）。文字画几经变衍及推广，既成为公共应用之文字，则其结果除表达意志外，复有记录语言之效用焉。

就语言方面言之，吾国语言为单音语，于世界语言系统中，属于印度支那语系中之中国暹罗语之一部。吾国古代疆域大部分在今日之陕、豫、晋、鲁、皖、鄂……诸省，占地虽非甚广，而语言之统

一已感艰难。《孟子·滕文公》篇上有“今也南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其所指者许行。孟子邹人，许行盖“自楚之滕”者也。同篇下复云：“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韩非子》谓“郑人谓玉未理者璞，周人谓鼠未腊者璞”，均可见春秋、战国时各地语言之复杂。汉时扬雄作《方言》一书，摭采各地不同之语言，谓“旧书雅记故俗，语不失其方，而后人不知，故为之作释”，又云“皆古雅之别语也，今则或同”，则其所记载者，自必远溯至春秋、战国间语之可考者无疑。如：“党、晓、哲，知也。楚谓之党，或曰晓，齐、宋之间谓之哲。”“娥、㜲，好也，秦曰娥，宋、魏之间谓之㜲，秦、晋之间，凡好而轻者谓之娥。自关而东、河济之间谓之媌，或谓之姣。……好，其通语也。”各地语言歧异之情形，吾人藉此书之追记，盖可略得梗概。语言既难于统一，而文字符号之用以达意者，自亦难免歧离纷杂之弊。秦时，因政治上之统一告成，而语言文字之复杂未变，遂注意及“同文字”之重要性。丞相李斯改通行大篆为小篆，自后各地不得随语言之改变而任意制造歧异之字体，《史记·秦始皇本纪》云“车同轨，书同文字”（二十六年），“器械一量，同书文字”（二十八年，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均记载此“同文字”一事之成绩。然文字虽告统一，而语言歧杂之问题，仍未有较完善之改革。复因吾国幅员日益开拓，疆域既渐辽广，而语言之分歧遂更形繁异。久而久之，语言文字之记载遂自然趋向于复古之一途，而成后世所谓“文言”，自汉迄今二千余年间，不通语言之各省域常利用之为交通之媒介，于是古文之著述遂特为浩繁。近二十年来始有统一国语，利用注音符号与阴阳平四声（国语平声分阴阳，入声绝鲜）及建立“国语的文学”等运动，俾吾国语言文字渐成一致。最近更有提倡所谓“大众语”及拉丁化新文字之主张，其方案均在试行推验与逐步研究之中，尚未有何种显著之效果。

吾国文字创始于何时？自昔即有造字之传说，然不尽可信。汉许慎《说文解字》序云："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又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按八卦之创造，本为古代社会对于生殖崇拜之象征，更假之为《周易》之符号。及数学知识逐渐发达之后，复重演之而为六十四卦，均为卜筮宗祝之用，与文字之创始本无何种直接之关系。《易传》亦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当为许慎根据之所从出。至后人重卦之说，通常多主文王附六爻，如《史记·日者列传》云"司马季主曰，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论衡·正说》篇云"说《易》者皆谓伏羲作八卦，文王演为六十四爻"，《汉书·扬雄传》云宓牺氏始以八卦，文王附六爻"是。然亦有主为神农、夏禹或伏羲者。《周礼·春官》："三《易》，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经卦皆八，别卦皆六十有四。"《连山》相传为夏《易》，或又以神农所作，故唐孔颖达《易正义序》云"郑玄之徒以为神农，孙盛以为夏禹，史迁等以为文王"，《魏志》"《易》博士淳于俊曰：包牺因燧皇之图而制八卦，神农演之为六十四卦"，亦为神农所作之一证。伏羲之说，则见于《淮南子·要略训》云："八卦可以议吉凶、知祸福矣，然而伏羲为之六十四变。"众说纷纭，不过后世之推测。至于仓颉作书之说，战国时已多言之，《荀子·解蔽》篇言："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韩非·五蠹》篇言："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者谓之公。"《吕览·君守》篇亦言："仓颉造书。"则仓颉造字之传说，实为战国间人所公认者。然古昔传说多不免附会之习，常以善某事者即为始创其事之人。如仅据《荀子》所言，仓颉亦不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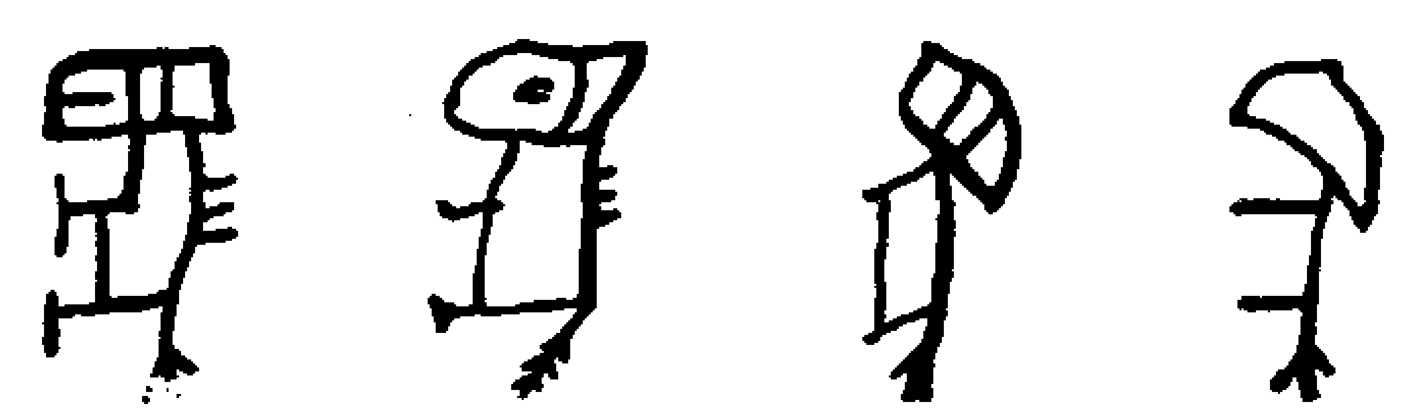
为好书之一人，而非始作书者也。且仓颉，汉人传说多以为古帝，《路史》引《春秋演孔图》及《春秋元命苞》叙帝王之相云“仓颉四目，是谓并明”，与颛顼、帝喾、尧、舜、禹、汤、文、武并举。《河图玉版》云“仓颉为帝，南巡狩，登阳虚之山，临于玄扈洛汭之水，灵龟负书，丹甲青文以授”，《河图说命征》云“仓帝起，天雨粟，青云扶日”，而汉熹平六年《仓颉碑》云“天生德于大圣，四目重光，为百王作宪”，说亦与《演孔图》、《元命苞》相同。是仓颉究为何时代、何如人，与夫造字之关系，文籍纷繁，十口相传，盖亦难于钩稽。吾人以为一国文字之创造，人既不应限于一二特殊之先知先觉，时亦系历悠久而积渐增进。汉儒附会既甚，而《尚书》伪孔传出，以羲、农、黄帝为三皇，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为五帝，别立所谓三坟五典之书，于是远在伏羲时精确之文字即已成立，而画八卦与造文字二事亦因之联系而发生密切之关系。苟细核之，则此说本非古之所有，而语言文字原为社会间共同利用之工具，其创始之时，亦必此倡彼和，取譬相成，今日添一语，明日添一辞，此人制一新字，彼人创一新形，孳乳浸多，而文字始渐完备。谓为一人所造成，布之群伦而习用之，非特古代必不能有是事，且以社会进化之原则衡之，恐亦不能有是情理也。

真实可据之古代文字，最早当始于殷商时代。此时之文字已颇形繁复，则距初民创始文字之期，大约已历若干年代。吾人今日所可见且足征信之殷商文字，一为历代宝藏及发掘之钟鼎彝器，一为清末在安阳出土之甲骨。

甲骨文字发现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地在河南安阳县之小屯村。初由古董商贩出，王懿荣、刘鹗、罗振玉、王国维等据《史记·项羽本纪》“洹水南”故殷墟之明文，遂断为殷商时代之故物，自是中外学者无不加意搜罗。至民国十七年(1928)，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更进行大规模之发掘(见出版《安阳发掘报告》)，历年考释其文字内容，并用以推考殷商历史文化者，则以王

国维《观堂集林》中之著述为最多(如《说商颂》、《殷周制度考》、《殷卜辞所见先王先公考》等),罗振玉之《殷虚书契考释》亦可供研究此学重要之参考。此时期之文字形式,大体虽已构成,但制作尚未臻完全固定,故常有一字数形、繁简各别者,而大要已可用后世之六书说为之解释。据近人商承祚《殷虚文字类编》(可识者七百八十九字,又待问编约四百字)、孙海波《甲骨文编》(可识者千零六字,合文一百五十六字,不可识者一一一零字)等书之统计,可识者约有二千余字,足征当时之文化程度已颇高。此等甲骨近年亦颇有伪造,或龟甲兽骨虽不伪而所刻文字之真伪则不能证明者,然经考古学上精密鉴审之后,可确信为殷墟故物者仍不少,吾人苟能应用旧有丰富之金石与文字知识,对已经诸家鉴定之各物细加考释,固亦研究远古文化之无尽宝藏也。今略举诸家所公认者数字为例,并依六书分类(据容元胎《中国文学史大纲》):

象形字

馬 

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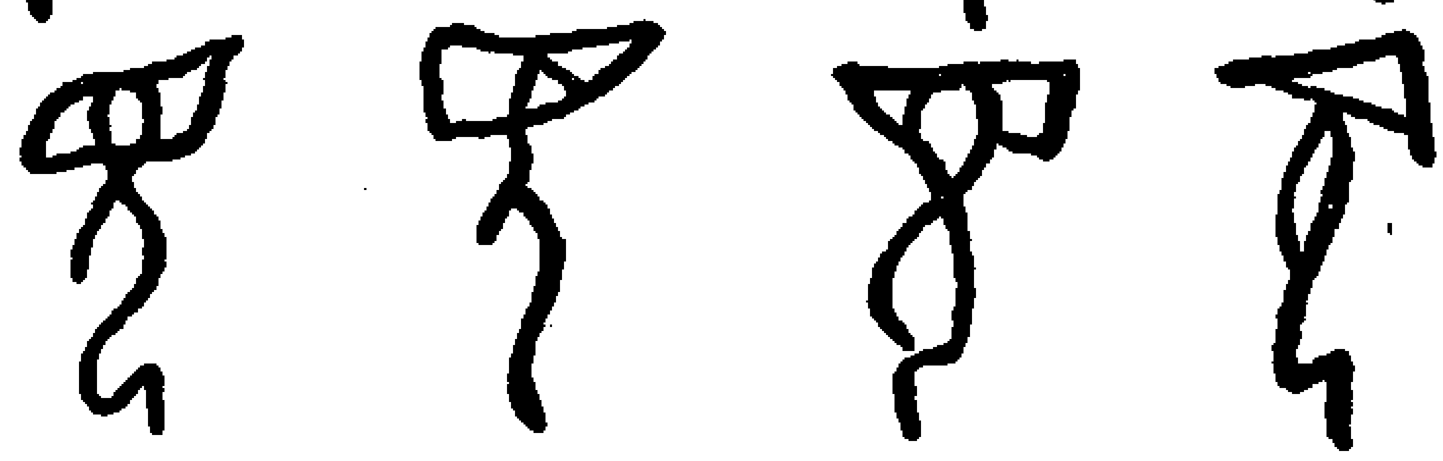
指事字

四 

九 

会意字

祝 

見 

形声字

遘 

雇 

甲骨文字之发展，最初仅为单辞片语，以卜辞为最多，后乃进为简单之记事文。董作宾《新获卜辞写本》后记中，曾述及有穿孔及刻“册六”二字之龟板（《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可见此种龟甲在当时应用之广大。且卜辞中之文字虽极简朴，然已有颇饶文学之风趣者，例如（诸例皆采自郭沫若《卜辞通纂》）：

（1）辛巳卜，贞王宾祖辛丁翌，亡尤（祖辛，先王名。宾、丁，皆祭祀意。翌，即翌日）。

（2）壬子卜，贞王田雝，往来无灾（雝，地名）。

（3）丁亥卜，贞今夕师亡尤，宁。

（4）辛巳卜，贞今日不雨。

（5）戊辰卜，及今夕雨？弗及今夕雨？

(6) 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

观诸例中文辞之组织及体裁,亦颇与习见之《周易》卦爻辞相近,例如《乾》卦云:“乾,元亨,利贞。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谦》卦云:“谦,亨,君子有终。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六二,鸣谦,贞吉。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六四,无不利,㧑谦。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上六,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盖均为古代巫祝卜史之辞。然如“其自西来雨”一例,极与后汉代街陌谣讴之《江南可采莲》相似。

>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朴素而自然,和谐而动听,亦可谓古代民歌中杰构也。

至于铜器之记载发现与认识其重要性而保存,均较龟甲文字为早。许慎《说文解字》序已云:“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而历代著录之者,则始以宋代为最盛,如吕大临之《考古图》、王黼等之《宣和博古图录》、王俅之《啸堂集古录》、薛尚功之《历代钟鼎彝器款识》,为其尤著者。至清代而后,钟鼎彝器之新发见者日多,而斯学之研求亦更进。

商代铜器实为其中时代最古者,故铭辞之简朴无华,既与后世之文彩绚烂殊,有时仅著数字,更可作为研究先民社会生活常型之好资料。如“子”、“庚”、“癸”鼎,各仅一字,盖为记载干支之标识;“蚤鼎”绘一蚤形,“象形饕餮鼎”作一饕餮兽形;“立戈父甲鼎”为立戈形,“横戈父癸鼎”为横戈形,亦可窥见时代演递日趋繁复之痕迹。近人罗振玉辑有《殷文存》二卷,今依《啸堂集古录》并《殷文存》二书,略示其梗概如下:

商父乙鼎(见《啸堂集古录》):

庚午,王命寝庙,辰见北田四品,十二月作册,友史锡赖贝用,作父乙尊,□,册册。

释作父乙彝(一名戊辰彝,见《殷文存》):

戊辰,弜师锡䌛卣廿卣,赍贝,用作父乙宝彝,在十月一,隹王廿祀,叠日遘于妣戊,武乙爽,彘一,旅。

此等文字,辞极质朴而意尚艰奥,细加紬理,大抵与甲骨文字同时。然一则为宗庙重器子孙宝用之铭识,且所刻附者为铜质,故文字较简而难了,其利便之处有二:所以示传享之尊重,所以避刻镂之困难。一则为祝宗、卜史占筮所习见,甲质薄糅,刻字较易,且应用之方面又更广,流行滋繁,故文字亦较丰而易解。虽然,此第就商代铜器之特点约加论列,非谓一切铜器文字之质朴率皆类此。譬如稍迟之西周铜器,其铭辞记载之详尽,较之前代即有长足之进步。孔子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其"监于二代"之说,以吾人今日之观点论之,夏质周文,演化更进,则孔子实甚富于进化观念与夫时代精神者。而《尚书》中之文字,亦复与此殷周铜器记载所采之语文形式,有甚深之渊源。

稽考史籍与夫甲骨刻辞、钟鼎彝器之记载,殷商民族与周民族实发源于二不同之地域,而时代亦有先后。大抵殷民族最先居住于吾国东北部沿海一带,迁徙后定居于河南黄河流域,其时文化程度已颇高,盖为渔猎社会进化至农业社会之过渡(观甲骨刻辞中之注重田猎及卜年卜雨可知)。此民族占卜时用龟甲,且已能使用铜器,并有较繁复之文字。周民族则居住于西部(大抵在今甘肃、陕西一带),文化程度最初较殷商民族为低,其发达且在殷中叶以后。此民族占卦习用蓍草(其占筮之书即为《周易》),因其民族文化程度较低,故未脱游猎部落犷悍之生活,而尚武精神亦甚著。周武王伐纣克殷后,复并吞河南各地域之小部落,其势力扩张至齐鲁、徐淮、江

汉各地。其后殷周民族之殄域渐泯，文化混合而产生更大之进步。此时期已达完熟之农业社会，生活既较前复杂，而文字之表现亦见典整丰长，有时且用韵律。观乎商代铜器刻辞多仅记名字、称号、年月，或某人作之子孙永宝用之陈词，而周代铜器之记载已渐能达情表意，文从字顺。王国维有《两周金石文韵读》，其序曰："前哲言韵，皆以《诗》三百五篇为主，余更搜周世韵语见于金石文字者，得数十篇。中有杞、鄀、许、邾、徐、楚诸国之文，出商、鲁二《颂》与十五国风之外。其时亦上宗周，下讫战国，近世古韵学之精密，自其可征者言之，其符合固已如斯矣。"所收金识共三十有七，后郭沫若《金文丛考》更有《金文韵读补遗》之作，搜求益广。今略举数例如下：

正考父鼎铭(《左传》昭公七年孟僖子所引，为宋国早期(西周)之作品)：

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

虢季子白盘：

惟十有二年(案，周宣王十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作宝盘：不(丕)显子白，庸武于戎工，经缕四方，薄伐猃狁，于洛之阳。折首五百，执讯五十，是以先行。桓桓子白，献馘于王。王孔嘉子白义，王格周庙，宣榭爰乡(飨)。王曰，伯父，孔𩔰有光。王锡乘马，是用左王。锡用弓，彤矢其央。锡用戉(钺)，用政蛮方。子子孙孙，万年无疆！(按，此盘"方""阳""行""王""乡""光""王""央""方""疆"，均协"阳部"韵。)

孟姜匜：

□叔作朕子孟姜盥匜：其眉寿万年，永保其身！沱沱熙熙，男女无谌！子子孙孙，永保用之。(近人胡适云："此铭中'年''身'为韵，'熙'，'谌''之'为韵。《诗》三百篇中，凡代名词'之'字作动词下的止词用时，都不押韵，韵都在其上的动词。

例如‘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例外极少。金文中‘用之’‘鼓之’，韵皆在‘之’字，已不是语言的自然。此可见铜器上的韵文模仿民歌体制，而渐失其自然音韵。”）

不嬰敦盖铭：

惟九月初吉戊申。白氏曰：不嬰，駿方玁狁，广伐西俞，王命我羞追于西。余来归献禽。余命女御追于畧。女以我车宕伐玁狁于高陰。女多折首執嘰。戎大同永追女，女及戎大臺戟。女休，弗以我车函于讟。女多禽折首執嘰。白氏曰：不嬰，女小子，女肇诲于戎工。易女弓一，矢束，臣五家，田十田，用永乃事。不嬰拜韻手休。用作朕皇祖公白、孟姬尊敨，用丐多福，眉寿无疆，永屯灵冬，子子孙孙其永宝用享。

此种文字，时代渐后而记事渐长，意义亦复深厚。其中以毛公鼎铭文最长（兹从略），文体与《尚书》中之周诰相类。故吾人研究殷周铜器记载，遂不得不提及周诰及《尚书》一书。

专就文学史编纂之内容论之，《尚书》虽未必有文学意味，然其既为现存载籍中最古之史料，且此书之时代内容、文体复与铜器记载及《诗》三百篇中之雅、颂之叙述有关，吾人当亦不容随意忽略。《尚书》有今古文之争，两千余年论议纷纭，至清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一书出而障翳始明。《汉书 · 刘歆传》云：“暴秦燔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是遂灭。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至孝惠之世，乃挟兵书之律。……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错，从伏生受《尚书》。……诗始萌芽，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伏生所授者为今文，今文家所传凡二十八篇（《尧典》一，合今本《舜典》，而无篇首二十八字。《皋陶谟》二，合今本《益稷》。《禹贡》三，《甘誓》四，《汤誓》五，《盘庚》六，《高宗肜日》七，《西伯戡黎》八，《微子》九，《牧誓》十，《洪范》十一，《金縢》十二，

《大诰》十三，《康诰》十四，《酒诰》十五，《梓材》十六，《召诰》十七，《洛诰》十八，《多士》十九，《无逸》二十，《君奭》二十一，《多方》二十二，《立政》二十三，《愿命》二十四，合今本《康王之诰》。《费誓》二十五，《吕刑》二十六，《文侯之命》二十七，《秦誓》二十八）。古文家称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于孔壁得书百篇，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得多十六篇（其目见于《书疏》。曰《舜典》，曰《汨作》，曰《九共》，曰《大禹谟》，曰《益稷》，曰《五子之歌》，曰《胤征》，曰《汤诰》，曰《咸有一德》，曰《典宝》，曰《伊训》，曰《肆命》，曰《原命》，曰《武成》，曰《旅獒》，曰《冏命》）。《隋书·经籍志》云：当时"经籍散逸，简札错乱，传说纰缪，遂使《书》分为二。"历来论今古文之异者，多谓为文字篆隶之别。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序亦云："文有古今之分者，孔壁书科斗文字，安国以今文读之。盖秦以来，改篆为隶，或以今文写书，安国据以读古文。"不知文字之异点不过偶有不同（《仪礼》郑注可见），而今古间出入之最大者，仍为经说。今古经说解释不同，影响儒学甚大，后世说者更复繁琐枝离，往往说一经者乃至百数十万言，难免冗长破碎之弊。然古文《尚书》之在汉时，初无师说，亦不传授，是以称为《逸书》十六篇。此《逸书》早亡，今所通行者，东晋时梅颐所献之伪古文本，而真书今文二十八篇亦附之以传。今所论列，因伪古文之考辨自阎氏《疏证》以后久经剖明，绝非周以前之作品，故仅限于今文二十八篇。

此二十八篇大约皆述作于周代。《尧典》为尧、舜二帝之传记，《禹贡》相传为夏禹时作，缕述九州之出产及贡赋等。然尧、舜、禹之事迹晦涩茫昧，《尚书》所载，当亦为传说与神话相参混后之叙述，绝非当时人士所记载，且去事实之真相亦必甚远（参考近人所编《古史辨》诸册之考证）。如用铁之事最早亦当始于周代中叶，而《禹贡》中已先言梁州贡铁，其为战国间之作品无疑。"九州"之说，最早铜器中可考见者为春秋时之齐侯镈钟，不过齐东野人之语，而《禹

贡》复言“九州”。又如甲骨卜辞中仅有“十三月”之称而无“闰”字，《尧典》反先言“以闰月定四时成岁”。近人有据古代天文历法推测《尧典》编成之年代者，其结论谓至早亦不过在春秋前半期，要为可信，而《皋陶谟》之著述时代亦大体与之相接。又《甘誓》、《汤誓》、《牧誓》三篇之时代大致相同，出于战国主张吊民伐罪之辩士。近人傅斯年谓：“《汤誓》疑是战国时为‘吊民伐罪论’者做的，可别论。《盘庚》三篇，文辞不如周诰古，而比其他所谓虞、夏、商、周书都古，疑是西周末宋人所追记前代之典。若《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三篇，以文辞论当更后。高宗是儒者所称三年之丧一议之偶像。西伯之称，当是宋人称文王者。周人自称曰文王，商宋人称他曰西伯。《诗》雅颂绝未提及西伯一名，且周人断无称他这一号之理。……此可解释文王、西伯之称，实因周、宋而异。然则《西伯戡黎》又是宋书了。《微子》这一篇说微子不是降周为山阳公崇礼侯，而是遁世，这也很像是宋人曲为其建国之君讳者。就这些看，至少可以假定商书大部分是宋书。”（见《周颂说》，中央研究院出版《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此说甚见确切。至周书十九篇，则更为西周初至东周间之作品，可以确信而无疑义者也。

《尚书》中商书之《盘庚》，前人虽称其为佶屈聱牙，然若视为商代作品则仍不甚可信，已如上述。惟周诰则辞句既甚艰深，而语言意味丰长，文格典古，复多与铜器文字相类，允足推为《尚书》中之代表文字。今举《多士》（节钞首节及最后一段）、《梓材》两篇为例，读者可从而略窥《尚书》文字之一斑。

《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王曰：“告尔殷多士，今予惟不尔杀，予惟时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攸宾，亦惟尔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逊。尔乃尚有尔土，尔乃尚宁干止。尔克敬，天惟畀矜尔，尔

不克敬，尔不啻不有尔土，予亦致天之罚于尔躬。今尔惟时宅尔邑，继尔居，尔厥有干有年于兹洛。尔小子乃兴，从尔迁。”

《梓材》：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达大家，以厥臣达王，惟邦君。汝若恒越曰，我有师师，司徒，司马，司空，尹，旅。曰，予罔厉杀人，亦厥君先敬劳，肆徂厥敬劳。肆往，奸宄、杀人，历人宥，肆亦见厥君事，戕败人宥。王启监厥乱，为民。曰，无胥戕，无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属妇，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养引恬，自古王若兹，监罔攸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陈修，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涂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朴斲，惟其涂丹雘。”今王惟曰：“先生既勤用明德，怀为夹，庶邦享作，兄弟方来，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先王受命。已若兹监。”惟曰：“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

周诰之遣辞用字及用譬喻之处，令人读之已颇有文学彬彬之感。及其后之《秦誓》，为春秋时期秦穆公时之作品，则语言更见畅达矣。其辞如下：

公曰：“嗟！我士！听无哗！予誓告汝群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惟古之谋人，则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谋人，姑将以为亲。虽则云然，尚猷询兹黄发，则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违，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谝言，俾君子易辞，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断断猗，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孙黎民，亦职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恶

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达，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陧，曰由一人；邦之荣怀，亦尚一人之庆。”

此种文字之记述日臻进步，遂为春秋、战国时期记言记事文体之所从祖。此当于后数章中论之，今请更言古代诗篇之渊源。

远溯任何国家、任何民族文学史发源之程序，其韵文之发展，必先于散文者若干年，此为各国文学史之通例。在吾国最早者为《诗》三百篇，希腊则有著名之史诗，印度则有古梵文之歌唱，均为韵文写成，可为此说作事实上之证明者。韵文之中，复以诗歌一体为最先。盖诗歌产生于原始人类生活之真实素描，即为自然感发之歌唱，故其所藉以倾吐哀乐心感之节奏韵律，亦无不归反之于自然。且诗歌多伴音乐舞蹈而俱成，而乐舞又咸为举动中节之表现，故尤不能不禀气怀灵，发情形言，讴咏自然之至极。《尚书》称“诗言志，歌咏言”，《荀子》称“《诗》，言其志也”，《乐记》云“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汉书·艺文志》则谓“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均是此意。后汉卫宏作《毛诗》大序（据《后汉书·儒林传》）更畅达论之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矣。”而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亦云：“虽虞夏以前遗文不睹，禀气怀灵，理无或异，然则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可见自有人类语言开始以来，即有产生诗歌之可能。沈氏以前，历朝如挚虞《文章流别志论》，沈氏以后，如朱熹作《诗集传》，其论诗歌起源之意亦咸同，足征吾国前代之文学观念虽多陈腐，未达明朗之域，然论诗篇之起源，则往往能得肯綮之旨，不失纯粹文学之观点。愈可见韵文之发达最早，而诗歌本身之滋长蔓衍亦最易。即舍《诗》三百篇而言，较古之典籍如《尚书·尧典》、《周易》、《老子》、《论语》、《管子·牧

民》、《韩非·守道》等篇，其用韵之处亦皆斑斑可考。诚以古代文学产生之后，记载文字之工具尚未十分完备，故其流传常恃口耳记诵，而口耳之相传，容多疑缺，则以有韵者为便。清人阮元云："古人以简册传事者少，以口舌传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耳治事者多。同为一言也，转相告语，必有愆误，是必寡其词，协其音，使远近易诵，古今易传。"其言可谓至当。然此特指有意为韵者而言，若如诗歌等咏言情性者，其发端率出于无意间自然之音节，声籁辞达则更合乎天然之音韵无疑矣。是故顾炎武谓："记曰：'声成文谓之音。'夫有文斯有音，比音而为诗，诗成然后被之乐，此皆出于天，而非人之所能为也。三代之时，其文皆本于六书，其人皆出于族党庠序，其性皆驯化于中和，而发之为音，无不协于正。然而《周礼》大行人之职，九岁属瞽史谕书名、听声音，所以一道德而同风俗者，又不敢略也。是以《诗》三百五篇，上自《商颂》，下逮陈灵，以十五国之远、千数百年之久，而其音未尝有异。帝舜之歌，皋陶之赓，箕子之陈，文王、周公之系，无弗同者。"（《音学五书》序）其文举例虽较广泛，容有毫铢之分，至谓音韵之自然则无弗同者，此倘仅就同一时代地域而言，非难之者固无从加以论辩，即或时代不同，若虞夏之与商周，民族、法俗、地域亦且迥异者。若就更大之范畴区画而考察之，则时皆不逾秦汉，地皆不出中原诸省。依古韵学上研究之新系统推论之，顾氏之说初亦未见其谬失也。

诗歌之起源，大凡已如上述，而其产生之环境背景，实与先民之真实生活情态有至密切之关系。《乐记》言："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则乐、舞、歌三者，原为诗歌构成之三大要素。《吕氏春秋·古乐》篇云："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帝，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此种操牛尾而歌之舞乐现象，非特为吾国古代社会某一部落之情形，抑且为今日研究社会

学者观察所得之共同现象。如麦更西(A. S. Mackenjie)氏于其《诗之起源》一书中谓:"诗之发生,实较明晰之语言为先,而最早时原始诗歌之构成,厥为音乐、舞蹈、歌唱三者之三位一体。"莫尔顿(R. G. Moulton)著《文学之近代研究》,以为原始之文学为诗与音乐、舞蹈之混合物,而称之曰"讴歌"(Ballad)。北美印地安土人至今仍有野牛舞,载舞载歌,大约即与《吕览》所述者相仿佛,而毕夏(Bucher)氏复云:"诗歌发达之初期,本与劳动及音乐为紧密之结合。"芬兰大学教授、当世之美学专家希伦(Hirn)更申论之于其所著《艺术之起源》云:"吾人以为最原始时野蛮人之舞蹈,如今日北美印地安人及黑奴之所习为者,要亦非单纯艺术之所启生,而为彼辈日常狩猎射击鸟兽之一种练习动作,此种狩猎鸟兽之动作,由习惯而演成自然之舞蹈。"若然,则吾人于此益可见诗歌之产生与社会实质生活联系关系之密切矣。《曲礼》郑注云:"古人劳役必讴歌,举大木者呼'邪许'。"至今二千余年后举大木者仍呼"邪许",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嗟言所以舒劳动之郁塞,嗟叹之不足而咏歌之,古人之言信然。

吾人今日恒谓《诗》三百篇为最早之诗歌,又谓诗歌产生于最古之原始社会,则必更有诗歌其时代更应在三百篇以前者。惟事实上此种更古之诗歌,因当时缺乏文字之记载,久已失传,即偶有为后代书籍所记述者,亦强半出于伪托。吾人于上文中已明言吾国文字之足以记载事物传达情性者,最早当亦在殷商时期之中叶。观其时甲骨文字,文辞杂糅,字形别异,有时一字之写法乃至数十种,决非已臻成熟之境象,诗体之发展在此时之更幼稚可知。而后世所传托之诗歌,其时代乃更在殷商之前,吾人倘不加辨别,讵信为古代原有之作,无宁近于痴人梦呓。清崔述谓《孔子家语》所收之伪《南风歌》"词露意浅,声曼力弱,正如韩子《拘幽操》之拟文王,《履霜操》之拟伯奇耳"(《唐虞考信录》),其实,如所谓《八伯歌》、《五子

歌》、《刺桀歌》等，又安往而非出于拟作、伪托耶？

中国文学之历史，占世界文学史中最复杂之内容及最悠长之年代，吾人盖早已具此简明之概念。从来之编著中国文学史者，或起自宗周，或远溯自三皇五帝。然古籍中最早之史料为《尚书》，《尚书》所记始于尧、舜，而相传关于尧、舜之史料，先秦诸子已深怀疑其正确性。如韩非云：

> 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显学》）
>
> 皆以尧舜之道为是而法之，是以有弑君，有曲于父。
>
> 尧为人君而君其臣，舜为人臣而臣其君。
>
> 今尧自以为明，而不能以畜舜；舜自以为贤，而不能以戴尧。
>
> 今舜以贤取君之国，而汤、武以义放弑其君，此皆以贤而危主者也，而天下贤之。古之烈士，进不臣君，退不为家；是进则非其君，退则非其亲者也。且夫进不臣君，退不为家，乱世绝嗣之道也。是故贤尧、舜、汤、武而是烈士，天下之乱术也。瞽瞍为舜父，而舜放之。象为舜弟，而杀之；放父杀弟，不可谓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谓义。仁义无有，不可谓明。（以上《忠孝》篇）

此亦可见先秦学者怀疑之主张。而《淮南》亦引尧戒曰："战战栗栗，日谨一日。人莫蹪于山，而蹪于垤。"（《人间训》）

《韩非·六反》篇中，亦引此"人莫蹪于山，而蹪于垤"二语。历来释此尧戒者，多谓为"大圣人忧勤惕厉语"，似未可尽信；又有释作"外患易敌，内奸难防"之意者，亦近穿凿。然尧、舜是否有其人？纵有其人，是否即有其政？东汉时王充已深怀疑之，充之言曰：

> 《尚书》"协和万国"，是美尧德政太平之化，化诸夏并及夷狄也。言协和方外可也，言"万国"，增之也。夫唐之与周，俱治

五千里内。周时诸侯千七百九十三国，荒服戎服要服及四海之外，不粒食之民，若穿胸、儋耳、焦侥、跋踵之辈，并合其数，不能三千。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尽于三千之中矣。而《尚书》云"万国"，褒增过实，以美尧也。(《艺增》)

而唐刘知几作《史通》，其所怀疑者更为确切：

盖虞书之美放勋也，云"克明俊德"，而陆贾《新语》又曰："尧舜之人，比屋可封"，盖因《尧典》成文，而广造奇说也。案《春秋传》云：高阳、高辛二氏，各有才子八人，谓之元、凯。此十六族也，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举。帝鸿氏、少昊氏、颛顼氏各有不才子，谓之浑沌、穷奇、梼杌。此三族也，世济其凶，增其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去。缙云氏亦有不才子，天下谓之饕餮，以比三族，俱称四凶，而尧亦不能去。斯则当尧之世，小人、君子比肩齐列，善恶无分，贤愚共贯。且《论语》有云："舜举咎繇，不仁者远。"是则当咎繇未举，不仁甚多，弥验尧时群小在位者矣，又安得谓之"克明俊德"、"比屋可封"者乎？其疑一也。《尧典》序又云："将逊于位，让于虞舜。"孔氏注曰："尧知子丹朱不肖，故有禅位之志。"案《汲冢琐语》云："舜放尧于平阳而书云：'某地有城，以囚尧为号。'"识者凭斯异说，颇以禅授为疑。然则观此二书，已足为证者矣。而犹有所未睹也，何者？据《山海经》谓放勋之子为帝丹朱，而列君于帝者。得非舜虽废尧，仍立尧子，俄而又夺其帝者乎？……斯则尧之授舜，其事难明。谓之让国，徒虚语耳。其疑二也。(《疑古》)

虞书《舜典》又云："五十载，陟方乃死。"注云："死苍梧之野，因葬焉。"案苍梧者，于楚则川，号汨罗；在汉则邑，称零、桂；地总百越，山连五岭，人风婐划，地气歊瘴。虽使百金之子，犹惮经履其途，况以万乘之君，而堪巡幸其国？且舜必以

精华既竭，形神告劳，舍兹宝位，如释重负。何得以垂殁之年，更践不毛之地。兼复二妃不从，怨旷生离，万里无依，孤魂溘尽。让王高蹈，岂其若是者乎？历观自古人君废逐，若夏桀放于南巢，赵嘉迁于房陵，周王流彘，楚帝徙郴，语其艰棘，未有如斯之甚者也。斯则陟方之死，其殆文命之至乎？（同篇）

若是，则尧、舜即使真有其人，尧、舜时争篡之激烈，政治之黑暗腐败，实至明显，谓其时而有《八伯歌》、《南风诗》、《康衢谣》之制作，殆不可信。近人考据更有主张尧、舜等五帝之传说，实由古代神话之上帝衍变而来（见杨宽：《黄帝与皇帝》论文，刊上海大美晚报《文史周刊》，收入《古史辨》第七册），则其人且为神话中之传说人物，遑论其时代作品之真确性耶。

三百篇以前之歌谣，统据各书所载录者，约有二十余篇。然或因其书决为后世伪托，或因篇章中可举证其为妄人伪造，一经考据家之鉴别，多难置信。历来此种辨伪之著述，代有其人，而收辑成书者，如宋高似孙《子略》、明宋濂《诸子辨》、胡应麟《四部正讹》、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崔述《考信录》等，均可一读。然相传中之古代歌谣，亦颇有二三篇疑与古代文学不无关系者，盖缘其富于古代社会状况之真实感，饶有当时实际生活之意味也。如《击壤歌》：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此诗见于皇甫谧《帝王世纪》，读之颇可窥知古代农民简朴之生活。又如《伊耆氏蜡辞》：

《礼记·郊特牲》云：伊耆氏始为蜡，蜡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祝辞云：

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

此大约为古代农事收获既毕，岁尽祷祝之辞。昆虫毋作，冀害虫得驱远也，草木归其泽，冀草木孳生于池泽之内，勿荒芜良田也。

又如《弹歌》：

《吴越春秋》曰：越王欲谋伐吴，范蠡进善射者陈音。王问曰：孤闻子善射，道何所生？对曰：臣闻弩生于弓，弓生于弹，弹起于古之孝子，不忍见父母为禽兽所食，故作弹以守之。歌曰：

断竹，续竹，飞土，逐宍。

此歌刘勰《文心雕龙》(《通变》、《章句》诸篇)以为系黄帝时歌，虽不可信据，然其来源当颇古，此亦可考见古代风俗之真实情况。上古之世，穴居野处，死无衣衾棺椁以葬，难免鸟鼠蛇兽之侵害，弓矢最早之起源，盖亦因在野外守葬之迫切需要而作。三年之丧，孝子庐墓，则为后世进化后演循之自然结果。儒家推行三年之丧，自亦有其古代原始社会思想之背景也。观夫“吊”字之古文作“弔”，像人形张弓，祭吊之时而需张弓，当然亦为驱逐禽兽之用矣。

又如《麦秀歌》：

《史记·宋微子世家》：箕子朝周，过故殷墟，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为其近妇人，乃歌以悲之。其歌云：

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

《采薇歌》见《史记·伯夷列传》：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此则以忧愤悲挚之感情，写怀旧思国之幽痛，至觉动人。此种作品，即非箕夷所作，亦必为同时口中流传之篇什，而为太史公所采撷者。《太史公书》列传以伯夷居篇首，盖亦深有感于其忠君爱国之热诚，高人隐士之胸襟，及其慷慨悲恻之至情也。

第三章 《诗》三百篇

《诗》三百篇(《诗经》)在吾国古代文学中,实为最光荣、最伟大,且最足以夸耀于世界文学之林之不朽权威,亦即西周末至春秋间(前 1122—前 479)一部极美丽之诗歌结集。一切新文学之来源厥由于民间,而《诗》三百篇内容之大部分,盖即为各地流传之民歌——《国风》。

《诗》三百篇何由而作也?《毛诗》大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班固《艺文志》云:"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又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礼记》云:"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郑玄解之云:"诗者,弦歌讽谕之声也。"宋朱熹《诗集传》序谓:"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综观诸说,自以时代愈后者,解释愈近情理。夫诗歌原为天然情感之表现,亦即文学最初之形式。人类所以发抒个性之情感,表示真挚热烈之心情者,往往借合乎自然音响节奏之诗歌以宣扬之,其间有咨嗟咏叹不能自已者焉,故吾人以为朱子之说较合情理也。

《诗》三百篇之如何集成,传说纷繁。自《史记·孔子世家》以降,皆谓周代旧有采诗之官与献诗之士,孔子删诗后,得三百五篇。《孔子世家》云:

>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

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旧说中之足与此传说相比附者甚多。如采诗一事，今古文经说，实大体相仿佛者：

《左传》襄公十四年引《夏书》云："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杜预《左传注》云："遒人，行人之官。木铎徇于路，求歌谣之言。"《汉书·食货志》云："孟冬之月，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此古文经说之采诗也。

何休《公羊传注》云："五谷毕，人民皆居宅，男女同巷，相从夜绩。从十月尽正月止，男女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此今文经说之采诗也。

献诗之事，见于旧籍者如《国语·周语》云："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晋语》亦云："古之王者，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毛诗·卷阿》传云："明王使公卿献诗。"皆是也。

至于孔子删诗之事，班固亦云："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视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无非推本《史记》之文，殊无异说。近人章炳麟论古箴诗之义云："官箴占繇皆诗。故诗序《庭燎》称箴，《沔水》称规，《鹤鸣》称诲，《祈父》称刺。明诗外无官箴，辛甲诸篇悉在古诗三千之数矣。"又云："瞽师瞍矇皆掌声诗，即诗与箴一实也。故自虞箴既显，扬雄、崔骃、胡广为官箴，体气文旨皆弗能与虞箴异，盖箴规诲刺者其义，诗为之名。"《国故论衡·辨诗》释献诗之实颇详。南宋王应麟著《困学纪闻》，尝谓诗有删章删句删字，引朱子发之言曰："诗全篇删去者二千六百九十四篇，如《狸首》、《曾孙》之类是也。篇中删章者，如'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之类是也。章中删句

者，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是也。句中删字者，如‘谁能秉国成，不自为政，卒劳百姓’是也。”而清初顾炎武更阐删诗之意，以为：

> 孔子删诗，所以存列国之风也。有善有不善，兼而存之，犹古之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而季札听之，以知其国之兴衰。正以二者之并陈，故可以观，可以听。世非二帝，时非上古，固不能使四方之风，有贞而无淫，有治而无乱也。文王之化，被于南国，而北鄘杀伐之声，文王不能化也。使其诗尚存，而入夫子之删，必将存南音以系文王之风，存北音以系纣之风，而不容于没一也。是以《桑中》之篇，《溱洧》之作，夫子不删，志淫风也。《叔于田》为誉段之辞，《扬之水》椒聊为从沃之语，夫子不删，著乱本也。淫奔之诗，录之不一而止者，所以志其风之甚也。一国皆淫，而中有不变者焉，则亟录之：《将仲子》，畏人言也；《女曰鸡鸣》，相警以劝生也；《出其东门》，不慕乎色也，《衡门》，不愿外也。选其辞，比其音，去其烦且滥者，此夫子之所谓删也。（《日知录》卷三）

顾氏心目中所谓之孔子删诗，仅为选辞、比音、去烦且滥三事，允为确当之论。而此三事不过比整音辞，去其烦滥，决非大加汰剔者，则三千古诗之所以仅余什一者，自仍以自然淘汰之结果为多，而并非出于任何人力之废削。《论语》中常举“诗三百”为成数，《墨子·公孟》亦言孔子“诵诗三百，舞诗三百，弦歌三百”，可见三百篇之数大约为古代篇什佚亡淘汰后之自然整数。至于孔子至多不过略加整理而已。清赵翼《陔余丛考》谓左丘明自引及述孔子之言所引者凡四十八则，而逸诗不过三则，其余列国公卿共引诗百一则，而逸诗不过五则。又列国燕享歌诗投报者七十则，而逸诗亦不过五则，是逸诗仅删存诗二十之一也。若古诗有三千余篇，则所引逸诗宜多于删存之诗十倍，岂有古诗十倍于删存诗，而所引逸诗反不及

删存诗二三十分之一也。赵氏之说，统据虽未甚精确(如诸子书中引逸诗未加计算)，然大体可以依信。近人傅斯年著《周颂说》，主张"《诗》各部分之集合应当成于孔子之前，'雅'、'颂'、'南'、'郑'之名均见《论语》，其后流传上大同小异，入汉才有现在所见的定本"，其论最新，且举证甚多，殊近情理，较之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氏之主《诗》三百篇曾经删正，因用韵大体一致之论，其见解实高出其右数倍也。

至于采诗献诗之说，亦有持怀疑论者，清崔述《读风偶识》已云：

> 余按克商以后，下逮陈灵，近五百年，何以前三百年所采甚少，后二百年所采甚多？周之诸侯千八百国，何以独此九国有风可采，而其余皆无之？……且十二国风中，东迁以后之诗居其大半，而春秋之策，王人至鲁，虽微贱无不书者，何以绝不见有采风之使？乃至《左传》之广搜博采，而亦无之，则此言出于后人臆度无疑也。……大抵汉以降之言《诗》者，多揣度而为之说。其初本无的据，而递相祖述，遂成牢不可破之解，无复有人肯考其首尾而正其失者。

而近人日本青木正儿复剿承崔氏之说，著《自诗教发展之径路见疑于采诗之官》一文，以为采诗之官不过为儒家传统之一种理想，殊无事实可以依据。其论分《诗》教之完成为三时期，谓：在西周仅有乐教而无诗教，及春秋赋《诗》之风盛行而《诗》教渐行萌芽，至战国时代而诗教已完成。复以音乐进化之观念考察殷周时代，分为乐主诗从期，乐诗分歧期，及诗教定础期，因而推定孔子以前实无诗教，而孔子实亦未尝删诗。其结论遂主张：周王室有采乐之事而无采诗之事，诗之内容亦仅供音乐之实用，而非供政教之资料。孔子未尝删诗，诗之亡逸为自然淘汰之结果，献诗、采诗、陈诗诸说，不过为《诗》教发展之后，自《诗》教之见地而构成之一种理想论而

已。其说虽见新颖,要不过受辨伪主张影响之深者,所举证多非的确之论。举证较可信者,近人钱夏(玄同)之说为谛。夏有《答顾颉刚先生书》(《读书》杂志第十期,收入《古史辨》第一册)论删诗云:

> 《论语》中说到《诗》的最多。其中《季氏》"鲤趋而过庭……"或不足信(崔述说),《泰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远在孔丘之后,将这两条除开不算外,还有十六则之多。这十六则之中,找不出一点删诗的材料来。其他所引的诗句或篇名,都在今本《诗经》之中,仅"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与"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为逸诗,则孔丘所见的诗,实与今本差不远(若说完全一样,则亦决无此理;即使数目相当,而经二千余年的写刻,内容底亡逸和增窜是必不能免的)。再看《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与《子路》"子曰:诵《诗》三百……,"则孔丘所见的诗,原来只有三百篇,并非删存三百篇,这是以前已经有好多人说过的了。只有《子罕》中有"乐正,雅颂得所"的话,但这话是论乐,不是论《诗》,就算是论《诗》,至多也不过说他编定诗篇次序,决不能作为删诗的证据。我想孔丘如果曾经删诗,则郑风必在被删之列,因为他是主张"放郑声"的(前人有谓"声"是"乐",不是"诗",这是要想曲为弥缝而又强作解人的议论);而且若照秦汉以来底儒者那样用"圣道""王化"来论《诗》,则王柏、阎若璩、万斯同底话真是一点不错,因为必须将《诗经》如此删改,然后可以免于邪僻淫乱而合于圣道王化也。

此可为孔子未尝删诗之主要论证。又其论诗之辑集云:

> 《诗》是一部最古的总集。其中小部分是西周底诗,大部分是东周(孔丘以前)底诗。什么人辑集的,当然无可考征了。至于辑集的时代,我却以为在孔丘以前;孔丘说:"《诗》三百""诵

《诗》三百”，则他所见的已是编成的本子了。……《论语》(《八佾》)子夏所问，并非《硕人》之诗。《硕人》第二章句句都是描写庄姜底身体之美，末了决不能有“素以为绚兮”一句。这一定是别一首诗，但“巧笑”二句与《硕人》偶同罢了。此诗后来全首亡逸。《唐棣》一诗也是全首亡逸。“素绚”为孔丘所称道，固不应删去；即《唐棣》虽为孔丘所不取，然今本无有，亦非有意删去，乃是偶然亡佚的。有亡佚也许还有增窜。例如《都人士》底首章，惟《毛诗》有之，三家均无(见《礼记·缁衣》释文)，不知是本有而三家亡逸呢，还是本无而毛经据《左传》(襄十四)、《礼记》(《缁衣》)、贾谊《新书》(《等齐》篇)增窜呢？无论真相如何，总可以做《诗经》传写必有亡逸或增窜之证。但虽有亡佚或增窜，总是原始本的变相，不能说他们是两个本子。

此大约可称为近人整理《诗经》之总成绩中，对于三百篇之辑集及孔子删诗说二者最近之解释与论证。更细核之，郑玄《诗谱》中虽对于三百篇之时代各有指定，然谬误甚多。大体论之，大约《周颂》为成康以来下至懿孝间诗，无韵者居先，有韵者为后。大、小《雅》南征北伐诸篇，可认为厉宣时作品，其他大约距东迁初迁时不远，无晚于平王者。二《南》之时代约为西周末叶至东周初间。《豳风》始于西周，《王风》成于东迁之后，其确切之时代已不易指明，然在国风中则为早期之作品，而邶、鄘、卫、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诸风，则又东迁后迄春秋时之诗也。

考论三百篇年代之方法，大约先就各诗中之时代确定并无疑问者为主，更取他诗互加比附，考核其语法、用辞、章句之异同，细细磨琢，而后对于诗之时代乃可有更清晰之了解。前人所论据之诗之世次，往往有不可信者。顾炎武《日知录》云：“诗之世次必不可信，今诗未必皆孔子所正。且如‘褒姒威之’，幽王之诗也，而次于前；‘召伯营之’，宣王之诗也，而次于后。序者不得其说，遂并《楚

茨》、《信南山》、《甫田》……。十诗皆为刺幽王作,恐不然也。又如《硕人》,庄姜初归事也,而次于后;《绿衣》、《日月》、《终风》,庄姜失位而作,《燕燕》,送归妾作,《击鼓》,国人怨州吁而作也,而次于前。《渭阳》,秦康公为太子时作也,而次于后;《黄鸟》,穆公薨后事也,而次于前。此皆经有明文可据。故郑氏谓《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小宛》皆刺厉王之诗,汉兴之初,师移其篇第耳。而《左氏传》楚庄王之言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敷时绎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今诗但以'耆定尔功'一章为《武》,而其三为《赉》,其六为《桓》,章次复相隔越。《仪礼》歌《召南》三篇,越《草虫》而歌《采蘋》,《正义》以为《采蘋》旧在《草虫》之前。知今日之《诗》,已失古人之次,非夫子所谓'雅、颂各得其所'者矣。"顾氏之言亦未必全确,因相传之《诗》本事不可依据者甚多,如《武》言"于皇武王",《桓》言"桓桓武王",而《左传》纪楚庄王言,竟以为武王自作者矣。然诗篇次第之不可信,与夫《楚茨》以降十诗之非刺诗,则因顾氏之说而彰甚。且诗又有所谓正变者,更不足据。汉儒见二《南》之周召,遂谓二《南》为正风,邶、鄘、卫以下遂断其为变风矣。《豳风》诗中有周公,故亦见于篇章,自为正风。《小雅·鹿鸣》诸篇,疑其为文王时作也,不得不正。然《六月》有"文武吉甫"之语,尹吉甫为宣王时人,宣王居西周之末,时代既晚,政治必衰,道德必劣,遂称《六月》以下诸诗为变《小雅》。又见《节南山》有"丧乱弘多"之句,宣王之时世乱似不至此,遂又以此后诸篇为"虽有孝子顺孙,百世不能改"之幽王时人所作。直到《何草不黄》四十四篇,均定为刺幽王之诗,而《四月》诸篇之形容颂美与《鹿鸣》意味相同者,则又谓为"复古"、"思见君子"、"美宣王因以箴之"之什。《大雅》中《文王》、《大明》等篇言周初立业之事,遂为正《大雅》。《民劳》中始见"无良"、"惛怓"、"寇虐"诸词,当为变《大雅》。然申伯、吉甫诸名仍在其后,足征《民劳》诸篇在宣王前,宣王前最著

名之暴虐君主为厉王，则此诗亦必厉王时作无疑，而《民劳》以下十三篇，或厉或宣或幽，亦均指为变《大雅》矣。此种论议，苟发之于今日学人之口，莫不以为可笑，然在汉儒，方上说下教以此为说《诗》之天经地义，武帝以后，儒术既崇，此种谬误之见解遂更不易打破之矣。

三百篇之体制，以风雅颂为主。六诗之说，盖始自《周官·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毛诗序》亦云："《诗》有六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郑小同《郑志》以为比、赋、兴"孔子录诗已合风、雅、颂中，难以摘别"，遂以赋、比、兴为诗体。孔颖达《毛诗正义》云："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之事，成此之事，是故同称为六义，非别有篇卷也。"朱熹亦云："所谓六义者，风、雅、颂乃是乐章之腔调，如言仲吕调、大石调、越调之类。至比、赋、兴又别：直指其名，直叙其事者，赋也；本要言其事，而虚用两句钩起，因而接续去者，兴也；引物为况者，比也。立此六义，非特使人知其声音之所当，而使歌者知作诗之法度也。"（《朱子全书》卷三十五）此皆以赋、比、兴为《诗》体。近人章炳麟著《六诗说》（检论卷二），谓赋、比、兴之所以被删者，因赋次有屈原、荀卿诸赋，文繁不可以被管弦；比者辩也，夏后启有《九辩》、《九歌》，晚周宋玉犹仪型之；兴与诔相似，故均不录。其言傅会过甚，实无根据之说。不知秦数用六，汉人沿其说，故书则有六艺、六经，此六义之称，盖亦可作如是观。实则风、雅、颂三者本无何种严格之制限，而赋、比、兴亦不过为体裁上大致之说明而已。

《诗》大序释风、雅、颂之别云：

>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由废兴也。颂者，美

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朱熹《诗集传》序则云:“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词,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大抵国风多为民间之歌谣,雅为士大夫讽谏时政之辞,而颂则为宗庙祭享所用、美盛德之形容者。风凡十有五国,其周、召二《南》及《王风》、《豳风》同出于周,《邶》、《鄘》可并于卫,合之《桧》、《魏》、《陈》、《齐》、《卫》、《唐》、《曹》、《郑》、《秦》,复各因地理、人情、法俗之不同,而各异其作风。秦地于《禹贡》时跨雍、梁二州,诗风兼秦、豳两国,多言农桑衣食、车马田狩之事。唐、魏居河东,其民有先王遗教,君子深思,小人俭陋,故其诗皆思奢俭之中,念死生之虑。郑土狭而险,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故俗称“郑卫之音”。齐居海滨,其诗舒缓。此第就其大概言之,其详盖见于《汉书·地理志》。以人民生活状况之不同,而反映于诗歌中作风之差别有如此者。《左传》襄公廿九年,吴公子季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劝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太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

以下无讥焉。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果此段文字为确,则三百篇之感人可谓深矣。

国风及二《雅》,均无何聚讼之问题,就中虽有主张"南、豳、雅、颂"四诗之说者,然其影响实不甚大。南宋程大昌《诗论》(有《艺海珠尘》本)中《南雅颂为乐诗诸国为徒诗》篇云:

> 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卿大夫士赋《诗》道志者,凡《诗》杂取无择。至考其入乐,则至《邶》至《豳》,无一诗在数。享之用《鹿鸣》,《乡饮酒》之笙《由庚》、《鹊巢》,射之奏《驺虞》、《采蘋》,诸如此类,未有出《南》、《雅》之外者。然后知《南》、《雅》、《颂》之为乐诗而诸国之为徒诗也。《鼓钟》之诗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季札观乐,有"舞象箾南籥"者。详而推之,"南籥",二《南》之籥也;"箾",雅也;"象舞",颂之《维清》也。其在当时亲其古乐者,凡举雅、颂率参以南。其后《文王世子》又有所谓"胥鼓《南》"者,则《南》之为乐古矣。《诗》更秦火,简编残缺。学者不能自求之古,但从世传训故第第相受,于是创命古来所无者以为国风,参匹雅、颂,而文王南乐遂包统于《国风》部汇之内。虽有卓见,亦莫敢出众拟议也。

顾炎武《日知录·四诗》条亦云:"《周南》、《召南》,南也,非风也。豳谓之'豳诗',亦谓之'雅',亦谓之'颂'(据《周礼·籥章》),而非风也。南、豳、雅、颂为四诗,而列国之风附焉,此《诗》之本序也。"后此诸儒之说《诗》者,亦复议论纷纭,或本故训,故杂己臆,殊鲜定论。至于《商颂》之问题,则争论尤多。《商颂》诸篇,通常多认为商诗之

遗留，其实则为宋诗。南宋王应麟《困学纪闻》云："或谓文之繁简，视世之文质。然商质而周文，《商颂》繁而《周颂》简，文不可以一体观也。"复云："《法言》(《学行》篇)曰：正考甫常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父矣。"司马公注《杨子》，谓正考甫作《商颂》，奚斯作《闷宫》之诗，故云。然愚按《史记·宋世家》："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注云："韩诗章句美襄公。"《乐记》"温良而能断者宜歌商"，郑康成注谓商宋诗，盖用《韩诗》说也。考之《左传》"正考甫佐戴武宣"。《世本》"正考甫生孔父嘉，为宋司马，华督杀之而绝其世"。皆在襄公之前，安得作颂于襄公之时乎？《后汉·曹褒传》"奚斯颂鲁，考甫咏殷"，注引《韩诗》"新庙奕奕，奚斯所作"，薛君传云是诗公子奚斯所作。正考甫孔子之先也，作《商颂》十二篇。《诗正义》云："奚斯作《新庙》。而汉世文人班固、王延寿谓《鲁颂》奚斯作，谬矣。然杨子之言皆本《韩诗》，时《毛诗》未行也。"盖尚以为《商颂》为商时所作，为之申辩者。至近人王国维著说《商颂》(《观堂集林》卷二)，而《商颂》为宋国人作之说，始确凿不移。其言曰：

> 《商颂》诸诗作于何时？毛、韩说异。《毛诗序》谓："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父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大师，以《那》为首。"是毛以《商颂》为商诗也。《史记·宋世家》："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集解》骃案：《韩诗章句》亦美襄公。案《集解》虽但引薛汉章句，疑是韩婴旧说，史迁从之。杨子《法言·学行》篇："正考父尝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尝睎正考父矣。"亦以《商颂》为考父作，皆在薛汉前后。汉曹褒及刻石之文亦皆从韩说，是韩以《商颂》为宋诗也。

襄公、考父时代不同，韩说固误。然以为考父所作，则固与《毛诗》同本《鲁语》，未可以臆定其是非也。《鲁语》闵马父谓：

“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大师，以《那》为首。”考汉以前，初无校书之说。即令校字作校理解，亦必考父自有一本，然后取周大师之本以校之，不得言“得”。是《毛诗序》改“校”为“得”，已失《鲁语》之意矣。余疑《鲁语》“校”字当读为效。校者，献也。谓正考父献此十二篇于周大师。韩说本之。若如《毛诗序》说，则所得之本自有次第，不得复云“以《那》为首”也。

且以正考父时代考之，亦以献诗之说为长。左氏昭七年《传》：“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世本》正考父生孔父嘉（《诗商颂正义引》），《潜夫论·氏姓志》亦云：“考孔父之卒，在宋殇公十年。”自是上推之，则殇公十年，穆公九年，宣公十九年，武公十八年，戴公三十四年，自孔父之卒，上距戴公之立凡九十年。孔父佐穆、殇二公，则其父恐不必逮事戴公。即令早与政事，亦当在戴公暮年。而戴公之三十年，平王东迁，其时宗周既灭，文物随之。宋在东土，未有亡国之祸。先代礼乐，自当无恙，故献之周太师以备四代之乐。较之《毛诗序》说，于事实为近也。

然则《商颂》为考父所献，即为考父所作欤？曰，否。《鲁语》引《那》之诗，而曰：“先圣王之传，恭犹不敢专，称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可知闵马父以《那》为先圣王之诗，而非考父自作也。《韩诗》以为考父所作，盖无所据矣。

然则《商颂》果为商人之诗欤？曰，否。《殷武》之卒章曰“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毛、郑于景山均无说，《鲁颂》拟此章则云“徂徕之松，新甫之柏”，则古自以景山为山名，不当如《鄘风·定之方中》传大山之说也。案《左氏传》，商汤有景亳之命。《水经注·济水》篇黄沟枝流北径已氏县故城西，又北径景山东。此山离汤所都之北亳不远，商丘蒙亳以北，惟有此山。《商颂》所咏，当即是矣。而商自盘庚至于帝乙居殷墟、纣居朝歌，皆在河北。则造高宗寝庙，不得远伐河南景山之木。惟宋居商

丘，距景山仅百数十里，又周围数百里内，别无名山，则伐景山之木以造宗庙，于事为宜。此《商颂》当为宋诗不为商诗之一证也。又自其文辞观之，则殷墟卜辞所纪祭礼与制度文物，于《商颂》中无一可寻。其所见之人地名，与殷时之称不类，而反与周时之称相类；所用之成语，并不与周初类，而与宗周中叶以后相类，此尤不可不察也。卜辞称国都曰商不曰殷，而颂则殷、商错出；卜辞称汤曰大乙不曰汤，而颂则曰汤曰烈祖，曰武王，此称名之异也。其语句中亦多与周诗相袭。如《那》之"猗那"，即《桧风·苌楚》之"阿傩"、《小雅·隰桑》之"阿难"、石鼓文之"亚箬"也；《长发》之"昭假迟迟"，即《云汉》之"昭假无赢"、《烝民》之"昭假于下"也；《殷武》之"有截其所"，即《常武》之"截彼淮浦，王师之所"也。又如《烈祖》之"时靡有争"，与《江汉》句同。"约軧错衡，八鸾鸧鸧"，与《采芑》句同。凡所同者，皆宗周中叶以后之诗，而《烝民》、《江汉》、《常武》序皆以为尹吉甫作。扬雄谓正考父晞尹吉甫，或非无据矣。

顾此数者，其为《商颂》袭风、雅，抑风、雅袭《商颂》，或二者均不相袭而同用当时之成语，皆不可知。然《鲁颂》之袭《商颂》，则灼然事实。夫鲁之于周，亲则同姓，尊则王朝。乃其作颂，不摹《周颂》而摹《商颂》，盖以与宋同为列国，同用天子之礼乐。且《商颂》之作，时代较近，易于摹拟故也。由是言之，则《商颂》盖宗周中叶宋人所作，以祀其先王。正考父献之于周太师，而太师次之于《周颂》之后。逮《鲁颂》既作，又次之于鲁后。若果为商人作，则当如《尚书》例在《周颂》前，又当次《鲁颂》后矣。然则《韩诗》以《商颂》为宋人所作，虽与《鲁语》闵马父之说不尽合，然由《商颂》之诗证之，固长于毛说远矣。

综观王氏之论，自以其列举之：(1)《殷武》之卒章曰"陟彼景山，松柏丸丸"云云。(2) 自其文辞观之，殷墟卜辞中所纪祭礼与制

度文物，于《商颂》中无一可寻。其所见之人地名，与殷时之称不类，而反与周时之称相类。(3) 所用之成语，并不与周初相类而与宗周中叶以后相类诸证最为重要。而钱玄同《答顾颉刚书》(《读书》杂志第十期，收入《古史辨》第一册)据清人魏源《诗古微》之论证，更主张《商颂》非东周以前之作品。此盖秉袭前贤微言，羽翼王氏之说，复加以严密之探讨与修正者。其言曰：

王静安先生说《商颂》是西周中叶宋国人底作品，此说我不以为然。王氏不信卫宏《序》以《商颂》为商诗之说，固然不错；以景山及人名、地名、用语、称名等等证明它是宋诗，尤为卓识。但王氏所举与《商颂》"语句相袭"的《苌楚》、《隰桑》、《石鼓文》、《云汉》、《烝民》、《常武》、《江汉》、《采芑》诸周诗，虽旧说以为宣、幽时代底作品，然我却不敢贸然相信，况王氏又说："其为《商颂》袭风、雅，抑风、雅袭《商颂》，或二者均不相袭而同用当时之成语，皆不可知。"则王氏本未尝以此等词句相像为《商颂》是西周时诗之证。但王氏又说："《鲁颂》之袭《商颂》，则灼然事实。夫鲁之于周，亲则同姓，尊则王朝，乃其作颂不摹《周颂》而摹《商颂》，盖以与宋同为列国，同用天子之礼乐。且《商颂》之作，时代较近，易于摹拟故也。"因此断定"《商颂》盖宗周中叶宋人所作，以祀其先王。正考父献之于周太师，而太师次之于《周颂》之后。逮《鲁颂》既作，又次之于鲁后"。他这种证据是不能成立的。他说《鲁颂》袭《商颂》之为"灼然事实"，大概是根据《法言》"公子奚斯尝睎正考甫矣"一语，所以他断定《鲁颂》"徂徕之松，新甫之柏"，是拟《商颂》"陟彼景山，松柏丸丸"。但扬雄这种话，实在没有做证据的价值。其他什么"同为列国"，什么"同用天子之礼乐"，什么"时代较近"，更是臆测无据之谈。盖王氏虽不信卫《序》，但极信《国语》"正考甫校(王氏读为'效'，解为'献也')《商颂》于周

> 太师"之说。我却以为《国语》这句话也不可轻信；因为用了"太师"和"校"这些字样，很有汉朝人的色彩。据我看，还是《史记》说《商颂》是宋襄公时底诗底话，比较地近情。因为《商颂》中夸大之语甚多，极与《鲁颂》相像。魏源《诗古微》因《鲁颂·閟宫》有"荆舒是惩"及《商颂·殷武》有"奋伐荆楚"之语，说"召陵之师，为中夏攘楚第一举，故鲁僖、宋襄归侈厥绩，各作颂诗，荐之宗庙"，其说似乎有理。还有一层，《商颂》文笔非常之畅达，实在不像东周以前底作品。

至于《周颂》，自以清阮元《释颂》(《揅经堂集》)一篇论断最为精当。王国维亦有《说周颂》(《观堂集林》)，傅斯年有《周颂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解释亦颇允当。惟《周颂》及《鲁颂》两者时代与内容之考据，大体原无问题，即或有之，亦不过枝节抵牾，学者可自参考诸篇，本书因篇幅之限制，亦惮于重加节引矣。

三百篇之于周代，实非如后世仅以文学作品视之而已者。孔子谓"不学《诗》，无以言"，又云"《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吾人苟以后世社会生活之眼光观察之，其言殆不可解。不知同时贵族士大夫间之典礼、讽谏、赋答、言语，往往假三百篇之言辞以为应用。此种应用之范围至广，所用之诗，亦不必尽合于作诗者之意志，而但求合于赋诗、称美、祝颂或讽谏者之意志为已足。顾颉刚著有《〈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一文，论之綦详。

《诗》之应用于典礼者甚多，如祭祀则有《小雅·楚茨》，宾宴则用《小雅·鹿鸣》、《白驹》、《周颂·有客》，庆贺则用《大雅·崧高》、《小雅·出车》，颂辞则用《周南·螽斯》、《桃夭》。《仪礼·乡饮酒礼》、《燕礼》、《乡射礼》、《大射仪》各篇，均有乐工歌诗之记载。如《乡饮酒礼》云：

> 设席于堂廉，东上。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皆左

何瑟，后首，挎越，内弦，右手相。乐正先升，立于西阶东。工入，升自西阶，北面坐。相者东面坐，遂授瑟，乃降。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乐《南陔》、《白华》、《华黍》。……乃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乃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蘋》。工告于乐正曰："正歌备。"乐正告于宾，乃降。

此描写奏乐之程序，最为清晰。《礼记》中《投壶》、《射义》，亦记奏《狸首》、《驺虞》、《采蘋》、《采蘩》为节之情形。周代典礼时用诗之状况，盖可于此窥见其一斑矣。

至于三百篇之用于讽谏朝政者，其事实亦甚众。《国语·周语》述邵公之谏厉王曰："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对晋悼公之语亦云："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又《国语·晋语》，范文子戒赵文子曰："吾闻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风听胪言于市，辨祆祥于谣，考百事于朝，问谤誉于路，有邪而正之，尽戒之术也，先王疾是骄也！"凡此皆可认为周代讽谏诗产生之环境。至于讽谏之作品，则如《魏风·葛屦》、《小雅·节南山》、《小雅·何人斯》、《小雅·正月》、《小雅·雨无正》，或意在规劝，或警戒暴虐，均为不可多得之讽谏诗歌也。

赋诗之用，多为主宾间相互之称美及祝颂。孔子谓"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云云，足证赋《诗》常为列国间外交上一种至为庄重优美之辞令。昭公十二年《左传》：宋华定来聘，通嗣君也。公享之，为赋《蓼萧》，弗知，又不答赋。昭子

曰:“必亡! 宴语之不怀,宠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将何以在?”襄公十六年传: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齐高厚之诗不类。”荀偃怒,且曰:“诸侯有异志矣!”使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归。僖二十三年传:晋公子重耳至秦,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赵衰曰:“重耳拜赐。”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级而辞焉。衰曰:“君称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昭二年传:晋侯使韩宣子来聘,公享之。季武子赋《绵》之卒章。韩子赋《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弥缝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赋《节》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树焉,宣子誉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树,以无忘《角弓》?”遂赋《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无以及召公。”襄二十七年传: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笫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 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曰:“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曰:“‘匪交匪敖’,福将焉往? 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昭十六年传:郑六卿饯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子齹赋《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产赋郑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太叔赋《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太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终乎!”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萚兮》。宣子喜曰:“郑其庶乎! 二三君子以君命贶起,赋不出郑志,皆

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数世之主也，可以无惧矣！"宣子皆献马焉，而赋《我将》。子产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乱，敢不拜德？"襄公二十六年传：秋七月，齐侯、郑伯为卫侯故如晋。晋侯兼享之。晋侯赋《嘉乐》，国景子相齐侯，赋《蓼萧》，子展相郑伯，赋《缁衣》。叔向命晋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齐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郑君之不贰也。"国子使晏平仲私于叔向曰："晋君宣其明德于诸侯，恤其患而补其阙，正其违而治其烦，所以为盟主也。今为臣执君，若之何？"叔向告赵文子，文子以告晋侯。晋侯言卫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国子赋《辔之柔矣》，子展赋《将仲子兮》。晋侯乃许归卫侯（晋平公囚卫献公，齐景公、郑简公至晋事）。定四年传：申包胥如秦乞师，曰："吴为封豕长蛇，以荐食上国，虐始于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秦伯使辞焉，曰："寡人闻命矣，子姑就馆，将图而告。"对曰："寡君越在草莽，未获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襄二十七年传：齐庆封来聘，其车美。孟孙谓叔孙曰："豹闻之，服美不称，必以恶终。美车何为？"叔孙与庆封食，不敬；为赋《相鼠》，亦不知也。

赋《诗》可以见志，如伯有、庆封诸人，"不学《诗》，无以言"，在当时即深为他国朝臣列士所讥辱。无此特"登高能赋"善颂善祷而已，初无何种实质上之用途。至于《诗》之用于应对言语者，则更有实质上之作用可见。

三百篇代替言语之用，如宣公二年传：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呜呼，'我之怀矣，自贻伊戚'，其我之谓矣。"襄二十五年传：卫献公自夷仪使与宁喜言，宁喜许之。大叔文子闻之曰："呜乎！《诗》所谓'我躬不说，皇恤我后'者，宁子可谓不恤其后矣！……《诗》曰'夙

夜匪懈,以事一人',今宁子视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襄二十九年传:郑大夫盟于伯有氏,裨谌曰:"是盟也,其与几何?《诗》曰:'君子屡盟,乱是用长。'今是长乱之道也,祸未歇也!"成二年传:晋师从齐师,入自丘舆,击马陉。齐侯使宾媚人赂以纪甗、玉磬与地。……晋人不可,曰:"必以萧同叔子为质,而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对曰:"萧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敌,则亦晋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诸侯,而曰必质其母以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若以不孝令于诸侯,其无乃非德类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今吾子求合诸侯以逞无疆之欲,《诗》曰'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子实不优而弃百禄,诸侯何害焉?"……晋人许之。襄十年传:晋荀偃、士匄请伐偪阳,……围之弗克。……偪阳人启门,诸侯之士门焉。县门发,郰人纥抉之以出门者。……孟献子曰:"《诗》所谓'有力如虎'者也。"定十年传:侯犯以郈叛。……叔孙谓郈工师驷赤曰:"郈非唯叔孙氏之忧,社稷之患也,将若之何?"对曰:"臣之业在《扬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孙稽首。《国语·鲁语》:"诸侯伐秦,及泾莫济。"晋叔向见叔孙穆子曰:"诸侯谓秦不恭而讨之,及泾而止,于秦何益?"穆子曰:"豹之业及《匏有苦叶》矣,不知其他!"叔向退,召舟虞与司马曰:"夫苦匏不材,于人共济而已!鲁叔孙赋《匏有苦叶》,必将涉矣。且舟除隧,不共有法。"是行也,鲁人以莒人先济,诸侯从之。诸例皆可见三百篇用于言语用途之流广,乐声虽有各国之分,而引用之者遍及各地,原无国界之畛域也。

至于三百篇之分类,在形式方面,固有风、雅、颂等大体上之区别,然就内容方面观之,则诗篇排列混淆复杂,殊有加以重新分类之必要。近年颇有人用白话加以语译,读之者如诵当代歌谣,趣味

盎然，弥觉亲切。复有就吾人今日对此三百篇之新认识，重行表列者，今举郑振铎《文学大纲》第一册所试行分表者为例。其分类亦未尽详惬，第此或可为学者将来从事之一种新途径而已：

诗三百篇
- 一　诗人创作（《正月》、《十月》、《节南山》、《嵩高》、《烝民》等）
- 二　民间歌谣
  - (1) 恋歌（《静女》、《中谷》、《将仲子》等）
  - (2) 结婚歌（《关雎》、《桃夭》、《鹊巢》等）
  - (3) 悼歌及颂贺歌（《蓼莪》、《麟之趾》、《螽斯》等）
  - (4) 农歌（《七月》、《甫田》、《大田》、《行苇》、《既醉》等）
  - (5) 其他
- 三　贵族乐歌
  - (1) 宗庙乐歌（《文王》等）
  - (2) 颂神歌或祷歌（《思文》、《云汉》等）
  - (3) 宴会歌（《庭燎》、《鹿鸣》、《伐木》等）
  - (4) 田猎歌（《车攻》、《吉日》等）
  - (5) 战事歌（《常武》等）
  - (6) 其他

上表中所举有诗人创作，如《小雅·节南山》为家父作诵，《大雅·嵩高》、《烝民》为吉甫作诵……，然三百篇作者主名之可考者实不多睹。毛传以《豳风》中之《七月》、《鸱鸮》、《东山》三篇为周公旦所作，虽无的证，然其描写技术确较国风诸篇为精进，似出诸朝士大夫之手，此则必非偶然者（郑表中以《七月》为农歌）。大、小《雅》中，有燕饮祭祀之诗，有赞美祝颂之辞，然其中更为吾人注意者，厥为长篇史诗之发展。如：《大雅·生民》之美后稷，《公刘》之美公刘，《绵》之美大王，《皇矣》之美文王，《大明》之美武王，其叙述姬周先世之史迹，饶有动人之处。《大雅·江汉》叙宣王命召虎征淮夷之事，《常武》叙宣王命皇父征淮徐之事，《小雅·出车》叙厉王时南仲伐猃狁之事，《采芑》叙宣王时方叔伐荆蛮之事，《六月》叙宣王命尹吉甫征猃狁之事，亦复将东周前之重要史迹铺陈尽叙（参看

陆侃如著《诗史》，龙沐勋著《中国韵文史》）。此种史诗，不仅可觇周代文学与武功之盛，亦且可跻列世界著名 Epic 之林而终无愧色者也。惜乎此种史诗之作者，有主名者亦不甚多。雅、颂既均如是，则风诗之出于里巷歌谣者，其作者之不易考见宜矣。

三百篇之形式，以四言句为最多，而三五杂言诸体亦往往有之。晋挚虞《文章流别志论》（辑本）云："古之诗有三言、四言、五言、七言、九言、六言。古诗率以四言为体，而时有一句二句杂在四言之间，后世演之，遂以为篇。古诗之三言者，'振之鹭'、'鹭于飞'之属是也，汉郊庙歌多用之。五言者，'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之属是也，于俳谐倡乐多用之。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属是也，乐府亦用之。七言者，'交交黄鸟止于桑'之属是也，于俳谐倡乐多用之。"此可征后世各种诗体多由三百篇之体制而来。刘勰《文心雕龙》云："《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阅时取证，则五言久矣。"谢榛《四溟诗话》复云："《江有汜》乃三言之始，迨《天马歌》体制备矣。"则五言、三言诗之凭藉三百篇发展之途径而蔚成巨制，盖可知矣。

至于三百篇之用韵，或协于句首尾，或协于句中，而隔句韵之外，更有每句用韵或换韵者。亦有不用韵者，如颂诗《清庙》一章八句，全篇无韵；《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全篇无韵；《时迈》一章十五句，全篇无韵；《思文》一章八句，末四句无韵；《载芟》一章三十一句，末三句无韵（详见顾炎武《诗本音》）。其他修辞方面，文学上之藻饰成分亦甚多，如好用重言、双声叠韵、叠句、对句、隔句对等，不胜枚举。至于形容之美、夸容之盛，如《大雅·绵》篇云"周原膴膴，堇荼如饴"（《文心雕龙·夸饰》篇云："荼味之苦，宁以周原而成饴？并意深褒赞，故义成矫饰。"）《大雅·假乐》云"干禄百福，子孙千亿"（《论衡·艺增》篇："夫子孙虽众，不能千亿，诗人颂美，增益其实。"）《大雅·云汉》云"兢兢业业，如霆如雷。周余黎民，靡有孑

遗”(《论衡·艺增》篇云:“夫旱甚则有之矣,言无孑遗一人,增之也。”)之类,无不富于描写之情韵。形容辞中,更多用重言谐声之创法,如形容雎鸠之声则用关关,形容草虫之声则用喓喓,形容鸡鸣之声则用胶胶,形容鹿鸣之声则用呦呦,形容筑土之声则用登登……是。又有以叠韵二字为联绵形容之辞,如虺隤、委蛇、鞅掌、差池、绸缪、优游等是;双声而兼叠韵,如绵蛮之类是;叠韵而兼双声,如间关之类是。日人大岛正健尝著《诗经中声音字描写之考察》,以古音读考之,具得声韵形容之妙。吾国学者研究三百篇之用韵者,自顾亭林以降,江慎修著《古韵标准》,孔广森著《诗声类分例》,近儒丁以此更著《毛诗正韵》,研究析画益细,所举韵例益繁。

三百篇文辞之内容,境界深隽自然,每有非一二言所可尽述者。然究其实际,则不过为山谣野歌以及朝庙享祀所应用之乐集,决非若后世诗中艺术之细密。然后世诗人斤斤于艺术之细,刻画之工,往往过于曲折,不易领悟,已有类似衰落之趋势,反不如无名诗人激越兴发之音节,发扬蹈厉之叙事之为愈(用傅斯年先生说)如《芣苢》之自然,《蒹葭》之柔情,《君子偕老》、《硕人其颀》、《女曰鸡鸣》之美畅,《柏舟》、《谷风》、《氓》之曲折婉转,《君子于役》之蕴蓄语外,《伐檀》、《硕鼠》之愤诉不平,《七月》之描写农家生活,于严肃态度中,间出以诙谐,《正月》、《繁霜》、《小旻》之意重心长,《民劳》、《板》之叮咛周至,莫不旨远言近,感情真挚有力。在距今二千五百年前,吾国已有此种诗歌之大结集,不可谓为非文学史上初幕之杰构已!

三百篇对于后世影响之巨大,可于其传统地位之崇高而觇得之。然旧说《诗经》为孔圣所删修,汉人举以为六经之首,复用为劝善惩暴之工具,故读诵旧籍者亦多震于其道德上之崇敬观念与权威,而没其文学上之光辉与真价值。如《诗序》云:“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

化，移风俗。”此序为东汉卫宏所伪托，亦可见当时对于三百篇之态度矣。至南宋朱熹《集传》始云：“诗本是恁地说话，一章言了，次章又从而叹咏之。虽别无义理，而意味深长，不可于名物上寻义理。后人往往见其言如此平淡，只管添上义理，却窒塞了他。”“今欲观诗，不若且置小序及旧说，只将原诗虚心熟读。徐徐玩味，见个诗人本意，欲从此推寻将去，方有感发。若被旧说局定，便看不去。”“大率古人作诗，其间亦自存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几时尽是讥刺他人？只缘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说，把诗人意思尽穿凿坏了。”“《小序》大无义理，是后人凑合而成，多就诗中采摭言语，不能发明大旨。”其议论极是，附和者亦甚多，如王应麟谓：“诸儒说《诗》，一以毛、郑为宗，未有参考三家者。独朱文公《集传》，闳意眇指，卓然千载之上。”其推尊有如此者！综观三百篇中，描写男女求偶者如《野有死麕》、《摽有梅》，写恋爱者如《桑中》、《东方之日》，写结婚者如《桃之夭夭》、《何彼秾矣》，写相思者如《卷耳》、《汝坟》，写单恋者如《有女同车》、《出其东门》，写拒爱者如《行露》、《匏有苦叶》，均为言情诗之上乘。其影响所及，如古诗十九首之《明月何皎皎》、《冉冉孤生竹》，秦嘉、徐淑之赠答诗，苏伯玉妻之《盘中诗》，以迄徐陵《玉台新咏》中所收集者，莫不得溯其渊源于此。写景之诗，如《文选》中游览行旅诸作，咏物之诗，如古乐府中题诗景山水草木鸟兽诸作，在三百篇中亦可推寻踪迹。讽谏之诗，如韦孟《讽谏在邹》、东方朔《诫子》、韦玄成《自劾戒子孙》、唐山夫人《安世房中乐》、傅毅《述志》、仲长统《述志诗》等，亦均受有《诗经》风格之感化。然四言之作，三百篇为极盛，其影响虽及于将来之各种诗体，而后人之专行模仿其体制者则殊鲜见（曹操《短歌行》，才雄气盛，为一例外。）盖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不相因袭，顾炎武所谓“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者，势也。

兹选三百篇若干首为例。篇幅虽较繁，读者盖可从而窥见《毛

诗》内容之各方面(依胡适《中国文学史》选例,北京大学出版):

(一)《周颂》

(1)《维天之命》

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骏惠我文王,曾孙笃之!

(2)《我将》

我将我享,维羊维牛,维天其右之!仪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飨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3)《丰年》

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

(二)周民族史诗

(4)《生民》

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

诞弥厥月,先生如达。不坼不副,无灾无害。以赫厥灵,上帝不宁。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诞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置之平林,会伐平林。诞置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訏,厥声载路。

诞实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麦幪幪,瓜瓞唪唪。

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茀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褎。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

诞降嘉种,维秬维秠,维穈维芑。恒之秬秠,是获是亩。恒之穈芑,是任是负,以归肇祀。

诞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释之叟叟,烝之浮浮。

载谋载惟，取萧祭脂，取羝以軷。载燔载烈，以兴嗣岁。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时，后稷肇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

(三) 民歌(上)(《国风》)

(5)《芣苢》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6)《草虫》

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见君子，我心伤悲。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夷。

(7)《静女》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

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

(8)《相鼠》

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

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9)《硕人》

硕人其颀，衣锦褧衣。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维私。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

笑倩兮,美目盼兮。

硕人敖敖,说于农郊。四牡有骄,朱帻镳镳。翟茀以朝。大夫夙退,无使君劳。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涉涉,鳣鲔发发。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10)《伯兮》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

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

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

(11)《木瓜》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12)《葛藟》

绵绵葛藟,在河之浒。终远兄弟,谓他人父。谓他人父,亦莫我顾!

绵绵葛藟,在河之涘。终远兄弟,谓他人母。谓他人母,亦莫我有!

绵绵葛藟,在河之漘。终远兄弟,谓他人昆。谓他人昆,亦莫我闻!

(13)《采葛》

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14)《将仲子》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

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15)《萚兮》

萚兮萚兮，风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萚兮萚兮，风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16)《狡童》

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17)《褰裳》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18)《出其东门》

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

出其闉阇，有女如荼。虽则如荼，匪我思且。缟衣茹藘，聊可与娱。

(19)《著》

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琼华乎而？

俟我于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琼莹乎而？

俟我于堂乎而？充耳以黄乎而？尚之以琼英乎而？

(20)《硕鼠》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

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

(21)《绸缪》

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绸缪束刍，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见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绸缪束楚，三星在户。今夕何夕，见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22)《兼葭》

兼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兼葭凄凄，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兼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23)《无衣》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24)《衡门》

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乐饥。

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取妻，必齐之姜？

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取妻，必宋之子？

（25）《东门之杨》

东门之杨，其叶牂牂。昏以为期，明星煌煌。

东门之杨，其叶肺肺。昏以为期，明星晢晢。

（26）《月出》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忧受兮，劳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绍兮，劳心惨兮！

（27）《七月》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七月流火，八月萑苇，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七月鸣鵙，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

四月秀葽，五月鸣蜩，八月其获，十月陨萚。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言私其豵，献豜于公。

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

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

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嗟我农

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

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28)《鸱鸮》

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

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

予羽谯谯，予尾翛翛。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予维音哓哓。

(四) 民歌(下)(《小雅》)

(29)《采薇》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归曰归，心亦忧止。忧心烈烈，载饥载渴。我戍未定，靡使归聘。

采薇采薇，薇亦刚止。曰归曰归，岁亦阳止。王事靡盬，不遑启处。忧心孔疚，我行不来。

彼尔维何？维常之华。彼路斯何？君子之车。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

驾彼四牡，四牡骙骙。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鱼服。岂不日戒？猃狁孔棘。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30)《杕杜》

有杕之杜，有睆其实。王事靡盬，继嗣我日。日月阳止，女心伤止，征夫遑止！

有杕之杜，有叶萋萋。王事靡盬，我心伤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归止。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忧我父母。檀车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远！

匪载匪来，忧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为恤。卜筮偕止，会言近止，征夫迩止！

(31)《黄鸟》

黄鸟黄鸟，无集于谷，无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谷。言旋言归，复我邦族。

黄鸟黄鸟，无集于桑，无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与明。言旋言归，复我诸兄。

黄鸟黄鸟，无集于栩，无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与处。言旋言归，复我诸父。

(32)《斯干》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无相犹矣！

似续妣祖，筑室百堵，西南其户。爰居爰处，爰笑爰语。

约之阁阁，椓之橐橐。风雨攸除，鸟鼠攸去，君子攸芋。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翚斯飞，君子攸跻。

殖殖其庭，有觉其楹，哕哕其正，哕哕其冥，君子攸宁。

下莞上簟，乃安斯寝。乃寝乃兴，乃占我梦。吉梦维何？维熊维罴，维虺维蛇。

大人占之："维寝维罴，男子之祥。维虺维蛇，女子之祥。"

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喤喤，朱

芾斯皇，室家君王！

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贻罹。

(33)《无羊》

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

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或负其糇。三十维物，尔牲则具。

尔牧来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尔羊来思，矜矜兢兢，不骞不崩。麾之以肱，毕来既升。

牧人乃梦，众维鱼矣，旐维旟矣。大人占之："众维鱼矣，实维丰年；旐维旟矣，室家溱溱。"

(34)《苕之华》

苕之华，芸其黄矣。心之忧矣，维其伤矣！

苕之华，其叶青青。知我如此，不如无生！

牂羊坟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鲜可以饱！

(35)《何草不黄》

何草不黄，何日不行！何人不将！经营四方。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独为匪民。

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栈之车，行彼周道。

(五) 讽谕诗

(36)《北门》

出自北门，忧心殷殷。终窭且贫，莫知我艰。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王事适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遍谪我。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遗我。我入自外,室人交遍摧我。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37)《黍离》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穗。行迈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实。行迈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38)《伐檀》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辐兮,置之河之侧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亿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轮兮,置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沦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鹑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39)《山有枢》

山有枢,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娄。子有车马,弗驰弗驱。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内,弗洒弗扫。子有钟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乐,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40)《正月》

正月繁霜，我心忧伤。民之讹言，亦孔之将。念我独兮，忧心京京。哀我小心，癙忧以痒。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后？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忧心愈愈，是以有侮。

忧心茕茕，念我无禄。民之无辜，并其臣仆。哀我人斯，于何从禄？瞻乌爰止，于谁之屋！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视天梦梦。既克有定，靡人弗胜。有皇上帝，伊谁云憎？

谓山盖卑，为冈为陵。民之讹言，宁莫之惩。召彼故老，讯之占梦，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

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维号斯言，有伦有脊。哀今之人，胡为虺蜴！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则，如不我得。执我仇仇，亦不我力。

心之忧矣，如或结之。今兹之正，胡然厉矣？燎之方扬，宁或灭之？赫赫宗周，褒姒灭之！

终其永怀，又窘阴雨。其车既载，乃弃尔辅，载输尔载，将伯助予。

无弃尔辅，员于尔辐。尔顾尔仆，不输尔载，终逾绝险，曾是不意。

鱼在于沼，亦匪克乐。潜虽伏矣，亦孔之炤。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邻，昏姻孔云。念我独兮，忧心殷殷。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谷。民今之无禄，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独！

(41)《十月之交》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则维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

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维宰，仲允膳夫，棸子内史，蹶维趣马，楀维师氏，艳妻煽方处。

抑此皇父，岂曰不时？胡为我作，不即我谋？彻我墙屋，田卒污莱，曰"予不戕，礼则然矣"。

皇父孔圣，作都于向。择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慭遗一老，俾守我王。择有车马，以居徂向。

黾勉从事，不敢告劳，无罪无辜，谗口嚣嚣。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职竞由人。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羡，我独居忧。民莫不逸，我独不敢休。天命不彻，我不敢效我友自逸。

(42)《烝民》

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监有周，昭格于下，保兹天子，生仲山甫。

仲山甫之德，柔嘉维则，令仪令色，小心翼翼。古训是式，威仪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赋。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缵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纳王命，王之喉舌。赋政於于，四方爰发。

肃肃王命，仲山甫将之。邦国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人亦有言："柔则茹之，刚则吐之。"维仲山甫，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强御。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鲜克举之。"我仪图之，维仲山甫举之，爱莫助之。衮职有阙，维仲山甫补之。

仲山甫出祖，四牡业业，征夫捷捷，每怀靡及。四牡彭彭，八鸾锵锵，王命仲山甫，城彼东方。

四牡骙骙，八鸾喈喈。仲山甫徂齐，式遄其归！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胡适《中国文学史》选例云："此诗是颂赞的诗，但诗中富有哲学意味，最可以表现古人说理的能力。此诗的一、二、四、五、六章，后世引用最多，影响也最大。《小雅·六月》诗中有'文武吉甫，万邦为宪'，'吉甫燕喜，来归自镐，饮御诸友'的话。吉甫似是前八世纪的一位文武全才的大臣。旧说他作的诗有《崧高》、《江汉》、《韩奕》及此诗。此诗与《崧高》之末皆明说'吉甫作诵'，当可无疑。"）

第四章　春秋战国时期

周自平王东迁之四十九年(公元前 722 年)至敬王四十一年(公元前 479 年),为《春秋》一书编年纪录之时代,是为春秋时期。自春秋末季,历二百五十余年以至秦始皇之统一(公元前 221 年),是为战国时期。在春秋战国时期间,周王政之统一日渐破坏,诸侯争伐,世道衰微;而各国则政治、社会、经济、武力、文化诸方面之发展,反因其国力之膨胀及环境之变迁,而有长足之进步。古代兴官师之制,本罕私人著述,至此时期之后半,因频年战乱,礼乐崩坏,文物播迁,遂分裂为私家之学。世卿世官之制既除,布衣谈说,立致卿相,于是学术更见崇隆,著作之风,因简册布帛等物质上之进步而大盛。古代文字之记载本极简单,如前引卜辞、金文诸例是,而春秋时代之古史文(鲁《春秋》经文),其简赅之情形亦复如是。此盖因当时记录文字之工具尚属窳陋,而著作史书昭示后人之观念亦未臻成熟之故。当时史官虽有褒贬之书法,其事盖亦由于古巫祝、卜史之沿革(如晋灵公时崔杼弑其君,董狐书赵盾、赵穿弑君)尚未必有修饰文辞、订立体例之深意。鲁《春秋》文后经孔子删改(《公羊传》曾引"不修《春秋》曰"可证),然尚可略窥古史文一部分之真相:

隐公元年,春,王正月。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

此种体裁,苟无诸传之解释阐明,实难完全了解其意义。然此确为

适合当时文书物质情形之记事，后世如古本《竹书纪年》作于战国时等书，虽成于较后之时代，其时长篇文书多已写成，亦仍多摹仿其简单之记载，而衍成各国官书所习用之简短体裁。至如宋王安石尝谓《春秋》为断烂朝报，此则不免讥以后世进步之眼光，衡量过于苛责矣。

古书散佚，遂使近人多倡孔子以前无私人著书之论。然《左传》、《国语》诸书所引"前志"(《左传》文六年、成十五年)，"志"(《左传》襄二十五年，《国语·晋语九》)，"周志"(《左传》文二年，《汲冢周书》第三十七)，《军志》(《左传》僖二十八年、宣十二年)，史佚之"志"(《左传》成四年、僖十五年、文十五年、襄十四年，《国语·周语下》)，《论语》，《左传》(隐六年)引周任之言，均在孔子以前者，并可窥见春秋时代古书体裁之梗概。《论语》以前更有《老子》书，其书为韵文口诀体，虽近人对老子及《老子》书之时代怀疑者颇多(参看北京大学哲学系出版之《哲学论丛》、胡适之《胡适论学近著》、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补》、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然其说多不易成立，故胡适、吕思勉等拥旧说者仍较有充足可信之理由。如有韵体便记诵，用牝牡不用男女诸证，均可见其书流传之悠久。兹引列诸条如下：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二章)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十一章)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无欲以静，

天下将自定。（三十七章）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四十三章）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四十七章）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六十六章）

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细也夫！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六十七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手矣。（七十四章）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故圣人云：爱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谓天下王。正言若反。（七十八章）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八十章）

《老子》书中之主张，可视为道家哲学之代表。或以其与黄帝之传说相依据而并称为黄老，或与庄子思想等量而合为老庄，然实为

一思想史上问题核心之人物。第就其文字结构及文思之朴质简炼论之，其时文书工具尚未发达，似非晚出之作也。

老子而后，私家著作之最早者，当推孔门弟子所笔记之《论语》。《论语》之文字，除少数外，仍多含蓄较深之意义，而未能于文字上完全尽记。推测此种语长文简之原因，大约《论语》成书之时代，文书之物质尚极难获得，记录口语，仅记纲目以免遗漏，而精微深远之涵义则仍凭口说，未必全在布帛。如“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诸章，苟非附带本事，后儒展转忖度，常易与他种思想混合，发生误会。此种情形，吾人即观察“去古未远”之汉儒，彼等对于《论语》之记载亦往往有不审其为何而发之感想，便可证明。然《论语》记事之处为少，记言之处较多，已颇有较丰富之文字与情感可资表章者，亦不可持一隅而概论其全貌也。例如：

(1) 注重助语辞应用之例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子曰：“由，诲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

(2) 文辞优美之例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

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三人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

矣。”

迨至战国以后，文书之工具远较《论语》成书之时代为发达，各种文字记录遂渐由简约之文言，进而为排铺衍饰之长篇大论，或更成为譬况之寓言。吾人推测《论语》成书之时代大约为曾子弟子时，去孟子时虽不远，然《孟子》书之编成，为时当更后，其时文书工具已甚形利便，故《孟子》书中所记载之长篇记言文字，极见流利丰畅。今人之讽诵古文者，多谓《孟子》之议论文字丰沛在《论语》上，尤多辩驳之辞，视为习作古文之梯阶，不知此为战国后文书工具视昔发达之结果，非必《孟子》书中之人物尽善说辩且必较《论语》书中诸人物为优也！兹举《孟子》之长篇论答文字两则为例，以明吾说：

(1) 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予’，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污池、沛泽多而禽兽至。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书》曰：‘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佑启我后人，咸以正无缺。’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

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2) 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孟子曰：“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棬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桮棬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桮棬，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告子曰：“生之谓性。”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曰：“然。”“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曰：“然。”“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欤？”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孟子曰：“何以谓仁内义外也？”曰：“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于外也，故谓之外也。”曰：“异于白，马之白也，无以异于白人之白也，不识长马之长也无以异于长人之长与？且谓长者义乎，长之者义乎？”

曰："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是以我为悦者也，故谓之内；长楚人之长，亦长吾之长，是以长为悦者也，故谓之外也。"曰："耆秦之炙无以异于耆吾炙，夫物则亦有然者也，然则耆炙亦有外与？"

记言文为战国时文体之初步，舍前所引《论语》、《孟子》两书外，馀如《庄子》、《晏子》、《管子》、《墨子》书中之若干部分，以及兼记事言之《国语》，均可谓同属于此一系统之文字。兹更引《庄子》内篇为例，吾人更可窥见其寓言体之形式：

(1)《逍遥游》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

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枪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汤之问棘也是已。

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

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此小大之辩也。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虽然,犹有未树也。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

(2)《养生主》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盍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却,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謋然已

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寓言之体，往往藉假托取譬为喻，有时颇不易取信。且思想发抒之方法亦不仅限于对话，常可据题论著而成为个人之单语。此种单语体之论著，大致成于战国之中期。如《荀子》、《商君书》、《韩非子》及《管子》之一部分，均可属于此单语论著之系统。此种情形，不能见于《论》、《孟》、《庄子》诸书，足征为战国诸子文体之一大进步。如：

(1)《荀子·性恶》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故枸木必将待檃栝烝矫然后直，钝金必将待砻厉然后利。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今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使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今之人，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者，为君子；纵性情、安恣睢而违礼义者，为小人。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孟子曰：“人之学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

(2)《荀子·天论》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祆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祆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唯圣人为不求知天。

(3)《韩非·五蠹》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蜯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禹、汤、武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古者

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膢腊而相遗以水；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饷；穰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争土橐，非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

(4)《显学》

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学之诚乎？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

必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愚诬之学，杂反之行，明主弗受也。

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丧三月，世主以为俭而礼之。儒者破家而葬，服丧三年，大毁扶杖，世主以为孝而礼之。夫是墨子之俭，将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将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俭俱在儒、墨，而上兼礼之。漆雕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世主以为廉而礼之。宋荣子之议，设不斗争，取不随仇，不羞囹圄，见侮不辱，世主以为宽而礼之。夫是漆雕之廉，将非宋荣之恕也；是宋荣之宽，将非漆雕之暴也。今宽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礼之。自愚诬之学、杂反之辞争，而人主俱听之，故海内之士，言无定术，行无常议。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今兼听杂学缪行同异之辞，安得无乱乎？听行如此，其于治人又必然矣。

今世之学士语治者，多曰："与贫穷地以实无资。"今夫与人相若也，无丰年旁入之利而独以完给者，非力则俭也。与人相若也，无饥馑、疾疚、祸罪之殃独以贫穷者，非侈则堕也。侈而堕者贫，力而俭者富。今上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是夺力俭而与侈堕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节用，不可得也。

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世主必从而礼之，贵其智而高其行，以为轻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陈良田大宅、设爵禄，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贵轻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世主必从而礼之，曰："敬贤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税，耕者也；而上之所养，学士也。耕者则重税，学士则多赏，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谈，不可得

> 也。立节参明，执操不侵，怨言过于耳必随之以剑，世主必从而礼之，以为自好之士。夫斩首之劳不赏，而家斗之勇尊显，而索民之疾战距敌而无私斗，不可得也。国平则养儒侠，难至则用介士，所养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养，此所以乱也。且夫人主之于听学也，若是其言，宜布之官而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为是也而弗布于官，以为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乱亡之道也。

《韩非》、《荀子》、《商君书》及《管子》之一部分，颇多舍记言之体而专抒己见据题立论者。《史记·吕不韦列传》云："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此种著书，内容已多由对话而进为单语，其时代大约在战国中期之后。此战国诸子文体演变之第二阶段也。而墨子之演说体裁，朴茂说理，尤见流畅。如《非攻》上篇云：

> 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入人栏厩取人马牛者，其不仁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杀不辜人也，扡其衣裘、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矣、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
>
> 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情不知其不义也，故书其言以遗后世，若知其不义也，夫奚说书其不义以遗后世哉？

> 今有人于此，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则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辩矣；少尝苦曰苦，多尝苦曰甘，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甘苦之辩矣。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辩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辩义与不义之乱也。

论著之体，虽已非单纯记言，然仅此种独立之论著，仍未能进步至成书之观念。至战国晚年，五德终始之论盛行，而著论者始亦稍趋于系统化。如《庄子·天下》篇云慎到著《十二论》，以齐物为首，如吕不韦之《八览》、《六论》、《十二纪》，均可认为由著述论说之相为终始，即渐著成一系统之书籍者。此种发展，可称为战国诸子文体演变之第三阶段，亦可视为较前进步愈臻显著者也。吕不韦以秦仲父之尊，聘集儒者著所闻见，训解凡十余万言。《汉书·艺文志》列《吕氏春秋》二十六篇于杂家，其叙论云："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细核全书内容，创作之处甚鲜，而文字则多谨饬修整，复因其杂集诸子学说并存而混合之，常可藉以考镜诸家之渊源。且依著书体裁之演进论之，前于《吕览》者仅成单篇，未见著为系统之书籍，则《吕览》之贡献可谓甚大。自此而后，如西汉《淮南》、《太史公书》等，系统成书之观念更见浓厚矣（详见傅斯年著《战国文籍中之篇式书体》，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二分）。

记言文之演进，吾人于上述中已可略得梗概。记事文之演进复何如耶？综观记事文之发展，自甲骨片断之单辞记事，进而为《尚书》或周金文中之长篇记事，已有长足之进步。而由各个之单辞记事，演变为编年式之简单记事，如《春秋》之编著，其进化较前为尤甚。然当时终因文书物质工具之艰难，故汇集丰富之记事文字而成专书之《国语》、《左传》等，其著书之年代乃在孔子获麟后约五十年左右。其时文书工具更见复杂，故《国语》、《左传》等书文字之畅达、

比譬之赡美，颇可与记言文之《孟子》、《庄子》诸书等量而齐观。近人褚传诰著《文学蜜史》，其论《左传》略云：

西山真氏《文章正宗》录左丘明文为冠，分辞命、议论、叙事三条，而叙事最有体要。如伐楚盟召陵（僖四年），齐桓公之霸也；战于韩（僖十五年），秦晋兵争之始也；战于泓（僖二十二年），宋襄求霸之终事也；战于城濮（僖二十八年），晋文公之霸也；济河焚舟（文三年），秦穆公之霸也；战于邲（宣十二年），楚庄王之霸也。鄢陵之战（成十六年），言楚之不竞也。三代王降而霸，春秋首尾大约皆五霸之事，左氏纤悉具备，而叙次城濮、邲、鄢陵之战，为史家权舆。自汉以来，学者但知尊公、谷两家以空文说经，而左氏之学中晦，遂使五经杂史，百家诸子，其言河汉，无所遵凭。故其记事也，当晋景行霸，公室方强，而云屠岸贾攻赵，有程婴、杵臼之事（《史记·赵世家》：晋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贾不请而擅攻赵氏于下宫，杀赵朔，灭其族。朔妻成公姊走公宫，生男，贾闻之索于公宫，不得。程婴、公孙杵臼谋匿赵孤）；鲁侯御宋，得俊乘丘，而云庄公败绩，有马惊流矢之祸；（《檀弓》：鲁庄公及宋人战于乘丘县，贲父御，马惊败绩，遂死之。国人浴马有流矢在白肉）；楚、晋相遇，唯在邲役，而云二国交战，置师于两棠（《贾子新书·先醒》篇：昔楚庄王即位，自静三年以讲得失，宋、郑无道，庄王围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奉簪而献国。庄王曰非利之也，弗受。乃南与晋人战于两棠，大克晋人）；子罕相国，宋睦于晋，而云晋将伐宋，觇哭于阳门（《檀弓》：阳门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晋人之觇宋者，反报于平侯曰：民悦，殆不可伐也。是时，子罕司城而向戌方弭兵，在襄公二十七年）；鲁师灭项，齐止僖公，而云项实桓灭，《春秋》为贤者讳（《公羊传》：孰灭之？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桓公讳也。《春秋》为贤者讳，此灭人之国，何贤尔？

君子之恶恶也疾始，善善也乐终。桓公尝有继绝存亡之功，故君子为之讳也。然僖十一年会于淮，十七年灭项，淮之会公有诸侯之事未归，而取项齐人以为讨而止公，则非齐灭可知)；襄公再盟，君臣和协，而云诸侯失政，大夫执权。(《谷梁传》：诸侯盟，又大夫相与私盟，是大夫张也。故鸡泽之会，诸侯始失政，大夫执国权，然是时晋悼方继霸为盟主，在襄三年。)其记时也，则秦穆居春秋之始，而云其女为荆平夫人(《列女传》：伯嬴者，秦穆公之女，楚平王之夫人，昭王之母也。昭王时，吴入郢，王亡，吴尽妻其后宫。伯嬴持刀曰：诸侯外淫者绝，卿大夫放，士庶人宫割。妾以死守，欲为乐而妾死，何益？吴王惭，遂退舍)；韩、魏处战国之时，而云其君陪楚庄葬马(《滑稽传》：优孟者，故楚之乐人也。楚庄王有所爱马死，欲以大夫礼葬之。优孟曰：薄请以人君礼葬之，齐赵陪位于前，韩楚翼卫于其后)；《列子》书论尼父，而云在郑穆公之年(刘向《诸子略》所校《列子》定著八篇，皆杀青书。列子者郑人也，与郑缪公同时，盖有道者也。按《左传》穆公有疾刈栏而卒，在宣三年，文五十五年始有孔子)；扁鹊疗虢公，而云当赵简子之日(《扁鹊传》：赵简子疾五日，不知人，召扁鹊。扁鹊入视病，出曰：血脉治也。居二日半，简子寤。其后过虢，虢太子死，扁鹊曰：臣能生之。虢君闻之出曰：幸而举之。扁鹊厉针砥石以取外三阳五会，太子苏。按《左传》僖五年，晋灭虢，简子则定、哀间人也)；栾书仕于周子，而云以晋文如猎犯颜直言(《新序·杂事》：晋文公遂麋而失之，问之农夫老古，老古曰：一不意人君如此也。君放不归，人将君之。文公恐，归，遇栾武子，武子曰：猎得兽乎？曰：得善言。曰：取人之善而弃其身，盗也。文公还，载老古与俱归。按武子栾书在晋景公时；文公，景公之祖也)；荀息死于奚齐，而云观晋灵作台，累棋申诫(《文选·西征赋》注《说苑》云：晋

灵公造九层之台，孙息上书求见曰：臣能累十二博棋，加九鸡子其上。公曰：危哉！息曰：复有危于此者。公即坏九层之台。按孙息即荀息，晋献公时人；灵公，献公曾孙）；或以先为后，或以后为先，日月颠倒，上下翻覆，古来君子曾无所疑。及《左传》既行。而其失自显，语其宏益，不亦多乎？（已上记事、记言两段俱引见《史通·申左》）。盖左氏以同圣之才，而膺授经之托，加以达者七十，弟子三千，远自四方，同在一国，于是上询夫子，下访其徒，凡所采摭，实广闻见。乃昧者犹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晋太康中，汲冢获书，全同左氏，由是世称实录，不敢复非其书。故束晳云：若使此书出于汉世，刘歆不作五原太守矣。于时挚虞、束晳引其义以相明，王接、荀勖取其文以相证，杜预申以注释，干宝藉为师范，大官之富，不比卖饼家儿，经繇之评当矣。自韩子谓左氏浮夸，宋儒因之，讥其不本于义理，而三病之说以起。于是有谓《左传》出三晋辞人手者，有谓"君子曰"是刘歆之辞，有谓叙事错杂，多难辨者。杨升庵谓左氏书赵朔、赵同、赵括事，茫然如堕蒙瞶，既书字，又书名，又书官，似谜语诳儿童者。读《春秋》之经则如天开日明，古今文章，《春秋》无以加矣。公、谷之明白其亚也。左氏浮夸繁冗，乃圣门之荆棘，而人以为珍宝，实文弊之始也。是则又以其小疵，汩没其全体，所谓忘我大德、日月用焉而不知者耳。夫左氏书周、晋、齐、宋、楚、郑等国之事，最详于晋，每出一师具列将佐，宋则每因兴废备举六卿，故知史策之文，每国各异。左氏得此数国之史以授门人，义则口传未形竹帛，后世学者乃总而合之，以为传记。又广采当时之文籍故训，与子产、晏子及诸国卿佐家传，并卜筮杂占、小说讽谏等杂在其中，故是非交错，混然难证。然石言神降之类，乃常变无定，亦阴阳之义。且事有传疑，《春秋》所许，以是谓为浮淫，并疑夫子之所称，过矣。刘知

几《申左》曰：左氏述臧哀伯谏桓纳鼎，周内史美其语言，王子朝告于诸侯，闵马父加之辨说，凡如此类，其数实多。斯盖当时发言，形于翰墨，立名不朽，播于他邦，而丘明仍其本语，就加编次，亦犹近代《史记》载乐毅、李斯之文，《汉书》录晁错、贾生之笔，寻其实也，岂是子长笔削、孟坚雌黄所构者哉？又曰：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如僖伯谏君观鱼、富辰谏王纳带、王孙劳楚而论九鼎、季札观乐而谈国风，其所援引，皆据礼经之类。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如剡子聘鲁言少昊以鸟名官，季孙行父称舜举八元、八恺，魏绛答虞人之箴，子革讽灵王诵祈招之句，其事明白，非是厚诬之类)，徵近代则循环可覆(如吕相绝秦述两国世隙，声子班荆称楚材晋用，晋士渥浊谏杀荀林父，说文公败楚于城濮，有忧色，子服景伯谓吴云：楚围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犹无城下之盟，祝佗称践士盟晋重耳、鲁申、蔡甲午之类)。斯盖当时国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编而次，配经称传而行也。如二传者，记言、记事，失彼精华，寻源讨本，取诸胸臆。夫自我作古，无所准绳，故理甚迂僻，言多鄙野，比诸左氏，不可同日而语矣。且即以名字错出而论，盖亦当时文法如此，不独一赵同、赵括也。越椒之乱，一斗般也，又曰子扬；一艿贾也，又曰伯嬴。邲之战，一荀林父也，又曰桓子；一士会也，又曰随武子，又曰随季，又曰士季，他篇又称范武子；一先谷也，又曰彘子，他篇又称原谷；一荀首也，又曰知庄子，又曰知季。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顾后来文家亦往往蹈袭，未闻有非之者。焦氏《易林》申公颠倒，巫臣乱国；刘琨《答卢谌》诗"宣尼悲获麟，西狩涕孔丘"；谢惠连《秋怀》诗"虽好相如达，不同长卿慢"；沈约《宋书·恩幸传论》胡广累世农夫，伯始致位公相，黄宪牛医之子，叔度名动京师，皆一人而兼举其名字也。古诗谁能刻镂此，公输与鲁班，下一"与"字，竟

以公输、鲁班为二人，则不通矣。而况左氏义深君父，颖叔、石碏之类，皆有殊称，以寓褒贬，能据实事以求圣经，则《春秋》之能事毕矣。盖文武之教，入人甚深，自《诗》、《书》所载而外，惟左氏为备。当是时，强凌众暴，天下靡然，骛于战争。然而列国诸侯朝会聘问，则有玉帛以将之；好会燕饮，则有歌《诗》以侑之；强大之侵伐于小国，则称王制以折之；其不幸而至于两军相遇，则犹有辞命以先之、执榼承饮以劳之，使人至今得想见先王之遗风者，左氏之书也。至其亲受于夫子，释经之例尤详。杜氏谓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归，又不徒在区区文字间也。……顾栋高自言年二十七八，执笔学为古文，始深识左氏文章用意变化处，而嗤近日所评提掇照应者，为未脱兔园习气。彼盖深于左癖，其所得皆关经义之大，能自成一家言。如竟以相斫书目之，则真膏肓之谬说矣。

其议论虽未免迂阔，然论左氏文章，要亦有可取处。近人仍多谓《左传》书晚出，刘歆或杜预尝割裂之以配《春秋》经文。此说今文家主之最坚，如刘逢禄、康有为等均曾详加论列。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著《左传真伪考》，颇以为《左传》为晋国人作。其论就鲁语系统之文字与《左传》之文字对勘，发现其中殊异之点甚多，而《左传》每与晋语系统文字逼肖，是《左传》之非必鲁左丘所作可知矣。而清儒俞正燮又尝就山东地理而考得左氏裔姓，言之凿凿。然则《左传》之时代作者与夫其书之性质内容，有待于吾人补释董理者，更不胜其繁博冗琐矣(俞作见《癸巳类稿》)。

兹举《左传》文字数则为例，以见古代记事文进步之概况。

(甲) 春秋时代之誓命

(1) 宁俞：与卫人盟于宛濮(僖二十八年)

天祸卫国，君臣不协，以及此忧也。今天诱其衷，使皆降心，以相从也。不有居者，谁守社稷？不有行者，谁扞牧圉？不

协之故，用昭乞盟于尔大神，以诱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后，行者无保其力，居者无惧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纠是殛！

(2) 士燮：与楚盟于宋西门外(成十二年)

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灾危，备救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其师，无克胙国！

(3) 士丐：同盟于亳载书(襄十一年)

凡我同盟，毋蕴年，毋壅利，毋保奸，毋留慝；救灾患，恤祸乱，同好恶，奖王室。或间兹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国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队命亡氏，踣其国家！

(4)戏之盟载书(襄九年)

(a) 晋士弱载书

自今日既盟之后，郑国而不唯晋命是听，而或有异志者，有如此盟！

(b) 郑公子驷载书

自今日既盟之后，郑国而不唯有礼与强可以庇民者是从，而敢有异志者，亦如之！

(5) 蒯聩：战祷(哀二年)

曾孙蒯聩，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郑胜乱从，晋午在难，不能治乱，使鞅讨之。蒯聩不敢自佚，备持矛焉。敢告：无绝筋，无折骨，无面伤，以集大事。无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请，佩玉不敢爱。

(乙) 春秋时代之书辞

(1) 郑公子归生与赵盾书(文十七年)

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与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

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难，寡君是以不得与蔡侯偕。十一月，克灭侯宣多，而随蔡侯以朝于执事。十二年六月，归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请陈侯于楚而朝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蒇郑事。十五年五月，陈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烛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陈、蔡之密迩于楚，而不敢贰焉，则敝邑之故也。虽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见于君，夷与孤之二三臣相及于绛。虽我小国，则蔑以过之矣。今大国曰，尔未逞吾志！敝邑有亡，无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余几？又曰：鹿死不择音。小国之事大国也，德则其人也，不德则其鹿也。铤而走险，急何能择？命之罔极，亦知亡矣。将悉敝赋以待于鯈，唯执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齐，四年二月壬戌为齐侵蔡，亦获成于楚。居大国之间而从于强令，岂其罪也？大国若弗图，无所逃命。

(2) 郑公孙侨：复叔向书(昭六年)

若吾子之言，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3) 周景王：为阎田事辞于晋(昭九年)

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迩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废队是为，岂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梼杌于四裔，以御螭魅，故允姓之奸，居于瓜州。伯父惠公归自秦而诱以来，使偪我诸姬，入我郊甸，则戎焉取之。戎有中国，谁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难乎？伯父图之。我在伯父，犹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谋主也。伯父若裂冠毁冕，拔本塞原，专弃谋主，虽戎狄其何有余一人？

(4) 王子朝：在楚告诸侯书(昭二十六年)

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无专享文、武之功，且为后人之迷败倾覆而溺入于难，则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诸侯莫不并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居王于彘，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宣王有志而后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吊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郏鄏，则是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颓祸心，施于叔带，惠、襄辟难，越去王都，则有晋、郑咸黜不端以绥定王家。则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髭王，亦克能修其职。诸侯服享，二世共职。王室其有间王位，诸侯不图而受其乱灾。至于灵王，生而有髭，王甚神圣，无恶于诸侯。灵王、景王，克终其世。今王室乱，单旗、刘狄剥乱天下，壹行不若，谓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谁敢讨之？帅群不吊之人，以行乱于王室，侵欲无厌，规求无度，贯渎鬼神，慢弃刑法，倍奸齐盟，傲狠威仪，矫诬先王。晋为不道，是摄是赞，思肆其罔极。兹不谷震荡播越，窜在荆蛮，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奖顺天法，无助狡猾，以从先王之命，毋速天罚，赦图不谷，则所愿也。敢尽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经，而诸侯实深图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无适则择立长，年钧以德，德钧以卜。王不立爱，公卿无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寿早夭即世，单刘赞私立少，以间先王，亦惟伯仲叔季图之。

(丙) 左传记事文(左氏《春秋》?)

(1) 晋文公出亡(僖二十三年)

晋公子重耳之及于难也，晋人伐诸蒲城。蒲城人欲战，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禄，于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从者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廧咎如，获其二女叔隗、季隗，纳诸公子。

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刘；以叔隗妻赵衰，生盾。将适齐，谓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来而后嫁。"对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则就木焉。请待子。"处狄十二年而行。过卫，卫文公不礼焉。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与之块。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赐也。"稽首受而载之。及齐，齐桓公妻之，有马二十乘，公子安之。从者以为不可，将行，谋于桑下。蚕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杀之，而谓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闻之者，吾杀之矣。"公子曰："无之。"姜曰："行也！怀与安，实败名。"公子不可。姜与子犯谋，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闻其骈胁，欲观其裸，浴，薄而观之。僖负羁之妻曰："吾观晋公子之从者皆足以相国。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国；反其国，必得志于诸侯。得志于诸侯而诛无礼，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贰焉？"乃馈盘飧，置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赠之以马二十乘。及郑，郑文公亦不礼焉。叔詹谏曰："臣闻天之所启，人弗及也。晋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将建诸，君其礼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晋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离外之患而天不靖晋国，殆将启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从之，三也。晋、郑同侪，其过子弟，固将礼焉，况天之所启乎？"弗听。及楚，楚子飨之，曰："公子若反晋国，则何以报不谷？"对曰："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君之余也，其何以报君？"曰："虽然，何以报我？"对曰："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弭、右属櫜鞬，以与君周旋。"子玉请杀之，楚子曰："晋公子广而俭、文而有礼。其从者肃而宽，忠而能力。晋侯无亲，外内恶之。吾闻姬姓唐叔之后，其后衰者也，其将由晋公子乎？天将兴之，谁能废之？违天必有大咎。"乃送诸秦。秦伯纳女五人，怀嬴与焉，奉匜沃盥，既而挥之，怒曰："秦、晋匹也，何以卑

我！”公子惧，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赵衰曰：“重耳拜赐！”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级而辞焉，衰曰：“君称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2) 殽之役(僖三十二——三十三年)

杞子自郑使告于秦，曰：“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穆公访诸蹇叔，蹇叔曰：“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师之所为，郑必知之；勤而无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谁不知？”公辞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师于东门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公使谓之曰：“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与师，哭而送之，曰：“晋人御师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风雨也。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秦师遂东。

秦师过周北门，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孙满尚幼，观之，言于王曰：“秦师轻而无礼，必败。轻则寡谋，无礼则脱；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及滑，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遇之，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曰：“寡君闻吾子将步师出于敝邑，敢犒从者。不腆敝邑为从者之淹，居则具一日之积，行则备一夕之卫。”且使遽告于郑。郑穆公使视客馆，则束载厉兵秣马矣。使皇武子辞焉，曰：“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资饩牵竭矣。为吾子之将行也，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间敝邑，若何？”杞子奔齐，逢孙、扬孙奔宋。孟明曰：“郑有备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围之不继，吾其还也。”灭滑而还。……

晋原轸曰：“秦违蹇叔而以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敌不可纵，纵敌患生，违天不祥，必伐秦师。”栾枝曰：“未报秦

施而伐其师，其为死君乎？”先轸曰：“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秦则无礼，何施之为？吾闻之，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也。谋及子孙，可谓死君乎？”遂发命，遽兴姜戎。子墨衰绖，梁弘御戎，莱驹为右。夏四月辛巳，败秦师于殽，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遂墨以葬文公，晋于是始墨。文嬴请三帅，曰：“彼实构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厌，君何辱讨焉！使归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许之。先轸朝，问秦囚，公曰：“夫人请之，吾舍之矣。”先轸怒曰：“武夫力而拘诸原，妇人暂而免诸国，堕军实而长寇仇，亡无日矣！”不顾而唾。公使阳处父追之，及诸河，则在舟中矣。释左骖，以公命赠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累臣衅鼓，使归就戮于秦，寡君之以为戮，死且不朽。若从君惠而免之，三年将拜君赐。”秦伯素服郊次，乡师而哭曰：“孤违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过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3) 楚共王遗命(襄十三年)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谷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丧先君，未及习师保之教训而应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师于鄢，以辱社稷，为大夫忧，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灵，获保首领以没于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从先君于祢庙者，请为‘灵’若‘厉’，大夫择焉。”莫对。及五命，乃许。秋，楚共王卒。子囊谋谥，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毁之！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而知其过，可不谓‘共’乎？请谥之‘共’。”大夫从之。

(4) 臧孙纥出奔(襄二十三年)

季武子无适子，公弥长而爱悼子，欲立之，访于申丰，曰：“弥与纥，吾皆爱之，欲择才焉而立之。”申丰趋退，归，尽室将行。他日，又访焉，对曰：“其然，将具敝车而行。”乃止。访于臧

纥，臧纥曰："饮我酒，吾为子立之。"季氏饮大夫酒，臧纥为客，既献，臧孙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钼，使与之齿，季孙失色。季氏以公钼为马正，愠而不出，闵子马见之，曰："子无然。祸福无门，惟人所召。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无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奸回不轨，祸倍下民可也。"公钼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孙喜，使饮己酒，而以具往，尽舍旃。故公钼氏富，又出为公左宰。

孟孙恶臧孙，季孙爱之。孟氏之御驺丰点，好羯者也，曰："从余言，必为孟孙。"再三云，羯从之。孟庄子疾，丰点谓公钼："苟立羯，请仇臧氏。"公钼谓季孙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则季氏信有力于臧氏矣。"弗应。己卯，孟孙卒。公钼奉羯立于户侧。季孙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钼曰："羯在此矣。"季孙曰："孺子长。"公钼曰："何长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孙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孙之恶子也而哀如是，季孙若死，其若之何？"臧孙曰："季孙之爱我，疾疢也；孟孙之恶我，药石也。美疢不如恶石，夫石犹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孙死，吾亡无日矣！"

孟氏闭门，告于季孙曰："臧氏将为乱，不使我葬。"季孙不信。臧氏闻之，戒。冬十月，孟氏将辟，藉除于臧氏。臧孙使正夫助之，除于东门，甲从己而视之。孟氏又告季孙，季孙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纥斩鹿门之关以出，奔邾。

初，臧宣叔娶于铸，生贾及为而死。继室以其侄，穆姜之姨子也，生纥，长于公宫，姜氏爱之，故立之。臧贾、臧为出在铸，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贾，且致大蔡焉，曰："纥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吊。纥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纳请，其可？"贾曰："是家之祸也，非子之过也，贾闻命矣。"再拜受龟，使为以纳请，遂自

为也。臧孙如防，使来告曰："纥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请，苟守先祀，无废二勋，敢不辟邑！"乃立臧为，臧纥致防而奔齐。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孙曰："无辞。"将盟臧氏，季孙召外史掌恶臣而问盟首焉，对曰："盟东门氏也，曰：'毋或如东门遂，不听公命，杀适立庶！'盟叔孙氏也，曰：'毋或如叔孙侨如，欲废国常，荡覆公室！'"季孙曰："臧孙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门斩关？"季孙用之，乃盟臧氏曰："无或如臧孙纥，干国之纪，犯门斩关！"臧孙闻之曰："国有人焉谁居！其孟椒乎？"

(5) 向戌弭兵(襄二十七年)

宋向戌善于赵文子，又善于令尹子木，欲弭诸侯之兵以为名。如晋，告赵孟，赵孟谋于诸大夫。韩宣子曰："兵，民之残也，财用之蠹，小国之大灾也。将或弭之，虽曰不可，必将许之。弗许，楚将许之，以召诸侯，则我失为盟主矣。"晋人许之，如楚，楚亦许之。如齐，齐人难之，陈文子曰："晋、楚许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许，则固携吾民矣，将焉用之？"齐人许之。告于秦，秦亦许之。皆告于小国，为会于宋。

五月甲辰，晋赵武至于宋。丙午，郑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赵文子，叔向为介，司马置折俎，礼也。——仲尼使举是礼也，以为多文辞。——戊申，叔孙豹、齐庆封、陈须无、卫石恶至。甲寅，晋荀盈从赵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于晋。丁卯，宋向戌如陈，从子木成言于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谓向戌："请晋、楚之从，交相见也。"庚午，向戌复于赵孟，赵孟曰："晋、楚、齐、秦匹也，晋之不能于齐，犹楚之不能于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于敝邑，寡君敢不固请于齐！"壬申，左师复言于子木，子木使驲谒诸王，王曰："释齐、秦，他国请相见也。"秋七月戊寅，左师至。是夜也，赵孟

及子皙盟，以齐言。庚辰，子木至自陈，陈孔奂、蔡公孙归生至，曹许之大夫皆至。以藩为军，晋、楚各处其偏，伯夙谓赵孟曰："楚氛甚恶，惧难。"赵孟曰："吾左还入于宋，若我何！"

辛巳，将盟于宋西门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诸侯之师，以为不信，无乃不可乎？夫诸侯望信于楚，是以来服，若不信，是弃其所以服诸侯也。"固请释甲。子木曰："晋、楚无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将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弃信，志将逞乎？志以发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参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

赵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为不信犹不可，单毙其死；若合诸侯之卿，以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济之，必莫之与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则夫能致死，与宋致死，虽倍楚可也，子何惧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诸侯，而称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

季武子使谓叔孙以公命曰："视邾、滕。"既而齐人请邾，宋人请滕，皆不与盟。叔孙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国也，何故视之？宋、卫，吾匹也。"乃盟。故不书其族，言违命也。

晋、楚争先，晋人曰："晋固为诸侯盟主，未有先晋者也。"楚人曰："子言晋、楚匹也，若晋常先，是楚弱也。且晋、楚狎，主诸侯之盟也久矣，岂专在晋？"叔向谓赵孟曰："诸侯归晋之德只，非归其尸盟也，子务德，无争先。且诸侯盟，小国固必有尸盟者，楚为晋细，不亦可乎？"乃先楚人。

(6) 鲁昭公去国(昭二十五年)

初，季公鸟娶妻于齐鲍文子，生甲。公鸟死，季公亥与公思展与公鸟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与饔人檀通而惧，乃使其妾抶己，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

诉于公甫曰："展与夜姑将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与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于卞，而执夜姑，将杀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杀是，是杀余也。"将为之请，平子使竖勿内，日中不得请，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杀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鸡斗，季氏介其鸡，郈氏为之金距，平子怒，益宫于郈氏，且让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

臧昭伯之从弟会为谗于臧氏，而逃于季氏，臧氏执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将禘于襄公。万者二人，其众万于季氏。臧孙曰："此之谓不能庸先君之庙。"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献弓于公为，且与之出射于外，而谋去季氏。公为告公果、公贲，公果、公贲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寝，将以戈击之，乃走。公曰："执之。"亦无命也。惧而不出，数月不见。公不怒，又使言，公执戈以惧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孙。臧孙以难告郈孙，郈孙以可，劝。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谗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为也。舍民数世以求克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难图也。"公退之，辞曰："臣与闻命矣。言若泄，臣不获死。"乃馆于公。

叔孙昭子如阚，公居于长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杀公之于门，遂入之。平子登台而请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讨臣以干戈，臣请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许。请囚于费，弗许。请以五乘亡，弗许。子家子曰："君其许之。政自之出久矣，隐民多取食焉，为之徒者众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众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将蕴。蕴蓄，民将生心。生心，同求将合，君必悔之。"弗听。郈孙曰："必杀之。"

公使郈孙逆孟懿子，叔孙氏之司马鬷戾言于其众曰："若之何？"莫对。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国。凡有季氏与无，于我孰利？"皆曰："无季氏，是无叔孙氏也。"鬷戾曰："然则救

诸?"帅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释甲,执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见叔孙氏之旌,以告。孟氏执郈昭伯,杀之于南门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诸臣伪劫君者,而负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与臧孙如墓谋,遂行。己亥,公孙于齐,次于阳州。

(7) 冉有败齐师(哀十一年)

齐为鄎故,国书、高无丕帅师伐我,及清。季孙谓其宰冉求曰:"齐师在清,必鲁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从公御诸竟。"季孙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间。"季孙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则君无出。一子帅师,背城而战,不属者非鲁人也。鲁之群室众于齐之兵车,一室敌车,优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战也宜。政在季氏,当子之身,齐人伐鲁而不能战,子之耻也,大不列于诸侯矣。"季孙使从于朝,俟于党氏之沟,武叔呼而问战焉,对曰:"君子有远虑,小人何知?"懿子强问之,对曰:"小人虑才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谓我不成丈夫也。"退而搜乘,孟孺子泄帅右师,颜羽御、邴泄为右;冉求帅左师,管周父御,樊迟为右。季孙曰:"须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为己徒卒,老幼守宫,次于雩门之外。五日,右师从之。公叔务人见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谋,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

师及齐师战于郊,齐师自稷曲,师不逾沟。樊迟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请三刻而逾之。"如之,众从之。师入齐军,右师奔。齐人从之,陈瓘、陈庄涉泗。孟之侧后入,以为殿,抽矢策其马曰:"马不进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谁不如?"曰:"然则止乎?"不狃曰:"恶贤?"徐步而死。师获甲首八十,齐人不能师。宵,谍曰:"齐人遁。"冉有请从之三,季孙弗

许，孟孺子语人曰："我不如颜羽而贤于邴泄。子羽锐敏，我不欲战而能默，泄曰：'驱之！'"公为与其嬖僮汪锜乘，皆死，皆殡。孔子曰："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可无殇也。"冉有用矛于齐师，故能入其军。孔子曰："义也。"

以上所引之《左传》文辞，故事既见完整详尽，抒写亦极流畅宣达，可见记事文字之进展，与夫文书物质工具难易关系之重大。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可见《国语》亦为左氏重要之著述。韦昭《国语解》叙云："孔子发愤于旧史，垂法于素王，左丘明因圣言以摅意，托王义以流藻，其明识高远，雅思未尽，故复采录前世穆王以来，下讫鲁悼、智伯之诛，以为《国语》。其文不主于经，故曰'外传'。"李寒严则云："昔左丘明将传《春秋》，乃先采集列国之史，国别为语，旋猎其英华作《春秋》传，而先所采集之语，草稿具存，时人共传习之，号曰《国语》，殆非丘明本志也。故其辞多枝叶，不若内传之简直峻健。"是又可见裒集在前，非"雅思未尽"，乃更采录也。司马温公亦云："左氏欲传《春秋》，先作《国语》。"是其明征已！近人褚石桥《文学蜜史》之评《国语》云：

> 《国语》与传相表里而非以释经，故谓之"外传"。其文深闳杰异，传吴、越事尤奇峻，而宋、卫、秦之纪缺如，识者不能无疑焉。然而《春秋》之文止此矣。观其词间多繁芜蔓衍，亦略类诸子之书，故一变而为战国纵横险谲，百家腾越，愈趋愈歧，而三代之制遂不可复见。此文章正变之会，所宜深思也。

此论中正不偏，既可知《国语》与诸子文体之渊源，又可说明《国语》文辞与《左传》之异同。唐柳子厚生平为文章，专学《国语》，尝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谓"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后虽作《非国语》六十七篇，亦无非就史实细核，对于文辞固甚嗜好之者，而宋黄东发《黄氏日钞》亦称《国语》文字之简洁。兹因篇幅关系，不更多所节引矣。

附表：古代记事文之进展（容肇祖）

简　单　记　事	复杂记事，汇集成书	系统的著书
1. 因受文书材料之限制，但记一事或记数事，而不相系属者，如甲骨刻辞、铜器刻辞。 2. 编年杂记各事，如《春秋》，如《竹书纪年》。	如《国语》、《左传》。 由编年记事，一变即为国别的汇集记事文。	如《世本》，如《楚汉春秋》，如后来的《史记》。 由记事之相为终始，自成系统之作。

第五章 楚 辞

苟吾人习读《诗》三百篇，常认为其足以代表中国北方黄河流域民族性之文学者如二《南》及诗之咏及江、汉流域者为例外，则楚辞之可代表以长江流域为中心之南方民族文学而无疑。三百篇中大部分之歌谣皆为平民之创作，楚辞则半系贵人、诗人之产品。因其时代不同，地域不同，作者环境不同，故其作风亦迥异。楚辞产生之时代较三百篇为后，故后者之进步亦属事实。三百篇之描写技巧异常朴素，比较写实，字句亦甚简短。楚辞则惯用骈偶长句，每篇至少亦有数百字，思想更趋重于浪漫神秘之倾向，假大自然之神话以表现自我丰富热烈之情绪，开中国文学史之新途径。此实楚辞最大之特点，而楚辞之影响于后世之诗歌者亦以此为最。

过去学者对于楚辞之见解，多认为与《诗经》有颇密切之关系。此实缘于彼辈对《诗经》无理之附会曲解，而濡染浓厚之道德或伦理气息。故彼等亦仍袭“六义”、“四始”之诗教以衡量楚辞。如刘勰，虽明称其“词赋之英杰”、“异乎经典”者，而仍不免有如下之辨难：

> 故其陈尧、舜之耿介，称汤、武之祗敬，典诰之体也；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虬龙以喻君子，云蜺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怨之辞也。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文心雕龙·辨骚》）

其实此种辨难，今人读之每觉其不切。楚辞在文学史上占有高贵之地位，固无人加以否认，惟即以之诠释附会经典，则吾人应表示反对。中国南方之诗歌原非始于楚辞，然进至战国时文化发达已涨至最高潮流，故其文学方面之发展亦达于非常神妙、隽美之境界。复因南北气候之不同，南方温暖安逸，人民之思想亦易流变于浪漫、

神秘之趋向，崇拜美妙之大自然，迷信神鬼，而欲于虚渺放荡之遐想中寻求解决宇宙或人生之谜。此种奔放驰骋、缱绻恻怛之丰富情感，经过婉转柔曲之描写咏为长篇，即为伟大之楚辞之来源。若王逸《章句》中则云：

> 《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

篇末复云"依托五经以立义焉"，其谬妄与武断之误解可知矣。即《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批评《离骚》，亦未能应用纯文学鉴赏，而谓：

>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絜，其行廉。

凡此皆引据经典以说楚辞之源于《诗》三百篇，并以"托物兴辞"之旧说而衡度之，皆不能了解楚辞在文学上最高之真价值者也。

说楚辞者不可不先述楚辞最早之创始者、古代文学史中最伟大之诗人屈原。《史记》有《屈原贾生列传》，其叙屈原者略云：

>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顷襄王立，……（令尹子兰）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自投汨罗以死。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

于此可略窥屈原之生平。近人胡适著《读楚辞》一文（《胡适文存》二

集卷一)，曾怀疑屈原之存在。然其举证既不明确，近亦颇自悔前说之孟浪。则此伟大诗人之历史，实无可妄疑者。考其被放逐时之往来踪迹，略见于《哀郢》、《涉江》、《怀沙》诸篇。东行登郢都，遵江夏，过夏首，南上洞庭，顺江东下，东至夏浦，又东至于陵阳。南行由鄂渚至洞庭，自洞庭西南溯沅江，复自枉渚溯沅至辰阳，入溆浦。在此迁流转徙、不忘欲返之时，怨悱幽忧，不得已而从事于文学之创作，以表现其热烈纯洁之情感，而成其为伟大之作家。司马迁尝云："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史记·自叙》)所谓意有所郁结辖滞，不得不思所以发泄之，而屈原特从文学方面发展，遂为百世辞人开此光荣之局耳！

《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赋二十五篇，今存本《楚辞》中，遂有二十五篇被认为屈原之作。其实各篇作品之性质非属一类，屈原所作者仅为其中之小部分。兹将二十五篇作品依照时代先后分列于下：

(1) 较古之南方民族文学　《九歌》(《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等十一篇)，古人以"九"为数之极，其后宋玉亦作《九辩》，非必其数为九篇也。

(2) 最古之故事传说集　《天问》

(3) 稍晚，屈原所作　《离骚》、《九章》之一部分

(4) 屈原同时或稍后　《招魂》

(5) 稍后，楚亡国后　《卜居》、《渔父》

(6) 汉人所作　《大招》、《远游》、《九章》之一部分

兹请先述《九歌》之来源。《诗》三百篇有十五国风，独不及楚，足证楚地歌谣自有其所以异于中夏者在。楚地险流急，人民生性狭隘，信巫而好鬼，故其发为文学，多闳伟窈眇之思，调促语长，而想象力亦綦富，复以山奇水丽，文藻益彰。稽之古籍，《说苑·善说》篇

载楚康王时之楚译越人歌："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其译述之技术高巧，令人想见楚人诗歌之格调。语助中用"兮"字，虽在三百篇中已颇有之，然于两句中始夹一用者，句调特长，则楚歌之所以异于十五国风诗者在矣。《新序·节士》篇引徐人歌诵延陵季子之辞，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剑兮带丘墓。"其风格之独创，亦复相似。《论语·微子》篇载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庄子引前四句作"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史记》引第三四句作"往者不可谏兮，来者犹可追也。"二书所载，较之《论语》均多语辞"也"字，别见楚调反复丁宁之意。《孟子·离娄》引孺子歌云："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其调亦近于前所引之徐人歌延陵季子辞，句调相同，即文情亦与后起之《九歌》同一轴杼者也。

自《九歌》乐章之出现，而楚文学始建立一新兴之基础。《九歌》者何由而作也？近人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王静安先生遗书本)谓："周礼既废，巫风大兴；楚越之间，其风尤甚。"汉王逸尝云：

> 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楚辞章句》)。

此以《九歌》为屈原作也。然后人颇多疑之者，朱熹《楚辞集注》乃谓：

> 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蛮荆陋俗，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亵慢淫荒之杂。原既被逐，见而感之，故为更定其

词，去其泰甚。

此虽臆测揣摩，然颇可据信。当时楚巫祭鬼神必兼歌舞，则自有一种祠神用之歌曲，别成一调。今观《九歌》之句法，每句必夹一“兮”字，完全楚调普遍之作风，而文采斐然，殊不鄙陋，则其曾经富有文学修养之人所修改润饰，殆无可疑。故谓屈原或依其歌调而为之创新辞，或就其原有之歌辞而为之藻润，吾人虽未敢完全定论，而屈原受《九歌》影响以作《离骚》，其风格、音节各方面均有显著之湘、沅民间歌曲之特点，则可以断言者也。

《九歌》之用原在于乐神，而多及男女慕悦之辞、真挚活泼之感，此盖古代民歌之本色。论其描写，或则清丽缠绵，或则悲激壮烈，莫不含蓄极热烈、极丰富之情调。例如：

(1)《湘君》

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

(2)《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3)《少司命》

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带，倏而来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谁须兮云之际？与女游兮九河，冲风至兮水扬波。与女沐兮咸池，晞女发兮阳之阿。望美人兮未来，临风怳兮浩歌。

以上各篇，较之三百篇之十五国风，无论技术上、情调上，其显著之进步有可得而言者。南人情绪热挚，善感多怀，复出以繁音促节，高歌亢调，荡气回肠，视北方歌曲之朴质无华，盖不可同日而语。而

《国殇》一篇，则慷慨雄激，一往直前，为诗歌中生面别开之作。三湘民气之热烈豪放、肃穆壮烈，盖肇自远古即有若是之可宝者！兹录其文如次：

(4)《国觞》

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天时坠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魄毅兮为鬼雄。

《天问》之体裁为四言问答式，文辞古奥，虽保全古代之故事传说甚夥近人颇有根据《天问》诸篇以考订古史之真相者，其风气自王国维启之，然缺乏文学价值。如“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像，何以识之？”等，均与屈原所作及《楚辞》他篇相异。或以为汉人伪托，兹不具论。

《远游》篇中有“奇傅说之托辰星兮，羡韩众之得一，形穆穆以浸远兮，离人群而遁逸”。韩众之名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为秦时方士，时代在屈原之后，大约亦是后人伪托之作。

《卜居》、《渔父》两篇系记事体，篇首即称“屈原既放”，显系旁人之记载。王逸亦云：“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间，忧愁叹吟，仪容变易，而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时遇屈原川泽之域，怪而问之，遂相应答。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此说或较可信。《卜居》、《渔父》两篇虽非屈原所作，然其见解与技术均可代表《楚辞》进步已至甚高之时期，故事实上可认为，屈原原作者不过《离骚》及《九章》之一部分耳。

近人梁启超(《楚辞解题》)尝对于屈原发其异常赞美之词曰：“屈原性格诚为积极的，而与中国人好中庸之国民性最相反也，而

其所以能成为千古独步之大文学家，亦即以此。彼以一身同时含有矛盾两种之思想，彼对于现社会极端的恋爱，又极端的厌恶。彼有冰冷的头脑，能剖析哲理；又有滚热的感情，终日自煎自焚。彼绝不肯同化于恶社会，其力又不能化社会，故终其身与恶社会斗，最后力竭而自杀。彼两种矛盾惟日日交战于胸中，结果所产烦闷至于为自身所不能担荷而自杀。彼之自杀，实其个性最猛烈、最纯洁之全部表现。非有此奇特之个性，不能产此文学，亦惟以最后一死，能使其人格与文学永不死也。"吾人由梁氏之言以读《离骚》，知屈原以伟大之人格，乃能发为伟大之文学；而伟大之文学，亦必有高尚、热烈内心流露之真情感以副之，而无疑已！

吾人观察屈原之生平，可知其为最富于情感及忠心于国家之人。班固谓："屈原痛君不用，信用群小，国将危亡，忠诚之情怀不能已，故作《离骚》，上陈尧、舜、禹、汤、文王之法，下言羿、浇、桀、纣之说，以讽怀王。"彼盖不满意于当代之政治，不满意于朝臣之贪婪骄恣及楚王之昏庸无能。彼虽思超世独立，虽亦知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然以其天生最丰富、最热烈之感情，乃绝不能掉首不顾而独善其身。及至最后屡被谗言，横遭放逐，流浪沅、湘，而仍不忘彼始终热烈爱护之国家，而此伟大之天才诗人之归宿，亦惟有自沉于汨罗江底。吾人于其最著名之《离骚》中，可读彼如何发挥其无拘无束、浪漫奔泻之情感，一变《诗经》朴素之作风而写成其三百七十二句，二千四百六十一字恣肆泛滥之抒情长诗，在体裁方面已为特殊之创构，而描写之对象更能运用完整而美妙之大自然，复穿插多处古代神话，缠绵婉转，活泼生动，一往情深。

今节引其最成功之作《离骚》中较精彩者两段为例：

曾歔欷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揽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驷玉虬以乘鹥兮，溘埃风余上征。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

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时暧暧其将罢兮，结幽兰而延伫。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緤马。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溘吾游此春宫兮，折琼枝以继佩。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诒。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结言兮，吾令蹇修以为理。纷总总其离合兮，忽纬繣其难迁。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乎洧盘。保厥美以骄傲兮，日康娱以淫游。虽信美而无礼兮，来违弃而改求。览相观于四极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雄鸠之鸣逝兮，余犹恶其佻巧。心犹豫而狐疑兮，欲自适而不可。凤皇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远集而无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遥。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导言之不固。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

此段描画作者自身奔放之热情，赞美活泼之自然生命，以及爱国、爱乡之心，完全为真情性之流露，故而缠绵悲恻，异常动人。其描写之技巧及用韵遣辞，引起后世一般文人普遍之摹仿，影响异常巨大（参看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兹不赘）。

今更以《离骚》末段为例：

惟兹佩之可贵兮，委厥美而历兹。芳菲菲而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沬。和调度以自娱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饰之方壮兮，周流观乎上下。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兮，历吉日乎吾将行。折琼枝以为羞兮，精琼爢以为粻。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何

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邅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扬云霓之晻蔼兮，鸣玉鸾之啾啾。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凤皇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与。麾蛟龙以梁津兮，诏西皇使涉予。路修远以多艰兮，腾众车使径待。路不周以左转兮，指西海以为期。屯余车其千乘兮，齐玉轪而并驰。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抑志而弭节兮，神高驰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乐。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

《离骚》辞句之文秀、条理之整饬、层次之明晰、想象力之丰富，不仅为文体上之创格，即就艺术上之造诣论之，亦当推为极成功、极珍贵之空前创作。

《九章》为不相连续之九篇，连合为一而总名之曰“九章”，其目为《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九篇之作风亦复不同，《惜诵》、《抽思》之情调与《离骚》相近，《涉江》、《哀郢》、《怀沙》、《思美人》、《悲回风》与《离骚》之情景亦尚相合，《橘颂》与《惜往日》似非一路之作品。胡适曾云：“《远游》是模仿《离骚》做的，《九章》也是模仿《离骚》做的，《九章》中，《怀沙》载在《史记》，《哀郢》之名见于《屈贾传论》，大概汉昭、宣帝时尚无‘九章’之总名。《九章》中也许有稍古的，也许有晚出的伪作。”其言甚是。而《卜居》、《渔父》则为二篇记事，其技术与见解均甚进步，则成熟时代亦较诸作为晚，可无疑义。

《离骚》虽不必能被管弦，与《诗》三百篇同为入乐之作，而其格局本出于祠神之曲（如《九歌》），与班固所称“不歌而诵”之赋体究有异殊。后来入乐之诗与一切歌辞莫不受其影响，宋沈约所谓“原其飙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宋书·谢灵运传论》）者是也。

《招魂》一篇，相传为宋玉所作。《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屈

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惟未道及宋玉之生平。《汉书·艺文志》于"宋玉赋十六篇"之下，仅注"楚人，与唐勒并时，在屈原后也。"《韩诗外传》七云："宋玉因其友见楚襄王，襄王待之无以异，乃让其友……。"《新序》卷一："楚威王问宋玉曰：'先生其有遗行耶？何士民众庶不誉之甚也。'宋玉对曰……"又卷五："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见察，意气不得，形于颜色。……"此外，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笛赋》、《大言赋》、《小言赋》、《钓赋》、《舞赋》，均相传为宋玉之作品。此种故事赋，悉指为出于一人之构固觉无稽，即故事之内容亦系从一般文人之想象演出。其内容与《韩诗外传》、刘向《新序》所说皆同一型式，设为问对，由宋玉之辩辞文饰以自解嘲，皆不必实有其事。此种故事不见称于战国末之著述中而盛行于汉代，疑为汉人辞赋中理想之文人，渐变成为民间理想故事中之人物，且未必实有其人。自王逸撰《楚辞章句》，谓"宋玉者，屈原弟子也"(《九辩》序)，自此而宋玉为屈原弟子，遂为一般人所艳称。《离骚》之后，有拟《离骚》体之《招魂》，更有《大招》、《九辩》等，本皆无名氏之作。后更有人疑《招魂》与《大招》皆屈原所作，又说《招魂》为宋玉作，《大招》为景差作。疑不能明，毋宁谓为《离骚》后之拟作之为愈。此种作品，吾侪亦不能决定其均为战国末之作，正如诸托名宋玉之故事赋，吾侪仍未能认其即为宋玉其人之作品也。

《招魂》、《大招》两篇，俱有意于夸张铺曼之叙述，以张大其描状之效力。如叙美人，则"朱唇皓齿，嫭以姱只；比德好闲，习以都只；丰肉微骨，调以娱只；魂乎归来，安以舒只；嫮目宜笑，蛾眉曼只；容则秀雅，稚朱颜只；魂乎归来，静以安只"(《大招》)；设宫室，则"高堂邃宇，槛层轩些；层台累榭，临高山些；网户朱缀，刻方连些；冬有突厦，夏室寒些；川谷径复，流潺湲些；光风转蕙，汜崇兰些；经堂入奥，朱尘筵些"(《招魂》)，甚至语饮食、传歌舞，亦莫不用

此种方法。而对所招来之灵魂，既历举上下四方之可畏及不能久居，又盛道归来所得享受之种种快乐。此种对举之叙述、重叠有叙之描写，后来之赋多所取法，如《三都》、《七发》等篇，莫不如此。

至于《九辩》，亦能传《骚》体之遗而加以变化者。兹录其首章如下：

>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慄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泬寥兮天高而气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憯凄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怆怳懭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燕翩翩其辞归兮，蝉寂漠而无声。雁廱廱而南游兮，鹍鸡啁哳而悲鸣。独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时亹亹而过中兮，蹇淹留而无成！

宋玉、景差而外，《汉书·艺文志》更著有唐勒赋四篇，惟俱已失传，亦不能取以与屈、宋诸篇互作比较观矣。

第六章　荀卿制作与赋体之完成

屈、宋而外，战国晚年，北方复产生一与文学、哲学均有相当关系之作家，厥为荀卿。荀卿之生卒岁月不详于史籍，据近人张长弓（所著《荀卿的韵文》）推定，约迟生于屈原三十一年，晚卒于屈原五十年以上。然屈原之生季已甚难详稽，则不若略叙荀氏经历梗概之为愈。近人姜赐蓉（所著《读荀子札记》）一述荀况生平云："荀子名况，刘向《校书叙录》说：'孙卿赵人，名况。'刘向更说：'兰陵人善为学，盖以孙卿也。长老至今称之，曰兰陵人喜字为卿，盖以法孙卿也。'故荀卿不一定是尊美之辞，而他实字卿。其生当战国时，约生于公元前335年左右，死约公元前235年前后。他曾游说燕、齐，刘向说：'方齐宣王、威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尊宠之，若邹衍、田骈、淳于髡之属甚众，号曰列大夫。……是时孙卿有秀才，年五十，始来游学。'《史记·孟荀列传》说：'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后来他还曾游秦，《荀子·儒效》篇载有他对秦昭王的话，《强国》篇载他答范雎（应侯）的'入秦何见'的回话：'孙卿子曰：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他又抵赵国，《议兵》篇开始就有'临武君与孙卿子议兵于赵孝成王前'一段。末后他又曾历楚，春申君使为兰陵令，其时当在楚考烈王八年（公元前255年）。春申君被杀后，他也就去官，不久便死在兰陵地方了。"姜君之说，大体可据。《汉书·艺文志》赋家载孙卿赋十篇，除五赋外，后人不甚得解。实则《成相》篇可以析为五章，即是五篇。自唐时杨倞误解之为三章后，人多不察，可见当时已列《成相》篇为赋体矣。"成相"二字之解释，其说亦非一端，约言之可以分为三种：

（一）杨倞说　谓以初发语名篇，或以为成功在相，故云。

（二）卢文弨说　成相之义，非谓成功在相，相乃乐器。又古者有瞽必有相，篇首所称“有瞽无相何伥伥”，亦即此义。首句“请成相”，言请奏此曲也。

（三）王念孙说　以为相者治也。“请成相”者，请言成治之方也。

统观上列之三种解释，自以卢说较为近理。《礼记·曲礼》篇云：“邻有丧，舂不相。”郑注以相字为送杵声。古人于劳动之时，必为歌讴以自解困，譬如举大木时必有邪许之声，为乐曲即谓之相。荀氏此辞，或即采用民间流行之歌调。民歌常重沓复奏（三百篇中如《邶风·柏舟》、《郑风·扬之水》、《唐风·绸缪》俱是），而《成相》篇亦复相同。每章四句，句字均有一定，且句句有韵（每章句例，首三字句，次三字句，次七字句，末十一字句）。至于五篇之大意，可概括于杨倞所谓“杂论君臣治乱之事，以自见其意”两语中，盖荀卿未得志时愤慨之作也。至于其他五赋，乃可指为“铺采摛文、体物写志”者。

《礼》赋之意，言礼之功用极大，时人莫知，故衍析其义而昭告之。《知》赋铺陈君子之“知”之功用，以明小人之“知”则不然。《云》赋言云之功用足以滋润万物，人多不察，故于此明之。《蚕》赋言蚕之功用。《箴》赋（箴，同后世之针）言其为万物微而用至重，以讥当世（以上五赋，在《荀子》书中总称曰《赋》篇）。五赋中有一共同之表现法，即先极力状物而不点题，并采用问答体。答语亦不直接点题，多用疑问意敷陈其理，颇似隐谜性质。其文辞之组织悉用三言四言构成，前段之问语常用隔句韵，后段之答语则或隔句韵，或句句韵，或错杂为韵。《赋》篇之后，附有佹诗，篇首谓“天下不治，请陈佹诗”，盖欲以推求天下变乱之由。佹诗之后更有小歌，又载有十二句诗辞。案《战国策·楚策》所纪，是诗为荀卿遗春申君者，玩其语意，多为愤懑失意之作。吾人研究荀卿与战国时赋体演变关系之

枢钮，盖自此《成相》、《赋》篇始。

考诗歌最早之作用，讽谕亦为其中之一端。刘彦和《文心雕龙·比兴》篇云："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记讽，盖随时之义不一，故诗人之志有二也。"大约《诗》三百篇中，讽谕之义多可考见。至于《离骚》之产生，则《文心雕龙·明诗》篇亦云："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而荀卿《成相》、《佹诗》诸作，亦包含诗骚中讽谕之义，与后世纯然写物言情者有别焉。

《赋》篇与《佹诗》统以四言句为主，《成相》篇虽为杂言组成，仍未脱四言臼痕。荀卿之时代视屈原为晚，楚辞中《离骚》、《悲回风》等篇为杂言组成，而《天问》、《怀沙》、《橘颂》等篇仍为四言体。荀卿生长北方，又曾游楚，则其作品渊源与三百篇、《楚辞》间之消息，固有可得而推求者。三百篇韵例甚多（前章已屡言之），迨屈、荀以后，渐以隔句韵为主。至于《成相》篇之句句韵，《小雅·车攻》已启其端。此吾侪所以认为荀氏韵文与前代及当代文学有所紧密关连之处也。

卢文弨谓："审此篇（《成相》篇）音节，即后世弹词之祖。"今按其章句之组织，颇有类于后世之乐府诗。汉魏乐府诗多为长短句自由之配合，有句句韵，亦有不定句韵。如汉铙歌之《战城南》、《君马黄》等，均与《成相》篇之组织相同，而郊祀歌之章法，似亦间接受《成相》篇之影响。此论甚繁（参看张长弓《中国文学史新编》），兹因篇幅关系，弗更多赘矣。

然汉世赋体之完成，其受屈原、宋玉诸作及荀卿作品之深刻影响，则诚为灼然易见之明显事实。

以下请略述汉赋之兴起，及其与楚辞并荀卿《赋》篇之关系，细核其异同之实，兼可见先秦文学最直接之影响。

吾人于叙述汉赋之前，必先认清一种意识，即汉代之辞赋与前

述之楚辞(尤其是所谓屈、宋),有迥不相侔之处是。屈原固夙被一般辞客所尊称为作赋之初祖者,说者以其一反《诗经》朴实之四言诗,而用长篇之韵文抒写。但吾人对于屈辞,仅可视为长篇之抒情诗,而弗能骤认为赋。至于汉代之赋体,在形式上本为模拟《楚辞》,惟内容则雕饰浮辞,堆叠典实,根本上早已丧失创作之精神及楚辞优美之情愫(此《楚辞》所收集者,仍有一部分汉人之作,惟作风与偶缛之赋体区有以别)。故吾人不承认其为《楚辞》系统之一部分,其间密切微妙之关系虽复存在,仍当别立之为汉赋也。

依据传统之主张,《诗》有"六义",而赋为其中之一义。《荀子》中有《赋》篇,其辞如:"爰有大物,非丝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为天下明,生者以寿,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军以强,粹而王,驳而伯,一无焉而亡。臣愚不识,敢请之王。"(《礼》篇)殊无何种文学上之价值。惟"赋"之名至此时始创成独立之名辞,殊堪注意。

刘勰《文心雕龙》云:"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诠赋》篇)《汉书·艺文志》亦云:"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汉赋则)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吾人读此段之末二语,即知赋与诗已完全脱离,另成一种重要之文体矣。

赋之性质,吾人可根据如刘勰所云:

> 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

钟嵘云:

> 直陈其事,寓言写物,赋也。(《诗品》)

刘熙《释名》亦云:

诗之也，志之所之也。兴物而作谓之兴，敷陈其义谓之赋，事类相似谓之比，言王政事谓之雅，称颂成功谓之颂。随作者之志而别名之也。"(《释典艺》第二十)

班固《两都赋》序云：

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

以上所叙之赋，皆须铺采摛文，敷布其义。故汉代之辞赋，全为富丽典雅、丰辞缛藻、歌颂太平盛世之文章。堆叠成篇，铺陈夸饰，全失诗歌抒发真性情之优美诗意，仅用为讴歌盛德、粉饰太平而已。故赋与诗已完全异体，与《楚辞》或荀赋亦不过为形式上或音调上之相似，而赋实独立变成诗文间之一种有韵骈体。

汉代常被认为辞赋之时代或楚声之时代，质言之，此亦不过谓赋在汉代有特别发展而已。何以赋在汉代能获得特别之发展？是盖亦别有故。

自中国历史发展之阶段言之，经过东周、战国迄秦，五六百年大混乱之时期后，入汉为比较安宁、休养生息之时代。此时期之政府及一班文人学士，遂亦提倡歌颂太平盛世、富丽典雅、雕饰辞藻之文学。普通诗歌仅为民间俚俗讴唱之产品，不似辞赋之辞采丰缛、雕章琢句，宜于点缀太平。且文士制赋，更可猎求功名。职是之故，汉代之辞赋遂日臻发达。

吾人今于《文心雕龙·诠赋》篇中，略可窥见西汉作赋风气之盛，其云：

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同其风，王、杨骋其势。皋、朔已下，品物毕图，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余首。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

陆贾、贾谊二人，盖汉初制赋最早者，其余著名之赋家如枚乘、司马相如等皆在武帝时，外如枚皋、东方朔等亦颇以赋著称，宣帝、成帝时，赋更繁盛。惟汉赋作者之目的，既多怀文以干禄之意念，故文学之真正价值方面遂不复顾及。故其所产生结果，作品每每成为堆砌辞藻、雕琢浮艳之华美文字，而文学欣赏之价值与趣味则大多低落。

今先略述汉代著名之赋家。

汉初之赋，贾谊等之作品，尚纯为《楚辞》式之性质。

贾谊，洛阳人。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吴廷尉为河南守，闻其秀才，召置门下。文帝召以为博士，是时贾生年二十余，最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尽为之对。文帝悦之，一岁中至太中大夫。后为忌者所谗，谓谊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乃迁谪为长沙王太傅。此时谊意甚抑郁，闻长沙卑湿，自以为不能长寿，乃渡湘水，作赋以吊屈原(《吊屈原赋》)。后文帝因少子梁怀王幼，爱而好书，遂令贾谊往为之傅。未久，怀王骑马堕死，贾谊哭泣岁余卒，年仅三十三。

谊尝为博士，故其议论文异常有名，如《过秦论》等，久已脍炙众口(有《贾长沙集》)。至于辞赋，则《楚辞》中有《惜誓》，相传为谊之作。惟《惜誓》首句为"惜余年老且日衰兮，岁忽忽而不反"，不似年少者所创制。王逸亦谓："《惜誓》者，不知谁所作也。或曰贾谊，疑不能明也。"《惜誓》而外，则有《吊屈原赋》及《鵩鸟赋》，亦颇有名。《鵩鸟赋》者，据《史记》谓楚人命鸮曰鵩，故名。今举此赋之一段文字为例：

> 愚士系俗兮，窘若囚拘。至人遗物兮，独与道俱。众人惑惑兮，好恶积亿。真人恬漠兮，独与道息。释智遗形兮，超然自丧。寥廓忽荒兮，与道翱翔。乘流则逝兮，得坻则止。纵躯委命兮，不私与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泉之静，

泛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宝兮，养空而游。德人无累，知命不忧。细故蒂芥兮，何足以疑。

贾氏之作，以模拟屈骚者为多，故亦被后人归集入《楚辞》中。平心而论，其赋多半为描写自身怀才不遇郁抑愤懑之感情，尚无雕琢丰缛之浮华气味。

其次，当及严忌、枚乘。

严忌（本姓庄，后人避明帝讳），会稽人。先事吴王濞，败后，游梁，与邹阳、枚乘等居梁孝王门下。《汉书·艺文志》称其赋二十四篇，今仅余《哀时命》一篇流传。风调与之相近者，有淮南小山之《招隐士》、东方朔之《七谏》、王褒之《九怀》，刘向之《九叹》等，均可谓为《楚辞》之余音。今复举《招隐士》一篇于下：

桂树丛生兮山之幽，偃蹇连蜷兮枝相缭。山气巃嵸兮石嵯峨，溪谷崭岩兮水曾波。猿狖群啸兮虎豹嗥，攀援桂枝兮聊淹留。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岁暮兮不自聊，蟪蛄鸣兮啾啾。坱兮轧，山曲岪，心淹留兮恫慌忽。罔兮沕，憭兮栗，虎豹穴。丛薄深林兮人上栗。嵚岑碕礒兮碅磳磈硊，树轮相纠兮林木茷骫。青莎杂树兮，薠草靃靡。白鹿麏麚兮，或腾或倚。状貌崟崟兮峨峨，凄凄兮漇漇。猕猴兮熊罴，慕类兮以悲。攀援桂枝兮聊淹留。虎豹斗兮熊罴咆。禽兽骇兮亡其曹。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

枚乘，生于景帝时，字叔，淮阴人。为吴王濞郎中。后去之梁。景帝平七国，召拜弘农都尉，以病去官。武帝即位，以安车蒲轮征之入都，道卒。

乘所著赋，《汉书·艺文志》谓共九篇。现有《柳赋》、《梁王菟园赋》、《七发》等，而《七发》最有名。《七发》之结构，极似楚辞中之《招魂》、《大招》，显系受诸篇之影响甚深。此种文体之结构至为简单，而叙写至为浮夸，予后来之汉赋以绝大之影响。今将《七发》之各

段，分析而略说之于下：

序：楚太子有疾，吴客往问之，以为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之。

第一段：吴客初以音乐说太子，琴声虽异常凄美，然而太子病弗能听。

第二段：继以饮食说太子，美味珍馐，庖厨复精，而太子亦病弗能尝。

第三段：更以骏马名骑说太子，马虽神骏，而太子病弗能乘。

第四段：再以宫苑池观之乐导太子，复有宾客赋诗、美人侍宴，而太子病弗能游。

第五段：又以游猎之乐说太子，太子之病虽未痊，然而已有起色。

第六段：于是吴客更以至广陵曲江观涛之说进，太子仍病不能兴。

第七段：最后，吴客谓将为太子奏方术之士，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太子据几而起，涊然汗出，霍然病已。

近人容肇祖(《中国文学史大纲》)谓《七发》："由这种体制，遂成为汉赋的一种倾向，就是弘丽的体制、谩诞的叙述、过度的描状、夸张的铺写，其结构的来源亦是从《楚辞》里出来的。"其观察堪称允当。后人摹仿《七发》之体制者极多(如《七激》、《七辩》)……，楚骚之作多为主观的抒写悲哀愤激之辞，《七发》则完全为客观的描写态度。此虽为作赋者别辟蹊径，然以其仍重藻砌，文学作品之真实性较逊，斯亦不足矜贵视之。惟汉代风尚所趋，竞喜枚、马，兹略引《七发》中之一节：

连廊四注，台城层构，纷纭玄绿。辇道邪交，黄池纡曲。溷章白鹭，孔雀鵁鶄。鹓雏鵁鶄，翠鬣紫缨。螭龙德牧，邕邕群

鸣。阳鱼腾跃，奋翼振鳞。漃漻薵蓼，蔓草芳苓。女桑河柳，素叶紫茎。苗松豫章，条上造天。梧桐并榈，极望成林。众芳芬郁，乱于五风。从容猗靡，消息阳阴。列坐纵酒，荡乐娱心。景春佐酒，杜连理音。滋味杂陈，肴糅错该。练色娱目，流声悦耳。

司马相如之辞赋，在两汉独负盛誉。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史记》称述之云：

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

后更以赀为郎，仕景帝武骑常侍。因景帝不好辞赋，相如未能展其所长，因病免。游梁，与梁孝王门下邹阳、枚乘、严忌等相善。著《子虚赋》，颇受知于孝王。未几，孝王卒。相如返里后，家贫，无法图存，往归临邛令王吉。后宴于临邛富室卓王孙家，《史记》更云：

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临邛，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既罢，相如乃使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

相如即偕文君相驰归家，家徒四壁，困苦不能谋生。文君遂劝相如，又偕回临邛，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垆，相如身自着犊鼻裈，与保佣杂作，涤器于市中。卓王孙闻而耻之，为杜门不出。后不得已，复分给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嫁时衣被财物。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买田宅治产为富人。武帝读相如《子虚赋》，恨不得与之同时。随侍武帝之狗监杨得意便云：其人为司马相如，与己同邑。武帝召见相如，相如为《上林赋》，因得任郎数年。后因通使西南夷，相如拜为孝文园令。后又病免，家居茂陵，卒。

相如在西汉可称为最大之辞赋家。其人格虽不足取，而作品则甚能得当时人主之非常感动。如相传武帝读《子虚赋》，恨不得与之同时，而《长门赋》竟能使武帝与陈后再得宠幸，破镜重圆（《长门

赋》事，清人考据者或辨其无此事）。惟其《大人赋》本欲谏劝武帝佞信神仙，而结果武帝竟“大说，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史记》），则其讽谏所言亦不过如博弈清客之谈言微中耳。

相如所著有《子虚赋》、《上林赋》、《美人赋》、《长门赋》、《哀秦二世赋》、《大人赋》等篇。《汉书·艺文志》载有相如赋二十九篇，大多今已失传。相如之辞赋，淫靡浮艳，堆叠成篇，专为献媚帝王，完全无描写自身心情个性之作品，不过侈丽闳衍、词藻典雅而已。惟其客观描写之天才，则可誉为独步一时。

今且举其描写弃妇失恋后之怨情最佳之《长门赋》一段为例：

> 日黄昏而望绝兮，怅独托于空堂。悬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于洞房。援雅琴以变调兮，奏愁思之不可长。按流征以却转兮，声幼妙而复扬。贯历览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卬。左右悲而垂泪兮，涕流离而纵横。舒息悒而增欷兮，踪履起而彷徨。揄长袂以自翳兮，数昔日之諐殃。无面目之可顾兮，遂颓思而就床。抟芬若以为枕兮，席荃兰而茝香。忽寝寐而梦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惕寤觉而无见兮，魂迋迋若有亡。众鸡鸣而愁予兮，起视月之精光。观众星之行列兮，毕昴出于东方。望中庭之蔼蔼兮，若季秋之降霜。夜曼曼其若岁兮，怀郁郁其不可再更。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复明。妾人窃自悲兮，究年岁而不敢忘！

容肇祖之评相如之赋云：“相如的赋，其靡丽较枚乘为尤甚。《子虚赋》胪列地方物产等，几若有韵之《地理志》。如《子虚赋》之说云梦，其山则什么，其水则什么，其土则什么，其石则什么，其东则什么，所有物产地势、鸟兽草木等，无不毕载，不问是否合于实际，都牵拉上去写出来了。他先写子虚说楚，再写乌有先生说齐，再写亡是公说上林。词极肤浅而意主夸张，这种赋体影响后来的赋家，像扬雄、班固、张衡、左思诸人俱受其影响。赋体到了司马相如，真

可以说是集赋体的大成了。”(《中国文学史大纲》,第十五章)其说颇可参考,用附录于是,以为习读相如赋者观览焉。

东方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人,与司马相如同时。武帝诏拜以为郎。曼倩为人,异常诙谐可喜,故其作品亦复富于此种风趣。现今留存者,尚有《七谏》、《客难》、《非有先生》等篇。

董仲舒,广川人。孝景时为《春秋》博士。武帝即位,以为江都相。后为公孙弘所忌,迁胶西王相。仲舒恐获罪,以疾免,居家。仲舒为人不治生产,专修学治经著书,为经学史中之重要人物,著述有《春秋繁露》等书。所著辞赋有《士不遇赋》等。

严助,为严忌子,武帝时为中大夫,后拜会稽守。《汉书·艺文志》中,称有赋三十五篇。

枚皋,枚乘之子,字少孺。武帝时为郎。皋为人亦喜诙谐,能赋颂,文思极为敏捷,时人以之并拟东方曼倩。制赋极多,《汉书·艺文志》称其有赋百二十篇,可谓为西京辞赋家中产量最多者。

武帝以后,辞赋之作家仍甚众多。

王褒,字子渊,蜀人。为宣帝谏议大夫。其所为辞赋,善用骈俪对偶,最著名者为《洞箫赋》。《汉志》称其有赋十六篇。子渊尝为有韵之白话赋一篇,曰《僮约》,为戏拟之买奴券文,内容异常滑稽《初学记》、《太平御览》、《艺文类聚》、《续古文苑》均采入。细玩《僮约》之白话赋体,或者西汉间民间之作赋格式亦不外是,而其所采录之语言,亦必与当时流行之白话孔迩。近年敦煌出现之写本《韩朋赋》、《晏子赋》等,其时代约在唐以前或更早至萧梁之前(见容肇祖《敦煌本韩朋赋考》),则其来源或竟与《僮约》诸作有密切之关系,则尚有待于吾人之考核也。

兹将《僮约》略录于下:

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资中男子王子泉从成都安志里女子杨惠买亡夫时户下髯奴便了,决贾万五千。奴当从百役使,

不得有二言：晨起早扫，食了洗涤，居当穿臼，缚帚裁盂，凿井浚渠，……织履作麄，黏雀张乌，结网捕鱼，缴雁弹凫，登山射鹿，入水捕龟。……舍中有客，提壶行酤，汲水作铺，涤杯整案，园中拔蒜，断苏切脯。……已而盖藏，关门塞窦，喂猪纵犬，勿与邻里争斗。奴但饭豆饮水，不得嗜酒。欲饮美酒，唯得染唇渍口，不得倾盂覆斗。不得晨出夜入，交关伴偶。舍后有树，当裁作船，上至江洲下到煎，……往来都洛，当为妇女求脂泽，贩于小市，归都担枲，转出旁蹉，牵犬贩鹅，武阳买茶杨氏池中，担荷往来。……持斧入山，断棘裁辕，若有余残，当作俎豆几木屐及彘盘。……日暮欲归，当送干薪两三束。……奴老力索，种莞织席，事讫休息，当舂一石。夜半无事，浣衣当白。……奴不得有奸私，事事当关白。奴不听教，当笞一百。

读券文适讫，词穷诈索，仡仡叩头，两手自搏，目泪下落，鼻涕长一尺。

审如王大夫言，不如早归黄土陌，丘蚓钻额。早知当尔，为王大夫酤酒，真不敢作恶。

刘向亦为著名之辞赋家，字子政，汉之宗室。向甚崇儒术，著有《新序》十卷、《说苑》二十卷等。《汉书·艺文志》称其有赋三十三篇，现存者仅得《九叹》一篇。

扬雄可称为西汉最后之辞赋家，字子云，蜀郡成都人。子云之赋，鲜有创作精神。成帝召见，献《甘泉》、《长杨赋》，即摹拟司马相如之《上林》、《子虚赋》而作。读《离骚》，即著《反离骚》，均不能表现作者本身之个性。王莽篡位，仕大中大夫，卒年七十一。其辞赋最著者，如《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解嘲》、《解难》、《反离骚》等等。此外，著有《法言》十三卷、《太玄经》九卷、《方言》十三卷、《训纂篇》一卷、《蜀王本纪》一卷、《琴清英》一卷，又集五卷。除《方言》一书较有特色外，大率好模拟古贤，且因多识古文

奇字，点缀文字间，不惜以艰深文其浅陋，实无独立之思想及浓挚之情绪也。

东汉辞人之称大家者，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明帝时为典校秘书，后随窦宪征匈奴败，被捕，死狱中。固曾摹效司马迁之《史记》为《前汉书》，为历史上极著名之国史家。所著辞赋，以《两都赋》为最著。

张衡，字平子，南阳人。顺帝时为河间相，所著以《两京赋》、《思玄赋》为最著。《两京赋》十年始完成，尤有名。

蔡邕，字伯喈，陈留人。灵帝时拜郎中，寻以事免。董卓辟为祭酒，累迁至中郎将。后以卓党死狱中，其辞赋可称为东汉殿军。

除上述所举汉赋作家之外，两京作者，余如邹阳、朱买臣、吾丘寿王、张子侨、冯衍、崔篆、崔骃、王逸、赵壹等，均甚有名。惟此种辞赋家所著之辞赋，实际上已近于倡优博弈，专供人主之玩赏，不惟失去文学家之气节，更失去赋体在文学上之价值。其富丽堂皇之辞赋，目的仅为博得一官半职之利俸。此种堆砌字藻、敷陈制成之作品，又安能免于“文以干禄”之讥诮乎？

与汉赋关系綦深，由于韵文诗之转变而连带叙述本事者，厥为故事赋之产生。欲明故事赋之产生，先宜明了赋之意义。《汉志》尝云：“不歌而颂谓之赋。”赋复有敷陈其事之义，则亦甚便于朗诵及参验旧事。如春秋、战国间之赋诗，即含此种意义，而荀卿赋礼智、贾谊悲鹏鸟，亦均设为对问之辞。司马相如之赋，更托子虚、乌有、亡是诸主名为对答。其后，此种赋体更形进步，即用历史上之人物姓名，凭虚构造，依傍故事。此种赋大约由一般无名文人创始，因其所说者为文人之故事，故其后故事中之主名，往往被误认为文章之作者。此种赋之故事常自成段落，其间精神所着重之处，每尽量描模，透切说出，甚含诗意，故其文体常介乎诗与小说之间。

故事赋最早者，为叙述宋玉故事之《神女赋》、《高唐赋》、《登徒

子好色赋》等九篇。其时代大约与司马相如相近，一切说宋玉之故事，皆被误指为宋玉所作，此种作品，后来影响所及，有名文人亦均仿作（如傅毅《舞赋》托之宋玉作是），正崔东壁所谓"其时远，其作者之名不传，则遂以为宋玉之所作耳"。《神女赋》、《高唐赋》、《登徒子好色赋》等，为甚进步之赋体，其叙述且甚能显出作者之异常机警与修辞之技巧。如《登徒子好色赋》叙宋玉对楚王自称不好色，则云：

> 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登徒子则不然，其妻蓬头挛耳，龃唇历齿，旁行踽偻，又疥且痔，登徒子悦之，使有五子。王孰察之，谁为好色者矣？

又如《神女赋》描写神女之美丽，亦饶趣味。如：

> 其始来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进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须臾之间，美貌横生。晔兮如华，温乎如莹。五色并驰，不可殚形。详而视之，夺人目精。其盛饰也，则罗纨绮缋盛文章，极服妙采照万方。振绣衣，被袿裳，秾不短，纤不长。步裔裔兮曜殿堂。忽兮改容，婉若游龙乘云翔。嫷被服，侻薄装。沐兰泽，含若芳。性和适，宜侍旁。顺序卑，调心肠。

此种修辞之格式，影响后世小说之描写方法甚大。

第七章　汉代之民歌

汉代之民歌，在当时称之为乐府诗。说者辄谓乐府诗变自楚骚，其实则多由三百篇中来。元时李孝先云："郊祀若颂，铙歌、鼓吹若雅，琴曲、杂诗若国风。"（胡应麟《诗薮》卷一所引）如郊祀歌中多用典实，并以为愈实愈典，与颂语之多典实盖如出一辙耳。

至谓乐府诗之长短句体肇源楚骚，实则不然。盖三百篇中虽以四言诗为正体，而杂言长短句者亦非少数。《周南》之《螽斯》，《召南》之《行露》、《江有汜》，《鄘风》之《桑中》……等，所在皆是。故乐府诗之杂言，决非单纯感受楚骚"些"、"只"之影响，实可以断言者。至欲详考其影响渊源之所自出，则于三百篇固自为民歌所肇祖宜多所留察外，汉武帝广拓塞外，羌狄歌曲之输入，实亦与当时民歌有甚大之关系。日人铃木虎雄尝有论著（《汉武帝乐府与塞外歌曲》），兹篇不更博加征引矣。

乐府诗之兴起也，其产生之步骤实可分为三时期：汉初创设乐府之酝酿，一也；武帝广加采辑之发展，二也；汉末乐府之继续存在，三也。

汉初，诏秦之乐官制氏，定礼乐章仪。厥后，制氏更司雅乐，叔孙通制宗庙之乐。大抵高祖之世，舞乐悉因秦之旧制。唐山夫人又作《房中祠乐》十七章，然其时乐府之名尚未定。《汉书・高祖本纪》称："高祖还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自击筑，自为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史记》称高祖为人，"不喜儒，诸客冠儒冠来者，辄解其冠，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故其所制歌

曲真挚感人，如《大风》之唱虽寥寥二十余字，形容富贵还乡之喜乐与骤得天下后患得患失之心理，流露尽致。孝惠五年，思高祖，在沛祭于高祖之庙。高祖所教儿百二十人皆令为吹乐，后有缺，辄补之。

“乐府”之名，始于惠帝二年以夏侯宽为乐府令，然是否开创、其制度如何，史书未甚详载，要以保存《房中祠乐》、《昭容乐》、《礼容乐》、《宗庙乐》等贵族乐歌为主。至武帝时，而乐府之制遂大备。

武帝距汉兴已七十余年，国势富强，家给人足，远非文、景崇尚黄老休养生息之际所能比拟。武帝复好大喜功，以武力开拓四方，远征匈奴，交通西域，均为旷古未有之盛事。武帝更欲夸示其功业，于是始立后土之祠于汾阴之脽上。此种祭祀，盖源于周代之祭太乙、配祭明堂、楚之祭神以及秦始皇之封泰山。入汉遂承继其制，而更有乐府之创制。

《汉书·礼乐志》云：“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祀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

乐府成立后，广收赵、代、秦、楚之讴，其收辑之方法虽不得详知，要之与周代辑集之三百篇颇有似处。其所收盖以当代民歌为主，据《汉书·艺文志》所载有“吴楚，汝南歌诗十五篇”、“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九篇”、“邯郸河间歌诗四篇”、“齐郑歌诗四篇”、“淮南歌诗四篇”等，而李延年亦见于《汉书·佞幸传》：

> 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刑，给事狗监中。女弟得幸于上，号李夫人，列《外戚传》。延年善歌，为新变声。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祠，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延年与上卧起，其爱幸埒韩嫣。久之，延年弟季与中人乱出入骄恣，及李

夫人卒后，其爱弛，上遂诛延年兄弟宗族。

延年尝在武帝前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武帝喜，叹息曰："善世岂有此人乎？"平阳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见之，实妙丽善舞，由是得幸。故乐府由延年等人主持之下，保存古代民间曼美之歌辞，实甚繁多。

乐府之分类，通常多以郭茂倩《乐府诗集》所定之郊庙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相和歌辞、舞曲歌辞、集曲歌辞为准则。近人梁启超主张清商曲宜脱离相和歌而独立（共分为郊庙歌、燕射歌、舞曲、鼓吹曲、横吹曲、相和曲、清商曲、杂曲等八类），其说甚觉新颖。盖据《通志·乐略》，平调、清调、瑟调皆周房中曲，汉世谓之三调。又有楚调、侧调。楚调者，汉房中乐也。汉高帝乐楚声，故房中乐皆用楚声。侧调生于楚调，与前之三调总谓之"相和"。据此，则清调实包含于相和之内。而梁启超讥之曰："郑樵有一大错误者，在清商与相和混为一谈。故于相和歌三十曲以外，复列相和平调、清调、瑟调、楚调四种，而清商则仅列七曲，附三十三曲，皆南朝新歌。一若汉魏只有相和，别无清商者。殊不知惟清商为有清、平、瑟三调，而相和则未闻有之。凡樵据王僧虔《技录》所录五十一曲，皆清商也。《宋书·乐志》云：'相和，汉旧歌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本十七曲，朱生、宋识、列和等合之为十三曲。'此十三曲，《宋志》全录。至于清商，则杜佑《通典》云：'清商三调，并汉世以来旧曲。歌章古调，与魏三祖所作者皆备于史籍。'佑所谓'史籍'，即指《宋志》也。《宋志》录完相和十三曲之后，另一行云：'清商三调歌诗，荀勖撰旧词施用者。'此下即分列平调六曲、清调六曲、瑟调八曲，则此三调皆属于清商甚明。而郑樵读《宋志》时，似将'清商三调荀勖撰'一行滑眼漏掉，漫然将《宋志》卷二十一所录诸歌全部归入相和，造出'相和平调'等名目。于是本来仅有十三曲之相和，无端增出数十

曲；本来有数十曲之清商，除吴声七曲外，汉魏歌辞一首均无。樵亦自知不可通，于是复曲为之说，谓'汉所谓清商者，但尚其音耳，晋、宋间始尚辞，观吴兢所纂七曲，皆晋、宋间曲也。'殊不知清商三曲，本惟其音，不惟其辞。郑樵谓'汉但尚音'，实则晋、宋何尝非尚音？又谓'晋、宋尚辞'，实则晋、宋间辞已逐渐散亡。大抵清商割地，始自吴兢，而郑樵、郭茂倩沿其误。今据王僧虔、沈约所记载，复还其旧。又《宋志》于三调之外，复有所谓大曲及楚调，其性质如何虽难确考，既王僧虔以类相次，则宜并属清商。"（陆侃如《中国诗史》引梁氏未刊稿）观夫梁氏之说，则清商调宜脱离相和而独立，所谓平调、清调、瑟调、楚调及大曲等，皆归于清商。梁氏新说，考据甚精，然明胡应麟已先云："今欲拟乐府，当先辨其时代，核其体裁，郊祀可为铙歌，铙歌不可为相和，相和不可为清商。"（《诗薮》卷一）虽未加以核明，固已主相和与清商之原非一体矣。

今请更略释各种乐府诗之内容。郊庙歌用以祭祀，颇类同于三百篇之《周颂》。祭祀祖先者曰庙，祭祀祖先以外诸神者曰郊，如《房中祠乐》，即汉高祖时祭祖先所歌之一种。武帝时司马相如等所为之十九章，即祭祀祖先以外诸神之《郊祀歌》也。

燕射歌辞今全亡佚。据《乐府诗集》所录，大约有亲四方之宾而用之燕享乐、有亲故旧朋友而用之大射乐、有亲宗族兄弟而用之食举乐等三类，惟食举乐之篇目尚可考见。舞曲所存歌辞亦少，要皆为贵族作品，于文学史上并无特殊之价值可言。

鼓吹、横吹均为塞外歌调，铙歌十八曲即鼓吹曲之篇章。后鼓吹分而为二，有箫笳者为鼓吹，于朝会道路用之；有鼓角者为横吹，于军中马上用之（《晋书·乐志》）惟歌辞均已无存。

相和歌、清商曲为汉代乐府中之主要部分。相和歌为"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宋书·乐志》），清商之调则以商为主（《魏志》），魏文帝《燕歌行》所谓"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者近是。

杂曲为以上诸种未提及之篇目(如马援《武溪行》、辛延年《羽林郎》等是)。

吾人研究相和清商两部分作品之内容,可概括之如次:

清商相和歌辞
- 1 社会的——如《东门行》、《上留田行》,
- 2 战争的——如《从军行》、《饮马长城窟》,
- 3 恋情的——如《陌上桑》、《白头吟》、《艳歌行》,
- 4 道德的——如《猛虎行》、《君子行》之类,
- 5 其　他——如《江南可采莲》。

《晋书·乐志》有云:"凡乐章古辞,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之属也。"此种民歌,辞句均极朴素自然,如《江南可采莲》,其风趣极近《诗经》之《芣苢》及卜辞之"其自东来雨"一例(见前)。不见卜辞中重叠反复之辞句,不知《江南可采莲》诸例之渊源所自。

《江南可采莲》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上留田行》

居世一何不同?上留田。富人食稻与粱,上留田。贫人食糟与糠,上留田。贫贱亦何伤?上留田。禄命悬在苍天,上留田。今尔叹息将欲谁怨?上留田。

此种民歌,多取音乐声调之和谐可听,殊无何种深刻意义可言。《上留田行》叹贫富生活之悬殊,发为不平之鸣,每行句尾"上留田"三字,其用在于谐韵。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三十八)中,以为魏文帝曹丕作,恐不能确信。此大约为汉代街陌俚谣,经过魏文之修润,因以留传。观其朴实自然之趣致,吾人固可信其必出于民间也。

《战城南》为反抗战争极有价值之民间歌谣,内容描写异常动人: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梁筑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归！

与《战城南》同样写战争惨暴者，尚有《十五从军征》：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出门东向望，泪落沾我衣。

汉代平民歌谣中，写男女恋情之艳歌者亦甚多。如《上邪》：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有所思》所写亦殊动人：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妃呼豨！秋风肃肃晨风飔，东方须臾高知之。

又如《艳歌行》：

翩翩堂前燕，冬藏夏来见。兄弟两三人，流宕在他县。故衣谁当补？新衣谁当绽？赖得贤主人，览取为吾组。夫婿从门来，斜柯西北眄。语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见。石见何累累，远行不如归。

相传辛延年尝制《羽林郎》，亦为描写艳情者，正宜归入平民文学之疆界：

昔有霍家姝，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头上蓝田

玉，耳后大秦珠。两鬟何窕窕，一世良所无。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余。不意金吾子，娉婷过我庐。银鞍何煜爚，翠盖空踟蹰。就我求清酒，丝绳提玉壶。就我求珍肴，金盘鲙鲤鱼。贻我青铜镜，结我红罗裾。“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人生有亲故，贵贱不相逾。多谢金吾子，私爱徒区区！”

而《陌上桑》一首，更可赞美之为艳歌中无上之作：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细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

使君自南来，五马立踟蹰。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罗敷前致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

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值千万余。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为人洁白皙，鬑鬑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

吾人观夫《陌上桑》、《羽林郎》文字之朴实挚恳，其灵动之描写及自然活泼之声韵美，均能充分表现民歌之真精神。此种民歌中，尚有多首系描写社会情形及家庭间生死别离之苦痛者，如《东门行》：

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桁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儿女牵衣啼。

“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餔糜。共餔糜上用仓浪天故，下为黄口小儿。今时清廉，难犯教言，君复自爱莫为非！”“行，

吾去为迟。”“平慎行，望君归。”

最悲哀动人者，莫如《孤儿行》：

孤儿生。孤子遇生，命当独苦。父母在时，乘坚车，驾驷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腊月来归，不敢自言苦。头多虮虱，面目多尘土。大兄言办饭，大嫂言视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儿泪下如雨。使我朝行汲，暮得水来归。手为错，足下无菲。怆怆履霜，中多蒺藜。拔断蒺藜，肠肉中怆欲悲。泪下渫渫，清涕累累。冬无复襦，夏无单衣。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春风动，草萌芽。三月蚕桑，六月收瓜。将是瓜车，来到还家。瓜车反覆，助我者少，啗瓜者多。“愿还我蒂，独且急归。兄与嫂严，当与校计。”乱曰：里中一何谚谚！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

单就描写技术而观察之，《上山采靡芜》尤为其中之特色：

上山采靡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阁去。”“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

此诗仅用八十余字，写一家新旧夫妇三口之情景如画，使人一读即痛怨彼较计锱铢贪利之故夫，此为何等经济之文学手腕！

汉代之民间歌谣，无论形式上或技巧上，俱曾获得巨大之成功。就故事体裁方面而论，《孤儿行》、《上山采靡芜》皆为写一个人或一家人之故事，《陌上桑》更进步至纯粹脱离单简之民歌而为整齐完美之故事诗。然则更伟大之杰构如《孔雀东南飞》之产生于东汉末季，是为汉代民歌数百年来不断发展继续而生之果实无疑已！东汉乐府诗作者，据郭茂倩所录杂曲，有马援之《武溪深行》、傅毅之《冉冉孤生竹行》、张衡之《同声歌》、辛延年之《羽林郎》、宋子侯之《董娇饶》、繁钦之《定情诗》，而无名氏之作亦复甚众。近人梁启

超以为《孔雀东南飞》之故事虽发生于汉代，但未必即为当时所作。梁氏主张《孔雀东南飞》一类之作品皆起于六朝，并受佛教文学之影响。陆侃如则根据《华山畿》之神话以为应作于宋少帝至徐陵(423—583)间。陆君并引文中"青庐"一词(见《酉阳杂俎》)以为北朝民间结婚所用，而"四角龙子幡"一句，则又证为南朝典实。其说本身已有矛盾之处(见胡适《白话文学史》上卷)。胡适则以为此诗当离建安不远，引魏文帝删改民间歌谣而成之《临高台》"五里一反顾，六里一徘徊。吾欲衔汝去，口噤不能开"数语为据，并谓历魏、晋、宋、齐之诸大文学批评家如刘勰、钟嵘等受时代之影响，俱未能识赏此掺有鄙俚字句之长篇，故经三百余年始收入《玉台新咏》中，方有最后之写定，因展转之口耳流传，遂增入不少如"青庐"等之本地风光。此说或较可信。原诗有小序云：

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没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

其诗云：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

府吏得闻之，堂上启阿母："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共事三二年，始尔未为久。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阿母谓府吏："何乃太区区？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府吏长跪告："伏维启阿母，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阿母得闻

之，槌床便大怒："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

府吏默无声，再拜还入户，举言谓新妇，哽咽不能语："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取。以此下心意，慎勿违我语！"新妇谓府吏："勿复重纷纭。往昔初阳岁，谢家来贵门。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劝作息，伶俜萦苦辛。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妾有绣腰襦，葳蕤自生光。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箱帘六七十，绿碧青丝绳。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人贱物亦鄙，不足迎后人。留待作遗施，于今无会因。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

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珠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上堂拜阿母，阿母怒不止。"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出门登车去，涕落百余行。府吏马在前，新妇车在后，隐隐何甸甸，俱会大道口。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誓不相隔卿，且暂还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当还归，誓天不相负！"新妇谓府吏："感君区区怀。君既若见录，不久望君来。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

入门上家堂，进退无颜仪。阿母大拊掌："不图子自归！十三教汝织，十四能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知礼仪，十七遣汝嫁，谓言无誓违。汝今何罪过，不迎而自归？""兰芝惭阿母，儿

实无罪过。”阿母大悲摧。还家十余日，县令遣媒来。云有第三郎，窈窕世无双，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阿母谓阿女：“汝可去应之。”阿女含泪答：“兰芝初还时，府吏见丁宁，结誓不别离。今日违情义，恐此事非奇。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阿母白媒人：“贫贱有此女，始适还家门，不堪吏人妇，岂合令郎君？幸可广问讯，不可便相许。”媒人去数日，寻遣丞请还，说有兰家女，承籍有宦官 。云有第五郎，娇逸未有婚，遣丞为媒人，主簿通语言。直说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结大义，故遣来贵门。阿母谢媒人：“女子先有誓，老姥岂敢言？”

阿兄得闻之，怅然心中烦，举言谓阿妹：“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兰芝仰头答：“理实如兄言。谢家事夫婿，中道还兄门，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虽与府吏要，渠会永无缘。登即相许和，便可作婚姻。”媒人下床去，诺诺复尔尔，还部白府君：“下官奉使命，言谈大有缘。”府君得闻之，心中大欢喜，视历复开书，便利此月内，六合正相应。“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交语速装束，络绎如浮云。青雀白鹄舫，四角龙子幡。婀娜随风转；金身玉作轮，踯躅青骢马，流苏金缕鞍；赍钱三百万，皆用青丝穿。杂彩三百匹，交广市鲑珍。从人四五百，郁郁登郡门。阿母谓阿女：“适得府君书，明日来迎汝。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举。”阿女默无声，手巾掩口啼，泪落便如泻。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窗下。左手持刀尺，右手持绫罗。朝成绣夹裙，晚成单罗衫。暗暗日欲暝，愁思出门啼。

府吏闻此变，因求假暂归。未至二三里，摧藏马悲哀。新妇识马声，蹑履相逢迎，怅然遥相望，知是故人来。举手拍马鞍，嗟叹使心伤。“自君别我后，人事不可量。果不如先愿，又非君所详。我有亲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应他人，君还何所

望？”府吏谓新妇：“贺君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新妇谓府吏：“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执手分道去，各各还家门。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念与世间辞，千万不复全。

府吏还家去，上堂拜阿母：“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儿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单。故作不良计，勿复怨鬼神。命如南山石，四体康且直。”阿母得闻之，零泪应声落：“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慎勿为妇死，贵贱情何薄？东家有贤女，窈窕艳城郭。阿母为汝求，便复在旦夕。”府吏再拜还，长叹空房中，作计乃尔立，转头向户里，渐见愁煎迫。其日牛马嘶，新妇入青庐。庵庵黄昏后，寂寂人定初。“我命绝今日，魂去尸长留”。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府吏闻此事，心知长别离，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

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行人驻足听，寡妇起彷徨。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

《孔雀东南飞》一诗，为古代民间最伟大之故事诗。文字既真挚朴实，情节又复缠绵哀艳、凄切动人，并暴露古代婚姻不自由之痛苦，不特在诗歌中为空前之创作，更足为当时妇女社会生活之重要史料。专就其文学上之特色观之，则有：

1. 恰当之题材成为创新之悲剧格式　此种格式不特在诗篇中不多见，即在后来之传奇剧本、小说亦不易见。

2. 用对话叙述为古代含有剧情之作品　中间叙述各人之对话，描写各人之性格，使读者易有真切之认识。

3. 叙述手腕经济　诗中之人物有十二人之多，而其中五者之

个性，完全自诗中表白出之。兰芝为主角，彼固为一甚能了解爱情之女子，受夫家母家种种之压迫，不得自由，因而出以消极反抗，一死了之。焦仲卿受家庭母亲之压迫，结果亦能殉情。仲卿母为一嫉妒凶残之悍妇。兰芝母虽爱其女，亦爱莫能助。兰芝兄仅知贪财慕势。全诗虽只一千七百余字，而叙述无微不至，其描写真可认为最经济之手腕。

4. 作风朴实　首段"十三能织布"等句，于篇中又重复叙述，而十余岁这叙述凡五见，均见其作风之朴素实挚。复字、俗句甚多，而莫非出于自然。

5. 叙述善于穿插　对话之写情非常朴实、非常哀苦，惟写景物则渲染精致。如"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珠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一段，写于兰芝被逼还母家之时，偏见作者叙述之闲暇。又如"青雀白鹄舫，四角龙子幡。婀娜随风转，金车玉作轮。踯躅青骢马，流苏金缕鞍。赍钱三百万，皆用青丝穿。杂彩三百匹，交广市鲑珍。从人四五百，郁郁登郡门"此种华丽之句，穿插于悲苦之对话中，乃益衬出兰芝之伤怜。

6. 篇幅分量分配有相当之比例　在对话中每人所占量之多少，与诗中人物之重要性成正比例。占篇幅最多者为兰芝，次为仲卿，次仲卿母，次兰芝母，殊堪玩味。

此诗具备上述多方面之特点，诚不愧为汉代民歌中最出色之叙事诗矣。

汉魏六朝文学



陈中凡著

据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重排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汉魏六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宋人苏轼作《潮州修韩文公庙记》，说："自东汉已来，道丧文弊，……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文起八代之衰。"依他的意见，自东汉以后，魏、晋、宋、齐、梁、陈、隋，皆是中国文学史上的衰颓时期了！清人阮元力反其说，其《揅经室三集·文言说》、《书文选叙后》等篇，推尊八代，至谓韩、苏诸家奇偶相生之体，乃经也，史也，子也，不能目之为文。甚至有人说："八代之文衰于韩愈。"他们俩造这种极端相反的见解，究竟谁是谁非呢？我们研究古代文学的人，本应用冷酷的态度，作客观的研究，不必凭主观的私见，起无谓的争论。而且我们要知道八代文学，究竟是盛是衰，也必须将八代以前和八代以后文学界情形，略为比较一下，方能得到较正确的判断。所以本书开首，先从中国文学发达史上，观察八代文学的地位。

中国文学之演进，就文体方面说，约有十一种嬗变；就时代说，约分十有三期。今将两者对照以下图明之。

试观下图，上古是风谣时期，其作品之传于后世者甚少。到殷、周两代，才有四言诗发生，今世所存三百篇《诗经》中之商颂和风、雅、颂是。这是北派（黄河流域）文学。晚周长江流域又有一种新兴

中国文艺演进图

<table>
<tr><td rowspan="3">古代</td><td>1 风谣（神话）</td><td>尚古</td><td rowspan="6">赋
诗</td><td rowspan="7">文
律</td><td rowspan="10"></td></tr>
<tr><td>2 四言诗</td><td>殷至东周中</td></tr>
<tr><td>3 楚辞</td><td>晚周</td></tr>
<tr><td rowspan="3">中古</td><td>4 辞赋，乐府</td><td>西汉东汉</td></tr>
<tr><td>5 五言诗（骈文）</td><td>魏晋六代</td></tr>
<tr><td>6 律诗</td><td>隋唐</td></tr>
<tr><td rowspan="3">近代</td><td>7 词</td><td colspan="2">晚唐至南宋</td></tr>
<tr><td>8 曲（八股）</td><td>南宋至明末</td><td colspan="2">律夹散</td></tr>
<tr><td>9 小说</td><td>明末至清</td><td colspan="2">散文</td></tr>
<tr><td>现代</td><td>10 新文艺</td><td>民国以来</td><td colspan="2"></td></tr>
</table>

文体，号为楚辞，属于南派。此中国文学第二期和第三期的嬗变。汉代最大的文体，一派是从楚辞出来的辞赋，一派是近于三颂的乐府诗，至建安前，才有五言诗发生。其时汉室已微，曹氏当国，故表中列为魏代。此第四、第五期的变化。晋、宋以后，由齐、梁、陈至于北魏、北周，皆属古诗时代，表面上一脉相承，内容却大有变化。一则晋人潘岳、陆机，宋人颜延之、谢灵运出来，易朴素为雕琢，化单行为排偶，另成一种面目。再则齐人沈约、王融、谢朓一班人发明四声，变古诗蹈厉之音为和柔之气，另成一种腔调。这两种关系，皆是隋唐以后律诗形成的原因，而其种子却播于六朝。这是中国文学第六期的变化（采焦循《易余籥录》说）。至此以后，唐人的律诗、两宋人的词、元人的曲、明清两代的小说，直到现代的新文艺，变化多端，皆属于八代以后之事，不归本书中交代，可以存而不论。我们现在要详叙的，是前图中第四、第五两期的文学。这两期的特点，可以简单说明如下：

（甲）汉　　　　　　辞赋时期，乐府时期。

（乙）魏、晋、六朝　古诗时期，骈文时期。

再将古诗的嬗变，详细分之，如下：

（子）东汉　　古诗胚胎期；

（丑）魏　　　古诗成立期；

（寅）晋、宋　律诗胚胎期；

（卯）北朝　　北派诗歌发生期。

由上表看来，八代文学，是上承周、楚，下启隋、唐，中间的一个枢纽。比方昆虫发生，经过幼虫、蛹、成虫三期变化，蛹是中间必经的一个历程。若比较优劣，强分盛衰，那就未免多事。然则“八代之衰”和“八代之盛”这一派话，有什么意义？故本书一概不取，纯用客观的态度，推求八代的真相，庶几免去武断的弊病。

第二节　汉以前的文学界

汉人继秦而有天下，汉人文学，应当沿袭秦人，或由秦人文学嬗变而出。但是我们考汉代政治和学说，皆蒙秦人影响，独文学方面毫无关系。这是什么原故？因为秦人尚法制，根本反对文学，故中国文学史上无秦人的地位，秦代实无文学之可言。试观他们反对文学的理由，约分几层：

（一）文学足以乱法

《韩非子·五蠹》篇说：

> 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赏。……工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

《六反》篇又曰：

> 学道立方，离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学之士。

因为文人多好口辩，骋空谈，一切任性而行，不知尊重国家法纪，是法家所最痛恶的。

（二）文人多无用

《商君书·农战》篇说：

学者成俗，则民舍农，从事于谈说，高言伪议，舍农游食，而以言相高也。

《韩非子·五蠹》篇亦说：

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

法家最注重能使国家富强的"耕战主义"，文人多不耕不战，而以游谈坐享其成，为他们所不容。

（三）文人以私害公

文人不独消闲坐食，无所事事，而且只图个人富贵，不顾国家安危，往往播弄是非，扰乱社会秩序，破坏政治安宁，冀获非分的权利。故商鞅《农战》篇说：

烦言饰辞而章无用，主好其辩，不求其实，说者得意，道路曲辩，辈辈成群，民见其可以取王公大人也，而皆学之。

韩非《五蠹》篇亦说：

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古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

统观上述三种理由，他们所谓"文学之士"，系包括一切学者，尤偏重于政客谈士，不仅专指文人，但文人也当然在内，不能逃避这种指摘。所以秦人统一天下以后，几乎无文学可言。观《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泰山刻石之辞曰：

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从臣思迹，本原事业，只诵功德。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兴夜

> 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后嗣。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戒。

简直是一篇煌煌的法令，没有丝毫文学的兴味。虽是四言，三句一韵，凡十二韵，可名之为四言韵语的文告，绝不能目之为文学。其之罘、碣石、会稽三种刻石，也和此文同样，不必钞录。《始皇本纪》还说："始皇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歌弦之。"这首诗现在不传了，不知其价值如何。然考其制此诗的动机，是因为天变（三十六年，荧惑守心，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和流言（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而作的，想《仙真人诗》的内容，亦不外胜妖定怪一派鬼话罢了，也没有什么文学意味。

由上面说来，秦朝的文学萌芽，几乎摧残殆尽，汉人如沿袭下去，岂不要入于绝境？所以当时经术，犹用秦博士伏生之说，礼制犹聘叔孙通起草；至于文学，则不能不祧秦人而取法于周楚了。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说："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京都诸赋，苏张纵横六国，侈陈形势之遗也。《上林》、《羽猎》，安陵之《从田》，龙阳之《同钓》也。《客难》、《解嘲》，屈原之《渔父》、《卜居》，庄周之《惠施问难》也。韩非《储说》，比事征偶，连珠之所肇也。而或以为始于傅毅之徒，非其质矣。孟子问齐王之大欲，历举轻暖、肥甘、声音、彩色，《七林》之所启也。而或以为创之枚乘，忘其祖矣。"他这段话，未免傅会太过；然说汉人文学，大抵皆源本《诗》、《骚》。这说是可信的。今因述汉以前文学界的情形，并说到此，其详容后篇述之。

第二章　两汉文学

第一节　汉代文学的背景

文学是人类性情的表现、社会的反映，故欲知一代特殊的文学，不可不考其背景。汉朝是君权最发达时期，当时学者的思想，社会的风尚，莫不受政治势力的支配，文学更是它的附属品了。故述汉代文学的背景，先从政治方面言之：

汉代政治，言其武功，则东平朝鲜，西征匈奴，声威煊赫，确有可观。言其文治，则推崇儒术，引用儒生，创制乐府，于文学上也发生莫大的影响。汉高祖刘邦虽是个草泽英雄，不懂什么学问。他见人戴儒冠，就取而溺之；与人讲话，常大骂"竖儒"；但是他的文学，倒还不错。试看他还故乡沛邑时，置酒沛宫，召集故人父老子弟佐酒。酒酣，他击筑自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发扬蹈厉，很合他那种"成则为王"的身分。武帝刘彻的文学天才比较更高，他所作的《秋风辞》、《李夫人歌》，都很有文学上的价值。他如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皆折节下人，招致四方宾客，内中不少文学之士，如严忌、枚乘、司马相如、小山等，各以辞赋著名。文学得到他们这班侯王提倡，应当十分发达，较晚周更加进步了。哪知他们这种提倡，不独没有好影响，反足以妨碍文学的进步。这是什么缘故？大概因为文学宜于独立，宜任其自由发展，一到了王公大人治下，沾染着贵族的色彩，就成了阿谀的玩品，没有什么价值了。这是汉代政治的背景。

次言当世学者的思想。先秦学者各有他们独立的主张，本不为政治转移；经秦始皇一番大诛除，士气消沉。到了汉代，就不能不托庇于政治势力之下，随着贵族的脚跟转移了。试看高帝、惠帝、文

帝、景帝、武帝五朝，为儒家、道家两派互相竞争的时候。儒家虽以武帝的力量，黜百家而定一尊；然自秦人为政，专以严酷的法令束缚人民，天下莫不厌其烦苛；加之汉、楚兵争以后，人心厌乱，大家更希望得片时休息，故道家“无为”的思想，很投合汉初群众的心理。曹参初为齐相，尽召长老诸先生，问有什么法子安集百姓。诸儒言人人殊，参不知何从。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请之。盖公说：“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参用其言，相齐九年，齐国大治，称为贤相。后来萧何死，惠帝召参为相，参一切皆尊何旧法，日夜饮酒，无所事事，为相三年死，民间歌曰：“萧何为法，斠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壹。”这皆是因势利导的效果。文、景二帝又皆深于黄、老刑名之学，致天下于太平。当时又因为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所以景帝及一班窦氏皆读老子书，尊其术，儒家不能与之争。及至武帝推崇儒家，赵绾、王臧皆以儒者见用。绾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且荐其师申公。因为窦太后出而阻挠，绾、臧诸人皆被排黜。所以由汉兴至武帝初年，凡七十余年，天下学说思想，道家的势力最大。后来窦太后崩，田蚡为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广招文学儒者，天下学者靡然向风。从此以后，儒学成为中国的国教了！而太史公司马谈学道论于黄子，其述六家要旨，还是归本道家。足见道家的潜势力依然存在，不以帝王之罢黜而至于消灭。所以汉人的文学，戴着儒家礼教帽子的居多，而道家的思想犹时时流露于字里行间，随处可以看到。这是汉代思想的背景。

再次，说社会风俗的背景。自秦始皇用法律劝导贞节，汉朝更加以种种奖励。《汉书·宣帝纪》及《后汉书·安帝纪》，皆有诏赐贞妇顺女谷帛、旌表门闾的大典。女子至此，应循规蹈矩，无丝毫失德可言了。哪知成帝后宫荒乱，所以刘向才作《列女传》为鉴诫。武帝营妓，又为中国宫妓之始。就是社会上男女交际，也是公开的。如《铙歌》中《上邪》云：“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

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又《有所思》云：“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绕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已后，勿复相思！……”男女自由表示爱慕，丝毫不受法律拘束，视儒家道德亦若无物。何以他们苦心孤诣，提倡礼教，竟无多效果呢？这是因为他们那班大人先生们，日日口中高谈贞节，而公侯之宫，美女数百，卿士之家，侍妾数十（仲长统说），加以画眉傅粉，佩玉缨金，妆饰日盛，奢侈无度。自家言不顾行，而希望天下人违反常性，那是不可能的事。这是汉代社会的背景。

根据上述三项背景，所以汉代文学作品，多数是贵族的，很少是平民的；其思想多属儒家的，中间也有道家的；其观念偏于道德的，间或夹杂浪漫的。这是当时政治、学术和社会上三大特点，我们应先分析观察清楚，而后方能谈汉人的文学。

第二节 汉代辞赋

汉人文体，以辞赋为最著；论汉代文学，当首述它了。考辞赋的来源，班固《两都赋叙》说：“赋者古诗之流。”《诗大序》说：“诗有六义，二曰赋。”赋本古诗中之一体，后来方以附庸蔚成大国，其间嬗变的痕迹，当于论楚辞中考之。今言汉赋，无须及此。至汉赋的派别及其渊源，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分之为四类，录之如次：

一、屈原以下二十家赋；

二、陆贾以下二十一家赋；

三、孙卿以下二十五家赋；

四、杂赋十二家。

这四派赋的分别，章太炎先生《国故论衡·明诗》篇释之曰：“屈原言情，孙卿效物，陆贾赋不可见，其属有朱建、严助、朱买臣诸家，盖纵横之变也。……杂赋有《隐书》者，传曰：‘谈言微中，亦可以

解纷。'与纵横稍出入，淳于髡《谏长夜饮》一篇，纯为赋体。优孟诸家顾少耳。东方朔与郭舍人为隐依以谲谏，世传《灵棋经》诚伪书，然其后渐流为占繇矣。管辂、郭璞为人占皆有韵，斯亦赋之流也。"依他的解释，屈原一派为抒情之赋，孙卿一派为体物之赋，陆贾一派为纵横之赋，杂赋为谐谑之赋。古赋共分此四类。他又考汉人辞赋，泰半出于屈原。曰："汉世自贾生《惜誓》，上接楚辞，《鹏鸟》亦方物《卜居》，而相如《大人赋》自《远游》流变，枚乘又以《大招》、《招魂》散为《七发》。其后汉武帝悼李夫人，班婕妤自悼，外及淮南、东方朔、刘向之伦，未有出屈、宋、唐、景外者也。"少数出于孙卿。曰："孙卿五赋，写物效情，《蚕》、《箴》诸篇，与屈原《橘颂》异状。其后《鹦鹉》、《焦鹩》，时有方物。"纵横家如鲁仲连、邹阳之徒，援譬引类，易人心志，亦文辩之隽。武帝以后，宗室削弱，纵横之辞，乃无所用，故此派赋不可多见。然符命中之封禅文、典引，设论中之《答客难》、《解嘲》、《答宾戏》仍为其变相。杂赋除《滑稽传》所载诸家谲谏之辞，其他亦不多见。依章先生的见解，是汉赋出于屈原者最多，出于孙卿者较少，陆、贾杂赋两派为尤少。可以换言之，曰：汉赋属于抒情者多，体赋者少，纵横、谐谑两派尤少了。然我看汉赋的体制，诚多出于屈、宋，而其内容，则与屈、宋之抒情者不同，与孙卿之刻画一物者亦复不同，大抵图写山川，肆陈物色，铺排靡丽，雕绘满眼，最后乃归结到本旨，使人骤读之，不知其真意之所在。而且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两京赋》，其文大抵散行而用韵，或不用韵，形式亦复不同。班固说："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谕，咸有恻隐古诗之意。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扬子《法言·吾子》篇亦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这几句区别汉人辞赋与楚人骚赋风格各异，最为明确。故汉赋出于楚辞而更加丽靡，变楚辞之律文为散文。兹

将汉赋形式沿袭楚辞之点，列举如下，以明其嬗变的痕迹。

（一）**楚辞《离骚》**　此篇章法如下：

（甲）叙章　自“帝高阳之苗裔兮”至“来吾导夫先路”，为《离骚》叙文。

（乙）本文　又分数节：

（子）自“昔三后之纯粹兮”至“愿依彭咸之遗则”。此节被谗明志。

（丑）自“长太息以掩涕兮”至“固前圣之所厚”。此节言己志不变。

（寅）自“悔相道之不察兮”至“岂余心之可惩”。此节为退隐之词。

（卯）自“女媭之婵媛兮”至“沾予襟之浪浪”。此节与女媭言志。

（辰）自“跪敷衽以陈辞兮”至“好蔽美而嫉妒”。此节言欲叩帝阍而不得。

（巳）自“朝吾济于白水兮”至“予焉能忍与此终古”。此节言求女无媒。

（午）自“索琼茅以筳篿兮”至“使百草为之不芳”。此节命灵氛占卜。

（未）自“何琼佩之偃蹇兮”至“周流观乎上下”。此节言去国。

（申）自“灵氛既告余以吉占”至“蜷局顾而不行”。此节为去国后眷顾之词。

（丙）结章　“乱曰”以下。

（二）**楚辞《招魂》**　此篇章法大致仿《离骚》，特中幅变化，乃似不同。

（甲）叙章　“朕幼清以廉洁兮”至“不能复用巫阳焉”。

（乙）本文　“乃下招曰：魂兮归来！去君之恒干，何为四方些？”以下分节铺叙：

（子）“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托些！”至“归来兮，不可以托些！”

（丑）“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托些！”至“归来兮，不可以久淫些！”

（寅）“魂兮归来，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至“归来兮，恐自遗贼些！”

（卯）“魂兮归来，北方不可以止些！”至“归来兮，不可以久些！”

（辰）“魂兮归来，君无上天些！”

（巳）“魂兮归来，君无下此幽都些！”

（午）“魂兮归来，入修门些！”

（未）“魂兮归来，反故居些！”

（申）“魂兮归来，何远为些！”

（丙）结章　“乱曰”以下。

此篇以叙起，以乱曰终，大致仿《离骚》；而篇中连叠“魂兮归来”句，以相呼应。首言“何为乎四方”，下连言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不可止；又言无上天，下地；最后劝其入修门，返故居。前后一起一结，中间数排，章法缜密，与骚辨的散漫者不同，实为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之所本。

（三）司马相如《子虚赋》　此篇章法如下：

（甲）叙章　楚使子虚答乌有先生问。

（乙）本文　子虚述云梦事。

（子）其山：则盘纡茀郁，隆崇嵂崒，……

（丑）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附，……

（寅）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瑉昆吾，……

（卯）其东：则有蕙圃衡，兰，芷，若，芎䓖，菖蒲，……

（辰）其南：则有平原广泽，登降陁靡，……

（巳）其西：则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

（午）其北：则有阴林，……

（丙）结章　乌有先生应子虚说。

此文前叙后结，中间逐段铺排，全仿《大招》，特将韵文化为散文耳。推之：班固《两都赋》，张衡《两京赋》，莫不同此。兹举一则，以例其余。

（四）班固《西都赋》

（甲）叙章　西都宾问东都主人。

（乙）本文　宾述西都形胜：

（子）其阳：则崇山隐天，幽世穹谷，……

（丑）其阴：则冠以九峻，陪以甘泉，……

（寅）东郊则有：通沟大漕，……

（卯）西郊则有：上囿禁苑，……

（辰）其中乃有：九真之麟，……

（巳）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

中间分段铺叙，章法仍从楚辞蜕变而来。若就每段演为一篇，则成枚乘之《七发》、傅毅之《七激》、张衡之《七辨》、崔骃之《七依》、马融之《七广》。其散行，如东方朔之《答客难》、扬雄之《解嘲》、崔骃之《达旨》、班固之《答宾戏》、张衡之《应间》，可谓出于楚辞中之《卜居》、《渔父》及宋玉《对楚王问》，亦可谓由赋中之问答体变化而出。试将汉赋之互相摹拟及其渊源，列表对照如后：

第一类　楚辞：《离骚》，《大招》，《招魂》。
　　　　汉赋：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两京赋》。

第二类　楚辞：《九歌》，《九章》，《九辩》。

汉赋：王褒《九怀》，刘向《九叹》，王逸《九思》。

第三类　楚辞：《卜居》，《渔父》，宋玉《对楚王问》。

汉赋：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崔骃《达旨》，班固《答宾戏》，张衡《应间》。

上述第一类都系长篇，第二类为分章体，第三类为问答体。惟枚乘《七发》、傅毅《七激》等，既系分章，又为问答，却不能把它归到第二、第三类，实由第一类蜕变而来。学者于此，可以明汉赋与楚辞中间嬗变的痕迹了。

兹将两汉赋家，依时代录之如次，以见盛衰。

(一) 西汉文帝、景帝时(公元前 179 至 141 年)。

贾谊，洛阳人。作《屈原文》及《鹏鸟赋》。(公元前 200 至 168 年)

枚乘，字叔，淮阴人。作《七发》。《汉书·艺文志》载枚乘赋九篇，今残。

庄忌(避明帝讳，改称严忌)，会稽吴人。作《哀时命》。《汉书·艺文志》有庄夫子赋廿四篇，今残。

(二) 武帝时(公元前 140 至 84 年)。

武帝刘彻，自造赋二篇，今存《悼李夫人赋》。

淮南王刘安为《离骚》传，《汉书·艺文志》有淮南王赋八十二篇，今《艺文类聚》存《屏风赋》一篇，余亡。

淮南群臣，《汉书·艺文志》有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今楚辞中仅存小山《招隐士》一篇，余亡。

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汉书·艺文志》载相如赋二十九篇，今《文选》中仅存《子虚》、《上林》、《哀二世》、《大人》、《长门》五篇，余亡(公元前 179 至 117 年)。

东方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人。作《七谏》、《答客难》、《非有先生论》等文。

枚皋，乘子。《汉书·艺文志》有枚皋赋百二十篇，今亡。

庄助、庄葱奇，皆庄忌族子。《汉书·艺文志》有庄助赋三十五篇，庄葱奇赋十一篇，今皆亡。

司马迁，字子长，《汉书·艺文志》有司马迁赋八篇，今《艺文类聚》载其《悲士不遇赋》一篇。

（三）宣帝后（公元前 73 年至公元 20 年）。

刘向，字子政，《汉书·艺文志》有刘向赋三十三篇，今《楚辞》中存《九叹》九篇，《古文苑》中存《请雨华山赋》一篇，余亡（公元前 80 年至公元 9 年）。

王褒，字子渊，蜀人。《汉书·艺文志》载王褒赋十六篇，今《楚辞》中存《九怀》九篇，《文选》中存《洞箫赋》一篇，《圣主得贤臣颂》一篇，余残。

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汉书·艺文志》载扬雄赋十二篇，今《文选》中存《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汉书》本传存《反离骚》一篇。《古文苑》有《蜀都》、《太玄》、《逐贫》三赋。《文选》又有《解嘲》、《赵充国颂》及《剧秦美新论》（公元前 53 年至公元 18 年）。

（四）东汉（公元 25 年至 189 年）。

班彪，字叔皮，扶风安陵人。作《北征赋》（公元 3 年至 54 年）。

班固，字孟坚，彪子。作《两都赋》及《答宾戏》、《典引》（公元 32 年至 92 年）。

冯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作《显志赋》。

李尤，字伯仁，广汉雒人。作《函谷关赋》、《东观赋》。

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人。作《二京》、《周天大象》、《思玄》、《髑髅》及《冢》等赋。又作《七谏》、《应间》（公元 78 年至 139 年）。

崔骃，字亭伯。作《七依》、《达旨》、《酒警》等文。

傅毅，字武仲，扶风茂陵人。作《七激》。

马融，字季长，扶风茂陵人。注《离骚》，作《广成》、《长笛》二赋(公元79年至166年)。

王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人。作《楚辞章句》及《九思》、《机赋》等。子延寿，字考文，作《灵光殿赋》。

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人。作《述行赋》(公元133年至192年)。

统看前表，知西汉文、景二帝时，为汉赋萌芽时期，其体制仍规仿楚辞，无多变化。武帝时，为汉赋大成时期，壁垒一新，非楚辞所能包容。宣帝后为沿袭时期。东汉以后为衰微时期。

第三节　汉代诗歌

汉人诗歌，依体制分别，约有三种：第一种，是西汉初杂言诗；第二种，是两汉乐府诗；第三种，是东汉末五言诗。杂言诗多沿用楚人旧调，可称为楚辞派的诗。乐府诗或模仿《诗经》中的三颂，或采用四方夷乐，或采自民间，可称为乐府派的诗。五言诗多流行于民间，可称为平民派的诗。试分述之：

（一）**杂言诗**　汉初诗歌，仍沿用楚声，但多为五言加兮字的短歌，与北派四言诗及南派楚辞似皆不同。因为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学，至秦代其势已衰，至汉尚未有新派文艺代之而起，故有此介于楚辞、汉诗两者之间的“楚调歌诗”出来。这完全由于楚遗民及几个大力者提倡，所以才有这种现象。《史记·项羽本纪》载范增说：“秦灭六国，楚最无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因为天下怨秦，楚人最为愤激，所以陈胜、吴广、项羽等起兵，皆以“张楚”为名。这就是楚辞派诗歌复兴的绝大原因。试看《九章》之《悲回风》云：“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惜往日》云：“临沅、湘之玄渊兮，遂自忍而沉流；卒没身而绝名兮，惜壅君之不昭。”言及屈原沉水，及其死后，明属后人追悼之辞。又《抽思》曰：“昔君与我成言兮，曰‘黄昏以为期’；羌中道而

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明从《离骚》中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与余有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等句摹模而来。《惜诵》曰“心郁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予之中情；固烦言不可结而诒兮，愿陈志而无路；退静默而莫予知兮，进号呼又莫予闻。”由《离骚》中“忳郁邑予侘傺兮，荃不察予之中情”及“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修吾初服”诸句蜕变而来，皆属后人仿骚之作。又《渔父》、《卜居》两篇，开首皆言“屈原既放”，为其后人追述，亦不待言。故王逸谓：“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词以相传焉。”亦认其文出于后人。又宋玉之《高唐赋》、《神女赋》、《讽赋》、《钓赋》及《登徒子好色赋》，皆称楚襄王，分明不是当时人称本国君主的口吻。而且叙宋玉与襄王问答，亦明出于后人追述。总而言之，这些托名屈、宋的作品，概无主名可考，原多出于楚遗民之手。故项羽被围垓下，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那班兵士个个皆好楚声，足见其流行最为普遍。难怪刘邦、项羽一班武人，各有“楚歌”留传于世，一时卿相皆模楚调制歌了。兹将当时楚调诗歌，录之如次：

汉高祖刘邦《大风歌》

赵幽王刘友歌

武帝刘彻《瓠子歌》，《秋风辞》，《西极天马歌》，《落叶哀蝉曲》

司马相如《琴歌》

淮南王刘安《八公操》

燕刺王刘旦歌

广陵厉王刘胥歌

霍去病《琴歌》

乌孙公主歌

昭帝刘弗陵《黄鹄歌》，《淋池歌》

李陵《别歌》

杨恽《拊缶歌》

赵飞燕《归风送远操》

华容夫人歌

灵帝刘宏《招商歌》

少帝刘辩《悲歌》

唐姬歌

徐淑《答秦嘉诗》

表中这班作者，大半是些贵族。他们的作品，多属短篇抒情小诗，犹诗中的绝句，词中的小令。较之司马相如、扬雄等的长篇赋，词藻虽不如其丰富，而趣味反觉得隽永。然而同属楚辞的余波，所以寿命究不能长，不久即有新兴派的文艺代之而起了。

（二）乐府诗　汉代乐府，起于孝惠二年，令夏侯宽为乐府令，这是乐府设官之始。但当时虽有此官，而于文学上并无创作，不过习常肄旧，歌高祖三侯之章，改唐山夫人所作房中乐为安世乐而已。三侯之章就是《大风歌》，已录见第一章，其为楚调，固不待言。《汉书·礼乐志》说："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今考其辞，有四言者，如第一、第二首曰：

大孝备矣，休德昭清！高张四县，乐充宫庭，芬树羽林，云景杳冥，金支秀华，庶旄翠旌。

七始华始，肃唱和声，神来晏娭，庶几是听，粥粥音送，细齐人情。忽乘青玄，熙事备成，清思眑眑，经纬冥冥。

有三言者，如第七、第八首曰：

安其所，乐终产，乐终产，世继绪。飞龙秋，游上天，高贤愉，乐民人。

丰草葽，女萝施，善何如？谁能回？大莫大，成教德。长莫长，被无极。

有七言及三言者，如第六首曰：

大海荡荡水所归，高贤愉愉民所怀。太山崔，百卉殖，民何

贵？贵有德。

其内容首言“大孝备矣”，以下屡言“大矣孝熙”，“皇帝孝德”，“孝道随世”，“呜呼孝哉”，反反复复，多言孝德和“寿考不忘”、“受福无疆”等颂祷之词，近于颂诗。其形式与楚调似乎不同，但《汉书》说它也用楚声唱之。可见汉代初期的乐府，仍未脱楚辞范围。

惠帝时仅有“乐府令”，至“乐府”则立于武帝之时。《汉书·礼乐志》说：“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颜师古注：“始置之也。乐府之名，盖起于此。”郭茂倩《乐府诗集》亦言：“武帝乃立乐府。”由“乐令”推广而成衙署，乐府至此大兴。乃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这是当时特创的新乐府，和楚辞大大不同了。考其内容，约分四大类：

（甲）郊庙歌　郊庙歌辞用于祭祀，是当时的神曲。今所存者，有司马相如等所造的郊祀歌十九章，其名目如下：

一、练时日；

二、帝临；

三、青阳；　《汉书·礼乐志》曰：“邹子乐。”

四、朱明；　《汉书·礼乐志》曰：“邹子乐。”

五、西颢；　《汉书·礼乐志》曰：“邹子乐。”

六、玄冥；　《汉书·礼乐志》曰：“邹子乐。”

七、惟泰元；

八、天地；

九、日出入；

十、天马；　一曰《天马歌》。

十一、天门；

十二、景星；　一曰《宝鼎歌》。

十三、齐房；　一曰《芝房歌》。

十四、后皇；

十五、华烨烨；

十六、五神；

十七、朝陇首；　一曰《白麟歌》。

十八、象载瑜；　一曰《赤雁歌》。

十九、赤蛟。

其中《天马歌》凡二首，实为二十首。《汉书·武帝纪》载："元鼎四年秋，马生渥洼水中，作《宝鼎》、《天马之歌》。太初四年，春，贰师将军李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来，作《西极天马之歌》。元鼎四年，夏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作《宝鼎之歌》。元封二年，夏六月，甘泉宫内中产芝，九茎连叶，作《芝房之歌》。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获白麟，作《白麟之歌》。太始三年，行幸东海，获赤雁，作《赤雁歌》。"这类诗皆是因获符瑞而作的，似近于颂诗，而其词句，则有三言者，如《天马歌》曰：

> 太一况，天马下，沾赤汗，沫流赭。志俶傥，精权奇，籋浮云，晻上驰，体容与，迣万里。今安匹？龙为友。
>
> 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天马徕，出泉水，虎脊两，化若鬼。天马徕，历无草，径千里，循东道。天马徕，执徐时，将摇举，谁与期？天马徕，开远门，竦予身，逝昆仑。天马徕，龙之媒，游阊阖，观玉台。

有四言者，如《芝房歌》曰：

> 齐房产草，九茎连叶，宫童效异，披图案牒。玄气之精，回复此都，蔓蔓日茂，芝成灵华。

又《后皇歌》曰：

> 后皇嘉坛，立玄黄服，物发冀州，兆蒙祉福。沇沇四塞，遐狄合处，经营万亿，咸遂厥宇。

有长短句杂用者，如《日出入》曰：

> 日出入安穷？时世不与人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

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池，遍观是邪谓何！吾知所乐，独乐六龙，六龙之调，使我心若。訾！黄其何不徕下？

与《安世房中歌》形式相近。但房中歌为楚声，而《汉书·礼乐志》说："是时河间献王……献所集雅乐，……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汉郊庙诗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调均，又不协于钟律。而内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说它"非雅声"则可，安见得它为郑声呢？可见这是一种新制的歌曲，与向来的旧调不同，当时人不免觉得逆耳，遂斥为郑声而非雅声耳。至《史记·佞幸列传》则说："延年善歌，为变新声，而上方兴天地祠，欲造乐诗，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诗。"称为"新声"，较为确当。这可算得是汉代文学脱离楚声而独立的一个新纪元啊。

（乙）鼓吹曲和横吹曲　杨慎《词品·乐曲名解》曰："鼓吹者，诸乐之总名。其所施用亦别：用之朝会宴飨者，曰黄门鼓吹；用之道路从行者，曰骑吹；其师行而奏之马上者，曰横吹；其旋师而奏之社庙者，曰短箫铙歌。"是鼓吹为诸乐之总名，横吹为鼓吹乐中之一种。故郭茂倩《乐府诗集》曰："横吹曲其始亦谓之鼓吹，马上奏之，盖军中之乐也。北狄诸国，皆马上作乐。故自汉已来，北狄乐总归鼓吹署。其后分为二部：有箫笳者为鼓吹，用之朝会道路，亦以给赐。汉武帝时，南越七郡皆给鼓吹是也。有鼓角者为横吹，用之军中马上所奏者是也。"是鼓吹、横吹同属北狄之乐，同隶于鼓吹署，特以其所用乐器不同，乃分为两部。考其所用乐器，一为箫笳。《通考·乐十一》云："二十一管箫，此箫取七音而三倍之，龟兹部所用。"杜挚《笳赋》云："西戎所造。"一为鼓角。《晋书·乐志》云："胡角者，本以应胡笳之声，后渐用之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是这类乐器，多出西戎，而非北狄。或者西北两地的音乐，大概相同，现在统称之为"胡乐"可也。

考胡乐流传中国的时代，《晋书·乐志》说："张博望入西域，传

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和帝时，万人将军得用之。魏、晋以来，二十八解不复具存。"这是胡乐流传中国之始，也就是中国歌曲西方化的先声了。可惜汉代鼓吹歌辞今仅存铙歌十八曲，横吹歌辞李延年所造的二十八解，魏、晋以来，惟传十曲：一曰《黄鹄》，二曰《陇头》，三曰《出关》，四曰《入关》，五曰《出塞》，六曰《入塞》，七曰《折杨柳》，八曰《黄覃子》，九曰《赤之杨》，十曰《望行人》。后又有《关山月》、《洛阳道》、《长安道》、《梅花落》、《紫骝马》、《骢马》、《雨雪》、《刘生》八曲，合为十八曲。现在则仅存名目，其歌辞皆无可考了。

汉代铙歌二十二曲，今仅存十八曲，一曰《朱鹭》，二曰《思悲翁》，三曰《艾如张》，四曰《上之回》，五曰《雍离》，六曰《战城南》，七曰《巫山高》，八曰《上陵》，九曰《将进酒》，十曰《君马黄》，十一曰《芳树》，十二曰《有所思》，十三曰《雉子班》，十四曰《圣人出》，十五曰《上邪》，十六曰《临高台》，十七曰《远如期》，十八曰《石留》。所亡佚者有《务成》、《玄云》、《黄爵行》、《钓竿》四曲。其句读有二言、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及长短不定者，形式极其奇佹，而且文字讹误，多不可解。其不可尽解之故：

一、声辞合写。　杨慎《乐曲名解》说："凡古乐录，皆大字是辞，细字是声，声辞合写，故致然尔。"按铙歌声辞合写处，如"妃呼豨"、"收中吾"之类是。

二、字句讹脱。　胡应麟《诗薮》内编说："铙歌词句难解，多由脱误。……《石流》、《上邪》等篇名，亦当有脱误字，与诸题不类。"又曰："《翁离》一章有脱简，非全首也。"

三、体制诘屈。　胡应麟又曰："铙歌、横吹，艰诘难通。"又曰："铙歌十八章，说者咸谓字句讹脱，及声文混淆，固然。要亦当时体制，大概如此。"

因上列三因，故后人之解铙歌者，如陈祚明、陈沆、庄述祖等，多各自为说，穿凿附会，似皆可以不必。今录其叙战征之《战城南》如下：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梁筑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朝行出攻，莫不夜归。

录其宴乐颂祷之《圣人出》、《临高台》如下：

圣人出，阴阳和；美人出，游九河。佳人来騑离哉何！驾六飞龙四时和，君之臣明护不道。美人哉，宜天子。免甘星筮乐甫始。美人子，含四海。

临高台以轩，下有清水清且寒。江有香草目以兰，黄鹄高飞离哉翻！关弓射鹄，令我主寿万年！收中吾。

录其抒写情思之《有所思》、《上邪》、《巫山高》如下：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已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妃呼狶，秋风萧萧晨风飔，东方须臾高知之。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巫山高，高以大；淮水深，难以逝。我欲东归，害梁不为。我集无高曳，水何梁。汤汤回回，临水远望，泣下沾衣。远道之人心思归，谓之何？

前人说铙歌为军乐，而汉人十八曲则不必皆然。蔡邕《礼乐志》说“铙歌为黄帝岐伯所作”亦属无稽之谈。这明明是西北传来的胡乐，更不待言了。

（丙）相和歌 《汉书·礼乐志》说：至武帝“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是当时乐府中诗，有采自民间的。虽《汉书·艺文志》中所录《吴楚汝南歌诗》、《齐郑歌诗》、《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等书，现在一种不存；但乐府“相和歌”中犹可考见一二。《宋书·乐志》说：“相和，汉旧曲也。丝竹相和，执节者歌。”《晋书·乐志》曰：“凡乐章古辞，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之属也。”其后渐被于弦管，即相和诸曲是也。是相和歌中《江南可采莲》等曲，皆汉代里巷歌谣。汉代民间文学作品，今日流传于世者，这是仅存的硕果了。而且不独当世歌辞存在，当时曲调后世犹可考的，也有清、商、瑟三调。《唐书·乐志》说：“平调、清调、瑟调，汉时谓之三调。又有楚调、侧调，……与前三调，总谓之相和调。”这三种曲调，经晋、魏、六朝至隋、唐，仍然存在，称为华夏正声。详见郭茂倩《乐府诗集·清商曲辞》下。今日虽不可得闻，而其歌法犹约略可见者，有几条特例。郭茂倩曰：“诸调皆有‘辞’有‘声’，而大曲又有‘艳’，有‘趋’，有‘乱’。‘辞’者，其歌诗也。‘声’者，若‘羊吾夷’、‘伊那何’之类也。‘艳’在曲之前，‘趋’与‘乱’在曲之后；亦犹吴声西曲前有‘和’，后有‘送’也。”按声与辞之别，前于铙歌中已说过了。至于“艳”犹吴声之“和”，“趋”与“乱”犹吴声之“送”，今略考之如下：

汉相和曲《江南》云：

>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按这首曲前三句一人独唱，后四句众人之和曲也。试看梁武帝《采莲曲》云：

> 游戏五湖采莲归，发花田叶芳袭衣，为君侬歌世所希。世所希，有如玉；江南弄，采莲曲。

和云：

采蓬渚，窈窕舞佳人。

这首曲后二句，《古今乐录》注明“采莲曲和声”，推知前首之后四句亦属“和声”了。再举“送声”之例，如《子夜》体《杨叛儿》云：

欢欲见莲时，移湖安屋里。芙蓉绕床生，眠卧抱莲子。叛儿，教侬不复相思。

古今乐录于“叛儿，教侬不复相思”前，注明“杨叛儿送声”。这就是送声的明例了。

（丁）舞曲歌　舞曲起源甚早，殷周时谓之“万”，《商颂》曰“万舞有奕”，《鲁颂》曰“万舞洋洋”，《卫诗》曰“公庭万舞”。或说“万”，或说“万舞”，皆是古代舞之别名。所以郭茂倩《乐府诗集》说：“周有六舞，……自汉以后，乐舞浸盛，故有雅舞，有杂舞。雅舞用之郊庙，杂舞用之宴会。……汉武帝乐饮，长沙定王起舞是也。”舞曲或用于祭祀，或用于宴饮，皆是贵族的作品。故今所传杂舞《淮南王篇》，铎舞《圣人制礼乐篇》，同为颂祷之辞，与郊庙歌体制不同，内容大概相近，可不必繁引了。

统上所述，汉人乐府诗传于今日者，约分这四种。第一种郊庙歌，与第四种舞曲歌是贵族的文学；第二种鼓吹曲、横吹曲，是用胡乐制成的文学；第三种是民间的文学。当时乐府诗共分此三类而已。

（三）五言诗　从前人多说五言诗发生于西汉，如钟嵘《诗品》言：“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萧统《文选》序言：“降将著河梁之篇。”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言：“少卿离辞，五言才骨，难与争骛。”现在人考证其说，皆不可信。试分述其理由如下：

（甲）前汉人的五言诗皆系伪品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说：“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典，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成帝时刘向、刘歆校中秘书，著《七略》，内有《诗赋略》，所收的诗歌，凡三百一十四篇，没有五言诗，足见西汉时没有发生五言诗

了。故后人所传的西汉五言诗，皆不可信，证之如次：

（子）苏、李赠答诗　李陵及苏武的赠答诗，刘知几《史通杂说》及苏轼《东坡志林》已辨其伪，至梁章钜《文选旁证》辨之尤详。其理由（一）与当日情事不切。"史载陵与武别，陵起舞作歌'径万里兮'五句，此当日真诗也，何尝有'携手上河梁'之事乎？即以河梁一首言之，其曰：'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时。'此谓离别之后，或尚可冀其会合耳。不思武既南归，决无再北之理；而陵云'丈夫不能再辱'，亦自知决无还汉之期，此则'日月弦望'为虚辞矣。"（二）岁月不合。"诗中又云：'嘉会难再过，三载为千秋。'苏、李二子之留匈奴，皆在天汉初年，其相别则在元始五年，是二子同居者十八九年之久，安得仅云三载嘉会乎？"（三）苏诗全不与李相关。"《文选》题云'苏子卿古诗四首'。不言与李陵别也。"据上三说，遂断定苏、李诗皆魏、晋以后拟作，与李陵《答苏武书》相同。

（丑）枚乘杂诗九首　徐陵《玉台新咏》录枚乘杂诗九首：一、"西北有高楼"；二、"东城高且长"；三、"行行重行行"；四、"涉江采芙蓉"；五、"青青河畔草"；六、"兰若生春阳"；七、"庭中有奇树"；八、"迢迢牵牛星"；九、"明月何皎皎"。萧统《文选》则录于古诗十九首中，并不知作者名姓。现在看：苏、李的五言诗不可信，苏、李之前的枚乘，更不会有五言诗了。况乎其第五首中有"盈盈楼上女"一句，盈字明犯惠帝的讳，前汉人绝不敢用的，后汉人就不拘了。

（寅）卓文君《白头吟》　《西京杂记》载"司马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其妻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没有载《白头吟》歌辞，后人以"皑如山上雪"当之。考这首诗，《玉台新咏》列为古乐府六首之一，《宋书·乐志》大曲中称为《古辞白头吟》。郭茂倩《乐府诗集》并收此两篇，前一首谓为"本辞"，后一首谓为"晋乐所奏"。又引王僧虔《技录》曰："《白头吟》歌，古皑如山上雪篇。"皆未尝说卓文君作。后人附会《西京杂记》之说，将此诗归之文君。

（卯）班婕妤《怨歌行》　《文选》及《玉台新咏》皆录班婕妤怨诗一首，《玉台新咏》并说："成帝时，班婕妤失宠，供养于长信宫，乃作赋自伤，并为怨诗。"现在考《汉书·外戚传》仅言："婕妤退处东宫，作赋自伤悼。"并载其全文，没有"并为怨诗"的话。班固是她的侄孙，如果有诗，不应疏略不说。《文选旁证》说："郭茂倩《乐府》题为颜延年作。"大概也是晋人的作品了。

观上述四条，前汉人作的五言诗，都不可信，可证明前汉时代实在没有五言诗了。

（乙）五言诗发生于后汉　汉人五言诗，除去上举伪作以外，其无主名的，当推《古诗十九首》为大宗。此十九首中，徐陵说枚乘所作的九首，不可信，据今人考证，实皆后汉人作品。试观其第三首"青青陵上柏"中云："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李善注已说："南阳郡有宛县，洛，东都也。"其第十三首"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上东门又为洛阳的城门，郭北墓就是指北邙山而言。其为东都人咏当时情事，显然易见。惟有第七首"明月皎夜光"中，有"玉衡指孟冬"一句，李注说："北斗七星，第五曰玉衡。《淮南子》曰：'孟秋之月，招摇指申。'然上云促织，下云秋蝉，明是汉之孟冬，非夏之孟冬矣。"《汉书》曰："高祖十月至灞上，故以十月为岁首。汉之孟冬，今之七月矣。"王士祯《居易录》引阎若璩亦曰："此孟冬乃建申之月，指改时而言。下文'秋蝉鸣树间'，为明实候，故以不改者言。"以此孟冬为汉武未改太初历以前之孟冬，当夏历之孟秋，非太初以后之孟冬，则这首诗必作于汉武以前可知。《文选旁证》引张庚《古诗十九首解》辨之曰："《史记·天官书》'斗杓指夕，衡指夜，魁指晨。尧时仲秋，夕杓指酉，衡指仲冬'。此言衡指孟冬，则是杓指申为孟秋七月也。然白露为八月节，'促织鸣东壁'，即《豳风》'八月在宇'义。'元鸟逝'，又即《月令》'八月元鸟归'。然则此诗是八月之交。旧注以为孟冬者，谬也。"则"玉衡指孟

冬”，当夏历之八月，应作孟秋，故有人疑冬字为秋字之误。观第十七首“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栗”，则其时必无秋蝉玄鸟，此必为孟秋无疑。则此诗非作于太初以前，不得谓为前汉人之作品了。

（丙）五言诗来源　凡一种新文体必从旧文体逐渐嬗变而来，断无突然发生之理。若说前汉人已有五言诗，则五言诗的来源不明，不合进化的公例。现在以五言诗出于后汉，而其前驱则为乐府。五言盖由乐府嬗变而来。试观前汉人诗，如田横门人《蒿里曲》，其第一句“蒿里谁家地”为五言，下三句即为杂言。戚夫人《春歌》，其后四句为五言，前二句又为三言。至武帝时李延年的“北方有佳人”歌，宣帝时杨恽的“田彼南山”歌，仍为五言与四言、七言杂用，没有一首纯粹的五言诗。直到成帝后，民间有黄爵谣及为尹赏歌，形式皆为五言，但与古诗的风格，绝不相同。乐府《铙歌十八曲》中《上陵》和《有所思》两首，尚不是纯粹的五言。相和歌中《江南可采莲》一首，是纯粹的五言了，但不用韵；平调中《君子行》一首用韵了，但近似格言，与诗风格不合。至“鸡鸣高树巅”、“日出东南隅”两首，兼用比兴，界近于诗，但两篇皆为叙事，而非缘情，这大概就是古诗的前趋。到了清商曲中《长歌行》、《艳歌行》、《怨诗行》，乃是纯粹的抒情诗，与古诗风格相同。可见由乐府变为古诗，其间逐渐进步的痕迹，非一朝一夕就能成功的了。前节说过，相和歌与清商曲皆是民间的歌诗，与风谣同出于里巷之间，则五言诗的来源，完全由于平民口中流行的歌谣嬗变而成，确是汉代留传下来的平民文学。故《十九首》中，或叙男女之情，或述朋友交谊，或怀生死之感，莫不直抒胸臆，明白晓畅，没有一点做作气，与阿谀晦涩、矫揉造作的郊祀歌完全不同。

（丁）五言诗成立的时代　由上所说，西汉绝无五言诗，五言诗发生于东汉，实由民间歌谣逐渐嬗变而成，则五言诗的大成时期，必在东汉之末。这个假定我们可从两方面证明。先看后汉诗史：

后汉初年人诗,如马援《武溪深行》,梁鸿《五噫歌》、《适吴诗》、《思友诗》,崔骃《安封侯诗》,皆属杂言。惟有班固《咏史》一首为五言,然而质木无文,序事而非抒情,与《十九首》的风格,绝不一律,分明是初步未成熟的作品,可见当时五言诗尚未到成功时期。至《十九首》中"冉冉孤生竹"一首,刘勰《文心雕龙》说为傅毅之作,这也是靠不住的。试观傅毅《述志诗》明为四言,当时安能有抒情的五言发生呢?直到安帝时,张衡才有《同声歌》一首;桓帝时,秦嘉有《留郡别妇诗》三首;灵帝以后,郦炎有《见志诗》二首,赵壹有《疾邪诗》二首,孔融有《杂诗》二首,作五言诗的此时才比较的普遍。足见东汉初年五言诗尚未成立,其成立当在东汉末年安帝、桓帝、灵帝三朝,紧接建安时代了。再看《十九首》中所表现的思想。如第三首云:"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第四首云:"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轗轲长苦辛!"皆是世道衰微,大乱将至,因而人心颓废,只求目前快乐,不顾将来如何。又如第十三首云:"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第十四首云:"去者日以疏,生者日以亲,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第十五首云:"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尤足征厌世思想,充满于字里行间。若在东汉初太平时期,绝不会有这种噍杀之声。其为桓、灵以后乱世之音,确然毫无可疑了。

统观上述,相传是西汉人的五言诗,实不是西汉人所做的;东汉初年,五言诗尚不多见;五言诗实成立于东汉末年。而且如乐府中的相和歌、清商曲,古诗中的十九首,皆是在野无名诗人所作。所以本节的总结,可说:五言诗乃东汉时民间流行一种文学,后来才被文人承认为正统艺术的。

第四节　结　论

本章所述，汉人文学，以辞赋、诗歌二者为大宗。其辞赋多出于贵族和依附贵族的文人之手，可称为古典派的文学。诗歌又分三派：第一种楚调诗，也用楚人旧调作诗，但与完全模拟的辞赋不同。第二种乐府诗。其中郊祀歌是用于庙堂中的神曲；鼓吹曲是仿外国音乐制的军歌；相和歌、清商曲是民间的作品，采来编入乐府的。第三种五言古诗，完全出于民间，后来才被文人采用的。乐府和古诗皆是当时的新体诗，但也有贵族平民之分。试分类立表如次：

（一）旧体文	辞赋	读式诗	贵族文学
	楚调诗	吟式诗	贵族文学
（二）新体文	郊祀歌	吟式诗	贵族文学
	鼓吹曲	吟式诗	贵族文学 外国文学
	相和歌清商曲	吟式诗	平民文学
	五言古诗	读式诗	平民文学

此外，汉人还有小说，如《汉书·艺文志》所载的《封禅方说》、待诏臣《饶心术》、臣寿《周记》、虞初《周说》、待诏臣安《未央术》、《百家》等书。可惜现在皆已散佚，无可考究。现在所可见到的，有《神异经》一卷，称东方朔撰。《十洲记》一卷，亦称东方朔撰，《汉武帝故事》一卷，称班固撰。《汉武帝内传》一卷，不题撰人。汉武《洞冥记》四卷，题后汉郭宪撰。实皆晋以后人伪造的作品，所以本章存而不论了。

第三章　建安文学

第一节　建安文学复兴的原因

两汉文学，至东汉末年，日就衰微，故刘勰《文心雕龙·时叙》篇说："自安、和已下，迄至顺、桓，……磊落鸿儒，才不时乏；而文章之选，存而不论。……降及灵帝，……乐松之徒，招集浅陋，故杨赐号为驩兜，蔡邕比之俳优。其余风遗文，盖蔑如也。"此时文学界，几如雪地冰天，没有一毫生气。然当时贵族文学虽雕零殆尽，而平民文学方在萌芽，遇春风一吹，便抽条吐叶。所以不到数十年，文学界焕然放一异彩，就是建安时代了。考建安虽是汉献帝纪元称号，而政权实掌于曹操。其时李傕、郭汜之乱初平，袁术称帝，刘备起兵，孙权据江东之地，群雄割据，战祸方启；天下人士正当逃生救死之时，安有闲功夫来商量文学呢？不知当此扰攘之秋，文学何以竟能复兴呢？考其原因，约有数端，分述于后。

（一）**思想解放**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儒学，天下学者的思想沉浸于礼教之中，不敢稍出其范围。对于文学观念，也以"发乎情，止乎礼义"为标准。纯粹抒情的文学，在他们目中看来，皆是些淫乱之词、靡靡之音，宜高呼"放郑声"，摒之于诗书之外。就是《诗经》三百篇，内中不乏男女慕悦之辞，如第一首《关雎》之什，感情何等热烈！他们也罩上礼教的面幕，说是"文王之化，后妃之德"，使读者味同嚼蜡，没有一毫意趣。至于他们自家的作品，除去称扬圣君贤相的奇勋伟绩外，惟有扯些闲淡，说什么"讽一而劝百"的无聊话，供主上之玩赏而已。求几篇真情流露的诗辞，在贵族文学中，如汉武帝《李夫人歌》、司马相如《琴歌》、后汉张衡《同声歌》，寥寥可数；求诸平民文学相如歌、古诗十九首中，比较反多。足见礼教妨碍

文学的发展，是确无疑义。到桓、灵之世，宦官与学者大起冲突，闹出一场空前的党锢大祸。从此以后，廉节之士多明哲保身，遁迹山林；一般人苟且偷安，渐厌礼文之拘谨，以通俗为清高。曹操当国，崇尚跅弛之士，轻视贞节之行，旧有礼教乃不为天下所注重。文学生机至此勃然兴盛，不复受他力束缚了。

（二）学术变迁　两汉之时，学者致力经术，辨析章句，钻研声音训诂，有童年从事、白首不能通一经的。他们毕生精力都消耗于经传之中。言其效，果能使周、秦遗籍釐然理解，未尝不有功于后世。然而这种专门事业，竟可任一部分学者为之；若率天下聪明才知之士，人人皆墨守陈编，穷年矻矻，思想界还有什么人来求革新，文学界还有什么人来谋进步呢？况乎研究经籍，亦以解释正确，考据详明，求得古人立言的本意、古代历史的真象为止；若他们各自为说，立异眩奇，穿凿傅会，不独毫无发明，反加上一层障碍，但使人觉得他们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不知何所适从。难怪后人渐渐厌恶它破碎支离，弃而不顾，别辟一新途径了。这就是建安时代经学衰微、文学复兴的一大因缘，与当时反对礼教的思想有密切关系。

（三）平民文学复兴　中国古代本靡有专门文士，所有《诗经》三百篇中，除去颂诗出于巫祝之手而外，其余风、雅之诗，多半采自民间。楚辞中的《九歌》，也是民间祭神之作。古代平民文学是何等的发达！至屈原政治失败，作赋发抒牢骚。其后宋玉、唐勒、景差乃以文学为终身职业。汉人枚乘、司马相如直到扬雄，更以此为吃饭的工具，不能不受王侯利用，甘心自处于俳优地步，制成许多矫揉造作的作品，来献媚求荣，供主上之一粲。他们的主人乐于趋承，当然承认他们这种阿谀文字为上品；他们也就习非成是，高声吟道："斯文在兹！"以此为文学正统了！他们目中看那些民间流行的直率抒情的诗歌，不斥它为"郑声"、为"淫辞"，已算是宽容大度了，安能把这种作品来与它们相提并论呢？然而当时文学上虽没有平民的

地位，而乐府里还是收罗了赵、代、秦、楚之讴，以备一格。到了东汉章、和以后，贵族的势力日就陵夷，逢迎他们的文人也日见减少，那些富丽堂皇的辞赋更不可多见，平民文学乃引起一般人注意；甚至那班模古的文人也高兴来做一二首，如班固《咏史》等，虽形似质非，也可见得文学的趋势渐渐转移。到桓、灵以后，秦嘉、蔡邕、郦炎、赵壹等大家皆来作这种新体诗了。至建安时代，这种新体诗居然战胜旧派贵族文学而独立。这不是平民文学复兴，才得到这个结果吗？

（四）文会发达　孔子虽说过"以文会友"这句话，然而古人聚集许多朋友同做一种文体，互相摩练，这种现象实不可多见。若楚襄王之征集宋玉、唐勒、景差，汉梁孝王之广招邹阳、枚乘、严忌、司马相如等人，虽也像一种文会，但是楚襄王、梁孝王那班人皆不学无才，不配做文人的领袖，不能提倡出特殊的风气。汉武帝天才比较高得多了，但是他好大喜功，喜谀恶直，所收容的一班文人也没有几个创作的天才，仍然不能转移一代的文运。至建安时代，曹操以一世之雄，奖励文学，其子丕、植又以公子之尊，爱才若命。曹丕《与吴质书》说："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面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可见他们当时诗文之会的乐趣了。因此，一时才隽如鲁国孔融、广陵陈琳、山阳王粲、北海徐幹、陈留阮瑀、汝南应玚、东平刘桢及吴质、杨修、丁仪、丁廙一班人，大家云集邺下。这实在因曹氏父子皆是作家，确能领袖文坛，执一世之牛耳，一时从之游者莫不乘风云际会，追随其间。所以邺下文章，千载称盛了！

以上述建安文学复兴的原因，粗举其荦荦大者，有这四种。其余原因尚有，不必琐述了。

第二节　建安文学的特色

前章述建安文学复兴，可谓极一时之盛。若考当时作品，也不过是乐府诗、古诗及辞赋，皆汉代固有的东西，并没有什么簇新的文体发生，何以值得那样鼓吹呢？殊不知那些文体虽前代所固有，他们的作风就与前人大大的不同了！试分别述之如下：

（一）**乐府诗**　汉代乐府，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因乐谱而制的诗；一类是采诗而后制乐。严格说来，那所采的民间歌谣，本是里巷之间信口吟哦的村俗小调，没有一定的曲谱，比较活动得多，尚能自由描写。至于文人按谱填出来的乐府，那就呆板拙滞，毫无生气了。曹氏父子天才特别的高，他们一方面依照乐谱，一方面自作诗，乃能合两者之长，并一炉而冶之，这确是难能可贵的了。刘勰《文心雕龙》说：

> 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观其"北上"众引，"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淫荡，辞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

三祖是指的魏武帝曹操、文帝丕、明帝叡三人。刘氏因他们志存淫荡，辞多哀思，故说他们才气虽高，音节平凡。谈到音节方面，我们无从证明了。不过他批评他们"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考《隋书·乐志》载："清商三调并汉来旧曲，……与魏三祖所作者，皆被于史籍。平陈后获之，高祖听之，善其节奏，曰：'此华夏正声也！'"足见他们还是依用汉代旧谱，并靡有别制新声，何能以他们诗的思想及辞句不高，并说他的音节不好呢？而且就以思想及辞句而论，汉人铙歌中的《有所思》、《上邪》，相和歌中的《妇病行》、《孤儿行》，何尝不淫？何尝不哀？曹操的《度关山》、《步出东门行》，何尝不雅正呢？总之，刘氏这种偏见的话，没有多大的价值。我们现在看汉人乐府，除去采用民歌以外，其郊祀歌、鼓吹曲、舞曲中，

不外颂扬的文辞，内容实在简单。至魏代乐府，内容复杂得多了。稽其类别，约分三项：

（甲）写景诗　从前人诗中写景的句子很多，但没有一首纯粹写景诗。自曹孟德《步出夏门行》第一首《观沧海》云：

>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这首写沧海景象，中间山水树木四句虽平铺直叙，至秋风二句，较为振作。下云："日月若出其中，星汉若出其里"，用想象写法，尤觉警策。这尚不是他最高的艺术。其五言《苦寒行》云：

> 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水深桥梁绝，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

这首描写北方山水荒寒气象，极其苍劲；而且音调昂激，确能表出他深沉雄鸷的人格，皆中古写景诗的先声。其后子桓《善哉行》前二解，《丹霞蔽日行》、《钓竿行》、《芙蓉池作》也是写景的。他辞句虽较富丽，气魄反不及乃翁沉着了。

（乙）记事诗　古乐府相和歌中如《妇病行》、《孤儿行》，皆是记事的诗歌，内容非常沉痛；然其句读长短参差，读者苦其艰深晦涩；而且各篇中皆有"乱曰"一节，章法亦近楚辞。这大概是第一期的作品。《陌上桑》一首，全篇皆用五言，句读明顺，内容浅显，比较算是进一步的作品了。至《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竟成一千七百余字的长篇记事诗，进步未免太快，恐怕不是当时人所能作。到建安时代，曹子建著《白马篇》、《名都篇》，写幽、并侠士，京、洛少年，专记

一人行动，足以推见一代风气。王粲用此法以作古诗，其《七哀》第一首中段曰：

>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

用最简单的几句话，写出最凄惨的一段事实，令人读之，当时兵灾惨酷、民不聊生的情形，可以想象得之。这是用最经济的手腕，节取片断事实，代表一时代的现象，实唐杜甫"三吏"、"三别"诗之所本，记事诗之最上乘也。

（丙）抒情诗　古乐府中抒情诗也不少，但采自民间者尚有可观；若郊祀、鼓吹等歌中多阿谀颂祷之辞，所抒的情感未免太肤泛浅薄了。建安诗人抒情之作，各有其特殊的风格，我们一读，就觉得作者人格隐现于字里行间。这就是真情流露的表征。若随意敷衍，通用雷同，还有什么情致可言呢？我们试读曹孟德的《短歌行》、《薤露歌》、《蒿里行》、《苦寒行》、《却东西门行》，即感到他豪放雄武的人格，凌厉无前，如见他把酒临江、横槊赋诗的气象。读子桓的《善哉行》、《燕歌行》、《丹霞蔽日行》，就不同了，便觉他清丽委宛，典赡可玩。陈思王之作，又与其父兄不同，谢灵运《邺中集诗叙》说他："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游，然颇有忧生之嗟。"所以他的诗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兼有其父兄之长，而有自成独立的风格。谢灵运又说："王粲家本秦川贵公子孙，遭乱流寓，自伤情多。陈琳原本初书记之士，故述丧乱事多。徐幹少无宦情，有箕、颍之心事，故仕世多素辞。刘桢卓荦偏人，而文最有气，所得颇经奇。应玚汝颍之士，流离世故，颇有飘薄之叹。阮瑀管书记之任，故有优渥之言。"他们各因所处的境遇不同，故所抒的情致各异，总不失各人本真的面目，故与古乐府诗之混朴者不同。

以上述建安乐府诗的内容，至其词调、音节，再于下文详之。

（二）**五言古诗**　五言古诗成立于建安以前，上文已说过了。然其时仅流行于民间，故其词多直率，靡有惊险之句、奇辟之思；到了建安文人手里，面目就大不同了。试分数项比较之：

（甲）用字　古诗用字，无多修饰。如云："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这种叠字在《诗经》时代已用惯了，他们还没有若何进步。至子桓《芙蓉池作》云："卑枝拂羽盖，修条摩苍天。惊风扶轮毂，飞鸟翔我前。丹霞夹明月，华星出云间。"《于玄武陂作》云："黍稷何郁郁，流波激悲声。菱芡覆绿水，芙蓉发丹荣。柳垂重荫绿，向我池边生。"词藻已觉绚烂。子建《箜篌引》云："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盛时不可再，百年忽我遒。"《侍太子座》云："白日曜青春，时雨净飞尘。寒冰辟炎景，凉风飘我身。"《公宴》云："明月澄清影，列宿正参差。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用字更加妍美，非率笔成章、矢口直陈者可比。

（乙）造句　费锡璜《汉诗总说》云："诗至宋齐，渐以句求。……汉人高古天成，意旨方且难窥，何况字句。"是六朝人诗方有清辞丽句，汉诗不可以辞句求。若建安诗则与汉诗微有不同，已开六朝人的门径，故其诗有工于起句者，如：

> 九州不足步，愿得凌云翔。（曹植《五游咏》）
> 八方各异气，千里殊风雨。（曹植《泰山梁甫行》）
>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曹植《野田黄雀行》）
>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曹植《怨歌行》）
> 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曹植《赠徐干》）
> 太谷何寥廓，山树郁苍苍。（曹植《赠白马王彪》）

有工于偶句者，如：

> 菱芡覆绿水，芙蓉发丹荣。（曹丕《于玄武陂作》）
> 君若清路尘，妾为浊水泥。（曹植《七哀》）

时俗薄朱颜，谁为发皓齿。（曹植《杂诗》）

从军度函谷，驱马过西京。（曹植《赠丁仪王粲》）

微风起闺闼，落日照阶庭。（徐幹《情诗》）

有叠字成句者，如：

洌洌寒蝉吟，蝉吟抱枯枝；枯枝时飞扬，身体忽迁移。不悲身迁移，但惜岁月驰；岁月无穷极，会合安可知？（曹丕《见新婚与妻别》）

子建《赠白马王彪》诗每后一首第一句，必叠前首末二字，亦属此例。

（丙）立意　古诗多述人事，如逐臣、弃妇、朋友阔别、游子思乡、死生新故之感。其诗皆因缘世变，发于主观者多。靡有超出人间、寄怀于理想界者。就是“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一首，亦不过借牵牛织女两星为象征，写男女之慕悦而已。又尝言“服食求仙”，然而仙境如何，则未尝言及。至曹子桓《折杨枝行》云：

西山亦何高，高高殊无极！上有两仙僮，不饮亦不食。与我一丸药，光耀有五色。服药四五日，身体有羽翼。轻举乘浮云，倏忽行万亿，流览观四海，茫茫非所识。彭祖称七百，悠悠安可原；老聃适西戎，于今竟不还；王乔假虚辞，赤松垂空言。达人识真伪，愚夫好妄传，追念往古事，愦愦千万端，百家多迂怪，圣道我所观。

子建《苦思行》云：

绿萝缘玉树；光耀粲相辉。下有两真人，举翅翻高飞。我心何踊跃，思欲攀云追。郁郁西岳巅，石室青葱与天连。中有耆年一隐士，须发皆皓然，策杖从我游，教我要忘言。

又《平陵东行》云：

阊阖开天衢，通被我羽衣，乘飞龙，乘飞龙，与仙期，东上蓬莱采灵芝。灵芝采之可服食，年与王父无终极。

其余如《远游篇》、《飞龙篇》,这类的诗甚多,他们皆能将理想的仙境表现于诗中,与郊祀歌中《帝临》、《惟泰元》诸歌写神祇多属于秘密的不可使世人想象者不同。此由写实而至于理想,诗人意境之一大变迁也。

（三）**音节**　古人不讲平仄,故古诗中没有音节可言,这是汉、魏以前普通的现象。但建安时代的诗虽不能平仄调和,而各有他们的自然音节。如曹孟德的《苦寒行》,读之觉其苍凉悲壮;子桓的《燕歌行》,读之觉其悠扬委婉,各有一种天然的节奏。子建的诗,如《赠徐幹》、《赠白马王彪》则属于前一派,《名都篇》、《美女篇》则属于后一派。他可算得兼有父兄之长了。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说:"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他以子建《赠丁仪王粲》诗"从军度函谷,驱马过西京"两句,及仲宣《七哀》"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两句,为音律调韵。问他们的音律何以调呢?沈氏又说:"至于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暗与理合,匪由思至。"就是说他们虽不明平仄,然不知不觉之间自然与之暗合,这就是天然的音节,非人力所制成。钟嵘《诗品叙》则谓:"古曰诗颂,皆被之金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楼'为韵之首。故三祖之词,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此重音韵之义也。"可知建安人诗皆可合乐,故有音节可言。谓与人力无关,尚非可信的议论。

（四）**七言诗**　七言诗是从楚调、《诗》变来的。最初汉人做的七言诗,如高祖《大风歌》、武帝《瓠子歌》、《秋风辞》、《天马歌》,昭帝《黄鹄歌》、《淋池歌》及李陵《别歌》等,皆每句中间夹用"兮"字。这是第一期的七言,中间惟有司马相如《琴歌》夹用无"兮"字句。如"有艳淑女在闺房,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缘交颈为鸳鸯?胡颉颃兮其翱翔",中间三句不用"兮"字,夹置于一首之中。至东汉安帝时张衡作《四愁诗》,除第一句外,其余皆为七言。如一首曰:

我所思兮在泰山：欲往从之梁甫艰，侧身东望涕沾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以下三首皆一例用“兮”字句起，用七言句接，这是由楚调派变成七言诗的遗迹，可算得第二期的七言诗。至曹子桓作《燕歌行》，七言诗乃完全成立。其词曰：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何为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又一首云：

白日晼晼忽西倾，霜露惨凄涂阶庭。秋草卷叶摧枝茎，翩翩飞蓬常独征，有似游子不安宁。

这两首可算是七言诗的始祖。但除此以外，不可多见。故建安虽是七言诗发生期，终不能算是七言时代。至汉武帝《柏梁台诗》是首伪作，顾炎武《日知录》已经辨明，用不着多说了。

汉代乐府中所歌的乐府诗，与民间的古诗截然不同，至建安中则同出于文人之手，那就靡有多大的区别了。本章言乐府时每说到古诗、言古诗时每引用乐府，即缘此故。

（四）辞赋　汉代诗歌不甚发达，其辞赋可谓丽巨闳衍，非后人所能几及了。若谓建安辞赋，也胜于汉人。这句话可以说吗？试容我分析比较以见优劣吧。

（甲）就内容言：　汉赋内容，多包括宇宙，总揽人物，诚所谓网罗宏富，较建安文人的赋，繁复不可以道里计了。然而挚虞《文章流别论》说：“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主，以义正为助。情义为主，则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为本，则言当

而事无常矣。文之繁省，辞之险易，盖由于此矣。"我看汉赋如两京三赋，皆以事形为主，无情义之可言。至建安之赋，如王粲《登楼》因登高四顾，动其忧时感事、去国怀乡之思，不觉行文低徊俯仰，一唱三叹，令人读之，觉其言有尽而意无穷。这才是"为情而造文"，与汉代辞赋之"为文而造情"者，孰得孰失？我们应当有个公正的批评吧。

（乙）就形式言： 汉赋多长篇巨制，考其行文，无非得僻字骈辞，联贯成句，如云："其山则崆岘嶱嵑，嵣嵝嶚刺，岧嵜嶵嵬，嵚巇屹嶾，……其木则柽松楔㮨，㰐柏杻橿，枫柙栌枥，……"这类生僻的字，堆积在一处，简直同字典一样。若以这样为文学，则类书辞典皆是文学的上选了。至王仲宣的《登楼赋》，全篇无雕镂之字、幽奥之词，但以直抒胸臆、言足达意而止，较之汉赋，觉着清疏得多了。刘熙载《赋概》说："在外者物色，在我生意，二者相摩相荡，而赋出焉。若与自家生意无相入处，则物色只成闲事，志士遑问及乎？"我看汉赋多斗靡跨奢，而生意索然；建安以后的赋，如嵇康叙琴，尚秀感笛，反比较有些情致。

汉赋最大的弊病，尚不在辞藻繁富，而在其文有定格，词多填砌，成了千篇一律的东西，看不出作者的个性。到建安则不然了。曹丕《典论·论文》说："徐幹时有齐气。……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皆是说他们各有特别的风格，故觉可贵。可惜他说的"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幹《玄猿》、《漏卮》、《橘赋》，虽张、蔡不过"的作品，现在大半不可见了。有人见此，以为汉赋所述，"为京殿苑猎，述行叙述，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建安以后的赋，则"言务纤密"，"理贵侧附"，"至于草区禽族，庶品杂类，则触兴致情，因变取会"，"斯又小制之区畛、奇巧之机要也"（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篇说）。这种以题目范围的大小判文章高下的见解未免遗笑后人。须知寓言写物，即鷦鷯、鹦

鹉，各有可观。情理不附，虽京都宫殿，亦何足取？舍内容而专论文题，尤非我所敢知了。

（五）结论　建安文学与汉代特异之处，显然易见的，就是汉代以辞赋为主，诗歌特其附庸；建安则以诗歌为主，辞赋为其一体。又七言诗虽发生于建安之际，而当时作者无多；五言体发生于建安以前，当时作者特众。故说两汉文学是辞赋时代，建安文学是五言诗时代，似无不可。观刘勰《明诗》说："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惟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这是说五言诗到建安时候，用处比以前多，彩藻比以前盛。汉赋虽也是篇题杂沓，文彩缤纷，而情致不深，势同谱录，反不如建安人赋，较有意趣。总说一句：建安最盛行的五言诗，汉人所不能为；汉代最盛行的辞赋，建安较为改进。这就是建安文学放异彩于文学史上的一个大原因了。

第四章　魏晋文学

第一节　魏晋文学变迁的原因

这期文学，应当从黄初起，至义熙为止。严羽《沧浪诗话》所谓黄初体、正始体、太康体三者，是其诗境变化的三大历程。但黄初诗人，如曹氏父子及邺中七子等，已于建安文学中叙过，此章无须复述，故从略。姑从正始、太康说到永嘉，即从魏中叶到西晋之末，东晋文学亦附带说明。

这期文学，诗赋以外，发生骈体文及小说。这两种文体实亦从历代嬗变而来，未足多怪；最可注意的，就是这期的诗赋，形式与前无异，而内容确大不同。兹分述之：

魏晋人的诗，言其形式方面，《文心雕龙·通变》篇说它"浅而绮"，这三个字颇觉扼要。何以说它浅？谓其用字平易，不事艰深。故《文心雕龙·练字》篇又说："魏代缀藻，则字有常检，追观汉作，翻成阻奥。……自晋来，用字率从简易。时并习易，人谁取难？今一字诡异，则群句震惊；三人弗识，则将成字妖矣。"因为汉人多精小学，所以他们的作品中，复文隐训，趣幽旨深，非师傅不能析其辞，非博学不能通其理。到了魏晋，文章学术分途，文人不必博学，学者不必能文，这是用字平易的一大原因。何以谓之绮呢？《文心雕龙·丽辞》篇说："至魏晋群才，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剖毫析厘。"言魏晋人诗，偶语益多，丽辞益富。刘申叔先生论汉魏文学变迁曰："西汉之时，虽属韵文，而对偶之法未严；东汉之文，渐尚对偶。若魏代之体，则又以声色相矜，以藻绘相饰，靡曼纤冶，致失本真。"文章由朴而华，也是自然势趋；故陆机《文赋》说诗的界说，为"缘情而绮靡"。这是形式不同前人的第二项。

言其内容，则变化尤大。《文心雕龙·明诗》篇说："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这是第一期的变化。又曰："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这是第二期的变化。这两期的变化，皆蒙玄学的影响。考当时的玄学，导源于正始，王弼、何晏开其先声。《晋书·王衍传》曰："魏正始中，何晏、王绯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而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又《范宁传》言："时以虚浮相扇，儒雅日替。宁以为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浮于桀、纣。"这是魏晋时玄学的起源。但是王弼不曾作什么诗，何晏诗今传者有《拟古》、《失题》两首，确是浮浅无味。所以当时诗界蒙玄学的影响尚不甚大。到了西晋竹林七贤，他们行为更加放达，其中阮籍、嵇康两人的诗亦大进，他们蒙玄学的影响也更深了。到了东晋，玄学势力发达到极点。《晋书·儒林传》序说："有晋始自中朝，讫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虚玄，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其时的诗学界，几乎与玄学打成一片，不可分析。故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说："有晋中兴，玄风独扇，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殚乎此。自建武暨于义熙，历载将百，虽比响联辞，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丽之辞，无闻焉尔。"时诗与玄学合而为一，所谓"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舍玄学竟无诗可言了。这是玄学诗的最盛时期。

又东晋人士思想，与西晋不必尽同。以西晋所云玄理，不过老、庄，至东晋支遁、法深、道安、惠远等人，并精佛理。一时文人，如殷浩、孙绰、许询、谢尚诸人，并承其风，均以佛理为主，因而其理致益深，才藻益奇，故檀道鸾《续晋阳秋》说："至过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

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询、绰并为一时文宗，自此学者悉体之。”盖一时风气所趋，仿效者日益繁多，遂呈诗学界特殊现象。此外尚有江左地理的关系及时代衰乱的关系，间接影响于文学者亦属不小。容后详述。

第二节　魏晋诗的派别

以上将魏晋诗学与思想的关系，略述大概。至当时玄学诗亦别数派，再分述之：

（一）忧愤派　当魏晋之际，王室孤立，权臣专恣，有身事乱朝，常恐遇祸，因作诗述志者，如阮籍《咏怀》八十一首是。钟嵘《诗品》说：“《咏怀》之作，……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沈德潜《说诗晬语》亦说：“阮公咏怀，反复零乱，兴寄无端，和愉哀怨，俶诡不羁，读者莫求归趣。”我们现在看来，《咏怀诗》八十一首，大抵皆忧时愤激之言。阮公身当乱世，进退皆难，不知何以自处，故发愤而咏此诗。观他第一首说：

>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此诗明言“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即表明他耳目之所接触，无非伤心惨目之事，如孤鸿之哀号，翔鸟之悲鸣，皆愁惨之象，故令人中夜不寐，如有隐忧。虽有清风明月之襟抱，亦无补于世道。其下“嘉树下成蹊”、“天马出西北”、“平生少年时”等首皆痛魏室之不振，“二妃游江滨”、“昔日繁华子”、“杨朱泣歧路”等首斥司马父子之奸险，“北里多奇舞”、“登高临四野”、“灼灼西瞶日”等首刺当时党附权势者多，“丹心失恩泽”、“洪生资制度”等首叹人心之颓废，“昔年十四五”、“若花耀四海”、“朝阳不再盛”等首思遁世以自修。陈沆《诗比兴笺》曰：“人谓嗣宗放达士耳，今寻八十余章，曾无孟浪之言、虚无之溺。”又曰：“粤自正始履霜之年，下穷景元倒柄之岁，触

绪抒骚，烦忧命管，畏显题之贾祸，遂《咏怀》以统篇，杂沓无伦，萧条百感。”现在看他八十一首虽多忧时伤乱之词，忠愤之情，形于诸墨，而其归结在遗世独立。故第二十四首云：

愿为云间鸟，千里一哀鸣。三芝延瀛洲，远游可长生。

第二十八首云：

若花耀四海，扶桑翳瀛洲。日月经天涂，明暗不相侔。穷达自有常，得失又何求？

第三十八首云：

炎光延万里，洪川荡湍濑。弯弓挂扶桑，长剑倚天外。泰山成砥砺，黄河为裳带。视彼庄周子，荣枯何足赖。

皆抗志浮云、远游登仙之想，仍不脱道家色彩，但与厌世派之置一切人事于不顾者不同，故名之为忧愤派。

（二）**厌世派**　这派诗人，见世事毫无可为，遂视人间如陷阱，名利如网罗，急思委之而去，别觅一安身栖遁之所。如何晏《拟古》云：

双鹤比翼游，群飞戏太清。常恐入网罗，忧祸一旦并！岂若集五湖，顺流唼浮萍？逍遥放志意，何为怵惕惊？

又《失题》云：

转蓬去其根，流飘从风移。芒芒四流涂，悠悠焉可弥？愿为浮萍草，托身寄清池。且以乐今日，其后非所知。

嵇康《赠秀才入军》诗末数句亦曰：

吉凶虽在己，世路多险巇。安得反初服？抱玉宝六奇。逍遥游太清，携手长相随。

又《答二郭》云：

详观凌世务，屯险多忧虞。施报更相市，大道匿不舒。夷路值枳棘，安步将焉如？权知相倾夺，名位不可居。鸾凤避蔚罗，远托昆仑墟。

他们激于乱世混浊，更从而推波助澜，遂放情曲糵，自甘沉溺，聊且借以排除忧患，消遣年华已耳。他们因为厌世，对于人世上一切旧制度皆所厌弃，故起而非薄礼法，轻视名节。一时闻风兴起，竹林七贤为其巨擘，视刘伶《酒德颂》一文，足以代表其思想，要皆标榜老、庄之玄学，反抗孔、孟之儒学的。

（三）达观派　前两派诗人，因愤世而至于厌世，其行为虽妄诞不经，而其情实可悲悯。吾人试思，吾身既需衣食以为生，人缘岂能尽行断绝？人事既不可绝，随俗又不甘心，因之更有达观一派。王羲之《兰亭集诗》叙说："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趋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将这派诗人随遇而安、怡然适志的心情和盘托出。前两派诗人皆抱悲观，这派诗人则变其态度而为乐观了。观王氏《兰亭集诗》曰：

仰视碧天际，俯瞰绿水滨，寥阒无涯观，寓目理自陈；大矣造化工，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

又谢安《兰亭集诗》曰：

相与欣佳节，率尔同褰裳。薄云罗景物，微风翼轻航。醇醪陶丹府，兀若游羲、唐。万殊混一理，安复觉彭、殇？

其他孙统、曹茂之、桓伟、魏滂、孙绰等人皆有《兰亭集诗》，其词气皆优游暇裕，与前两派人之烦忧闷郁者不同。但是文学中抒情、悲观容易引起读者同情，乐观就不能如此。加以他们这派恬憺之词，诸篇一致，使人读之，了无余味。所以这派诗不为后人所传诵，甚且斥之为"风骚体尽"，也不算过分之词啊。

（四）理想派　前述三派，虽其态度有悲观、乐观之分，而同属于消极一流。更有积极描写其理想境界，为安心立命之地，如郭璞《游仙诗》是。其词曰：

青溪千余仞，中有一道士。云生梁栋间，风出窗户里。借

问此何谁？云是鬼谷子。翘迹企颍阳，临河思洗耳。阊阖西南来，潜波涣鳞起。灵妃顾我笑，粲然启玉齿。蹇修时不存，要之将谁使？

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绿萝结高林，蒙笼盖一山。中有冥寂士，静啸抚清弦。放情陵霄外，嚼蕊挹飞泉。赤松临上游，驾鸿乘紫烟。左挹浮邱袖，右拍洪崖肩。借问蜉蝣辈，宁知龟鹤年？

此派诗人虽遗世冥想，蝉蜕尘寰，然能驰域外之观，抗陵霄之志，与前数派之纯然消极者不同。乃后人评论此诗者，钟嵘谓："其词多慷慨，乖远玄宗。坎坛咏怀，非列仙之趣。"李善谓："其文多自叙，未能餐霞倒景，锱铢尘网。"皆未免吹求。刘勰说："景纯艳逸，足冠中兴。……仙诗飘飘而凌云。"这种批评，较为公允。

上述四派，皆蒙道家之影响而做玄学诗的。当时亦有超然于玄学范围之外，仍规仿旧制而做诗的，更有两派，述之如下：

（一）**咏古派**　这派诗专以古人为对象，其中又分三类：第一类是咏古人的。如曹植《三良》诗，后来陶潜《咏二疏》、《咏三良》、《咏荆轲》诗，颜延之《王君咏》等，皆属这派。第二类是咏古事的。如左思《咏史》诗八首，袁宏《咏史》诗二首等。第三类是以史事入诗的。如阮籍《咏怀》第六首"昔闻东陵瓜"，以召平自比。刘琨《重赠卢谌》中用史事尤多，如云：

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滨叟，邓生何感激，千里来相求。白登幸曲逆，鸿门赖留侯。重耳任五贤，小白相射钩。苟能隆二伯，安问党与仇？中夜抚枕叹，想与数子游，吾衰久矣乎，何其不梦周？谁云圣达节，知命故不忧。宣尼悲获麟，西狩涕孔丘。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

后人对于这三类的诗，每多过分的称赞。依我看：这第一类简直是赞体，第二类是论体，第三类是用典。皆非诗之正轨，就算不得是上

乘了。

（二）拟古派　这派诗是专门模仿古人、制造假古董的。其中亦分二类：第一类是拟古诗。如陆机拟“行行重行行”，拟“今日良宴会”，拟“迢迢牵牛星”，拟“涉江采芙蓉”，……这类作品，作为教初学作诗方法，未尝不可。若竟以此为诗，我亦以为不可。第二类是隐射古人或古事而作的。如汉代《虞姬答项王歌》、李陵和苏武《赠答诗》，与当日情势不合，分明皆是魏晋以后人代作的赝品了。

以前三派玄学诗与后两派仿古诗比较，其价值孰优孰劣？这个结论，非我一人所能武断遽定。我只能说：前者是受当时思潮所驱使，是时代精神的产物；后者是反抗当时思潮、古调独弹的作品罢了。

第三节　魏晋赋及骈文

自建安文人节缩《上林》、《京都》诸大赋之局法，以为短篇，魏晋人相承不改。其中尤以潘岳《闲居》、《秋兴》各篇意趣最为隽永。虽其文既不高奇，又不工密，远逊前人之精丽；而逸趣横生，轻清爽利，出口如脱，诚别有风味。刘义庆《世说新语》注引《续文章志》说：“岳为文，选言简章，清绮绝伦。”绮而能清，确是安仁的评。这是魏晋赋家第一派。

六朝人论西晋文学者，必首推潘、陆。故《宋书·谢灵运传论》以为“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南齐书·文学传》亦谓：“潘、陆齐名。”然看两家风格，确相反对。《文选》注引孙兴公云：“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陆机的赋，诚过于繁缛。故《世说》刘注引文章传言：“机善属文，司空张华见之，篇篇称善，犹讥其作文太易。谓曰：‘人之作文，患于不才；至子为文，乃患太多也。’”《文心雕龙·熔裁》篇说：“至如士衡才优，而缀辞尤繁；士龙思劣，而雅好清省。及云之论机，亟恨其多。而称清新相接，不以为病。”盖陆氏逸思涛翻，

奇情波涌，诚可谓才大如海。然文繁而词隐，究不如潘之锋发而韵流。这是魏晋赋家的第二派。

潘、陆以外，当推左思。两汉辞赋，惟逞丽词，不免淫浮之讥。就是挚虞《文章流别论》所斥为"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的。左思出而矫之，悉以征实为主。其《三都赋》叙曰：

> 班固曰："赋者，古诗之流也。先王采焉，以观土风。"见"绿竹猗猗"，则知卫地淇澳之产；见"在其板屋"，则知秦野西戎之宅。故能居然而辨八方。然相如赋《上林》，而引卢橘夏熟；扬雄赋《甘泉》，而陈玉树青葱；班固赋《西都》，而叹以出比目。张衡赋《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称珍怪，以为润色，若斯之类，匪啻于兹。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且夫玉卮无当，虽宝非用；侈言无验，虽丽非经。而论者莫不诋讦其研精，作者大氐举为宪章，积习生常，有自来矣。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何则？发言为诗者，咏其所志也；升高能赋者，颂其所见也。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览者奚信？

他这种排斥想象、推崇写实的意见，是否有当，姑且置之不论。但说他既立意矫正汉赋淫浮之病，应当别开生面，特创新体。我们现在看《三都赋》的结构，仍属模拟陈篇，不免冗长散缓之弊。如《蜀都赋》云：

> 于前则"跨躡犍牂，枕輢交趾，……"
>
> 于后则"却背华容，北指昆仑，缘以剑阁，阻以石门，……"
>
> 于东则"左绵、巴中，百濮所充，……"
>
> 于西则"右挟岷山，涌渎发川，陪以白狼，夷歌成章，……"

其封域之内，则有“原隰坟衍，通望弥博，滨以潜沫，浸以绵雒，……”

山园，则有“林檎枇杷，橙柿梬楟，……”

其圃，则有“蒟蒻茱萸，瓜畴芋区，……”

其瀛沃，则有“攒蒋丛蒲，绿菱红莲，……”

其文虽精丽宏博，文彩烂然，足与汉人比美；但刻画太甚，实由苦心琢炼，凑合而成，致骨力未充，无驱运跌宕之致。李善《文选注》说：“此文一出，都邑豪贵，竞相传写，名重一时，洛阳为之纸贵。”现在看来，完全模拟汉人，并非是创造的作品，也没有多少奇思精彩，令人动魄惊心，算不得当时第一流的作品。这是魏晋赋的第三派。

晋赋中词旨清新、最称高秀者，当推孙绰《天台山赋》。其图绘山川，吟咏物色，如云：

> 赤城霞起而建标，瀑布飞流以界道。

两语将天台山南门之峰势及其西东之瀑布，描摹尽致，真不愧写生的能手。其下又写石桥之险云：

> 跨穹隆之悬磴，临万丈之绝冥，践莓苔之滑石，搏壁立之翠屏，揽樛木之长萝，援葛藟之飞茎。

又写天台顶之仙都云：

> 陟降信宿，迄于仙都。双阙云竦以夹路，琼台中天而悬居；朱阙玲珑于林间，玉堂阴映于高隅。

这类写景的赋，当时实不可多见。比较前三派之规抚旧艺者，可称为别调。这是魏晋赋的第四派。

此外还有一派言志的赋，为枣据之《表志》、曹摅之《述志》、庾顗之《意赋》是。然在前，汉有崔篆之《慰志》、冯衍之《显志》，魏有刘桢之《遂志》、丁仪之《励志》，皆属此类，非作始于晋人。但这亦可谓魏晋赋的第五派罢了。

上述诗赋两者，虽其内容日益分化，而体制仍遵旧章。时有特

创新体，开四六文之门径者，则陆机《演连珠》五十首是也。兹录其一曰：

> 臣闻日薄星回，穹天所以纪物；山盈川冲，后土所以播气。五行错而致用，四时违而成岁，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离；明君执契，以要克谐之会。

傅玄叙连珠曰："连珠兴于汉章之世，班固、贾逵、傅毅三子受诏作之。其文体辞丽而言约，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而览者微悟，合于古诗讽兴之义，欲使历历如贯珠，易看而可悦，故谓之连珠。"黄叔琳又曰："按《文章缘起》，'连珠扬雄作'。"则连珠不始于班固。嗣后潘勗拟连珠，魏王粲仿连珠，晋陆机演连珠，宋颜延之范连珠，齐王俭畅连珠，梁刘孝仪探物作艳体连珠。又陈懋仁《文章缘起》注："《北史·李先传》：'魏帝召先读韩子连珠二十二篇。'韩非子书中有联语先列其目，而后著其解，谓之连珠。"据此，则连珠又起于韩非子。今日连珠一体，舍陆氏所作外，传世者实少，汉人所作的如何不可得知。若以韩非子《内外储说》言之，他不过间用排句，此则全用排句。推知汉人亦未必如陆文之对偶工整，声韵谐协，以辞赋之支流，为四六文之滥觞的。

第四节 魏晋小说及杂文

小说起源甚古，《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载有《伊尹说》、《鬻子说》等书，久已亡佚。又有《青史子》、《臣寿周纪》、《虞初周说》等近于历史，所谓"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则野史一类的作品，可名之为历史派或纪实派的小说。至《隋书·经籍志》载："曹丕撰《列异传》三卷，以序鬼物奇怪之事。"乃有神话派或志怪派的小说。后来干宝撰《搜神记》二十卷，又有荀氏作《灵鬼志》，陆氏作《异林》，戴祚作《甄异传》，祖冲之作《述异记》，祖台之作《志怪》。此外尚有孔氏、殖氏、曹毗等作品甚多。可算得魏晋时最盛的文艺。可

惜现在除干宝《搜神记》而外，其他多不流传。曹丕的《列异传》中说到甘露年间事，已经为后人所窜乱，非其原本了。至两汉的小说，无一真品，大概多出于魏晋人伪造。由此可以得两个结论：(一)小说至于魏晋，才脱离历史而为纯粹的文艺。(二)文艺小说至魏晋人作品才多。

魏晋间尚有一最大发明，就是“文论”及“文评”。从前人不知文论及文评是一种专门学问，多不注意它。至曹丕作《典论》，其中乃有《论文》一篇，今录见《昭明文选》中。虽其评人仅及邺下七子，论文仅列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体，然此篇实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创作。后陆机作《文赋》，详言运思、命笔、立意、遣辞种种要义，近于文学概论。其所论文体，有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十种，较之曹氏所说，更加完美。到了挚虞著《文章流别志论》二卷，这类学问才有专书。可算当时文艺上一大特色。

西汉人散文概用单行之语，不杂骈俪之词；至东京以后，文人往往以单文运偶语，成为奇偶相生之势。至建安之世，七子撰述，悉以排偶易单行，即非有韵之文，亦用偶文之体。这可算是散文骈偶化的趋势。所以当时人所作论文，如曹冏《六代论》、韦曜《博弈论》、嵇康《养生论》、李康《运命论》、陆机《辨亡论》、陆云《五等论》，体皆近于辞赋；然论人论事之作，无关文艺，我们只得存而不讲。又魏晋人妙善玄谈，精言名理，莫不以识理相高，辩论为业，此亦应于哲学史中言之，非本编所欲陈述者也。

第五章　南朝文学

第一节　南朝文学勃兴的原因

南朝宋、齐、梁、陈四代人的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可算是极盛的时期了。试看当时文人辈出，真是肩背相望，更仆难数。举其最著者：如晋宋之际，则有谢混、陶潜、汤惠休诸诗人，皆自成一派。至于宋代，则颜延之、谢灵运最为时人所重。颜、谢而外，文人甚众，以傅亮、范晔、袁淑、谢瞻、谢惠连、谢庄、鲍照为大家。齐初有王俭、褚渊、王僧虔，后有王融、谢朓，诗文并茂。齐、梁之际，则沈约、范云、江淹、邱迟皆工诗文，任昉尤长载笔。后来刘孝绰、刘峻、裴子野、王筠、陆倕，诗文亦为当时所法，柳恽、吴均、何逊尤以诗名。陈代文士，首推徐陵、沈炯，次有顾野王、江总、姚察诸家。一时济济称盛，诚秦汉以来所罕见，可算是中古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了。而且最奇的现象，这班文学之士，大半出于世族。每见一门之内，父子兄弟各以文学擅名。如《南史·刘孝绰传》说："孝绰兄弟及群从子侄，时有七十人，并能属文。近古未有！"《王筠传》载筠《与诸儿书》说："史传所称，未有七叶之中，人人有集如吾门者。"这皆是的确的事实。因为文人多出于世族，故其文学成功，多在早年，莫不才思敏捷，或援笔立成，或文不加点。不知这班天才文人，何以皆会粹于是时，而放文学上异彩，蔚为大观呢？推原其故，约有数因。

（一）时代关系　自西晋末年，五胡竞起，割据中原，建立两赵、三秦、四燕、五凉及汉、夏等十六国，互相攻伐，亘百余年而不止。汉民族所根据之黄河流域，一寸干净土亦没有，还有什么文化可说呢？所以一时名士，莫不渡江南迁。江左一隅，遂为文人会粹之所。其初，武人尚有击楫悲歌，誓复中原；文人尚作新亭之泣，伤

心故国。到了后来，刘裕以功高而受晋禅，萧道成以国乱而篡君统，萧衍更受齐禅而为梁，陈霸先又代萧氏而立国。百六十余年之间，君臣篡夺，上下争权，内乱屡兴，封疆日蹙。士大夫逃生救死之不遑，安有经纬邦家、澄清宇宙之志呢?大家惟有朝夕晏安，相率到文苑艺圃里去，寻些乐趣，聊以自慰罢了。这是南朝文学勃兴的第一个原因。

（二）地理关系 自古北派文学偏于实际，南派文学偏于理想，《诗经》及《楚辞》是它们的代表了。这是因为气候及生物的关系。北方气候严寒，生物缺乏，故曹操《苦寒行》云："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虽仅写一地，可以代表大部分。曹植《赠白马王彪》诗又云："太谷何寥廓，山树郁苍苍。霖雨泥我涂，流潦浩纵横。中逵绝无轨，改辙登高冈。修坂造云日，我马玄以黄。"也是写北地跋涉之苦，借以抒其闷郁之怀。若南朝四代所都的建业，地当吴头楚尾，江左淮南，较之北方，气候有惨舒之别，山川有清浊之分，物产更丰啬不同。一班渡江名士，远离寒荒之境，置身佳丽之邦，不觉俯仰之间，悲愉易位。难怪他们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终日模山范水，乐而忘返了。这是六朝南派文学代汉魏北派文学而起的一大机会，即当日文学勃兴的第二个原因。

（三）思潮关系 自玄理大盛，佛法东来，晋宋学者乃由老庄思想变而为佛老。一时文人，如陈郡谢灵运、琅琊颜延之、衡阳太守何承天莫不怡情禅悦，究心佛典。齐竟陵王萧子良、琅琊王僧虔及吴郡陆澄、王俭、僧虔从孙融、汝南周颙、会稽孔稚圭，并叙佛书。梁武帝舍身事佛，昭明太子及简文帝、元帝更好谈玄。陈武帝亦舍身庄严寺，文帝自称菩萨戒弟子。这是南朝思想界的现象。当时文艺蒙其影响，焕然改观。建筑上有天竺式的伽蓝，雕刻上有立体的造

像，绘画上有背景的山水；而诗人歌咏，动称三世之辞，学者著书，每为因果之说。这皆是当时思潮反映于文艺之显著者。更因字母之说，而发明四声，容于后章详之。这是南朝文学勃兴的第三个原因。

（四）政治关系　汉因武帝及淮南王、梁孝王雅好文辞，一时文风为之大振。魏有曹氏父子，乃得邺下诸贤。这不过少数大力者提倡，遂有那样效果。若南朝君相，几无一而非文豪，尤足令人惊异不置了！试观《南史·临川王义庆传》说："文帝好文章，自谓人莫能及。"《宋书·武帝纪》说："帝才藻甚美。"《庆帝纪》说："帝颇有文才。"当时宗室，如南平王休铄、建平王弘、卢陵王爰真、江夏王义恭等，莫不招集才士，爱好文学。《齐书·高帝纪》说："帝博学，善属文。"诸子如鄱阳王锵、江夏王锋、豫章王嶷皆以文学著名；梁武帝更崇尚文艺，其嗣子、昭明太子、简文帝、元帝均以文学为天下倡。其余诸子、诸孙及宗室能文者，不可胜计。陈承梁季之乱，文学稍衰。自世祖以后，渐复旧状。后主在东宫，汲引文士，如恐不及。故后妃宗室，皆竞为文辞。开国功臣，如侯安都、孙玚等均结纳文士，故文学大昌，讫于亡国。这是政治领袖竭力提倡，所以文学勃兴的第四个原因。

（五）文艺独立　前人说"余力学文"，看文学不过是道德的附属品罢了。汉魏以来，文学虽盛，亦未尝别立一科。自宋文帝元嘉十六年，置立四学。于儒学、玄学、史学三馆外，别立文学馆，使司徒参将谢元掌之。后来明帝泰始六年，立总明观，亦分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并见《南史·宋本纪》）。刘申叔先生《中古文学史》说："此文学别于他科而独立之始。"刘先生又说："《文章志》一书，始作于挚虞；至南朝傅亮著《续文章志》，宋明帝著《江左文章志》，沈约著《宋世文章志》，并见《隋书·经籍志》。"盖一种独立的学问，必有专门的历史。专史愈丰富，由于其学问日见发达。这是南朝文学勃

兴的第五个原因。

上述五者，皆南朝文学勃兴之最大原因也，其他尚有助缘，不及琐述。至于南朝文学价值如何，那更是别一问题，非本编所欲申述的了。

第二节　南朝文学的嬗变

诗文到了晋代，易朴为雕，化奇作偶，已与魏晋不同了。到了南朝，色泽愈趋妍丽，体制愈加工整，音韵更为谐适。较之晋人，尤为殊异。刘申叔先生说，此种变化，厥有二因：

（一）声律说之发明　反切之法，始于魏之孙炎，其时李登有《声类》一书，以五声命字。其书不传，今无可考。晋代吕静仿李登之法，作《韵集》五卷，今亦不存。自竺法护四十一字母之说出，齐人周颙著《四声切韵》，梁人沈约著《四声谱》，王斌著《四声论》，由是四声之说发明，文学上乃生绝大的变化。《南史·陆厥传》说："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汝南周颙善识声韵，为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沈约传》又曰："约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从四声发明，文句必调平仄。五字之中，不能皆用平声或仄声；两句之内，不能以平声对平声，仄声对仄声。文句必须平仄相间，高下窜节，所谓"判低昂，审清浊"。使人读之，口吻调利，律吕谐和了。但时人对于声律之说每持异说。如《南史·庾肩吾传》说："齐永明中，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为丽靡。"钟嵘《诗品》曰："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我们现在对于四声的利弊，可置之不论。但说齐梁文学，异于前人，这是最大的一个分别。故王闿运称这派用声韵的诗为"新体诗"，诚与魏、晋以前的

旧诗大大不同了。

（二）文笔之区别　文笔之辨，起于南朝。汉魏以前，散文中或夹韵语，奇偶可以叠用，未尝有文笔之分。晋宋以还，乃有此辨。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说："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慧笔端而已。"则惟以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为文。据范晔《与甥侄书》曰："手笔差异，文不拘韵。"《文心雕龙·总术》篇亦曰："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两家又以有韵为文，无韵为笔。刘先生以宋、齐、梁、陈各史传证之，"知当时所谓笔者，非徒全任质素，亦非偶文为文、单语为笔也。盖学时世俗之文，有质直叙事、悉无浮藻者，如今本《文选》任昉《弹刘整文》所引刘寅妻范氏诣台诉词是也。亦有以语为文、无复偶词者，如齐世祖《敕晋安王子懋》诸文是也。然史传诸云文笔、词笔以及所云长于载笔、工于为笔者，笔之为体，统该符、檄、笺、奏、启、书札诸作言，其弹事、议对之属，亦属于笔，史册亦然。凡文之偶而弗韵者，皆晋宋以来所谓笔类也。更即《雕龙》篇次言之：由第六迄于十五，以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讔诸篇相次，是均有韵之文也。由第十六迄于二十五，以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诸篇相次，是均无韵之笔也。此非《雕龙》文笔二体之验乎？盖晋宋以降，惟以有韵为文，故当时无韵之文，亦矜尚藻彩，迄于唐代不衰。"文学界说自此始严，必偶语用韵，而后谓之文。即所谓笔，亦以藻彩相尚。此又是南朝文学异于汉魏之特点。

第三节　南朝文学的派别

缘前述诸端，南朝文学变化极大，其派别亦日趋复杂，兹择其著者，约分数派述之：

（一）山水派　《文心雕龙·明诗》篇说："宋初文咏，体有因

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由玄学诗变而为山水诗，这是晋宋之间文学界最好的消息。因为冲淡无味的几句出世话，说之不休，没有多少兴趣。就进一步而为游仙诗，将理想的境界具体写出，亦是可望而不可即、望梅止渴的空谈。当此“乱离瘼矣，奚其适归”的时候，究竟有什么办法实现我们诗人的理想呢？惟有山巅水涯、深林空谷、寒荒寂寞之地，隔绝人间，比较与他们理想的境界接近些罢了。因此由理想的游仙诗，更进而为山水诗，这亦是必然的趋势。风气既然转移，大家皆走这条新路，作品非常之多，其中以陶潜及大谢、小谢为三大家，试略述之：

（甲）陶潜　渊明本是晋人，但其山水诗当作于入宋致仕以后，开宋人之先声。他的诗描写农村景色，最为真切。如《归园田居》第一首云：

>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将田园前后左右的景物，写得如在目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两句，写远看茫昧的情形，尤有奇趣。又第三首云：

>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这首前后几句，皆为隐喻，含有讽世之意，独“带月荷锄归”一句，写景入神，最为清绝。又《游斜川》云：

> 气和天惟澄，班坐依远流。弱湍驰文鲂，闲谷矫鸣鸥。迥泽散游目，缅然睇层丘。虽微九重秀，顾瞻无匹畴。

写山泽之间，鸟飞鱼跃，真觉得天气澄和，风物闲美，非亲身目睹者不能写得如是逼真。又《饮酒》云：

>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

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这首写采菊之时，偶然见山，并非着意看山，而景与意会，故意趣悠然，真是出神入化之笔。渊明诗的特长，在不用彩藻，而冲淡高远，合于自然；非胸襟闲适、深得农田真趣者，不能为此本色语也。

（乙）谢灵运　《宋书·谢灵运传》说："出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灵运素所爱好……遂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所志辄为诗咏，以致其意焉。"又说："灵运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百数，凿山浚湖，功役无已。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嶂千重，莫不备尽登蹑。"他简直以山水为性命，官可以不做，民事可以不理，甚至衣食都可以捐弃，山水是不可不登临的了。所以他的诗天质奇丽，运思精凿，足见工力之深，非浅率者所可几及。如《过始宁墅》云：

剖竹守沧海，枉帆过旧山。山行穷登顿，水涉尽洄沿。岩峭岭稠叠，洲萦渚连绵。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

写山深水曲，云与石相倚，水与竹交映，而用一"抱"字及"媚"字，把自然加以人格化，皆成活物，这是何等奇趣。又其《登江中孤屿》云：

乱流趋孤屿，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

写天光云影，湛然清明。又《从斤竹涧越岭溪行》云：

猿鸣诚知曙，谷幽光未显。岩下云方合，花上露犹泫。

写清晨山谷间云雾弥漫的景色。又《游南亭》云：

时竟夕澄霁，云归日西驰。密林含余清，远峰隐半规。

写日暮雨霁、林峰隐约的景色，又《七里濑》云：

石浅水潺湲，日落山照曜。荒林纷沃若，哀禽相叫啸。

写秋日荒林景象。又《初去郡》云：

溯溪终水涉，登岭始山行。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憩石挹飞泉，攀林搴落英。

写秋夜月明景象。总之，灵运写各种风物，皆能各极其致，颇费惨淡经营。不过句磨字琢，偏于雕缛；较之渊明，天工人巧各不相谋了。

（丙）谢朓　前举陶诗清新，谢诗精艳。玄晖较为后出，其风格异于两家，而备有清俊富丽之长。难怪他独步萧齐一代了。观其“之宣城”诗云：

> 江路西南永，归流东北骛。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

写江天远望，云树苍茫，景象辽阔。又《晚登三山还望京邑》云：

> 灞涘望长安，河阳视京县。白日丽飞甍，参差皆可见。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

余霞成绮，澄江如练，天光水色，映带尤奇。《和王融登八公山》云：

> 二别阻汉坻，双崤望河澳。兹岭复巑岏，分区奠淮服，东限琅琊台，西距孟诸陆。阡眠起杂树，檀栾荫修竹。日隐涧疑空，云聚岫各复。出没眺栖雉，远近送春目。

登高眺远，感物造端，气势至为雄浑。又《游东田》云：

> 戚戚苦无悰，携手共行乐。寻云陟累榭，随山望菌阁。远树暧阡阡，生烟纷漠漠。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不对芳春酒，还望青山郭。

鱼戏鸟散，闲情逸致，写来亦至清绮。钟嵘《诗品》说他：“微伤细密，颇在不伦。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足使叔源失步，明远变色。善自发诗端，而末篇多踬，此意锐而才弱也。”现在看他如《暂使下都》诗起句云：“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发端的确遒劲。又如《和王季哲怨情》结句云：“故人心尚尔，故人心不见。”篇末未免稍弱。然亦不见首首如此。若说“微伤细密”，这是齐人诗协平仄的关系。我们试他《玉阶怨》及《王孙游》两首，已有唐人绝句的形式。而《怀故人》句云“清风动帘夜，孤月照窗时”，则又唐人律句之先声也。

（丁）山水文　当时人于山水诗外，还有专门描写山水的小品

文章。如陶弘景《答谢中书书》云：

>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花，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

寥寥数语，简澹高素，萧然尘埃之外，比汉人长篇大赋好得多，真是少许胜人多许啊。又吴均《与宋元思书》曰：

>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嶂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鸢飞唳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返。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

扫除浮艳，澹然无尘，南朝此作，颇为难得。这种名之为文，不如谓为“散体诗”，较为确当。又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写庐山景色曰：

> 西南望庐山，又特惊异。基压江潮，峰与辰汉相接。上常积云霞，雕锦缛。若华夕曜，岩泽气通，傅明散彩，赫似绛天；左右青霭，表里紫霄；从岭而上，气尽金光；半山以下，纯为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镇控湘、汉者也。

亦能将烟云变幻，写得尽态极妍。但其全文铸词精缛，用字锤炼，出于汉人《京都》等赋。只可谓之“无韵赋”，不能谓为“散文诗”了。

（二）宫体派　宫体诗是南朝最盛的一种侧艳诗，其体作始于梁，大盛于陈。刘申叔先生考晋、宋之间已经有了。他说：“晋宋乐府，如《桃叶歌》、《碧玉歌》、《白纻词》、《白铜鞮歌》，均以淫艳哀音，被于江左。迄之萧、齐，流风益盛。其以此体施于五言诗者，亦始晋、宋之间，后有鲍照，前有惠休。特至于梁代，其体尤昌。《南史·简文纪》谓：‘帝辞藻艳发，然伤于轻靡，时号宫体。’《徐摛传》亦谓：

‘属文好为新变，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始。’盖当此之时，文士所作，虽多艳词；然尤以艳丽著者，实惟摛及庾肩吾。嗣则庾信、徐陵承其遗绪，而文体特为南北所崇。此则大同以后文体之一变也。又据《陈书》、《南史·后主纪》及《张贵妃》各传，谓：‘帝荒酒色，奏伎作诗，以宫人有文学者为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采其尤艳丽者以为典调，被以新声。其曲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江总传》亦谓：‘尤工五七言诗，溺于浮靡，日与后主游晏，后庭多为艳诗。好事者相传论玩，于今不绝。’是陈季艳丽之词，尤较梁代为盛。即魏征陈论所谓：‘偏尚淫丽之文也。’”他把宫体诗的本源及其末流，说得极详尽了。试将他们作品略引如下，以见异同。

鲍照《代白纻曲》云：

朱唇动，素袖举，洛阳少年邯郸女，古称渌水今白纻，催弦急管为君舞。穷秋九月荷叶黄，北风驱雁天雨霜，夜长酒多乐未央。

春风澹荡使思多，天色净绿气妍和。桃含红萼兰紫牙，朝日灼烁发园花。卷幌结帷罗玉筵，齐讴秦吹卢女弦，千金一笑买芳年。

汤惠休《白纻歌》：

琴瑟未调心已悲，任罗胜绮强自持。忍思一舞望所思，将转未转恒如疑。桃花水上春风出，舞袖逶迤鸾照日。徘徊鹤转情艳逸，君为迎歌心如一。

少年窈窕舞君前，容华艳艳将欲然。为君娇凝复迁延，流目送笑不敢言。长袖拂面以自煎，愿君流光及盛年。

四诗写舞女风情绮丽，汤诗尤为哀感。《南齐书·文学传》说鲍诗“雕藻淫艳，倾炫心魂”。《南史·颜延之传》：“延之诋惠休制作为委巷中歌谣”。这类诗歌，在当时已觉得轻靡，难登大雅之堂了，哪知

梁陈宫体，更加艳发。试录数首如下：

梁简文帝《美女篇》：

佳丽尽关情，风流最有名。约黄能效月，裁金巧作星；粉光胜玉靓，衫薄拟蝉轻；密态随羞脸，娇歌逐软声；朱颜半已醉，微笑隐香屏。

梁简文帝《戏赠丽人》：

丽妲与妖嫱，共拂可怜妆。同安鬟里拨，异作额间黄。罗裙宜细简，画屧重高墙。含羞来上砌，微笑出长廊。取花争间镊，攀枝念蕊香；但歌聊一曲，鸣弦未肯张。自矜心所爱，三十侍中郎。

梁简文帝《率尔为咏》：

借问仙将画，讵有此佳人？倾城且倾国，如雨复如神；汉后怜飞燕，周王重姓申。挟瑟曾游赵，吹箫屡入秦。玉阶偏望树，长廊每逐春。约黄出意巧，缠弦用法新。迎风时引袖，避日暂披巾。疏花映髻插，细佩绕衫伸。谁知日欲暮，含羞不自陈。

陈后主《玉树后庭花》：

丽宇芳林对高阁，新妆艳质本倾城。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含态笑相迎。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

陈后主《七夕宴乐修殿》：

秋初芰荷殿，宝帐芙蓉开。玉笛随弦上，金钿逐照回。钗光摇玳瑁，柱色轻玫瑰。笑靥人前敛，衣香动处来。非同七襄驾，讵隔一春梅？神仙定不及，宁用流霞杯？

这类的诗，虽说是轻浮淫艳，然他们对于女性，仅为肉体的描写，没有多少神致。不能说它是有价值的作品。

（三）讽刺派　讽刺类的诗及文，当时谓之“谐讔”。《文心雕龙》说：“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讔者，隐也。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其体起源亦古，但至宋、齐而后，作者益加轻

薄。《南史·文学传》说:卞铄为词赋,多讥刺世人。丘巨源作《秋胡诗》,有讥刺语。卞彬拟《枯鱼赋》喻意。又著《蚤虱》、《蜗虫》等赋,大有指斥。永明中,诸葛勗为国子生作《云中赋》,指祭酒以下,皆有形似之目。到梁代世风益薄,嘲讽之文更多。《梁书·临川王弘传》说:"豫章王综以弘贪吝,作《钱愚论》,其文甚切。"又《南史·江德藻传》说:"弟从简作《采荷调》,刺何敬容,为当时所赏。"现在录最著名的孔稚圭刺周彦伦的《北山移文》以见例:

> 钟山之英,草堂之灵,驰烟驿路,勒移山庭。……世有周子,俊俗之士,既文且博,亦玄亦史。然而学遁东鲁,习隐南郭,偶吹草堂,滥巾北岳,诱我松桂,欺我云壑。虽假容于江皋,乃缨情于好爵。……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独举,青松落荫,白云谁侣?涧户摧绝无与归,石径荒凉徒延伫。……今又促装下邑,浪拽上京,虽情投于魏阙,或假步于山扃。岂可使芳杜厚颜,薜荔蒙耻,碧岭再辱,丹崖重滓?尘游躅于蕙路,污渌池以洗耳。宜扃岫幌,掩云关,敛轻雾,藏鸣湍,截来辕于谷口,杜妄辔于郊端。于是丛条瞋胆,叠颖怒魄,或飞柯以折轮,乍低枝而扫迹。请回俗士驾,为君谢逋客。

看其文词严义正,笔墨飞舞,然而牙尖口利,可谓刻薄到极点了。

(四)数典派 这是南朝流行最盛而价值最少的一派文学。其风气开于宋代颜延之。《诗品》说:"颜延之喜用古事,弥见拘束,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学殆同书抄。"后来任昉用典尤多。《南史·任昉传》说:晚转好诗,"用事过多,属诗不得流便。自尔都下士子慕之,转为穿凿"。《诗品》亦云:"任昉博物,动辄用事,是以诗不得奇。"是南朝人诗,数典为其最大一派。他们有所谓"离合诗"、"回文诗"、"建除诗"、"四色诗"、"八音诗"、"数名诗"、"州郡名诗"、"药名诗"、"姓名诗"、"鸟兽名诗"、"树名诗"、"草名诗"、"宫殿名诗"各体,又有什么叫做"大言诗"、"小言诗",皆是工于数典之诗,实皆无

大价值，现在不必征引。所以《诗品》批他们谓："拘挛补纳，蠹文已甚。"《齐书·文学传》说："缉比事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皆是确切的批评。但他们多闻强记，炫博惊奇，不能不说他们有本领。到了王俭使宾客隶事，梁武帝又集文士策经史事，制成类书。从此属文之士，取材于此，操笔便成文章，华词翰藻，满纸皆是，文体更卑靡了。

（五）模古派　当此举世竟为新体、习华随侈之时，而主张模拟古调的，仍时有所闻。试观梁简文帝《与湘东王书》说："比见京师文体，懦钝殊常，……既殊比兴，正背《风》《骚》。若夫六典三礼，所施则有地；吉凶嘉宾，用之则有所。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择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依其说观之，其时摹古的作家大有人在。虽然他们的作品侈陈故训典制，未免可笑，但是他们这种风气，居然流传于京师，就很值得注意了。不知究竟是什么人如是主张呢。现举宋代裴子野为其代表。裴氏见宋明帝命文武臣课诗，有人买文来应命，痛恨天下风尚雕虫之艺，不知留心经史，乃作《雕虫论》以诋之。其说曰：

> 古者四始六义，总而为诗；既形四方之风，且章君子之志，劝美惩恶，王化本焉。后之作者，思存枝叶，繁华蕴藻，用以自通。若悱恻芬芳，楚骚为之祖；靡漫容与，相如和其音；由是随声逐景之俦，弃旨归而无执，赋诗歌颂，百帙五车；蔡邕等之俳优，扬雄悔为童子。圣人不作，雅郑谁分？其五言为诗家，则苏、李自出，曹、刘伟其风力，潘、陆固其枝柯。爰及江左，称彼颜、谢，箴绣鞶帨，无取庙堂。宋初讫于元、嘉，多为经史，大明之代，实好斯文，高才逸韵，颇谢前哲，波流相尚，滋有竺焉。自是闾阎年少，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觚鲁。淫文破典，斐尔为功；无被于管弦，非止

于礼义；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讨其宗途，亦有宋之遗风也。

他这篇议论，对于南朝浮靡派的文艺，批评得不留余地了。但是他自家主张熔经铸史，实与文艺无关。他是个史家，盖以史学眼光来批评文学。所以梁简文帝说："裴氏乃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他这种议论，没有什么价值了。当时还有一个诗文并茂的作家，竭力变革新体、效法汉魏的。《南齐书·文学传》说："次则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眩心魂，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鲍照之遗烈也。"我们看鲍照的诗文，虽是雕藻淫艳，但是他化复为单，变纡徐为险急，所以萧子显说他"发唱惊挺，操调险急"，与当时一般文艺实在不同。他集中有许多拟古诗、绍古辞，还有学刘公干体、拟阮公《咏怀》诗、学陶彭泽体。他的《芜城赋》虽开律赋之先声，《登大雷岸与妹书》仍是规模汉赋。他的诗虽自成一家，似未脱摹古的色彩。

（六）平民文学　以上所举，皆是当时文人的文艺。此外乐府中所收的平民诗，不少有价值的作品，尤以哀情及艳情两类诗为最多。如《华山畿》二十五首，其末数首云：

相送劳劳渚，长江不应满，是侬泪成许。

奈何许，天下人何限，慊慊只为汝。

松上萝，愿君如行云，时时见经过。

夜相思，风吹窗帘动，言是所欢来。

长鸣鸡，谁知侬念汝，独向空中啼？

腹中如乱丝，愦愦适得去，愁毒乙复来。

又《读曲歌》八十九首，其中数首云：

芳萱初生时，知是无忧草。双眉画未成，那能就郎抱？

日光没已尽，宿鸟纵横飞。徒倚望行云，蹀躞待郎归。

闺阁断信使，的的两相忆；譬如水上影，分明不可得。

逍遥待晓分，转侧听更鼓。明月不应停，特为相思苦。

又《子夜歌》二百首，其中数首云：

秋风入窗里，罗帐起飘飏。仰头看明月，寄情千里光。

途涩无人行，冒寒往相觅。若不信侬时，但看雪上迹。

自从别欢来，奁器了不开。头乱不敢理，装拂生黄衣。

果欲结金兰，但看松柏林：经霜不堕地，岁寒无异心。

这类文字，浅显明白，不加丝毫粉饰，而真情毕露，委婉动人；较那班文人矫揉造作的作品，自然好得多。此外尚有《石城歌》、《莫愁乐》、《乌夜啼》、《襄阳乐》等，皆历来论南朝文学的人所不注意的平民文学。

（七）小说 汉魏由历史派小说而为志怪派小说，至南朝又变为故事派小说。故事或捃摭前闻，或记录时事，本属历史之一种。但南朝人故事小说，多采撷古今佳事佳话，或词冷而趣远，或事琐而意深，风旨各条不同，事事皆有寄托，其文学兴趣极其浓厚。所以他们这派小说，可谓之文艺的故事，与那些琐碎的街谈巷语、写实的遗闻逸事，绝对不同。试举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为例，以见大凡。《世说·言语第二》曰：

庾公造周伯仁，伯仁曰："君何所欣悦而忽肥？"庾曰："君复何所忧惨而忽瘦？"伯仁曰："吾无所忧，直是清虚日来，滓秽日去耳。"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惟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

林公见东阳长山曰："何其坦迤！"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

霞蔚。”

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道壹道人好整饰音辞，从都下还东山，经吴中，已而会雪下，未甚寒。诸道人问在道所经，壹公曰：“风霜固所不论，乃先集其惨澹，郊邑正自飘瞥，林岫便已皓然。”

每叙一事，寥寥数语，而清辞丽句，旨趣超远，令人玩味无穷。刘申叔先生《中古文学史》上说：“自晋代人士，均擅清言，用是言语文章，虽分二途；而出口成章，悉饶词藻。晋宋之际，宗炳之伦，承其流风，兼以施于讲学。宋则谢灵运、谢瞻之属，并以才辩辞义相高。王惠精言清理。齐承宋绪，华辩益昌。《齐书》称：‘张绪言精理奥，见宗一时，吐纳风流，听者皆忘饥疲。’又称：‘周颙音辞辨丽，辞韵如流，太学诸生慕其风，争事华辨。’又谓：‘张融言辞辩捷，周颙弥为清绮；刘绘音采不瞻，丽雅有风则。’迄于梁代，世主尤崇讲学，国学诸生惟以辨论行玄为务。或发题申难，往复循环。具详《南史》各传。”他这段话，将当时言语文辞发达的原因，说得非常详尽。当时于《世说》之外，这派小说甚多。见于《隋书·经籍志》者：梁沈约有《俗说》三卷，殷芸有小说三十卷，杨松玠有《解颐》二卷，刘孝标有《世说注》十卷，皆属故事的小说。

（八）批评文学　文学批评之书，始于魏晋人。至南朝作者更多，其最有名者以刘勰《文心雕龙》及钟嵘《诗品》，为中古两大名著。但两书内容，略有同异：(一)《文心雕龙》上卷分论各种文体。就每种文体，溯其源流，释其名义，并举古人名篇，讨论其得失。下卷专言文章的原理、原则，近于推理的批评。《诗品》叙中总论历代诗学变迁之趋势；其本文将汉魏以来诗人一百二十二家，分列上中下三品，详言其派别利弊。两书的体例不同。(二)刘、钟两氏同生于齐、梁之际，刘氏对于当时发明之声律说，极表赞同。其《声律》篇

曰："凡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睽。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与沈约"前有浮声，后须切响，两句之中，轻重悉异"之说相合。钟氏则竭力反对，谓其"襞积细微，专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这是他们对于当时新体诗意见的不同。刘氏最重情性，反对造作。其《情采》篇曰："文采所以饰言，而辨丽本于情性。"《丽辞》篇曰："气无奇类，文乏异采，碌碌丽辞，则昏睡耳目。"钟氏亦谓："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又谓："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这是他们根本意见相同之点。要而言之，其持论虽有参差，其价值难判高下，皆后人公认为不朽之名作也。

第四节　结　论

南朝文学，诚中国美文全盛时期。惟其过于繁华绮艳，不免"文胜"之讥。这也是秦、汉以后质文代变、往复循环的一种自然现象。因为秦、汉两代文学堕落到最低度，魏、晋以后，一天一天澎涨，涨到齐、梁，可谓到最高潮了。兹将其回涨的趋势，列举数点以明之：

（一）由质趋文　秦人无所谓文学，其四言韵语的刻石，简直就是一种文告。前汉除去最少数楚调诗及平民的相和歌而外，其他多系模仿的无生气的作品，后汉并这种作品也不多见了。直到建安之际，才有五言诗发生。乐府诗到了曹氏父子一般文人手里，也就大有可观了。晋人言诗，乃有"缘情而绮靡"之说，主张华饰；但其时玄风独扇，诗多冲淡。潘、陆之作，方缛旨星稠，繁文绮合；颜、谢继起，由数典而趋琢句，益重彩藻。梁、陈宫体方兴，更务侧艳。所以《昭明文选》叙，以"沉思翰藻"为极则；元帝《金楼子》，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乃得为文。这皆是由质趋文之表征也。

（二）由单趋复　古人行文，本来骈散不分，单复并用。这是文言合一时代，文章务便于口说的缘故。秦汉以后，文语分途，文章乃

有单复之别。刘申叔先生论汉魏文章变迁曰："西汉之时，箴、铭、赋、颂，原出于文；论、辩、书、疏，原出于语。观邹、枚、扬、马之流，咸上词赋，沉思翰藻，不歌而诵；旁及箴、铭、骚、七，咸属有韵之文。若贾生作论，史迁报书，刘向、匡衡之献疏，……大氐皆单行之语，不杂骈骊之词。或出语雄奇，或行文平实，咸能抑扬顿挫，以期语意之简明。东京以降，论辩诸作往往以单行运排偶之词；而奇偶相生，致文体迥殊于西汉。建安之世，七子继兴，偶有撰著，悉以排偶易单行；华靡之作，遂开四六之先，而文体复殊于东汉。"他这是说汉、魏文体的变迁。西汉之世，虽属韵文，而对偶之法未严。东汉之文，渐尚对偶。至魏晋之文，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剖毫无析厘，骈骊之风顿盛。至于南朝，务以声色相矜，藻绘相尚，四六之体，至此成立。这皆是由单趋复之表征。

（三）由刚趋柔　有人说：西汉之文，多雄丽刚劲；东汉较有逊色，然朴茂之气仍存；魏晋之文，虽多华靡，尚有清气；六朝以降，偏重词华，靡曼纤冶，毫无风骨。这种说法，似合乎自然趋势，然其词气之间，妄分优劣，这是一种偏见。友人某君与我论文书尝说："自晋而后，雄伟之文不再见；至宋而后，古雅之作不可遇；至齐而后，遒整之气不复存。"我复他信说："足下谓晋以后雄伟之文不再见，此非的论也。试观晋文之著者，如刘琨《劝进》、《北伐》诸表，及卢谌《为刘氏理冤》一文，煌煌巨制，冠绝一时。其他论著之属，如陆机《辨亡》、江统《徙戎》，虽贾生《治安》无以远过。齐、梁以来，诚多短作，然《哀江南赋》，亦出陈世。并宜分别观之。又谓宋以来古雅之作不可遇，齐后遒整之气不复存，此声律说发明，新旧文体之变革也。夫骈四骊六之风，实起萧齐以后，自是声调妍美，而汉魏质厚之风少杀。此由质趋文，自然之趋势，亦未容抑扬于其间也。"因为优美与壮美派别不同，不可比较。如甲胄之士与粉黛佳人，各有风格，不容相提并论。又如鼓角悲壮之声与丝竹柔靡之调，各有所用，不

必奏于一处。见者闻者亦各有嗜好，彼此不必相强。若妄分高下，褒甲贬乙，那就未免可笑。所以我们只要人知道由阳刚而至阴柔，由壮美而为优美，这是汉、魏六代文学界自然趋势。盛衰之说，优劣之分，那就置之不论了。

（四）由实趋虚　两汉诗文，所写多属实境，惟赋家词尚假托，而用意仍在讽劝人君，未能驰思于八表以外。乐府诗出于文人者皆颂祷之词；出于平民者，多抒情之什；《古诗十九首》更属人间感想，其中“牵牛织女”一首，亦不过借二星为象征，咏男女之慕悦而已。惟张衡《仙诗》，算是一种新声。正始以后，诗杂仙心；江左篇制，玄言尤盛；然而意旨率多浮浅，辞趣千篇一律，没有多大价值。到了郭璞《游仙诗》，乃挺拔而称惟一的杰作。至南朝陶、谢之诗，虽以山水为其对境，而能加以美化，抒其理想，实境即虚境也。试观渊明《饮酒诗》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无心见山，而景与意会，此意境中之山，非望中之山。灵运《进帆海》诗云：“溟涨无端倪，虚舟有超越。”大海苍茫，而虚舟独能超越，此亦意境中之海，非望中之海。这是因为他们皆精研佛理，故能即色即空，两无所碍。故陶云：“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谢云：“虑淡物自轻，意惬理无违。”皆是说明他们虽写实境，而意中别有寄托。这是由实趋虚的表征。

第六章　北朝文学

东晋南迁，河淮之间为五胡所蹂躏，中国文化自此荡然无遗，还说到什么文学呢？至拓跋氏统一北方，孝文定都洛阳，力变胡俗，提倡华化，文学稍稍振起。北齐篡有东魏，享国日浅，政无可观。而其时改革文学动机已露；至宇文泰专政，任用苏绰，主张文学革命，南朝文风至此大变，唐宋人“古文运动”，由此发端。北周可谓南朝文学反动时期，唐宋文学胚胎时期。

第一节　北朝诗赋

《北史·文苑传》说：“中州板荡，戎狄交侵，僭伪相属，生灵涂炭，故文章黜焉。其能潜思于战争之间，挥翰于锋镝之下，亦有时而间出矣。”“然皆迫于仓卒，牵于战阵，章奏符檄，则粲然可观；体物缘情，则寂寥于世。非其才有优劣，时运然也。”这是说，当时中原扰攘，满地兵戈，做散文的尚有其人，做诗赋者就不可多得了。然而北魏有温子昇、胡叟等，北齐有邢邵、祖珽、郑公超、萧悫、颜之推等，北周有庾信、王褒等。他们未尝无名章美句，流传于世，不过他们的风格，与南朝之绮艳派不同耳。最奇怪的是庾信，他本为梁庾肩吾之子，早年与徐陵同为梁太子抄撮学士，文亦绮丽，世号徐庾体。后来他出使西魏，遂居北方，又仕于北周，遂变其体为苍凉悲壮之致。这真是受环境熏染的缘故，以至于前后判若两人。他如不到北方去，那些《拟咏怀》诗及《哀江南赋》就做不出来。文学真是环境的产物啊。

北朝除少数文人外，其武人亦有矢口直陈、自然高古的诗，如斛律金《敕勒歌》曰：

>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莽莽而来，气魄何等雄厚，非琢句炼字者可比。这种作品，可以代表北人精神。此外还有民间作的《木兰诗》、《企喻歌》、《幽州马客吟歌辞》、《陇头歌辞》、《折杨柳歌辞》，皆属北音。尤以《木兰诗》事迹奇伟，词义异常壮烈。其“朝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水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声啾啾”一段，至今读之，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犹觉懔懔有生气，非北派诗人不能为此也。

第二节　复古运动

北派文人不满意南朝文学，想对它革命，不能不提出古人来压倒它，于是有复古运动。这种风气，倡始于北齐颜之推，其《家训》论文学曰：

> 今世相承，趋末弃本，率多浮艳。辞与理竞，辞胜而理伏；事与才争，事繁而才损。放逸者流宕而忘归，穿凿者补缀而不足。

这是他对于南派文学的攻击。他主张文章当原本五经，曰：

> 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书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方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

又说文章当尚理致，重气质，曰：

> 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

他主张以质朴易文华，以散体易骈偶。后来宇文泰于西魏当国时，从苏绰的话，谓诰皆仿《尚书》，乃大变骈俪之习。从此以后，文笔悉依此体，文学革命乃告一段落。虽不久又有隋季初唐之反动，然至

韩愈、柳宗元出，大声疾呼，摧陷廓清，此种革命，乃大告成功。溯其远源，则伏机早在北朝，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五曾言之。

第三节　写景文

北朝虽乏写景的诗赋，而写景的散文，则有甚美者，如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及郦道元《水经注》是最著名的。《水经》作于桑钦，郭璞曾为作注，至道元之注尤善。其写巫峡曰：

>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

写三峡中四时风景，有声有色，这种文字，富有诗意，简直是散文诗。我们试读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不是就从此文衍绎而成的吗？

第四节　结　论

南北文学异同，李延寿《北史·文苑传》叙曾略言之曰：

> 洛阳、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

这段批评，可谓公允。若推其异同的原因，则气候、地理、生物、风俗、礼教及思想、学术种种关系，言之甚长，非此种小册子所能尽说的了。



唐代文学

陈子展著

原名“唐代文学史”

据上海作家书店1944年版重排

第一章　说到唐代文学

说到唐代文学，我以为刘昫《旧唐书·文苑传》、宋祁《新唐书·文艺传》都记载得很好，可是他们论文的宗旨却有不同。刘昫生在五代古文中绝的时代，偏重骈文；宋祁生在北宋古文复兴的时代，偏重古文。刘昫最赞美初唐之文，说是“文皇帝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门罗吐凤之才，人擅握蛇之价。靡不发言为论，下笔成文，足以纬俗经邦，岂止雕章缛句。韵谐金奏，词炳丹青。故贞观之风，同乎三代。高宗、天后，尤重详延。天子赋横汾之诗，臣下继柏梁之奏，巍巍济济，辉烁古今”。宋祁则最赞美中唐之文，说是“大历、贞元间，美才辈出，擩哜道真，涵泳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严，抵轹晋、魏，上轧汉、周，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此其极也”。刘昫于唐诗特提王维、杜甫；宋祁于唐诗则特提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刘禹锡。而以侍从酬奉之作推许李峤、宋之问、沈佺期、王维；谲怪之作推许李贺、杜牧、李商隐。如上所说，可见刘昫、宋祁论文，宗旨不同，他们眼中的唐代文学也颇异样了。假使我们论唐代文学要分初、盛、中、晚四期的话，那么宋祁最推崇中唐之文，而不提及晚唐，于初唐之文沿袭南朝颇有微词，于盛唐之燕许大手笔始稍为推许。他说：“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

绨句绘章，揣合低卬，故王、杨为之伯。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瑑，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则燕、许擅其宗。是时，唐兴已百年，诸儒争自名家。”下文他就说到韩、柳了。他于中唐韩柳一派的古文说是“擩哜道真，涵泳圣涯”，推崇已极，所以他就不得不以中唐为唐代文学最盛的时期，他不论及晚唐之文也是当然的了。

就文学本身的发展进程而说，李唐一代是文学史上最好分期的一个时代。在这以前，八代文学以古体诗和骈文为盛；在这以后，就以近体诗和古文为盛了。近体诗讲求声律，虽说因受佛典文学转读歌赞的影响而起于齐梁之际，实则到唐代而近体诗的规律才算确立。加以唐代音乐因融合胡乐俗曲的结果而新声转盛，自然于当时入乐的诗歌有些影响。唐诗声调之美，和后来诗人对于唐音的赞叹，不是没有来由的。

再就文学产生的历史影响和社会背景说，在八代中间经过五胡乱华，南北朝对立。所谓胡虏，都是西北或靠近东北的游牧部族，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新分子，他们的民族性伉爽直率，慷慨悲歌，自然有一部分融化到中华民族的里头。直到隋唐统一，经过几百年，中华民族同化诸部族的艰巨工作才算告一段落。唐文学以固有的温柔敦厚的底子加上许多外来的慷慨悲歌的成分，通过南朝的铅华靡曼参以北朝的伉爽直率，因民族性格的融合与文化风格的融合，不知不觉中就产生出一种异彩来了。我们还应该知道：唐代自李渊起兵，化家为国，承南北朝丧乱之后，隋炀帝荒淫之余，削平了割据的群雄，造成了统一的、专制的一个大帝国，人民也就乐得休养生息，安于一种小康的状态。“贞观盛世，至于斗米三钱”（《魏征传》）。直到玄宗，百年之间，虽间见水旱蝗螟等灾荒，一经赈给，便又相安无事。而且玄宗开元年代，累岁丰稔，“东都米斗十钱，青齐米斗五钱”（《本纪》），真算是所谓太平盛世了。这时候在民间以有了剩余经济之故，自然可以产生多量有文学教养的知识分子。在

政府方面，贵族官僚只知道歌舞太平，铺张盛世，怎样的夸耀功德，炫示权威，文学恰好给他们利用作为这种工具。所以当时诗歌的大部分不是奉和应制，就是乐府歌辞，揄扬或娱乐圣主贤臣以及诸王公主之作。如从四杰沈、宋以至苏、张的大手笔，就大半是谀生颂死的文章。只因当时正需要这种文学，不然，便得不到国家的豢养，也就不能见重于社会了。《旧唐书·张说传》里说："当承平岁久，志在粉饰盛时。""中书舍人徐坚自负文学，常以集贤院学士多非其人，所司供膳太厚，尝谓朝列曰：'此辈于国家何益？如此虚费。'将建议罢之。说曰：'自古帝王功成，则有奢纵之失，或兴池台，或玩声色。今圣上崇儒重道，亲自讲论，刊正图书，详延学者。今丽正书院，天子礼乐之司，永代规模，不易之道也。所费者细，所益者大。徐子之言何其隘哉！'玄宗知之，由是薄坚。"其实，玄宗这种粉饰盛时的政策，还是承袭了祖先的传统，因为从太宗、高宗，历武后、中宗、睿宗各朝，莫不提倡文学，重用文人，先后设置了文学馆、弘文馆、崇文馆、修文馆等清要机关，招揽一班文人学士。又常常举行君臣酣乐，吟咏唱和的宴会。还定下了天下英雄入彀中的考试制度，兼用诗赋取士，开了文人获得利禄的一条捷径。同时文化的各方面如宗教（三大教并行不悖之外，他如回教、景教、祆教、摩尼教等也先后传入中国）、艺术（如建筑、雕塑、音乐、绘画、书法之类）等都很自由地得到相当的发展，也足以丰富文学的内容，提高文学的水准。至于唐代武功之盛尤为秦汉以来所未有，所以高祖说："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太宗《纪功诗》说："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当时皇帝是诸蕃君长共载的天可汗。是中国民族力最强盛的时代，四夷慑伏，中外交通，彼此文化也得到了交流机会，对于文学也有其相当的影响。前人下种，后人收获，到了玄宗时候，就达到开花结果的日子了。加以玄宗末年突起安史之乱，惊破了当时人的太平迷梦。安史之乱虽然平了，而藩镇之祸不息。从太平盛世的诗人忽然跌到了

这样一个祸乱的社会，无论是在挣扎中的贵族官僚，未得志的知识分子，受了这样一种大刺激，他们心灵上所起的反应虽因阶级性、个性种种的差异而有强弱深浅等等的不同，可是对于人生的认识、文学的表现，却都较以前更为深刻，因为事实告诉我们：这一时期诗人的收获最为丰富。换句话说，他们的成就最为伟大，还大有影响于后来的作者。我把李白、杜甫代表这一时期稍前的作家，把韩愈、白居易，代表这一时期稍后的作家。这一时期约自 8 世纪初叶到 9 世纪中叶，即所谓盛唐、中唐的时期，也就是唐代文学最盛的时期。所谓晚唐即由 9 世纪中叶到末叶的一个时期，那就是唐代文学衰落的时期了。

第二章　初唐诗人

现在先讲初唐诗人：

高棅《唐诗品汇》初、盛、中、晚之分，似乎系承宋祁三变之说和严羽盛、中、晚之说为评述便利而设的。所谓初唐，包括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至武后的一个时期(约自 620—710)。这一时期虽因开国君主鉴于六朝，政尚简肃，文学上有虞世南、王师旦等反对沿袭南朝宫体之诗、浮靡之文，而提倡雅正(《新唐书·虞世南传》[《文艺传》])，但除虞世南、李百药、魏征、王绩(王通之弟)几人之作近于所谓雅正而外，大都仍沿江左余风。有名的如上官仪(？—664)，其诗绮错婉媚，虽被称为"上官体"，实是宫体的变种，不过他更讲究对仗而已。就是最有名的初唐四杰王、杨、卢、骆也还跑不出南朝的范围，不过他们的骈文更讲究平仄而已。

王勃(648—675)，字子安，绛州龙门人。王通之孙，福畤之子，一家祖孙父子兄弟都有才名。勃六岁能文章，未冠应举及第，旋为沛王府修撰。因诸王斗鸡，戏为文檄英王鸡，为高宗所斥，父亦坐贬为交趾令。勃往省父，渡海溺死，年二十八。今存《王子安集》十六卷，明张燮辑本。勃为文敏捷，时人称为"腹稿"。所作骈文以《滕王阁序》为最佳。序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为传诵名句。便是反对骈文的韩愈作《新修滕王阁记》提到王勃，也说"壮其文辞"，并说"窃喜载名其上，词列三王(勃序、绪赋、仲舒记)之次，有荣耀焉"。勃诗工五言，今录《别薛华》一首于次：

送送多穷路，遑遑独问津。悲凉千里道，凄断百年身。

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辛。无论去与住，俱是梦中人。

杨炯(650—692?)，华阴人。年十一举神童，为崇文馆学士，詹

事司直。出为梓州司法参军，迁盈川令，以严酷称，吏稍忤意，榜杀之。卒官下，年约四十余。时称王、杨、卢、骆“四杰”。炯曰：“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虽不满于勃，然亦不见有大胜勃处。今存《盈川集》十卷，明童佩辑本，录其《从军行》诗一首：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他作诗赋每好连以人名作对，如《庭菊赋》序云：

薛凯以亲贤为洗马，田岩以幽贞为学士。高元思、张师德以至孝托后车，颜强学、沈尊行以博闻兼侍读。周琮、李宪、王祖英、曹叔文以儒术进，崔融、徐彦伯、刘知几、石抱忠以文章显。德行则许子丰，耆旧则权无二。骆缤则训诂之前识，张相则老庄之后兴。

又如诗中也好用古人名：

汉帝求仙日，相如作赋才。(《和刘侍郎入隆唐观》)
亭逢李广骑，门接邵平瓜。(《送李庶子致仕还洛》)
钟仪琴未奏，苏武节犹新。(《和刘长史答十九兄》)

因此，他的作品被讥为“点鬼簿”。

卢照邻(650—?)，字昇之，幽州范阳人。十岁从曹宪、王义方授“苍”“雅”。为邓王府典签，王称“此吾之相如”。调新都尉，病，去官，居太白山中。后以足挛手废，乃去具茨山下，买园数十亩，疏颍水周舍，复豫为墓，偃卧其中。自以当高宗时尚吏，己独儒；武后尚法，己独尚黄老；后封嵩山，屡聘贤士，己已废，著《五悲文》以自明。其《穷鱼赋》序称曾以横事被拘，将致之深议，则中间又遭非罪。读他的《与洛阳名流朝士乞药直书》，他想向每人乞钱二千，贫困可以想见。又《释疾文序》云：“余羸卧不起，行已十年。宛转匡床，婆娑小室。未攀偃蹇桂，一臂连踡；不学邯郸步，两足匍匐。寸步千里，咫尺山河。”又云：“覆焘虽广，嗟不容乎此生；亭育虽繁，恩已绝乎斯

载。”病苦亦可想见。无怪乎他自称“幽忧子”，最后与亲属执别，自沉颍水了。《释疾文三歌》之一云：

> 岁将暮兮欢不再，时已晚兮忧来多。东郊绝此麒麟笔，西山秘此凤凰柯。死去死去今如此，生兮生兮奈汝何！

这就是那位苦命诗人的绝命辞了。今存《幽忧子集》七卷。

骆宾王（650—684），婺州义乌人。七岁能赋诗，有《咏鹅》诗云：“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为人落魄无行，好与博徒游。高宗末为长安主簿，坐赃左迁临海丞，怏怏失志，弃官去。徐敬业起兵，军中书檄皆宾王之词。武后读檄，初但嬉笑，读至“一坏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瞿然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敬业败，伏诛，年三十五。所作诗文多散失，武后素重其文，遣使求之。有兖州人郗云卿集成十卷，今存。（以上四杰集均有“四部丛刊”一本。）朱国桢《涌幢小品》载正德九年有曹某者，凿靛池于海门城东黄泥口，得古冢题石曰“骆宾王之墓”。则孟棨《本事诗》所云宾王落发，遍游名山，宋之问游灵隐寺作诗，尝为续“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句一说，似不可靠。宾王所作好以数字属对，被讥为“算博士”。尝作《帝京篇》，当时以为绝唱，篇中亦多数字。如云“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五纬连影集星躔，八水分流横地轴。秦塞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此以数字状形势之雄。如云“三衢九陌丽城隈，万户千门平旦开”，“小堂绮帐三千户，大道青楼十二重”，此以数字状宫阙之壮。如云“延年女弟双飞入，罗敷使君千骑归”，“春朝桂樽樽百味，秋夜兰灯灯九微”，“且论三万六千是，宁知四十九年非”，此以数字状王侯贵戚之荒淫无度。如云“相顾百龄皆有待，居然万化咸应改”，“当时一旦擅豪华，自言千载常骄奢”，此以数字状倏忽变迁，荣华消歇。如云“三冬自矜诚足用，十年不调几邅回”，此以数字状一己之湮滞。这位“算博士”的诗真算会用数目字了。也许是因为这首多用数字的诗得到当时人的鼓励，他才喜常

用数字的。

《新唐书·文艺传·杜甫传》赞云："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问、沈佺期等，研揣声音，浮切不差，而号'律诗'，竞相沿袭。"又《宋之问传》云："魏建安后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语曰，'苏、李居前，沈、宋比肩'，谓苏武、李陵也。"五言古诗相传自苏、李而成立，五言律诗则自沈、宋而成立。自然，四声八病之说，丽辞属对之法，虽远在齐梁之际，沈约、刘勰诸人已有提倡。五言律诗的萌芽也在齐梁，如沈约、王融、谢朓、江淹、何逊、阴铿诸人所作，就有许多这类诗。到了初唐四杰、沈、宋诸人，他们的这类诗，不但属对情密，平仄也精密了，五言律诗的体制完成了。同时七言律诗也成立了，沈、宋就是兼工七言律诗的人。总之，这个时期五七言律绝诗都有了，七言古诗也渐渐盛行了。

沈佺期(650—715?)，字云卿，相州内黄人。及进士第，累除给事中考功，受赇劾未究。会张易之败，遂长流驩州。后官至中书舍人，太子少詹事。其为诗尤长于七言。

> 卢家少妇郁金堂，海燕双栖玳瑁梁。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白狼河北音书断，丹凤城南秋夜长。谁谓含愁独不见，更教明月照流黄！(《古意呈补阙乔知之》)
>
> 天长地阔岭头分，去国离家见白云。洛浦风光何所似，崇山瘴疠不堪闻。南浮涨海人何处，北望衡阳雁几群。两地江山万余里，何时重谒圣明君！(《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

宋之问(656—712)，字延清，虢州弘农人。武后时，召与杨炯分直内教。于时张易之等烝昵宠甚，之问与阎朝隐、沈佺期、刘允济倾心媚附，至为易之奉溺器。及易之等败，左迁泷州参军。未几，逃匿张仲之家，以举发仲之与王同皎谋杀武三思事，得复官。为了脱罪

求荣，便是告密卖友的事他也居然做。睿宗立，以易之为三思党配徙钦州，先天中赐死，年五十七。之问善为五言诗。如《题大庾岭北驿》：

阳月南飞雁，传闻至此回。我行殊未已，何日复归来。

江静潮初落，林昏瘴不开。明朝望乡处，应见陇头梅。

沈、宋之流至为在朝小人捧便壶，可谓斯文扫地了。据《新唐书·文艺传·李适传》云："初，中宗景龙二年，始于修文馆置大学士四员、学士八员、直学士十二员，像四时、八节、十二月。于是李峤、宗楚客、赵彦昭、韦嗣立为大学士，适、刘宪、崔湜、郑愔、卢藏用、李乂、岑羲、刘子玄为学士，薛稷、马怀素、宋之问、武平一、杜审言、沈佺期、阎朝隐为直学士。又召徐坚、韦元旦、徐彦伯、刘允济等满员。其后被选者不一。凡天子飨会游豫，唯宰相及学士得从。春幸梨园，并渭水袚除，则赐细柳圈辟疠；夏宴蒲萄园，赐朱樱；秋登慈恩浮图，献菊花酒称寿；冬幸新丰，历白鹿观，上骊山，赐浴汤池，给香粉兰泽，从行给翔麟马，品官黄衣各一。帝有所感即赋诗，学士皆属和，当时人所歆慕。然皆狎猥佻佞，忘君臣礼法，惟以文华取幸。"多谢这段记载，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君主以文学粉饰盛时，文人以文华取幸。由叔世的宫体诗到盛时的奉和应制之作，显有历史线索可寻。在这些文人中，除沈、宋而外，徐坚(659—729)、刘子玄(661—721)是渊博的学者。徐撰《初学记》，在唐人类书中，博不及欧阳询(557—641)《艺文类聚》，精胜于虞世南(558—638)《北堂书钞》、白居易《白孔六帖》。刘本名知几，著《史通》，为史学杰作，论者推为载笔之法家、著书之监史。其他如李峤、杜审言、宗楚客、薛稷等则都能诗，而以李峤、杜审言为著。李峤、苏味道、崔融、杜审言被称为"文章四友"。李峤(644—713)最工"咏物诗"，凡日月、风云、河海、田宅、典籍、音乐、文具、武器以及银钱、布帛、饮食、被服、舟车、器用、飞潜、动植各类物事都有题咏，都是五

律，共存一百三四十首之多（据《全唐诗》）。大约因为当时这种诗体还算新起，他才用这种诗体作咏物的尝试，他就成了唐代第一个咏物诗人。杜审言（647—715）是一个恃才傲世的狂士。《新唐书·文艺传》本传云："苏味道为天官侍郎，审言集判，出谓人曰：'味道必死。'人惊问故，答曰：'彼见吾判，且羞死。'又尝语人曰：'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又云："审言病甚，宋之问、武平一等省候何如，答曰：'甚为造化小儿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厌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见替人。'"他临死还不失掉矜诞的风趣。所作亦颇有风趣，今录二首：

> 今年游寓独游秦，愁思看春不当春。上林苑里花徒发，细柳营前叶漫新。公子南桥应尽兴，将军西第几留宾。寄语洛城风日道，明年春色倍还人。（《春日京中有怀》）
>
> 知君书记本翩翩，为许从戎赴朔边。红粉楼中应计日，燕支山下莫经年。（《赠苏绾书记》）

说也奇怪，在这文学沿袭江左余风的时候，有几个隐逸方外的诗人偏能别具一格，突破"当时体"的范围。前已提及的王绩和现在要说到的王梵志、寒山子，就是如此。倘若王梵志真是生于隋文帝时候（590—660?）（《太平广记》八十二），"寒山子"真是贞观中天台广兴县僧（《四库提要》一百四十九），那么，他们约和王绩（584—644）同时。王绩的思想属于老庄一派，他们的思想属于佛家一派。王绩是《隐逸传》中的人物，好饮酒，既作《醉乡记》、《无心子传》、《五斗先生传》，又著《酒经》、《酒谱》，当时李淳风称他为"酒家南董"。他常把《周易》、《老》、《庄》放在床头，而大胆说出"礼乐囚姬旦，诗书缚孔丘"的话，作有许多近于白话的诗，而又不伤雅正。

> 此日长昏饮，非关养性灵。眼看人尽醉，何忍独为醒！（《题酒店壁》）
>
> 北场芸藿罢，东皋刈麦归。相逢秋月满，更值夜萤飞。

（《秋夜喜遇王处士》）

问春桂："桃李正芳华。年光随处满，何事独无花？"

春桂答："春华讵能久？风霜摇落时，独秀君知否？"（《春桂问答二首》）

无疑的，王绩的人格和诗格都深受陶潜的影响。今存《东皋子集》三卷。

王梵志，卫州黎阳人，相传他是林檎树上瘿里生出来的。其诗久逸，近来才从敦煌石室发现几个写本，伯希和（Pelliot）拿去藏在巴黎图书馆。刘复《敦煌掇琐》中抄录《王梵志诗》一卷。这里选录他几首较好的诗：

吾有十亩田，种在南山坡。青松四五树，绿豆两三窠。热即池中浴，凉便岸上歌。遨游自取足，谁能奈我何！

草屋足风尘，床无破毡卧。客来且唤入，地铺稿荐坐。家里元无炭，柳麻且吹火。白酒瓦钵藏，铛子两脚破。鹿脯三四条，石盐五六课。看客只宁馨，从你痛杀我。

世无百年人，强作千年调。打铁作门限，鬼见拍手笑。

养儿从小打，莫道怜不答。长大欺父母，后悔定无疑。

借物索不得，贷钱不肯还。频来论即斗，过在阿谁边。

其他五言四句，都是讽世劝善的白话诗。例如：

他人骑大马，我独跨驴子。回头担柴汉，心下较些子。

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载黄庭坚赏爱王梵志的《翻着袜》一诗，也是五言四句的：

梵志翻着袜，人皆道是错。乍可刺你眼，不可隐我脚。

陈善《扪虱新话》说："知梵志翻着袜法，则可以作文；知九方皋相马法，则可以观人文章。"这话说的有理。

我以为寒山子大概生在初唐、盛唐之际，隐居天台翠屏山，与

国清寺僧拾得、丰干时相往来，大历中还在(《太平广记》五十五)。《续藏经·风穴语录》载寒山诗一首：

> 梵志死去来，魂识见阎老。读破百王书，不免受捶拷。一称南无佛，皆以成佛道。

寒山的诗或许受了王梵志的影响。王绩往往题壁作诗，寒山则于竹木石岩、人家厅壁，处处题诗。现在看他自己怎样自述：

> 五言五百篇，七字七十九，三字三十一，都来六百首。一例书岩石，自夸云好手。若能会我诗，真是如来母。

他自夸好手，颇有风趣。他怎样作诗的呢？

> 有个王秀才，笑我诗多失。云不识蜂腰，仍不会鹤膝。平侧不解压，凡言取次出。我笑你作诗，如盲徒咏日。

他不识什么四声八病，他不怕用凡言，他有意的要做不拘格律的白话诗。他也不管读者的反应如何：

> 下愚读我诗，不解却嗤诮。中庸读我诗，思量云甚要。上贤读我诗，把著满面笑。杨修见幼妇，一览便知妙。

他自信会有人知道他的诗之妙处，会有人替他流传。——"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他还自信他的诗具有使人为善向上的效用：

> 凡读我诗者，心中须护净。悭贪继日廉，谄曲登时正。驱遣除恶业，归依受真性。今时得佛身，急急如律令。

这里选录他的几首好诗：

> 出身既扰扰，世事非一状。未能舍流俗，所以相追访。明吊徐五死，今送刘三葬。日日不得闲，为此心凄怆。
>
> 我在村中住，众推无比方。昨日到城下，仍被狗形相。或嫌裤太窄，或说衫少长。撑却鹞子眼，雀儿舞堂堂。
>
> 有人把椿树，唤作白旃檀。学道多沙数，几个得泥丸。弃金却担草，谩他亦自谩。似聚沙一处，成团亦大难。
>
> 欲得安身处，寒山可长保。微风吹幽松，近听声逾好。下

有斑白人，喃喃读黄老。十年归不得，忘却来时道。

这种诗略像禅宗语录，无疑的是受了当时禅宗的影响。语带诙谐而意实严肃，外似平易而内藏机锋，其妙处在此。《寒山子诗附丰干、拾得诗》，有《四部丛刊》本。自晋宋以来，渐有僧人模仿佛典文学中的偈颂而作偈说理、传教、讽人。如鸠摩罗什慧远用偈相问答，禅宗此土第二祖慧可、第六祖慧能也作有近于白语的偈。可是惠休、宝月之流仍作世俗的艳冶之诗。慧能生卒(638—713)恰在王梵志、寒山子间，王梵志、寒山子作出这种非偈非诗的诗体自然不是偶然的奇迹了。

最后要说这一时期的陈子昂(656—698)了。他是梓州射洪人，家世富豪子，他独苦节读书。初为《感遇诗》三十首，京兆司功王适叹谓"此子必为天下文宗"。官至右拾遗、麟台正字。尝上书武后请兴明堂太学，宋祁谓为"荐圭璧于房闼，以脂泽污漫之"。今存《陈拾遗集》十卷，有《四部丛刊》本。韩愈诗云："国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柳宗元亦谓："张说工文章，九龄善比兴，兼备者子昂而已。"张说(667—730)文章典丽宏赡，当时与苏颋(670—727)并称，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号为"燕许大手笔"。今存《张燕公集》二十五卷，有《四部丛刊》本。张九龄(673—740)诗有神味，文亦高雅。今存《曲江集》二十卷，有《四部丛刊》本。燕许、曲江皆为初唐、盛唐之际的人。初唐文士撰碑颂，皆以徐、庾为宗，气调渐劣；富嘉谟、吴少微始以经典为本，称为"富吴体"。到了燕许大手笔，可说达到这一类文体的最高峰了。子昂之文，不逊燕许。所作表序犹沿排偶之习，论事书疏则疏朴近古，无怪韩、柳好像要推他为古文运动的先驱。我最爱读他的《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一首小诗把一瞬间登高望远所得的灵感，所悟宇宙无限、人生有涯的大道理写出来，真是神来之笔。

综观初唐百年间文学，一面沿习了六朝浮靡的余习，一面又有一点借复古而革新的倾向。作者辈出，后来居上，唐代文学脱旧创新的机运已经酝酿到了快要成熟的时候了。

第三章　盛唐诗人

所谓盛唐，应包括玄宗、肃宗至代宗的一个时期(约自 710—780)。太宗已有“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的豪语，实则到了玄宗才是唐代国力达到最高峰的一个时期，同时也是中国文化自周、汉以后发展到最高的一个时期。就文学说，由初唐四杰、沈、宋、陈子昂、张说诸人，直到盛唐李、杜、王、孟、高、岑诸人，诗格才大变了。这一大变已和初唐作风不同，自然不必说八代。他们算替唐诗开了一个新时代，即就全部诗史说，也开展了一个新时代。倘若我们承认胡适之所说诗经时代为“诗人时代”，那末，这一时代就可算是“第二诗人时代”了。

略依作者生卒先后，就从王、孟说起吧。

孟浩然(689—740)，襄阳人。少好节义，喜振人患难，隐鹿门山。年四十余乃游京师，张九龄、王维雅称道之。九龄为荆州，辟置于府，府罢，开元末病疽背卒，年五十二。初，王维过郢州，画浩然像于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郑诚谓贤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亭”。皮日休《郢州孟亭记》谓“明皇世，章句之风大得建安体，论者推李翰林、杜工部为尤，介其间能不愧者，浩然也”。浩然一生风流潇洒，不汲汲于仕进。所以李白《赠孟浩然》诗云：“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他自己的诗中也说：

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岁暮归南山》)。

拂衣何处去？高枕南山南。欲徇五斗禄，其如七不堪。(《京还赠王维》)

又《自洛之越》诗云：

> 皇皇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扁舟泛湖海，长揖谢公卿。且乐杯中物，谁论世上名。

他好与隐者、道士、上人法师来往，幽栖生活是他最好的题材。颇多关于"谈玄"、"高论"、"悟道"、"忘机"之作。如云："会理知无我，观空厌有形。""坐听闲猿啸，弥清尘外心。"能引读者于其欣赏的瞬间忘其自我，而与作者同入翛然尘外的一种境界。又云："我爱陶家趣，林园无俗情。"可见他曾受了陶潜的影响，不过更饶禅机妙悟。又云："书取幽栖事，将寻静者论。""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他似乎只许王维为知音。总之不是悟道的静者不易领会他的诗趣。王士祯欣赏其富有神韵之作，这位阔诗人也算是他的异代知音罢。今存《孟浩然集》四卷，有《四部丛刊》本。

王维(699－759)，字摩诘，太原祁人。九岁知属辞。与弟缙齐名。开元初擢进士，调太乐丞，累迁给事中。天宝末，安禄山陷两都，维为贼得，迎置洛阳，迫以伪署。禄山大宴凝碧池，召梨园诸工会乐。维悲恻赋诗云："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贼平，维以《凝碧池》诗闻于行在，特宥之。责授太子中允，官至尚书右丞，卒年六十一。维工草隶，善音乐。弟兄皆笃志奉佛，食不荤血，衣不文彩。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谭为乐。斋中唯有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妻亡无子，孤居三十年。别墅在辋川，地奇胜，与道友裴迪往来其间，弹琴赋诗为乐。尝聚其田园所为诗，号《辋川集》。母亡，表辋川第为寺，终葬其西。今存《王右丞集》二十八卷，附录二卷。王维是一个多方面的艺术家。他的生活兼都市、山林而有之，不但与幽栖人物、名医道友相来往，兼为豪英贵人虚左以迎。虽然他的诗格和孟浩然相近，王孟并称，实则他的题材较孟丰富，体裁较孟多样，情趣较孟深厚，有时禅味也较孟更浓。他的诗多为诸王

座上乐章，不止《渭城曲》一首。他的画思固然入神，而诗思也像画思，不过诗为有声之画，画乃无声之诗而已。如诗句云："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山中一半雨，树杪百重泉。""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都是诗中有画的名句。又如：

苍茫葭菼外，云水与昭丘，樯带城乌去，江连暮雨愁。(《送贺遂员外外甥》)

日隐桑柘外，河明闾井间。牧童望村去，猎犬随人还。(《淇上田园即事》)

前一诗不是很鲜明的一幅荆门秋色的画面吗？后一诗不是很活现的一幅北方田野的景象吗？再如：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使至塞上》)

这几句诗给人以边塞荒凉的深刻印象。把捉物象要点，而以单纯有力的手法描绘之，同时以瞬间涌现的情思移入之，真只有观察独到、精思入神的艺术家才能如此。又王维的诗常用"静"字、"闲"字。有时一诗中二字同用。如云"洒空深巷静，积素广庭闲"(《冬晚对雪》)，以及"闭门画方静"，"闲居日清静"等是。唯其能闲能静才能察物工画，审音精乐，独坐耽禅。今录五律二首：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终南别业》)

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酬张少府》)

再录五绝二首：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竹里馆》)

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芳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送别》）

他的五绝似较五律更好。写来不费力，却是由静中妙悟得来的，言外暗示透出的。这是诗趣，也是禅趣。诗家三昧在此，禅家三昧也在此。

与王、孟同时而作风略近，又见于王维诗题里的诗人，有裴迪、祖咏、丘为、储光羲、綦毋潜等，而以储光羲为著。储为兖州人，与崔国辅、綦毋潜、祖咏、崔颢、常建同为开元进士，官至监察御史，天宝末任伪官贬死。今存《储光羲诗集》五卷。殷璠《河岳英灵集》称其诗“削尽常言，得浩然之气”。农樵渔牧是他常用的题材，质朴古淡略近陶诗，略嫌道尽而少余味。例如《田家即事》一诗倘截去首尾六句岂不更佳？

（蒲叶日已长，杏花日已滋。老农要看此，贵不违天时。）迎晨起饭牛，双驾耕东菑。蚯蚓土中出，田乌随我飞。群合乱啄噪，嗷嗷如道饥。我心多恻隐，顾此两伤悲。拨食与田乌，日暮空筐归。（亲戚更相诮，我心终不移。）

常建，字里均无可考，但知其尝为盱眙尉而已。《河岳英灵集》录肃代间二十四人，以建冠首，序中称许其“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诸句。今存《常建诗集》三卷。录其五律《破山寺后禅院》一首：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山林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惟闻钟磬音。

欧阳修《题青州山斋》极赏此诗，谓欲效其语，久不可得。企慕古人，固是常事。至若李白之推许同时人崔颢《黄鹤楼》一诗，则尤为虚心服善，不可多得了。

崔颢（？—754），汴州人。有文无行，好蒱博饮酒。及游京师，娶妻惟择美者，稍不惬意即去之，前后凡四五娶（稍后秦系亦以出妻获谤）。累官司勋员外郎。他以《黄鹤楼》一诗而享盛名：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州。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沈德潜谓此诗“意得象先，神行语外，纵笔写去，遂擅千古之奇”。相传李白的《鹦鹉洲》、《登金陵凤凰台》二诗为求效崔颢此诗而作。

李白（701－762），字太白，汉陇西人李广之后，梁武昭王暠九世孙。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碎叶（今新疆焉耆）。神龙初（705）遁还，客巴西。白生于西域，母为蛮婆。（《四川总志》说龙安府平武县有蛮婆渡，相传李白母浣纱于此。）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名。后为任城尉，因家焉。白自述“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上安州裴长史书》），“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又说：“昔与邑人东岩子隐于岷山之阳。白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因举二人以有道，并不起，此则白养高忘机不屈之迹。”王琦《李太白年谱》说：“白性倜傥，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尝手刃数人；轻财重施，不事产业。”可知李白五岁到二十岁左右是他读书修养、任侠仗义的时期。二十五岁左右到四十岁左右，他就“仗剑去国，辞亲远游”，“遍干诸侯”，“历抵乡相”了。据他自己说：“南穷苍梧，东涉溟海，见乡人相如大夸云梦之事，云楚有七泽，遂乃观焉。而许相公家见招，妻以孙女，憩迹于此，至移三霜焉。”又说：“酒隐安陆，蹉跎十年。”（《上安州裴长史书》、《上安州李长史书》）大约他在楚汉的时期颇久，其间曾南泛洞庭，东至金陵、维扬，又曾至山东、河南、太原等处。在山东时，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居徂徕山，日沉饮，号“竹溪六逸”。天宝初，南入会稽，与吴筠善，筠被召，故亦同至长安。那时李白已四十多岁了。白到长安后，玄宗召见金銮殿，论当世事，奏颂一篇。帝赐食，亲为调羹。有诏供奉翰林，白犹与饮徒醉于市。帝坐沈香亭子，意有所感，欲得召白为乐章；召入而白已

醉，左右以水洒面，稍解，援笔成文，婉丽精切，无留思。帝爱其才，数宴见。白尝侍帝，醉，使高力士脱靴。力士素贵，耻之。擿其诗以激杨贵妃。帝欲官白，妃辄阻止。白自知不为亲近所容，益骜放不自修。与贺知章、李适之、汝阳王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酒八仙人"。恳求还山，帝赐金放还。于是就从祖陈留采访大使彦允，请北海高天师授道箓于齐州紫极宫。自是浮游四方，北抵赵、魏、燕、晋；西涉邠岐，历商于至洛阳；南游淮泗，再入会稽。而家寓鲁中，故时来往齐鲁间，前后十年中，惟游梁、宋最久。这是李白四十多岁到五十多岁的事。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白转侧宿松、匡庐间。永王璘为江淮兵马都督扬州节度大使，白在宣州谒见，遂辟从事。永王璘谋乱兵败，白坐长流夜郎。后遇赦得还，往依当涂令李阳冰。白晚好黄老，度牛渚矶至姑孰，悦谢家青山，欲终焉。及卒，葬东麓，年六十二。元和末，宣歙观察使范传正以白志在青山，为改葬，立二碑焉。有《李太白集》三十卷，清王琦集注本，别为附录六卷。

李白论诗，排斥六朝，昌言复古。如云："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玄古，垂衣贵清真。"又云："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古风》五十九首之一）又云："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孟棨本事诗》）他似以全力制作乐府古体，不甚措意于当时的律诗。偶作七律，存者不多。五律虽称逸品，亦以长古体单行之气，运于声调偶俪之中。李阳冰的《李白草堂集序》说："自三代已来，风骚之后，驰驱屈宋，鞭挞扬马，千载独步，唯公一人。故王公趋风，列岳结轨，群贤翕习，如鸟归凤。"卢藏用云："陈拾遗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质文，翕然一变。至今国朝诗体尚有梁、陈宫掖之风，至公大变，扫地并尽，今古文集遏而不行，唯公文章横被六合，可谓力敌造化欤！"我们可以知道李白不但自己有革新诗体的宏愿，即从他同时的人

看来,他也是一个风靡一世的诗体革命者。我以为他倡诗体革命正和后来韩愈倡文体革命一样,同是迎合一般人好古的心理而昌言复古,其实同是以革命者的精神而从事创作。皮日休说李白不求古于建安江左,不求丽于江左南朝(《刘枣强碑文》),正是指李白的创作精神而说的。李白的诗虽多用乐府古辞旧题,却不甚拘于原有意思,也不拘于原有声调形式,乃是为自己发抒胸臆而作的新诗,和其他的五言七言歌行一样。从来诗人摹拟乐府的作品大都只能算是一种戏作,其根柢全置于作者自身的经验而唱出由作者内心所发的声音,绝不多见。到了李白,却能充分把自己肺腑中间潜流或澎涨的情感思想借着乐府而自然地歌唱出来。他真是基于自己生活的经验而发挥内在的真理之抒情诗人啊!录诗二首:

> 日出东方隈,似从地底来。历天又入海,六龙所舍安在哉?其始与终古不息,人非元气安得与之久徘徊!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羲和、羲和,汝奚汩没于荒淫之波?鲁阳何德,驻景挥戈。逆道违天,矫诬实多。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日出入行》)

>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邱生,将进酒,君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钟鼓馔玉何足贵,但愿长醉不用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酒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将进酒》)

《日出入行》一诗可见他的自然主义的人生观,同时亦可见其与天地万物精神往来的一种超脱境界。《将进酒》一诗可见他找寻

刺激、贪图瞬间享乐的颓废生活。刘昫说他“少有逸才，志气宏放，飘然有超世之心”。这是不错的。所谓逸才，是说他有迥异寻常的天才。天才本是先天的。加以当他出生时，其母长庚入梦，名他为白，而字太白。后来又有人称他“谪仙”。这都给他以非常人的暗示。他的诗里说：“天上白玉京，十二楼五重，仙人抚我顶，结发受长生。”难怪他以不同凡人的仙侣自命了。何况他少年养高学道，受有道家（不如说神仙家）的影响，这就是他诗中超自然的神仙思想的来源罢。所谓志气宏放，也因才大而志益大。未得志时则羡慕游侠，如说：“燕南壮士吴门豪，筑中置铅鱼隐刀。感君恩重许君命，太山一掷轻鸿毛。”（《结袜子》）又说：“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侠客行》）得志时则享乐富贵，如说：“承恩初入银台门，著书独在金銮殿。龙钩雕镫白玉鞍，象床绮席黄金盘。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何况游侠总是容易接近富贵的。如说：“君不见淮南少年游侠客，白日球猎夜拥掷，呼卢百万终不惜，报仇十里如咫尺。少年游侠好经过，浑身装束皆绮罗。兰蕙相随喧妓女，风光去处满笙歌。骄矜自言不可有，侠士堂中养来久。好鞍好马乞与人，十千五千旋沽酒。赤心用尽为知己，黄金不惜栽桃李。桃李栽来几度春，一回花落一回新。府县尽为门下客，王侯皆是平交人。”（《少年行》）从他诗中可见其超人超凡庸的游侠富贵思想。然而神仙不可求，富贵不可保，失志之余，不免露出厌世思想，颓废气氛，还是超世主义的一贯。所谓超世的意义当如此。他这种超世的思想和态度移在作风上也有超现实的倾向，往往用象征的手法，暗示的力量，美化当前的现实。杜甫诗说：“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似就李白超世的人格和作风说的。又一诗说：“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狂人、罪犯、天才，只是一个心理变态或精神异常者的人格的多方面，杜甫可说是最能知道李白的吧。李白于诗几乎无体不工，但我

最爱读他的七言歌行《江上吟》、《庐山谣》、《梦游天姥吟》、《灞陵行》、《宣州谢朓楼饯别》、《把酒问月》诸篇，真有鞭打山岳，驱走风霆的气魄。同时也最爱读他的五七言绝句，真是语近情遥，使人神远。虽是小诗吧，他却用其生命的全力把瞬间的灵感呈现出来，又并不像故意去努力，只像在一种不得不然的状态里，而已见其抒情的紧张、兴会的深远，这真是抒情诗人入神的妙技呵！有唐一代，只有王维的五绝、王昌龄的七绝差可和他比肩，余人均有不及。他和王昌龄是朋友，有诗(《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为证：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

王昌龄，字少伯，江宁人。开元间进士，又中宏辞。曾为汜水尉。不护细行，贬龙标尉。以世乱还乡里，为刺吏阎晓丘所杀。李攀龙推他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一诗为唐代七绝压卷之作。王士祯以为未允，必求压卷，则李白的"朝辞白帝"，王维的"渭城"，王之涣的"黄河远上"和昌龄的"奉帚平明"皆可，而终唐之世，绝句亦无出四章之右者。我们要知道足以使王昌龄诗名不朽的即在他那将近百首的绝句(《据《全唐诗》)，称他为"诗天子"的也在此。从来批评者论到七绝大都是把他和李白并称的。

当李白十二岁的时候，又有一个伟大的诗人诞生，这便是杜甫。

杜甫(712—770)，字子美，晋杜预之后。本籍襄阳，曾祖依艺为河南巩县令，徙居于此。祖审言，前已说过。父闲，终奉天令。母崔氏。甫幼多病，家贫好学。他的《壮游》诗云："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尚)魏(启心)徒，以我似班杨。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在作成一囊。"可见他幼年夙慧。二十岁左右，他就开始漫游。《哭韦之晋》诗云："凄怆郇瑕邑，差池弱冠年。"大约游

晋之后，又为吴越之游。归赴长安，举进士不第。《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云："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可见其少年时代的气概。又《壮游》诗云："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邱旁。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冈。射飞曾纵鞚，引臂落鹙鸧。苏侯(预)据鞍喜，忽如携葛强。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下第之后，遨游齐、赵间，过了八九年的快意生活，又到长安，他已是三十五岁左右的人了。《壮游》诗又云："许与必词伯，赏游实贤王。曳裾置醴地，奏赋入明光。天子废食召，群公会轩裳。脱身无所爱，痛饮信行藏。黑貂不免敝，斑鬓兀称觞。杜曲换耆旧，四郊多白杨。坐深乡党敬，日觉死生忙。朱门任倾夺，赤族迭罹殃。国马竭粟豆，官鸡输稻粱。举隅见烦费，引古惜兴亡。"又《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云："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可见他在长安时，虽声名渐盛，而生活潦倒。同时国事渐坏，已露衰危之象。他在长安四五年间，先后进《献雕赋》、《三大礼赋》、《封西岳赋》，高自称道。且言"先臣恕预以来，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审言以文章显中宗时。臣赖绪业，自七岁属辞且四十年，然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窃恐转死沟壑，伏惟天子哀怜之。若令执先臣故事，拔泥涂之久辱，则臣之述作虽不足鼓吹六经，至沉郁顿挫，随时敏给，杨雄、枚皋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弃之"！自待制集贤院，授河西尉不拜，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但他仍不能养家。他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诗中云："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可见他虽做了一个小京官，儿子却已饿死了。同时又云："凌晨过骊

山，御榻在嵽嵲。蚩尤塞寒空，蹴蹋崖谷滑。瑶池气郁律，羽林相摩戛。君臣留欢娱，乐动殷樛嶱。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中堂舞神仙，烟雾散玉质。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他因过骊山而叹君臣欢娱，忧其荒淫兆乱。此诗作于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果然，安禄山就在这年冬叛乱了。肃宗立，他自鄜州欲奔行在，遂陷贼中。他的《哀王孙》、《哀江头》等名篇，皆为此时作品。次年亡走凤翔，上谒，拜左拾遗。房琯以讨贼兵败罢相，他上疏言罪细不宜免大臣，几至获罪，放还鄜州。他的杰作之一《北征》诗云："潼关百万师，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残害为异物。况我堕胡尘，及归尽华发。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见爷背面啼，垢腻脚不袜。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海图坼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老夫情怀恶，呕泄卧数日。那无囊中帛，救汝寒凛栗。粉黛亦解包，衾裯稍罗列。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问事竞挽须，谁能即瞋喝。翻思在贼愁，甘受杂乱聒。新归且慰意，生理焉得说。"他由乱离中逃到家来，一时悲喜交集的情状都活描出来了。此时官军虽收两京，而贼犹充斥。他的"三吏"(《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诸名篇皆此期间所作。他从驾还京师，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关辅饥，寓居成州同谷县，自己负薪采橡栗自给。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写他的艰苦生活最深挚、最沉痛。(后来文天祥、汪元量、王天之、郑燮都有仿作。)这个时候他已五十岁，李白已死了。严武镇成都，奏为节度参谋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他于

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结庐枕江，纵酒啸咏，与田夫野老相狎，荡无拘检。严武死后，他经渝州到夔州，居之。《诸将》、《秋兴》、《咏怀古迹》诸名篇皆此期间所作。大历三年(768)离夔州，出峡，至岳州。四年至潭州，登衡山。五年到耒阳，死于寓次，旅殡岳阳，年五十九。注杜诗者号称千家，以清仇兆鳌《杜诗详注》为最流行。又《杜诗镜诠》也好。

杜甫是屈原以后第一个被推崇的诗人，元稹谓其“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宋祁亦以为“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都似乎有推崇杜甫为集古今诗人之大成的意思。又黄庭坚推他为诗中之“史”，杨万里推他为诗中之“圣”，王世贞则推为诗中之“神”。宋荦说：“七言古诗上下千百言，定当推少陵为第一，盖天地元气之奥至少陵而尽发之，允为集大成之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要算王世贞诗神之说，推崇杜甫到了极点了。诋毁杜甫的人就很少，只有杨亿诋杜为“村夫子”，王慎中也曾严驳杜诗，都没有什么影响。至李、杜优劣之说，则始于中唐元、白诸人。元稹说：“诗人已来，未有如子美者。时山东人李白亦以文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予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摸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白居易也说：“李白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今古，覙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元白极推崇杜的长律，而白更推崇杜诗的讽谕，都不免抑李扬杜。当时韩愈有诗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他以平等的眼光看李、杜，所以对于当时的李、杜优劣论者就不免诃斥了。

我们虽不必用个人的趣味来评骘李、杜的优劣，但从艺术的观点来辨别他们的差异，却是可以的。最好先看李、杜当日彼此间的互相批评。相传李白有《戏赠杜甫》的一诗道：

　　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因何太瘦生，只为从前作诗苦。

李白眼中的杜甫只是一个态度严肃而认真的苦吟诗人。所以《旧唐书·杜甫传》中说："白自负文格放达，讥甫龌龊，而有饭颗山之嘲诮。"杜甫也有《赠李白》的一首诗道：

　　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杜甫眼中的李白则是一个态度超脱而豪放的狂歌诗人。再从李、杜诗文选摘可以作为他们自己表白的诗句：

李白："嵚奇历落可笑人。"(《上安州李长史书》)

杜甫："乾坤一腐儒。"(《江汉》)

李白："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杜甫："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李白："巨鳌莫戴三山去，我欲蓬莱顶上行。"(《怀仙歌》)

杜甫："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咏怀》)

可见一个肯自命为狂者，一个不讳言为腐儒。一个抱超世主义，源于道家思想；一个抱淑世主义，源于儒家思想。一个幻想超升仙境，一个不忍离开君国。总之，他们的作品都是他们自己生命纯真的表白，这里不过略为举例比较而已。再看他们怎样论诗吧！

李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放流夜郎书怀》)

杜甫："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

李白："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江上吟》)

杜甫："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醉时歌》)

大抵李、杜于诗的手法上，一个侧重自然，一个侧重雕饰。风格上一个豪放飘逸，一个沉郁顿挫。各有各的价值，各有各的生命。我们还该知道李白是主观主义的诗人，以个人的情绪为对象，长于抒情。杜甫是客观主义的诗人，以外物的真实为对象，长于写实。李诗偏于造境，是想象的境界，超于现实的境界。杜甫偏于写境，是经验的境界，囿于现实的境界。李、杜都能在诗坛上开拓一个大境界，成为势均力敌的两大家。虽同生一个时代，却因通过了各自不同的人生观与艺术观，各人诗中所反映出来的时代就觉两样了。

杜甫于天宝以后，颇多描写乱离之作。他那种客观的写实诗，就是这个时代诗人的伟大收获。自个人的身边琐屑以至天下国家的大事，无一不可为他的题材。杜诗所以被称为诗史，就在这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自宋人倡诗史之说，而笺杜诗者遂以刘昫、宋祁二书据为稿本，一字一句，务使与纪传相符。夫忠君爱国，君子之心；感事忧时，风人之旨。杜诗所以高于诸家者，固在于是，然集中根本不过数十首耳。咏月而以为比肃宗，咏萤而以为比李辅国，则诗家无景物矣。谓纨绔下服为小人，谓儒冠上服为君子，则诗家无字句矣。"我想注李诗的只有宋杨齐贤、元萧士赟、明胡震亨、清王琦四五家，而注杜诗的号称千家，何能保住他们不说些穿凿傅会的话？杜甫就真由他们派作腐儒了。李白毕竟是一个不可捉摸的伟大天才，不幸在生没有几个人了解他，幸而死后少有人误注误笺他的作品。

现在要说到和李、杜同时高、岑诸家了。

高适(695？—765)，字达夫，渤海人。少濩落不事生产。家贫，客于梁宋，以求丐取给。天宝中，海内事干进者注意文词。适年过五十始留意诗什。数年之间，体格渐变，以气质自高。每吟一篇已，为好事者称诵。初举有道科，为封丘尉。河西节度使哥舒翰表为书

记。安禄山之叛，潼关失守，适奔赴行在，擢谏议大夫，历迁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代宗即位，御吐蕃无功，召还为刑部侍郎，转散骑常侍，进封渤海县侯。开元、天宝间，诗人封侯者惟高适一人。今存《高常侍集》八卷，有《四部丛刊》本。他的诗工七言古体。杜甫每以高适、李白并称。如《遣怀》云："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芒砀云一去，雁鹜空相呼。"可见当日他们三人的豪情逸兴。就诗而论，高在李杜之间只算蜂腰。高的一生由乞丐而诗人而达官，生活不为不丰富，可是真正富有生命之力的作品实在不多。本来他是一个热心功名的豪杰，注意文词也不过作为干进之具而已。送别诸作却多壮语，我最爱"别恨随流水，交情脱宝刀"，"白云劝尽杯中物，明月相随何处眠"，"意气能甘万里去，辛勤判作一年行"诸句。《别董大》也很好。诗云：

> 十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岑参(715？—770？)，南阳人。少孤贫笃学。登天宝中进士第，由右率府兵曹参军累官安西节度判官，入为右补阙，又出为虢州长史。代宗总戎西服时，委以书奏之任。由库部郎出刺嘉州。杜鸿渐镇西川，表为从事，以职方郎兼侍御史，领幕职。使罢，流寓不还，遂终于蜀。所著《岑嘉州诗》七卷，有《四部丛刊》本。参诗多写边塞壮境奇景，故多壮辞奇语。每一篇出，人人传写。虽闾里士庶，戎夷蛮貊，莫不讽诵。他与高适为友，同样热心功名。例如《银山碛西馆》：

> 银山碛口风似箭，铁门关西月如练。双双愁泪沾马尾，飒飒胡沙迸人面。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

可见其意气之一斑。他们两人的诗，说及边塞战事，大都精神百倍，不像别的诗人仅含非战思想。高、岑并称，在这一点上不是偶然的。王、孟多写田园山水，高、岑爱写边塞风光。王、孟所写自然界的美是优美，高、岑所写自然界的美是壮美。读王、孟诗生隐逸的思想，

读高、岑诗起功名的念头。再举高、岑两人的诗为例：

积雪与天迥，屯军连塞愁。谁知此行迈，不为觅封侯！（高适《送兵到蓟北》）

来亦一布衣，去亦一布衣。羞见关城吏，还从旧路归。（岑参《戏题关门》）

泉喷诸戎血，风驱死虏魂。头飞攒万戟，面缚聚辕门。（高适《同李员外贺哥舒大夫破九曲之作》）

日落辕门鼓角鸣，千群面缚出蕃城。洗兵鱼海云迎阵，秣马龙堆月照营。（岑参《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

总之，高、岑在当日都是欢喜为自己民族而歌唱的诗人，足以代表盛唐诗人的民族意识。

李颀，与高适、王昌龄、王维、崔颢诸人为友，而生卒年不可考。他是东川人，家于颍阳，开元中进士，官新乡尉。所作以七言诗为最工。明代嘉隆诸子及晚清王闿运都奉为圭臬。今录其诗两首：

主人有酒欢今夕，请奏鸣琴广陵客。月照城头乌半飞，霜凄万木风入衣。铜炉华烛烛增辉，初弹“渌水”后“楚妃”。一声已动物皆静，四座无言星欲稀。清淮奉使千余里，敢告云山从此始。（《琴歌送别》）

朝闻游子唱离歌，昨夜微霜初渡河。鸿雁不堪愁里听，云山况是客中过。关城树色催寒近，御苑砧声向晚多。莫见长安行乐处，空令岁月易蹉跎。（《送魏万之京》）

还有刘长卿是开元末进士，韦应物当玄宗时为三卫郎，钱起是天宝十年进士第一人，郎士元是天宝末进士，他们的文学活动大都在大历年代。他们算是介于盛唐、中唐之间的诗人，不妨叙述于此。

刘长卿，字文房，河间人，一说宣城人。官至随州刺史。为人刚怼多忤，诗工五言，权德舆称为“五言长城”。皇甫湜尝讥人云：“诗未有刘长卿一句，已呼阮籍为老兵。语未有骆宾王一字，已呼宋玉

为罪人。"其为人推重如此。今举两首为例：

> 昔贤怀一饭，兹事已千秋。古墓樵人识，前朝楚水流。渚蘋行客荐，山木杜鹃愁。春草茫茫绿，王孙旧此游。（《经漂母墓》）

> 春风倚棹阖闾城，水国春寒阴复晴。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日斜江水孤帆影，草绿湖南万里晴。东道若逢相识问，青袍今已误儒生。（《别严士元》）

刘长卿的诗，意深不露，而有高秀之韵，这是他所以异于人处。今存《刘随州集》十卷，外集一卷，有《四部丛刊》本。

韦应物，长安人，官至左司郎中，苏州刺史。性高洁，鲜食寡欲，所在焚香扫地而坐。唯刘长卿、顾况、秦系、丹丘、皎然之俦，得厕宾客，与之酬唱。年在九十以上，不知其所终。所著《韦苏州集》十卷，附录一卷，有《四部丛刊》本。其《逢杨开府》一诗云："少事武皇帝。无赖恃恩私，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朝持樗蒱局，暮窃东邻姬。司隶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骊山风雪夜，长杨羽猎时。一字都不识，饮酒肆顽痴。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读书事已晚，把笔学题诗。两府始收敛，南宫谬见推。非才果不容，出守抚惸嫠。忽逢杨开府，论旧涕俱垂。坐客何由识？惟有故人知。"这可算是他一生的速写。少壮时候，只是一个无赖的宿卫武士，中年以后才因受侮辱而发愤读书，晚年因不得志而便甘淡泊。他有诗句说："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这样，他就有"效陶体"的诗，有和陶相近的人格与作风。朱熹就说他"无一字造作，气象近道"了。录《寄全椒山中道士》诗一首：

> 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欲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

他有《答故人见谕》诗，说是"时风重书札，物情敦货遗。机杼十缣单，慵疏百函愧。尝负交亲责，且为一官累"。官场腐败至此！他是

一个高洁的人，当然要看不惯了。

钱起，字仲文，吴兴人，官至尚书考功郎中。郎士元，字君胄，中山人，官至郢州刺史，《全唐诗》录其诗一卷。当日自丞相以下，出使作牧，钱、郎若无诗祖饯，即为时论所鄙。时人语曰，“前有沈、宋，后有钱、郎”。又合刘长卿、李嘉祐并称为“钱、郎、刘、李”。今录钱、郎“祖饯诗”各一首：

> 楚乡飞鸟外，独与片帆还。破锦催归客，残阳见旧山。诗成流水上，梦尽落花间。倘寄相思字，愁人定解颜。（钱起《送夏侯审校书东归》）
>
> 双旌汉飞将，万里独横戈。春色临关尽，黄云出塞多。鼓鼙悲绝漠，烽戍隔长河。想到阴山北，天骄已请和。（郎士元《送李将军赴邓州》[沈德潜疑邓州原为定州]）

《钱考功集》十卷，有《四部丛刊》本。其古体诗皆称“往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大历以还，诗格初变，开、宝浑厚之气渐远渐漓，风调相高，稍趋浮响，升降之关，十才子实为之职志，起与郎士元其称首也。然温秀蕴藉，不失风人之旨，前辈典型犹有存焉。”明七子倡言诗必盛唐，不读大历以后书，似未免为偏见。钱起与卢纶、吉中孚、韩翃、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夏侯审、李端为“大历十才子”（《新唐书》）。十才子之说不一，郎士元、刘长卿、李嘉祐、李益、冷朝阳、皇甫曾、皇甫冉诸子，都有人各依自己的意见加减进去的。所谓十才子，如苗、吉、夏侯、崔、耿几个人存诗都不多，也不尽见其才，盛唐文学到了他们，真算强弩之末了。

第四章　中唐诗人

我们要谈到中唐诗人了。

中唐，应该是指德宗、顺宗、宪宗、穆宗到敬宗的一个时期（约780—830），约五十年。这一时期的文学，就诗说，当以韩、白为代表作者；就文说，当以韩、柳为代表作者。无疑的，韩愈是这一时期的大作家。因柳早死，就从柳说起吧：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人。十七岁举进士，二十七岁为监察御史里行。王叔文、韦执谊新贵用事，引他为朋党，擢礼部员外郎。俄而叔文失败，他也贬永州司马。同贬的八人，称为"八司马"。宗元少年即精警绝伦，为文雄深雅健。既贬窜荒僻之地，因自放于山水间。抑郁感愤皆发于文章，因《天问》而作《天对》，仿《骚》数十篇，读者为之悲恻。元和七年移柳州刺史，十四年卒，年四十七。《唐柳先生文集》四十八卷，有《四部丛刊》本。论其文，则韩柳并称，将于另章评述。论其诗，则韦柳并称，因为同是学陶的。其实，柳诗一部分在风格上固然受了陶诗影响，在思想上则受佛家的影响也大。他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送巽上人序》）他以永州、柳州清幽奇丽的山水，佛家寂静超妙的情趣，陶诗冲淡自然的风格，熔铸而成一家的诗。

宿云散洲渚，晓日明村坞。高树临清池，风惊夜来雨。予心适无事，偶此成宾主。（《雨后晓行独至愚溪北池》）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然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渔翁》）

觉闻繁露坠，开户临西园。寒月上东岭，泠泠疏竹根。石泉远逾响，山鸟时一喧。倚楹遂至旦，寂寞将何言。（《中夜起

望西园值月上》)

他能窥探自然的秘奥,写出物我浑融的境界。不过他究竟是一个好事喜功的志士,一旦被谴为投荒的逐臣,心中的烈火虽骤遭闭熄,而残灰剩烬犹有余温。所以他的诗有时看似平淡怡悦,而深忧至愤不难于言外得之。他自己也说:"嬉笑之怒其乎裂眦,长歌之哀过乎痛哭,庸讵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对贺者》)热烈与冷静,愁苦与怡悦,怨尤与悔悟,愤慨与恬淡,种种极矛盾的情绪错综起伏于他的心中,这真是他精神上的大痛苦。懂得这个,才可以读他的《永州山水记》,同时还可以读他的《囚山赋》。读了他的平静心情、怡悦山水的诗以外,同时更可以了解他怅触无已、情绪亢奋的诗。

海畔尖山似剑芒,秋来处处割愁肠。若为化作身千亿,散向峰头望故乡。(《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

零落残魂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欲知此后相思梦,长在荆门郢树烟。(《别舍弟宗一》)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

他这种诗把孤愤的郁结、愁肠的回荡,很热烈地表现出来,至今我们读了还可想见当时一位忧谗畏讥者的腐心陨涕。人生的苦闷白昼无可排遣,心灵自求安慰,晚上不得不做满足愿望的梦。被遣投荒的柳宗元尽管外貌恬淡,但他忧愤郁结的潜意识却时时冲决意识的藩篱,而不能自已地宣泄于诗篇。所以他虽然在心波平静的时候可以做优游闲淡的诗,如陶潜、王维一样,还可以与不爱官不争能而嗜闲安之浮图游;但他究竟不曾打算做什么高人隐士,乃是被谴责的政治上的失败者。而且他所居之地,不是山水名胜的渠

里、辋川，乃是当时所谓荒烟瘴雨、蛮花犵草的永州、柳州，于是他不得不“时时举首，长吟哀歌，舒泄幽郁”！(《上李中丞书》)这样，能够捕捉自己感情的真影，作为自己的生命的表白，柳诗的不朽在此，何必他求？我以为中唐的诗人仅柳一人可以和韩、白并驾齐驱而无愧色。

韩愈(768—824)，字退之，昌黎人，一说河内河阳人。三岁而孤，兄会嫂郑鞠养之。自知读书，日记数千百言。比长，尽能通六经百家学。擢进士第，官监察御史。上疏极论宫市，德宗怒，贬山阳令。有爱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又历国子博士、史馆修撰等官。裴度宣慰淮西，奏愈为行军司马。淮西平，迁刑部侍郎。宪宗迎佛骨入禁中，愈上表极谏，贬潮州刺史，寻移袁州。在潮除鳄鱼患，在袁禁以男女为隶。召拜国子祭酒，转兵部侍郎。王廷凑乱，召愈宣谕，愈极论顺逆利害，廷凑畏服之。归转吏部侍郎卒，年五十七，谥曰文。所著《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遗文一卷，有《四部丛刊》本。

韩愈以倡散文复古，享不朽之名，将另章详述。就诗而说，他开奇险生涩一派，影响和他同时及后来无数的作家，真是诗坛怪杰。他的诗以七古为最工。喜用僻字险句，喜压剧韵(稍后段成式亦好压穷韵恶韵，其平声好韵不僻者，书竹简，称为韵牒)，也喜描述丑恶(如《元和圣德诗》写刘辟全家就刑的惨状，以及《嘲鼾睡》、《谴疟鬼》等诗)，所以有人说他“以丑为美”。他好使才，不免说尽。有时只是平面的叙述，或大发议论，使诗散文化，即篇章字句的结构都是散文的，所以有人说他“以文为诗”。不过他也有诗趣盎然的作品，《山石》便是一例：

> 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铺床拂席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

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当流赤足踏涧石，水深激激风生衣。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鞿。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

元好问《论诗绝句》云："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有情"二句为秦观诗。不错，秦诗婉弱，韩诗雄健。元好问论诗主张高华，故推崇韩诗。沈德潜云："昌黎从李杜崛起之后，能不相沿袭，别开境界。虽纵横变化不逮李杜，而规模堂庑弥见阔大，洵推豪杰之士。"(《唐诗别裁》)沈论诗主格调，也推崇韩诗。赵翼云："诗至昌黎时，李杜已在前，纵极力变化，终不能再辟一径。惟少陵奇险处尚有可推扩，故一眼觑定，欲从此辟山开道，自成一家，此昌黎注意所在也。然奇险处亦自有得失。盖少陵才思所到，偶然得之，而昌黎则专以此求胜，故时见斧凿痕迹，有心与无心异也。其实昌黎自有本色，仍在文从字顺中自然雄厚博大，不可捉摸，不专以奇险见长。恐昌黎亦不自知，后人平心读之自见。若徒以奇险求昌黎，则失之矣。"(《瓯北诗话》)这段话说得较公允。无奈和韩同时而受他的影响的作家，就只有见韩诗的奇险处，似乎未见韩诗的自然雄厚博大处。

韩门弟子皇甫湜为顾况《华阳集》(今存三卷)作序说："偏于逸歌长句，骏发踔厉，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胁，意外惊人语，非寻常所能及。"可见讽刺诗人顾况也是险怪一派，不过顾况死在韩愈三十岁前，自然未受韩诗的影响。至于孟郊、贾岛、刘乂、卢仝乃至张籍、王建、姚合、李贺诸人，就或多或少受到韩愈的影响，可称为韩派诗人了。

孟郊(751—814)，字东野，湖州武康人，一说洛阳人。年五十始登进士第。有诗云："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可以想见寒士登科后的狂喜。官溧阳尉。韩愈极推重他，荐于兴元尹郑余庆，奏为参谋，未至而卒，年六

十四。张籍私谥曰贞曜先生。所著《孟东野诗集》十卷，有《四部丛刊》本。他是苦吟诗人，思苦奇涩。他自己也说："夜学晓未休，苦吟鬼神愁。如何不自闲，心与身为仇。"（《夜感自遣》）又说："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赠别崔纯亮》）又说："万事有何味，一生虚自囚。"（《冬日》）可以想见其心之深处的悲哀。他的诗好自咏贫苦，又常寄与贫苦大众以无限的同情，有时亦诅咒社会制度的不合理。韩愈常以"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称孟郊，后人就以此称韩愈了。

苏轼说："郊寒岛瘦。"元好问说："郊、岛两诗囚。"又说："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原来孟郊、贾岛同是出身贫苦阶层。郊尝苦寒，恨敲石无火；岛叹鬓丝如雪，不堪织衣。郊、岛并论，由来已久。相传韩愈有诗云："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风云顿觉闲。天恐文章中断绝，再生贾岛在人间。"贾岛（788—843），字浪仙，一作阆仙，初为浮屠，名无本。韩愈有《送无本师归范阳》诗，说是"无本于为文，身大不及胆。吾尝示之难，勇往无不敢"。又说："狂词肆滂葩，低昂见舒惨。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他既从韩愈学为文章，遂返俗。累举不第。文宗时为长江主簿卒，年五十六。我们读了《贾长江集》（十卷，有《四部丛刊》本），知道他常卧病经年累月，幸亏韩愈屡屡送衣食给他。他自比病鹤，所作《病蝉》、《病鹘吟》也是自况。他说："不缘毛羽遭零落，焉肯雄心向尔低。"病鹘也不同凡鸟了。相传他于驴上吟出"鸟宿池中树，僧敲月下门"研究敲推二字，神游诗府，致遭权京尹韩吏部的呵喝，真可说是诗迷。又相传他三年吟了"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二句，自述甘苦道："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他把作品比生命还看得重要，这是何等严肃的创作态度呵！

刘义也是一个大胆的险怪诗人。他有诗句道："酒肠宽似海，诗胆大如天。"又《答孟东野》云："酸寒孟夫子，苦爱老叉诗，生涩有百

篇，谓是琼瑶辞。”他的《冰柱》、《雪车》二诗颇有名，实则生涩怪僻读不上口(据《全唐诗》)，他少时任侠，因酒杀人亡命，逢赦后，从韩愈为学。又因与宾客争论使气，持愈金数斤而去，声言“此谀墓中人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不知所终。他是韩门的子路。

卢仝，范阳人，号玉川子。嗜饮茶，长须赤脚，灌园自资。因宿王涯第，死于甘露之变(835)(王涯、王建，同以词诗有名)。所著《玉川子诗集》二卷，外集一卷，有《四部丛刊》本。韩愈有《寄卢仝》诗，说他“怪辞惊众谤不已”，殆指他的《与马异结交》诗而言。他有《月蚀》诗长一千七八百字，怪辞更多，更蹇涩难读。韩愈的《月蚀》诗似就卢仝原作删改而成。

张籍，字文昌，苏州吴人，历官太祝，国子司业。今存《张司业集》八卷，有《四部丛刊》本。这位病眼诗人长于乐府，多涉及社会问题、劳动问题，如《野老歌》、《筑城曲》等是。白居易称许他，以为“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他有《赠王建》诗云：“白君去后交游少，东野亡来箧笥贫。赖有白头王建在，眼前犹有咏诗人。”可证他受过白、王的影响，同时也受到韩、孟的影响。韩愈赠他的诗道：“今我及数子，固无莸与薰。险语破鬼胆，高词媲皇坟。”(《醉赠张秘书》)又道：“想当施手时，巨刃摩天扬。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硠。”(《调张籍》)王建，字仲初，颍川人，官陕州司马。他也长于乐府，如《田家行》、《水夫谣》等都属于社会问题的诗。他的《寄上韩愈侍郎》诗云：“咏伤松桂青山瘦，取尽珠玑碧海愁。叙述异篇经总核，鞭驱险句最先投。碑文合遣贞魂谢，史笔应令谄骨羞。”他似有意推韩愈为当时险怪诗人的领袖，同时也敬重韩愈的碑传文章。有《王司马集》八卷。

姚合《赠王建司马》云：“文高轻古意，官冷似前资。”《赠张籍太祝》云：“古风无手敌，新语是人知。飞动终由格，功夫过却奇。”张王乐府虽用古题，却想用新语写新意，颇和白居易相近。若论好奇，仍

属韩派。姚合不甚作乐府，作诗则刻意苦吟，力求新奇。姚、贾友善，齐名，都工五律，风格亦相近。姚合，陕州人，宰相姚崇的曾孙。历官武功主簿，秘书少监。以其早作《武功县诗》三十首有名，人称其诗为“武功体”。《姚少监诗集》十卷，有《四部丛刊》本。又撰《极玄集》，录王维至戴叔伦二十一人之诗百篇。他自谓“此诗中射雕手也”。张为作《主客图》，以李益为清奇雅正主，以姚合为入室，其实二人诗格不甚相类。

李益，姑臧人，大历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少痴而忌刻，防闲妻妾苛严，世谓妒为“李益疾”。他最工七绝。沈德潜云：“七言绝句，中唐以李庶子、刘宾客为最，音节神韵可追逐龙标、供奉。”他的诗，时人或以绘图，或以合乐，与宗人李贺齐名。其《夜上受降城闻笛》一绝最为人所传诵。诗云：“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全唐诗》录李益诗二卷。

李贺(791—817)，字长吉，洛阳昌谷人，系出郑王后。七岁能辞章。韩愈、皇甫湜访之，命赋《高轩过》一篇：

> 华裾织翠青如葱，金环压辔摇玲珑，马蹄隐耳声隆隆，入门下马气如虹。云是东京才子，文章钜公，二十八宿罗心胸，元精耿耿贯当中。殿前作赋声摩空，笔补造化天无功。庞眉画客感秋蓬，谁知死草生华风。我今垂翅附冥鸿，他日不羞蛇作龙。

一个总角荷衣的孩子，能作出这样的诗，这还不是奇迹吗？他以父名晋肃，不举进士，韩愈为作《原讳》劝之，卒不就举。仕为奉礼太常，年二十七死。他有两句诗道“病骨伤幽素”(《伤心行》)，“庞眉又苦吟”(《巴童答》)，可以想见这位少年诗人的风裁。旧史载：“贺每旦日出，骑弱马，从小奚奴，背古锦囊，得句即书投囊中，暮归足成之。母郑使婢探囊，见所书多，即怒言：是儿要呕出心血乃已耳。”原来他呕心苦吟，是先吟成了零缣碎锦似的句子，然后缀缉成篇。他的诗险怪而纤美，和卢仝、刘乂的诗险怪而粗陋不同，每于秾丽之

中加以阴暗的色彩，又善写鬼，所以被人称为“鬼才”。所用典故，每多点化其意，牵合其文，如“羲和敲日玻璃声”（《秦王饮酒》），“秋坟鬼唱鲍家诗”（《秋来》），羲和为日驭，鲍照有《蒿里吟》，非必有敲日唱诗事，不过见他联想之妙而已。常人未易有此联想力，读他的诗不免如猜哑谜，自有晦涩之感。他有乐府数十篇，教坊伶官、诸王、妓女都拿去入乐，可证足以投合当时习于宴乐而日趋没落的统治阶层所有颓废而又不免感伤的情调。同时我们要知道作者正是一个已经没落了的王孙。在他死后，遗诗李藩所收者，竟被和他有笔砚之旧的表兄投入溷中。他临命时亲授沈子明者，即今存之《昌谷集》四卷，外集一卷，有《四部丛刊》本。

以上略论韩愈以及和他有深切关系的一群作家。他们的作品，虽因个性、教养、遭遇等等的差异而有大小、深浅、巧拙种种的不同，但有一种共同的倾向，便是走生硬险怪或新奇的一条路。因为从建安以来，诗歌的发展，经过李、杜及其同时诗人的努力，已经把古近体南北作风冶为一炉，锻炼极其纯熟，形式亦已凝固。末流不免平庸化，最好也是铁中铮铮，庸中佼佼，“大历十才子”正是一个好例。到了韩愈这派刁钻古怪的诗人不肯再走凝固的纯熟平庸的老路，就不得不另辟放肆的生硬险怪的一条新路，这也是一种自然的趋势。这派诗人论到他们自己的作品也就已经说出“硬语”、“新语”、“险语”、“狂词”、“怪辞”、“生涩”、“苦吟”一类的话头，可见他们已是自觉的要开辟一条新路了。总之韩愈一派的诗人于诗求其难，白居易一派的诗人于诗求其易，在当时诗坛上都算一条新路。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自号醉吟先生，太原人，一说下邽人。生七月，即识“之”、“无”二字。贞元中擢进士第，补秘书郎。元和间由翰林学士左拾遗拜太子左赞善大夫，直言敢谏。有素恶居易者，谓居易浮华无行。其母因看花堕井而死，居易作《赏花新井诗》，甚伤名教，贬为江州司马。召还，累官至中书舍人，复出为杭、苏二

州刺史。文宗立，召迁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食邑三百户。开成中，起为太子少傅，进封冯翊县开国侯。会昌初，以刑部尚书致仕。晚年与香山僧如满结香火缘，白衣鸠杖，往来香山，自称"香山居士"。又与胡杲等九人宴集，有年至百三十余者，人为绘图，称为香山九老。卒年七十五，无子。《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有《四部丛刊》本。

白居易有《与元九书》，元稹有《叙诗寄白乐天书》，都是自述文学的生活及其对于文学的主张。白居易的主张更为鲜明。他"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食辍哺，夜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他觉得个人努力扶持诗道还不够，主张由政府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路。他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凡诗必须具备情感、语言、声韵、思想四个要素，这是他的诗之界说。他反对梁、陈之际嘲风雪、弄花草的作品。他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治）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是他所以多作政治诗或社会问题诗的理由。又他的《新乐府自序》说："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戒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他真算是一个现实主义的诗人。他想"易喻"，所以注重诗的通俗性，在使"老妪都解"；他想"传言"而"深戒"，所以注重诗的现实性，在能"箴时之病，补政之缺"；他想"播于乐章歌曲"，所以注重诗的音乐性，做到"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而通俗性、音乐性二者又是加强现实性及其效果的。这里录《寄唐生（衢）》诗一首：

贾谊哭时事，阮籍哭路歧。唐生今亦哭，异代同其悲。唐生者何人，五十寒且饥。不悲口无食，不悲身无衣。所悲忠与义，悲甚则哭之。太尉（段）击贼日，尚书（颜）叱盗时；大夫（陆）死凶寇，谏议（阳）谪蛮夷。每见如此事，声发涕辄随。往

> 往闻其风，俗士犹或非。怜君头半白，其志竟不衰。我亦君之徒，郁郁何所为！不能发声哭，转作乐府诗。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功高虞人箴，痛甚骚人辞。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未得天子知，甘受时人嗤。药良气味苦，琴淡音声稀。不惧权豪怒，亦任亲朋讥。时人竟无奈，呼作狂男儿。每逢群动息，或遇云雾披。但自高声歌，庶几天听卑。歌哭虽异名，所感则同归。寄君三十章，与君为哭词。

白居易知道歌哭异名同归，想要以歌代哭，却未尽能把歌哭交融在一起，即未尽能把现实和自己的感情思想融化于一坩埚之中。有人说他学杜，却未能如杜甫所造诣的那样，"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在酣沉于创作的俄顷，超越个人的利害感，而达到一种悲天悯人的圣贤境界。他说："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这样，就容易使人犯狭隘的现实主义的毛病，只知文学有人生的或实用的价值，而不知其同时亦有艺术的或审美的价值；只知文学的教训作用，在以理教人，而不见其有最为重要的感动作用，在以情动人。他自己却似知道此中得失的。他的《和答微之诗序》云："每下笔时辄相倾，共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盖理太周则词繁，意太切则言激。与足下为文，所长在此，所病亦在此。"诚然，所谓"元白体"的作品每有理太周、意太切的毛病。理不太周，使读者有玩味之地；意不太切，引读者于想象之中；再稍加以浪漫的气氛，或感伤的情调，如《长恨歌》、《琵琶行》，自是白诗中的不朽之杰作了。他分自己的诗为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四类。自谓志在兼济，行在独善，故以为讽谕诗、闲适诗为可传，其余都可删略。大约他中年用世而面对现实时多"讽谕诗"，诗的境界是社会的功利主义的境界。晚年退休而逃避现实时多"闲适诗"，诗的境界是个人的自然主义的境界。

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人，后魏昭成皇帝十世孙。八岁

丧父，家贫，母郑亲为授书，九岁能属文。二十八岁应制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第一。除右拾遗，历监察御史。稹性锋锐，见事风生，既居谏垣，不欲碌碌自滞，事无不言，大为执政所忌，贬为通州司马。白居易亦于此时贬为江州司马，二人往来赠答之诗甚多。自三五十韵有至百韵者，朝野传诵，竞相仿效，号“元和体”。穆宗时召还，超擢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未几，因与裴度不能相容，同时罢相。出为同州越州刺史。时白居易为杭州刺史。白有诗云：“为向两州邮吏道，莫辞来去递诗筒。”文宗时官至鄂州刺史，武昌军节度使卒，年五十三。《元氏长庆集》六十卷，集外文章一卷，有《四部丛刊》本。

元稹有《叙诗寄白乐天书》，自述文学的生活及其对于文学的见解。他看不惯当时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至于“心体悸震，若不可活”，想从诗歌中发摅出来。他说：“每公私感愤，道义激扬，朋友切磋，古今成败，日月迁逝，光景惨舒，山川胜势，风云景色，当花对酒，乐罢哀余，通滞屈伸，悲欢合散，至于疾恙穷身，悼怀惜逝，凡所对遇异于常者，则欲赋诗。”原来他是一个敏感的诗人，情感所触都成诗料，初不必限于社会一方面。他的《连昌宫词》为名篇，他因中人崔潭峻进此诗而得超擢，宫中至呼为“元才子”。实则此诗借宫边老人口吻咏玄宗、杨贵妃事，指斥浅露，不及《长恨歌》远甚，倒不如他的《故行宫》一诗廖廖二十字却令人感喟无穷。诗云：

寥落故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他把自己的诗分为古讽、乐讽、古体、新题乐府、律讽、律诗、悼亡、艳诗八类。其中古讽、乐讽、律讽就是白居易的所谓“讽谕诗”。白居易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元稹也说到他们两人的诗：“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摹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白氏长庆集序》）。他们的诗多

为大众而歌，又为大众所歌，他们可说是那一时代大众的诗人了。

元、白齐名，刘、白亦齐名，有《刘白唱酬集》。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中山无极人。贞元中擢进士第，登博学宏词科。淮南节度使杜佑(《通典》著者)表管书记，入为监察御史。王叔文用事，引为朋党。叔文败，禹锡坐贬连州刺史，未至，贬朗州司马，在"八司马"之列。朗州接近夜郎，诸夷喜巫鬼，每祠歌竹枝辞，禹锡倚其声作《竹枝辞》十余篇，于是武陵夷俚悉歌之。居十年召还，复出刺播州，改连州，徙夔、和二州。入为主客郎中，集贤直学士；又出刺苏州，卒于检校礼部尚书，年七十一。《刘宾客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有《四部备要》本。禹锡诗精锐有气骨，晚年尤精。与白居易相倡和。白尝叙其诗云："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又云："其诗在处应有神物护持。"相传他与元微之、韦楚客同会白乐天舍，各赋《金陵怀古》诗，他引满一杯，饮完而诗成，诗云：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白公览诗云："四人探骊龙，子先获珠，所余鳞爪何用耶！"于是罢唱。禹锡还有《石头城》一诗云：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又《乌衣巷》一诗云：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二诗均在他的《金陵五题》内。自序云："友人白乐天掉头苦吟良久，且曰，'石头'诗云'潮打空城寂寞回'，吾知后之诗人不复措辞矣。"又相传他说过"为诗用僻字须有来处"的话，他重阳作诗想押一糕

字，思索“六经”无糕字，竟不敢下笔。我看未必然，因为他是一个富有创作精神的诗人，不但和元、白一样肯用平常的语言，敢作讽刺执政的诗，他还曾仿效民歌的声调风格创作了许多的新体诗。

与元、白作风相近的还有李绅，元、白都曾和过他作的新乐府。

李绅，字公垂，亳州人，一说润州无锡人。官至中书侍郎平章事，封赵郡公。他和李德裕、元稹号“三俊”。白居易亦有“笑劝迂辛酒，闲吟短李诗”句。今存《追昔游集》三卷，其《悯农》二诗甚佳：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他这种小诗却能很扼要地写出农民的痛苦。可是他做了宰相后，似乎忘了因被掠夺被压迫而辛苦而饿死的农民。《锄禾》一首或云为聂夷中诗。夷中《田家》一诗也很好：

父耕原上田，子劚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仓。

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

聂夷中、于渍都是中唐、晚唐间不甚著名的农民诗人，《全唐诗》录其诗各一卷。中唐时候，外而边塞有警，藩镇抗命；内而宦官擅权，朋党构祸；政治日益腐败，民生日益凋敝。面对现实而具敏感的诗人，不但见到现实的表面，而且有时洞见现实的核心，不得不揭出现实的真象而为之呼号：这是“讽谕诗”一时盛行的由来吧。不幸这派诗人是预言者。到了晚唐，国事更不堪问，王仙芝、黄巢之流利用农民不安的情绪起而为乱，唐代就完了。

以上叙述韩、白及其同时诗人已完。就作风说，一派作诗如作文；一派作诗如说话。一派求其难，故为硬语险句；一派求其易，不避俚语俗调。一派侧重技巧形式，是个人的；一派侧重思想内容，是社会的。二者虽似背道而驰，却同是古近体诗发展到烂熟而且平庸化了以后所生的一种反动。

第五章　晚唐诗人

这里要讲到晚唐诗人。

所谓晚唐，系指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到昭宗的一个时期(约830—910)，约七十年。实则所谓五代(梁、唐、晋、汉、周)，起讫不过五十年左右(约910—960)，在文学上除了词继中唐、晚唐而更见发展以外，其他都只算是唐代文学之闰余。而且许多生存于晚唐、五代之际的文人也不好分属，故不妨包括在晚唐内讲，前人论文就有是这样的。晚唐虽到了唐代文学衰落的时期，却依然有好多诗人撑持这一代诗坛最后的场面。其主要的倾向在秾丽宏敞，如小杜、温、李是。他如皮、陆之僻涩奥峭，于韩、孟为近；韦、罗之爽秀条畅，于元、白为近，亦各有其特点。所以从宋初之杨亿、钱惟演，直到清初之冯舒、冯班，就有好多人是偏爱晚唐诗的。

杜牧(803—852)，字牧之，京兆万年人，大史学家杜佑之孙。刚直有奇节，善论古今成败。太和二年(828)擢进士第，官至中书舍人卒，年五十。他作《平卢节度巡官李戡墓志》，述李戡的话："尝痛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他似同意这种论调。可是他自己的诗有时纤艳不减元、白；有时情致豪迈，风骨劲拔，又是元、白所不及的。相传喻凫以诗投杜牧，牧不之顾，凫出语人云："吾诗无绮罗铅粉，宜其不售也。"实则他只见到杜牧纤艳的一方面。就豪迈说，喻凫诗学贾岛，原是杜牧所不取的。杜牧于李、杜、韩、柳，都极佩服。他的《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云："经书刮根本，史书阅兴亡，高摘屈、宋艳，浓薰班、马香。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近者

四君子，与古争强梁。”又有诗句云：“少陵鲸海动，翰苑鹤天寒。”又云：“杜诗韩笔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搔。”可以见其崇尚。他称许浑（用晖）为先辈。许诗工对偶，有《丁卯集》（以所居在丁卯桥，故名），七律警句如“水声东注市朝变，山势北来宫殿高”，“草生宫阙国无主，玉树后庭花为谁”，人称为“丁卯句法”。杜牧七律亦多这类雄奇生硬的句子，如“月锁名园孤鹤唳，川酣秋梦凿龙声”（《洛阳长句》），“北极楼台长挂梦，西江波浪远吞空”（《酬张祜处士》），不胜枚举。《樊川文集》二十卷，外集一卷，别集一卷，有《四部丛刊》本。他的七言律绝最工。七绝可与李白、王昌龄鼎足而三。今举数首为例。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泊秦淮》）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寄扬州韩绰判官》）

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遣怀》）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江南春绝句》）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山行》）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赤壁》）

王士祯《唐人万首绝句选凡例》中称杜牧的七绝说：“中唐之李益、刘禹锡，晚唐之杜牧、李商隐四家，亦不减盛唐作者。”可是曾国藩《十八家诗钞》但钞杜牧七律，钞李商隐诗也只钞七律。杜牧七律已经用典太多，流于晦涩了；李商隐的七律更不好懂。我想李商隐作诗真是“检阅书册，左右鳞次”，由“獭祭”得来的。例如《锦瑟》

一首：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这诗究竟说的什么？锦瑟就是锦瑟，还是令狐楚妾？或者悼亡？或者忧国？还是叹惜年华？从明末释道源作注以来，其说不一。王士祯《论诗绝句》云：

獭祭曾惊博奥殚，一篇"锦瑟"解人难。千秋毛郑功臣在，尚有"弥天释道安"。

其实道源的《李义山诗注》引证虽博，而穿凿未免。作者故意晦涩，难怪后人猜谜。《李义山文集笺注》十卷，清徐树谷笺，徐炯注，比较精审可读。苏雪林有《李义山恋爱事迹考证》，考出李商隐曾恋爱女冠宋华阳，宫嫔卢飞鸾、卢轻凤姊妹，于是他的《无题》、《圣女祠》诸诗谜底揭穿，蕴藏发露，虽然尽管带着很浓厚的象征意味或神秘色彩，也有线索可寻了。这里选录几首比较好懂的：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无题》）

虎丘山下剑池边，长遣游人叹逝川。罥树断丝悲舞席，出云清梵想歌筵。柳眉空吐效颦叶，榆荚还飞买笑钱。一自香魂招不得，只应江上独婵娟！（《和人题真娘墓》〔原注：真娘，吴中乐妓，墓在虎丘山下寺中〕）

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鸣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马嵬》）

《石林诗话》称李商隐诗"精密华丽"，可谓能道出其特点。李商隐(813－858)字义山，怀州河内人。开成二年(837)登进士第，官弘农

尉。会昌中，王茂元镇河阳，辟为掌书记，行侍御史，茂元以其女妻之。李德裕秉政，厚遇之。李宗闵党与德裕相仇怨，大薄之。后令狐绹作相，商隐启陈绹文楚相厚之情，绹不之省。会河南尹柳仲郢镇东蜀，辟为节度判官。大中末，仲郢左迁，商隐罢，未几卒，年四十六。商隐幼能为文。令狐楚镇河阳，以所业文干谒。年才弱冠，楚以其少俊深礼之。楚镇天平、汴州，从为巡官。楚能章奏，以其道授商隐，自是始为今体章奏，博学强记，下笔不能自休；尤善为诔奠之辞，与太原温庭筠、南郡段成式齐名，时号“三十六”。论文思清丽，则庭筠过之；而俱无持操，恃才诡激，为当途者所薄，名宦不进，坎壈终身。诗人的命运如此，也可悲了。

温庭筠者，太原人，本名歧，字飞卿。貌甚陋，人称“温钟馗”。大中初应举进士，苦心砚席，尤长于诗赋。每理发思来，即罢栉缀文。初至京师，人士翕然推重。然士行尘杂，不修边幅。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公卿家无赖子弟裴诚、令狐缟之徒相与蒱饮，酣醉终日，由是累年不第。相传庭筠入试，押官韵作赋，凡八叉手而八韵成，时号“温八叉”。咸通中失意归江东，路由广陵，与新进少年狂游狭邪。又乞索于扬子院，醉而犯夜，为虞侯所击，败而折齿。后为方城尉隋县尉卒。今存《温庭筠集》七卷，别集一卷，有《四部丛刊》本。庭筠属对绝工，如以“玉条脱”对“金步摇”，以“苍耳子”对“白头翁”之类。尝有一联云“蜜官金翼使，花贼玉腰奴”，道蜂蝶也。又“蝶翎胡粉重，鸦背夕阳多”，“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等句，亦为人传诵。其诗得力于六朝乐府宫体，而殊有富贵佳致。今录《春晓曲》一首：

> 家临长信往来道，乳燕双双拂烟草。油壁车轻金犊肥，流苏帐晓春鸡早。笼中娇鸟暖犹睡，帘外落花闲不扫。衰桃一树近前池，似惜红颜镜中老。

庭筠洵多绮罗铅粉之辞，商隐尚有感事伤时之作。李涪《释怪》讥商

隐“无一言经国，无纤意奖善”，不如以此说庭筠，倘若论文主善，我们也相当的认可的话。还有韩偓于温、李为后进，亦好艳体诗。偓字致尧（尧一作光），小字冬郎。商隐集中有“韩冬郎即席得句，有老成之风”的话，昭宗时，偓与吴融（有《唐英歌诗》三卷）同官翰林学士。朱全忠篡唐，偓入闽依王审知。今存《韩内翰别集》一卷。他有《香奁集》二卷，后人仿作，称“香奁体”。或云《香奁集》系和凝作，凝贵后，避人议论，乃假名有韩偓。

韩偓自谓“报国危曾捋虎须”。同时司空图（837—908）则因朱全忠篡唐，不食而死，年七十二。图字表圣，河内人，僖宗时为中书舍人，晚自号知非子、耐辱居士，《唐书》列入《卓行传》。《司空表圣文集》十卷，诗集五卷，均有《四部丛刊》本。他在文学上的不朽，与其说是创作，毋宁说是批评。他的批评除了与人论诗的书札（如《与李生论诗书》，主张味外味）以外，另有《诗品》一卷，深通诗理，而且本身就是最好的诗篇。《诗品》凡分二十四品：雄浑、冲淡、纤秾、沉着、高古、典雅、洗炼、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都用四言诗十二句，以象征的手法显出各种风俗的妙境，而不专主一格。自然，风格的种类区分也是不好拘泥的。王士祯独取“采采流水，蓬蓬远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数语，以为诗家之极则，因为这正给了神韵派一种微妙的启示。至于摹仿《诗品》而作的批评的韵语，有袁枚的《续诗品》，许奉恩的《文品》，马荣祖的《文颂》，魏谦升的《赋品》，郭麐的《词品》等等，可见《诗品》大有影响于清代的作家和批评家了。我们要知道诗的发展到了晚唐真是各体各派都臻完备。司空图用他敏锐的眼光洞见前人的甘苦得失，所以就能成功《诗品》那样广博深湛的见解了。

还有皮日休、陆龟蒙一流诗人，因他们怪僻的个性，侧陋的遭遇，不免好奇立异。好像走路一样，不肯走人家走过的旧路，就拣偏

僻窄狭的小路走，其实这样的小路已有许多人偶尔高兴走过来的。这里所谓小路，就是皮、陆爱做的杂体诗。凡汉、魏、六朝以来的杂体诗，如联句、离合、反复、回文、风人、次韵、叠韵、双声、四声、短韵、强韵、县名、药名、人名、杂言、六言、问答、咏物（如《渔具》、《茶具》、《樵人十咏》、《酒中十咏》）等等，他们无体不作，自诩多能。皮日休有《杂体诗序》一文，叙述杂体诗起源和他们作杂体诗的所以。他们以为诗体的演进"由古而律，由律而杂，诗之道尽乎此"，所以就拣杂体诗这条最后的路而走。他们以为"近代作杂体，唯《刘宾客集》中有回文、离合、双声、叠韵。如联句，莫若孟东野与韩文公之多，他集罕见，足知为之之难。"他们窃慕韩、孟之为人，想要因难见巧，以奇见长，就成为杂体诗（不如说是游戏诗）的作者。皮日休字袭美，襄阳人，性傲诞，隐居鹿门山，自号醉吟先生，又号间气布衣。咸通中进士，官太常博士，《唐书》称其降于黄巢，后为所害。但尹洙《河南集》、陆游《老学菴笔记》，均称日休终于吴越。《皮子文薮》十卷，有《四部丛刊》本。日休尝上书请废庄、列之书，以孟子为学科，又请以韩愈配享太学。所为文亦多原本经术。与陆龟蒙相倡和，有《松陵倡和集》。陆龟蒙，字鲁望，苏州人，举进士不第，辟苏湖二郡从事。退隐松江甫里，自号天随子。以高士召，不赴，光化中赠左补阙。有《笠泽丛书》四卷，补遗一卷。又《甫里先生文集》二十卷，有《四部丛刊》本。

这一时期的诗人还有不少，最使我们注意的是一群苦吟诗人，大都受了贾岛的影响。例如对于贾岛铸金呼佛的李洞，"才吟五字句，又白几根须"的缺唇诗人方干（有《元英集》八卷），"只将五字句，用破一生心"的李频（官建州刺史卒，州民祀为黎岳之神，有《黎岳集》一卷，附录一卷），自谓"乍可百年无称意，难教一日不吟诗"，"吾道在五字，吾身宁陆沈"的杜荀鹤（传为杜牧嫁妾所生，有《唐风集》三卷），自谓"吟安一个字，撚断数茎须"的卢延让，自许"苦吟僧

入定，得句将成功"的裴说，"朝吟复暮吟，只是望知音"的崔涂，"为觅出人句，只求当路知"，卒登五老榜的曹松，自述"省学为诗日，宵吟每达晨"，"到晓改诗句，四邻嫌苦吟"，至于"为爱诗名吟至死"的夜吟诗人刘得仁，说是"五言如四十个贤人，著一字如屠沽不得"的刘昭禹以及皮日休所称"雕金篆玉，牢奇笼怪，百锻为字，千炼为句"的刘言史都是。其他如自谓"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背上"，"属对可以衡称"（如"冻瓶粘柱础，宿火陷炉灰"）的"歇后郑五"（棨），相传风流放诞，艳遇湘妃的李群玉（有《李群玉集》八卷），诗多怨老嗟卑之作的曹邺，好作《游仙诗》的曹唐（有《曹祠部集》二卷，附曹唐诗一卷，说是"诗无僧字格还卑"，好以僧字入诗的郑谷（有《云台集》三编），专以程试诗赋有名的王棨（有《麟角集》一卷），专以咏史有名的胡曾（有《咏史诗》二卷），好作咏物诗的徐寅（有《徐正字诗赋》二卷），好咏古迹的汪遵，以吟"子孙何处闲为客，松柏被人伐作薪"，厉声骇走樵夫的周朴等。这里都不能详说了。

还有所谓"江东三罗"，即罗隐、罗虬、罗邺。我们可把罗隐来代表晚唐最后的一个诗人。罗隐（833—909），字昭谏，余杭人，十上不中第，归依钱镠，官钱塘令，卒年七十七。有《罗昭谏集》八卷。他是一个生在动乱时代滑稽玩世的作者，有许多可笑的故事至今还流传民间。他有些诗句还是如今的俗言谚语。如"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忧"（《自遣》），"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筹笔驿》），"只知事逐眼前去，不觉老从头上来"（《水边偶题》）。他每利用此等俗言谚语添加讽刺的风趣，亦庄子"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之意。他有两首诗，叫人读起来就要发笑。一首为《谒文宣王庙》：

> 晚来乘兴谒先师，松柏凄凄人不知。九仞萧墙堆瓦砾，三间茅殿走狐狸。雨淋状似悲麟泣，露滴还同叹凤悲。傥使小儒名稍立，肯教吾道受栖迟。

接着一首为《代文宣王答》，就更可笑了：

> 三教之中儒最尊，止戈为武武尊文。吾今尚自披蓑笠，你等何须读典坟。释氏宝楼侵碧汉，道家宫殿拂青云。若教颜闵英灵在，终不羞他李老君。

原来唐代的思想界是儒、释、道三分天下的局面。道教以老子姓李，更得帝王的尊崇，至封为大圣祖玄元皇帝。又设崇玄馆，令习真经以应贡举。佛教沿六朝的余波，除武宗外，帝王莫不信佛。同时儒家也被尊重，国子学祀周、孔，封孔子为先圣，诏令诸儒撰定《五经正义》。（景教、回教等外来宗教虽已传入，但在思想上似乎没有甚么影响。）但看到晚唐孔庙独自荒芜冷落的景象，才知道儒家已失其在学术思想上的权威。唐代诗坛上四个伟大的代表作家，杜甫、韩愈虽受儒家的熏染极深，李白却带有极浓厚的道家色彩。从自号"腐儒"的杜甫看来，李白简直是一个飞扬跋扈的异端的作者。白居易虽还不至于像王维那样诵经奉佛，显然露出异端的面目。他的讽谕诗里那种淑世主义的精神尽管是十足的儒家的思想，可是他的闲适诗里那种达观主义的思想却不能不说是出于佛家，从他晚年的生活看来就是一宗铁证。在这样一个思想信仰比较自由的时代，除了几个高僧大德以外，可惜没有产生甚么伟大的哲学家，幸而有了几个伟大的文学家，总算弥补了这个缺憾。或许有人以为韩愈是一个肩道统的人物，不能不承认他是儒家一派的一个大哲学家；实则他谈道、论性、讲学、说师，都平常得很。不如把他纳在文学史里作为一个大诗人、大古文家，还有他的不朽的位置。尤其是他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于后来的文学上有最大的影响，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了。

第六章　古文运动

提起唐代古文运动，就令人回溯到北周苏绰、隋代李谔那流人物。他们想借帝王的提倡，利用政治的势力，来做文学上的复古运动，结果，公牍文字上各有过一个时期摹仿古文，排斥华艳，算是给了当时徐庾体的骈俪文一种打击。同时姚察撰著《梁书》，其子思廉继续完成，也用古文体。思廉(557－637)死于贞观十一年，对于那时的文学上似乎没有甚么影响。可是史家还是要说"古文自姚察始"。赵翼《廿二史劄记》云："《梁书》虽全据国史，而行文则自出炉锤，直欲远追班、马。盖六朝争尚骈俪，即序事之文亦多四字为句，罕有用散文单行者。……此独卓然杰出于骈四俪六之上，则姚察父子为不可及也。"初唐四杰之文不脱六朝之习。只有王勃算是一个奇才，给骈俪文开了一点玩笑。如《感兴奉送王少府》一文：

> 八十有遇，共太公晚宦未迟，七岁神童，与颜回早死何益。仆一代丈夫，四海男子。衫襟缓带，拟贮鸣琴。衣袖阔裁，用安书卷。贫穷无有种，富贵不选人。高树易来风，幽松难见日。羽翼未备，独居草泽之间；翅翮若齐，即在云霄之上。乌众多而不辨凤，马杂群而不分龙。荆山看刖足之夫，湘水闻《离骚》之客。人贫材富，罔窥卿相之门；貌弱骨刚，岂入王侯之宅。王少府北辞伊阙，南登沔山，过我贫居，饮我清酒。一谈经史，亚次孔先生。再读词章，何如曹子建。山岳藏其迹，川泽隐其形。一旦睹风云，千年想光景。孔夫子何须频删其《诗》、《书》，焉知来者不如今。郑康成何须浪注其经史，岂觉今之不如古。王少府乃可畏后生，学问人也。各为四韵，共写别怀。

他虽不废骈俪，但拿徐庾体来比，总会有人觉得造句选辞都很鄙俗

可笑。就是他的杰作《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虽有奇警处，也有平凡处，古文家韩愈还是叹服。总之，雕饰的纤巧的骈俪文到了这个时代已经不能束缚杰出的天才了，王勃就是首先不甘束缚的一个人。所以杨炯《王勃集序》说：

> 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

不过王勃诸人虽有志改革，想做到内容（骨气）充实而有力量（刚健），还是想在骈俪文范围以内改革，四杰之文可贵在此。同时他们比徐、庾更加讲究声律，严格的律体的四六文出来了。

到了陈子昂，他才很显明的打出“复古”的旗帜。他的《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书》云：“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窃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这可视为他在文学上主张复古的宣言。论到古文运动，就不能不算他做了先驱者。所以卢藏用的《陈子昂文集序》，也以为由晋、宋至于徐、庾，斯文将衰；上官仪继踵而生，风雅之道扫地而尽；竟以为道丧五百岁而得陈子昂：“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至于所谓燕、许大手笔，那是当时典型的骈散兼行的应用文体。李白在诗上虽然主张复古，但所作散文还是骈句多于单句。杜甫偶作散文，生涩不可读，也好像有意避免骈俪。只有元结（723—772）于诗于文都主复古。他撰《箧中集》，恭维沈运千诸人那种古淡的作风，可见其对于诗的见解。他不作骈俪绮靡之文，可见他是自觉的要做古朴的散文。他自号琦玗子，复四易其号为浪士、漫郎、漫叟、聱叟，很可怪。今存《元次山文集》十卷。同时还有李华、萧颖士、贾至、独孤及以及苏源明、李翰之流，也都算是古文运动初期的人物，而以李、萧、独孤及为最重要。独孤及门人梁肃（753—793）的《李翰前集

序》说：

> 唐有天下几二百载，而文章三变。初则广汉陈子昂以风雅革浮侈，次则燕国公张公说以宏茂广波澜。天宝以还，则李员外、萧功曹、贾常侍、独孤常州，比肩而作，故其道益炽。若乃辞源辩博，驰骛古今之际，高步天地之间，则有左补阙李君。

梁肃说的"其道益炽"，换句话说，他们的古文运动因参加的人多，声势更大了。其实就这几个人现存的作品而论，或者没有脱尽骈文的旧习，或者还是半生熟的散文，正所谓风气初开，明而未融也。李华，赵州赞皇人，开元末进士擢第，天宝中官右补阙。安禄山反，华为贼所得，伪署凤阁舍人；贼平，贬杭州司户参军；后为吏部员外郎，以风痹去官卒。今存《李遐叔文集》四卷，《吊古战场文》一篇最有名。萧颖士，颍川人，与李华同年登进士第。天宝初官秘书正字，以忤李林甫外调广陵及河南府参军。安禄山反，颖士走山南，源洧辟掌书记，后为扬州功曹参军，客死汝南。今存《萧茂挺文集》一卷。其《伐樱桃赋》为刺李林甫而作，有"每俯临于萧墙，奸回得而窥伺"之句，真可谓知几先见。独孤及(744—796)字至之，洛阳人，官至司封郎中，常州刺史卒，谥曰宪。《毘陵集》二十卷，附录一卷，补遗一卷，有《四部丛刊》本。贞观而后，文章还是不脱六朝之习。到了开元、天宝，诗格大变，文格还守旧规。元结、独孤及、李华、萧颖士诸人始起而倡变文格。只因这几个人自命不凡的努力于"文章中兴"，有意的要作文章改革事业(独孤及《李华中集序》)，就造成了一时代的古文运动。韩、柳继起，古文运动就告成功了。至于陆贽(754—805)、权德舆(759—818)虽和韩、柳同时而年辈较长，却都是作的不甚严格的骈文。权为天水人，字载之，三岁能辨四声，四岁能赋诗。后官至中书门下平章事。他长于碑铭书序，是应酬当世之作。今存《权文公集》十卷。陆为嘉兴人，字敬舆。他于德宗时为翰林学士，从幸奉天，应付李希烈，朱泚诸镇之乱。所作诏书斟酌时势，入

情入理，据说当时武夫悍卒读了也很感动。所作奏议，指陈时政得失利病，深切著明。有《翰苑集》二十二卷。从四杰、燕、许以来在骈俪文范围以内的改革，可算得了成功，因为陆宣公的奏议证明骈俪文在当时应用上还有存在的价值。可是韩、柳出来了，古文运动毕竟成功了。

据《旧唐书·韩愈传》说："大历、贞元间，文学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洎举进士，投文于公卿间，故相郑余庆为之延誉，由是知名于时。"可证韩愈之倡为古文，所受独孤及、梁肃二人的影响最大。我们都知道韩愈是第一个把自己的散文称为"古文"的；他又是第一个有鲜明的主张，有坚决的态度，用全幅的精神来作古文的。他的《与冯宿论文书》说：

> 仆为文久，每自测，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及示人，则人亦以为好矣。小惭者亦蒙谓之小好，大惭者即必以为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于今世也，然以俟知者知耳。

可见他作古文，在当时很招人家非笑骇怪。又《答李翊书》说：

> 愈之所为，不自知其至犹未也？虽然，学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惧其杂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

焉。虽然，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

读此，可见韩愈对于古文所具的见解及其在古文上所用的工夫和心得。同时我们要知道他是一个正统派的儒者，他是圣人之徒，所以一面提倡古文，一面提倡圣人之道，而以诗书为古文的思理源泉，仁义为古文的实践路径。好像以为文与道不可分开，文不能离道而存在。柳宗元所谓“文者以明道”，李汉所谓“文者贯道之器”，也正是他这个意思。韩愈虽自谓世无仲尼，不当在弟子之列，可是他自己却好为人师。李翱、张籍、皇甫湜、李汉之流，都是韩门弟子。李翱，字习之，陇西成纪人。贞元中进士，官至山南东道节度使、检校户部尚书。《李文公集》十八卷，有《四部丛刊》本。他于《答皇甫湜书》中自称《高愍女碑》、《杨烈妇传》不在班固、蔡邕下。又《寄从弟正辞书》略谓“人号文章为一艺者，乃时世所好之文；其能到古人者，则仁义之词，恶得以一艺名之”。可知其为文也是重道而不重艺。苏舜卿谓其词不逮韩，而理过于柳。皇甫湜，字持正，睦州人。元和初进士，仕至工部郎中。《皇甫持正文集》六卷，有《四部丛刊》本。翱、湜之文同出韩愈，翱得愈之醇正，湜得愈之奇崛。张籍集中无文，翱、湜集中无诗。故《石林诗话》云：“人之材力有限，李翱、皇甫湜皆韩退之高弟，而二人独不传其诗，不应散亡无一篇者，计或非其所长，故不作耳。二人以非所长而不作，贤于世之不能而强为之者也。”还有欧阳詹、李观，与韩愈同年举进士，同为“龙虎榜”中人物，同出陆贽门下。欧阳詹，字行周，泉州晋江人。官至四门助教。闽人第进士自詹始，闽派诗人亦当自詹数起。《欧阳行周文集》十卷，有《四部丛刊》本。其文有古格，在当时纂组排偶者上。李观，字元宾，李华之从子，官至太子校书郎，年二十九卒。有《李元宾文编》三卷，外编二卷。其文雕琢艰深，或格格不能自达其意。顾当雕章绘句之时，而李观、欧阳詹肯从事古文，与韩愈相左右，皆不失为

豪杰之士。其他如白居易、刘禹锡也都能作古文，不过为诗名所掩。梁肃、吕温（有《吕衡州集》十卷）之文，仅可以比得上李翱、皇甫湜。只有柳宗元卓然大家，与韩愈齐名。他比韩似乎更能"识古书之正伪"，如《辩列子》、《辩文子》一类之文，可见其很能辨伪。他好为寓言，如《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三戒》、《捕蛇者说》诸文都是。他的最好的文章当然是他在永州、柳州所作的山水游记，描写精澈，意味深永，这是在《水经注》以后很难见到的美文。他的《答韦中立书》说：

> 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彩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远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于道不远矣。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

柳宗元虽好佛至三十年，可是论到古文却和韩愈的见解差不多。所谓"文者以明道"，原来这个道就是"五经"之道、圣人之道。总之，古之文，古之道，古之人，这是古文家常说的三古。

韩愈真是一个文坛怪杰！因他的诗文好奇，想要以奇矫俗，一时成为风气。韩派诗人的"怪诗"前已说过，末流至于皮、陆，专走杂体诗一路，结果，此路不通，唐诗完了。韩派古文也因尊奇之故，至

于不可句读，叫做“难文”。韩愈作《樊宗师墓志》，以“文从字顺”称樊文，实则樊文最奇涩难读。今存《樊绍述集》，仅有《绛守居园池记》、《越王楼诗序》两文。前一篇止七百七十字，注家有六人，唐王晟、刘忱所注已佚，尚有元赵仁举、吴师道、许廉，清孙之騄四家注，各说不同，终无定论，可知其难到甚么程度了。皇甫湜也以“异常出众”为奇怪，一传为文真诀于来无择，再传而为孙樵，更以“趋怪走奇”自命。孙樵，字可之，又字隐之，关东人，大中间进士，官至职方郎中，今存《孙可之集》十卷。韩愈包孕群言，自然高古。皇甫湜稍有意为奇，孙樵则较湜益有努力为奇之态。难怪苏轼要说“学韩愈而不至者为皇甫湜，学湜而不至者为孙樵”了。只有李德裕（有《会昌一品集》共三十四卷）、杜牧几个人还没有走到奇怪的难文一条路。杜文尤纵横奥衍，多切经世之务，《罪言》、《阿房宫赋》都是名作。他如皮日休、沈亚之（有《沈下贤集》十二卷）都务为险崛，与孙樵相上下。刘蜕则更险于孙樵，较易于樊宗师。刘蜕，字复愚，长沙人，大中间进士，咸通中官至左拾遗，外谪华阴令。有《文泉子》一卷。自谓“覃以九流之旨曰文，配以不竭之义曰泉。崖谷结珠玑，昧则将救之；雨雷亢粢盛，干则将救之；岂托之空言哉”。可以想见其自负。《刘蜕集》六卷，有《四部丛刊》本。其《文冢铭》最为世所传，实则故为奇奥，已算所谓难文了。韩派末流走入难文一路，结果，又是此路不通，唐代古文也完了。所以李商隐、段成式初为古文，原属难文一派，后来就和温庭筠一道回到骈俪文，号为“三十六体”，这不能不说是古文运动末流难文一派所引起的一种反动了。

以上各章详述唐代诗文已完，唐代文学之盛况可以想见。唐代文学何以如此之盛，第一章里已说了，这里再指出一种参考资料。明胡震亨《唐诗丛谈》卷三论唐代文学之盛，综其原因有五：一、君主皆好文学。上好下甚，风偃化移，加以提倡，谣习寖广。才人艺士行卷歌篇多得传御禁掖。诗人集子多出人主下诏编进。二、唐试士

初重策，兼重经，后乃觭重诗赋。三、唐时风习豪奢。民间爱重节序，好修故事；文人纪赏年华，概入歌咏。百官游宴，酬倡流传。四、节镇幕府多辟词人。五、朝士文会之盛。所举事实太多，这里不能录了，学者可自去参考。关于唐代诗文总集，举其最重要的有《文苑英华》一千卷，宋李昉、徐铉等奉敕编。此书起于梁末，盖欲以上续《文选》。《唐文粹》一百卷，宋姚铉编。诗不录近体，文不录四六。《全唐诗》九百卷，清圣祖御定，凡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作者二千二百余人。以最后二书有通行本为最易得。又宋计有功编《唐诗纪事》八十一卷，所录凡一千一百五十家，有通行本，亦易得。他如沈德潜《唐诗别裁》、王士祯《唐人万首绝句选》、王闿运《唐诗选》，也都是有名而且易得的选本。至近人鲁迅编《唐宋传奇集》，汪辟疆编《唐人小说》，唐代小说的总集，也粗具规模了。

第七章　唐人小说

诗歌、散文的进展到了百花怒发、绚烂已极的时候，从来不甚为人注意，因而没有什么可以惹人注意的小说，也就渐渐有人注意，而且有了惹人注意的成就了。唐人小说便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发达起来。刘攽说："小说至唐，鸟花猿子，纷纷荡漾。"洪迈也说："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事情，凄惋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又赵彦卫《云麓漫钞》说："唐世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诸主司，然后投献所业，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盖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贽，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者是已。"还有胡应麟《笔丛》说："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设幻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唐人小说的成就，及其所以发达的原因，宋、明人说的大致不错。我以为当时诗歌散文的发达也足以促进小说的发达。先就诗歌而说，从前的乐府里面有好些故事诗。唐代诗人元、白好为新乐府，也有些是故事诗。白诗如《长恨歌》，元诗如《会真诗》，不是顶有小说味的故事诗吗？当时陈鸿看见了《长恨歌》就作《长恨歌传》。元稹似乎因为作了《会真诗》而意犹未尽，又作《莺莺传》。同时杨巨源有《崔娘诗》，李绅有《莺莺歌》，沈亚之作了《冯燕传》，司空图又作《冯燕歌》。这样说来，当时诗歌与小说二者在发展的进程中彼此确乎有些联系。次就散文而说，唐代散文最盛的时期在所谓中唐、晚唐之间，唐代小说家十之八九生于此时，可见新的小说之繁兴正在新的散文成熟的时候。可惜这些小说家的生卒年代十之八九无从确考，只能略为假定。现在从这些小说家中拣出几个最有名的，或有影响于后来戏曲和小说的，略依他

们年代的先后及其重要作品制为简表如下：

唐代小说家及其作品简表

作者姓名	生卒年代	作　品	备　考
王　度	585？—625？	《古镜记》	王为隋、唐间人，此为唐代小说第一篇。至梅鼎祚《隋文纪》所收《开河纪》、《迷楼记》、《海山记》、《大业拾遗记》等篇，疑出后人依托，未必隋、唐间人作也。
张　鷟	660？—740？	《游仙窟》	以俪语为传奇，中夹俗谚，在古小说中最为别致。当时流入日本，近来国内始有传本。
陈玄祐	740？—790？	《离魂记》	郑德辉：《倩女幽魂》
沈既济	750？—800？	《枕中记》	马致远：《黄粱梦》 汤显祖：《邯郸记》 吴元泰：《东游记》 无名氏：《吕祖全书》
白行简	775？—826？	《李娃传》	石君宝：《李亚仙花酒曲江池》 高文秀：《打瓦罐》 朱有燉：《曲江池》 薛近兖：《绣襦记》
		《三梦记》	蒲松龄：《凤阳士人》
元　稹	779—831	《莺莺传》	赵德麟：《商调蝶恋花十阕》 王解元：《弦索西厢》 董实甫：《西厢记》 关汉卿：《续西厢记》 李日华：《南西厢记》 陆天池：《南西厢记》 周公鲁：《翻西厢记》 沓继佐：《续西厢》 程　端：《西厢印》

（续表）

作者姓名	生卒年代	作　品	备　考
陈　鸿	770?　—830?	《长恨歌传》	乐　史:《杨太真外传》 白　朴:《梧桐雨》 王伯成:《天宝遗事》 屠长卿:《彩毫记》 洪　昇:《长生殿》 蜗寄居士:《长生殿补阙》
蒋　防	780?　—830?	《霍小玉传》	汤显祖:《紫钗记》《紫箫记》
李公佐	760?　—840?	《南柯太守传》	汤显祖:《南柯记》
		《谢小娥传》	《新唐书》:《列女传》 凌濛初:《拍案惊奇》(十九) 王夫之:《龙舟会》
沈亚之	780?　—840?	《湘中怨解》 《秦梦记》 《异梦录》 《冯燕传》	曾　布:《水调七遍》
许尧佐	贞元间人	《柳氏传》	梅鼎祚:《玉合记》 吴长儒:《练囊记》
李朝威	贞元间人	《柳毅传》	尚仲贤:《柳毅传书》,又《张生煮海》 李好古:《张生煮海》 许自昌:《橘浦记》 黄说仲:《□箫记》 李　渔:《蜃中楼》
牛　肃	贞元、元和间人	《纪闻》: 《吴保安》	《新唐书》:《忠义传》 沈　璟:《埋剑记》 《古今小说》
牛僧孺	780—848	《玄怪录》	当时李复言有《续玄怪录》,牛之外孙张读有《宣室志》十卷,亦纪仙鬼灵怪

（续 表）

作者姓名	生卒年代	作　品	备　考
薛用弱	长庆、太和间人	王　维 《集异记》 王之涣	王　衡:《郁轮袍》 黄兆森:《郁轮袍》 郑之奇:《旗亭记》 张龙文:《旗亭宴》 卢见曾:《旗亭记》 裘　琏:《旗亭馆》
薛　调	咸通间人	《无双传》	陆　采:《明珠记》
裴　铏	咸通乾符间人	《昆仑奴》 《传奇》:《聂隐娘》、《裴航》(此书盛行于宋,宋人因概称唐人小说为传奇。)	梁辰鱼:《红绡》 梅禹金:《昆仑奴》 尤　侗:《黑白卫》 龙　应:《蓝桥记》 杨之炯:《玉杵记》 黄兆森:《裴航遇仙》
皇甫枚	咸通、天祚间人	《三水小牍》 《飞烟传》	《飞烟传》一作《非烟传》
杜光庭	唐末前蜀人	《虬髯客传》	凌初成:《虬髯翁》 张凤翼:《红拂记》 冯梦龙:《女丈夫记》 梁辰鱼:《红拂记》 无名氏:《双红记》
附注:一、此表根据拙著《中国文学史讲话》上册 1933 版更改。 二、赵景深著《中国文学史新编》,1936 版,一一二页,可参看。			

我们读了上表,可知唐人小说给后人戏剧上以不少的题材。还有孟棨《本事诗》中许多本事也为后来戏剧作者所采用。如白朴的《韩翠蘋御水流红叶》,用顾况"红叶题诗"本事;白朴和尚仲贤的《崔护谒浆》、孟称舜的《桃花人面》、金怀玉的《桃花记》、舒位的《人

面桃花》、曹锡黼的《桃花吟》，皆用“崔护”本事；明人《金镜记》，用“乐昌分镜”本事；尤侗、张韬的《清平调》，用“李白”本事。桂馥的《放杨枝》，用“白居易”本事。又上面表内从沈既济到薛用弱这一群小说作者的生年大概和韩、柳相上下，可知小说发展最盛的时期正和古文运动最盛的时期相当。我想，要是文体不解放，那么，自由活泼、描写有生气的小说，未必会这样发达起来。韩、柳一流的古文家用古文宣传圣人之道，这些小说家却用古文来写圣人所不说的怪力乱神之类的东西，煞是相映成趣。韩柳集子里也有好些类似小说的传记杂文，不过他们多少带些说教的意味。如韩愈的《圬者王承福传》、《毛颖传》，柳宗元的《区寄传》、《河间妇传》、《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以及《三戒》等都是。我想当时小说家、古文家在无形之中是互有影响的，彼此也或互为师友。比如元稹、白行简是朋友，韩愈、元稹也是朋友，据说沈亚之还出韩氏门下。懂得此中消息，就更容易领会短篇散文的小说何以会勃兴于这一时期。还有要知道的，四十年前，从敦煌石室发现唐、五代、北宋人写本书库，其中有好些类似小说的俗文，虽大都残缺不完，可知那时民间已经有通俗的小说流行了。白话小说胚胎于唐，词也胚胎于唐，下面要说到晚唐五代的词了。

第八章　晚唐五代词人

词是怎样起源的？由诗到词发展的进程如何？诗和词的关系怎样？这是我们论到晚唐五代词人时必得触及的问题。

由三百篇而楚辞，而汉魏六朝乐府，而唐人律绝，大都是入乐或可以入乐的诗，其间由楚辞而演化的汉赋虽不可歌，却仍可以诵，所以说，“不歌而诵为之赋”。其实，诵也还是有声调节奏的。由乐府而演化的五言诗，如汉、魏之际，七子三祖所作，则大都可歌，为魏、晋乐所奏，正所谓“文或不工，而韵人歌唱”。到了齐、梁之际，文人言志之作较晋、宋时候更多，而且受了佛教诵经歌赞的影响，更加讲究声韵。不过当时关于诗的声律运动虽已勃兴，而音乐还在清商时期，没有若何显著的变化和这种运用新的声律的诗相适应，诗多不可歌。所以钟嵘《诗品》中说：“今既不备管弦，亦何取于声韵？”直到李唐建立了一个一统的大帝国，音乐方面承受北朝吸收胡乐的影响，又采取民间的俗乐，扩大了隋之九部乐而为十部乐，即燕乐伎、清乐伎、西凉伎、天竺伎、高丽伎、龟兹伎、安国伎、疏勒伎、高昌伎、康国伎。凡大宴会则设十部乐以夸示华夷，正反映着这个大帝国胡越一家的权威的意识。不过这个时候新声繁兴，古曲沦缺，太常徒设虚官，音乐上的实权都握在教坊乐人手里。所以《旧唐书·音乐志》说：“自长安(700——)已后，朝廷不重古曲，工伎转缺。能合于管弦者，唯《明君》、《杨伴》、《骁壶》、《春歌》、《秋歌》、《白雪》、《堂堂》、《春江花月》等八曲。”又说：“自开元(713——)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开元时人崔令钦《教坊记》载三百二十多曲，可以考见当时所用胡乐俗乐的曲目。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七十九到八十二所录《近代曲辞》则可以考见唐人曲辞的一斑。其中乐

曲长的分为许多部分，如"入破"、"排遍"、"彻"之类各以绝句组成，《水调歌》、《凉州歌》、《伊州歌》等曲便是；乐曲短的大都是律绝一首。自中唐起才渐渐有长短句，稍后就渐渐有依曲作辞的了。

倘若从唐代诗人所作入乐的诗辞来考察词的发展，那么，最初开国时所用的燕乐，如《英雄乐》、《景云河清歌》等，显然有夸耀权威意味的曲辞，已经无从考见了。李百药的《火凤词》是五律二首，《破阵乐》是七绝六律各一首，想是当初仅存的乐章吧。武后的《商调曲》、《如意娘》是七绝，章怀太子贤的《黄台瓜辞》是五古。武后表侄嘉兴令杨廷玉的《回波词》，中宗时谏议大夫李景伯和流放岭表的沈佺期所作《回波乐》，都是六言四句，或称六言绝句，这算是最早的唐人依曲填词吧。李峤的《桃花行》、《汾阴行》，在中宗、玄宗宫中讴唱过的，还是整齐的七言。只有明皇自己作的《好时光》：

> 宝髻偏宜宫样，莲脸嫩体红香。眉黛不须张敞画，天教入鬓长。　莫倚倾国貌，嫁取个有情郎。彼此当年少，莫负好时光。

这已经像长短句的词了，但不知确为他作否。按当时张说所作《破阵乐》（六言八句二首）、《舞马词》（六言四句六首）、《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七律三首）、《苏摩遮》（《泼胡寒戏》所歌，七绝五首），崔液所作《踏歌词》（五言六句二首），都不出律绝的形式。还有杨贵妃的《阿那曲》，李白奉诏而作的《清平调》三首，也都是七绝。《全唐诗》收李白词十四首，《清平调》外，不仅《桂殿秋》二首、《运理枝》二首、《清平乐》五首，都不可靠，便是《菩萨蛮》一首：

>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　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和《忆秦娥》一首：

>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这是前人认为可靠的，也都有疑问。不过定要称李白为“百代词曲之祖”，我们也并不反对，因为他有《清平调》三章，也足以使他在词曲上不朽了。和他同时诗人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一诗，入乐而称为《渭城曲》或《阳关曲》的也还是七绝。刘禹锡的《与歌者诗》云：“旧人唯有何戡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白居易的《对酒》诗云：“相逢且莫推辞醉，听唱阳关第四声。”可见此曲的流行一时。又据薛用弱《集异记》载有高适、王昌龄、王之涣三人旗亭饮酒，窃听伶倌妓女唱诗的故事，这些诗大都是七言绝句。

根据以上所说，可证自初唐以至盛唐玄宗时候，继乐府古曲而起可歌的诗，大都是整齐的五言、六言、七言，尤以七言绝句为最多，长短句绝少，就是有，也在盛唐时候，还似乎不甚可靠。倘若有人定要认为伟大的音乐天才唐玄宗和伟大的诗歌天才李白是词曲之初祖，那么，说是词的萌芽在盛唐时候，也没有什么不可的了。

稍后一点，元结仿湘江船歌作《欸乃歌》，同时顾况仿巴人竹枝歌有《竹枝词》，也都是七绝。只有张志和、张松龄倡和的《渔父歌》：

>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
> ——张志和
>
> 乐是风波钓是闲，草堂松桧已胜攀。太湖水，洞庭山，狂风浪起且须还。
>
> ——张松龄

韩翃和他爱姬柳氏倡和的《章台柳》：

> 章台柳，章台柳！往日依依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
>
> ——韩　翃
>
> 杨柳枝，芳菲节，所恨年年增离别。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

君来岂堪折！

——柳　氏

他们一倡一和，这都好像是依调而填的词。这个时候，长短句的词已渐渐出来了。如“三台”、“调啸”就始见于《韦苏州集》。“三台”还是六言绝句，和张说的《舞马词》相同。另有“上皇三台”、“突厥三台”，一为五绝，一为七绝，都还不算创体。只有“调啸”，一名“调笑令”，或名“宫中调笑”，又名“转应曲”或“三台令”，就是长短句的词：

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二首之一）

同时王建、戴叔伦作的“调笑令”，调子正和性晓音律的韦应物所作相同。而且这个时候，作者自己明白说是依调而填的词也有了。例如刘禹锡的《春去也》词：

春去也，共惜艳阳年。犹有桃花流水上，无辞竹叶醉尊前；惟待见青天。（二首之一）

他自己的标题是《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原来白居易曾有《忆江南》一词：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二首之一）

刘、白集中都有许多首“竹枝”、“杨柳枝”、“浪淘沙”等词，大约是彼此倡和之作，不过都是绝句，并非创体。最使我们注意的是他们宦游南方、摹仿长江流域的民间歌曲作词，民间又取他们的新词来歌唱（如刘禹锡《踏歌词》）。不仅刘禹锡在建平摹仿巴渝俗歌“作竹枝九篇，俾善歌者扬之”，元稹的诗也曾被民间歌入“竹枝”：

江畔离人唱“竹枝”，前声断咽后声迟。怪来调苦缘词苦，多是通州司马诗。

刘、白所作“杨柳枝”虽说是由旧曲“折杨枝”翻新的曲子，好像也是

为着民间歌唱而作的，同时他们自己也能歌唱自己所作的新词。如白居易的《忆梦得》诗说："几时红烛下，闻唱竹枝歌。"自注："梦得能唱竹枝，听者愁绝。"相传为白居易所作的词，还有"如梦令"、"长相思"，都不见于他的《长庆集》，恐为伪托。他自己说："若集内无，而假名流传者，皆谬为耳。"《如梦令》二首，据宋杨偍《古今词话》说，是后唐庄宗作。《长相思》二首：

>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　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
>
> 深画眉，浅画眉，蝉鬓鬅鬙云满衣；阳台行雨回。　巫山高，巫山低，暮雨潇潇郎不归；空房独守时。

此词疑为当时名妓吴二娘作。白居易《寄殷协律》诗说："吴娘暮雨萧萧曲，自别江南更不闻。"自注："江南吴二娘曲词云，暮雨萧萧郎不归。"这就是个铁证。至于刘禹锡的《清湘词》，一名《潇湘神》，也有人疑为伪托，我看这两首词：

> 湘水流，湘水流，九疑云物至今愁。若问二妃何处所，零陵香草露中收。
>
> 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楚客欲闻瑶瑟怨，潇湘深夜月明时。

这当是刘禹锡摹仿潇湘一带民间迎神的曲子而作。他的《浪淘沙》云："令人忽忆潇湘渚，回唱迎神三两声。"白居易的《夜招晦叔》诗说："为君更奏湘神曲，夜就侬来能不能。"又有《夜闻筝中弹潇湘送神曲感旧》诗。可见刘、白对于潇湘神曲的欣赏。刘禹锡当有作《潇湘神》那两首词的可能，而且"潇湘神"的体式正和"章台柳"相似，不过用仄韵。刘禹锡的诗以词命题的很多，都是整齐的五七言，便是后人认作词的"抛球乐"、"纥那曲"，也都是整齐的五言律绝，大约他的诗也和元、白的诗一样，多为知音协律者所歌。元稹《重赠》诗说："休遣玲珑唱我诗，我诗多是别君辞。"自注："乐人商玲珑能

歌，歌予数十诗。”又《见人咏韩舍人新律诗因有戏赠》云：“轻新便妓唱，凝妙入僧禅。”宣宗《吊白居易》诗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白居易《醉戏诸妓》诗云：“席上争飞使君酒，歌中多唱舍人诗。”又《闻歌妓唱严郎中诗因以绝句寄之》云：“已留旧政布中和，又付新诗与艳歌。”因为他们这班风流自赏的诗人，当贬谪失意的时候，不免有些感伤颓废的气氛，爱和妓女、乐人接触，又能欣赏当地的民间歌曲，所以多有作诗即唱、依曲作词的机会。总之，长短句的词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渐渐起来了，尤其是韦应物、刘禹锡、白居易三个人做了这种新型文学的创始者。

以上所说，可证词起于中唐时候。倘若一定要说词已萌芽于盛唐，那么，词的生长，就在中唐了。

自从韦应物和刘、白在诗歌上开了词的一条新路，词人就渐渐多起来了。郑符、段成式、张希复三人所作《闲中好》：

闲中好，尽日松为侣。此趣人不知，轻风度僧语。

——郑

闲中好，尘务不萦心。坐对当窗木，影看三面阴。

——段

闲中好，幽磬度声迟。卷上论题肇，画中僧姓支。

——张

这还像是偶然倡和之作。只有皇甫松（父湜）作词稍多，王国维从《花间》、《尊前》二集及《全唐诗》辑得其词二十二首，收入《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因松自称檀栾子，就称为《檀栾子词》。最可注意的是《竹枝》、《采莲子》二词：

木棉花尽竹枝荔支垂女儿，千花万花竹枝待郎归女儿。
斜江风起竹枝动横波女儿，劈开莲子竹枝苦心多女儿。

（《竹枝》六首录二）

菡萏香连十顷陂举棹，小姑贪戏采莲迟年少。晚来弄水船

头湿举棹，更脱红裙裹鸭儿年少。

（《采莲子》二首录一）

于整齐的七言句中或句尾附有二字旁注，大概就是所谓“和声”罢，但不知怎样歌唱法。其《忆江南》二首：

兰烬落，屏上暗红蕉。闲梦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潇潇，人语驿边桥。

楼上寝，残月下帘旌。梦见秣陵惆怅事，桃花柳絮满江城，双髻坐吹笙。

厉鹗《论词绝句》云：“颇爱花间肠断句，夜船吹笛雨潇潇。”王国维也以为“情味深长在乐天、梦得上”。可是从来论者称为刘、白以后第一个大词人的还是那位“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的温庭筠。《花间集》录他的词六十六首，王国维补辑为《金荃词》，共七十 首。《词苑丛谈》说：“唐宣宗爱唱《菩萨蛮》，令狐丞相（绹）托温飞卿撰进，宣宗使宫嫔歌之。”今存《菩萨蛮》十六首，不知是否撰进之作。这里录三首：

玉楼明月长相忆，柳丝袅娜春无力。门外草萋萋，送君闻马嘶。　画罗金翡翠，香烛销成泪。花落子规啼，绿窗绮梦迷。

南园满地堆轻絮，愁闻一霎清明雨。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　无言匀睡脸，枕上屏山掩。时节欲黄昏，无憀独倚门。

夜来皓月才当午，重帘悄悄无人语。深处麝烟长，卧时留薄妆。　当年还自惜，往事那堪忆。花露月明残，锦衾知晓寒。

这三首词通体无生硬字句，而清绮有味，《栩庄漫记》称为“全璧”。我最欢喜他的《更漏子》一首：

玉炉香，红蜡泪，偏照画堂秋思。眉翠薄，鬓云残，夜长衾枕寒。　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

《尊前集》以此词为冯延巳作，不知何据。词写秋思离情，凄艳欲绝，

“梧桐树”数句真是语弥淡，情弥苦。《栩庄漫记》说：“飞卿此词自是集（《花间》）中之冠。”还有《梦江南》二首也极佳。

千万恨，恨极在天涯。山月不知心里事，水风空落眼前花。摇曳碧云斜。

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蘋洲。

此词幽情远韵，低回不已，使人读之，徒唤奈何。论词者往往以温比屈，似觉过当。但此词幽绝韵绝，正复不让《九歌》“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叶下”诸语。温庭筠的词比诗更多富贵气，词的内容是富贵生活，词的形式多富贵辞藻。因此金玉锦绣，络绎笔端。如写容貌及其他化装品物者，则有香腮、金靥、云发、宝鬟、蛾眉、玉腕，以及宝函、钿筐、鸾镜、玉钗、翠凤、翠钿、钿雀、红粉之类。如写衣服被帐者，则有绣衫、罗袖、画罗、绣衣、霞帔、金带、绣罗襦、绣芙蓉、金鹧鸪、金凤凰、金鸂鶒、金鹦鹉、金翡翠、金雁、鸳鸯锦，以及锦衾、鸳被、锦帐、凤帐、绣帏、罗幕之类。如写建筑工艺及其室内装饰器物者，则有金堂、玉楼、朱门、珠阁、雕梁、绣槛、翠箔、珠帘、银屏、琪树，以及金鸭、玉炉、麝煤、香雾、兰釭，银烛之类。如写舟车及其他器物者，则有兰棹、兰桡、香车、金鞯之类。总之，在他的六十首词中，这类富丽香艳的词藻，重见迭出，不胜枚举。他有缠绵悱恻的情思，带着绮罗脂粉的色泽，自我开创，还不伤雅，他人仿效，便觉俗恶。《栩庄漫记》所谓“正如小家碧玉初入绮罗丛中，只能识此数事，便矜羡不已”，这话不错的。花间派以后的词人模仿《花间》，难见出色，其故在此。《御选历代诗录》说是唐自大中（宣宗年号，847——859）后，诗衰而倚声作，至庭筠始有专集，名“握兰”、“金荃”。王国维以为宋时飞卿词止有一卷，“握兰”、“金荃”当是诗文集。其实，晚唐时候，诗词的界限还是未分。比如《草堂诗余》所录温词《木兰花》原是《春晓曲》一诗。同时

司空图仅有之《酒泉子》一词也在诗集里。韩偓的词，《尊前集》仅录《浣溪沙》二首，但《香奁集》中还有不少可认为长短句的词，故王国维辑为《香奁词》，共得十三首，而且他也承认唐人诗词尚未分界。

以上所说，可证长短句的词实成立于晚唐时候。

关于词的发展，我们虽不必机械地坚持由四言而五言、七言而长短的形式论，却也不愿苟同于诗词绝缘论，以为诗和词决不相蒙。因为自初唐乐府古曲沦缺而后，继之而起的可歌之诗，是先有整齐的五七言律绝，后来才有长短句的词，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要考察由诗到词的发展，是不能不考察诗歌与音乐之关系的。因此，我很重视隔唐代不远的宋人所见的词的起源之说。北宋沈括《梦溪笔谈》说：

> 诗之外又有和声，则所谓曲也。古乐府皆有声有词，连属书之，如曰"贺贺贺""何何何"之类，皆和声也。今管弦之中，缠声亦其遗法也。唐人乃以词填入曲中，不复用和声。

这可称为"词起于填实和声说"。《全唐诗》编者于词的部分加以小注道：

> 唐人乐府，元用律绝等诗杂和声歌之。其并和声作实字，长短其句以就曲拍者，为填词。开元、天宝肇其端，元和、太和衍其流，大中、咸通以后，迄于南唐二蜀，尤家工户习，以尽其变。凡有五音二十八调，各有分属，今皆失传。

这像是就沈括所说而加以补充的，这是关于词的起源最有势力的一说。《朱子语类》论诗云：

> 古乐府只是诗，中间却添许多泛声。后来的人怕失了那泛声，逐一声添个实字，遂成长短句，今曲子便是。

这可称为"词起于填实泛声说"。何谓泛声？我想就是宋末沈义父在《乐府指迷》中说的教师唱家有衬字。他还说：

> 古曲谱多有异同，至一腔有两三字多少者，或句法长短不

等。盖被教师改换，亦有嘌唱一家多添了字。

这似可用为词有泛声的一种解释。还有比朱子稍前一点，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中也说：

唐初歌舞多是五七言诗，后渐为长短句，今止存“瑞鹧鸪”、“小秦王”二阕。“瑞鹧鸪”是七言八句诗，犹依字易歌。“小秦王”是七言绝句，必须杂以虚声乃可歌耳。

我看所谓虚声和泛声虽字面不同，而意义则一，都是说为著顺应乐句的音数拍子，歌者自己添上些无甚意义的字，以补歌辞的不足。至于所谓和声，它的正确的意义倘若真是歌时群相随和之声，那就与泛声显然不同。除了上文所举皇甫松的“竹枝”、“采莲子”两首可以作为歌辞附有和声的例以外，把和声填著实字而变为本辞的例，在其他唐人作品中不可得见。只有五代张泌的“柳枝”一首：

腻粉琼妆透碧纱，雪休夸。金凤搔头堕鬓斜，发交加。倚著云屏新睡觉，思梦笑。红腮隐出枕函花，有些些。

同时顾敻也有这样的一首“柳枝”。这就像是由七绝而填实和声的歌词。但如《全唐诗》编者的所谓和声，意思含混，大概是包括了泛声而说的。我想将泛声或和声填著实字加入本辞，于是就由整齐的五言、六言、七言的诗而形成了长短句的词，并非完全出于沈括、胡仔、朱子、沈义父诸人无根据的臆说。因为不仅他们生在宋代，去唐未远，传闻比较可靠；而且词在当时正是一种盛行的活文学，他们当然经验或考察过词的歌唱的实际。我们须知唐代可歌的诗虽是整齐的五言、六言、七言律绝，乐曲却是可以因旋律的进行而伸缩变化的。我们虽不确信《北词广正谱》所载王维《渭城曲》于本辞外添加了那么多的字，那就是唐人绝句原来的一种歌法；却不难推想当初乐人谱诗入乐而填实和声或泛声是可有的事，而且是很不方便的事。所以后来一般懂得音乐的诗人如韦应物、王建、刘禹锡、白居易之流，为了顺应乐曲的伸缩变化，就开始试作长短句的词。温

庭筠比较韦、白、刘、王为后进，承受了先进者宝贵的经验，适应社会环境的需要，加以个人的天才、兴趣和努力，依曲而作的词更多，所以他就成了词的初期一个大作家，而且给了继起的作家以莫大的影响，花间派的词人出来了。

所谓花间派，是指《花间集》中一群词人而说的。《花间集》为五代蜀赵崇祚所编，共有诗客曲子词五百首，分为十卷。除了晚唐温助教庭筠、皇甫先辈松（以上二人上文已经论过）、中原和学士凝、荆南孙少监光宪、南唐（?）张舍人泌以外，余如韦相庄、薛侍郎昭蕴、牛给事峤、毛司徒文锡、牛学士希济、欧阳舍人炯、顾太尉夐、魏太尉承班、鹿太保虔扆、阎处士选、尹参卿鹗、毛秘书熙震、李秀才珣，这十三人当时都在蜀。未知蜀中词人独多呢，还是赵崇祚的见闻限于蜀中一隅。当时蜀中自为风气，和骚乱的中原隔绝。加以前蜀主王建、王衍，后蜀主孟昶，都算爱士能文，这也是蜀中词人独多的原因之一吧。

论到蜀中词人，当以韦庄为其代表作者。

韦庄（855—920），字端己，杜陵人。乾宁九年登进士第，授校书郎。光化三年（900）赴蜀，为王建掌书记。王建开国，累官至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卒，谥文靖。《浣花集》十卷，补遗一卷，有《四部丛刊》本。《唐诗记事》说："庄应举时，遇黄巢犯阙，著《秦妇吟》，云'内库烧为锦锈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在位多垂讶，庄乃讳之，时号'秦妇吟秀才'。"后来韦庄撰《家诫》，不许垂"秦妇吟"幛子，故《浣花集》亦不载此诗。四十年前，敦煌石室遗书发见，中有自署"天复五年乙丑岁十二月十五日敦煌郡金光明寺学仕张龟写"的《秦妇吟》一本，才又流传于世。多谢黄巢之乱，成就了他这一诗人。韦庄在晚唐有诗名，入蜀以后又以词名著，他一个人恰恰代表了诗词代谢之际的两方面的作者。五代有许多重要的词人，重要的诗人却没有几个。只有诗僧贯休、齐己可以比肩和韦应物为友的皎然。还有女诗人，

后蜀主孟昶的花蕊夫人徐氏（一作费氏）和号为女校书的薛涛也可以比得上稍前一点的鱼玄机。所以我们论诗到五代，不能不推韦庄为一个大诗人，《秦妇吟》就是他的不朽的作品。此诗藉一个从长安逃出来的阔人家姨太太，说出她身经乱离的见闻感愤，讪笑官军甚于痛诋草贼，是极沉痛深刻之作，共长一千六百六十六字，是七言诗里第一长篇，它为唐诗放了最后的光辉。今引一段于此：

> 蓬头垢面眉犹赤，几转横波看不得。衣裳颠倒言语异，面上夸功雕作字。柏台多士尽狐精，兰省诸郎皆鼠魅。还将短发戴华簪，不脱朝衣缠绣被。翻持象笏作三公，倒佩金鱼为两史。朝闻奏对入朝堂，暮见喧呼来酒市。

可以想见在黄巢领导之下的农民群众，他们一旦建立了政权，只知道摹仿旧统治者的一些老花样，这是那时没有觉悟又没有政治目标的农民革命应有的现象。再引一段于此：

> 明朝又过新安东，路上乞浆逢一翁。苍苍面带苔藓色，隐隐身藏蓬荻中。问翁本是何乡曲？底事寒天霜露宿？老翁暂起欲陈词，却坐支颐仰天哭。乡园本贯东畿县，岁岁耕桑临近甸。岁种良田二百廛，年输户税三千万。小姑惯织褐絁袍，中妇能炊红黍饭。千间仓兮万斯箱，黄巢过后犹残半。自从洛下屯师旅，日夜巡兵入村坞。匣中秋水拔青蛇，旗上高风吹白虎。入门下马若旋风，罄室倾囊如卷土。家财既尽骨肉离，今日垂垂一身苦。一身苦兮何足嗟，山中更有千万家。朝饥山上寻蓬子，夜宿霜中卧荻花。

诗中这位老翁原来是一个大地主，也叫他尝尝乞丐生活的味道，不能不感谢那些官军。陈寅恪作《秦妇吟校笺》，推寻韦庄晚年所以讳言此诗之故，以为是时“从长安东出奔于洛阳者，如《秦妇吟》之秦妇，其路线须经近杨（复光）军防地。从长安西北奔于成都者，如《金溪闲谈》之李氏女，其路线亦须经近杨军防地。而杨军八都大将之

中，前蜀创业垂统之君，端己北面亲事之主（王建），即是其一。其余若晋晖、李师泰之徒，皆前日杨军八都之旧将，后来王蜀开国之元勋也。当时复光屯军武功，或会兵华渭之日，疑不能不有如秦妇避难之人，及李女委身之事。端己一诗，流行一世，本写故国乱离之惨状，适触新朝宫闱之隐情，所以讳莫如深，志希免祸。以生平之杰构，古今之至文，而竟垂戒子孙，禁其传布者，其故倘在斯欤"？考证至为精审。韦庄的词散见于"花间"、"尊前"诸集，王国维辑为《浣花词》一卷，共得五十四首。我最爱读他的这几首词：

>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垆边人似月，皓腕凝双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
> 劝君今夜须沉醉，尊前莫话明朝事。珍重主人心，酒深情亦深。　须愁春漏短，莫诉金杯满。遇酒且呵呵，人生能几何！（《菩萨蛮》）
>
> 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别君时，忍泪佯低面，含羞半敛眉。　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除却天边月，没人知。（《女冠子》）
>
> 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思帝乡》）

我以为韦词出语似浅，而含情至深；不似温词故为富丽，而时有俗气。张炎《词源》说："词之难于令曲，如诗之难于绝句，不过十数句，一句一字闲不得，末句最当留意，有有余不尽之意始佳。当以《花间集》中韦庄、温庭筠为极则。"王国维说："端己词深语秀，虽规模不及后主正中，要在飞卿之上。"（《观堂集林》）从来论词的人常以温、韦并称，但论到二人的优劣，就人各一见了。

总之，《花间集》作者十八人，以温、韦为两大家。词格近温者，有牛峤、顾敻、阎选、魏承班、毛熙震，而以毛文锡所作质直浅露，为"花间"最下品。词格近韦者，有皇甫松、孙元宪、薛昭蕴、牛希济、鹿

虔扆。介乎温、韦之间者，有曲子相公和凝，以及张泌、尹鹗。此外有可独张一帜者为李珣，欧阳炯亦属之。《栩庄漫记》说："花间词约可分为三派：镂精错彩，缛丽擅长，而意在闺帏，语无寄托者，飞卿一派也。清绮明秀，婉约为高，而言情之外，兼书感兴者，端己一派也。抱朴守质，自然近俗，而词亦疏朗，杂记风土者，德润一派是也。"这话是很确当的。

李珣，字德润，梓州人，蜀秀才。其妹舜弦，王衍纳为昭仪。以先世为波斯国人，被呼为李波斯。尹鹗有诗嘲笑他道："异域从来不乱常，李波斯强学文章。假饶折得东堂桂，胡臭熏来也不香。"其实李珣于国亡后不仕，词多感慨之音，人格还算是香的。他的《南乡子》为写粤中风俗景物之作：

乘彩舫，过莲塘，棹歌惊起睡鸳鸯，带香游女偎伴笑，争窈窕，竞折团荷遮晚照。

倾绿蚁，泛红螺，闲邀女伴簇笙歌。避暑信船轻浪里，闲游戏，夹岸荔支红蘸水。

渔市散，渡船稀，越南云树望中微。行客待潮天欲暮，送春浦，愁听猩猩啼瘴雨。

相见处，晚晴天，刺桐花下越台前。暗里回眸深属意，遗双翠，骑象背人先过水。

《栩庄漫记》说："李珣《南乡子》均写广南风土，欧阳炯作此调亦然。珣，波斯人。或曾至粤中，岂炯亦曾至粤？不然，则《南乡子》一调或专为咏南粤风土而制，故作者一本调意为之也。珣词如'骑象背人先过水'、'竞折团荷遮晚照'、'愁听猩猩啼瘴雨'、'夹岸荔枝红照水'诸句，均以浅语写景而极生动可爱，不下刘禹锡巴渝"竹枝"，亦《花间集》之新境也。"不错，李珣写此调十首，都用明洁之笔，绘影绘声，引人入胜。欧阳炯的《南乡子》八首也有此胜处，今录四首：

嫩草如烟，石榴花发海南天。日暮江亭春影渌，鸳鸯浴，水远山长看不足。

画舸停桡，槿花篱外竹横桥。水上游人沙上女，回顾，笑指芭蕉林里住。

岸远沙平，日斜归路晚霞明。孔雀自怜金翠尾，临水，认得行人惊不起。

路入南中，桄榔叶暗蓼花红。两岸人家微雨后，收红豆，树底纤纤抬素手。

欧阳炯(896—971)，益州华阳人，仕前后蜀，累官至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兼修国史。入宋，授左散骑常侍。王国维收辑他的词为《欧阳平章词》，凡三十一首。他说："愁苦之音易好，欢愉之语难工。"他很会写公子佳人的旧愁新欢，离情别绪。他为《花间集》作序，可见他在当时是一个很有名的词人了。

《花间集》不录君主之作。后唐庄宗李存勗、前蜀主王衍、后蜀主孟昶、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都能作词，尤以南唐二主为最有名。并且南唐偏安江左，堪称乐国。史称士之避乱失职者群以南唐为归。南唐君主自以为出自大唐苗裔，中原文物之所寄，都能提倡文学，培植士类。当时著名词人，张泌而外，有冯延巳。延巳一名延嗣，字正中，广陵人，一说新安人。他在南唐由翰林学士做到宰相。他的词有《阳春集》。陈世修《阳春集序》说："金陵盛时，内外无事，明僚亲旧，或当燕集，多运藻思，为乐府新词，俾歌者倚丝竹而歌之。"相传冯延巳尝作《谒金门》：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闲引鸳鸯芳径里，手挼红杏蕊。斗鸭，阑干独倚，碧玉搔头斜坠。终日望君君不至，举头闻鹊喜。

元宗李璟戏问延巳道："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延巳对道："安得如陛下'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特高妙也!"可以想

见南唐君臣沉湎声色的生活正和蜀中一样。懂得这个，才可以来论南唐后主李煜的词。

李煜(937—978)字重光，璟第六子，二十五岁时嗣位，在位十五年。宋将曹彬攻金陵，煜降(975)，被封为远命侯。相传煜在宋，有札致金陵旧宫人道："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又作《虞美人》一词：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宋太宗知道了，赐他一种毒药(牵机药)，他死了。《南唐二主词》有王国维辑本，刘继曾笺注本。中宗词不过几首，后主词存四十多首。后主第一期的词是在"量珠聘妓，纫彩维艘"的生活里所作：

　　花明月暗笼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刬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　画堂南畔见，一晌偎人颤。好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菩萨蛮》)

　　红日已高三丈透，金炉次第添香兽，红锦地衣随步皱。佳人舞点金钗溜，酒恶时拈花蕊嗅，别殿遥闻箫鼓奏。(《浣溪沙》)

　　晓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凤箫声断水云闲，重按霓裳歌遍彻。　临风谁更飘香屑，醉拍阑干情未切。归时休放烛花红，待踏马蹄清夜月。(《玉楼春》)

我们从这种词，可以想见江南小朝廷那位皇帝是怎样的风流豪侈。他自己回顾当日的生活时也说："岂知佳苇乎性，忘长夜之靡靡；宴安其毒，累大德于滔滔。"(《却登高文》)可是悔之已晚，不久就亡国了。他第二期的词是从"无一欢之可作，有万绪以缠悲"，直到"以眼泪洗面"的生活里所作：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

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乌夜啼》）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阙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销磨。最是苍黄辞庙日，教坊独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破阵子》）

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　多少泪，沾袖复横颐。心事莫将和泪滴，凤笙休向月明吹，肠断更无疑。（《望江南》）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暮凭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

他这种词已经不是享受的歌唱，而是悲苦的声诉。词本是统治阶级君主臣僚寻开心的曲子，到了亡国以后的李后主，词就成了他的发愤告哀的一种新体诗。从此以后，词虽还可以歌唱，却不必专为歌唱而作。由歌者的词变为诗人的词，应该从他数起。他是五代最后死的一个大词人，开拓了词的一个新境界。

以上叙述五代词人完了。假如有人要问："词在这一时代何以特别流行呢？"

我以为就文学形式的发展而说，诗到晚唐，真是如皮、陆一流诗人所说，由古体而律体，由律体而杂体，诗的道路已经被人走到了尽头，长短句的词应运而兴，自是一种自然的趋势。而且词的起来是和音乐有密切关系的，这在上文已经说过了。再就社会背景而说，词在这一时代特别流行，并不是偶然的。但看欧阳炯的《花间集叙》就可知道。细玩叙文之意，词和南朝乐府宫体是同性质的东西，各适应着当时统治阶级贵族官僚以及知识分子的要求。他们在社会上凭藉了自己优越的地位，特殊的权利，世间上一切可能的幸福都得享受。醇酒、妇人、歌唱，三者谐和酣美的享乐，正是他们所追求的。词，这东西恰出于他们那一阶级之手，有《花间集》的作者可

证；恰以他们的姿态出现，恰以他们的生活为内容，而歌奏于宫庭北里，绣幌绮筵，满足他们的生之享乐的要求，有《花间集》的作品可证。他们这样贪图瞬间的享乐，带着极浓厚的感伤或颓废的气氛，这是他们生在晚唐、五代那样兴亡倏忽，祸变无常的状态里而无可如何的。陆游《花间集跋》云："斯时天下岌岌，士大夫乃流宕如此，或者出于无聊。"他说出于无聊，这是不错的。唐初兴盛时有所谓"英雄乐"，晚唐、五代叔季之世有这种儿女词，不能说文学与世变无关了吧。

五代文学



杨荫深著

据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重排

第一章 绪 言

唐自黄巢乱后，藩镇益发恣肆，互相吞并，中央早已无权过问。其时政府大权俱入朱全忠一人之手，于是 907 年遂有代唐称帝之事，而开五代纷乱之局。五代可以说是最纷乱的一个时代，故史有“乱五代”之称。原来朱全忠既篡位，诸藩镇当然不服，于是各逞其强，据地称帝，故历史上除正统的梁、唐、晋、汉、周五代以外，当时尚有十国(即吴、南唐、前蜀、后蜀、南汉、楚、吴越、闽、荆南、北汉)，前后称雄于中国，而五代也不过占据中原的一部分，其他东南与西南均为十国所割据，直至 979 年才为宋所统一，五代纷乱的局面至此才告了闭幕。

五代既是这样纷乱的时代，在五十余年中连易了五次的朝代，国祚最长者不过十七年(后梁)，而短者只有四年(后汉)，诸帝原皆恣横的武夫，杀伐篡夺之不暇，还有什么余暇来谈文学呢？文学之衰落，原是意中的事实。可是五代之外的十国，却也有年祚较长而地处较静的，如西蜀、如江南、如浙、如闽，尽有一般文士来避地于此，仍可歌着他们爱好的文学，那倒也是意中的事实。所以就五代而言五代(指梁、唐、晋、汉、周)，那是没有什么文学可以说的，就五代而旁及十国，五代仍不愧为有文学的一个时代，而且在文学史上还可称为一个灿烂的时期。

这灿烂便是词，是一种新体的诗，可以歌唱的，或称为“长短句”者是。词原起于中唐，至五代而方盛，后至于宋始更发挥光大。所以五代可以说是词的草创时代，若不经过这一个时代，词的发展是不会有这样迅速的。所以五代在文学史上，便永远成为一个可纪念的时代。

词本来起于民间，流传于娼女、歌伶之口，后来才渐渐被文人学士采用，于是体裁渐多，内容渐富。五代词的特色，那便是还富于平民色彩，还尽可上得娼女、歌伶之口。因为他们的词，大多不外是离情闺思，这与后来什么都谈是不同的。因为只写些离情闺思，所以用不着标题，不像后来，于词调之下必须再标一个题目。同时他们所写都是绮丽香艳，惯作小儿女的情态，正如赵崇祚所称为“花间”。确是读了他们的词，如人在百花丛里一样，觉得倚红偎绿，十分陶醉。虽然如李后主的也写他亡国的悲哀，但这种在五代词中却是很少很少的，大多数的词人总是高唱着“夜夜相思更漏残”(韦庄)，“寄语薄情郎，粉香和泪泣”(牛峤)，“绮罗纤缕见肌肤”(欧阳炯)，“红腮隐出枕函花”(张泌)，这种动人心肺、摇人魂魄的情调的。正如欧阳炯所谓“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见《花间集》序)，词原是要取其“丽锦”，按之于“香檀”，而一方面无非欲“助娇娆之态”，使美人、艳歌相得益彰，否则满篇辛酸语，岂非大煞风景了吗？

五代除了词足以灿烂于一时外，诗坛亦颇呈活跃的气象，当时写旧体诗的人依然很多，惟诗格不高，已不能与词争雄强了。陆游所谓“诗至晚唐、五季，气格卑陋，千人一律，而长短句独精巧高丽，后世莫及”(见《花间集跋》)，这话是很对的。

第二章　后梁文学

五代的第一个朝代是梁，它的始祖是朱全忠，于907年废唐帝而自立，可是好景不常，即位六年就被郢王友珪所弑。不久末帝即位，也不过是十一年，结果又被后唐庄宗所灭，他遂自杀。

这样短促的十七年，在干戈扰乱之中，当然是谈不到什么文学的。又况太祖朱全忠本是黄巢的贼将，史称"不事生业，以雄勇自负，里人多厌之"。可见得他是一个无赖之类，毫不知书。同时前蜀亦于那时建国。蜀地本较为富庶之区，且隔绝中原，少受兵乱，故一般文人学士率多避难于那里，而中原文学遂变为淹没无闻了。兹就现时尚有存诗诸家，如罗绍威、罗衮、王镕等，略述如下：

罗绍威，字端己，魏州贵乡人。唐末以父荫官魏博节度使，封邺王。他见唐祚日衰，太祖兵强，故很倾心附结。及太祖称帝，以他为太傅，兼中书令。年三十四卒，赠尚书令。

他形貌魁伟，有英杰气。史称他"攻笔札，晓音律。性复精悍明敏，服膺儒术，明达吏理。好招延文士，聚书万卷，开学馆，置书楼。每歌酒宴会，与宾佐赋诗，颇有情致"（见《五代史》本传）。那时罗隐佐吴越钱镠军幕，他最嗜其作，因目自己所作为《偷江东集》，共五卷。但今只存诗二首，《柳》云：

> 妆点青春更有谁？青春常许占先知。亚夫营畔风轻处，元亮门前日暖时。花密宛如飘六出，叶繁何惜借双眉。交情别绪论多少，好向仁人赠一枝。

罗衮，字子制，临邛人。唐大顺中，历左拾遗、起居郎。后入梁，事太祖为礼部员外郎。他曾劝罗隐来就夕郎，而罗隐终不肯就。著有诗集二卷，今只存三首。《清明登奉先城楼》云：

年来年去只艰危，春半尧山草尚衰。四海清平耆旧见，五陵寒食小臣悲。烟销井邑隈楼槛，雪满川原泥酒卮。拭尽贾生无限泪，一行归雁远参差。

王镕，其先回鹘人。唐中和中，袭父位为成德军节度使，封常山郡王。太祖即位，改封赵王，后竟为大将张文礼所弑。他虽为异族人士，亦善于诗。今传有他《哭赵州和尚》诗二首，兹录其一首，如下：

佛日西倾祖印隳，珠沉丹沼月沉辉。影敷丈室炉烟惨，风起禅堂松韵微。只履乍来留化迹，五天何处又逢归。解空弟子绝悲喜，犹自潸然对雪帏。

此外李京、许鼎均梁贞明六年进士，京有《除夜长安作》云："长安朔风起，穷巷掩双扉。新岁明朝是，故乡何路归？鬓丝饶镜色，隙雪夺灯辉。却羡秦州雁，逢春尽北飞。"鼎有《粤岭四望》云："汉家仙仗在咸阳，洛水东流出建章。野老至今犹望幸，离宫秋树独苍苍。"均称新警。《五代史》尚称有张策，字少逸，敦煌人。聪警好学，尤乐章句，官终刑部尚书，著有词制歌诗二十卷。李珽，字公度，亦敦煌人。聪悟有才学，尤工词赋，官谏议大夫。张儁，字彦臣，善为五言诗，其警句颇为人所称，官至礼部郎中。余外则无所闻云。

第三章　后唐文学

李存勗于923年灭了后梁而称帝，是为后唐庄宗。但他自己只即位三年，至第四年而为伶人郭从谦所弑。于是明宗嗣位，凡八年而殂。次年闵帝即位，四月被李从珂所废而自立，是为废帝。废帝即位三年，又为晋高祖石敬瑭所灭(936)，国遂亡。自庄宗至废帝虽四主，而建国不过十四年，较之后梁又要少了三年。

在这十四年中，当然也无文学可言。幸而庄宗是个爱好文艺的帝王，史称他"既好俳优，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晋之俗，往往能歌其声，谓之御制者皆是也"(见《新五代史·伶官传》)，可知他在当时一定制了许多词曲。他自己为伶人所杀，也正可说为文艺而牺牲呢！只可惜他在位太暂，国祚又短，除他一人以外，其余竟也默默无闻，这与后梁可说是同样的。

庄宗李存勗(885—926)，其先本沙陀人，以有功于唐，唐懿宗时乃赐姓李。他幼有奇表，及长善骑射，胆勇过人。于梁开平二年(908)即晋王位，923年灭梁而自立。但他因喜音声歌舞俳优之戏，以致荒于政治，卒为伶人郭从谦所弑，且其尸亦为所焚，可谓死得惨极。他自即位至死，不过四年罢了，死时年四十二。

他虽然是个武夫，但却做得一手好词，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可说是一个很奇特的人物。他的词今只存四首，却也写闺情，学小女儿的风姿，如《如梦令》：

> 曾宴桃源深洞，一曲清歌舞凤。长记别伊时，和泪出门相送。如梦，如梦，残月落花烟重。

又如《阳台梦》：

> 薄罗衫子金泥缝，困纤腰怯铢衣重。笑迎移步小兰丛，亸

金翘玉凤。　娇多情脉脉，羞把同心捻弄。楚天云雨却相和，又入阳台梦。

这些都写得深挚婉约，有旖旎的风格的。我们读到此词，谁还相信他是个纵横疆场的代北健儿呢？

此外可略述者有：薛廷珪，其先河东人。中和中，在西川登进士第，累历台省，昭宗迁洛阳，授礼部侍郎。入梁为礼部尚书，庄宗平定河南，以他年老，除太子少师致仕。同光三年（925）卒，赠右仆射。他著有《凤阁词书》十卷、《克家志》五卷，以善于诗赋见称于当世。

李琪，字台秀，陇西人。幼时亦擅文名，昭宗时李谿父子以文学知名。他年十八，袖赋一轴谒谿，谿览后惊异，为之倒屣相迎。天复初，应博学宏词，居第四等，授武功县尉。梁祖受禅，累迁户部侍郎、翰林承旨。庄宗入汴，素闻他名，历太常卿、吏部尚书，后以太子太傅致仕，年六十卒。他有《金门集》十卷，大行于世。

李袭吉，洛阳人。乾符末应进士举，时中原丧乱，他乃避地太原。武皇（李克用）署为府掾，后掌书记，当时羽檄军书多出他手。天祐三年（906）卒，后追赠礼部尚书。为文精意练实，动据典故，与罗隐、李山甫并有文誉。

窦梦徵，同州人。少苦心为文，登进士第，历校书郎，充翰林学士。庄宗入汴，他以例贬沂州。天成初，迁中书舍人，复入为翰林学士、工部侍郎。卒，赠礼部尚书。他在当时文称甚高，尤长于笺启，编有《东堂集》十卷行于世。

又有乌震，冀州信都人。好为诗辞，凡邮亭、佛寺多有留题之迹。卢士衡，天成间进士，有诗集一卷。今存诗七首，诗格不甚高。《花落》云："迎风啸未已，和雨落簌簌。千枝与万枝，不如一竿竹。"

第四章　后晋文学

后晋的始祖为高祖石敬瑭，他本出于西夷，以其父臬捩鸡从晋王李克用征伐有功，官至洺州刺史，遂留居中国。后于936年借契丹兵而灭后唐，契丹立他为晋皇帝，并与契丹主耶律德光约为父子。及高祖死，侄重贵继位，是为出帝，奢淫自纵，又欲与契丹绝欢，结果于946年又为契丹所灭，虏出帝而去，幽于黄龙府。

后晋的年祚也是很暂，不过十一年罢了。以言文学，当然也是很衰落的。惟有一事殊堪我们注意者，即在这样混乱短促的时期中，居然撰成了《唐书》二百卷。这是一部历史的巨著，虽然较欧阳修所撰的《新唐书》为芜杂，然其长处亦不可掩。故清代刊行《二十四史》时即将此二书并收兼蓄，而后之研究唐史者亦无不并及此二书的。奉诏撰此书者为刘昫（887－946），他字耀远，涿州归义人。神彩秀拔，文学优赡，与兄暄、弟暤俱有乡曲之誉。初为定州王处直观察推官。后唐庄宗即位，拜他为太常博士，以为翰林学士。明宗时累迁至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及高祖称帝，诏为东都留守，判河南府事。后奉使契丹，还迁太子太保，兼左仆射，封谯国公。开运初，授司空平章事，监修国史。契丹犯京师，他以眼疾留于东京，其年病卒，年六十。他撰《唐书》，新、旧《五代史》本传均未述及。大约自宋嘉祐以后，欧阳修、宋祁等重撰新书，此书已废，故作传者遂把他漏略，亦未可知。他撰此书，原有蓝本，故编撰较易，大约即在高祖即位后数年中成之。

当时又有尹玉羽、郑云叟二人，以诗文名一时。尹玉羽，京兆长安人。唐天福中随计京师，甚有文称。梁贞明中，刘鄩辟为保大军节度判官。后唐时，又为光禄少卿。后退居秦中，以诗酒林泉自乐，

因号自然先生。及高祖入洛，受诏而来，以所著《自然经》五卷贡之，因老授少府监致仕，月给俸钱，不久卒。有《武库集》五十卷行于世。

郑云叟本名遨，南燕人，云叟乃他的字，因避后唐明宗庙讳，故遂以字行。少好学，耿介不屈。唐昭宗时，曾应进士举不第，遂欲携妻子隐居不出。其妻非之，他乃薄游数郡，获数百缗以赡其家，已则辞诀而去。初入少室山，著《拟峰诗》三十六章，后游华阴。高祖即位，闻他名，征为右谏议大夫，他称疾不起，上表陈谢。高祖因赐他号逍遥先生，以谏议大夫致仕，年七十四卒。他好酒能诗，善长啸。有大瓠云可辟寒暑，置酒于其中，经时味不坏，日携就花木水石之间，一酌一咏。尝为《咏酒》诗千二百言，一时海内争传诵之。有文集二十卷行于世。

此外又有熊皎者，亦以能诗名。皎不知何许人，自号九华山人。后唐清泰二年(935)进士，延安节度使刘景岩辟为从事，高祖时，他说景岩归朝，以功擢右谏议大夫。不久坐事，贬为上津令。他工古律诗，语意甚妙，有《屠龙》、《南金》二集。《早梅》云：

> 江南近腊时，已亚雪中枝。一夜欲开尽，百花犹未知。人情皆共惜，天意欲教迟。莫讶无浓艳，芳筵正好吹。

又有史圭，常山人，官刑部侍郎。裴皞，字司东，河东人，官兵部尚书。韩恽，字子重，太原晋阳人，官兵部尚书。卢质，字子徵，河南人，官太子太保。崔棁，字子文，博陵安平人，官太常卿。此数人《五代史》均称他们好学善属文，在当时文坛上亦有一部分的势力。

第五章　后汉文学

后汉自建国至亡国，不过四年而已(947—950)，这在历代建国的年祚中，可说是最短了。后晋既为契丹所灭，次年二月，高祖刘知远即称帝于晋阳。六月入大梁，乃正式改国号为汉。又次年二月，高祖殂，周王承祐立，是为隐帝。即位三年，为郭威所灭，国遂亡。

后汉以四年而建国亡国，且易二主，真如昙花一现。当然在如此短促乱离之间，政治上犹未上了轨道，欲言文学，自属难乎其难。我们在前面所述的梁、唐、晋三朝，均以无文学可言为遗憾，但虽无文学，终尚有可述之处，不过求其次者而已。若言后汉，则诚无文学之可言了。史称高祖“昔莅戎藩，素亏物望，洎登扆极，未厌人心。徒矜拯溺之功，莫契来苏之望，良以急于止杀，不暇崇仁。燕、蓟降师，既连营而受戮；邺台叛帅，因闭垒以偷生。盖抚御以乖方，俾征伐之不息。及回銮辂，寻堕乌号，故虽有应运之名，而未睹为君之德也。”而“隐帝以尚幼之年，嗣新造之业。受命之主，德非禹、汤；辅政之臣，复非伊、吕。将欲保延洪之运，守不拔之基，固不可得也。然西摧三叛，虽仅灭于欃枪；而内稔群凶，俄自取于狼狈。自古覆宗绝祀之速者，未有如帝之甚也。”以如此情形之下，除杀夺而外，还有什么可以谈呢？无已，惟李崧尚可为此时代一作家耳，余外则无可述者。

李崧，深州饶阳人。幼而聪敏，十余岁为文，家人即奇之。弱冠，本府署为参军。后唐同光初，魏王继岌为兴圣宫使，领镇州节度使，他以参军从事。那时推官李荛掌书，他见荛起草不工，密谓掌事吕柔说：“令公皇子，天下瞻望，至于尺牍往来、章表论列，稍须文理，李侍御起草，未能尽善。”吕柔因试他代为之，以示卢质、冯道，皆称

道不置，由是擢为兴圣宫巡官，独掌奏记。庄宗入洛，授太常寺协律郎。明宗时，累迁翰林学士、户部侍郎。晋祖入洛，召拜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出帝嗣位，充枢密使。国亡，契丹主甚称其才，尝谓左右道："我破南朝，只得李崧一人而已。"以为太子太师。高祖称帝，与冯道、和凝十数人归阙，授太子太傅。后为苏逢吉所诬，举家遇害，少长咸尸于市，人多冤之。

第六章　后周文学

后周太祖郭威，本为后汉枢密使，以隐帝欲杀他，他乃举兵而反，于951年即皇帝位。越三年而殂，晋王柴荣嗣位，是为世宗。世宗雅有德政，惜降年不永，美志不就，即位六年而殂。子恭帝立，未及一年，逊位于宋(960)，国祚遂绝。自建国至废国，先后亦不过十年而已。

后周的年祚也是这样的短促，按理也是无文学之可言的。但是后周却有两个特别原因，遂使五代文学之中，以后周为最兴盛。其一，当然由于当时帝王的倡导。史称世宗"内延儒学文章之士，考制度，修通礼，定正乐，议刑统。其制作之法，皆可施于后世"(《新五代史》本纪)。五代本来是一个极混乱的时代，诸帝均以杀伐为主，非子弑其父，即臣篡其君，以如此局面之中，还有何暇来谈文学？而诸帝又多是横恣的武夫，固不知文学为何物，遂使中原文士东西避难，而呈荒落之象。后周之所以能得兴盛一些，亦未始非世宗之能倡导有以致之。其二，五代既然是一个混乱的时代，各朝的年祚又是十分短促，故能臣事一朝者，殊寥落无几，欧阳修尝叹："五代得全节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士之被服儒者，以学古自名而享人之禄、任人之国者多矣。"(见《新五代史》杂传第四十二)所以有许多文学之士，如和凝、冯道、杨凝式、王仁裕等辈，均臣事四朝，不以为耻。前数朝文学之寥落无闻，一半就由于这般文士不能全节，而后周文学之得特盛，也由于这般文士之仍能来朝的缘故。

和凝(898—955)，字成绩，郓州须昌人。少好学书，一览即能知大义。年十七，举明经。至京师，忽梦人以五色笔一束给他，说道："子有如此才，何不举进士？"自是才思敏赡，十九登进士第。初为梁

义成军节度使贺瓌从事。瓌爱其才，以女妻之。后唐时，拜殿中侍御史，累迁知制诰、翰林学士、知贡举。入晋，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汉高祖时，拜为太子太傅，封鲁国公。至世宗显德二年卒，年五十八，赠侍中。

他姿状秀拔，神采射人。性好修整，车服仆从必加华楚，又好延纳后进，故甚有当时之誉。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有"曲子相公"之称。在中原文学中，他可说是鲁灵光殿了。他的著述甚富，有《演纶》、《游艺》、《孝悌》、《疑狱》、《香奁》、《籯金》六集，凡百卷。当时自篆于版，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人以是非之。

他因为爱写艳曲，又以相公应厚重有德，未免所玷，故后来他专托人收拾此种艳曲焚毁，并将原有的《香奁集》，嫁名于韩偓。《宋朝类苑》云：

> 和鲁公凝有艳词一编，名《香奁集》。凝后贵，乃嫁其名为韩偓，今世传韩偓《香奁集》，仍凝所为也。凝生平著述，分为《演纶》、《游艺》、《孝悌》、《疑狱》、《香奁》、《籯金》六集，自为《游艺集》序云："予有《香奁》、《籯金》二集，不行于世。"凝在政府避议论，讳其名，又欲后人知，故于《游艺集》序实之，此凝之意也。

这样看来，他既好文学，又爱相位，真是一个患得患失的人了。但他虽焚毁艳词，毕竟还未曾全被焚完，我们还有二十四首可以看到（见《全唐诗》所录），这里面也尽有写男女间的艳情的，如《江城子》：

> 迎得郎来入绣闱，语相思，连理枝。鬓乱钗垂，梳堕印山眉。娅姹含情娇不语，纤玉手，抚郎衣。

又如《临江仙》：

> 披袍窣地红宫锦，莺语时转轻音。碧罗冠子稳犀簪，凤凰双飐步摇金。 肌骨细匀红玉软，脸波微送春心。娇羞不肯入

鸳衾，兰膏光里两情深。

像这种的描写，不但艳而已，且已近乎透骨的狎昵了。他也工诗，有宫词百首，但多是颂圣歌功之作，在艺术上殊逊于词，兹姑举较清新者二首如下：

缕金团扇对纤𫄨，正是深宫捧日时。要对君王说幽意，低头佯念《婕妤》诗。

绣额朱门插艾人，羞将角黍近香唇。平明朝下夸宣赐，五色香丝系臂新。

冯道（886－954），字可道，瀛州景城人。唐天祐中，刘守光署为幽州掾，守光败，归太原监军使张承业。那时庄宗已并有河北，即以他掌书记，军中文翰一以委之，及即位，拜中书舍人、户部侍郎，明宗时，累改门下侍郎，户部、吏部尚书，加尚书左仆射，封始平郡公。晋祖入洛，以他为首相，寻加司徒兼侍中，进鲁国公，改燕国公。汉高祖时，拜太师。他以连事三朝，自以为乐，因自号长乐老。太祖即位，复拜太师、中书令，世宗时为山陵使，其年卒，年七十三。赠尚书令，追封瀛王，谥文懿。

他自幼纯厚好学，善于属文，披诵吟讽，终年不息，史称他"长于篇咏，秉笔则成，典丽之外，义含古道"。实则他的为诗，正如其人，浅近而多理语，如《偶作》：

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须知海岳归明主，未必乾坤陷吉人。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

他本有诗集十卷，但今只存五首。他在后唐明宗时，以诸经舛缪，与同列李愚，委学官田敏等取西京郑覃所刻石经，雕为印版，流布天下。这为中国雕版之最早者，于文化上有极大的贡献。

杨凝式（870－954），字景度，华阴人。唐昭宗时登进士第，授度支巡官。梁开平中，为殿中侍御史。后唐庄宗时，授比部郎中、知制

诰。入晋，改太子宾客。至汉，历少傅，少师。太祖时，以年老求致政，官至太子太保。年八十五卒，赠太子太傅。

他为人蕞眇而精神颖悟，富有文藻，长于歌诗。洛川寺观蓝墙粉壁之上，题纪殆遍。时人以其纵诞，有“风子”之号。今存诗三首，《赠张全义》云：

洛阳风景实堪哀，昔日曾为瓦子堆。不是我公重葺理，至今犹是一堆灰。

王仁裕（880—956），字德辇，天水人。少孤，不从师训，年二十五方有意就学，渐以文辞知名，秦帅辟为秦州节度判官。秦州归蜀，他乃事蜀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后唐庄宗平蜀，他复为秦州节度判官。晋高祖入立，历司封、左司郎中、谏议大夫。汉高祖时，后为翰林学士承旨，累迁户部尚书，罢为太子少保。显德三年卒，年七十七，赠太子少师。

他性晓音律，喜为诗，与和凝同以文章知名。少时曾梦剖其肠胃，以西江水涤之，由是文思益进，乃集平生所作诗为《西江集》百卷，然今只存一卷了。其诗殊平浅，无甚意趣可言，如《放猿》：

放尔丁宁复故林，旧来行处好追寻。月明巫峡堪怜静，路隔巴山莫厌深。栖宿免劳青嶂梦，跻攀应惬白云心。三秋果熟松梢健，任抱高枝彻晓吟。

后周除此四位老诗人外，余亦掩没无所闻。惟《全唐诗》尚录孟贯诗一卷。云：贯，字一之，建安人，初客江南，后仕周。《五代史》无他传，惟《唐才子传》说他是闽中人，为性疏野，不以荣宦为意。周世宗幸广陵，他献诗一卷，首篇《贻谭先生》云：“不伐有巢树，多移无主花。”世宗不悦，说：“朕伐叛吊民，何得有巢无主之说？献朕则可，他人则卿必不免。”遂只赐释褐进士，虚名而已。后不知所终，是他当非仕周者。其诗多写隐逸生涯者，盖为一不得志的隐逸诗人。如《宿山寺》：

溪山尽日行，方听远钟声。入院逢僧定，登楼见月生。露垂群木润，泉落一岩清。此景关吾事，通宵寐不成。

后周能以散文著称者，惟贾纬为最。纬，真定获鹿人。少苦学为文，唐末举进士不第。后唐天成中，范延光辟为赵州军事判官。入晋，为太常博士，非他所好，改起居郎、史馆修撰，与修《唐书》。累迁中书舍人、谏议大夫、给事中。后汉时，仍为史馆修撰。太祖即位，改给事中，判馆如故。后为监修王峻所劾，出为平卢军行军司马，广顺二年(952)卒。

他长于史学，勤于撰述。尝以唐代诸帝实录，自武宗以下阙而不纪，乃编为《唐年补录》六十五卷，又有《草堂集》三十卷，并传于世。当时因他议论刚强，同辈均不平之，有目之为“贾铁嘴”云。

此外马裔孙，字庆先，棣州商河人，卒赠太子少傅；王朴，字文伯，东平人，卒赠侍中；扈载，字仲熙，北燕人，亦均以文章知名于一时者。

第七章　吴文学

五代的梁、唐、晋、汉、周，不过占据中原的一部分，此外在东南与西南，尽有群雄割据着，即史所称的“十国”。吴就是最早占据于东南的一个大国，掩有今江苏、安徽、江西一带。吴太祖杨行密，以唐昭宗乾宁二年(895)封为弘农郡王，天复二年(902)进爵为吴王。吴之有国，盖自此始。唐亡之后，吴主虽未称帝，亦不臣事后梁，仍从唐朔。直至梁末帝贞明五年(919)，高祖始改元武义，用天子礼，然犹称吴国王。洎至睿帝，始于后唐明宗天成二年(927)正式即皇帝位。至后晋高祖天福二年(937)禅位于南唐，国遂亡。

吴以建国未久，故当时文学之士如韩熙载、宋齐丘之辈，均后仕于南唐，惟殷文圭、沈颜、游恭诸人，尚可称耀于一时者。

殷文圭，池州人，小字桂郎。居九华山苦学，所用墨池，底为之穴。乾宁中，以朱全忠表荐及第，寻为裴枢宣谕判官。后南归，宁国节度使田頵雅重儒士，置田宅以迎他。頵死，事太祖父子，掌书记，终左千牛卫将军。

他以文章著名于当时，著作甚富，有《登龙集》十卷、《从军稿》二十卷、《笔耕》二十卷、《冥搜集》二十卷，今存诗一卷。唐末词场请托公行，他与游恭独步场屋，其名重可知。《八月十五夜》云：

> 万里无云镜九州，最团圆夜是中秋。满衣冰彩拂不落，遍地水光凝欲流。华岳影寒清露掌，海门风急白潮头。因君照我丹心事，减得愁人一夕愁。

沈颜，字可铸，湖州德清人。天复初举进士第，授校书郎。因中原丧乱，乃南奔湖南马氏。未几来归，为淮南巡官，累迁礼仪使、兵部郎中、知制诰、翰林学士。顺义中卒。

他少有词藻，琴弈皆佳，时人目为“下水船”，意为文精速无不载也。性闲淡，不乐世利，疾当世文章浮靡，仿古著书百篇，为《謦书》十卷，又有《解謦书》十五卷、《大纪赋》一卷。亦能诗，今存二首，其一《书怀寄友人》云：

江湖劳遍寻，只自长愁襟。到处慵开口，何人可话心？登楼得句远，望月抒情深。却忆山斋后，猿声相伴吟。

游恭，建安人。登唐进士第，初为杜洪掌书记。洪死来归，署馆驿巡官。武义改元，迁知制诰，不久卒。他博学能文辞，尝奉命撰烈祖墓志，词极体要，时辈甚相传诵。所著有《小东集》三卷、《广东集》四卷。

此外，王振仕高祖，史弟为史官，撰太祖等本纪。信都镐撰《淝上英雄小录》二卷。陈濬，庐陵人，睿帝时为中书舍人，撰《吴录》二十卷。均称有良史之才，而其文亦甚传于当时。

第八章 南唐文学

南唐受吴禅而建国，拥有江淮诸地。《宋史·南唐世家》称为“擅鱼盐之利，即山铸钱，物力富盛”。自建国(937)至灭亡(975)，凡三十余年。虽自元宗中兴(958)以后，奉周正朔，国势渐衰，但江南毕竟富庶之区，君主又重视文士、爱好文艺，故文学仍很鼎盛，可与西蜀媲美。陈世修叙冯延巳的《阳春集》云：“金陵盛时，内外无事，朋僚亲旧，或当宴集，多运藻思为乐府新词，俾歌者倚丝竹歌之。”即可以为明证了。

南唐文学虽以词为主，但可惜得很，词集传于今者，只元宗、后主父子及冯延巳三人而巳。有人以为南唐的词人，当不亚于西蜀，特以西蜀有人像赵崇祚者为之选集他们蜀中词人的作品(《花间集》)，故得流传于今，为世人所知。南唐也许遭了这一个没有结集的劫，所以有许多词人、作品皆不免于沦亡，而为世人所不知。这话诚然不错，否则我们对于南唐，当更能见到他们许多第一流词人珍贵的作品的。

但南唐在这方面虽然感到损失，另一方面如诗文之类，著名作家如韩熙载、李建勋、陈陶、徐铉诸辈，仍有见于史传的。他们虽不工于词，但在当时也颇有一部分的势力，而比之于西蜀以外其他诸国，仍可以雄傲一时的。

元宗李璟(916－961)，字伯玉，本徐州人。初名景通，嗣位(943)后始更名璟，为烈祖李昪的长子。初为驾部郎中，烈祖为齐王，他为王太子。烈祖受禅，他封吴王，又徙齐王，后又立为皇太子。烈祖卒，他嗣位，是为中主。那时南唐占有江淮三十余州，国势颇盛，可惜他用人不当，如陈觉、魏岑、查文徽、冯延巳、冯延鲁等，当

时斥之为“五鬼”，他都十分信任。保大十五年(957)，周世宗亲自率兵南征，直至江口，他惧周师南渡，乃遣使尽献江北诸地，与周划江为界，并岁贡数十万，去帝号，奉周正朔，又改名为景，以避周信祖讳。过了三年，他遂忧郁而卒。其后后主告哀于宋，请追复帝号，太祖许之，乃谥曰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庙号元宗。

李璟治国的才能虽逊，但他的文学却有天赋。马令《南唐书》称他“有文学，甫十岁，吟《新竹》诗云‘栖凤枝梢犹软弱，化龙形状已依稀’，人皆奇之”。陆游《南唐书》亦谓“幼工属文”，“多才艺，好读书”。他因为自己好于文学，故对文学之士颇为接近，甚至相待如布衣交。《唐余纪传》云：

> 中主接群臣如布衣交，间御小殿，以燕服见学士，必先遣中使谢曰：“小疾不能著帻，欲冠褐可乎？”其待士有礼如此。

又马令《南唐书》云：

> 元宗乐府辞云：“小楼吹彻玉笙寒。”延巳有“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之句，皆为警策。元宗尝戏延巳曰：“‘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延巳曰：“未如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元宗悦。

可知他对文士时相嬉戏，竟无君臣之分了。可惜他的诗词传于今的已经不多(《全唐诗》录他诗二首、词三首)，但亦可见他伟大的地方。兹录其《摊破浣溪沙》如下：

> 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　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何限恨，倚阑干。

> 手卷真珠上玉钩，依前春恨琐重楼。风里落花谁是主，思悠悠。　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回首渌波三峡暮，接天流。

这二首词都是表示他一种哀婉的作风，王国维所谓“大有众芳芜

秽，美人迟暮之感”（见《人间词话》）。正惟其“美人迟暮”，而愈觉其高隽之处。

他的诗较逊于其词，但亦别有韵致，如《元日大雪登楼赋诗》：

珠帘高卷莫轻遮，往往相逢隔岁华。春气昨宵飘律管，东风今日放梅花。素姿好把芳姿掩，落势还同舞热斜。坐有宾朋尊有酒，可怜清味属侬家。

后主李煜（937—978），字重光，为李璟第六子。本名从嘉，即位后始改今名。初封为安定郡公，后徙吴王。宋太祖建隆二年（961）立为太子。那时元宗南迁于豫章，即以他留金陵监国。就在是年秋，元宗晏驾，他嗣立为后主。可是那时国势已弱，早已称臣于北朝。但幸有他的爱妻昭惠周后天天和他混在一起，他为了她的美貌，他为了她的歌舞，故尚能过他逸乐的生活。国事任它去吧，这真是他的词人的本色。然而昭惠周后不久即死（964），他于是伤心起来了，而且宋太祖比周世宗还要厉害，不但叫他称臣纳贡而已，大有遣将调兵、克日扫灭之意。因此屡叫他进京受爵，他的心于是渐渐感到不安起来了，他的生活当然渐为忧郁所笼围。果然不到几年，宋太祖已遣大将曹彬等率水陆师积极进攻。当时他犹为近臣所蒙蔽，以为长江天险可保无虞，不想宋师在长江筑了浮梁，渡江而来。直至兵围金陵他还不知，听沙门德明等在净居室讲解《楞严圆觉经》。结果金陵被陷，他不得已与近臣殷崇义等肉袒降于军门，他遂为俘虏了。第二年（976）他到了宋京，着了白衣向太祖请罪，太祖封他为违命侯。对这样侮辱的封号，他只有饮泣不已，他哪里还会觉得生之可恋，他是早已无意于人世间了。至宋太宗立，始改封为陇西郡公，然亦受了不少冷嘲与热骂，所谓“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者也。这样过了三年（978），他于七月七日诞辰那天，因为在赐第中命故伎作乐，声闻于外，太宗闻之大为震怒。又传他有“小楼昨夜又东风”、“一江春水向东流”诸词句，遂以为他犹怀念故国，命楚王元佐等赐

酒，他遂中牵机药毒，头足相就，前却几十回，痛苦不堪而死。

在历代帝王之中，李煜可以说是特别爱好文学的一个。据说他在围城之中，犹作《临江仙》词，未就而城已破（见《西清诗话》）。无怪宋太祖要说："李煜若以作诗工夫治国事，岂为吾禽也？"又传他于去国之时，作《破阵子》云：

>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阙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挥泪对宫娥。

苏东坡说他："当痛哭于九庙，下谢其民而行，却乃挥泪对宫娥，听教坊离曲哉！"似颇谴责他对国家的淡漠，而反依恋于儿女歌曲身上。但于此均足见他之爱好文学，殊出于天性。他宁愿致国家于不顾，而不能抛弃他所爱好的文学。也因他有如此的爱好，遂较他人造诣为更深。他不但对当时《花间》诸作家可以雄视，实亦可称为古今第一大词人呢！王鹏运尊之为"词中之帝"，确是当之无愧。

他的词可分为三期来研究。第一期，约自他幼年至昭惠周后的死（946）。昭惠周后的死，实在给他一个大刺激，同时国势日蹙，渐使他感觉生之无味，直至他国亡北迁（975），这可以说是他词的第二时期。自亡国至死，虽然不过三年，却是他的词的大转变时期，他已由至尊的帝王而降为阶下囚虏，一切的生活已失他的自由。他感觉失望，其实他已感觉绝望了，他不但感觉生之无味，而已感觉生之无恋了。这时期的词，真如王国维所说"以血书者也"。因为"血书"，故更能感人，更见它伟大的地方。

关于他第一期的词，我们可以用"温香华丽"四字来形容它，正如莺啼春晓、蝶飞花丛一样的令人留连忘返，例如《一斛珠》：

> 晓妆初过，沈檀轻注些儿个。向人微露丁香颗，一曲清歌，暂引樱桃破。　罗袖裛残殷色可，杯深旋被香醪涴。绣床斜凭娇无那，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

第二期的词渐渐转于悲哀途境，我们可以用"黯淡萧飒"四字来形容它。它宛如嫠妇的夜泣、怨女的哀诉，有说不尽的凄其哀婉。例如《相见欢》：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又如《长相思》：

云一緺，玉一梭，澹澹衫儿薄薄罗，轻颦双黛螺。　秋风多，雨如和，帘外芭蕉三两窠，夜长人奈何？

这些，都足见他有无可奈何处境凄苦的地方。他惜春花谢太匆匆，他惜芭蕉被风雨摧残，真是触景生情，使他生出不少的惆怅与感慨。

至第三期则完全陷入于所谓"血书"者，该已处"悲绝凄惨"的境地了。这时他是说不出"多少恨"、"几多愁"来，正如子规泣血、孤猿哀啼，简直使人不忍卒听，沁人心脾。例如《忆江南》：

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

又如《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又如《浪淘沙》：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暮凭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这些都为后人传诵不已的词句，而几成为千古的绝唱。至于诗，虽较逊于其词，但亦具有真情的流露，与真实物均能融化起来。如《渡中江望石城泣下》一诗，亦见其真情之处，非乱堆字句者可比。其诗

如下：

> 江南江北旧家乡，三十年来梦一场。吴苑宫闱今冷落，广陵台殿已荒凉。云笼远岫愁千片，雨打归舟泪万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闲坐细思量。

总之，李煜是南唐最杰出的词人，无疑的也是五代最著名的作家。我们于叙述他的文学之时，不惮烦来再三致意的。

冯延巳（903—960），一名延嗣，字正中，广陵人。少有胆识，以文字见称于时。烈祖授他以校书郎，与元宗相游处。元宗为元帅，以他掌书记。惟为人轻脱，常以计排斥异己，陆游《南唐书》云：

> 延巳负其才艺，狎侮朝士，尝诮孙晟曰："君有何所解而为丞郎？"晟愤然答曰："仆山东书生，鸿笔藻丽，十生不及君；诙谐歌酒，百生不及君；谄媚险诈，累劫不及君。然上所以置君于王邸者，欲君以道义规益，非遣君为声色狗马之友也。仆固无所解，君之所解，适足以败国家耳。"

是可知他的行为，颇为一般朝臣所不满，元宗唯爱他的才能，故欲斥而未果。及元宗即位，他乃喜形于色。拜他为谏议大夫、翰林学士，与他的弟弟延鲁交结魏岑、陈觉、查文徽诸人，侵害时政，时人号为"五鬼"。后又自中书侍郎拜同平章事，肆言自己才略经营天下而有余。元宗以为然，悉委以政事。及周师大入，尽失江北诸地，始罢他为太子太傅。宋太祖建隆元年卒；谥曰忠肃。

延巳为人虽不足取，然其为词，除李煜外确可独当一面。王国维云："冯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见《人间词话》）的是确评。例如《蝶恋花》：

> 萧索清秋珠泪坠，枕簟微凉，展转浑无寐。残酒欲醒中夜起，月明如练天如水。　阶下寒声啼络纬，庭树金风，悄悄重门闭。可惜旧欢携手地，思量一夕成憔悴。

这种虽不过写些闺情离思，而情致真切，确足以表示他的艺术手腕

的高超。又如《归国谣》：

江水碧，江上何人吹玉笛？扁舟远送潇湘客。　芦花千里霜月白。伤行色，来朝便是关山隔。

又如《忆江南》：

今日相逢花未发，正是去年，别离时节。东风次第有花开，恁时须约却重来。　重来不怕花堪折，只恐明年，花发人离别。别离若向百花时，东风弹泪有谁知？

都是旨隐词微，委婉沉挚，无怪后之词家如晏殊、欧阳修诸辈，都学他的词呢！延巳有《阳春集》，今传于世。

此外南唐词人，旧说尚有张泌，《全唐诗》录他的二十七首（《花间集》同）。然据近人胡适研究所得，《花间集》结集于940年，其时南唐建国不及四年。后主嗣位在961年，相距二十余年，而《花间集》里已称张舍人泌了，《花间集》称人的官爵，皆是结集时的官爵，若和凝只称学士而不称相，所以那个词人张泌，大约也是蜀人。此说颇可信从，因此我们也不在这里叙说，而划到西蜀去了。又有王感化者，建州人，亦善为词。《全唐诗》云：

元宗嗣位，宴乐、击鞠不辍，尝乘醉命感化奏《水调》词，感化唯歌"南朝天子爱风流"一句，如是者数四。元宗悟，覆杯叹曰："使孙、陈二主得此一句，不当有衔璧之辱也。"由是有宠。

又据《十国春秋》云，元宗所作《浣溪沙》二首，即以手书赐感化者。是可知他亦是当时一个著名词人，可惜词已不传，我们无从研究起了。

南唐词人虽少，而作旧体诗的却很多，著名者有韩熙载、李建勋、沈彬、孙鲂、廖凝、陈陶、陈贶、刘洞、江为、伍乔、左偃、李中、孟宾于、成彦雄及徐铉等诸人。

韩熙载（902—970），字叔言，北海人。少隐嵩山，后唐同光中擢进士第。明宗时，以父光嗣见杀，来奔于吴。放荡嬉戏，不拘名节。

因里民赵氏女有美色，遂娶为正室。烈祖受禅，用为秘书郎，辅元宗于东宫。及元宗即位，拜虞部员外郎、史馆修撰，当时宋济丘、冯延巳辈颇忌恨他。后主嗣立，拜为兵部尚书，终中书侍郎。然风流自赏，性忽细谨，老而益甚。家中蓄妓四十辈，纵她们出入，与客杂居。因此物议哄然，他犹说："吾为此以自污，避入相尔。老矣，不能为千古笑端。"后主亦无如之何。年六十九卒，赠为右仆射、同平章事，谥曰文靖。

熙载风采照物，高简无所卑屈，江南都称之为"韩夫子"。据说严续曾请他为其父撰神道碑，遗珍货巨万，而他但叙其谱裔品秩而已，不肯加以颂扬。严续慊之，他遂还其所赠。他所著有《拟议集》十五卷、《定居集》二卷，但今都散佚。今所存者惟《全唐诗》录诗五首及零碎散文而已。其诗描写直率，无蕴藉之处，如《感怀》诗：

> 未到故乡时，将为故乡好。及至亲得归，争如身不到。目前相识无一人，出入空伤我怀抱。风雨萧萧旅馆秋，归来窗下和衣倒。梦中忽到江南路，寻得花边旧居处。桃脸蛾眉笑出门，争向前头拥将去。

李建勋（？—957），字致尧，广陵人，为义祖徐温之婿。烈祖受禅，拜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元宗即位，东宫官属稍稍侵权，乃罢他为抚州节度使，后又召拜为司空。那时他营亭榭于钟山，适意于泉石之间，累表乞骸骨，因以司徒致仕，并赐号为钟山公。及卒，赠太保，谥曰靖。

建勋博览经史，为诗少时犹涉浮靡，晚年则颇清淡平易，见称于当时，如：

> 自为专房甚，匆匆有所伤。当时心已悔，彻夜手犹香。恨枕堆云髻，啼襟揾月黄。起来犹忍恶，剪破绣鸳鸯。（《殴妓》）
>
> 淡淡西园日又垂，一尊何忍负芳枝。莫言风雨长相促，直是晴明得几时？心破只愁莺践落，眼穿唯怕客来迟。年年使我

成狂叟，肠断红笺几首诗！（《惜花》）

这二首诗，适足表示他前期与后期作品不同的地方。建勋本有集二十卷，但今只传诗一卷。

当时与李建勋为诗友者，有沈彬、孙鲂、廖凝诸人，亦均有诗名。

沈彬，字子文，洪州高安人。唐末乱离，浪迹湘湖，隐于云阳山十余年，与僧虚中、齐己为诗侣。烈祖欲取吴自代，他遂献画山水诗，有云："尺素隐清辉，一毫分险阻。"因表授校书郎。后以吏部郎中致仕还山，直至元宗南迁都于豫章，那时他年已八十余，来求见道："臣久处山林，不预世事，臣妻曰：'君主人郎君，今为天子，何不一往？'臣遂忘衰老而来。"元宗为厚赐粟帛，并署他的儿子元为秘书省正字。他天才狂逸，下笔成章，幼经丧乱，又举进士不第，故颇抑郁。他的诗即多悲愤慷慨之词，这也是必然的趋势吧。如《都门送别》：

岸柳萧疏野荻秋，都门行客莫回头。一条灞水清如剑，不为离人割断愁。

又如《吊边人》：

杀声沈后野风悲，汉月高时望不归。白骨已枯沙上草，家人犹自寄寒衣。

这种的歌调，大类唐人边塞派的遗风。故沈彬虽与李建勋为诗友，然两人作风截然不同，这也许是两人处境截然不同的原因吧。

孙鲂，字伯鱼，南昌人。唐末都官员外郎郑谷避难江淮，他也与之从游，故他的诗颇得郑体。后烈祖召见，授为宗正郎，与李建勋、沈彬时相唱和，结为诗社。彬好评诗，建勋尝与彬议，适他不在，彬议他诗道："此非有风雅制度，但得人间烟火气多尔。"他忽出，问彬道："非有风雅固然，而谓得人间烟火气何耶？"彬笑道："《子夜坐》句云：'划多灰杂苍虬迹，坐久烟消宝鸭香'，非垆上作而何？"阖座

为之大笑。实则他的诗，确如沈彬之所评。又有《题金山寺》一首：

　　山载江心寺，鱼龙是四邻。楼台悬倒影，钟磬隔嚣尘。过橹妨僧定，惊涛溅佛身。谁言题咏处，流响更无人？

当时与张祜所题“僧归夜船月，龙出晓堂云”，前后并称，一时以为绝唱。惟胡仔《苕溪渔隐诗话》说他不及，谓“如‘惊涛溅佛身’之句，则金山寺何其低而且小哉”？确是有矜炫过甚之处。

廖凝，字熙绩，虔州人。初隐衡岳，楚亡，与马希咢同迁金陵。元宗授以水部员外郎，出为建昌令，终江州团练副使。善于讽吟，与李建勋为诗友，当时学诗者多造其门。他十岁，吟《咏棋》云：“满汀沤不散，一局黑全输”，已极有可观。有诗集七卷，今但存诗三首。《闻蝉》云：

　　一声初应候，万木已西风。偏感异乡客，先于离塞鸿。日斜金谷静，雨过石城空。此处不堪听，萧条千古同。

亦颇隽永耐味，无怪当时认为绝唱的。

陈陶，字嵩伯，岭南人。少时学于长安，自恨乱世不得逞其志。升元中南奔，将求见烈祖，闻知宋齐丘秉政，自度与己意不合，遂隐居洪州西山，日以诗酒为事。元宗虽闻他的诗名，而未及召之。后南迁至落星湾，欲召见，恐他不肯尽言。知他嗜鲊，乃伪使人卖鲊于他门，他果出而啗鲊。卖者因问：“官舟至落星矣，处士知之乎？”他道：“星落不还。”果然元宗未几即殂，他自己也不知所终。

他虽然是个隐士，但却是有济世之志，而只未遇明主而已。“中原莫道无麟凤，自是皇家结网疏”（《自咏》），“好向明时荐遗逸，莫教千古吊灵均”（《寄水部任畹郎中》），即可知他隐痛的一斑了。所以他写的诗亦多悲愤凄婉之作，与沈彬有同一的作风如《陇西行》之一：

　　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又如《江上逢故人》：

> 十年蓬转金陵道，长哭青云身不早。故乡逢尽白头人，清江颜色何曾老！

都足以表示他一种感慨抑郁之气的。

陈贶，南闽人，亦为南唐隐士，居庐山凡三十年。他专苦思于诗，得句未成章，辄已远播四方，因此学者多师事之。元宗闻他名，以币帛往征。他入见元宗，则“幞巾绦带，布裘鹿鞯”。诏授江州士曹掾，固辞不就，仍赐粟帛还山，年七十五卒。他的诗今只存一首《景阳台怀古》云：

> 景阳六朝地，运极自依依。一会皆同是，到头谁论非。酒浓沉远虑，花好失前机。见此尤宜戒，正当家国肥。

其诗清波古朴，有如其人，当时如刘洞、江为均出其门下。

刘洞，庐陵人，亦隐居庐山凡二十年。学诗于陈贶，辄浃旬不洗面。长于五言唐律，自号“五言金城”，得贾岛遗法。后主嗣位时，洞献诗百篇，其首篇《石城怀古》云：

> 石城古岸头，一望思悠悠，几许六朝事，不禁江水流。

后主为之改容，掩卷不复再读。因此他也不得见召，仍还庐陵。及金陵被围，他写诗署于路旁云：“千里长江皆渡马，十年养士得何人？”可知他也是个不得志的诗人。

江为本宋州人，以避乱家居于建阳，居庐山也二十年。元宗初设贡举，他去应试，屡不得第，因此颇怏怏不能自已。意欲束书东亡吴越，为同谋者所发，遂以有罪伏诛。他也是个不得志的诗人，故言多愤愤，如《登润州城》：

> 天末江城晚，登临客望迷。春潮平岛屿，残雨隔虹霓。鸟与孤帆远，烟和独树低。乡山何处是？目断广陵西。

江为又有弟子夏宝松，庐陵人，诗名与刘洞相埒。如《宿江城》的“雁飞南浦砧初断，月满西楼酒半醒”，“晓来羸骥依前去，目断遥

山数点青”，均新警可喜，故时人有目之为“夏江城”云。

伍乔，庐江人。性好学，以淮人无出他右者，遂渡江居庐山困学数年，苦节自奋。后以得山中浮屠资助，入金陵举进士，竟列第一，仕至考功员外郎。其诗多写景物及胸怀，大约是他未及第时所作。如《僻居酬友人》：

僻居虽爱近林泉，幽径闲居碧藓连。向竹掩扉随鹤息，就溪安石学僧禅。古琴带月音声亮，山果经霜气味全。多谢故交怜朴野，隔云时复寄佳篇。

左偃亦南唐人，居金陵不仕。能诗，有《钟山集》一卷。他与李中似很友善，李中常有诗寄他，如“萧条陋巷绿苔侵，何事君心似我心”，“每病风骚路，荒凉人莫游。惟君还似我，成癖未能休”。他的诗潇洒清新，如《送君去》：

关河月未晓，行子心已急。佳人无一言，独背残灯泣。

又如《江上晚泊》：

寒云淡淡天无际，片帆落处沙鸥起。水阔风高日复斜，扁舟独宿芦花里。

李中，字有中，江州人。仕南唐为淦阳令，有《碧云集》三卷。当时孟宾宇极赏识他的诗句，比之于贾岛，谓能惊人泣鬼者。如《子规》：

暮春滴血一声声，花落年年不忍听。带月莫啼江畔树，酒醒游子在离亭。

又如《都下寒食夜作》：

香尘未歇暝烟收，城满笙歌事胜游。自是离人睡长早，千家帘卷月当楼。

确能道出离人的一种心事来。

孟宾于，字国仪，连州人。亦仕南唐为滏阳令，终水部郎中。因初居吉州玉笥山，遂自号为群玉峰叟。有《金鳌集》二卷，今只存诗

八首。其诗亦偶有佳句，如《公子行》：

锦衣红夺彩霞明，侵晓春游向野庭。不识农夫辛苦力，骄骢踏烂麦青青。

成彦雄，字文干，亦为南唐进士。有《梅岭集》五卷，今存诗一卷，间有佳篇，如《惜花》：

忘餐为恋满枝红，锦障频移护晚风。客散酒酣归未得，栏边独立月明中。

此外南唐诗人，尚有后来归宋的徐铉。他字鼎臣，广陵人。十几岁即能属文，与韩熙载齐名，时谓之"韩徐"。初仕吴为秘书郎，后仕南唐，历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吏部尚书。归宋为散骑常侍，坐贬卒。他文思敏速，凡有著作，往往执笔立就，著有《骑省集》三十卷。他的诗篇什虽多，然均平易坦白，少深挚新警。兹录其《吴王挽诗》二首如下：

倏忽千龄尽，冥茫万事空。青松洛阳陌，荒草建康宫。道德遗文在，兴衰自古同。受恩无补报，反袂泣途穷。

土德承余烈，江南广旧恩。一朝人事变，千古信书存。哀挽周原道，铭旌郑国门。此生虽永死，寂寞已销魂。

铉之弟锴，亦能诗，惟不如其文，我们将在后面再说。他的《秋词》："井梧纷堕砌，寒雁远横空。雨久莓苔紫，霜浓薜荔红。"亦佳。钟谟，字仲益，崇安人。元宗时为礼部侍郎判尚书省，其《代京妓越宾答徐铉》云："一幅轻绡寄海滨，越姑长感昔时恩。欲知别后情多少，点点凭君看泪痕。"何昌龄为庐陵令，《题杨克俭池馆》云："经旬因雨不重来，门有蛛丝径有苔。再向白莲亭上望，不知花木为谁开？"李询不知何许人，《赠织锦人》云："札札机声晓复晡，眼穿力尽竟何如。美人一曲成千赐，心里犹嫌花样疏。"皆清新可诵。至如康仁杰、邵拙、孙晟、毛炳之辈皆称他们能诗，然其诗今皆不传，我们也无从说起了。

南唐的散文作家，则江文蔚与高越俱以辞赋著称，此外徐锴、潘佑、史虚白、谭峭等亦各有所长，马令《南唐书》云："江文蔚之高才，徐锴之典赡，高越之华藻，潘佑之清逸，皆能擅价于一时。"

江文蔚，字君章，建安人。后唐明宗时举进士，初为河南府馆驿巡官，后坐罪南奔。烈祖时拜中书舍人，南唐礼仪多所撰述。元宗时迁为御史中丞，以弹劾冯延巳等，黜为江州司士，后又起为翰林学士，命知贡举。年五十二卒，谥曰简。

文蔚高才博学，雅善作赋，《天窗赋》云："一窍初启，如凿开混沌之时；两瓦欹飞，类化作鸳鸯之后。"又《土牛赋》云："饮渚俄临，讶盟津之捧塞；度关倘许，疑函谷之丸封。"皆称一时佳句。著有《唐吴英秀集》及《桂香集》等。

高越，字冲远，幽州人。少举进士，精词赋，有名于燕、赵之间。初为威武军节度使卢文进掌书记。文进有女才色双全，时称"女学士"，他很爱慕，后遂嫁他为妻。及文进南奔，他也随来。先在吴为秘书郎，烈祖受禅，迁水部员外郎。元宗时迁中书舍人。淮南交兵，书诏多出他手，援笔立成，辞采温丽，元宗甚赞赏之。后主嗣立，累官御史中丞、左谏议大夫兼户部侍郎。年六十二卒，谥曰穆。

他与江文蔚俱以能赋擅名，时称"江高"，而实则高为首称（见马令《南唐书》），可惜他的文集多已散佚，使我们无复知其内容。

徐锴（920—974），字楚金，广陵人。生四岁而孤，时母方教铉就学，未暇及他，而他自能知书。稍长，即以文词与铉齐名。元宗时为秘书郎，后授右拾遗。曾论冯延鲁有罪无才，元宗爱其才而不贬。后主立，迁屯田郎中、知制诰、集贤殿学士。后改官，拜右内史舍人、直光政殿兼兵吏部选事。只以那时国势日削，终于忧愤郁郁，得疾而卒，年五十五。赠礼部侍郎，谥曰文。

锴酷嗜读书，虽隆寒烈暑，未尝少辍。其在集贤，朱黄不去手，非暮不出殿。后主尝自集其文，命他为之序，可知他在当时文誉的

高了。当时他与兄铉，人以比之于晋之二陆。他的著述甚富，而尤精于小学，著有《说文解字系传》四十卷、《说文通释》四十卷、《说文隐音》四卷、《说文韵谱》十卷，及《方舆记》一百三十卷、《历代年谱》二卷、《古今国典赋苑》、《岁时广记》等若干卷。

潘佑，幽州人。元宗时为秘书省正字，那时后主在东宫开崇文馆以招贤，他也入选。及即位，迁为虞部员外郎、史馆修撰，后又改内史舍人。时国家日衰削，用事者充位无所为，他乃愤切上疏，极论时政，历诋大臣将相，词甚激讦。凡七上疏而不用，最后上疏，有云："家国愔愔，如日将暮。"后主大怒，遂收他，并徙其家。他闻命自刭，年只三十六。据说他方生时，其母梦见一古衣冠人，说道："我颜延之也，乞夫人为子。"后生七岁始能语，道："儿误伤白龙，为上帝所罚。"因吟句云："只因骑折玉龙腰，谪在人间三十六。"至是遂验云。

佑气宇孤峻，闭门读书，不营赀产。文章赡逸，尤敏于论议，每草诏，下笔千言，文不加点，所以时誉蔼然，韩熙载、陈乔均推重之。所著有《荥阳集》三十卷。

史虚白，字畏名，山东人。少隐居嵩山，与韩熙载友善。因中原多事，遂与熙载渡淮南奔。时吴方用宋齐丘，他扬言道："吾可代彼。"齐丘不平，欲穷他的技能，因召与宴饮。酒饮数行，齐丘出诗百咏，请他赓和，并恣女奴玩肆，多方挠之。他却谈笑自若，笔不停辍，顷刻立就，一座为惊。然烈祖总不能用，他乃南游至九江落星湾，遂家在那里，常乘双犊版辕，挂酒车上，复令山童负一琴一酒瓢，往来于庐山之间，绝意世事。年六十八卒。

虚白虽是一个隐士，但对国事未尝不关心，元宗献江北诸地，他乃为《割江赋》以讽，有云："舟车有限，沿汀岛以俱闲；鱼鳖无知，尚交游而不止。"及迁都豫章。元宗问他有何所赋，他说近得《谿居》诗一联云："风雨揭却屋，浑家醉不知。"元宗为之变色。盖其身虽在野，而心殊不忘于国家。所著又有《钓矶立谈》一卷，备叙江南

兴废之事，今传于世。

谭峭字景升，泉州人。性好黄老之学，不喜举子业，师事嵩山道士十余年，得辟谷养气之术，夏则服乌裘，冬则绿布衫，或卧于风雪中，经日不冻。后又炼丹于南岳，能入水火，隐形不见。著有《化书》，为当时的散文名著，以传与宋齐丘，遂得流传于后世。

此外徐铉亦著有《稽神录》六卷，多记神鬼之事（一说为其门客蒯亮所撰）。殷崇义，陈州西华人，官至右仆射、同平章事，入宋易姓名为汤悦，撰有《江南录》十卷，自言有陈寿史体，为当世所称。蒯鳌，宣城人，极反对“摘裂章句，钩校属耦，绮丽悦目，清新沃耳”之文，以为“文章者，所以达道德之本，发才智之蕴，使旨胜于辞，理过于文”。惜其文已不传。郭昭庆，禾川人，后主时为著作郎，博学善著作，尝拟九经撰唐春秋三十卷。卢郢，金陵人，举进士第一，常为徐铉捉笔，国亡亦归宋。又有何晦著《唐摭言》十五卷、章僚著《海外使程广记》三卷，其书皆为当世所称。

第九章　前蜀文学

前蜀于907年建国，即梁太祖开平元年，在十国中建国最早。巴蜀本是中国西南的天府，人物富庶，地又险要。故唐末大乱，中原人士多至蜀地避难。高祖王建虽然是个无赖出身(据《十国春秋》云，少时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里人谓之“贼王八”)，目不知书，但他好与儒生谈论，颇解其理，《十国春秋》云：“是时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帝礼而用焉，使修举政事，故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至于后主王衍，则谙通音律，能自制词，大词人韦庄那时也在蜀国为相，无怪前蜀文学突然鼎盛，与东南的南唐前后媲美了。

前蜀的词人很多，王衍、韦庄以外，尚有牛峤、牛希济、李珣、尹鹗、薛昭蕴、魏承班以及张泌诸人。就这一点，前蜀是足向南唐夸矜的。但这都是赵崇祚《花间集》的功绩，因为这几个作家，我们都在那集里找到的。

后主王衍初名宗衍，字化源，许州舞阳人。高祖殂，他即帝位(918)，为人荒淫，政事一委之于宦者，自己则与近臣日夜酣饮，或作艳曲令宫女歌唱，虽经嘉王宗寿极谏，终不肯听。所以他即位不到七年，即为后唐庄宗所灭，而被杀于秦川驿(926)。可是他虽然是个荒诞的昏君，却是才思甚富，自幼即能属文。他大约也如南唐后主一般，只爱他的文学而却忽略了国家。他作词不多，《全唐诗》只录二首，其一《醉妆词》云：

者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那边走，者边走，莫厌金杯酒。

颇能写出一个富于享乐的意味来。另一为《甘州曲》：

画罗裙，能解束，称腰身。柳眉桃脸不胜春，薄媚足精神，

可惜沦落在风尘。

据说是他与太后太妃游于青城山，宫人衣服皆画云霞，飘然望之若仙，故作此曲，颇为当时所称。

韦庄（？—910），字端己，杜陵人。自幼即疏旷不羁，能作艳诗，应举时，适遇黄巢犯阙，因著《秦妇吟》，流传颇广，人遂称他为"《秦妇吟》秀才"。后登乾宁元年（894）进士。那时高祖为西川节度副使，唐昭宗命他宣谕两川，遂留于蜀，同冯涓并掌书记。高祖即位，进左散骑常侍，判中书门下事，凡开国制度号令、刑政礼乐，皆由他所定，累官至门下侍郎、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武成三年卒，谥曰文靖。

他是经过乱离的人，奔走过许多地方，大江南北如吴、越、赣、楚都有他的题咏。虽然最后归身于蜀，而心仍不能忘怀于他的故乡，所以词中亦多写他抑郁的离绪，如《菩萨蛮》：

洛阳城里春光好，洛阳才子他乡老。柳暗魏王堤，此时心转迷。　桃花春水绿，水上鸳鸯浴。凝恨对斜晖，忆君君不知。

又如《浣溪沙》：

夜夜相思更漏残，伤心明月凭阑干，想君思我锦衾寒。咫尺画堂深似海，忆来惟把旧书看，几时携手入长安？

此外他写温艳的词当然也是很多，但他的温艳正如王国维所谓"'弦上黄莺语'，端己语也，其词品似之"（见《人间词话》）。"弦上黄莺语"，是使人除清脆悦耳以外，并不会觉得怎样猥亵的，这也就是他词格的高处，足为当时的一大家。如《女冠子》：

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别君时。忍泪佯低面，含羞半敛眉。　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除却天边月，没人知，

昨夜夜半，枕上分明梦见。语多时。依旧桃花面，频低柳叶眉。　半羞还半喜，欲去又依依。觉来知是梦，不胜悲。

这些都用白话写出，一些没有雕斲，极出于自然。又如《荷叶杯》：

记得那年花下，深夜，初识谢娘时。水堂西面画帘垂，携手

暗相期。　惆怅晓莺残月，相别，从此隔音尘。如今俱是异乡人，相见更无因。

又如《谒金门》：

空相忆，无计得传消息。天上嫦娥人不识，寄书何处觅？新睡觉来无力，不忍把君书迹。满院落花春寂寂，断肠芳草碧。

这些写离恨愁绪，多么逼切，多么沉挚。而后者据说他本有一美姬，为高祖所夺，作此词忆之，姬闻知，竟不食而死。

至于他的诗，有《浣花集》十卷。因为他所居就是杜甫草堂旧址，故以名集。但他最负盛名的《秦妇吟》却不在集内，据说是他自己删去的，因此后遂失传。直至最近敦煌石室遗书的出现，方才得当时的手抄本，乃复被流传于人间。这是中国古来的第二长诗，凡一千六百六十六字。写中和年间乱离的情形，是十分痛切深刻的，无怪当时家家传诵，制做帘子挂着。这是值得一读的诗篇，兹全录如下：

中和癸卯春三月，洛阳城外花如雪。东西南北路人绝，绿杨悄悄香尘灭。路旁忽见如花人，独向绿杨阴下歇。凤侧鸾欹鬓脚斜，红攒黛敛眉心折。借问女郎何处来，含颦欲语声先咽。回头敛袂谢行人：丧乱漂沦何堪说。三年陷贼留秦地，依稀记得秦中事。君能为妾解金鞍，妾亦与君停玉趾。前年庚子腊月五，正闭金笼教鹦鹉。斜开鸾镜懒梳头，闲凭雕阑慵不语。忽看门外起红尘，已见街中擂金鼓。居人走出半仓皇，朝士归来尚疑误。是时西面官军入，拟向潼关为警急。皆言博野自相持，尽道贼军来未及。须臾主父乘奔至，下马入门痴似醉。适逢紫盖去蒙尘，已见白旗来匝地。扶羸携幼竞相呼，上屋缘墙不知次。南邻走入北邻藏，东邻走向西邻避。北邻诸妇咸相凑，户外崩腾如走兽。轰轰昆昆乾坤动，万马雷声从地涌。火迸金星上九天，十二官街烟烘焖。日轮西下寒光白，上帝无言空脉

脉，阴云晕气若重围，宦者流星如血色。紫气渐随帝座移，妖光暗射台星坼。家家流血如泉沸，处处冤声声动地。舞伎歌姬尽暗捐，婴儿稚女皆生弃。

东邻有女眉新画，倾国倾城不知价。长戈拥得上戎车，回首香闺泪盈把。旋抽金线学缝旗，才上雕鞍教走马。有时马上见良人，不敢回眸空泪下。西邻有女真仙子，一寸横波剪秋水。妆成只对镜中春，年幼不知门外事。一夫跳跃上金阶，斜袒半肩欲相耻。牵衣不肯出朱门，红粉香脂刀下死。南邻有女不记姓，昨日良媒新纳聘。琉璃阶上不闻声，翡翠帘间空见影。忽看庭际刀刃鸣，身首支离在俄顷。仰天掩面哭一声，女弟女兄同入井。北邻少妇行相促，旋解云鬟拭眉绿。已闻击柝坏高门，不觉攀缘上重屋。须臾四面火光来，欲下回梯梯又摧。烟中大叫犹求救，梁上悬尸已作灰。

妾身幸得全刀锯，不敢踟蹰久回顾。旋梳蝉鬓逐军行，强展蛾眉出门去。旧里从兹不得归，六亲自此无寻处。一从陷贼经三载，终日惊忧心胆碎。夜卧千重剑戟围，朝餐一味人肝脍。鸳帏纵入岂成欢，宝货虽多非所爱。蓬头面垢眉犹赤，几转横波看不得。衣裳颠倒语言异，面上夸功雕作字。柏台多半是狐精，兰省诸郎皆鼠魅。还将短发戴华簪，不脱朝衣缠绣被。翻持象笏作三公，倒佩金鱼为两史。朝闻奏对入朝堂，暮见喧呼来酒市。一朝五鼓人惊起，叫啸喧争如窃议。夜来探马入皇城，昨日官军收赤水。赤水去城一百里，朝若来兮暮应至。凶徒上马暗吞声，女伴闺中潜生喜。皆言冤愤此时销，必谓妖徒今日死。逡巡走马传声急，又道军前全阵入。大彭小彭相顾忧，二郎四郎抱鞍泣。沉沉数日无消息，必谓军前已衔璧。簸旗掉剑却来归，又道官军悉败绩。四面从兹多厄束，一斗黄金一升粟。尚让厨中食木皮，黄巢机上刲人肉。东南断绝无粮道，沟

壑渐平人渐少。六军门外倚僵尸，七架营中填饿殍。

长安寂寂今何有？废市荒街麦苗秀。采樵斫尽杏园花，修寨诛残御沟柳。华轩绣毂皆销散，甲第朱门无一半。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楼前荆棘满。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来时晓出城东陌，城外风烟如塞色。路旁时见游奕军，坡下寂无迎送客。霸陵东望人烟绝，树锁骊山金翠灭。大道俱成棘子林，行人夜宿墙匡月。明朝晓至三山路，百万人家无一户。破落田园但有蒿，摧残竹树皆无主。路旁试问金天神，金天无语愁于人。庙前古柏有残枿，殿上金炉生暗尘。"一从狂寇陷中国，天地晦冥风雨黑。案前神水咒不成，壁上阴兵驱不得。闲日徒歆奠飨恩，危时不助神通力。我今愧恧拙为神，且向山中深避匿。寰中箫管不曾闻，筵上牺牲无处觅。旋教魇鬼傍乡村，诛剥生灵过朝夕。"妾闻此语愁更愁，天遣时灾非自由。神在山中犹避难，何须责望东诸侯。

前年又出杨震关，举头云际见荆山。如从地府到人间，顿觉时清天地闲。陕州主帅忠且贞，不动干戈惟守城。蒲津主帅能戢兵，千里晏然无戈声。朝携宝货无人问，暮插金钗唯独行。明朝又过新安东，路上乞浆逢一翁。苍苍面带苔藓色，隐隐身藏蓬荻中。问翁本是何乡曲，底事寒天霜露宿。老翁暂起欲陈词，却坐支颐仰天哭。"乡园本贯东畿县，岁岁耕桑临近甸。岁种良田二百廛，年输户税三十万。小姑惯织褐绝袍，中妇能炊红黍饭。千间仓兮万斯箱，黄巢过后犹残半。自从洛下屯师旅，日夜巡兵入村坞。匣中秋水拔青蛇，旗上高风吹白虎，入门下马若旋风，罄室倾囊如卷土。家财既尽骨肉离，今日垂年一身苦。一身苦兮何足嗟，山中更有千万家。朝饥山草寻蓬子，夜宿霜中卧荻花。"妾闻此老伤心语，竟日阑干泪如雨。出门惟见

乱枭鸣，更欲东奔何处所？仍闻汴洛舟车绝，又道彭门自相杀。野色徒销战士魂，河津半是冤人血。适闻有客金陵至，见说江南风景异。自从大寇犯中原，戎马不曾生四鄙。诛锄窃盗若神功，惠爱生灵如赤子。城壕固护教金汤，赋税如云送军垒。奈何四海尽滔滔，湛然一境平如砥。避难徒为阙下人，怀安却羡江南鬼。愿君举棹东复东，咏此长歌献相公。

他的短诗，亦多清秀可诵，例如：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台城》)

感君情重惜分离，送我殷勤酒满卮。不是不能判酩酊，却忧前路醉醒时。(《离筵诉酒》)

牛峤，字松卿，一字延峰，陇西人。据他自己说是唐相僧孺孙。登唐乾符五年(878)进士，历官尚书郎。高祖镇西川，辟为判官，及前蜀开国，拜给事中，后卒。史称他有集三十卷、歌诗三卷，但今多不传。今所传者只有词三十二首(《全唐诗》二十七首，加《杨柳枝》五首，《花间集》只录三十一首)及诗一首(《全唐诗》录诗六首，但内《杨柳枝》五首应入词内)而已。

他似也曾到过江南，《江城子》云："越王宫殿，蘋叶藕花中。"大约他也与韦庄一样，因乱离而避难江南，亦未可知。他的词也多写离恨别愁的闺情，而较韦庄为更爱绮丽，如《菩萨蛮》：

玉钗风动春幡急，交枝红杏笼烟泣。楼上望卿卿，窗寒新雨晴。　薰炉蒙翠被，绣帐鸳鸯睡。何处有相知，羡他初画眉。

亦颇似温庭筠的"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其中较为清俊的只《江城子》二首而已，其一云：

鵁鶄飞起郡城东，碧江空，半滩风。越王宫殿，蘋叶藕花中。帘卷水楼鱼浪起，千片雪，雨濛濛。

又有一首《定西番》，则较为雄壮而已，其词如下：

紫塞月明千里，金甲冷，戍楼寒，梦长安。　乡思望中天阔，漏残星亦残。画角数声呜咽，雪漫漫。

牛希济，陇西人，为峤的兄子。仕后主为起居郎，累官至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国亡，入后唐，明宗拜他为雍州节度副使。他虽然降了后唐，但仍眷恋故国，当时明宗叫他试赋蜀主降唐诗，他云：

满城文武欲朝天，不觉邻师犯塞烟。唐主再悬新日月，蜀王难保旧山川。非干将相扶持拙，自是君臣数尽年。古往今来亦如此，几曾欢笑几潸然！

明宗叹谓："不伤两国，回存忠孝。"可知他是个有血性的人，是个爱国的词人。他的词，今存者十二首，也有写他故国之念的，如《临江仙》：

峭碧参差十二峰，冷烟寒树重重。瑶姬宫殿是仙踪。金炉珠帐，香霭昼偏浓。　一自楚王惊梦断，人间无路相逢。至今云雨带愁容。月斜江上，征棹动晨钟。

他写闺情，以自然胜，非若峤之喜藻丽的，如《生查子》：

新月曲如眉，未有团圞意。红豆不堪看，满眼相思泪。终日劈桃穰，人在心儿里。两朵隔墙花，早晚成连理。

李珣，字德润，梓州人，为昭仪李舜弦之兄。其先本波斯人，故尹鹗尝作诗嘲他为"李波斯强学文章"。但他虽是异域种子，却是善作小词，为后主所赏。他在前蜀未曾做过大官，只以秀才预宾贡。国亡，不仕他姓，隐居以终。

因为他是这样一个烈士，所以他的词除写闺情以外，尚写他凄凉的胸怀和他隐居的生活，如《巫山一段云》：

古庙依青嶂，行宫枕碧流。水声山色锁妆楼，往事思悠悠。云雨朝还暮，烟花春复秋。啼猿何必近孤舟，行客自多愁。

又如《河传》：

去去，何处？迢迢巴楚，山水相连。朝云暮雨，依旧十二峰

前，猿声到客船。　愁肠岂异丁香结，因离别，故国音书绝。想佳人花下，对明月春风，恨应同。

这些都是大有抚今追昔、今非昔比之感，在《花间集》中是少有的。又如《渔歌子》：

楚山青，湘水渌，春风澹荡看不足。草芊芊，花簇簇，渔艇棹歌相续。　信浮沉，无管束，钓回乘月归湾曲。酒盈樽，云满屋，不见人间荣辱。

又如《定风波》：

志在烟霞慕隐沦，功成归看五湖春。一叶舟中吟复醉，云水，此时方认自由身。　花岛为邻鸥作侣，深处，经年不见市朝人。已得希夷微妙旨，潜喜，荷衣蕙带绝纤尘。

这些就都是描写他隐居生活的逸乐，而另有一种潇洒的情趣。至于写闺情的如《酒泉子》：

秋雨连绵，声散败荷丛里。那堪深夜枕前听，酒初醒。

牵愁惹思更无停，烛暗香凝天欲曙。细和烟，冷和雨，透帘旌。

亦有一种清淡趣味，而不觉怎样浓艳的。

尹鹗，成都人。仕蜀为翰林、校书郎，累官至参卿，与宾贡李珣极相友善。他的词今只存十六首，从这几首词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个极欢喜狎妓的词人，“少年狂荡惯，花曲长牵绊。去便不归来，空教骏马回”(《菩萨蛮》)，这便是他的自白。所以他的描写，便有许多是猥亵的，如《清平乐》：

芳年妙妓，淡拂铅华翠。轻笑自然生百媚，争那尊前人意。

酒倾琥珀杯时，更堪能唱新词。赚得王孙狂处，断肠一搦腰肢。

又如《拨棹子》：

丹脸腻，双靥媚，冠子缕金装翡翠。将一朵，琼花堪比。窠窠绣，鸾凤衣裳香窣地。　银台蜡烛滴红泪，醁酒劝人教半醉。帘幕外，月华如水，特地向，宝帐颠狂不肯睡。

所谓"搦腰肢"、"颠狂不肯睡",这种赤露的描写,实可称为大胆之至。沈雄谓开屯田(柳永)俳调(《柳塘词话》),信非虚语。至于他写闺情的,亦殊明浅动人,如《临江仙》:

深秋寒夜银河静,月明深院中庭。西窗幽梦等闲成。逡巡觉后,特地恨难平。　红烛半条残焰短,依稀暗背银屏。枕前何事最伤情?梧桐叶上,点点露珠零。

薛昭蕴,山东人,为唐直臣存诚后裔。仕蜀官至侍郎,颇恃才傲物,每入朝省,弄笏而行,旁若无人(见《北梦琐言》)。他的词传于今者凡十九首,亦多写离恨的闺怨,如《谒金门》:

春满院,叠损罗衣金线。睡觉水精帘未卷,帘前双语燕。

斜掩金铺一扇,满地落花千片。早是相思肠欲断,忍教频梦见。

又如《离别难》:

宝马晓鞴雕鞍,罗帏乍别情难。那堪春景媚,送君千万里,半妆珠翠落,露华寒。红蜡烛,青丝曲,偏能钩引泪阑干。　良夜促,香尘绿,魂欲迷。檀眉半敛愁低。未别心先咽,欲语情难说,出芳草,路东西。摇袖立,春风急,樱花杨柳雨凄凄。

这首更能道尽离别时候一种千缠百结的心绪来。

魏承班,不知何许人。父宏夫,为高祖养子,赐姓名王宗弼,封齐王。他为驸马都尉,官至太尉。他的词今存者二十首,也多言情之作。元好问说他"大旨明净,不更苦心刻意以竞胜者"。如《满宫花》:

雪霏霏,风凛凛,玉郎何处狂饮?醉时想得纵风流,罗帐香帏鸳寝。　春朝秋夜思君甚,愁见绣屏孤枕。少年何事负初心,泪滴缕金双衽。

又如《诉衷情》:

高歌宴罢月初盈,诗情引恨情。烟露冷,水流轻,思想梦难成。　罗帐袅香平,恨频生。思君无计睡还醒,隔层城。

都是明净尖丽，情深而远，无怪“人人喜效为之”(《柳塘词话》沈雄语)。

最后我们应说到张泌了。张泌，旧说字子澄，淮南人。仕南唐官句容尉，上书陈治道，后主征为监察御史，历考功员外郎、中书舍人、内史舍人，后随后主降宋，迁郎中。但近人胡适以为此张泌与《花间集》中词人张泌是两个人的，他说：“《花间集》结集于940年，其时南唐建国不及四年，后主嗣位在961年，相距二十余年，而《花间集》里已称张舍人泌了。《花间集》称人的官爵，皆是结集时的官爵，故和凝只称学士而不称相。所以我们疑心词人张泌另是一人，大概也是蜀人，他的年辈很早，故他的词在《花间集》里列在韦庄、薛昭蕴之后。”此说甚是可信，故我们现在也以他为蜀人，至少是仕于蜀，官至舍人。从他的诗词里，我们又可知道他也到过长安、洞庭、桂州等处，却而并未述及江南的情景，这也更可证明他非南唐时人了。

他的词今存二十七首，以清丽明白胜。他似在不爱刻画之中，而却能见其深隽处，这正如元好问之评魏承班的词一样。如《浣溪沙》：

> 晚逐香车入凤城，东风斜揭绣帘轻，慢回娇眼笑盈盈。
> 消息未通何计是，便须佯醉且随行，依稀闻道“太狂生”。

又如《江城子》：

> 浣花溪上见卿卿，脸波秋水明，黛眉轻。绿云高绾，金簇小蜻蜓。好事问他，来得么，和笑道，莫多情！

这两首都把轻薄儿的轻佻描写殆尽，而却未见如尹鹗的猥亵，这正是他的长处。《花间集》中像他这样写法，也是很少有的。至于他写闺思，也殊有清隽之处，如《浣溪沙》：

> 枕障薰炉隔绣帏，二年终日两相思，杏花明月始应知。
> 天上人间何处去，旧欢新梦觉来时，黄昏微雨画帘垂。

他的诗也很著称，今存者凡二十首，如《寄人》：

别梦依依到谢家，小廊回合曲阑斜。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

据说他少时与邻女浣衣相善，经年不见，夜必梦之。女别字，他寄以此诗，浣衣为之流泪云。的确，"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这两句诗，犹为我们所传诵不置的。其余也多是离别伤感之作。再举《春日旅泊桂州》如下：

暖风芳草竟芊绵，多病多愁负少年。弱柳未胜寒食雨，好花争奈夕阳天。溪边物色堪图画，林畔莺声似管弦。独有离人开泪眼，强凭杯酒亦潸然。

前蜀词人，至此叙述殆尽。此外能作旧体诗者，大诗人韦庄与张泌以外，著名者尚有张蠙、卢延让、唐求及僧贯休诸人。

张蠙，字象文，清河人。唐乾宁二年(895)进士，历任校书郎、栎阳县尉，迁犀浦令。高祖建国，拜膳部员外郎，后出为金堂令。后主嗣位，与太后游大慈寺，见壁间题句有云："墙头细雨垂纤草，水面回风聚落花。"太后深加欣赏，顾问寺僧，知为他所题，乃赐霞光笺五百幅，令写所制诗以进。他捃集箧中藏诗约二百章献焉，后主善之，将召为知制诰，被内侍宋光嗣所阻，只赐白金奖劳而已。

他生而颖秀，性喜为诗。咸通时，与张乔、许棠齐名。今有诗集一卷，多送别述怀之作，如《边游别友人》：

欲别不止泪，当杯难强歌。家贫随日长，身病涉寒多。雨雪迷燕路，田园隔楚波。良时未自致，归去欲如何！

但描写都很平淡，似少佳者。

卢延让，字子善，范阳人。唐光化三年(900)进士，为朗陵雷满从事。满败，归高祖，授水部员外郎。后迁给事中，拜工部侍郎，终刑部侍郎，卒。

他作诗不尚奇巧，当时多诮为浅陋，独吴融重视之，且云："语

不寻常，后必垂名。”甚实他的诗倒是质朴明白，毫不做作，如《松寺》：

山寺取凉当夏夜，共僧蹲坐石阶前。两三条电欲为雨，七八个星犹在天，衣汗稍停床上扇，茶香时拨涧中泉。通宵听论莲华义，不藉松窗一觉眠。

唐求，成都人。隐居于蜀之味江山，高祖帅蜀，召为参谋不就。放旷疏逸，时人称之为“唐隐居”。性好吟咏，所作诗稿均捻为丸，纳一大瓢中。后卧病，投瓢于锦江，泛至新渠为人所得，由是诗名大噪。他的诗多写他沦隐生涯，故气韵清新，颇多奇趣。如《和舒上人山居即事》：

败叶填溪路，残阳过野亭。仍弹一滴水，更读两张经。暝鸟烟中见，寒钟竹里听。不多山下去，人世尽膻腥。

最后我们要说到和尚诗人贯休(832－912)了，那倒是当时诗僧中的大家。他字德隐，俗姓姜氏，婺州兰溪人。七岁投本邑和安寺圆贞禅师出家，乾宁中谒吴越武肃王，献诗云：“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武肃王命改为四十州，他乃拂然而去。登南岳，游荆南，与吴融相遇，甚为相得。后至蜀，献诗于高祖云：“一瓶一钵垂垂老，万水千山得得来。”高祖大悦，呼之为“得得和尚”，留住东禅院，署号禅月大师。既而建龙华道场令居之，恩宠备至，累加龙楼待诏、明因辨果功德大师，食邑三千户，赐紫大沙门。年八十一卒。

他有《实月集》三十卷。为诗多警句，怪古不媚，以奇崛胜，如《古意》：

古交如真金，百炼色不回。今交如暴流，倏忽生尘埃。我恐君子气，散为青松栽。我恐荆棘花，只为小人开。伤心复伤心，吟上高高台。

但有时亦有较清逸者，如《怀白阁道侣》：

寒思白阁层，石屋两三僧。斜雪扫不尽，饥猿唤得应。香然一字火，磬过数潭冰。终必相寻去，孤怀久不胜。

此外，王周，不知何许人，登进士第，曾仕蜀。《全唐诗》录他诗一卷，亦颇见新警，如《无题》："梨花如雪已相迷，更被惊乌半夜啼。帘卷玉楼人寂寂，一钩新月未沉西。"李舜弦为珣之妹，后主纳为昭仪，亦能诗，如《钓鱼不得》："尽日池边钓锦鳞，芰荷香里暗消魂。依稀纵有寻香饵，知是金钩不肯吞。"黄崇嘏，临邛人，为当时一女诗人，《下狱贡诗》云："偶辞幽隐在临邛，行止坚贞比涧松。何事政清如水境，绊他野鹤在深笼。"又有李仁表、杨义方等均称能诗，惜皆不传，无从说起了。

至于前蜀的散文作家，著名者惟冯涓、王锴、庾传昌与道士林光庭数人而已。

冯涓，字信之，婺州东阳人，一说信都人。登唐大中四年(850)宏词科进士，为京兆府参军，后隐居商山数年。昭宗时官祠部郎中，擢眉州刺史，而田陈拒朝命不令之任，他乃于成都墨池灌园以自给。高祖称帝，以为翰林学士，终御史大夫。他生平工于奉奏文字，著有《南冠集》、《龙吟集》三卷及《长乐集》十卷。

王锴，字鳣祥，不知何许人。天复时奉使西川，因留蜀，官翰林学士，迁御史中丞。武成二年(909)，除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永平元年(911)高祖作新宫，集四部书于中，他因劝高祖兴用文教，上奏记数千言，历举历代帝王爱好文学故事。后主即位，他与庾传素同为宰相，及蜀亡，随后主降后唐。他博洽能文，家藏异书数千本，多手自丹黄，每趋朝于白藤担子内钞书，可知他的好学。惟竟无文集传世。

庾传昌，义成人，为北周庾信后裔。初为永和府判官，累升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他文才敏赡，工于著作，著有《玉堂集》二十卷、《春宫载笔记》二十卷、《金行启运录》二十卷，然今多不传。

道士林光庭，字宾至，缙云人。他可说是这时期一个大散文家，著述极富。咸通中，应九经举不第，遂入天台山学道。后入蜀，事高祖为金紫光禄大夫、谏议大夫，封蔡国公，赐号广成先生。后主立，又以他为传真天师、崇真馆大学士。未几解官，隐青城山，号登瀛子。年八十五卒。他著有文集三十卷及其他文集百余卷，但今已散佚，只存《广成集》十一卷。然这些都是他的道书，无足轻重。我们所要注意者，倒是他所作的传奇《虬髯客传》，那是一篇结构很好的小说，成为后来好几个戏曲家作品的材料，如凌初成的《虬髯翁》、张凤翼的《红拂记》等。兹录其原文如下：

> 隋炀帝之幸江都也，命司空杨素守西京。素骄贵，又以时乱，天下之权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贵自奉，礼异人臣。每公卿入言，宾客上谒，未尝不踞床而见，令美人捧出，侍婢罗列，颇僭于上。末年愈甚，无复知所负荷，有扶危持颠之心。一日，卫公李靖以布衣上谒，献奇策，素亦踞见。公前揖曰："天下方乱，英雄竞起，公为帝室重臣，须以收罗豪杰为心，不宜踞见宾客。"素敛容而起，谢公，与语大悦，收其策而退。
>
> 当公之骋辩也，一妓有殊色，执红拂，立于前，独目公。公既去，而执拂者临轩指吏曰："问去者处士第几，住何处？"公具以对，妓诵而去。公归逆旅，其夜五更初，忽闻叩门而声低者，公起问焉。乃紫衣戴帽人，杖揭一囊，公问谁，曰："妾，杨家之红拂妓也。"公遽延入，脱衣去帽，乃十八九佳丽人也，素面画衣而拜，公惊答拜。曰："妾侍杨司空久，阅天下之人多矣，无如公者。丝萝非独生，愿托乔木，故来奔耳。"公曰："杨司空权重京师，如何？"曰："彼尸居余气，不足畏也。诸妓知其无成，去者众矣，彼亦不甚逐也。计之详矣，幸无疑焉。"问其姓，曰："张。"问其伯仲之次，曰："最长。"观其肌肤仪状、言词气性，真天人也。公不自意获之，愈喜愈惧，瞬息万虑不安，而窥户者无停

屦。数日，亦闻追讨之声，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马，排闼而去，将归太原。

行次灵石旅舍，既设床，炉中烹肉且熟。张氏以发长委地，立梳床前。公方刷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而虬，乘蹇驴而来。投革囊于炉前，取枕欹卧，看张梳头。公怒甚，未决，犹刷马。张熟视其面，一手握发，一手映身摇示公，令勿怒。急急梳头毕，敛衽前问其姓。卧客答曰："姓张。"对曰："妾亦姓张，合是妹。"遽拜之。问第几，曰："第三。"因问妹第几，曰："最长。"遂喜曰："今多幸逢一妹。"张氏遥呼："李郎且来见三兄！"公骤拜之，遂环坐，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计已熟矣。"客曰："饥。"公出市胡饼，客抽腰间匕首，切肉共食，食竟，余肉乱切送驴前食之，甚速。客曰："观李郎之行，贫士也，何以致斯异人？"曰："靖虽贫，亦有心者焉。他人见问，故不言，兄之问则不隐耳。"具言其由，曰："然则将何之？"曰："将避地太原。"曰："然吾故非君所致也。"曰："有酒乎？"曰："主人西，则酒肆也。"公取酒一斗。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曰："不敢。"于是开革囊，取一人头并心肝，却头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天下负心者，衔之十年，今始获之，吾憾释矣。"又曰："观李郎仪形器宇，真丈夫也，亦闻太原有异人乎？"曰："尝识一人，愚谓之真人也，其余，将帅而已。"曰："何姓？"曰："靖之同姓。"曰："年几？"曰："仅二十。"曰："今何为？"曰："州将之子。"曰："似矣，亦须见之，李郎能致吾一见乎？"曰："靖之友刘文静者与之狎，因文静见之可也。然兄何为？"曰："望气者言太原有奇气，使访之。李郎明发，何日到太原？"靖计之日，曰："达之明日，日方曙，候我于汾阳桥。"言讫，乘驴而去，其行若飞，回顾已失。公与张氏且惊且喜，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无畏。"促鞭而行。

及期，入太原，果复相见。大喜，偕诣刘氏，诈谓文静曰："以善相者思见郎君，请迎之。"文静素奇其人，一旦闻有客善相，遽致使迎之。使回而至，不衫不履，裼裘而来，神气扬扬，貌与常异。虬髯默居末坐，见之心死，饮数杯，招靖曰："真天子也！"公以告刘，刘益喜，自负。既出，而虬髯曰："吾得十八九矣，然须道兄见之。李郎宜与一妹复入京，某日午时，访我于马行东酒楼，下有此驴及瘦驴，即我与道兄俱在其上矣。到即登焉。"又别而去，公与张复应之。

及期访焉，宛见二乘。揽衣登楼，虬髯与一道士方对饮，见公惊喜，召坐。围饮十数巡，曰："楼下柜中有钱十万，择一深隐处驻一妹，某日复会我于汾阳桥。"如期至，即道士与虬髯已到矣。俱谒文静，时方弈棋，揖而话心焉，文静飞书迎文皇看棋。道士对弈，虬髯与公傍侍焉，俄而文皇到来，精采惊人，长揖而坐。神气清朗，满坐风生，顾盼炜如也。道士一见惨然，下棋子曰："此局全输矣！于此失却局哉，救无路矣，复奚言！"罢弈而请去。既出，谓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也。勉之，勿以为念。"因共入京。虬髯曰："计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与一妹同诣某坊曲小宅相访。李郎相从一妹，悬然如磬。欲令新妇祗谒，兼议从容，无前却也。"言毕，吁嗟而去。

公策马而归，即到京，遂与张氏同往。乃一小版门子，叩之，有应者，拜曰："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延入重门，门愈壮。婢四十人，罗列庭前。奴二十人，引公入东厅。厅之陈设，穷极珍异，巾箱妆奁冠镜首饰之盛，非人间之物。巾栉妆饰毕，请更衣，衣又珍异。既毕，传云："三郎来！"乃虬髯纱帽裼裘而来，亦有龙虎之状，欢然相见。催其妻出拜，盖亦天人耳。遂延中堂，陈设盘筵之盛，虽王公家不侔也。四人对馔讫，陈女乐二十人，列奏于前，似从天降，非人间之曲。食毕，行酒。家人

自东堂舁出二十床，各以锦绣帕覆之。既陈，尽去其帕，乃文簿钥匙耳。虬髯曰："此尽宝货泉贝之数，吾之所有，悉以充赠。何者？欲于此世界求事，当龙战三二十载，建少功业。今既有主，住亦何为？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内即当太平。李郎以奇特之才，辅清平之主，竭心尽善，必极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蕴不世之艺，从夫之贵，以盛轩裳。非一妹不能识李郎，非李郎不能荣一妹。起陆之贵，际会如期，虎啸风生，龙吟云萃，固非偶然也。持余之赠，以佐真主，赞功业也，勉之哉！此后十年，当东南数千里外有异事，是吾得事之秋也。一妹与李郎可沥酒东南相贺。"因命家童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言讫，与其妻从一奴，乘马而去，数步遂不复见。公据其宅，仍为豪家，得以助文皇缔构之资，遂匡天下。

贞观十年，公以左仆射平章事。适南蛮入奏曰："有海船千艘，甲兵十万，入扶余国，杀其主自立，国已定矣。"公心知虬髯得事也，归告张氏，具衣拜贺，沥酒东南祝拜之。乃知真人之兴也，非英雄所冀，况非英雄乎？人臣之谬思乱者，乃螳臂之拒走轮耳。我皇家垂福万叶，岂虚然哉？或曰："卫公之兵法，半乃虬髯所传耳。"

第十章 后蜀文学

前蜀于925年亡后，过了九年(934)，孟知祥又在那里称帝，是谓后蜀。后蜀自建国至灭亡(965)凡三十二年，这三十二年，高祖只称帝七月，其余都是后主孟昶在位。孟昶也如前蜀的王衍一样，是爱好文学的一个帝王，且自能制曲，所以后蜀的文学与前蜀也有同样的发展。

后蜀词人，除后主孟昶外，又有顾夐、鹿虔扆、毛熙震、毛文锡、欧阳炯、阎选诸人，其实他们也多是前蜀时的老词人。

后主孟昶(919—965)，字保元，邢州龙冈人，为高祖第三子。初名仁赞，即位后改名昶，时年十六岁(934)，在位凡三十二年，于宋太祖乾德三年(965)为宋所灭。后主因用匪其人，致一闻宋师深入，即无应命为前敌者，计宋自兴师至灭蜀，不过六十六日而已。后主既降，宋太祖为赐临汴大第居之，并拜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中书令、秦国公。但过了七日，他竟死了。追封为楚王，谥曰恭孝。

后主幼即聪悟，有才辩，能文章。所作词虽不多(今只传一首《玉楼春》)，但已可窥见其造诣的高深，与别人以轻艳取胜者多多。今举录如下：

> 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一点月窥人，欹枕钗横云鬓乱。 起来琼户启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屈指西风几时来，只恐流年暗中换。

又据苏轼《洞仙歌》序云："仆七岁时见眉州老尼，姓朱，忘其名，年九十余。自言尝随其师入蜀主孟昶宫中。一日大热，蜀主与花蕊夫人夜起避暑摩诃池上，作一词，朱具能记之。今四十年，朱已死，人无知此词者，但记其首两句云：'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暇日寻

味，岂《洞仙歌令》乎？乃为足之。"是苏轼即檃括后主的词以作歌，足见他对此词惊赏的地方。

顾敻，不知何许人。前蜀通正时以小臣给事内庭，曾有秃鹙鸟翔摩诃池上，他作诗刺之，祸几不测。久之，擢为茂州刺史。后仕高祖，累官至太尉。

他的词今传五十五首，况周颐说："顾太尉，五代艳词上驷也。工致丽密，时复清疏。"（见《蕙风词话》）实则他的词多有透骨的深情语，如《诉衷情》：

> 永夜抛人何处去，绝来音。香阁掩，眉敛，月将沉，争忍不相寻，怨孤衾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

此种"换我心，为你心"，实是透骨的情语，论者以为已开柳七一派（《历代词话》引），信非虚言。又如《荷叶杯》：

> 记得那时相见，胆颤，鬓乱四肢柔。泥人无语不抬头，羞摩羞，羞摩羞？　金鸭香浓鸳被，枕腻，小髻簇花钿。腰如细柳脸如莲，怜摩怜？怜摩怜？

这种"羞摩羞"、"怜摩怜"的透骨写法，在别人词中亦是少有的。

鹿虔扆，亦不知何许人。后蜀时登进士，累官为学士，出为永泰军节度使，进检校太尉，加太保。他在前蜀时似已留居蜀中，故词中有亡国之吟，与前之李珣同多感慨之音。

他的词今只存六首，当时他与欧阳炯、韩琮、阎选、毛文锡等俱以工小词供奉后主，时人忌之，号为"五鬼"。他所作的词当不止此数，大约多所散佚了。他的词如《临江仙》：

> 金锁重门荒苑静，绮窗愁对秋空。翠华一去寂无踪。玉楼歌吹，声断已随风。　烟月不知人事改，夜阑还照深宫。藕花相向野塘中。暗伤亡国，清露泣香红。

这种词调，与李后主"晚凉天净月华开，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浪淘沙》）有异曲同工之妙，使人想见其抗志高节，有无限感

慨淋漓处。这在花间词人中，惟他与李珣、毛熙震数人而已。至于他写闺情之作，如《思越人》，当时亦推为绝唱，其词如下：

> 翠屏欹，银烛背，漏残清夜迢迢。双带绣窠盘锦荐，泪侵花暗香销。　珊瑚枕腻鸦鬟乱，玉纤慵整云散。苦是适来新梦见，离肠争不千断？

毛熙震，蜀人，曾为秘书监。《十国春秋》没有他的传。他的词今存二十九首，周密在《齐东野语》里说："蜀人毛熙震集止二十余调，中多新警，不为儇薄。"似他的词作本不多，也许只有此数。其中如《后庭花》一首，确也是写"暗伤亡国"的：

> 莺啼燕语芳菲节，瑞庭花发。昔时欢宴歌声揭，管弦清越。　自从陵谷追游歇，画梁尘黦，伤心一片如珪月，闲锁宫阙。

他对于闺情之作，其情调亦殊为高隽，如《南歌子》：

> 惹恨还添恨，牵肠即断肠。凝情不语一枝芳，独映画帘闲立，绣衣香。　暗想为云女，应怜傅粉郎。晚来轻步出闺房，髻慢钗横无力，纵猖狂。

又如《清平乐》：

> 春光欲暮，寂寞闲庭户。粉蝶双双穿槛舞，帘卷晚天疏雨。　含愁独倚闺帏，玉炉烟断香微。正是销魂时节，东风满院花飞。

均能于浓艳中并不觉得儇薄。

毛文锡，字平珪，南阳人。年十四登唐进士第，既而来成都，事前蜀高祖为翰林学士承旨，累迁礼部尚书、文思殿大学士，又拜司徒。天汉时(917)与宦官唐文扆争权，被贬为茂州司马。前蜀亡后，随后主降后唐。未几又来成都，事后蜀高祖，与欧阳炯等俱以词供奉内庭，为后主所赏。

他的词今存三十一首，亦以浓艳胜，但不免涉于率露，无复如

毛熙震辈的蕴藉。叶梦得且说："诸人评庸陋词，必曰此仿毛文锡之《赞成功》而不及者。"（见《石林诗话》）《赞成功》词云：

海棠未坼，万点深红。香包缄结一重重。似含羞态，邀勒春风。蜂来蝶去，任绕芳丛。　昨夜微雨，飘洒庭中。忽闻声滴井边桐。美人惊起，坐听晨钟。快教折取，戴玉珑璁。

像这一首词，的确使人但觉其平庸无味，不过硬拉字句而已。此外他因为供奉内庭，有许多词完全因颂圣而敷衍题意的，但间亦有可诵者，如《醉花间》：

休相问，怕相问，相问还添恨。春水满塘生，鸂鶒还相趁。昨夜雨霏霏，临明寒一阵。偏忆戍楼人，久绝边庭信。

可惜这一种词，在他的词里是很少的。

欧阳炯（一作迥，896－971），益州华阳人。初事前蜀后主，为中书舍人。前蜀亡，降后唐为秦州从事。高祖建国，他又来蜀为中书舍人，终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同平章事。后随后主归宋，为右散骑常侍，迁翰林学士。后以祭南海忤宋主罢职，不久卒，年七十六。

他善文章，尤工于词。赵崇祚编《花间集》，请他作叙，足见他在当时被人推崇的地方。他的词今传四十八首，亦多为闺情之作，"大抵婉约轻和，不欲强作愁思"（《历代词话》引《蓉城集》语）。惟其不欲强作愁思，故有许多艳语是写得十分透骨的，他自言"愁苦之音易好，欢愉之语难工"。也许欲取其工，故爱作此种词句。如《浣溪沙》：

相见休言有泪珠，酒阑重得叙欢娱，凤屏鸳枕宿金铺。兰麝细香闻喘息，绮罗纤缕见肌肤，此时还恨薄情无？

此种刻划小儿女的情态，正如况周颐所谓"自有艳词以来，殆莫艳于此"了（见《蕙风词话》）。我们试冥想此中情景，真有说不出的温艳与甜美呢。又如《春光好》：

垂绣幔，掩云屏，思盈盈。双枕珊瑚无限情，翠钗横。　几

见纤纤动处，时闻款款娇声。却出锦屏妆面了，理秦筝。

这种也是写得十分透骨的。至如《定风波》：

暖日闲窗映碧纱，小池春水浸晴霞。数树海棠红欲尽，争忍，玉闺深掩过年华？ 独凭绣床方寸乱，肠断，泪珠穿破脸边花。邻舍女郎相借问，音信，教人羞道，未还家。

又如《更漏子》：

玉阑干，金甃井，月照梧桐影。独自个，立多时，露华浓湿衣。 一向凝情望，待得不成模样。虽叵耐，又寻思，争生嗔得伊？

这些写小女儿的闺情，似恨未恨，似痴未痴，真是活爱煞人。又有《江城子》：

晚日金陵岸草平，落霞明，水无情。六代繁华，暗逐逝波声。空有姑苏台上月，如西子镜，照江城。

则颇有抚今追昔，沧海桑田的感慨。

他也能诗，曾以拟白居易的讽谏诗受后主嘉奖，他如《贯休应梦罗汉画歌》，亦颇是精心结构之作，兹举录如下：

西岳高僧名贯休，孤情峭拔凌清秋。天教水墨画罗汉，魁岸古容生笔头。时捎大绢泥高壁，闭目焚香坐禅室。忽然梦里见真仪，脱下袈裟点神笔。高握节腕当空掷，窸窣毫端任狂逸。逡巡便是两三躯，不似画工虚费日。怪石安拂嵌复枯，真僧列坐连跏趺。形如瘦鹤精神健，顶似伏犀头骨粗。倚松根，傍岩缝，曲录腰身长欲动。看经弟子拟闻声，瞌睡山童疑有梦。不知夏腊几多年，一手搘颐偏袒肩。口开或若共人语，身定复疑初坐禅。案前卧象低垂鼻，崖畔戏猿斜展臂。芭蕉花里刷轻红，苔藓文中晕深翠。硬筇杖，矮松床，雪色眉毛一寸长。绳开梵夹两三片，线补衲衣千万行。林间乱叶纷纷堕，一印残香断烟火。皮穿木屐不曾拖，笋织蒲团镇长坐。休公，休公，逸艺无人

加，声誉喧喧遍海涯。五七字句一千首，大小篆书三十家。唐朝历历多名士，萧子云兼吴道子。若将书画比休公，只恐当时浪生死。休公，休公，始自江南来入秦，于今到蜀无交亲。诗名画手皆奇绝，觑你凡人争是人。瓦棺寺里维摩诘，舍卫城中辟支佛。若将此画比量看，总在人间为第一。

阎选，不知何许人。《花间集》称他为"阎处士"，因此有人以为他是布衣，并未入仕。惟《十国春秋》有云："（鹿虔扆）与欧阳炯、韩琮、阎选、毛文锡等，俱以工小词供奉后主，时人忌之者，号曰'五鬼'。"（见《鹿虔扆传》）是他也入仕，否则岂有供奉后主而不仕之理？且虔扆等均任要职，不信他独无官。大约他初年入仕于蜀，后则隐沦而为处士，较为可信。

他的词今只传十首，描写闺情多浓丽侧艳，往往流于率直，如《虞美人》：

粉融红腻莲房绽，脸动双波慢。小鱼衔玉鬓钗横，石榴裙染象纱轻，转娉婷。　偷期锦浪荷深处，一梦云兼雨。臂留檀印齿痕香，深秋不寐漏初长，尽思量。

又如《谒金门》：

美人浴，碧沼莲开芬馥。双髻绾云颜似玉，素娥辉淡绿。

雅态芳姿闲淑，雪映钿装金斛。水溅青丝珠断续，酥融香透肉。

这种率直，已近于猥亵了，什么"一梦云兼雨，臂留檀印齿痕香"，什么"酥融香透肉"，这在别人词中是很少有的。他因为是个处士，也曾写过他的处士生活，如《定风波》：

江水沉沉帆影过，游鱼到晚透寒波。渡口双双飞白鸟，烟袅，芦花深处隐渔歌。　扁舟短棹归兰浦，人去，萧萧竹径透青莎。深夜无风新雨歇，凉月，露迎珠颗入圆荷。

此外又有欧阳彬，字齐美，衡州衡山人。初落魄湖南，日与歌姬酒徒为伍，后入成都，事前蜀后主为翰林学士。后蜀时，累官至尚书

左丞。他爱好文学，工于辞赋，惟《花间集》不录他词，大约在当时较为无声。今《全唐诗》录他《生查子》一首，其词如下：

竟日画堂欢，入夜重开宴。剪烛蜡烟香，促席花光颤。
待得月华来，满院如铺练。门外簇骅骝，直待更深散。

后蜀的词人虽多，而能写旧体诗的诗人却寥寥无几，欧阳炯外，花蕊夫人、徐光溥与僧可朋数人而已，兹一并叙述如下：

花蕊夫人本姓徐氏，青城人。幼有才色，父国璋纳于后主，后主很爱她，拜为贵妃，即别号花蕊夫人，后又升为慧妃。她长于歌咏，平时常仿唐王建作《宫词》百首，时人很为称许。国亡，随后主入宋，宋太祖颇爱幸她，但不久为太宗所射死。

她所作《宫词》，多描写宫中旖旎的风光、逸乐的生活，这点颇有人为之非议。因为宫中的情景是很复杂的，有的固然过着愉快的生活，但有的正过着囚狱的生活，自来宫词中最多是妒怨之词，正如少妇之有闺怨，是同样的事实。这确是她的一个大缺点，但是她所写的旖旎逸乐却也很成功，如下列数首：

东内斜将紫禁通，龙池凤苑夹城中。晓钟声断严妆罢，院院纱窗海日红。

离宫别院绕宫城，金版轻敲合凤笙。夜夜月明花树底，傍池长有按歌声。

春风一面晓妆成，偷折花枝傍水行。却被内监遥觑见，故将红豆打黄莺。

殿前宫女总纤腰，初学乘骑怯又娇。上得马来才欲走，几回抛鞚抱鞍桥。

她又有一首述国亡诗（一说非她所作），颇为激昂慷慨，其词如下：

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

徐光溥，蜀人。初事高祖为观察判官，后蜀建国，进翰林学士。

后主时，拜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后以艳词挑前蜀安康长公主罢相卒。他博学善诗歌，所作《题黄居寀秋山图》，可与欧阳炯的《贯休应梦罗汉画歌》相并称，是一篇有结构的长歌。短诗有《咏笋》一首，亦颇见高隽，其诗如下：

迸出班犀数十株，更添幽景向蓬壶。出来似有凌云势，用作丹梯得也无？

僧可朋，丹稜人。能诗，好饮酒，但贫不能偿酒债，或作诗以酬之，因自号为醉髡。少时与卢延让、方干为诗友，后来蜀与欧阳炯相善。炯比之孟郊、贾岛，力荐于后主，后主赐以钱帛。他有诗千余篇，号《玉垒集》，但今已散佚，只存诗四首而已。其诗言浅旨深，殊为隽永，如《耘田鼓》诗：

农舍田头鼓，王孙筵上鼓。击鼓兮皆为鼓，一何乐兮一何苦？上有烈日，下有焦土。愿我天翁，降之以雨。令桑麻熟，仓箱富，不饥不寒，上下一般。

据说当时"炯（欧阳炯）与同僚纳凉净众寺，依林亭列樽俎，众方欢饮自若。寺外有耕者曝背烈日中，耘田击鼓，敝疲不休。可朋在坐，乃作《耘田鼓》诗献炯曰：……炯遽命众宾撤饮"（见《十国春秋》），亦足见他诗的感动人了。

此外蒋贻恭，江淮人，曾官大井县令，有《咏蚕》："辛勤得茧不盈筐，灯下缫丝恨更长。著处不知来处苦，但贪衣上绣鸯鸳。"张立，新津人，李昊尝荐之后主而不赴，自号阜江渔翁，有《咏蜀都城上芙蓉花》："去年今日到成都，城上芙蓉锦绣舒。今日重来旧游处，此花憔悴不如初。"均称佳妙。当时又有令狐峤、向瓒二人，亦工吟咏。韦縠尝辑唐人诗千首为《才调集》，赵崇祚辑时人词五百首为《花间集》，两书均盛传于世，而尤以《花间集》为后人所称颂不置。盖五代词人作品之得流传于今日者，厥赖此书的选辑，其在文学史上实有伟大的功绩。

至于后蜀的散文作家惟李昊较为著名。昊字穹佐，关中人，自言为唐相绅之后裔。幼经丧乱，父及弟妹皆被害，为刘知俊所救，遂妻以女。知俊归前蜀，他也随来。后主时，历官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前蜀亡，入后唐为检校兵部郎中。后蜀建国，事高祖为礼部侍郎。后主时累官尚书左丞、同平章事，后又封赵国公，加司空。国亡随后主降宋，拜工部尚书。于其年卒，年七十五，赠右仆射。

他前后仕蜀凡五十年，位兼将相，岁入无算，所以颇为奢侈，置伎妾至数百人。前后蜀降表皆他一人所撰，故蜀人讥之为“世修降表李家”，潜署其门。著述甚富，有文集二十卷、《高祖实录》三十卷、《后主实录》一百二十卷、《经纬略》百卷等，今皆散佚。盖为当时蜀中一大手笔。

此外毋昭裔，河中龙门人，官至左仆射。性嗜藏书，酷好古文，精经术。尝以九经命张德钊书之，刻石于成都学官，后又请后主镂版印行。又自刻《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由是文学大盛。他自著有《尔雅音略》三卷。当时词人毛文锡亦著有《前蜀纪事》二卷、《茶谱》一卷。又有赵元拱《唐谏诤集》十卷、杨九龄《蜀桂堂编事》二十卷、何光远《鉴诫录》十卷、《广政杂录》三卷，皆为士林所称道的。

第十一章　南汉文学

南汉建国于后梁末帝贞元三年(917),亡于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凡四帝五十五年,在十国中,称帝者以它为最久(十国称帝者只吴、南唐、前蜀、后蜀、南汉、北汉六国,余均称王)。其实五代一个时代也不过五十八年(907—960),所以它的年祚不可说不久。它所占据的岭南凡四十七州,在十国中也可说是版图最大的国家。当时中原多乱,若西蜀,若南唐,若南汉,均是较为平静的地方。《十国春秋·南汉烈宗世家》云:"是时天下已乱,中朝人士以岭外最远,可以避地,多游焉。唐世名臣谪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孙,或当时仕宦遭乱不得还者,皆客岭表。"足见当时海内贤杰,亦有多归于南汉者。这样说来,南汉以地、以人,其文学当可与西蜀、南唐相媲美。可是事实上南汉却是一个文学十分衰落的国家,这实在是令人感到失望的。但南汉除烈宗未称帝尚能"好贤礼士"以外,其余自高祖以下四主均荒淫无道,残暴成性,高祖竟以"每视杀人,不胜其喜"。降至中宗,"益峻刑法以威众",后主则"多置酖毒臣下"(以上均见《十国春秋》本纪)。试想在这样专以杀戮为事的国度里,即有文学,也不过是些颂圣而已,何况诸帝又不爱文学,当然无文学之可言了。史称"牢牲视人,岭蜓遭刘"(见《新五代史》),其情形可以想见了。

黄损,字益之,连州人。少有大志,栖隐静福山,罕与俗接。登梁龙德二年(922)进士第,既而来岭南,事高祖为尚书左仆射。高祖建南薰殿,雕沉香为龙柱,极尽工巧,少不如意,辄诛工匠。他因上疏极谏,忤高祖意,高祖谓左右道:"我殊不喜此老狂。"遂见黜。他乃退居永州北沧塘湖上,以诗酒自娱,竟病卒。

他与郑谷及僧齐己都相友善,尝定近体诗诸格,为湖海骚人所

宗。自著有《桂香集》，今只存诗四首，如《公子行》：

> 春草绿绵绵，骄骖骤暖烟。微风飘乐韵，半日醉花边。打鹊抛金盏，招人举玉鞭。田翁与蚕妇，平地看神仙。

亦颇能写出公子哥儿一副骄纵的神情来。

陈用拙，本名拙，以字行，亦连州人。唐天祐元年(904)擢进士第，授著作郎。因心恶朱全忠，南来事烈宗掌书记。高祖称帝，擢他为吏部郎中、知制诰，久之卒。他少习礼乐，工诗歌，著有诗集八卷。又著有《大唐正声琴籍》十卷，中载琴家论操名，及古帝王名士的善琴者。惜其书今多不传。

倪曙，字孟曦，福州侯官人。唐中和时及第，官太学博士。黄巢作乱，避归故乡，与徐寅、陈郯等诗酒为乐。未几西游岭南，烈宗辟置幕中。高祖即位，擢为工部侍郎，进尚书右丞、同平章事。他著有赋一卷。

王宏，不知何许人。高祖时由进士官翰林学士承旨，尝为《白虹纪白龙赋》，文采巨丽，辞旨畅洽，颇为高祖所欣赏。后又撰《昭阳殿赋》，亦见称于时。大约他是以善于辞赋颂圣，故高祖竟以他的赋而改元为白龙(按，改元白龙时在925年)。

王诩，咸宁人。高祖时由进士拜中书舍人。他也是个善于颂圣的文人，与王宏同时进《白龙颂》，后又著《昭阳殿赋》。但他颇自矜持，尝扬言道："吾赋字字作金声。"

此外何泽，韶州曲江人，事烈宗为清海军从事；简文会，咸宁人，举高祖乾亨初进士第一。均称工诗赋。至于当时的散文学家，惟王定保、钟允章二人较为著名。

王定保，南昌人。举唐光化三年(900)进士第，为唐容管巡官，因乱不得还，遂留岭南。高祖时官宁远军节度使，后又进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不久卒。他善文辞，高祖作南宫，极土木之盛，他献《南宫七奇赋》，一时称为绝伦。但他著名的作品倒不是辞赋，而是

散文。他所著《摭言》十五卷，历叙有唐一代贡举逸事，凡百余篇，类似小说家言，兹录其一篇如下：

王勃，字子安，文中子之孙，早负俊声。其父福畤官洪都，勃自汾省亲，舟次马当，阻风涛不得进，因泊庙下，登岸纵观。忽见一叟坐石矶上，须眉皓白，顾盼异常，遥谓勃曰："少年子何来？明日重九，滕王阁有高会，若往会之，作为文词，足垂不朽矣。"勃笑曰："此距洪都，为程六七百里，岂一夕所能届耶？"叟曰："兹乃中元水府，是吾所司。子若决行，吾当助汝。"勃方拱谢，忽失叟所在。依其言发舟，清风送帆，倏抵南昌。次旦入谒，果不爽期。

时都督阎公，有婿吴子章与筵，公令宿搆序文，欲以夸客。及宴，先授简四座，四座咸辞。次第至勃，受命不让。时勃年十四，坐于席末。阎公意不平，乃命吏候于勃傍，俟下笔即报。勃说起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笑曰："老生常谈耳。"次云："星分翼轸，地接衡庐。"公曰："故事也。"又报曰："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公即不语。俄而数吏沓至以报，公但颔颐而已，至"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不觉矍然曰："真天才也！"顷而文成，公大悦。子章闻之，惭而退。公私宴勃，宠渥荐臻。既行，赠以五百缣。

迨回船至马当，见前叟依然坐石矶上，勃趋进拜谢，仰而陈词曰："某昨蒙冥祐，谨已衔德矣。不识此生休咎，可得闻乎？"叟曰："少年子无以进取为也。子神强骨弱，气清体羸，目精不全，脑骨亏陷，但恐秀而不实，终非遐远耳。此自天定，子将奈何！虽然，吾少有烦于子。昔吾与长芦神戏，欠彼博债，子今过其祠下，可焚阴钱十万，为吾偿之。"言已，冉冉没于水际。勃后经长芦，偶亡前约，忽有群鸦飞集樯上，舟不得前，勃悟焚钱，遂获利济。勃后竟罹夭折，一如老叟之言。

钟允章，其先邕州人，后徙家番禺。高祖时进士及第，累迁至中书舍人。中宗时拜工部郎中、知制诰，当时诰敕碑记多由他所作。后主嗣位，擢为尚书左丞、参知政事。他素性侃直，不畏强御，至是遂为内侍监许彦真所谗，竟至族诛。他文思敏捷，操笔立就，著作甚富，当时声名藉甚。其所撰《碧落洞天云华御室记》，最为文士所称许。

第十二章 楚文学

楚以武穆王马殷开国于后唐明宗天成二年(927),于后周太祖广顺元年(951)为南唐所并。他们虽然开国,但只称王而没有称帝。诸王之中,如文昭王"好学善诗,颇优礼文士"(见《十国春秋·楚文昭王世家》),故楚的文学,尚称兴盛。

但楚的文学不过承袭前代的旧文学而已,他们对于新兴文学的词竟没有一个人敢作,这实在是一个大缺陷。当时能写旧体诗的,有徐仲雅、廖匡图、刘昭禹、何仲举、翁宏、廖融、王元诸人。

徐仲雅,字东野,其先秦中人,徙居长沙。初为昭顺观察判官,文昭王开天策府,以僚佐拓跋恒等十八人为学士,他年十八,也与其列,楚人以为荣。及国亡,屏迹荒遁,不欲仕进。周行逢慕他的名,署为节度判官。他辞以疾,后被放于邵州,结庐山寺,以诗酒而终。

他有隽才,长于诗文,著作甚富,多至百卷,但今已散佚,诗则只存六首。其诗多写其负气不屈的精神,盖为遁迹后之所作,如《咏棕树》:

叶似新蒲绿,身如乱锦缠。任君千度剥,意气自冲天。

廖匡图,虔州虔化人。初授江南观察判官,文昭王时选为天策府学士,与徐仲雅同在十八学士之列,居数年卒。他有集一卷,今但存诗四首。其诗颇为清隽,如《九日陪董内召登高》:

祝融峰下逢嘉节,相对那能不怆神。烟里共寻幽硐菊,樽前俱是异乡人。遥山带日应连越,孤雁来时想别秦。自古登高尽惆怅,茱萸休笑泪盈巾。

此外如断句"正悲世上事无限,细看水中尘更多",亦殊为新警耐味。

刘昭禹，字休明，桂阳人。在湘南累为县令，武穆王时官容管节度推官。文昭王时亦署天策府学士，终严州刺史。

他少师林宽为诗，刻苦不惮风雨。平居尝论诗道："五言如四十贤人，不乱著一字屠沽辈也。"又云："索句如获玉匣，精求必得其宝。"有集一卷，今存诗九首。但他的诗殊不高妙，盖过事雕琢，反形见拙了。惟《送休公归衡》一首尚称佳妙，兹录如下：

草履初登南岳船，铜瓶犹贮北山泉。衡阳旧寺春归晚，门锁寒潭几树蝉。

何仲举，营道人。后唐天成中登进士第，未几归事文昭王为桂管观察推官，及建天策府，因李宏皋的引荐，同与十八学士之列。后出为全州刺史，又改衡州，遂卒。

他美姿容，俊迈绝伦。年十三，家贫输税不及限。时李宏皋为县令，怒系他于狱中。有言他雅能文，且工敏。宏皋乃令他作诗，谓"若能诗，吾当贷汝"。他果援笔立就，宏皋大为惊异。他今只存诗一首，即在狱中所作者：

似玉来投狱，抛家去就枷。可怜两片木，夹却一枝花。

又有《秋日晚望》诗断句云："树迎高鸟归深野，云傍斜阳过远山。"宏皋推为诗家之高逸者。

当时又有隐逸诗人翁宏、廖融、王元等，诗名均噪于一时。翁字大举，桂州人。《春残》云："又是春残也，如何出翠帏？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寓目魂将断，经年梦亦非。那堪向愁夕，萧飒暮蝉辉。"融字元素，隐居衡山，《退宫妓》云："神仙风格本难俦，曾从前皇翠辇游。红踯躅繁金殿暖，碧芙蓉笑水宫秋。实筝钿剥阴尘覆，锦帐香消画烛幽。一旦色衰归故里，月明犹梦按梁州。"元字文元，桂林人。《登祝融峰》云："草叠到孤顶，身齐高鸟翔。势疑撞翼轸，翠欲滴潇湘。云湿幽崖滑，风梳古木香。晴空聊纵目，杳杳极穷荒。"这些均清秀高逸，深隽可喜。

此外又有僧虚中，宜春人。住湘西栗成寺，与齐己、尚颜、栖蟾为诗友。司空图亦雅推重其诗句，有云："十年华岳峰头住，只得虚中一首诗。"他有《碧云集》一卷，今存诗十四首。其诗清逸有致，如《泊洞庭》：

槐柳未知秋，依依馆驿头。客心俱念远，时雨自相留。浪没货鱼市，帆高卖酒楼。夜来思展转，故里在南州。

楚之散文作家殊寥寥无几，惟石文德、李宏皐二人较为著名。

石文德，连州人。酷好学，博览坟史，经目不忘。尝读范晔《后汉书》，摘其瑕璺数百条辨驳之，识者谓可比之于《史通》。又撰《大唐新纂》十三卷，事颇可采，亦为时称许。

李宏皐，不知何许人。武穆王时，由营道令累迁都统，掌书记。文昭王开天策府，他也与十八学士之列。及威服诸蛮，于溪州界立铜柱为表，高丈二尺，命他铭之，文极为时所称。以争立恭孝王事，为恭孝王脔杀。盖他以恭孝王为庶出，不应嗣位。他著有表状一卷。

又有朱遵度者，青州人。家多藏书，周览略遍，当时推为博学，号"朱万卷"。因避辽主之召，挈妻孥携书杂商贾来奔。文昭王待之甚薄，他乃杜门却扫，专事著作。后徙居金陵。著有《鸿渐学记》千卷、《群书丽藻》千卷及《漆经》若干卷云。

第十三章　吴越文学

吴越的开国，实始于后梁太祖开平元年(907)。史称夏四月，梁遣金吾卫大将军安崇隐进封钱镠为吴越王，吴越之名自此而起。吴越亦如楚之称王而不称帝，盖仍臣事中朝，未尝有僭位之心。然在当时混乱的时代，名义上虽未称帝，实际上等于称帝是同样的。中朝遣使进封，也不过是有名无实罢了。后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以国弱献地归宋，计称王凡七十二年，在十国中可谓最久。

吴越诸王均称有文采，且能以礼下士。而言文学，实无可称兴盛之处。除诗人罗隐以外，余皆默默无闻。大约当时文人多趋向于西蜀与南唐。南唐原与吴越为邻国，文人既趋向于彼，当然不会再趋向于此了。而南唐之建国与亡国亦与吴越相先后，故文学之中心点既被南唐所侵据，无怪吴越文学是这样的落寞了。

吴越也没有做词的作家，惟据陈师道《后山诗话》云："吴越后王来朝，太祖为置宴，出内妓弹琵琶，王献词云：'金凤欲飞遭制搦，情脉脉，看取玉楼云雨隔。'太祖起拊其背曰：'誓不杀钱王。'"是忠懿王钱俶似也能作词。只可惜仅存此断句，其余已都散佚无闻了。至于写旧体诗的诗人，罗隐以外，武肃王钱镠、忠懿王钱俶亦都能诗，此外惟谢鹗、吴仁璧寥寥数人而已。

罗隐(833—909)，字昭谏，新城人。本名横，貌寝陋，凡十上不中第，遂改今名。初寓池州梅根浦，刺史窦潏营墅居之，因自号江东生。后从事湖南，历淮、润诸镇，不合而归。以诗卷谒武肃王，卷首为《夏口》诗有云："一个祢衡容不得，思量黄祖谩英雄。"武肃王览诗大笑，辟他掌书记。累官钱塘县令、节度判官、给事中。朱全忠召他为谏议大夫，他不行。于天宝三年卒，年七十七。

他性傲睨，喜谑语。所为诗文每有逸气，而常涉刺讥。虽未及第，而诗名擅一时。据云，他尝“以诗投相国郑畋，畋有女殊丽，喜诗咏，读隐作，至‘张华谩出如舟语，不及刘侯一纸书’，由是切慕之，精爽飞越，莫知所从。隐忽来谒，女从帘后窥见迂寝之状，不复念矣”(见《唐才子传》)，亦足见他的诗能感人地方。著有《江南甲乙集》十卷、《江东后集》三卷、《吴越掌记集》三卷、《湘南应用》三卷、《淮南寓言》七卷及《谗书》五卷。兹举其《投所思》如下：

憔悴长安何所为，旅魂穷命自相疑。满川碧嶂无归日，一榻红尘有泪时。雕琢只应劳郢匠，膏肓终恐误秦医。浮生七十今三十，从此凄惶未可知。

他的诗又能善用俗语俚言，至今犹为人所引用者，如《自遣》：

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

又如《鹦鹉》：

莫恨雕笼翠羽残，江南地暖陇西寒。劝君不用分明语，语得分明出转难。

武肃王钱镠，字具美，杭州临安人。幼时倜傥有大度，志气雄杰。乘唐末乱离，削平江浙而据有之。既封为吴越王，还里省茔，延故老大陈乡饮，于即席自唱《还乡歌》云：

三节还乡兮挂锦衣，碧天朗朗兮爱日晖。功臣道上兮龙旌旗，父老远来兮相追随。家山乡眷兮会时稀，今朝设宴兮觥散飞。斗牛无孛兮民无欺，吴越一王兮驷马归。

此歌颇似汉高祖的《大风歌》，但不若《大风歌》的雄壮而已。

忠懿王钱俶，字文德，文穆王第九子，为武肃王之孙。史称他“博览经史，手不释卷。平生好吟咏，在国中编三百余篇，目曰《政本》。国相元德昭、翰林学士陶穀皆撰序，后文僖公搜寻遗坠，总集为十卷，撰后序行于世”(见《吴越备史》)，然今已散佚，只存《宫中

作》一首：

> 廊庑周遭翠幕遮，禁林深处绝喧哗。界开日影怜窗纸，穿破苔痕恶笋芽。西第晚宜供露茗，小池寒欲结冰花。谢公未是深沉量，犹把输赢局上夸。

吴仁璧，字廷实，吴人。唐大顺二年(891)登进士第，已而入浙，家贫，常佯狂行乞于市。武肃王闻其名，待之客礼，并欲辟为幕职，他以诗固辞；又请他为秦国太夫人墓铭，他也坚不肯属草。武肃王大怒，沉他于江中，他竟可谓为文学而殉身了。他有诗集一卷，今存十一首。其诗风格不高，《投谢钱武肃》云：

> 东门上相好知音，数尽台前郭隗金。累重虽然容食椹，力微无计报焚林。弊貂不称芙蓉幕，衰朽仍惭玳瑁簪。十里溪光一山月，可堪从此负归心。

谢鹗，南康人。举唐进士，仕武肃王，善为诗，有令名。进士裴诜选其诗之善者六十余篇行于世，惜今已散佚。

当时能作散文的颇多，章鲁封、沈崧、皮光业、林鼎均较为著名。

章鲁封，桐庐人。举进士不第，有隽才，少与罗隐齐名。武肃王既破董昌，辟他为表奏孔目官，他拒不受。武肃王命吏笞之，乃勉就职，累官苏州刺史。著有《章子》三卷。

沈崧，字吉甫，闽人。登唐乾宁二年(895)进士第，归闽经杭州，武肃王为镇海军掌书记，累迁至兵部尚书、右仆射，凡书表奏多出其手。文穆王立，置择能院，选吴中文士，命他领其职。后为丞相，年七十六卒。有文集二十卷。

皮光业，字文通，世为襄阳竟陵人，父日休在唐末有盛名，遂徙家于苏州。十岁能属文，以所业谒武肃王，与沈崧、林鼎，同辟幕府，累署浙西节度推官，并赐进士及第。文穆王嗣立，拜为丞相，凡教令仪制多所考定，年六十七卒。著有《皮氏见闻录》十三卷、《妖怪录》

五卷。

林鼎，字涣文，本侯官人，父无隐徙居明州。初谒武肃王，以为观察押牙，文穆王袭位拜为丞相，年五十四卒。他性谠正而强记，中年读书必达曙，所聚图籍皆手钞数过，即残编断简亦校雠补缀，无所厌倦。著有《吴江应用集》二十卷。

此外范赞时，苏州人，为宋范仲淹之祖；林克己，钱塘人，为宋林逋之祖。均博洽善文章。赞时所辑《资谈》六十卷，世多藏之。又有僧延寿字冲立，本姓王，余杭人，著《宗镜录》一百卷。僧赞宁，本姓高，德清人，后入宋，著有《高僧传》三十卷、《内典集》一百五十卷、《外学集》四十九卷，今均传于世。

第十四章 闽文学

闽之建国，实始于后唐明宗长兴四年(933)，即史所称的惠宗。太祖王审知、嗣王王延翰均未称帝，当时亦有劝太祖称帝者，太祖曰："我宁为开门节度使，不作闭门天子也。"(见《十国春秋·闽太祖世家》)后于晋出帝开运二年(945)为南唐所灭，其立国不过十余年而已。

不过我们要谈闽的文学，必须上溯于太祖王审知嗣威武节度使起(897)。史称太祖虽起于盗贼，而为人俭约，好礼下士，因此宾至如归，唐之衣冠卿士跋涉来奔，如韩偓、如崔道融、如徐寅、如黄滔、如翁承赞，均为著名的文学之士，故闽的文学遂得称盛。太祖以后，诸帝惟以跋扈篡夺为事，无复文学之可言了。

韩偓，字致尧，号玉樵山人，京兆人。唐龙纪初进士，累迁谏议大夫、翰林学士，昭宗屡欲相之，他让而不受，后为朱全忠所忌，贬荣经尉。昭宗被弑，挈族来依太祖，侨居南安。朱全忠篡位，召他不去，天德三年(923)卒。

他著有《翰林集》一卷、《香奁集》三卷。其诗多写绮丽侧艳之词，有晚唐遗风，如《五更》：

> 往年曾约郁金床，半夜潜身入洞房。怀里不知金钿落，暗中唯觉绣鞋香。此时欲别魂俱断，自后相逢眼更狂。光景旋消惆怅在，一生赢得是凄凉。

如《昼寝》：

> 碧桐阴尽隔帘栊，扇拂金鹅玉簟烘。扑粉更添香体滑，解衣唯见下裳红。烦襟乍触冰壶冷，倦枕徐敧宝髻松。何必苦劳魂与梦，王昌只在此墙东。

均是穷极香腻的。又如《秋村》：

稻垄蓼红沟水清，荻园叶白秋日明。空坡路细见骑过，远田人静闻水行。柴门狼藉牛羊气，竹坞幽深鸡犬声。绝粒看经香一炷，心知无事即长生。

又如《船头》：

两岸绿芜齐如剪，掩映云山相向晚。船头独立望长空，日艳波光逼人眼。

这些写景写情，亦殊逼切动人。所以他的诗，又与当时韦庄、罗隐并称三大家。他亦工词，绮丽如其诗，《生查子》云：

侍女动妆奁，故故惊人睡。那知本未眠，背面偷垂泪。懒卸凤凰钗，羞入鸳鸯被。时复见残灯，和烟坠金穗。

此种把少女相思之苦，曲曲道出。他虽未被选入于《花间》，而实当《花间》诸作家。惜其词已多散佚，今只存三首了。

崔道融，荆州人。唐时以征辟为永嘉令，累官右补阙。后避难来闽依太祖，与司空图、黄滔为诗友。他卒，滔为文以吊之，词甚哀切。著有《申唐集》十卷，但今多散佚。

他作诗最工绝句，语意妙甚，如《寄人》：

澹澹长江水，悠悠远客情。落花相与恨，到地一无声。

又如《对早梅寄友人》：

忆得前年君寄诗，海边三见早梅词。与君犹是海边客，又见早梅花发时。

这些都是含意深长，颇饶隽味。辛文房推谓“晚唐间忽有此作，使古人复生亦不多让。可谓出乎其萃，拔乎其类者矣”（见《唐才子传》），其言虽属过誉，而要之清隽动人，有足取者。

黄滔，字文江，泉州莆田人。唐乾宁二年（895）进士，光化中除四门博士，天复元年（901）受太祖辟，以监察御史里行充威武军节度推官。梁时强藩多僭位称帝，太祖虽据全闽，而终身只为节将，皆

他规劝之功。

他为文赡蔚典则，当时国中大著作多由他属草。诗则清淳丰润，有贞元、长庆之风，如《落花》：

落花辞高树，最是愁人处。一一旋成泥，日暮有风雨。不如沙上蓬，根断随长风。飘然与道俱，无情任西东。

又如《寄友人》：

君爱桃李花，桃李花易飘。妾怜松柏色，松柏色难雕。当年识君初，指期非一朝。今辰见君意，日暮何萧条。入门有势利，孰能无嚣嚣？

徐寅，字昭梦，莆田人。登唐乾宁进士第，授秘书省正字。后归乡里，太祖辟掌书记。因礼待简略，他遂拂衣而去，隐居于延寿溪以终。关于此事，《十国春秋》本传有一段记载，兹录如下：

（寅）尝游大梁，以赋谒梁王全忠，误触其讳，梁王变色。寅狼狈出，欲遁去，恐不得脱，乃作《过大梁赋》以献，略曰："千金汉将，感精魄以神交；一眼伧夫，望英风而胆落。"梁王得赋大喜，遗缣五百匹。盖全忠曾梦淮阴侯指授兵法，而晋王克用则眇一目者也。已而走归家里，太祖辟掌书记。唐灭梁，闽使贺庄宗登极。庄宗遽问使回："徐寅无恙乎？归语尔主，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寅指斥先帝，尔国何以容之？"使回，具以告，太祖曰："如此则上直欲杀徐寅尔，今但不可用可矣。"即日戒阍者不得引接，寅拂衣去。

他才思敏绝，善作诗赋，著有《探龙》、《钓矶》二集。其诗多写胸怀抑郁不平之语，如《旅次寓题》：

胡为名利役，来往老关河？白发随梳少，青山入梦多。途穷怜抱疾，世乱耻登科。却起渔舟念，春风钓绿波。

又如《古往今来》：

古往今来恨莫穷，不如沉醉卧春风。雀儿无角长穿屋，鹦

> 鹉能言却入笼。柳惠岂嫌居下位，朱云直去指三公。闲思郭令长安宅，草没匡墙旧事空。

这些都是写自己失志而聊以自慰之语。他的赋，著名者如《止戈为武赋》、《人生几何赋》、《斩蛇剑赋》、《过骊山赋》，均极为时人所传诵，且有以金书列为屏障者，其珍重可知。

翁承赞，字文尧，福唐人。唐乾宁三年(896)进士，又擢宏词科，任京兆府参军，累官右拾遗、户部员外郎。后仕梁为谏议大夫，复为闽王册礼副使。因归依太祖，太祖待之甚厚，遂以为相。他劝太祖建四门学，以教闽士之秀者。自号狎鸥翁。

他体貌甚伟，亦工于诗，时人称其高妙。如《晨兴》：

> 晨起竹轩外，逍遥清兴多。早凉生户牖，孤月照关河。旅食甘藜藿，归心忆薜萝。一尊如有地，放意且狂歌。

此外能写诗者尚多。王延彬为太祖弟审邽之子，官节度使，《哭徐寅》云："延寿溪头叹逝波，古今人事半销磨。昔除正字今何在?所谓人生能几何。"颜仁郁，字文杰，泉州人，为归德场长。《农家》云："夜半呼儿趁晓耕，羸牛无力渐艰行。时人不识农家苦，将谓田中谷自生。"刘乙，字子真，亦泉州人，隐安溪凤髻山；郑良士，字君梦，仙游人。均称能诗云。

闽之散文作家殊寥落无可称者，有之，惟陈峤、刘山甫两人尚可述者。此外黄滔、徐寅原亦能文，惟均不如其诗的著称。

陈峤，字延封，莆田人。幼居北平山读书，登光启三年(887)进士第，授京兆府参军。太祖兄弟入闽，辟为大从事，终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年七十五卒。他弱冠即能文，所著有表记奏牍凡三百篇。

刘山甫，彭城人。仕太祖为威武军节度判官，后迁殿中侍御史。他为故中朝旧族，富有才藻，著《金溪闲谈》十二卷。尝撰《徐寅墓志铭》，情文兼至，为世所称。

第十五章　荆南文学

荆南,《新五代史》作南平,因武信王高季兴曾受后唐封为南平王的缘故。但《宋史》、《十国春秋》均作荆南,故我们也称荆南。

荆南在十国中是一个最小的国度,只有州府三。所以他们也是臣事中朝,惟受中朝的封爵而已。计自后梁太祖开平元年(907)武信王据有荆州起,至宋太祖乾德元年(963)高继冲降宋止,凡五十七年,其间称王之年不过四十八年(自 913 年梁封渤海王起,至 960 年贞懿王薨)。史称武信王虽一武人,颇折节好宾客,游士缁流至者,无不倾怀结纳。故当时著名词人孙光宪、诗僧贯休、齐己,均在荆南。贯休后以忤成汭故,遽放黔中,故今只述孙光宪与齐己二人。此外如梁震、王贞范之辈,也附论之。

孙光宪(? —968),字孟广,贵平人。家世业农,至他独读书好学,唐时为陵州判官。天成初避地江陵,时武信王方招致四方之士,因梁震的推荐,入掌书记。累官荆南节度副使、检校秘书、御史大夫。及宋灭湖南,假道于荆,他乃立劝高继冲献三州之地归宋。宋太祖嘉其功,授黄州刺史。乾德末卒。

他博物稽古,性嗜经籍,聚书凡数千卷,或自钞写,孜孜校雠,老而不废。著作颇富,惟最著者乃他所作的词,当时《花间集》辑他的词最多,至六十篇。十国词人,除西蜀与南唐外,其他只有荆南光宪一人而已。而他的作品,意境也都十分高妙,不愧为第一流的作家。如《思帝乡》:

> 如何?遣情情更多。永日水堂帘下,敛羞蛾。六幅罗裙窣地,微行曳碧波。看尽满地疏雨,打团荷。

又如《谒金门》:

留不得，留得也应无益。白纻春衫如雪色，扬州初去日。轻别离，甘抛掷，江上满帆风疾。却羡彩鸳三十六，孤鸾还一只。

这种写少妇的离愁，真是刻画殆尽。他也写隐士生涯，清逸潇洒，别有情致，如《渔歌子》：

泛流萤，明又灭，夜凉水冷东湾阔。风浩浩，笛寥寥，万顷金波澄澈。　杜若洲，香郁烈，一声宿雁霜时节。经霅水，过松江，尽属侬家日月。

此外，他又著有《荆台》、《橘斋》等集。又有《北梦琐言》，多采词家逸事，今传于世。

僧齐己，益阳人。本佃户胡氏子，名得生，七岁在大沩山寺落发为浮图，久之，居湖南道林寺。后欲游蜀，武信王闻他名，遮留不令去，署为龙兴寺僧正。终于江陵，自号衡岳沙门。

他在当时，与僧贯休为两大诗僧。初以诗师郑谷，后在湖南，徐仲雅、廖匡图、刘昭禹辈皆心折之，时人有戏呼之为“诗囊”。有诗八百首，孙光宪为作序文，名《白莲集》。

他居恒郁郁，故写诗亦多郁郁之词。此外则不脱佛家本色，另有其清逸之致，如《惊秋》：

晓窗惊觉向秋风，万里心凝淡荡中。池影碎翻红菡萏，井声干落绿梧桐。破除闲事浑归道，销耗劳生旋逐空。妖杀九原狐兔意，岂知丘陇是英雄。

此种“岂知丘陇是英雄”，大有自叹不如之意。又如《日日曲》：

日日日东上，日日日西没。任是神仙容，也须成朽骨。浮生灭复生，芳草死还出。不知千古万古人，葬向青山为底物！

此盖写禅家所谓“空”的一字，万事皆空，何必留葬于青山呢？

梁震，邛州依政人。唐末进士，流寓京师。梁初归蜀，路过江陵，武信王喜他才识，留而不遣，欲奏为判官，他以耻为强藩属吏，但求

为宾客，王因称之为先辈。文献王继立，固请退居，王为筑室于土洲上，自是他披鹤氅，逍遥若仙，自称荆台隐士。著有文集一卷。

王贞范，江陵人。事文献王为推官，累官至少监。他素精于《春秋》，有驳正杜预《左传注》数百条。他又为女弟曲谱制序，一时咸诧以为异。

第十六章　北汉文学

后汉既为郭威所篡(951),高祖弟旻因据太原以北诸州,自立称帝,是为北汉。故北汉在十国之中建国最晚,凡传四主,至英武帝广运六年(979)亦为宋太宗所灭。在十国中,亦以它亡国为最后。

北汉北有强辽,南有周、宋,区区一隅,不速亡已属幸事,欲求其兴,自属难乎其难。且年祚又促,不过二十九年,故言文学,几等于无,而诸帝亦忙于纳贡遣兵之事,当然对于文学是无暇来顾及了。无已,姑将当时称能文者略述如下:

赵宏,蓟州渔阳人。后唐清泰中举进士。世祖称帝,雅爱其才,累官至翰林承旨、兵部尚书。睿宗天会四年(960),授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后出知岚州,为宋太祖所围,他乃出降,授检校太傅、安国军节度使。年六十七卒。

他雅善音律,能吹笛,又善为诗,人多讽诵。著有《观光集》若干卷,惜今已不传。

李恽,字孟深,汴州阳武人。后汉乾祐初进士,客游岚州。世祖称帝,署为州从事,后擢知制诰、翰林学士。历仕睿宗父子,累官至尚书左仆射兼中书侍郎、平章事、上柱国、陇西郡开国公。他可说是北汉最得荣任的大臣,可是后来也降于宋,降为殿中监,后又出知广州。年七十三卒。

他性躁达,善谈名理,又工文词,以骈丽见称于当时。英武帝时天龙寺千佛楼成,诏他撰碑铭,文长千余言,一时无不叹绝。

又有杨梦申者,不知何许人,睿宗时累官右谏议大夫,亦长于碑铭。曾奉敕撰《定王维颙神道碑文》,文不加点,朝士多称赏之。王保衡,亦不知何许人,仕英武帝为中书舍人,直翰林院。博学有文

名，著有《晋阳见闻要录》行世。王景纯，太原人，与谭用之为文友，以文章相砥砺，不求仕进。时时购钞四方之书，晚年集书至数千卷。国亡入宋，终于汴京。

第十七章　民间词曲

我们在上面所说的几章里，都是关于文人学士的文学，而却没有说到民间的文学。我们早已知道词起于民间，流传于娼女、歌伶之口的，后来才渐渐被文人学士所采用，而变成典雅的文学。所以在当时，除典雅的文学外，必应有浅俗的民间文学，这在词一方面是无可讳言的。自从敦煌石室所发现汉文卷子里有《云谣集杂曲子》一种，我们更可证明在当时确有这一种素朴的文学了。这集里有杂曲子三十余首，惜有十二首是阙了的。它们都没有作者的姓名，它们的词也是无题，如《凤归云》、如《天仙子》、如《破阵子》、如《长相思》，都是调即是题，所以我们可以深信，这些曲子是五代的民间文学无疑，最早不过在唐季而已。

这三十余首的杂曲子，所写也不外乎闺情与离思。有的也写得十分典雅，这也许已经文人润饰了的。但大多数总不失却它们一种浅俗土朴之气的，如《破阵子》：

> 年少征夫军帖，书名年复年。为觅封侯酬壮志，携剑弯弓沙碛边。抛人如断弦。　迢递可知闺阁，吞声忍泪孤眠。春去春来庭树老，早晚王师归却还。免教心怨天。

又如《雀踏枝》：

> 叵耐灵鹊多瞒语，送喜何曾有凭据？几度飞来活捉取，锁上金笼休共语。　比拟好心来送喜，谁知锁我在金笼里！欲他征夫早归来，腾身却放我向青云里。

这些都写少妇远思征夫，其语浅，其情真。盖当时国内混乱，征夫久久不归，无怪闺中少妇怨天恨地，把自己比拟像锁在金笼里一般，此种风趣，真非文人学士所能模拟得到的。



宋代文学

柯敦伯著

原名“宋文学史”

据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重排

第一章　绪　论

赵宋一代之文学，我国有史以来蔚然一大观也。其间上下三百余年，遗文故献传于今日者，汗牛充栋，承学之士目为之眩，殆未易骤寻端绪。夫历年未远，则文献易征，故赵宋遗事较详于李唐以前，斯固然矣。而自来研寻学术源委者，莫不归其大功于国家之政教。按《宋史·文苑传》序曰：

> 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学之名，作其即位，弥文日增。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国初，杨亿、刘筠犹袭唐人声律之体，柳开、穆修，志欲变古而力弗逮。庐陵欧阳修出，以古文倡，临川王安石、眉山苏轼、南丰曾巩起而和之，宋文日趋于古矣。南渡文气不及东都，岂不足以观世变欤？

此说偏主于狭义之散体文。又修史者挟有尊崇道学之成见，直以诗文词曲为末事，故以姜夔擅盛名于词坛，而不获著传于史。其为疏漏，诚有如《四库总目提要》所谓“《文苑传》止详北宋，而南宋止载周邦彦等数人”。惟其推论为君者典学于上，则海内文士辈出于下，要亦信而有征。按吴处厚《青箱杂记》云：

> 真宗听政之暇，唯务观书。每观毕一书，即有篇咏，使近臣

赓和。故有御制看《尚书》诗三章,(中略)看《孝经》三章,复有御制读《史记》三章,读《前汉书》三首,读《后汉书》三首,读《三国志》三首,读《晋书》三首,读《宋书》二首,读《陈书》二首,读《魏书》三首,读《北魏书》二首,读《后周书》三首,读《隋书》三首,读《唐书》三首,读《五代·梁史》三首,读《五代》后唐史三首,读《五代》晋史二首,读《五代》汉史二首,读《五代》周史二首,可谓近世好文之主也。

文学者,人类抒情适性之具。其体制之单复、文野,与民族文化之演进同一方向。大抵人群之知识日益开明,则嗜欲之需求亦日臻复杂。我国文学,邃古无论矣,自三百篇以降,体制日增,迄于赵宋而大备矣。真宗听政之暇,雅好吟咏。此其以渔古染翰为乐,抒情适性之上焉者也。他如太宗洞晓音律,亲制曲破(详后第六章)。仁宗时,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台舞席,竞赌新声,而词之小令多衍为长调(详后第五章),又是时日进一奇怪之事以娱宫禁,而诨词小说以兴(详后第七章)。徽宗身为亡国之君,而当其居帝位时,风流跌宕,纵情于绳墨之外,虽终召灭亡之祸,而在另一方面,亦足以助长文学之进化。南渡偏安,孝宗以天下养太上,下逮理宗,藉蒙古之兴,共灭女真,亦皆升平自庆,朝野恬嬉,群众娱乐之方式日繁,文学领土亦日以开拓。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吴自牧《梦粱录》、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周密《武林旧事》诸书,其时繁绮之风,可想见其概(详后第六、第七各章),今之讨论赵宋文学者皆不废其书,与宋人遗集并重焉。然则上之所好,固不必拘拘于好学以合乎道学派所谓“义理”,苟其日常抒情适性之具,可以与民众同者,经多时之蕴酿而有所成就,罔不足以占一位置于文学系统之中。故赵宋三百年间之文学,语其大别,无间新旧,可得下列六种:

(一) 散体文　上承唐旧而发挥光大,渐入道学派“文以载道”之囿者也。

（二）四六文　上承唐旧而渐脱恒蹊，大抵适用于告语者也。

（三）诗　上承唐旧而变化生新，能与唐人争胜者也。

（四）词　上承唐旧而体制加繁，附庸蔚为大国，独占一代文坛，允为一代之文学，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五）戏曲　协于音律之文学，由词进而为曲，其衍简为繁，非一蹴可几也。今之所谓戏曲，盖合舞蹈、说白、曲调数者以演一事，北宋东都之盛，渐已具其端倪，下逮元、明乃大备耳。

（六）小说　小说由来旧矣。李唐以前，大都以纪怪述事为宗，入宋而杂取史实，行以诨词，于是平话兴焉。盖不以组绘为尚，惟计描写之工，遂于近代文学史上别树一帜，而赵宋一代实肇其端云。

虽然，赵宋一代，凡具有文学天才者，往往受义理之桎梏，义理胜于词章，而义理终不能掩抑词章。史载欧阳修与学者言，未尝及文章，惟谈吏事，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黄庭坚亦尝谓："数十年来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奖后生，故华而不实。"其周、张、二程诸子，更谨持文章害道之说，而萃其大成于朱熹。熹读《唐志》，尝有说曰："自孟子殁，天下之士不求知道养德以充其内，而文章遂无实。东京以后讫于隋、唐，愈下愈衰，韩愈氏出，始出六艺而作《原道》诸篇。然读其书，出于谄谀戏豫放浪者自不少。若夫所原之'道'，则徒能言其大体，而未见有探讨服行之效。故其论古人，直以屈原、孟轲、马迁、相如、扬雄为一等，而不及董、贾。其论当世之弊，但以词不己出遂有神徂圣伏之叹。则师生传受，未免裂道与文以为两物。自是以来又数百年，而后有欧阳子，其病亦同。"熹持"文以载道"之说，其所谓"道"者，拘拘于历圣群贤统绪相承，故于异端俗学，又复诋其不遗余力，欧阳、二苏且不获免。按罗大经《鹤林玉露》载：

> 朱文公云："二苏以精深敏妙之文，煽倾危变幻之习。"又云："早拾苏、张之绪余，晚醉佛老之糟粕。"余谓此文公二十八

字弹文也。自程、苏相攻，其徒各右其师。孝宗最重大苏之文，御制序赞，太学翕然诵读。所谓“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盖纪实也。文公每与其徒言苏氏之学坏人心术，学校尤宜禁绝。编《楚辞后语》，坡公诸赋皆不取，惟收《胡麻赋》，以其文类《橘颂》；编《名臣言行录》，于坡公议论所取甚少。

又载：

东山先生杨伯子尝为余言，某昔为宗正丞，真西山以直院兼玉牒官。尝至某位中，见案上有近时人诗文一编，西山一见掷之曰：“宗丞何用看此？”某悚然问故，西山曰：“此人大非端士，笔头虽写得数句行，所谓本心不正，脉理皆邪，读之将恐染神乱志，非徒无益。”某佩服其言，再三谢之。因言近世如夏英公、丁晋公、王岐公、吕惠卿、林子中、蔡持正辈亦非无文章，然而君子不道者，皆以是也。

道学家高自标榜，务以义理掩抑词章。观于罗氏所纪，可概见矣，斯亦研究赵宋文学者所当深考也。

道学派务以掩抑词章为事。而宋代文士修辞具有鉴衡，仍流传至今不废其绪，何也？岂不以民族文化及是时而臻于灿烂，各种学术分途竞进，在同一时期之内兼容并包，虽其甚相牴牾者，终不能稍形轩轾。故道学莫盛于赵宋，文学亦大昌于赵宋。而吾人今日所藉以讨论瑕瑜，别裁真伪，博参而广考者，尤莫如文学批评一类诸书。《四库总目提要》云：

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棨《本事诗》旁采故实，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宋、明两代

均好为议论，所撰尤繁。虽宋人务求深解，多穿凿之词；明人喜作高谈，多虚憍之论。然汰除糟粕，采撷菁英，每足以考证旧闻，触发新意。

兹就《四库全书》集部诗文评类所著录者，列举其目于后。其间诗话为数最多，评文之作仅得七种，评词者又别见于词曲类云。

（甲）宋人诗话著录于《四库全书》及附存目者其目如下：

（一）欧阳修《六一诗话》一卷

（二）司马光《续诗话》一卷

（三）刘攽《中山诗话》一卷

（四）陈师道《后山诗话》一卷

（五）魏泰《临汉隐居诗话》一卷

（六）吴幵《优古堂诗话》一卷

（七）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四十八卷、后集五十卷

（八）许颉《彦周诗话》一卷

（九）吕本中《紫微诗话》一卷

（十）张表臣《珊瑚钩诗话》三卷

（十一）叶梦得《石林诗话》一卷

（十二）吴可《藏海诗话》一卷

（十三）朱弁《风月堂诗话》二卷

（十四）张戒《岁寒堂诗话》二卷

（十五）陈岩肖《庚溪诗话》二卷

（十六）葛立方《韵语阳秋》二十卷

（十七）黄彻《䂬溪诗话》十卷

（十八）计有功《唐诗纪事》八十一卷

（十九）吴聿《观林诗话》一卷

（二十）吴德远《环溪诗话》一卷

（二十一）周紫芝《竹坡诗话》一卷

（二十二）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六十卷、后集四十卷
（二十三）周必大《二老堂诗话》一卷
（二十四）杨万里《诚斋诗话》一卷
（二十五）严羽《沧浪诗话》一卷
（二十六）魏庆之《诗人玉屑》二十卷
（二十七）赵与虤《娱书堂诗话》一卷
（二十八）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二卷、后集二卷、续集四卷、新集六卷
（二十九）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四卷
（三十）蔡梦弼《草堂诗话》二卷
（三十一）何谿汶《竹庄诗话》二十四卷
（三十二）周密《浩然斋雅谈》三卷
（三十三）范晞文《对床夜话》五卷
（三十四）蔡正孙《诗林广记》前集十卷、后集十卷
以上文渊阁著录
（一）释文莹《玉壶诗话》一卷
（二）释惠洪《天厨禁脔》三卷
（三）洪迈《容斋诗话》六卷
（四）林越《少陵诗格》一卷
（五）蔡传《历代吟谱》五卷
（六）严有翼《艺苑雌黄》十卷
（七）陈应行《吟窗杂录》五十卷
（八）尤袤《全唐诗话》十卷
（九）方岳《深雪偶谈》一卷
（十）吴子良《吴氏诗话》二卷
以上附存目
（乙）宋人文话著录于《四库全书》者其目如下：

（一）王铚《四六话》二卷

（二）谢伋《四六谈麈》一卷。

（三）陈骙《文则》二卷

（四）王正德《余师录》四卷

（五）李涂《文章精义》一卷

以上文渊阁著录

（一）洪迈《容斋四六丛谈》一卷

（二）强行甫《唐子西文录》一卷

以上附存目

（丙）宋人词话著录于《四库全书》及附存目者其目如下：

（一）王灼《碧鸡漫志》五卷（参知"不足斋丛书"刊本）

（二）沈义父《乐府指迷》一卷

以上文渊阁著录

（一）张炎《词源》二卷（四库全书总目原作《乐府指迷》，盖沿陈继儒之误）

以上附存目

以上所列尚未尽赅洽者，如姜夔有《诗说》一卷，附于《白石道人诗集》之后，故《四库》未著其目。至于诗话诸书，颇有兼及于词者，如陈师道《后山诗话》、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是也；亦有兼及于文者，如杨万里《诚斋诗话》、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是也。其周密《浩然斋雅谈》三卷，经四库馆臣就《永乐大典》中搜辑排纂，以考证经史评论文章者为上卷，以诗话为中卷，以词话为下卷。此书几奄有文学批评之全。循是例以推求，则宋人说部书中杂有诗话、文话、词话者，当亦不易悉数。清厉鹗撰《宋诗纪事》、张宗楠撰《词林纪事》，往往取材于小说、笔记诸书，靡不裒成巨帙。后之从事于宋代文学而讨论其升降源流者，资以考证阐发焉。

今所论次，以文学之体裁举其纲，以作者之承袭系其目，首散

体文，次四六文，次诗，次词，次戏曲，次小说。前之四者，宋人之制作具存，元、明以降，文士之讨论扬搉亦详审矣，博观约取，料简融通，尤于师友渊源递嬗之间三致意焉。后之二者，盖五六百年来文人学士所不乐道。近时渐知爱重，而宋人遗制散亡，今复出于世者片鳞只爪，无由品第其高下，其可供铺叙者，不过体裁承易之迹而已。两宋作者，如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陆游之俦，罔不兼擅众美。其人里贯、仕履未可任意穿插，自形冗蔓，故汇列于后，而以文学作者小传殿焉。

第二章　宋之散体文

第一节　文体之复古

散体文，即旧说所谓“古文”也。文曷为而有今、古之别耶？以时间言，自今日以前皆渐即于古，是则凡五代以前之文流传于宋者皆古文也。其宋人自为之文，乌得而谓之古？若夫居宋之世而学为五代以前之文以复于古，则宋代之学古人文体者不一其派，又曷为而必以欧、曾、王、苏为正宗？而本章之所谓散体文即旧说所谓“古文”者，又何说乎？盖自魏晋六朝以还，文尚骈俪，至中唐元结、杜甫等始为散体，韩愈、柳宗元益发挥而光大之，以其越八代而复西汉之古，故号“古文”，而苏轼遂称韩愈曰“文起八代之衰”。至晚唐、五代，文体又渐次卑靡，甚或流于浮艳，宋初亦未能遽振。西昆派杨亿等于诗尚辞采，于文亦以妍华骈俪为高。迨欧阳修起，有柳开、穆修、尹洙、石介等导之于前，有曾巩、王安石、三苏父子承之于后，而韩、柳复古之风乃复大昌，重见西汉散体文之旧。惟其排近世而上溯于古，故号曰古文。究其文体，则屏抑骈俪之习而复于散行之体，故旧说所谓“古文”者，即散体文也。

惟是时持文体复古之论者，往往参合“文以载道”之说，如张景为柳开文集作序云：

> 一气为万物母，至于阴阳开阖、嘘吸消长，为昼夜，为寒暑，为变化，为生死，皆一气之动也。庸不知斡之而致其动者果何物哉，不知其何物，所以为神也。人之道不远是焉。至道无用，用之者有其动也。故为德，为教，为慈爱，为威严，为赏罚，为法度，为立功，为立言，亦不知用之而应其动者又何物也。夫至道潜于至诚，至诚蕴于至明。离潜发蕴而不知所至者，非神

乎哉？尧、舜之揖让，汤、武之征伐，周公之制礼乐，孔子之作经典，孟轲之拒杨、墨，韩愈之排释老，大小虽殊，皆出于不测而垂于无穷也。先生生于晋末，长于宋初，拯五代之横流，扶百世之大教，续韩、孟而助周、孔，非先生孰能哉？先生之道，非常儒可道也；先生之文，非常儒可文也。离其言于往迹，会其旨于前经，破昏荡疑，拒邪归正，学者忠信，以仰以赖，先生之用可测乎？藏其用于神矣。然其生不得大位，不克著之于事业而尽在于文章，文章盖空言也，先生岂徒空言哉？足以观其志矣。

至如苏轼序《六一居士集》，其称颂欧阳修尤有甚焉，略云：

自汉以来，道术不出于孔氏，而乱天下者多矣，晋以老庄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余年而后得韩愈。学者以愈配孟子，盖庶几焉。愈之后二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师尊之。自欧阳子之存，世之不说者哗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呜呼！此岂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欧阳子没十有余年，士始为新学，以佛老之似，乱周、孔之真，识者忧之。赖天子明圣，诏修取士法，风厉学者，专治孔氏，罢黜异端，然后风俗一变。考论师友渊源所自，复知诵习欧阳子之书。

宋代散体文之实质，大率如张景、苏轼所称说。南渡以后，道学派与功利派各植一帜，是又分道扬镳者已。

第二节　宋初古文家

北宋为古文者，柳开最先。当时梁周翰、高锡、范杲并与开声名相埒，而开治古文用力最勤。少慕韩愈、柳宗元，尝以肩愈、希元（一作绍元）为名字。推崇韩愈尤至，观其《昌黎集后序》可知也。后欧阳修为古文，甚推重穆修、苏舜钦而不及开，惟范文正公作《尹师鲁集序》，略云：

> 五代文体薄弱，皇朝柳仲涂起而麾之。洎杨大年独步当世，学者专事藻饰，谓古道不适于用，废而弗学者久之。师鲁与穆伯长力为古文，欧阳永叔从而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变而古。

观此可知，开之倡复古文在杨亿等专事藻饰之前，盖杨等居高位力足以抑之也。洪迈《容斋续笔》甚以欧阳修不知有柳开为异，其言曰：

> 予读张景集中柳开行状云："公少诵经籍，天水赵生，老儒也，持韩愈文仅百篇授公曰：'质而不丽，意若难晓，子详之，何如？'公一览不能舍，叹曰：'唐有斯文哉！'因为文章，直以韩为宗尚，时韩之道独行于公，遂名肩愈、字绍元。韩之道大行于今，自公始也。"又云："公生于晋末，长于宋初，扶百世之大教，续韩、孟而助周、孔。兵部侍郎王祐得公书曰：'子之文出于今世，真古之文章也。'兵部尚书杨昭俭曰：'子之文章，世无知者已二百年矣。'"开以开宝六年登进士第，景作行状时咸平三年。开序韩文云："予读先生之文，自年十七至于今，凡七年。"然则在国初，开已得《昌黎集》而作古文，去穆伯长时数十年矣。苏、欧阳更出其后，而欧阳略不及之，乃以为天下未有道韩文者，何也？

柳开同时有王禹偁，后有范仲淹、孙何、丁谓，皆治古文。王禹

偁不仅以文著，其诗亦足为苏舜钦、梅尧臣之先导。范仲淹勋业卓绝一时，本不藉文章以传，而贯通经术，明达政体，凡所论著，一一皆有本之言，洗尽浮夸之习。孙何与丁谓少相友善，尝同袖文谒王禹偁，禹偁大惊重之，以为自唐韩愈、柳宗元后三百年始有此作。惟谓位至通显后又与杨亿酬唱，列名《西昆酬唱集》中。何弟仅及家人甫，皆究心古文云。

柳开倡为古文，而终抑于杨亿、刘筠等声偶之辞，诚亦势使之然。仁宗朝词臣如夏竦、宋庠、宋祁等，又自为风气。欧阳修《归田录》于夏竦称其能文。二宋少尝受知于夏竦，按吴处厚《青箱杂记》，竦守安州日，二宋兄弟尚皆布衣，竦试以"落花"诗。庠咏落花而不言落，竦谓"当状元及第"。祁非所及，然亦须登严近。后皆如其言。竦与二宋，当真、仁之交，西昆派风靡一世，而独远规盛唐，殆亦不随时俯仰者。宋祁与欧阳修同修《唐书》，其文雕琢刻削，师韩愈而失之艰涩，于并时亦未始不服欧阳修也。其所作《笔记》中自述三十年来为文用力之要，略云：

> 余少为学，本无师友，家苦贫无书，习作诗赋，未始有志立名于当世也，愿计粟米养亲绍家阀耳。年二十四而以文投故宰相夏公，公奇之，以为必取甲科，吾亦不知果是欤。天圣甲子，从乡贡试礼部，故龙图学士刘公叹所试辞赋，大称之朝，以为诸生冠。吾始重自淬砺力于学，模写有名士文章，诸儒颇称以为是。年过五十，被诏作《唐书》，精思十余年，尽见前世诸著，乃悟文章之难也。虽悟于心，又求之古人，始得其崖略。因取视五十以前所为文，赧然汗下，知未尝得作者藩篱，而所效皆糟粕、刍狗矣。夫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后可以传不朽，若体规画圆，准方作矩，终为人之臣仆。古人讥屋下作屋，信然。陆机曰："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韩愈曰："惟陈言之务去。"此乃为文之要。五经皆不同体，孔子没后，百家奋兴，类不相沿，

是前人皆得此旨。鸣呼！吾亦悟之晚矣，虽然，若天假吾年，犹冀老而成云。

第三节　庆历以后古文家

至庆历而后，苏舜钦兄弟与穆修、尹洙、孙复、石介诸人，竞为复古之文。穆修毕生搜求韩、柳文集，矻矻数十年不懈。其《唐柳先生集后序》自记颠末甚详，称颂韩、柳，至谓"辞严义密，制述如经"。又云："鸣呼！天厚予者多矣。始而餍我以韩，既而饫我以柳，谓天不吾厚，岂不诬也哉？世之学者，如不志于古则已，苟志于古，则践立言之域，舍二先生而不由，虽曰能之，非予所敢知也。"

石介尝作《怪说》以诃杨、刘，其中篇曰：

> 或曰，天下不谓之怪，子谓之怪。今有子不谓怪而天下谓之怪，请为子而言之可乎？曰：奚其为怪也？曰：昔杨翰林欲以文章为宗于天下，忧天下未尽信己之道，于是盲天下人目，聋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见有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使天下人耳聋，不闻有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俟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吏部之道灭，乃发其盲，开其聋，使天下唯见己之道，唯闻己之道，莫知其他。今天下有杨亿之道四十年矣。今人欲反盲天下人目，聋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见有杨亿之道；使天下人耳聋，不闻有杨亿之道。俟杨亿道灭，乃发其盲，开其聋，使目唯见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吏部之道，耳唯闻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也，三才、九畴、五常之道也。反厥常，则为怪矣。夫《书》则有《尧、舜典》、《皋陶、益稷谟》、《禹贡》、箕子之《洪范》，《诗》则有大小雅、《周颂》、《商颂》、《鲁颂》，《春秋》则有圣人之经，《易》则有文王之繇、周公

之爻、夫子之十翼。今杨亿穷研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使天下不为书之典、谟、《禹贡》、《洪范》，《诗》之《雅》、《颂》，《春秋》之经，《易》之繇、爻、十翼；而为杨亿之穷研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其为怪大矣！是人欲去其怪而就于无怪，今天下反谓之怪而怪之，呜呼！

观介此说，可知是时杨、刘在文学界势力之大。故虽柳开等倡导于先，苏、穆、石、尹等继起而和之，而必得欧阳修居高位以力挽之，风气乃为之大变也。

是时李觏亦为古文。觏字泰伯，有《直讲先生集》。朱熹谓其文自大处起议论，如古《潜夫论》之类。刘壎《隐居通议》谓其所作《袁州学记》高出欧、苏，百世不朽。刘熙载《艺概》云：

泰伯之学，深于《周礼》，其所为文，率皆法度谨严。《宋史》本传但载其所上《明堂定制图序》，尚非其极也。东坡谓尝见泰伯自述其文曰："天将寿我与，所为固未足也，不然，斯亦足以藉手见古人矣。"观是言，其生平之力勤诣卓具见。

又有祖无择治古文，从穆修游，又尝受经于孙复，其为文峭厉劲拔，足与尹洙相上下。穆修遗集，即无择所编次者。穆修以明道元年客死淮西道中，遗文散失，其仅存者不能成卷，至无择始为之搜辑，厘订成编。苏舜钦《哀穆先生文》有序，略次其遗行，兹节录于后，亦可见是时穆、苏、石、尹诸人倡复古文之不易也：

先生字伯长，名修。幼嗜书，不事章句，必求道之本原，皆记士徒无意处，熟习评论之。性刚介，喜于背俗，不肯下与庸人小合，愿交者多固拒之。议事坚明，上下今古皆可录，然好诋卿弼，斥言时病，谨细后生畏闻之。又独为古文，其语深峭宏大，羞为礼部格诗赋。咸平中举进士，得出身。（中略）自废来，读书益勤，为文章益根柢于道。然耻从文干有位，以故困甚。张

文节守亳，亳之土豪者作佛庙，文节使以骑召先生作记。记成，竟不窜士名。士以白金五斤遗之，曰："枉先生之文，愿以此为寿。"又使周旋者曰："士所以以遗者，乞载于石，图不朽耳。"既而亟召士让之，投金庭下，遂俶装去。郡士谢之，终不受。尝语人曰："宁区区糊口为旅人，终不为匪人辱吾文也。"天圣末，丞相有欲置为学官者，耻诣谒之，竟不得。尝客京师南河邸中，往往醉，暮归，逷地如不省持者，夜半邸人犹闻其吟诵喟叹声，因隙窥之，则张灯危坐苦瞑执卷以至曙，用是贷其资。母丧，徒跣自负榇成葬，日诵《孝经》、《丧记》，未尝观佛书、饭浮屠氏也。识者怜哀之，或厚遗，则必为盗取去。不然，且病，或妻子卒。后得柳子厚文，刻货之，售者甚少。逾年积得百缗。一子辄死，将还淮西，道遇病，气结塞胸中不下，遂卒。嘻吁！天之厌文久矣，先生竟以黜废穷苦终其身，顾其道宜不容于今世，然由赋数踦只，常罹兵贼恶少辈所辱困，其节行至死不变。有孤懦且幼，遗文散坠不收，伯长之道，竟已矣乎？（下略）

第四节　欧阳修

欧阳修初亦为偶俪之文，后乃肆力复古。其《记旧本韩文后》云：

予少家汉东，于州南李尧辅家得旧本唐《昌黎先生集》，因乞李氏以归，读之，见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犹少，未能悉究其义，徒见浩然无涯若可爱。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未尝有道韩文者。予亦方举进士，以礼部诗赋为事。年十有七，试于州，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韩氏之文复阅之，则喟然叹曰："学者当至于是而止尔。"因怪时人之不道，而顾己亦未暇学，时时独念于予心。（中略）后七年举进士及第，官于洛阳而尹师鲁之徒皆在，遂相与

作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补缀之，求人家所有旧本而校定之。其后天下学者亦渐趋于古，而韩文遂行于世，至于今三十余年矣，学者非韩不学也。

修作苏舜钦集序，谓其学古文在先。盖舜钦实与穆修游，宜其先也。尹洙文辞简古，尤为欧阳修所折服。据邵伯温《闻见录》云：

> 本朝古文，柳开仲涂、穆修伯长首为之唱，尹洙师鲁兄弟继其后。欧阳文忠公早工偶俪之文，故试于国学、南省皆为天下第一。既擢甲科官河南，始得师鲁，乃出韩退之文学之，公之自叙云尔。盖公与师鲁于文虽不同，公为古文则居师鲁后也。(中略)公志师鲁墓，论其文曰"简而有法"，公曰："在孔子六经中，惟《春秋》可当。"则欧阳于师鲁不薄矣。崇宁间改修神宗正史欧阳公传乃云："同时有尹洙者，亦为古文。"然洙之才不足以望修云。盖史官皆晚学小生，不知前辈文字渊源自有次第也。

宋代文坛，修为巨擘，四六、诗词亦所兼擅，尤于古文居于承先启后之重要地位。苏轼为序《六一居士集》，推崇备至，已见首节。轼又谓"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陈善《扪虱新话》亦称欧文多拟韩作，略云："韩文重于今世，盖自欧公始倡之，公集中拟韩作多矣，予辄能言其相似处：公祭吴长文似祭薛中丞文，书梅圣俞诗稿似送孟东野序，吊石曼卿文似祭田横墓文。盖其步骤驰骋亦无不似，非但效其句语而已。孙樵尝言自'得为文真诀于来无择，无择得之皇甫持正，持正得之于韩吏部'。据其所言，似有来处。然樵之文实牵强僻涩，气象绝不类韩作而过自称许，嫫母捧心，信有之矣。吾尝谓韩氏之墙数仞，樵辈尚未能造其藩。敢言文乎？"刘熙载《艺概》云："欧公称昌黎文'深厚雄博'，苏老泉称欧公文'纡余委备'。大抵欧公虽极意学韩，而性之所近，乃尤在李习之。不独老泉于公谓李翱有执事之态，即公文亦云'欲生翱时，与翱上下其论'，所尚盖可见矣。"

又云："谢叠山云：'欧阳公文章为一代宗师。然藏锋敛锷，韬光沉馨，不如韩文公之奇奇怪怪，可喜可愕。'按欧之奇不如韩，固有之。然于韩之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讵相远乎？"

惟欧阳文亦有与韩文异趣之处，《艺概》谓："欧阳公《五代史》诸论，深得畏天悯人之旨。盖其事不足言而又不忍不言，言之怫于已，不言无以惩于世。情见乎辞，亦可悲矣。公他文亦多恻隐之意。"又云："欧阳公文几于史公之洁，而幽情雅韵，得骚人之指趣为多。"此则以取材之故，自成其悲悯之文派，不可与韩文强同也。

《朱子语类》称欧阳文亦好是修改到妙处。其《醉翁亭记》首句"环滁皆山也"五字，初稿说滁州四面有山，凡数十字，末后乃改定。《扪虱新话》亦称其为文不苟成，略云："世传欧阳公平昔为文章，每草就纸上净讫，即粘挂斋壁，卧兴看之，屡思屡改，至有终篇不留一字者，盖其精如此。大抵文以精故工，以工故传远。三折肱始为良医，百步穿杨始名善射。真可传者，皆不苟者也。唐人多以小诗著名，然率皆旬锻月炼，以故其人虽不甚显而诗皆可传，岂非以其精故耶？然人说杨大年每遇作文，则与门人宾客饮博、投壶、弈棋，语笑喧哗而不妨属思。以小方纸细书，挥翰如飞，文不加点，每盈一幅则命门人传录，须臾之际成数千言。如此似为难及，然欧公、大年要皆是大手，欧公岂不能与人斗捷哉？殆不欲苟作云耳。"

罗大经《鹤林玉露》云："江西自欧阳子以古文起于庐陵，遂为一代冠冕，后来者莫能与之抗。其次莫如曾子固、王介甫，皆出欧门，亦皆江西人。老苏所谓执事之文非孟子之文，而欧阳子之文也。朱文公谓江西文章如欧阳永叔、王介甫、曾子固，做得如此好，亦知其皓皓不可尚已。"按欧阳、曾、王及三苏父子，明代朱右、唐顺之、茅坤等以之追配唐之韩、柳，号为唐宋八大家者也。清初姚鼐编《古文辞类纂》，于唐宋文大抵亦以八家为限。故论宋代古文者，莫不知欧阳之后有曾、王、三苏。曾、王与欧阳皆江西人，三苏皆出欧阳门

下。故是时领袖文坛以承先启后，舍欧阳修其谁耶？

第五节　曾巩、王安石

曾巩生而警敏，读书数百言，脱口成诵。年十二，试作《六论》，援笔而成，辞甚伟。甫冠，名闻四方，欧阳修见其文奇之。巩弟肇尝称巩视欧阳文忠稍后出而与文忠齐名，《邵氏闻见后录》有说辩其不然，略云："欧阳公谓广文曾生者，在礼部奏名之前已为门下士矣，公示吴孝宗诗有云：'我始见曾子，文章初亦然。昆仑倾黄河，渺漫盈百川。疏决以道之，渐敛收横澜。东溟知所识，归路到不难。'是子固于文，遇欧阳公方知所归也。故子固祭欧阳公文，自云'戆直不敏，早蒙振拔。言由公诲，行由公率'也。"

清方苞云："南丰之文长于道古，故序古书尤佳，而《战国策》、《列女传》、《新序》诸目录序为最纯古洁净，所以与欧、王并驱而争先于苏氏也。"按王震《南丰集序》谓："先生自负似刘向，不知韩愈为何如尔。"又谓其"衍裕雅重，自成一家"。盖惟其能自成一家，故为善学刘向也。方苞所称诸序之佳者，良亦骎骎乎与刘向侔云。

至姚鼐论古文，判之以阴柔与阳刚两途，而谓："宋朝欧阳、曾公之文，其才皆偏于阴与柔之美者也。欧公能取异己者之长而时济之，曾公能避其所短而不犯。"盖曾文穷尽事理，其气味尔雅深厚，令人想见硕人之宽。王安石尝云："夫安驱徐行，辚中庸之廷而造乎其室，舍二贤人者而谁哉？"二贤，谓孙侔与曾巩也。然则巩之文，即肖巩之为人矣。

朱熹云："余年二十许时，便喜读南丰先生之文而窃慕效之，竟以才力浅短，不能遂其所愿。"又云："南丰文却通质，他初亦只是学为文，却因为文渐见些子道理，故文字依傍道理做不为空言。只是关键紧要处也说得宽缓不分明，缘他见处不彻，本无根本工夫，所以如此，但比之东坡则较质而近理。"又云："某未冠而读南丰先生

之文，爱其词严而理正，居常以为人之为言必当如此，乃为非苟作者。”其服膺曾氏如此，盖又不仅在文辞之末矣。

姚鼐所谓“曾公能避其所短而不犯”，避其偏于阴柔之短也，顾巩亦未能尽其所长以效于当世焉。据徐度《却扫编》云：“神宗患本朝国史之繁，尝欲重修五朝正史通为一书，命曾子固专领其事，且诏自择属官。曾以彭城陈师道应诏，朝廷以布衣难之，未几撰太祖皇帝总叙一篇以进，请系之《太祖本纪》篇末，以为国史书首。其说以为太祖大度豁如，知人善任使与汉高祖同，而汉祖所不及者其事有十，因具论之，累二千余言。神宗览之不悦，曰：‘为史但当实录以示后世，亦何必区区与先代帝王较优劣乎？且一篇之赞已如许之多，成书将复几何？’于是书竟不果成。”

《宋史·王安石传》称友生曾巩携其文示欧阳修，修为之延誉，擢进士上第。考其实殊不然。曾巩之称道王安石于欧阳修在庆历四、五年间，安石已先于二年登第矣。庆历六年，巩再与欧阳修书，略曰：“顷尝以王安石之文进左右，而以书论之，其略曰：‘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在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书既达而先生使河北，不复得报，然心未尝忘也。”至庆历七年，巩与安石书，始有“欧公悉见足下之文，爱叹诵写，不胜其勤”及“欧公甚欲一见足下，能作一来计否”等语，而是时安石尚未能与欧阳修一见也。

至嘉祐初，安石始与欧阳修相往还。修既论荐安石，而推重其“学问、文章知名当世，论议通明，兼有时才之用”，复赠安石以诗，而有“后来谁与子争先”、“常恨闻名不相识”之句。是安石之成进士，必非欧阳推挽之力也。欧阳尝规其不必学孟、韩文（见曾巩致安石书内）。而安石酬诗则曰：“欲传道义心虽壮，强学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抠衣最出诸生后，倒屣常倾广座

中。只恐虚名因此得，嘉篇厚贶岂宜蒙？"观此一诗，则安石出于欧阳修门下之由来，可见其梗概矣。

曾巩尝称安石文学不减扬雄，而安石咏扬雄亦云："千古雄文造圣真，眇然幽思入无伦。"慕其文者如此其深，则必效之惟恐不及矣。安石极推韩愈之为文，尤有得于韩之"陈言务去"，然又讥其"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盖病其不识道而无补于世也。今录《论文书》一首，以见其对于文学之见解：

> 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其书诸策而传之人，大体归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云者，徒谓辞之不可以已也，非圣人作文之本意也。自孔子之死久，韩子作，望圣人于百千年中，卓然也。独子厚名与韩并，子厚非韩比也，然其文卒配韩以传，亦豪杰可畏者也。韩子尝语人以文矣，曰云云，子厚亦曰云云。疑二子者，徒语人以其辞耳，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孟子之云尔，非直施于文而已，然亦可托以为作文之本意。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某学文，数挟此说以自治。始欲书之策而传之人，其试于事者则有待矣。其为是非邪，未能自定也。执事，正人也，不阿其所好者。书杂文十篇献左右，愿赐之教，使之是非有定焉。

安石又有《答孙长倩书》云："古之道废踣久矣。大贤间起废踣之中，率常位庳泽狭，万不救一二，天下日更薄恶，宦学者不谋道，主利禄而已。尝记一人焉，甚贵且有名，自言少时迷，喜学古文，后乃大寤，弃不学，学治今时文章。夫古文何伤？直与世少合耳，尚不

肯学，而谓学者迷。若行古之道于今世，则往往困矣，其又肯行邪?”此其抗心希古，迥出流俗之表，为何如耶?

谢枋得称安石之文曰:“笔力简而健。”魏禧云:“介甫文如断崖千尺，又如高士溪刻，不近人情。”吕璜云:“古来博洽而不为积学所累者，莫如王介甫。渠作文直不屑用前人一字，此其所以高。”刘熙载云:“荆公文是能以品格胜者，看其人取我弃，自处地位尽高。”又曰:“半山文瘦硬通神，善用揭过法。只下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是何简贵。”观此诸说，可以知安石之文当有不同于欧、曾、三苏者矣。

是时致位通显而嗜学擅文者有苏颂、王珪，别以史学名者有司马光。苏颂、王珪与欧、曾、王、苏相先后，擅名当时而黯于后世，岂以其不能抗心希古之故欤?司马光尝以不擅四六文谢知制诰，仁宗许其用古文体。王安石称其文类西汉，良为定评，光大儒名臣，不以词章为重，其文气象雍容，亦足以自成一家云。

曾、王同时又有二刘者(刘敞、刘攽兄弟)，同登庆历年进士，于欧阳修亦为门下士。敞之文湛深经术，具有本原，朱熹称其“气平文缓，乃自经书中来。比之苏公，有高古之趣”。攽与兄齐名，司马光修《资治通鉴》，自辟所属，极天下之选，而任《史记》与前后《汉书》者，攽也。朱熹尝称其:“文字工于摹仿，学《公羊》、《仪礼》亦复称之。”欧阳修为刘敞作墓志，称其:“立马却坐，一挥九制，文辞典雅，各得其体。”刘攽亦以文辞敏赡称于时云。

第六节　三苏及苏门文士

苏洵僻处眉山，所谓岩穴之士也。少不喜学，年二十七始发愤读书。举进士又举茂才，皆不中。乃大究六经、百家书说，不复事场屋文字。嘉祐初，携二子至京师，谒翰林学士欧阳修，上《权书》、《衡论》二十二篇。欧阳修深用叹赏，以为贾谊、刘向不能过也，三苏由

是知名，轼、辙皆出欧阳门下成进士。洵上欧阳书略云：

(上略)执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窃自以为洵之知之特深，愈于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自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执事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此三者，皆断然自为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长，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让，有执事之态；陆贽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当，有执事之实，而执事之才又自有过人者。盖执事之文，非孟子、韩子之文而欧阳子之文也。夫乐道人之善而不为谄者，以其人诚足以当之也，彼不知者则以为誉人以求其悦己也。夫誉人以求其悦己，洵亦不为也，而其所以道执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执事之知其知我也。虽然，执事之名满于天下，虽不见其文而固已知有欧阳子矣。而洵不幸堕在草野泥涂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欲徒手奉咫尺之书自托于执事，将使执事何从而知之，何从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学，生二十五年始知读书，从士君子游，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厉行以古人自期，而视与己同列者，皆不胜己，则遂以为可矣。其后困益甚，然每取古人之文而读之，始觉其出言用意与己大别，时复内顾，自思其才，则又似夫不遂止于是而已者。由是尽烧曩时所为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观于其外而骇然以惊。及其久也，读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当然者，然犹未敢自出其言也。时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试出而书之，已而再三读之，浑浑乎觉其来之易矣，然犹未

敢以为是也。近所为《洪范论》、《史论》凡七篇，执事观其如何？嘻！区区而自言，不知者又将以为自誉以求人之知己也。惟执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宋史》称王安石见苏洵之文，诋之曰："此战国纵横之学也。"稗官遂衍为老苏亦鄙视安石之说。曾巩称老苏之文，则曰："修能使之约，远能使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烦能不乱，肆能不流。""能"之一字，足明老泉之得力，正不必与他人较量长短也。刘熙载《艺概》云："苏老泉迂董诈晁，谓贾生有二子之才而不流。余谓老泉文取径异于董，而用意往往杂以晁。迂董于董无损，诈晁恐晁不服也。"

陈善《扪虱新话》云："欧阳公不得不收东坡，可谓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者，其实掩抑渠不得也。"何薳《春渚纪闻》述苏轼之言曰："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诚亦自知明矣。然轼于欧阳修执弟子礼甚恭，其上欧阳修书云：

窃以天下之事，难于改为。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圣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诏天下，晓谕厥旨，于是招来雄俊魁伟、敦厚朴直之士，罢去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将以追两汉之余而渐复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余风未殄，新弊复作。大者镂之金石以传久远，小者转相模写号称古文，纷纷肆行，莫之或禁。盖唐之古文自韩愈始，其后学韩而不至者为皇甫湜，学皇甫湜而不至者为孙樵，自樵以降，无足观矣。伏惟内翰执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遗文，天下之所恃以觉悟学者，恭承王命，亲执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诏。轼也远方之鄙人，家居碌碌，无所称道。及来京师，久不知名，将治行西归，不意执事擢为第二，惟

其素所蓄积无以慰士大夫之心，是以群嘲而聚骂者，动满千百。亦惟恃有执事之知与众君子之议论，故恬然不以动其心，犹幸御试不为有司之所排，使得搢笏跪起谢恩于门下。闻之古人，士无贤愚，惟其所遇，盖乐毅去燕不复一战，而范蠡去越亦终不能有所为。轼愿长在下风与宾客之末，使其区区之心，长有所发，夫岂惟轼之幸，亦执事将有取一二焉。不宣。

刘熙载《艺概》之评大苏也，尝曰："东坡文只是拈来法。此由悟性绝人，故处处触着耳，至其理有过于通而难守者，固不及备论。"又曰："东坡文虽打通墙壁说话，然立脚自在稳处。譬如舟行大海之中，把柁未尝不定，视放言而不中权者异矣。"又曰："坡文多微妙语，其论文曰快、曰达、曰了，正为非此不足以发微阐妙也。"又曰："'远想出宏域，高步超常伦'，文家具此能事，则遇困皆通，且不妨故设困境以显通之之妙用也，大苏文有之。"又曰："东坡文亦孟子，亦贾长沙；陆敬舆亦庄子，亦秦、仪。心目窒隘者，可资其博达以自广，而不必概以纯诣律之。"此皆抽象之论也。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尝论其渊源所自焉，原文云：

《庄子》之文以无为有，《战国策》之文以曲作直。东坡平生熟此二书，故其为文，横说竖说，惟意所到，俊辨痛快，无复滞碍。其论刑赏也，曰："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其论武王也，曰："使当时有良史如董狐者，则南巢之事，必以叛书，牧野之事，必以弑书。而汤、武仁人也，必将为法受恶。周公作《无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上不及汤，下不及武王。'其以是哉？"其论范增也，曰："增始劝项梁立义帝，诸侯以此服从。中道而弑之，非增意也。夫岂独非其意，将必力争而不听也。不用其言而杀其所立，羽之疑增，自此始矣。"其论战国任侠也，曰："楚汉之祸，生民

尽矣，豪杰宜无几，而代相陈豨从车千乘，萧、曹为政，莫之禁也。岂惩秦之祸，以为爵禄不能尽縻天下之士，故少宽之，使得或出于此也耶？"凡此类，皆以无为有者也。其论励法禁也，曰："商鞅、韩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则舜之术也。"其论唐太宗征辽也，曰："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岁岁出师，以从事于夷狄，盖晚而不倦，暴露于千里之外，亲击高丽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争先而处强也。"其论从众也，曰："宋襄公虽行仁义，失众而亡；田常虽不义，得众而强。是以君子未论行事之是非，先观众心之向背。谢安之用诸桓未必是，而众之所乐，则国以义安；庾亮之召苏峻未必非，而势有不可，则反成危辱。"凡此类，皆以曲作直者也。叶水心云："苏文架虚行危，纵横倏忽，数百千言，读者皆如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自来，古今议论之杰也。"

刘熙载亦云："东坡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后人读东坡文，亦当有是语。盖其过人处在能说得出，不但见得到已也。"是则苏轼议论之文，渊源于《庄子》者为多矣。

苏辙与兄轼同出欧阳修门下，其称颂欧阳氏，亦以比附韩愈，所为《欧阳公神道碑》有云：

> 自魏晋以来历南北朝，文弊极矣，虽唐贞观、开元之盛，卒不能振。惟韩退之一变复古，阏其颓波东注之海，遂复西汉之旧。其后五代相承，天下不知所以为文，及公之文出，乃复无愧于古。呜呼！千数百年文章废而复兴，惟得二人焉，夫岂偶然哉？

辙又尝称欧阳修文雍容俯仰，不大声色，而义理自胜。苏轼《答张文潜书》则谓："（子由文）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此盖有得于欧阳者也。辙又谓："子瞻之文奇，吾文

但稳耳。”然则大苏、小苏之文，可以“奇”、“稳”两字判之。小苏才气不及父兄，然其文高处殆与兄相迫。至于以名节立朝，谔谔谠言，罔识忌讳，亦不逊于兄。惟其人深沉恬淡，较能匿景韬光，故其文亦不似轼之奔放横溢，以法度严整见长。议论之文得于家学，亦具有洵之一体云。

三苏中轼尤名满天下，四方文士多归附之。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所谓“苏门四学士”也。益以陈师道、李廌，又即所谓“六君子”也。黄、陈以诗名，秦以词著，晁、张文名藉甚于当时，李独稍逊。六人者，浸润于苏门，其散体文亦振拔而不流于卑靡，要皆不失为北宋巨手。庭坚之文专学西汉，峻峭如其诗。师道虽不擅文名，然简严密栗，方之唐人，不在李翱、孙樵下。秦观文丽而思深，盖词人之文也。张耒之文，苏轼亦尝以“汪洋冲淡，有一唱三叹之音”称之。黄庭坚有诗，称其“笔端可以回万牛”，而称晁补之则曰“晁子智囊可以括四海”，又称其文章有汉、唐间风味，可以名世。苏轼亦称补之博辩俊伟，于文无所不能。盖补之自少为文，即欲追步屈、宋、班、扬，下逮韩愈、柳宗元之作，促驾力鞭，务与之齐而后已。李廌以文见知于轼，其才气横溢，文章条畅曲折，辩而中理，善论古今治乱，颇与轼相近，驰骤于秦、张之间，未必遽落后尘也。《宋史·文苑传》载张耒尝著论云：

> 自六经以下，至于诸子百氏、骚人辩士论述，大抵皆将以为寓理之具也。故学文之端，急于明理，如知文而不务理，求文之工，世未尝有也。夫决水于江、河、淮、海也，顺道而行，滔滔汩汩，日夜不止，冲砥柱，绝吕梁，放于江湖而纳之海。其舒为沦涟，鼓为波涛，激之为风飙，怒之为雷霆，蛟龙鱼鳖喷薄出没，是水之奇变也。水之初岂若是哉？顺道而决之，因其所遇而变生焉。沟渎东决而西竭，下满而上虚，日夜激之，欲见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达之文也，

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沟渎而求水之奇，此无见于理，而欲以言语句读为奇，反复咀嚼，卒亦无有，文之陋也。

第七节　道学派与功利派

宋代古文家，后世所奉为正宗者，厥惟欧阳、曾、王、三苏。余如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以迄于朱熹、吕祖谦等，皆于哲学史上占有地位，其文亦一洗浮靡之习，是为道学派之文。其南渡以后薛季宣、陈傅良、叶适、陈亮等，致力典章经济，其文亦异于流俗，是为功利派之文。

道学派托始于周敦颐，与敦颐同时者曰邵雍、曰张载。二程兄弟皆出于周敦颐之门，后有杨时、谢良佐、游酢、吕大临，号"程门四先生"，而杨时名最高，朱熹、张栻皆尝从之游。熹同时有吕祖谦、陆九渊，皆一时大师，而朱与陆颇持异同之论，分二派云。所谓道学派者，其渊源大抵如此。

周敦颐主"文以载道"之说，其论文也尝谓："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程氏复衍为"作文害道"之论，至比之玩物丧志，尝称："吕大临之诗曰：'学如元凯方成癖，文到相如始类俳。独立孔门无一事，只输颜氏得心斋。'盖文学专务章句、悦人耳目者，有之无所补，无之靡所阙，乃无用之赘言。若夫'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岂词章之文也？"下逮朱熹，更有详尽之论焉。《朱子语类》有一节云：

> 欧阳子云："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论也。然彼知政事、礼乐之不可不出于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于二也。夫古之圣贤，其文可谓盛矣，然初岂有意学为如是之文哉？有是实于中则必有是文于外，如天有是气则必有日月星辰之光曜，地有是形则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圣贤之心，既有是

精明纯粹之实，以旁薄充塞乎其内，则其著见于外者，亦必自然条理分明，光辉发越而不可掩盖，不必托于言语、著于简册而后谓之文。但是一身接于万事，凡其语默动静，人所可得而见者，无所适而非文也。姑举其最而言，则《易》之卦画、《诗》之歌咏、《书》之记言、《春秋》之述事，与夫礼之威仪、乐之节奏，皆已列为六经而垂万世，其文之盛，后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岂无所自来，而世亦莫之识也。故夫子言之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盖虽已决知不得辞其责矣，然犹若逡巡顾望而不能无所疑也。至于推其所以兴衰，则又以为是皆出于天命之所为，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体之甚重，夫岂世俗所谓"文"者所能当哉？孟轲氏没，圣学失传。天下之事，背本趋末，不求知道养德以充其内，而汲汲乎徒以文章为事业。然在战国之时，若申、商、孙、吴之术、苏、张、范、蔡之辩，列御寇、庄周、荀况之言，屈平之赋，以至秦汉之间韩非、李斯、陆生、贾傅、董相、史迁、刘向、班固，下至严安、徐乐之流，犹皆先有其实而后托之于言，唯其无本而不能一出于道，是以君子犹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扬雄之徒，则一以浮华为尚而无实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盖亦《长扬》、《羽猎》之流而粗变其音节，初非实为明道讲学而作也。东京以降，迄于隋唐，数百年间愈下愈衰，则其去道益远，而无实之文亦无足论。韩愈氏出，始觉其陋，慨然号于一世，欲去陈言以追《诗》、《书》六艺之作，而其敝精神、縻岁月，又有甚于前世诸人之所为者。然犹幸其略知不根无实之不足恃，因其颇溯其源而适有会焉。于是《原道》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煜，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于道而能文者"，则亦庶几其贤矣。然今读其书，则其出于谄谀戏豫放浪而无实者，自不为少。若夫所原之道，则亦徒能言其大体，而

未见其有探讨服行之效。使其言之为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议论古人,则又直以屈原、孟轲、马迁、相如、扬雄为一等,而犹不及于董、贾。其论当世之弊,则但以辞不己出而遂有神徂圣伏之叹。至于其徒之论,亦但剽掠潜窃为文之病,大振颓风,教人自为,为韩之功。则其师生之间传授之际,盖未免裂道与文以为两物,而于其轻重缓急、本末宾主之分,又未免于倒悬而逆置之也。自是以来,又复衰歇数十百年,而后欧阳子出,其文之妙,盖已不愧于韩氏,而其曰"治出于一"云者,则自荀、扬以下皆不能及,而韩亦未有闻焉。是则疑若几于道矣,然考其终身之言与其行事之实,则恐其亦未免于韩氏之病也。抑又尝以其徒之说考之,则诵其言者,既曰"吾老将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谓文必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韩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兹"者以张其说。由前之说,则道之与文,吾不知其果为一耶为二耶;由后之说,则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与欧、韩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呜呼!学之不讲久矣,习俗之谬,其可胜言也哉?吾读《唐书》而有感,因书其说以订之,因言文士之失曰:"今晓得义理底人少,间被物欲激搏,犹自一强一弱、一胜一负。如文章之士,下梢头都靠不得。"且如欧阳公,初间做本论,其说已自大段拙了,然犹是一片好文章有头尾。他不过欲封建井田与冠昏丧祭蒐田燕飨之礼,使民朝夕从事于此。少间无工夫被佛氏引去,自然可变,其计可谓拙矣,然犹是正当议论也。到得晚年,自做《六一居士传》,宜其所得如何,却只说有书一千卷、《集古录》一千卷、琴一张、酒一壶、棋一局,与一老人为六,更不成说话,分明是自纳败阙。如东坡一生读尽天下书,说无限道理。到得晚年过海,做昌化峻灵王庙碑,引唐肃宗时一尼恍惚升天,见上帝以宝玉十三枚赐之,云中国有大灾,以此镇之。今此山如此,意其必有

宝。更不成议论，似丧心人说话。其他人无知如此说尚不妨，你平日自视为如何？说尽道理却说出这般话，是可怪否？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分明是如此了，便看他们这般文字不入。

道学派以经术道德自任，本不屑屑于词章之末。然当时言古文者必曰返雕为朴，折衷于经术，因文以见道，彼道学派既拳拳于"文以载道"，则亦甚有协于文体复古之趣。故周、邵、张、程、朱、陆诸人之文，其说理精粹，有从容闲暇之象，以平实坦易为主，以言返朴还淳，或又非普通文士所能几及。如邵雍之《太极图说》、周敦颐之《通书》、张载之《西铭》、二程所为墓志之文，皆不可谓非散体文之工焉者也。

至于朱熹尝谓"人之才德偏有长短，其或意中了了而言不足以发之，则亦不能传于远矣，故孔子曰：'辞达而已矣。'"是亦未尝不致意于修辞之末矣。黄震《日抄》云："朱子为文，其天才卓绝，学力宏肆，落笔成章殆于天造。其剖析性理之精微，则日精月明；其穷诘邪说之隐遁，则神搜霆击；其感慨忠义、发明《离骚》，则苦雨凄风之变态；其泛应人事、游戏翰墨，则行云流水之自然。"刘熙载亦称："朱子之文，表里莹彻。故平平说出，而转觉矜奇者之为庸；明明说出，而转觉恃奥者之为浅。其立定主意，步步回顾，方远而近，似断而连，特其余事。"

吕祖谦之文，朱熹尝病其太杂。然祖谦词多根柢，不涉游谈，故豪迈骏发而无嫌于古。陆九渊、张栻等皆以道学文章与朱、吕相上下，不失为南宋作者。刘熙载尝谓："陆文得孟子之实，不容意为去取，亦未易评。"良亦实大声宏者欤！宋末周密《癸辛杂识》云：

南渡以来，太学文体之变，乾、淳之文师淳厚，时谓之"乾淳体"。至端平江万里习《易》自成一家，文体几于中复。淳祐甲辰，徐霖以《书》学魁南省，全尚性理，时竞趋之，即可以钓致

科第功名，自此非四书、东西铭、太极图、通书、语录不复道矣。至咸淳之末，江东李谨思、熊瑞诸人倡为变体，奇诡浮艳，精神焕发，多用《庄》、《列》之语，时人谓之“换字文章”，对策中有“光景不露”、“大雅不浇”等语，以至于亡，可谓文妖矣。

按此可见道学派之影响于科场，其穷而渐变，亦风气使然。密遽谓之“文妖”，而又于他书诋詈道学派诸儒，至欲伸文词以抑道学，何也？

功利派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皆永嘉人，陈亮永康人，故又号“永嘉学派”。先是，永嘉人周行己早从伊川程颐游，传其绪论，为文学东坡而明白淳实，粹然为儒者之言。其后薛季宣尝师事伊川之门人袁溉，晚复与朱熹、吕祖谦等往还，多所商榷，然朱子喜谈心性而季宣则兼重事功。陈傅良初师事季宣，及入太学，与吕祖谦、张栻相友善，而其为学，以通知成败、谙练掌故为长，盖得于季宣者为多。其所为文，多切于实用，而密栗坚峭，自然高雅。叶适亦祖述季宣，而文章雄赡，才气奔逸，其碑版之作简质厚重，尤可追配作者。陈傅良、叶适及陈亮又皆从学于郑伯熊，伯熊亦永嘉人，私淑周行己之学而光大之者也。

叶适较陈傅良稍晚出而享名最盛，学者号为“水心先生”。《宋元学案》谓：“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水心龂龂其间，遂称鼎足。然水心工文，故弟子多于辞章。”按叶适于文章之概念，亦有暗合于道学派之处，如云：“立言非专为文。言之支流派别散而为文则言已亡，言亡而大义息矣。欧阳公乃通以后世文字为言，而以立言为不如有德之默，不知文之不可以为言也。”又云：“文者，言之衍也。古人约义理以言，言所未究，稍曲而伸之尔。其后俗益下、用益浅，小为科举，大为典册，虽刻秾损华，往往在义理之外，力且尽而言不立。”《宋元学案》又谓：“永嘉功利之说，至水心始一洗之。”其在斯乎？

陈亮故与朱熹友善，亦尝与吕祖谦讲论，而其为学则以读书经济为事，嗤黜空疏随人牙后谈性命者，以为灰埃，故持论与朱、吕相左。朱熹尝诋之曰："同甫在利欲胶漆盆中。"又曰："才高气粗，故文字不明莹。"然其议论之文，才辩纵横，不可控勒，似天下无足当其意者。生平喜学欧文，尝选《欧阳文粹》，其序极与欧文相类，然他文却不尽似之。亮尝上孝宗皇帝书，贬驳道学，至谓"今世之儒士，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痺不知痛痒之人"。而其自跋《中兴论》，复言一日读《杨龟山语录》，谓"人住得然后可以有为。才智之士非有学力，却住不得"，不觉恍然自失。可见同甫之所驳者乃无实之人，非龟山一流也。刘熙载评其文曰："箴砭时弊，指画形势，自非绌于用者之比，如四上孝宗皇帝书及《中兴五论》之类是也。特其意思挥霍，气象张大，若使身任其事，恐不能耐烦持久。试观赵营平、诸葛武侯之论事，何尝挥霍张大如此！"

按：南渡以后，道学、功利两派诸人文体，大抵沿袭欧阳修及曾、王、三苏，各得其一节之似。朱熹瓣香曾巩，陈傅良初学欧阳、后学张耒，此其昭然者。吕祖谦之辩博凌厉，叶适之纵论政治，陈亮之不可控勒，皆有苏氏父子之风。即其功利之谈，亦未始不暗合于王安石"文者务为有补于世"之说也。

叶适门人以文章著者，曰陈耆卿。适序其所作，以为学游、杨而文张、晁也。然观车若水《脚气集》载当时王象祖之言，可略知其递嬗，盖不能无末流不振之感也。《脚气集》云：

> 大甲王老先生讳象祖，字德甫，尝以文见水心，水心所谓"尘垢拭杯案"者也。其文简古老健，篔窗亦畏之，第方褊不似篔窗圆活，然非有意不为文，非有味不为句，尤未易及，但所见自僻。（中略）予弱冠时尝投其书，答书有云："文字之趋日靡矣。皇朝文统，大而欧、苏、曾、王，次而黄、陈、秦、晁、张，皆卓然名家，辉映千古。中兴以来，名公巨儒不自名家，张、吕、朱氏

造儒术而非文艺，独水心擅作者之权，一时门人，孰为升堂孰为入室，晚得陈懵窗而授之柄。今懵窗之门亦夥矣，求其可授者，未有也。人才之续绝，天运之盈亏也；斯文之隆替，国家之治忽也。前者敻出，后者藐然，则识者惧矣。乡邦之彦，嘲风露而写光影，借比、兴而盗《离骚》，句吟字炼，岂无一得？而与之读《檀弓》、谈《左传》、评《国语》及太史公、贾谊、扬雄、韩、柳、欧、苏之作，求其一言之几于道，莫得也。议论甚不是，文章自好，什么文柄，未有可授者也。"

筼窗者，陈耆卿也。车若水尝师事之。后若水崇尚理学，遂倾向于道学派云。

此外，诗人范成大、杨万里、陆游等，其文皆为诗名所掩。范成大仅有诗集传世。万里之文，往往杂以诗句，散体文尤非所擅。陆游乃王安石门人陆佃之孙，世承文献，其为文遣词命意，尚有北宋典型，《四库总目提要》称其"根抵不必其深厚，而修洁有余；波澜不必其壮阔，而尺寸不失。（中略）较南渡末流以鄙俚为真切，以庸沓为详尽者，有云泥之别矣。"是游之文，又未始不可在南渡后道学、功利两派之外独标一帜者也。

第八节　晚宋之文风

今所传吕祖谦《古文关键》二卷，取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苏轼、张耒之文凡六十余篇，各标举其命意布局之处，示学者以门径，卷首冠以总论看文、作文之法。择古人之文章而批点之，当以此篇为始。朱熹尝以拘于腔子议之，要之不为无益，亦治学之一端耳。

祖谦之门人楼昉撰《崇古文诀》，大约如《古文关键》，所录上溯《史》、《汉》，迄于宋朝，篇目增多，发明尤精，《四库总目提要》称其"繁简得中，尤有裨学者"。盖因其师说推阐加密，正未可以文皆习

见而忽之矣。

真德秀，道学之儒也。尝编《文章正宗》，分辞令、议论、叙事、诗歌四类，录《左传》、《国语》以下至于唐末之作，盖亦循吕氏《关键》之例而稍变其意者。然其持论甚严，大意主于论理而不论文，清顾炎武《日知录》尝病其执理太过。故书虽卓然自成一说，而四五百年来，自讲学家以外，未有尊而用之者。《四库总目提要》则曰："专执其法以论文，固矫枉过直；兼存其理以救浮华冶荡之弊，则亦未尝无裨。"欲知宋代散体文之流变者，固亦未可废也。

晚宋文体，卑靡益甚，独文天祥、谢枋得尚有可得而称者。天祥平生大节照耀今古，其文章亦极雄赡，如长江大河，浩瀚无际。枋得之名，彪炳于史册，其文章亦博大昌明，具有法度，不愧有本之言。枋得尝编《文章轨范》七卷，录汉、晋、唐、宋之文凡六十九篇，亦略如吕氏《关键》之例。而韩愈之文居三十一，柳宗元、欧阳修之文各五，苏洵之文四，苏轼之文十二，其余诸葛亮、陶潜、杜牧、范仲淹、王安石、李觏、李格非、辛弃疾各一。前二卷题曰"放胆文"，后五卷曰"小心文"，各有批注圈点。明王守仁叙刻此书，称其为当时举业而作，然凡所标举，动中窾要。古文之法，沿至赵宋末造，则可于斯编见之矣。

按《四库全书》集部总集类著录《论学绳尺》十卷，宋魏天应编。其书虽为谈古文者所不乐道，而当时场屋应试文字之程式，亦可因以考见。《四库总目提要》云：

> 是编辑当时场屋应试之论，冠以《论诀》一卷。所录之文分为十卷，凡甲集十二首，乙集至癸集俱十六首。每两首立为一格，共七十八格。每题先标出处，次举立说大意，而缀以评语。又略以典故分注本文之下。（中略）考宋礼部贡举条式，元祐法以三场试士，第二场用论一首。绍兴九年定以四场试士，第三场用论一首，限五百字以上成，经义、诗赋二科并同。（中略）是

> 当时每试必有一论，较诸他文应用之处为多，故有专辑一编，以备揣摩之具者。天应此集，其偶传者也。其始尚不拘成格，如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自出机杼，未尝屑屑于头项心腹腰尾之式。南渡以后，讲求渐密，程式渐严，试官执定格以待人，人亦循其定格以求合，于是双关三扇之说兴，而场屋之作遂别有轨度。虽有纵横奇伟之才亦不得而越。此编以"绳尺"为名，其以是欤?(中略)当日省试中选之文多见于此，存之可以考一朝之制度，且其破题、接题、小讲、大讲、入题、原题诸式，实后来八比之滥觞，亦足以见制举之文，源流所自出焉。

制举之文本不足论，然在昔科举时代，无论文豪词伯，苟有志功名，莫不由此进身，即莫不于此致力，就其形式而言，自不失为散体文之附庸。爰附于此，其渊源所自亦可概见矣。

第三章　宋之四六文

第一节　宋四六文之源流

四六之名，何自昉乎？清孙梅《四六丛话》凡例云：

古文有韵谓之文，无韵谓之笔。梁时沈诗任笔，刘氏三笔六诗是也。骈俪肇自魏晋，厥后有齐梁体、宫体、徐庾体，工绮递增，犹未以"四六"名也。唐重文选学，宋目为词学，而章奏之学则令狐楚以授义山，别为专门。今改樊南甲乙，始以"四六"名集，而柳州《乞巧文》云"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又在其前。《词学指南》云："制用四六，以便宣读。"大约始于制诰，沿及表启也。

此言四六文体制之演化，溯远源于魏晋，而与诗赋则同源而异派。其形式上显然之异点，则诗赋有韵，四六文无韵是也。宋王铚撰《四六话》，亦有溯源之说，以为四六皆诗赋之苗裔，且随诗赋为盛衰焉。其说略云：

唐天宝十二载，始诏举人策问外试诗、赋各一首，自此八韵律赋始盛，其后作者，如陆宣公、裴晋公、吕温、李程，犹未能极工。逮至晚唐，薛逢、宋言及吴融出于场屋，然后曲尽其妙，然但山川草木、雪风花月，或以古之故实为景题赋，于人物情态为无余地，若夫礼乐刑政、典章文物之体，略未备也。国朝名辈，犹杂五代衰陋之气，似未能革。至二宋兄弟，始以雄才奥学，一变山川草木、人情物态，归于礼乐刑政、典章文物，发为朝廷气象，其规模闳达深远矣。继以滕、郑、吴处厚、刘辉，工致纤悉备具，发露天地之藏，造化殆无余巧，其檃括声律，至此可谓诗赋之集大成者。亦由仁宗之世太平闲暇，天下安静之久，

故文章与时高下。盖自唐天宝远迄于天圣，盛于景祐、皇祐，溢于嘉祐、治平之间，师友渊源，讲贯磨砻，口传心授，至是始克大成就者，盖四百年于斯矣。岂易得哉，岂一人一日之力哉？（中略）世所谓笺题、表启号为四六者，皆诗赋之苗裔也。故诗赋盛则刀笔盛，而其衰也亦然。

按王铚，宋徽宗时人，自序又谓："先君子少游学四方，学文于欧阳文忠公而授经于王荆公、王深父、常夷甫。既仕，从滕元发、郑毅夫论作赋与四六，其学皆极先民之渊蕴。铚每侍教诲，常语以为文为诗赋之法。"其论四六文之由来，有如上述之说者，殆亦有得于当时师友之讨论。然斯时号为四六者，不过笺题、表启应用之文而已。其所谓"与时高下"者，易辞言之，即国家政令足以左右之耳。其立说似囿于场屋，亦足以传示北宋一部分学士大夫对于四六文之见解。若其远溯渊源，不过极于唐之天宝，则其为说也，方之孙梅，犹逊其赅矣。

按王应麟《词学指南》序云：

博学宏词，唐制也。吏部选未满者试文三篇（赋、诗、论），中者即授官。韩退之谓所试文章亦礼部之类，然名相如裴、陆，文人如刘、柳，皆由此选。（中略）皇朝绍圣初元，取士纯用经术，五月，中书言唐有词藻宏丽、文章秀异之科，皆以众之所难劝率学者，于是始立宏词科。二年正月，礼部立试格十条（章、表、赋、颂、箴、铭、诫谕、露布、檄书、序记），除诏诰、赦敕不试，又再立试格九条，曰章、表、露布、檄书（以上依四六）颂、箴、铭、诫谕、序记（以上依古今体，亦许用四六），四题分两场，岁一试之。大观四年五月，以立法未详，改为词学兼茂科。除去檄书，增入制诏，仍以四题为两场，内二篇以历代故事借拟为题，余以本朝故事或时事，盖质之古以觇记览之博，参之今以观翰墨之华。宣和五年七月，职方员外郎陈磷奏，岁试不无幸

中，乃有省闱附试之诏，由是三岁一试。绍兴三年，工部侍郎李擢请别立一科，七月，诏以博学宏词为名，凡十二体，曰制诰、诏、书、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古今杂出六题，分为三场，每场一古一今，三岁一试如旧制。（中略）盖是科之设，绍圣颛取华藻，大观俶尚淹该，爰暨中兴，程式始备。科目虽袭唐旧，而所试文则异矣。朱文公谓是科习谄谀夸大之词，竞骈俪刻雕之巧，当稍更文体，以深厚简严为主，然则学者必涵泳六经之文以培其本云。

此序历述科举制度与四六文之关系，即王铚所谓“与时高下”也。大抵北宋初叶，科举制度多沿唐旧，故迄至真宗朝以前，乃四六之因袭时期也。仁宗以后，欧阳修倡改科举制度，至神宗相王安石，尽革旧规，罢诗赋，崇经术，而四六文遂随与俱变，是为四六文之改革时期。洎乎绍圣立宏词科，沿及南渡，以迄丧邦，其间四六作家辈出，可谓风靡一时，譬之春花竞放，殆已精华尽泄矣，虽朱熹、真德秀辈欲以经术挽其颓波，曾无补也。

第二节　宋四六文之应用与修辞

宋四六文大都用于诏制、表启者为繁，绳以清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文体分类法，皆属于告语门。诏制者，上告下者也；表者，下告上者也；启者，同辈相告者也。此外如上梁文、乐语，则词赋之变相，属于著作门者也。清曹振镛云：

宋诏多古体，制则今古体参半，惟表启最繁、家有数卷，上梁文、乐语，作者每工。（中略）至于赋乃有韵之文。诰檄、国书、露布，词科间有拟作；青词、表本、疏牓，于义无取；记传、碑序，传盖鲜矣。

按曹振镛编次、彭元瑞所纂《宋四六选》，仅限于诏、制、表、启、上梁文、乐语六体，余皆不录。盖宋代散行文亦复盛极一时，四六文

之应用惟此六体为偏盛，较之魏晋、六朝、初唐一切文字皆取骈俪，则有间矣。然当时士大夫亦颇以此相尚，盖亦入仕途者所不可忽也。宋谢伋《四六谈麈》自序云：

> 三代、两汉以前，训诰、誓命、诏策、书疏，无骈俪粘缀，温润尔雅。先唐以还，四六始盛，大约取便于宣读。本朝自欧阳文忠、王舒国，叙事之外作为文章，制作浑成，一洗西昆磔裂烦碎之体。厥后学之者益以众多，况朝廷以此取士，名为博学宏词，而内外两制用之，四六之艺诚日大矣。下至往来笺记启状皆有定式，故谓之应用，四方一律，可不习而知。

故自今日观之，宋之四六文不过占宋文学之一部分，而在当时，则官私文书之讲求典赡工致者必从事于此，不仅取便于宣读已也。宋英宗时，司马光擢翰林学士，以不能为四六谢不拜命，强之乃受。按司马光学殖淹博，文辞最为典雅，其文集内表启之类亦间有四六之作，岂不能为四六者？盖亦思所以矫当世之失，冀渐返于淳朴耳。惟当世俗尚所趋，于此正可概见，光虽思有以矫之而终未能也。

宋代学者谈四六文之修辞者颇不乏人，南渡以后尤夥，择录如下：

> 吕祖谦云："凡作四六，须声律协和，若语工而不妥，不若少工而浏亮。上句有好语而下句偏枯，绝不相类，不如两句俱用常语。"

> 叶梦得云："前辈作四六，不肯多用全经语，恶其近赋也。然意有适会，语亦有不得避者，但不得强用之尔。（中略）自大观后，时流争以用经语为工，于是相为裒次排比，预蓄以待用，不问切当否。粗可牵合则必用之，虽有甚工者，而文气扫地矣。"

> 刘克庄云："四六家以书为料，料少而徒恃才思，未免轻

疏；料多而不善融化，流为重浊，二者胥失之。”

王铚云：“四六有伐山语，有伐材语。伐材语者，如已成之柱桷，略加绳削而已；伐山语者，则搜山开荒，自我取之。伐材谓熟事也，伐山谓生事也。生事必对熟事，熟事必对生事。若两联皆生则伤于奥涩，皆若两联熟则无工。”又云：“四六贵出新意。然用景太多而气格低弱，则类俳矣。惟用景而不失朝廷气象，语剧豪壮而不怒张，得从容中和之道，然后为工。”

四六文之修辞，盖有不同于散行文者。元刘祁《归潜志》云：“文章各有体，本不可相犯。故古文不宜蹈袭古人成语，当以奇异自强；四六宜用前人，复不宜生涩求异。”然则四六文之修辞，在文学范围之内，必有一种特殊方法矣，“雕琢”二字犹未足以尽之也。

第三节　因袭派四六作家

宋初文格诗体，大率因沿晚唐五季旧观，诗之有西昆派与文之偏重骈俪，盖同隶于一种背景之下。彭元瑞云：“杨、刘犹沿于古意。”阮元亦曰：“鼎臣、大年，犹沿唐旧。”徐铉字鼎臣，杨亿字大年，刘者刘筠。自徐铉以下，迄于宋庠、宋祁兄弟，皆属于因袭派之四六家，论列如下。

徐铉当五季之末，为文沿袭燕、许，不能嗣韩、柳之音，而就一时体格言之，则亦迥然孤秀。翟耆年《籀史》曰：“太平兴国中，李煜薨，诏侍臣撰神道碑。有欲中伤铉者，奏曰：‘吴王事莫若徐铉为详。’遂诏铉撰。铉请存故主之义，太宗许之。铉但推言历数有尽，天命有归而已，其警句曰：‘东邻搆祸，南箕扇疑，投抒致慈亲之惑，乞火无邻妇之辞。始劳因垒之师，终后涂山之会。’太宗览之，称叹不已。”后吕祖谦编《文鉴》，多不取俪偶之词而特录此碑，盖亦赏其立言有体，其见重于世，又不徒以词章也。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铉幼能属文，尤精小学。为文未尝沉思，自云‘速则意思壮敏，缓则

体势疏慢’。”《宋史》谓其“从征太原，军中书诏填委，铉援笔无滞，词理精当，时论能之”。盖其文思敏捷，实枚叔之流亚也。

王禹偁之文，已渐变五季雕绘之习，始为古雅简淡之作，然亦不为柳开之奇僻。在词垣时，所为应制骈偶之文亦多宏丽典赡，不愧一时作手。其《谢赐御制月诗表》有云：“效星辰之北拱，徒竭丹心；诵乌鹊之南飞，终惭雅咏。”又《谢免和御制元日除夜诗表》有云：“丰隆门下，免为聚响之蚊；庄叟山中，甘作不鸣之雁。”皆佳制也。洪迈《容斋三笔》称其《拟李靖平突厥露布》叙颉利求降且复谋窜曰：“阱中饿虎，暂为掉尾之求；鞲上饥鹰，终有背人之意。”《蕲州谢上表》曰：“宣室鬼神之问，敢望生还；茂陵封禅之书，已期身后。”按《青箱杂记》云：“禹偁尤精四六，有同时与之在翰林而大拜者，禹偁以启贺之曰：‘三神山上，曾陪鹤驾之游；六学士中，独有渔翁之叹。’以白乐天曾有诗云‘元和六学士，五相一渔翁’故也。”其隶事隽永，有如此者。

杨亿之文，大致如其诗，宗法李商隐而逊其精警。时际升平，春容典赡，无唐末五代衰飒之气，不失为治世之音。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曰：“自唐大中后，文气衰滥，国朝稍革其弊，至亿乃振起风采，与古之作者方驾矣。”陈师道《后山诗话》则云：“国初士大夫例能四六，然用散语与故事耳。杨文公刀笔豪赡，体亦多变而不脱唐末五代之气。又喜用古语，以切对为工，乃进士赋体耳。”循师道之说，则公武所谓“振起风采”者，殆可与晚唐李商隐方驾。按《西轩客谈》谓杨亿为文用故事，使子侄检讨出处，用片纸录之，文成而后掇拾，人谓之“衲被”，殆媲美于李商隐之“獭祭鱼”也。徐度《却扫编》云：“杨文公亿初入馆时年甚少，故事授馆职必以启事谢先达，公启事有曰：‘朝无绛灌，不妨贾谊之少年；坐有邹枚，未害相如之末至。’一时称之。”《青箱杂记》称：“亿为执政所忌，母病谒告，不俟朝旨，径归韩城与弟倚居，逾年不调，有启谢朝中亲友曰：‘介推母子，愿归

绵上之田；伯夷弟兄，甘受首阳之饿。'后除知汝州，而希旨言事者攻击不已，又有启与亲友曰：'已挤沟壑，犹下石而弗休；方困蒺藜，尚关弓而相射。'"大抵运典遣词切于事情，足与文采相映发，是其所以擅长一时也。又如《汝州谢上表》有云："酒泉素愿，敢望于生归；丽正残编，几成于死恨。"亦隽雅可诵。

刘筠与杨亿并称。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其"文章以理为宗，词尚致密"，有《中山刀笔集》三卷，皆四六应用之文，今无传本。吕祖谦《宋文鉴》取其《大酺赋》一首、《贺册皇太子表》一首，又《回颍州曾学士启》一首，皆丽而有则之作也。

钱惟演亦西昆派之巨擘，与杨、刘号"江东三虎"，遗集甚多，皆不传。《宋文鉴》存其《春雪赋》一首。

晏殊在宋初号曰能文，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称其为文"温纯应用"。其文集篇帙甚富，今皆失传。清《四库全书》仅著录其遗文一卷。吕祖谦《宋文鉴》存其中《园赋》一首，状、表各一首，连珠一首，皆四六文也。又记一首，铭一首。

张咏亦列名西昆派中，其文乃疏通平易，不为崭绝之语。其《声赋》一首穷极幽渺，梁周翰至叹为一百年不见此作，吕祖谦亦选入《宋文鉴》。《四库总目提要》称其"非无意于为文者，特其光明俊伟，发于自然，故真气流露，无雕章琢句之态。"其《乖崖集》今有传本。

夏竦工为文词，复多材术，而不自爱重，甘心奸邪，非端士也。晁公武则称其"善为文章，尤长偶俪之语，朝廷大典策屡以属之"，《四库总目提要》亦曰："竦之为人无足取。其文章则词藻赡逸，风骨高秀，尚有燕、许轨范。"欧阳修《归田录》载其《辞免奉使启》有云："义不戴天，难下穹庐之拜；礼当枕块，忍闻鞞鞨之音。"又有云："王姬作馆，接仇之礼既嫌；曾子回车，胜母之游遂辍。"余如《青箱杂记》、《东轩笔录》、《中山诗话》、《玉海》、《困学纪闻》诸书皆称引之，吕祖谦编《文鉴》亦颇采录。盖其文可取，不以其人废矣。集中多朝

廷典册之文，盖所长特在于是也。

宋庠文章多馆阁之作，皆温雅瑰丽，沨沨乎治世之音。《四库简明目录》称其与尹洙、欧阳修分道扬镳，譬枚、马、贾、董，体制各殊而均为一代作者。庠弟祁，修《唐书》列传，务为艰涩，又删除骈体，一字不登。然其文乃博奥典雅，追唐人之格律，无所谓奇险难句者。盖其为文谨严不苟，未可尽以诘屈斥也。庠、祁兄弟，并称"二宋"，《四库总目提要》称其"方驾燕、许之轨"云。

胡宿亦工于四六，《四库总目提要》谓"当时文格未变，尚沿四六骈偶之习，而宿于是体尤工，所为朝廷大制作典重赡丽，足以追纵六朝"云。

范仲淹自读书入官，志在康济，未尝沾沾于词章之末，然亦雅善四六。微时从其母改适，冒姓朱，后复本姓。以启谢时宰，有曰："志在逃秦，入境遂称于张禄；名非霸越，乘舟偶效于陶朱。"用范睢、范蠡，皆当家故事。吴处厚《青箱杂记》、洪迈《容斋三笔》并称其工切。

第四节　改革派四六作家

宋四六自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以散行之气，运骈俪之文，可谓另出机杼，其组织经传、陶冶成句，实足跨越前人，清彭元瑞所谓"欧、苏务以气行"、阮元所谓"欧、苏、王、宋始脱恒蹊，以气行则机杼大变，驱成语则光景一新"是也。阮氏之所谓"宋"，殆指宋庠、宋祁兄弟。按二宋虽欲稍变机杼，实未能尽脱窠臼。陈师道云："国初士大夫例能四六，然用散语与故事尔。欧阳少师始以文体为对属，又善叙事，不用故事陈言而文益高。"盖转移风尚之功，欧阳修应居其首，其后从风而靡者，皆四六文之改革派也，论列如次。

欧阳修早工偶俪之文，试于国学、南省，皆为天下第一。既擢甲科，始识尹师鲁，得韩退之遗文学之。陈振孙《书录解题》谓："欧公

本以词赋擅名场屋。"孙梅曰："宋初诸公，骈体精敏工切，不失唐人矩矱。至欧公倡为古文，而骈体亦一变其格，始以排奡古雅争胜古人。而枵腹空笥者亦复以优孟之似，藉口学步。于是六朝三唐格调寖远，不可不辨。"阮元亦曰："衣辞锦绣，布帛伤其无华；工谢雕几，簴业呈其朴凿。"是皆于修之变骈体之恒蹊，不能无微词者也。然《六一居士集》中偶俪之作，亦不乏清新典雅者，如《西湖念语》一首云：

> 昔者王子猷之爱竹，造门不问于主人；陶渊明之卧舆，遇酒便留于道士。况西湖之胜概，擅東颖之佳名。虽美景良辰，固多高会；而清风明月，幸属闲人。并游或结于良朋，乘兴有时而独往。鸣蛙暂听，安问属官而属私；曲水临流，自可一觞而一咏。至欢然而会意，亦旁若于无人。乃知偶来常胜于特来，前言可信；所有虽非于己有，其得已多。因翻旧阕之词，写以新声之调。敢陈薄技，聊佐清欢。

此虽小品文字，而彭元瑞所谓"务以气行"，阮元所谓"始脱恒蹊"，殆不难讽咏而得其意也。陈善《扪虱新语》谓："以文体为四六，自欧阳公始。"盖无韵之文，至欧阳修而会其通，不复以偏长取胜矣。孙梅《四六丛话》引《瑞桂堂暇录》称："欧阳修作诗几及李杜，碑铭记序即不减韩退之，作五代史即与司马子长并驾，作四六洗昆体，作奏议庶几陆宣公，盖得文章之全者。"

王安石之四六文，彭元瑞称其用古，亦即以文体为四六之谓也。其《贺诞皇子表》有云："盖《芣苢》之薄言采采，众乐先成；则《螽斯》之宜尔振振，宗强孰御。"又《贺致政赵少保》有云："伯夷之直惟清，仲山之明且哲。所居之名赫赫，岂独后思；尔瞻之节岩岩，方当上辅。"按《四六丛话》引叶适云："荆公取经史语组缀，有如自然，谓之典雅，自此后进相率效之。"是诚宋四六文之一变也。又《四六谈麈》载："王荆公在金陵，有中使传宣抚问，并赐银盒茶药，令中外各

作一表。既具稿，无可于公意者，公遂自作。有云：'信使恩言，有华原隰；宝奁珍剂，增贲丘园。'盖五事见四句中，言约而意尽，众以为不及也。"

与王安石同时有元绛、王珪，并善四六。绛晚岁以安石荐入翰林，一时文诰多出其手，时人称其"精丽稳密"。王珪亦以文章致位通显，与安石同预大政，其文博赡瑰丽，自成一家，典内外制十八年，集中多大典策，故骈俪之作尤多而且工。王铚、谢伋、陆游、杨万里等往往称之，盖揖让于二宋之间无愧色云。

司马光尝以不善为四六辞知制诰，邵伯温《闻见录》记王安石推重其文类西汉。今按《传家集》，其文亦气象宏伟，所存文诰亦有用俪体者。但语自质实，不以妃青俪白为工耳。《宋四六选》录其《进〈稽古录〉表》，有云：

> 惟稽古尧、舜之旧章，惟信史《春秋》之成法。高山可仰，覆辙在前，其兴亡在知人，其成败在立政。或当艰难之运，而不能师用贤智；或有恻隐之意，而无以照知忠邪。载籍之编，患乎太漫；鉴观之主，力不暇遑。敢用芟夷，略存体要。

此等文字，虽具骈偶之形式而朴凿无华，诚如阮元所谓"衣辞锦绣，工谢雕几"，视欧阳修殆尤甚焉。

苏轼词源如长江大河，汹涌奔放，瞬息千里，可骇可愕；而于四六文之用事属对，亦精妙切当，人不可及。其通守余杭日，《答高丽私觌状》有云："归时事于宰旅，方劳远勤；发私币于公卿，亦蒙见及。"费衮《梁溪漫志》尝引称之。盖发币一事，乃外夷使者致馈之故实也。洪迈《容斋三笔》称其《坤成节疏》有曰："至哉坤元，德既超于载籍；养以天下，福宜冠于古今。"又《慰国哀表》有曰："大哉孔子之仁，泫然流涕；至矣显宗之孝，梦若平生。"《谢赐带马表》有曰："枯羸之质，匪伊随之而带有余；敛退之心，非敢后也而马不进。"王铚《四六话》则称其后为兵部尚书，又作《谢衣带表》有曰："物生有待，

天地无穷。草木何知，冒庆云之渥采；鱼虾至陋，借沧海之荣光。虽若可观，终非其有。”且谓：“四六至此，涵造化妙旨矣。”朱翌《猗觉寮杂记》又称其脍炙人口者，如《黄州谢表》有曰：“天地能覆载之，而不能容之于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于死中。”盖用《后汉书·袁敞传》张俊语曰：“天地父母能生臣俊，不能使臣俊当死复生。”斯其驱成语而以气行，信足以一新光景也。孙梅论宋代翰苑文章，以三等概诸家，而欧阳修与苏轼为上，其赞扬之词曰：“智珠在握，春丽纷敷。笔综九流，转若枢而罔碍；胸罗万卷，运于手而不知。浩若长河之东注，贲若化工之肖物。”又评轼曰：“东坡四六，工丽绝伦中，笔力矫变，有意摆落隋唐、五季蹊径。以四六观之则独辟异境，以古文观之则故是本色，所以奇也。”按《东坡全集》中四六诸作，最为后世传诵者，莫如《王安石赠太傅制》及《吕惠卿谪词》两首，文繁不具录。朱弁《曲洧旧闻》谓：“吕惠卿之谪也，刘攽当草制，引疾而出，轼一挥而就，不日传都下，纸为之贵云。”轼弟辙与兄颉颃，四六之作亦有可观。

曾巩早以文章名天下，晚入掖垣，所为代言之文古质无华，殆不可以四六名之。间出骈骊之语，裁对高浑，运词典藻，孙梅谓“求之唐人，燕、许有其瑰奇而无其缜密”云。

曾肇，巩之季弟。文章稍不及巩，其制诰诸作亦温润典雅，徽宗朝尝草兄布拜相制，世称其得命次之体云。

此时期中，文士以文章名天下，或曾典内外制者，如刘敞、刘攽、吕诲、吕公著、黄庭坚、秦观、张耒、陈师道、晁补之、晁咏之、李之仪、邓润甫、林希、吕惠卿、韩忠彦、张舜民、李清臣、李邴，皆擅四六。邓润甫当熙宁中，以翰林学士兼掌皇子阁笺记，一时制作皆出其手，其《立哲宗为皇太子制》末云：“离明震长，绵帝祚于亿年；解吉涣亨，洒天人于万宇。”天下诵之。洪迈尝称其《行贵妃制》有曰：“《关雎》之得淑女，无险陂私谒之心；《鸡鸣》之思贤妃，有警戒相成

之道。"哲宗立，润甫在院，一夕草制二十有二首，盖其才华赡敏，一时称独步焉。林希当哲宗绍圣朝，因章惇荐，获典书命，章惇逞毒于元祐诸臣，凡司马光等降谪之制皆希当笔，词极丑诋。孙梅《四六丛话》引《野老纪闻》谓："林希绍圣初在外制，行元祐诸公谪词，是非去取，固时相风旨，然而命词似西汉诏令，有王言体，于苏轼一词尤不草草，苏见之曰：'林大亦能作文章耶？'"其词有云："若讥朕过失，亦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诋诬圣考，乖父子之恩，害君臣之义。在于行路，犹不戴天；顾视士民，何施面目？"又曰："虽汝轼文足以惑众，辩足以饰非，然而自绝君亲，又将谁怼？"吕惠卿佐王安石行新法，为文长于表奏。王铚《四六话》谓其自资政殿大学士贬建州也，苏轼行谪词，剧口诋之，号为"元凶"。吕既至建州，谢表末云："龙鳞凤翼，固绝望于攀缘？虫臂鼠肝，一冥心于造化。"轼见此表于邸报，笑曰："福建子难容，终会作文字。"罗大经《鹤林玉露》录其表语云："九金聚粹，共图魍魉之形；孤剑埋光，尚负斗牛之气。"指正人为邪人如此，人主何以辨之？王铚所称之谢表，彭元瑞录入《宋四六选》内，视苏轼之作无多让也。按林希、吕惠卿此等文字，姑就其清词丽句而欣赏之，尚可隶属于文学范围之内，其邪正是非固不足论也。

第五节　南宋四六作家

彭元瑞《宋四六选》序有曰：

> 洎乎渡江之衰，鸣者浮溪为盛。盘洲之言语妙天下，平园之制作高禁中。杨廷秀笺牍擅场，陆务观风骚余力。尊幕中之上客，捉刀竞说三松；封席上之青奴，标准犹传一李。后村则名言如屑，秋崖则丽句为邻。臞轩、南窗、憯窗、象麓，雄于末造，讫在文山。

阮元序《四六丛话》亦曰：

> 南渡以还，浮溪首倡。野处、西山，亦称名集；渭南、北海，

并号高文。

彭、阮二氏所称引，凡宋室南渡后工于四六文者，大抵尽之矣。浮溪者，汪藻也。盘洲者，洪适也。平园者，周必大也。廷秀者，杨万里也。务观者，陆游之字，“渭南”则其文集之名也。“捉刀竞说三松”者，王子俊尝客蜀幕，所著有《三松类稿》也。“标准犹传一李”者，李刘有《四六标准》也。后村者，刘克庄也。秋崖者，方岳也。臞轩者，王迈也。篔窗者，陈耆卿也。文山者，文天祥也。野处者，洪迈也。西山者，真德秀也。北海者，綦崇礼也。尚有王安中、翟汝文、孙觌诸人，皆南宋四六名手，而彭、阮二氏未之及者，囿于俪词故也。兹列叙如次。

汪藻四六之工，自少年即妙，张邦基《墨庄漫录》称其崇宁三年《谢颁冰表》有云：“使漱润而吮清，得除烦而涤秽。顺时致养，俯同豳雅之春开；受命知荣，固异卫人之夕饮。”又曰：“防履深薄之危，不昧至坚之渐。子孙传诵，记御林金碗之香；生死不忘，动宫井玉壶之洁。”洪迈称其作《靖康册康王文》有云：“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又责张邦昌有云：“虽天夺其衷，坐愚如此；然君异于器，作匮可乎？”又知徽州，其乡郡也。谢启有云：“城郭重来，疑千载去家之鹤；交游半在，感一时同队之鱼。”谢伋《四六谈麈》称其《贺吕成公初大拜启》有云：“方群臣忧杞国之天，靡遑朝夕；乃两手取虞渊之日，重正乾坤。”故《四库总目提要》论之曰：“藻学问博赡，为南渡后词臣冠冕。（中略）统观所作，大抵以俪语为最工。其代言之文，如《隆祐太后手书》、《建炎德音》诸篇，皆明白洞达，曲当情事，诏令所被，无不凄愤激发，天下传诵，以比陆贽。说者谓其著作得体，足以感动人心，实为词令之极则。（中略）孙觌作藻墓志，以大手笔推之，殆非溢美。”惟罗大经《鹤林玉露》记藻初投李纲启有云：“孤忠贯日，正二仪倾侧之中；凛气横秋，挥万骑笑谈之顷。”又云：“士颂公冤，咸举幡而集阙下；帝从民望，

令免胄以见国人。"其赞美至矣，及草纲谪词，则曰："朋奸罔上，有虞必去于驩兜；欺世盗名，孔子先诛于正卯。"当时有问藻者，藻云："我前启自直一翰林学士，而彼不我用，安得不丑诋之？"此则颇为后世所讥。又名节、心术之事，与文章之工拙别为一论者矣。大抵就文章而论，宋四六自欧阳、苏、王大变机杼，迨绍圣后置词科，习者益众，若汪藻者，殆其集大成者也。陈振孙《书录解题》，于汪藻推崇备至，且谓其度越晚唐，视令孤楚、李商隐为尤工。孙梅则有说辩其不然，其说曰：

> 浮溪之文可称精切，南宋作者未能或先，然何可与义山同日语哉？古之四六，句自为对，语简而笔劲，故与古文未远。其合两句为一联者，谓之"隔句对"，古人慎用之，非以此见长也。故义山之文，隔句不过通篇一二见，若浮溪非隔句不能警矣，甚至长联至数句、长句至十数字者，以为裁对之巧，不知古意寖失，遂成习气。四六至此，弊极矣，其不相及者一也。义山隶事多而笔意有余，浮溪隶事少而笔意不足，其不相及者二也。若令狐文体尤高，何可妄为轩轾乎？

按文章随世运为转移，其升降高下，有不可强致者。孙氏盖谓骈俪之文以唐为极盛，故于汪藻之评骘如此。

王安中当政和中，以作瑞应表受知于徽宗，《宋史》称其"为文丰润敏拔，尤工四六之制"，惟行谊甚为纰缪。《四库总目提要》谓："其人虽至不足道，而文章富赡，要有未可尽泯者。"亦不以人废言之义。杨万里《诚斋诗话》称其《行余深少宰制》有云："仰惟前代，守文为难；相我受民，非贤不乂。"又在象州思乡作文有云："万里丘坟，草木牛羊之践履；百年乡社，室家风雨之飘摇。"陈振孙称其少尝师事苏轼于定武，复受业于晁说之，其议论闻见多得于晁氏，既贵显，遂讳晁学。曾敏行《独醒杂志》亦记其初学东坡书，崇、观、宣、政间颇更少习，南渡以来，复还其旧。盖亦随时翻覆之无行文人也。

孙觌生平出处尤不足道,《四库简明目录》谓其一生巧宦,殆不知世有廉耻。其碑志谀颂宦寺,排抑忠良,殆亦不知世有是非。其词采则汪藻、綦崇礼罕与抗行,亦所谓"孔雀有毒,不掩文章"者,故自宋以来,无不非薄其人而不废其集焉。周必大为作集序,称其名章隽句,晚而愈精。盖生于元丰,卒于乾道,不可谓非耆宿也。试词科日,代高丽国王作《谢赐燕乐表》,有云:"玉帛万国,干舞已格于七旬;箫韶九成,肉味遽忘于三月。"又云:"荡荡乎无能名,虽莫见宫墙之美;欣欣然有喜色,咸豫闻管籥之音。"洪迈尝称其工致。又谢伋《四六谈麈》称其《黄楙和罢相制》有云:"移股肱者,固非朕志;作耳目者,言皆汝尤。"又《谢吏部侍郎表》云:"名节坏于谤谗,孰听鼠牙之讼;精神销于忧患,屡惊马尾之书。"盖遣词清新,用事切当,是其所以擅长也。

綦崇礼与汪藻、孙觌并擅四六,《宋史》称其妙龄秀发,聪明绝人,覃心辞章,极润色论思之选,"再入翰林凡五年,所撰诏命数百篇,文简意明,不私美,不寄怨,深得代言之体"。盖其操行醇正,远胜汪、孙之徒以词藻文其奸矣。《四库总目提要》云:"观《北海集》所载内外诸制,大约明白晓畅,切中事情,颇与《浮溪集》体格相近。如吕颐浩开督府制词,则楼钥赏其宏伟;王仲嶷落职制词,则王应麟取其精切;邹浩追复待制制词,则《宋史》采入本传,以为能推朝廷所以褒恤遗直之意。其草秦桧罢政制则直著其恶,致桧再相后奏索其稿,几蹈危祸,史所云盖非溢美矣。"按崇礼《行邹浩追复待制制词》有云:"处心不欺,养气至大。言期寤意,引裾尝犯于雷霆;计不惜身,去国再迁于岭徼。具臣动色,志士倾心。"又云:"英爽不忘,想生气之犹在;奸谀已死,知朽骨之尚寒。"陆游《老学庵笔记》称其《谢宫词表》有云:"杂宫锦于渔蓑,敢忘君赐;话玉堂于茆舍,更觉身荣。"时叹其工。又有一表:"欲挂衣冠,尚低回于末路;未先犬马,傥邂逅于初心。"尤佳。楼钥序崇礼《北海集》,有云:"平时为文,不

为崖异之言，而气格浑然天成。故一旦当书宣之任，明白洞达，虽武夫、达人，晓然知上意所在，非规规然取青媲白以为工者比也。"循是说也，则崇礼虽与汪、孙并称而终有间矣。

翟汝文尝从苏轼、黄庭坚、曾巩游。史称其为中书舍人时，"外制典雅，一时称之"。盖当北宋之季，如汪藻、孙觌皆以四六著名，惟汝文能与之颉颃。周必大序孙觌《鸿庆集》，谓中多误收汝文所作，亦足见其体格之相近矣。杨万里《诚斋诗话》称其《左仆射制词》用成语而雅驯妥贴，又称其《贺蔡攸除少师启》中有"朝廷无出其右，父子同升诸公"二句，以为截断古语，补以一字，而读者不觉，为巧之至。又洪迈所称为工致者，如《外国王加恩制》云："宗祀明堂，所以教诸侯之孝；大赉四海，不敢遗小国之臣。"又如知越州日，以擅发常平仓米救荒降官，谢表云："敢效秦人，坐视越人之瘠；既安刘氏，理知晁氏之危。"《四库总目提要》评其文曰："大都根抵深厚，措词雄健，所谓无一字无来处者，庶几足以当之，非南宋表启涂饰剽掇之比。其为作者所推，非徒然也。"

洪皓三子适、遵、迈，承藉家学，并掇词科，当时称"三洪"焉。而沿流溯源，皓实开之。遵进用最先于兄弟，而得年不永，遗集又无传本。适自撰小传，谓自其少时拟《复得河南贺表》，有云："齐人归郓讙之田，宣王复文武之境。"颇为作者所称。其内外诸制皆长于润色，藻思绮句层见叠出。其弟迈，于《容斋三笔》中所举称者，如《张浚免相制》、《王大宝致仕制》、《浙东谢表》、《谢生日诗词启》诸联，盖犹未尽其美也。迈与两兄并以文章取盛名，而尤以文备众体受知孝宗。惜其《野处猥稿》，传播未远，清《四库》集部仅著录《野处类稿》二卷。其《容斋随笔》中颇评骘前辈及并时文士四六诸作，苟非致力之勤，亦安能妄下雌黄耶？尝云："四六骈俪，于文章家为至浅，然上自朝廷命令、诏册，下而缙绅之间笺书、祝疏，无所不用。则属辞比事固宜警策精切，使人读之激昂，讽味不厌，乃为得体。"韩淲

《涧泉日记》谓其作翰林学士有文名，“制词有典式，喜用艰深之词，以作碑记，世亦以此宝之”云。

周必大以文学致身宰辅，享耆艾之年，好学不倦，晚益精进。真德秀称其制词最为可法，与王安中、汪藻并举，且谓其体格与场屋之文相近故也。孙梅亦以必大与汪藻同称，曰：“抽青妃白，选义考词，参差叶凤管之和，组织尽鸳机之巧。极雕镵之能事，而妙若天成；驱卷轴之纷纶，而工如己出。若汪浮溪、周益公，又其次也。”此盖专论制敕、诰册，而评之如此。周密《浩然斋雅谈》称其尝戏作《贺冬启》云：“数九九而哦诗，自怜午瘦；辨多多而有酒，骤觉冬肥。”又《词学指南》称其就试时，代交趾拟进驯象表，有云：“名应周郊之五路，克协驭仪；耳闻舜乐之八音，能参率舞。”又云：“靡惮奔驰，幸舍鸢飞之跕跕；无烦教扰，俾陪兽乐之般般。”皆曲尽驯象生意，宜其中首选也。

杨万里以诗名，其四六小篇亦精妙绝伦，往往属对出意外，妙若天成，孙梅谓“南宋诸公皆不及”云。其《诚斋诗话》，颇评骘前辈四六文。

陆游诗为中兴之冠，四六文亦佳，彭元瑞所谓“陆务观风骚余力”是也。

楼钥文章淹雅，多为世所传述，《宋史》称其“代言坦明，得制诰体”。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载钥所草《光宗内禅制词》，有“虽丧纪自行于宫中，而礼文难示于天下”二语，为海内所称云。

李刘事迹无可称述，《四库全书》著录其《四六标准》四十卷，凡分七十一目，一千九十六首，可谓专门矣。大抵以流丽稳贴为宗，无复唐以来浑厚之气，孙梅评之曰：“雕琢过甚，近于纤冗；排偶虽工，神味全失。骈体至此，发泄太尽，难以复古矣。”

真德秀之四六文，在南宋为一大家，孙梅称之曰：“华而有骨，质而弥工，不染词科之习，野处、诚斋而下，皆不及也。”盖德秀生朱

熹之乡，力崇朱子之绪论，著作甚富，不失为儒者之言，非仅以词章擅场也。其代言之作，孙梅则以之与曾巩并举，视欧、苏为未及，视汪、周则差胜，其说曰："官举其职，人甄厥长；文赡义精，句奇语重。炳然与三代同风，卓尔轶汉京而上，若曾南丰、真西山，固其亚也。"此盖质胜于文之说也。德秀尝有说曰："表章工夫，最宜用力。先要识体制，贺谢、进物，体各不同，累举程文，自可概见。前辈之文，惟汪浮溪集中诸表，皆精致典雅，可为矜式。"是其对于四六文又未尝不推重汪藻，然则文与质二者，固有不可偏废者矣。

王子俊《格斋四六》一卷，《四库全书》著录。子俊有《三松类稿》，此其一也。杨万里称之曰："踵六一、东坡之步武，超然绝尘。"《四库总目提要》则称其"典雅流丽，亦复斐然可观"，故朱彝尊谓其"由中而发，渐近自然，无组织之迹，必谓胜于汪藻、孙觌，固友朋标榜之词，要之骖驾二人，亦足以步其后尘矣"。

卫博《定庵类稿》四卷，《四库全书》著录。其中表、札、笺、启、序记、书疏，代人作者十之九，盖亦以四六擅长，每为当时贵显所罗致。《四库总目提要》称其所作亦"工稳流丽，有汪藻、孙觌之余风，非应酬牵率者可比"云。

周南《山房集》九卷，《四库全书》著录。《提要》称其"长于四六，以俊逸流丽见称，制诰诸篇，尤得训词之体"。

李廷忠《橘山四六》二十卷，《四库全书》著录。集中启、札为多。《提要》云："北宋四六大都以典重渊雅为宗，南渡末流，渐流纤弱。廷忠生当淳熙、绍熙之间，正风会将变之时，故所作体格稍卑，往往好博务新，转伤繁冗。然组织尚为工稳，其佳处要不可掩。"

陈耆卿《筼窗集》十卷，《四库全书》著录。按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谓："耆卿四六理趣深而光焰长，以文人之笔藻，立儒者之典型，合欧、苏、王为一家，叶适深叹赏之。"适所作《耆卿集》序，称许甚至。《四库总目提要》称其"虽当南渡后文体衰弱之余，未能尽除

积习，然其纵横驰骤而一归之于法度，实有灏气行乎其间，非啴缓之音所可比”，宜其为适叹赏矣。

王迈《臞轩集》十六卷，《四库全书》著录。其中四六文皆启、札之作。迈少负才名，而史尤称其“练达世务”，盖非徒以词藻见长者也。

刘克庄作四六文好用本朝故事，王士祯《池北偶谈》尝讥其非是，《四库总目提要》则称“其清新独到之处，亦未可尽废”云。

方岳工于四六文，《四库总目提要》谓其“名言隽句，络绎奔赴，以骈体为尤工，可与刘克庄相为伯仲”。又援洪焱祖为作小传，谓其“不用古律，以意为之，语或天出，可谓兼尽其得失”云。

文天祥平生大节照耀今古，不必以词章重，而四六文亦卓然可传。彭元瑞《宋四六选》所录诸首，皆典赡清丽，信所谓“雄于末造”也。

王应麟著《词学指南》论述四六文之修辞，盖以词科起家，于四六文讲习甚精。今所传《四明文献集》制诰居十之七，《四库总目提要》称其“典雅温丽，有承平馆阁之遗”。惜其《深宁集》一百卷，久已散佚耳。

第四章　宋之诗

第一节　宋诗之总评

宋诗在中国文学史上，蔚然一大观也。且勿论上拟唐诗，孰优孰劣，即其规模唐人而变化生新，亦何可轻议？况五代以后，诗篇不复被于管弦，文人寄兴于词，多已尽其适性陶情或正或变之能事，而又能于诗自成壁垒，转移风气。其间诗人辈出，往往强自振拔，与新兴之词联镳方轨，此又岂可以幸致者？后来元、明诸朝虽号称"规复唐音"，而究之不能自异于古。刘克庄曰："宋诗岂惟不愧于唐，盖过之矣。"明方孝孺诗云："前宋文章配两周，盛时诗律亦无俦。今人未识昆仑派，却笑黄河是浊流。"清吴之振、吕留良同辑《宋诗钞》，之振作序，尤极言宋诗不腐，略曰：

> 自嘉、隆以还，言诗家尊唐而黜宋，宋人集覆瓿糊壁，弃之若不克尽，故今日搜购最难得。黜宋诗者曰"腐"，此未见宋诗也。宋人之诗，变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尽，精神独存。不知者或以为腐，后人无识，倦于讲求，喜其说之省事而地位高也，则群奉"腐"之一字，以废全宋之诗。故今之黜宋者，皆未见宋诗者也。(中略)宋之去唐也近，而宋人之用力于唐也尤精以专。(中略)曹学佺序宋诗，谓取材广而命意新，不剿袭前人一字，然则诗之不腐，未有如宋者矣！今之尊唐者，目未及唐诗之全，守嘉、隆间固陋之本，皆宋人已陈之刍狗，践其首脊，苏而爨之，久矣，顾复取而篋衍文绣之，陈陈相因，千喙一唱，乃所谓"腐"也。(下略)

按宋荦《漫堂诗话》云："明自嘉、隆以后，称诗家皆讳言宋，至举以相訾謷，故宋人诗集，庋阁不行。近二十年来乃专尚宋诗，至吾

友吴孟举《宋诗钞》出，几于家有其书矣。"孟举，之振字也。盖宋诗当明、清之交由晦而显，吴氏之功为不细矣。

若其规规于唐诗、宋诗之辨别而抑宋尊唐者，则有如明李东阳《怀麓堂诗话》云："宋人于诗无所得。所谓法者，不过一字一句对偶雕琢之工，而天真兴致则未可与道。"陈子龙则曰："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其为诗也，言理而不言情，终宋之世无诗。"又如清王夫之云："宋人始争疆垒，欧阳永叔亟反杨亿、刘筠之靡丽，而矫枉已迫，还入于枉，遂使一代无诗，掇拾夸新，殆同觞令。"吴乔则曰："宋之最著者苏、黄，全失唐人一唱三叹之致，况陆放翁乎？"吴氏有《围炉诗话》及《答万季野诗问》，对于宋诗贬抑殆遍，至谓："宋人诗集甚多，不耐读而又不能不读，实为苦事。"又谓："唐人以诗为诗，宋人以文为诗。唐诗主于达性情，故于三百篇近；宋诗主于议论，故于三百篇远。"此皆偏崇唐诗者之诐词也。夫《诗经》三百，风、雅异轨，正、变殊途；《离骚》继作，体制既异，波澜益肆；汉魏六朝，代有变迁，其旨格殆未可以一端尽之。故赵宋之诗，自有其独具之面目，未可强同于唐人也。

清沈德潜曰："宋初台阁倡和，多宗义山，名'西昆体'。梅尧臣、苏子美起而矫之，尽翻窠臼，蹈厉发扬，才力体制非不高于前人，而渊涵渟滀之趣无复存矣。"又叶燮谓："自梅、苏变尽昆体，独创生新，必辞尽于言，言尽于意，发挥铺写，曲折层累以赴之，竭尽乃止。才人伎俩，腾踔六合之内，纵其所如，无不可者，然含蓄渟泓之意亦少衰矣。"观沈、叶两家之说，可知宋代梅、欧以后迄于所谓江西派之诗，信能于唐音之外别开生面，故《贞一斋诗话》谓："宋人惟无意学唐，故法疏而天趣间出。金、元人专意学唐，故有法而气体反弱。"此宋诗之所以高出于后世，而未必逊于唐也。试观元诗称大家，必曰虞、杨、范、揭，以四子而视宋，特泰山之于卷石耳。叶燮更有精透之说，略曰：

从来论诗者，大约伸唐而绌宋，有谓“唐人以诗为诗，主性情，于三百篇为近；宋人以文为诗，主议论，于三百篇为远。”何言之谬也！唐人诗有议论者，杜甫是也。杜五言古议论尤多，长篇如《赴奉先县咏怀》、《北征》及《八哀》等作，何首无议论？而独以议论归宋人，何欤？彼先不知何者是议论、何者为非议论，而妄分时代耶？且三百篇中，二雅为议论者正自不少。彼先不知三百篇，安能知后人之诗也？如言宋人以文为诗，则李白乐府、长短句何尝非文？杜甫前后《出塞》及《潼关吏》等篇，其中岂无似文之句？为此言者，不但未见宋诗，并未见唐诗。村学究道听耳食，窃一言以诧新奇，此等之论是也。

吴之振校刊《瀛奎律髓》，亦于序中抒其唐、宋不分畛域之见解，节录如次：

两间之气运，屡迁而益新，人之心灵意匠，亦日出而不匮。故文者，日变之道也。（中略）诗者，文之一也。律诗起于贞观、永徽，逮乎祥兴、景炎，盖阅六百余年矣。其间为初盛、为中晚、为西昆、为元祐、为江西，最后而为江湖、为四灵、作者代生，各极其才而尽其变，于是诗之意境开展而不竭，诗之理趣发泄而无余，盖变而日新，人心与气运所必至之数也。其间或一人而数变，或一代而数变，或变之而上，或变之而下，则又视乎世运之盛衰与人材之高下，而诗亦为之升降于其间，此亦文章自然之运也。由是言之，时代虽有唐、宋之异，自诗观之，总一统绪相条贯，如四序之成岁功，虽寒暄殊致，要属一元之递嬗尔。而固者遂划为鸿沟，判作限断，或尊唐而黜宋，或宗宋而祧唐，此真方隅之见也。

夫就诗论诗，如吴氏之说，诚无俟分析唐、宋，评騭高下。惟两宋文学发展之途径，已不在诗而在词，不在因袭而在演变，然则上列诸说，宁非徒费词哉？若径谓终宋之世无诗，则又限于门户之见

者矣！

第二节　宋初诗人

宋初诗人，声名较著者，略述数人如下，类皆因袭晚唐五代余风，不足以言转移风气也。

徐铉故南唐词臣，早知名于江左，入宋后以文章冠朝列。其文思敏速，凡其撰述，执笔立就。其诗流易有余而深警不足，然其学博才高，亦时有名隽之篇，如《临汉隐居诗话》所称《喜李少保卜邻》诗"井泉分地脉，砧杵共秋声"之句，亦未尝不具有思致云。

潘阆当宋初五代余风未沫，其诗间有粗犷余习，而大体风格孤峭，尚有晚唐作者之遗，一时若王禹偁、柳开、寇准、林逋诸人，皆与赠答。后来刘攽《中山诗话》称其《岁暮自桐庐归钱塘》诗不减刘长卿，苏轼、刘克庄皆尝称其佳句"或不在苏舜钦、石延年之下"。盖宋人绝重之也。

寇准以风节著于时，其诗含思凄婉，有晚唐之致，然骨韵特高，终非凡艳可比。陆游尝有诗称准云："巴东诗句澶州策，信手拈来尽可惊。"盖虽勋名之高，犹未足以掩其诗也。

王禹偁词学敏赡，独步一时，出入词林。宋太宗雅重其文，不仅以诗著，而称述宋诗薄西昆派者，求其人于梅、苏之前，厥惟禹偁。故吴之振编《宋诗钞》，自禹偁《小畜集》始，称其独开有宋风气，于是欧阳修得以承流接响。修诗雄深过于禹偁，然禹偁固其滥觞矣。盖禹偁颇变诗体，惜未能转移风气，后得苏、梅、欧阳力矫杨、刘之敝，乃奏大功，禹偁实导其先河也。

林逋恬洁自好，宋初逸士也。其诗澄淡高远，如其为人，其《咏梅》诸什尤脍炙人口。北宋文士多以科第致通显，其逃名于当时而蜚声于后代者，逋为最。同时有魏野，然视逋有逊色矣。

魏野，亦处士也。身后之名不及林逋，而装点湖山，供后人题

咏，则当时之世誉出于逋上。史称大中祥符初，辽使至宋，言本国得野集上册，愿求全部。《续湘山野录》载长安名姬添苏，得野一诗，至署于堂壁夸鬻于人。其倾动一时，可想见也。其诗尚仍五代旧格，未能及林逋之超诣，而胸次不俗，究无龌龊凡鄙之气，是亦不可废也。

宋初浮屠以诗名者九人，有《九僧集》，今有传本。九僧者，剑南希昼、金华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汝州简长、青城维凤、江东宇昭、峨眉怀古、淮南惠崇。其间惠崇诗多警丽，殆西昆派之先导也。欧阳修《六一诗话》曰："国朝浮屠以诗名于世者九人，故时有集号'九僧诗'，今不复传矣！余少时闻人多称之，其一曰惠崇，余八人者忘其名字矣。余亦略记其诗，有云：'马放降来地，雕盘战后云。'又云：'春生桂岭外，人在海门西。'其佳句多类此。其集已亡，今人多不知有所谓九僧者矣！"按欧阳修之时代，去九僧不过数十年耳，而人已不知有所谓九僧者，岂其不甚为当世重视欤？

第三节　西昆派

西昆派今传有《西昆酬唱集》二卷，杨亿编，自为序曰：

> 余景德中忝佐修书之任，得接群公之游。时今紫微钱君希圣、秘阁刘君子仪，并负懿文，尤精雅道，雕章丽句，脍炙人口，予得以游其墙藩而咨其模楷。二君成人之美，不我遐弃，博约诱掖，置之同声。因以历览遗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发于希慕，更迭唱和，互相切劘，而予以固陋之姿，参酬继之末，入兰游雾。虽获益以居多，观海学山，叹知量而中止。既恨其不至，又犯乎不韪，虽荣于托骥，亦愧乎续貂。间然于兹，颜厚何已。凡五七言律诗二百四十七章，其属而和者计十有五人，析为二卷，取玉山、策府之名，命之曰"西昆酬唱集"云尔。

其与名酬唱者凡十八人，原阙其一，兹列举于次：

杨　亿　刘　筠　钱惟演　李宗谔　陈　越
李　维　刘　隲　丁　谓　刁　衎　张　咏
钱惟济　任　随　舒　雅　晁　迥　崔遵度
薛　映　刘　秉

观亿之自序，盖其诗体实钱惟演、刘筠诸人互相切劘而成，而田况《儒林公议》则称亿在两禁变文章之体，刘筠、钱惟演辈皆从而效之，时称"杨刘"。按杨亿幼擅文名，既入馆阁，遂主盟诗坛，陶铸士林，而时际升平，为文从容典赡，一以李义山为宗，颇能一扫晚唐五代衰飒之气。当时与于唱和之人，今可考而称者，亦惟杨亿与刘筠、钱惟演最著。刘筠作诗务故实，欧阳修尝称其咏《新蝉》云"风来玉宇乌先转，露下金茎鹤未知"，虽用故事，何害为佳句也？又称其"峭帆横渡官桥柳，叠鼓惊飞海岸鸥"不用故事，又岂不佳？钱惟演诗篇，今仅见于《西昆酬唱集》中，全集今无传本。大抵西昆派诸人之诗，皆尚纤巧、重对偶，学李义山而失之过，无复空灵之趣。后来欧阳修以优游坦夷之词，矫而变之，虽大变其体，然于昆体亦未尝一概抹煞，尝谓："先朝杨、刘风采耸动天下，至今使人倾想。"盖工力精切，亦诗之一体，未可偏废。钱惟演留守西京时，欧阳修为推官，相处甚久，故不能无夙契也。

张咏《乖崖集》，今有传本。虽列名西昆派中，而其诗清逸有骨气，无雕琢之态，与杨、刘颇不类。

《西昆酬唱集》中，晏殊未与其列。殊在宋初号为能文，诗名亦著，其诗传者绝鲜。《古今诗话》则以殊与杨、刘、钱并举，谓其为诗"亦宗李义山"。

后世崇尚西昆体者，清常熟二冯为最。按二冯先生评阅《才调集》凡例，有一条云：

> 两先生教后学，皆喜用此书，非谓此外皆无可取也，盖从此而入则蹈矩循规，择言择行，纵有纨绔气习，然不过失之乎

文。若径从江西派入，则不免草野倨侮，失之乎野，往往生硬拙俗，诘屈聱牙，遗笑天下后世而不可救。今学者多谓印板唐诗不可学，喜从宋、元入手。盖江西诗可以枵腹而为之，西昆则必要多读经史骚选，此非可以日月计也。况诗发乎情，不真则情伪，所以从外至者，虽眩目悦耳而比之刍狗衣冠从肺腑流出者，虽近里巷鄙俚而或有可取。然亦须善为之，钝吟有云："图骒褭之形，极其神骏，若求伏辕，不免驾款段之驷；写西施之貌，极其美丽，若须荐枕，不如求里门之姬。万历间，王、李盛学盛唐、汉魏之诗，则求之声貌之间，所谓图骒褭、写西施者也；牧斋谓诗人如有悟解处，即看宋人亦好，所谓款段之驷、里门之姬也。遂谓里门之姬，甚于西施；款段之驷，胜于骒褭，岂其然乎？若今诗人专以俚言俗语为能事，是图款段之驷、写里门之姬矣，其能免于千古姗笑乎？"噫！此言真为好言宋诗者药石矣。

按二冯崇尚西昆体，故厌薄江西派，因厌薄江西派，遂并及全宋之诗而皆厌薄之，是亦一家之见。薛雪《一瓢诗话》亦云："杨、钱、刘、晏诸公何罪于人？乃论诗者动辄鄙薄西昆，甚至为挦扯义山之剧，吾不解也！"按鄙薄西昆，殆一时风气使然，至演剧之举，在杨、刘当时，不过优人滑稽取笑而已，后人遂引为口实。党同则伐异，文人轻薄，固如是耶？清《四库总目提要》曰：

(西昆酬唱)诗宗法唐李商隐，词取妍华而不乏兴象，效之者渐失本真，惟工组织，于是有优伶挦扯之戏，石介至作《怪说》以刺之，而祥符中遂下诏禁文体浮艳。然介之说，苏轼尝辨之。真宗之诏，缘于宣曲一诗有"取酒临邛"之句，陆游《渭南集》有西昆诗跋，言其始末甚详，初不缘文体发也。其后欧、梅继作，坡、谷迭起，而杨、刘之派遂不绝如线。要其取材博赡，炼词精整，非学有根柢，亦不能熔铸变化，自名一家，固亦未可轻

诋。

常熟冯氏所谓“西昆派必要多读经史骚选”即与上说相通。盖取材富赡是其所长，所以未可轻诋者，正在此耳。

第四节　苏、梅、欧阳

欧阳修于诗矫西昆体之浮靡，而于当时诗人最心折苏舜钦、梅尧臣，其次则石延年。三人之殁，欧阳修皆为文以祭。苏之《沧浪集》、梅之《宛陵集》，欧阳修并为之序。其于石诗，亦于《六一诗话》内亟称之。

苏舜钦歌行雄放，轩昂不羁，如其为人，及蟠屈为近体，则极平夷妥帖。盖舜钦少登朝籍，坐事废居苏州，韬晦读书，一发其愤懑于歌诗，故其体豪放，往往惊人。

梅尧臣之诗，刘克庄称为宋诗“开山祖师”，有圣俞出，“然后桑濮之淫哇稍息，风雅之气脉复续”，非过论也。欧阳修序其集有曰：“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乐于诗而发之。”其诗之见重于当时有如此者。故张舜民评之曰：“圣俞诗如深山道人，草衣菌茹，土形木质，虽王公大人见之，不觉屈膝。”然陈振孙则谓：“圣俞为诗，古淡深远。（中略）近世少有喜者，或加毁訾，惟陆务观重之，此可为知者道也。自世竞宗江西，已看不入眼，况晚唐卑格方锢之时乎？杜少陵犹有窃议妄论者，其于宛陵何有？”盖自黄庭坚张大欧、苏驰骋之风，衍为江西一派，去圣俞之深微闲淡日远，其看不入眼宜也。按欧阳修《六一诗话》载梅尧臣论诗语云：“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循是说也，则梅之所以取重于欧阳，其造诣所得，正亦从“难”字中来，岂幸致哉？

叶燮谓开宋诗一代之面目者，始于梅尧臣、苏舜钦二人，然二

人诗格实不相同。《六一诗话》云："圣俞、子美齐名于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子美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余尝于《水谷夜行》诗略道其一二云：'子美气犹雄，万窍号一噫。有时肆颠狂，醉墨洒滂霈。譬如千里马，已发不可杀。盈前尽珠玑，一一难拣汰。梅翁事清切，石齿漱寒濑。作诗三十年，视我犹后辈。文词愈精新，心意虽老大。有如妖韶女，老自有馀态。近诗尤古硬，咀嚼苦难嘬。又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苏豪以气轹，举世徒惊骇。梅穷独我知，古货今难卖。'语虽非工，谓粗得其彷彿，然不能优劣之也。"

石延年自少以诗酒豪放自得，诗格奇峭，又工于书。欧阳修尝得南唐后主澄心堂纸，延年为书其《筹笔驿》诗，修藏为家宝，号称"三绝"。《筹笔驿》诗警句云"意中流水远，愁外旧山青"，朱熹亦称为极佳。又他诗如"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当时颇为伊洛中人所称。石介序其集，称其"与穆参军以古文自任"，而延年尤豪于诗，其诗诚如张舜民所谓"如饥鹰夜归、岩冰春拆，俊爽有余而不可寻绎"，足与苏舜钦抗手，宜欧阳修亦为之称赏不置也。

欧阳修在宋代文学界，有如韩愈之于唐，不仅诗之一端已也，然论宋诗者，莫不以矫昆体之功归于修。盖修以文学致通显，前之苏舜钦、梅尧臣赖以发挥光大，后之王安石、苏轼赖以奖诱称扬，故即以诗论，修实居于承先启后之地位。其诗以气格为主，豪迈敷腴，平易疏畅，视其文之偏于阴柔之美者，殆有过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称："欧公作诗，盖欲自出胸臆，不肯摹袭前人。亦其才高，不见牵强之迹。"殆非溢誉。王安石选四家诗，以李白、杜甫、韩愈及欧阳修并列，且以修居最前，诚推之至矣！叶梦得《石林诗话》云："欧公律诗意所到处，虽语有不伦亦不复问，而学之者往往遂失于快直，倾困倒廪，无复余地。然公诗如《崇徽公主手痕》诗：'玉颜自昔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中略）抑扬曲折，婉靡雄胜，字字不失相对，

虽昆体之工者亦未易此。”是又徒以平易视修诗者所当知也！

《邵氏闻见后录》云：“欧阳公喜韩退之文，皆成诵。刘原父戏以为韩文究，每戏曰：‘永叔于韩文，有公取，有窃取，窃取者无数，公取者粗可数。永叔《赠僧》云“韩子亦尝谓，收敛加冠巾”，乃退之送僧澄观“我欲收敛加冠巾”也；永叔《聚星堂燕集》云“退之尝有云，青蒿倚长松”，乃退之《醉留孟东野》“自惭青蒿倚长松”也，非公取乎？’”又陈善《扪虱新话》云：“韩退之与孟东野为诗友，近欧阳公复得梅圣俞，谓可比肩韩、孟，故公诗云：‘犹喜共量天下事，亦胜东野亦胜韩’也。盖尝目圣俞为诗老。”《邵氏闻见后录》亦称欧阳修自比韩退之，而以梅尧臣为孟郊，梅亦未必心服云。《扪虱新话》又曰：“欧阳公诗犹有国初唐人风气，公能变国朝文格，而不能变诗格，及荆公、苏、黄辈出，然后诗格极于高古。”欧阳于诗虽不能极于高古，然力矫昆体之失，其功要不可没。

与欧阳修并时而稍后者，有道学家之诗。邵雍居洛，安贫乐道，其诗出于白乐天，其失在浅俗少味。张载之诗颇偏于执拗，周敦颐则尚有逸趣。二程与王安石、苏轼同时，以诗而论，去王、苏远矣！大抵道学派之于文字，以说理为本，修辞为末，其俚质处，几于禅门之偈。欲绳以文学之定义，求其动人之美感，不可得也。

欧阳修门下，最以诗著名满天下者，人皆知为苏轼。视苏轼差前亦以诗鸣者，王安石是也。安石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含蓄，后于唐人诗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其律句之精严者，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远，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叶梦得《石林诗话》称之如此。黄山谷亦尝谓：“荆公之诗，暮年方妙。”张舜民云：“王介甫诗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执着而曾不可得。”清吴之振谓：“安石晚年遗情世外，其悲壮即寓于闲淡之中，独是议论过多，亦是一病。”王士祯则云：“衮公（欧阳修）之后，学杜、韩者，王文公（安石）为巨擘。七言长

句，盖欧阳公后劲，苏、黄前茅，特其妙处微不逮数公耳！”至如吴乔《围炉诗话》述贺裳《载酒园诗话》之言曰：“宋人惟介甫诗能令人寻绎于语言之外，当其绝诣，实自可兴可观，特推为宋人第一。”贺氏尝病梅、欧之平淡为粗直，独推重安石如此，是亦另具只眼者也。

王令与王安石为僚婿，吴之振《宋诗钞》存其《广陵集》。《四库总目提要》称之曰：“令才思奇轶，所为诗磅礴奥衍，大率以韩愈为宗而出入于卢仝、李贺、孟郊之间。”王安石最称赏之，卒年仅二十有八。

第五节　苏轼及其门下士

苏轼诗各体皆工，七古尤擅长，惟五律差逊。清王士祯称其七言长句之妙，自子美、退之后，一人而已。欧阳修见苏轼，自谓“老夫当放此人出一头地”，盖非独文也，唯诗亦然。沈德潜亦曰：“苏诗长于七言，短于五言；工于比喻，拙于庄语。”又极赞之曰：

> 苏子瞻胸有洪炉，金银铅锡皆归熔铸，其笔之超旷，等于天马脱羁，飞仙游戏，穷极变幻而适如意中所欲出，韩文公后又开辟一境界也。元遗山云：“只知诗到黄苏尽，沧海横流却是谁。”嫌其有破坏唐体之意，然正不必以唐人律之。苏门诸君子清才林立，并入寰中，犹之郝、莒已。

赵翼《瓯北诗话》亦曰：

> 大概才思横溢，触处生春，胸中书卷繁富，又足以供其左旋右抽，无不如志。其尤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

盖苏轼于诗、于文，两者殆占同等之地步，各具一种面目。从来论宋诗者，独于苏轼鲜有贬词焉，惟吴乔《围炉诗话》于宋诗备致苛评，其于苏轼亦病其“用作文之意，匠心纵笔而出之，去杜子美远

矣”，又述贺裳之说曰：“子瞻诗美不胜言，病不胜摘。大率多俊迈而少渊渟，得瑰琦而失详慎，多粗豪滑稽草率，又多以文为诗，然其才古今独绝。”此亦如当时张舜民之评，譬轼诗如“武库初开，戈矛森然，观者不觉神慑，若一一寻之，不无利钝。”盖轼之文学天才独绝古今，又不仅诗之一端为然也。

苏轼尝以诗文获谴，所谓“乌台诗案”是也。盖自王安石行新法，轼心不谓然，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言者无罪而闻者足戒也。而谗人见之，乃取其文字罗织锻炼，以成其罪。时轼方知湖州，遂逮赴御史台狱，诏李定、何大正等杂治之。其诗句中据为铁案者，如“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指为讥青苗，“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指为刺课士，“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指为斥盐政，“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指为非盐禁，“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指谓有不臣之心，卒赖神宗曲赦，得免于死。甚哉！才士以诗句贾祸一至于此，是诚文学史上之悲剧也已。

轼晚年谪居惠州，和陶潜诗殆半，清人诗话或评之曰：“陶诗多微至语，东坡学陶多超脱语，天分不同也。”惟其天分不同，故亦面目各异。惟轼之和陶，正亦不在面目之表，按《和陶诗》引云：“嗟夫！渊明不肯为五斗粟一束带见乡里小人，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虽然，子瞻之仕，其出入进退犹可考也，后之君子其必有以处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区区之迹，盖未足以论士也。”此文旧题苏辙作，据《梁溪漫志》，轼尝有所改定。此亦可以见其和陶之趣矣！

苏辙诗篇亦富，其格调次于轼，然亦清逸可诵，具柳州淡泊之趣。时与兄倡和，殊未见其才竭也。当时张耒《赠李德》诗有句云：“长公波涛万顷海，少公峭拔千寻麓。”二苏之异，亦犹之文耳，其在

豪放与谨严乎！

苏门六君子中，黄庭坚、陈师道二人，吕居仁奉之为江西派之领袖，当于后节述之。

张耒，故苏辙门下士也，诗文传于世者颇多。其诗矩式白居易而见知于苏轼。轼尝并称秦观、张耒曰："秦得吾工，张得吾易。"世谓工可致，易不可致，以耒为难云。又尝称之曰："汪洋冲淡，有一唱三叹之音。"盖能于平易中见风格云。

秦观之诗，王安石尝称其清新婉丽，有似鲍、谢。盖观长于词，亦尝自言其文铢两不差，但以华丽为愧耳。吕本中《童蒙训》则称其过岭以后诗高古严重，自成一家，与旧作不同云。其雷州诗八首，后人误编轼集中，不能辨别。盖未可以其取法鲍、谢，即以靡曼之音小之也。

晁补之诸体诗俱风骨高骞，一往俊迈，并驾秦、张之间，未易次其先后。苏轼称之曰："无咎雄健峻拔，笔力欲挽千钧。"盖于苏门诸子中，独以豪迈见长云。

李廌诗见称于苏轼曰："笔墨澜翻，有飞砂走石之势。"盖亦不羁之才。惜其诗湮没者多，清《四库》著录《济南集》八卷，殊未足考其诗格也。

"清江三孔"者，孔武仲、孔文仲、孔平仲，兄弟并有文名，苏轼亦尝与酬答。其诗武仲幽峭，文仲新奇，平仲则夭矫孤警，兼武、文二仲之长，吴之振《宋诗钞》均著录其诗云。

苏门有僧曰参寥子，名道潜，时与轼等倡和。其诗潇洒清远，惟乏含蓄。僧惠洪《冷斋夜话》、吴可《藏海诗诗话》谓其性褊，憎凡子如仇，盖亦傲僻寡合之流。当时诸诗僧皆不之及，虽惠洪亦未能与之抗手云。

惠洪撰有《冷斋夜话》，颇平章当代文士。其文俊伟胜于参寥，而诗则视之稍逊，说者谓其失在求名过急。《冷斋夜话》颇有假托标

榜之处，然其诗虽边幅苦狭而清新有致，以词藻出入于苏、黄之间，诚亦诗僧之佼佼者。吴之振称之曰："洪诗雄健振踔，为宋僧之冠。"盖其雄放处，或胜于参寥云。

第六节　黄庭坚

黄庭坚虽为苏门六君子之一，而独与苏轼齐名。吕本中述江西诗派，奉庭坚为鼻祖。此派诸人之诗，其不能无轩轾醇疵，姑置勿论，要亦可见庭坚在当时诗坛声势之伟大矣！罗大经《鹤林玉露》以黄诗与欧文并举，称为"江西诗文"，略云：

> 至于诗则山谷倡之，自为一家，并不蹈古人町畦。象山云："豫章之诗，包含欲无外，搜抉欲无秘，体制通古今，思致极幽眇，贯穿驰骋，工夫精到。虽未极古之源委，而其植立不凡，斯亦宇宙之奇诡也。开辟以来，能自表见于世若此者，如优钵昙华，时一现耳。"杨东山尝谓余云："丈夫自有冲天志，莫向如来行处行。"岂惟制行，作文亦然。如欧公之文、山谷之诗，皆所谓"不向如来行处行"者也。

黄诗源出杜甫，尤于甫之瑰奇绝俗处，具体而微，潘德舆《养一斋诗话》所谓"得老杜诗法之一节以名世"是也。是时苏轼以文章彪炳一世，庭坚出其门下，其格调之得于轼者，亦颇有迹象可寻。惟金人王若虚《滹南诗话》颇多扬苏抑黄之论，并有诗云："骏马由来不可追，汗流余子费奔驰。谁言直待南迁后，始是江西不幸时。"又云："戏论谁知是至公，蝤蛑信美恐生风。夺胎换骨何多样，都在先生一笑中。"前诗意谓黄已不可追苏，固不必俟江西派之末流乃见绌也。《滹南诗话》云："鲁直欲为东坡之迈往而不能，于是高谈句律，旁出样度，务以自立而相抗，然不免居其下也。（中略）世以坡公之过海为鲁直不幸，由明者观之，其不幸也旧矣。"此可谓前诗之注脚。后诗则以苏轼尝谓鲁直诗"如蝤蛑江瑶柱，格韵高绝，盘飧尽废，然不

可多食，多食则发风动气。”又庭坚尝有“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喻，非苏所屑道也，其贬抑庭坚甚力。其实苏、黄并以诗名，最能互相敬重，黄答苏诗有云：“我诗如曹郐，浅陋不成邦。公如大国楚，吞五湖三江。”苏亦称黄曰：“读鲁直诗，如见鲁仲连、李太白，不敢复论鄙事。虽若不入用，亦不无补于世也。”苏诗以豪荡纵横极其驰骋之大观，黄诗亦往往有不可控抑之处。若夫劲直沉着，则其所以表异于苏者，而其太过处则失之生疏。魏泰尝有句评黄诗云：“当其得玑羽，往往失鹏鲸。”盖讥其工于细而疏于大也。王若虚又谓：“鲁直开口论句法，便是不及古人处。”此皆巧诋苛绳之论。今按黄集诗篇，其气象万千足与苏轼抗手者，不一而足。杜甫尝谓“佳句法如何”，“为人性僻耽佳句”，则斤斤于句法亦未足为庭坚病也。

宋张戒《岁寒堂诗话》载戒与吕本中论黄诗之语，略谓：

> 往在桐庐见吕舍人居仁，余问：“鲁直得子美之髓乎？”居仁曰：“然。”“其佳处焉在？”居仁曰：“禅家所谓死蛇弄得活。”余曰：“活则活矣，如子美‘不见旻公三十年，封书寄与泪潺湲。旧来好事今能否，老去新诗谁与传？’此等句，鲁直少日能之。‘方丈涉海费时节，元圃寻河知有无。桃源人家易制度，橘州田土仍膏腴’此等句，鲁直晚年能之。至于子美‘客从南溟来’、‘朝行青泥上，’《壮游》、《北征》，鲁直能之乎？如‘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此等句，鲁直能到乎？”居仁沉吟久之曰：“子美诗有可学者，有不可学者。”余曰：“然则未可谓之得髓矣。”

按此段问答，如本中之说，可代表当时之崇奉黄诗者；如戒之说，则对于黄诗亦有相对之信仰，而庭坚之诗能得杜甫之一节，亦可于戒说见之矣。清王士祯云：“苏文忠公凌踔千古，独心折山谷之诗，数效其体。前人之虚怀如此，后世腐儒乃谓山谷与东坡争名，何其陋耶！山谷虽脱胎于杜，顾其天姿之高、笔力之雄，自辟庭户，宋

人作《江西宗派图》极尊之，配食子美，要亦非山谷意也。”又云：“从来学杜者，无如山谷。山谷语必己出，不屑稗贩杜语，后山、简斋之属都未梦见。”又谓：“朱少章诗话云：‘黄鲁直独用昆体工夫，而造老杜浑成之地，禅家所谓更高一着也。’此语入微，可与知者道，难为俗人言。”士祯之推尊黄诗，有如此者。姚鼐亦谓：“山谷刻意少陵，虽不能到，然其傲兀磊落之气，足与古今作俗诗者澡濯胸胃，导启性灵。”是故北宋诗坛苏、黄并称，岂无故哉！后来江西诗人奉为诗派初祖，诚以宋人对于一切学术好以地域分门户，而黄庭坚在苏门，既以诗见重于苏轼，又承苏轼之风，对于后进动辄奖诱，故其余风流韵之深入人心者，视苏轼反差胜焉，况其诗格又未必逊于苏，则领袖诗坛又何愧乎哉！

第七节　江西派

吕本中所作《江西宗派图》，自庭坚以降，计列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朋、洪刍、饶节、僧祖可、徐俯、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韩驹、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杨符、谢迈、夏倪、林敏功、潘大观、王直方、僧善权、高荷，合二十五人。《苕溪渔隐丛话》有何颉而无高荷，其中如陈师道、韩驹、潘大临、夏倪、二林、晁冲之、江端本、李彭、善权、高荷皆非江西人，故“江西诗派”云者，非以江西人为限也。其疏漏处，更有如刘克庄、张泰来所议者焉，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有云：

> 同时如曾文清（几）乃赣人，又与紫微公（本中）以诗往还而不入派，不知紫微去取之意云何。

张泰来《江西诗社宗派图录》云：

> 考绍兴初，晁仲石尝与范顾言、曾裘父同学诗于居仁，后湖居士苏养直歌诗清腴，盖江西之派别。坡公谓秦少章句法本黄子，夏均父亦称张彦实诗出江西诸人。范元实曾从山谷学

诗，山谷又有赠晁无咎诗："执持荆山玉，要我雕琢之。"彼数子者，宗派既同，而不得与后山之列何也？

《江西宗派图》所列诸人，庭坚以下，陈师道最著。师道亦苏门六君子之一也。其诗古调出入郊、岛之间，五言律诗较他体尤胜，往往规模杜甫之沉郁而失之僻涩，盖大体以杜甫为归。虽才力不逮苏、黄，而运思苦吟，决非浅尝者流所可同日语也。黄庭坚尝有诗曰："闭门觅句陈无己，对客挥毫秦少游。"此二人才思迟速之异也。叶梦得曰："世言陈师道每登览得句，即急归卧一榻，以被蒙首，谓之'吟榻'。家人知，即猫犬逐去，婴儿稚子亦皆抱寄邻家。"此形容其闭门觅句，良堪一噱。谈江西诗派，咸以师道与庭坚并举，或谓师道过于黄焉。此盖偏嗜之说，不可为训也。

宋人称扬陈师道者，如任渊所谓"读后山诗，似参曹洞禅，不犯正位，忌死语，非冥搜旁引，莫穷其用意深处"，又如刘克庄云："后山树立甚高，其议论不以一字假借人，然自言其诗师豫章公。或曰：'黄、陈齐名，何师之有？'余曰：'射较一镞，弈角一着，惟诗亦然。后山地位去豫章不远，故能师之，若秦、晁诸人则不能为此言矣。'此惟深于诗者知之。"

师道为诗规模杜甫，在江西派中良堪继武庭坚，非他人所可几及。惟明王世贞《艺苑卮言》曾力诋其学杜之失，至譬之为"点金成铁"，略谓："少陵有句云'昨夜月同行'，陈无己则云'勤勤有月与同归'；少陵云'暗飞萤自照'，陈则曰'飞萤元失照'；少陵云'文章千古事'，陈则曰'文章平日事'；少陵云'乾坤一腐儒'，陈则云'乾坤着腐儒'；少陵云'寒花只自香'，陈则云'寒花只白香'，一览可见。"

吕本中之诗，敖陶孙尝称其"如散圣安禅，自能奇逸"，其《诗派图》奉黄庭坚为初祖，且称黄诗得杜甫之髓。而曾季狸《艇斋诗话》则称其喜令人读东坡诗。本中论诗之说及其诗之佳句，见于《艇斋诗话》者甚多，如谓其论诗尝引《孙子》"始如处女终如脱兔"之论，

甚有禅味。此其所以自能奇逸欤！其所作《宗派图》,《艇斋诗话》亦谓:“尝见东莱,自言少时率意而作,不知流传人间,甚悔其作也!”盖其间本无诠次。若有诠次,则不应如此紊乱。且如四洪兄弟皆得山谷句法,而龟父不预焉,是亦疏之甚矣!陆游《渭南文集》有吕居仁集序一首,于其诗推崇甚至,节录于下:

> 宋兴,诸儒相望有出汉、唐之上者,迨建炎、绍兴间,承丧乱之余,学术文辞犹不愧前辈,如故紫微舍人东莱吕公者,又其杰出者也。公自少时既承家学,心体而身履之几三十年,仕愈踬,学愈进。因以其暇尽交天下名士,其讲习探讨,磨砻浸灌,不极其源不止。故其诗文汪洋闳肆,兼备众体,间出新意,愈奇而愈浑厚,震耀耳目而不失高古,一时学士宗焉。晚节稍用于时,在西掖尝兼直内庭,草赵丞相鼎制,力排和戎之议,忤秦丞相桧。秦公自草日历,载公制辞以为罪,而天下益推公之正。公平生所为诗既已孤行于世,嗣孙祖平又尽裒他文凡若干首为若干卷,而属某为序。某自童子时读公诗文,愿学焉。稍长未能远游,而公捐馆舍。晚见曾文清公,文清谓某乃君之诗渊源殆自吕紫微,恨不一识面,某于是尤以为恨,则今得托名公集之首,岂非幸欤!

南渡前后,诗人源出黄庭坚,而吕本中《宗派图》未列入者,尚有陈与义、曾幾二人。与义视本中差前,视元祐诸人稍晚,靖康以后,巍然独存。其诗源出豫章,而天分绝高,工于变化,风格遒上,思力沉挚,能卓然自辟蹊径。尝自言:“诗至老杜极矣,苏、黄复振之,而正统不坠、东坡赋才大,故解纵绳墨之外,而用之不穷。山谷措意深,故游泳玩味之余,而索之益远。要必识苏、黄之所不为,然后可以涉老杜之涯矣。”可谓善于剖析苏、黄之同异者矣。方回选《瀛奎律髓》,以杜甫为一祖,黄庭坚、陈师道及与义为三宗,是固一家门户之论。然就江西派言之,与义视师道殆亦未多让焉,刘克庄云:

"元祐后诗人迭起，不出苏、黄二体。及简斋始以老杜为师，建炎间避地湖峤，行万里路，诗益奇壮。造次不忘忧爱，以简洁扫繁缛，以雄浑代尖巧。第其品格，当在诸家之上。"得评如此，岂偶然哉？

曾幾工诗，陆游尝师事之。游称其诗以杜甫、黄庭坚为宗，魏庆之《诗人玉屑》则称其诗出于韩驹，驹固江西派中人也。《诗人玉屑》又载赵庚夫题几集曰："清于月出初三夜，淡似汤烹第一泉。咄咄逼人门弟子，剑南已见一灯传。"幾诗盖以清淡见长。欲知南宋四大家与江西派嬗变之迹，殆未可置幾而不论也！

第八节　南渡后四大家——陆、尤、范、杨

南渡后诗人称大家者，尤、杨、范、陆，而陆游为之弁冕。刘克庄称陆游学力似杜甫，又谓："放翁记问足以贯通，力量足以驱使，才思足以发越，气魄足以陵暴。南渡而下，故当为一大宗。"当游之时，则周必大对宋孝宗之问，比之于李白。又朱熹与徐赓载书中论及陆游，亦曰："放翁诗读之爽然，近代惟此人为有诗人风致。今诸家诗具在，可与游匹者谁也？"盖游之生平，有与杜甫类者。少历兵间，晚栖农亩，中间浮沉中外，在蜀之日颇多。其感激悲愤、忠君爱国之诚，一寓于诗。酒酣耳热，跌荡淋漓，至于渔舟樵径、茶碗炉熏、或雨或晴、一草一木，莫不著为歌咏，以寓其意。此与甫之诗，何以异哉？诗至万首，瑕瑜互见，评者谓："譬之深山大泽，包含者多，不暇剪除荡涤，非如守半亩之宫，一木一石，可屈指计数。"信然也。

游尝言："诗欲工，而工亦非诗之极。锻炼之久，乃失本指；斫削之甚，反伤正气。"故有《文章》一首云：

>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粹然无疵瑕，岂复须人为。君看古彝器，巧拙两无施。汉最近先秦，固已殊淳漓。胡部何为者？豪竹杂哀丝。后夔不复作，千载谁与期！

似此深识妙解，良非浅人所可领悟。明李东阳讥宋人于诗，但

一字一句对偶雕琢之工，而天真兴致未可与道，殆有所蔽欤。宋代其他诗人或有此失，要不可论于陆游。惟游之才情繁富，触手成吟，则其间利钝互陈，亦所不免。《四库总目提要》云：

> 游诗法传自曾幾，而所作吕居仁集序又称源出居仁，二人皆江西派也。然游诗清新刻露而出以圆润，实能自辟一宗，不袭黄、陈之旧格。刘克庄号为工诗，而《后村诗话》载游诗，仅摘其对偶之工，已为皮相。后人选其诗者，又略其感激豪宕、沉郁深婉之作，惟取其流连光景、可以剽窃移掇者，转相贩鬻。放翁诗派遂为论者口实。（中略）然其托兴深微、遣词雅隽者，全集之内指不胜屈，安可以选者之误，并集矢于作者哉？

清刘熙载评游诗云："放翁诗明白如话，然浅中有深，平中有奇，故足令人咀味。"盖剑南诗派自有其真，非浅学者所可藉口也。

尤袤诗，全集已佚。今传《梁溪遗稿》一卷，清尤侗所裒集，百存其一而已。元方回作袤诗跋云："中兴以来，言诗者必曰尤、杨、范、陆。诚斋时出奇峭，放翁善为悲壮，公与石湖冠冕佩玉，端庄婉雅。"则袤在当时，本与三人并驾齐驱，《四库总目提要》云："今三家之集皆有完本，而袤集独湮没不存，盖文章传不传，亦有幸不幸焉。然即今所存诸诗观之，残章断简，尚足与三家抗行。"

范成大以敷文阁待制帅蜀，自桂林入成都，有《四征小集》。陆游为之序，称其："素以诗名一代，故落纸墨未及燥，士女万人已更传诵，被之乐府弦歌，或题写素屏团扇，更相赠遗。"盖成大诗名与宦绩皆取重于时，两相得而益彰也。至杨万里序《石湖全集》则曰："公以文学材气受知寿皇，自致大用。（中略）至于大篇决流，短章敛芒，缛而不酿，缩而不窘。清新妩丽，奄有鲍、谢；奔逸儁伟，穷追太白。求其只字之陈陈，一倡之呜呜，而不可得也。今四海之内，诗人不过三四，而公皆过之无不及者。予于诗岂敢以千里畏人者，而于公独敛衽焉！"按万里与成大，同年进士也，成大先登庸而万里晚

达。万里为成大遗集作序时，尚自称“野客”，故其称颂成大或不能无溢誉也。《四库总目提要》于《石湖诗集》系以评曰：

> 今以杨、陆二集相较，其才调之健不及万里，而亦无万里之粗豪；气象之阔不及游，而亦无游之窠臼。初年吟咏，实沿溯中唐以下。（中略）自官新安掾以后，骨力乃以渐而遒。盖追溯苏、黄遗法，而约以婉峭，自为一家，伯仲于杨、陆之间，固亦宜也。

按成大虽毕生宦达，而集中田园杂兴诸作，颇能追挹储、韦疏旷之风。盖状物写景，是所长也。

杨万里立朝多大节，然其生平乃特以诗擅名。方回称其一官一集，每集必变一格。虽沿江西诗派之末流，不免有颓唐粗俚之处，而才思健拔，包孕富有，自为南宋一作手，非后来四灵、江湖诸派可得而并称。周必大尝跋其诗曰：“诚斋大篇短章，七步而成，一字不改，皆扫千军、倒三峡、穿天心、出月胁之语。至于状物姿态，写人情意，则铺叙纤悉，曲尽其妙，笔端有口，句中有眼。”万里亦尝自序其诗体之变化云：

> 始学江西诸君子，又学后山五字律，既又学半山老人七字绝句，晚乃学绝句于唐人。（中略）后官荆溪，忽若有悟，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然自得，时目为“诚斋体”。

南宋诗集传于今者，惟万里及游最富。游晚年为韩侂胄作《南园记》，得除从官。万里寄诗规之，有“不应李杜翻鲸海，更羡夔龙集凤池”句，故《四库总目提要》曰：“以诗品论，万里不及游之锻炼工细；以人品论，则万里倜乎远矣！”陆、杨二家长短，可即此数语判之。

第九节　南渡后别派诗人——朱熹、姜夔等

朱熹，宋代理学家后劲也，其诗殊未可与邵雍诸人摹拟禅家偈语者等量齐观。盖其雅正明洁，可于陆游以外自树一帜。明李东阳《怀麓堂诗话》云："晦翁深于古诗，其效汉魏，至字字句句、平侧高下亦相依仿。命意托兴，盖以经史事理播之吟咏，岂可以后世诗家者流例论哉？"然熹之于诗，尝自有说曰：

> 仆不能诗，平生侥幸多类此。然虽不役志于诗，而中和条贯，浑涵万有，无事模镌，自然声振，非浅学之士所能窥。此和顺之英华，天纵之余事也。

盖朱熹为学，源本于经，故其论诗也，亦以三百篇为极则。魏庆之《诗人玉屑》记其尝欲抄取经史诸书所载韵语，及《文选》汉魏古词，以尽乎郭景纯、陶渊明之所作，自为一编，附于三百篇、《楚辞》之后，以为诗之根本准则。又于其下二等之中择其近于古者，各为一编，以为之羽翼、舆卫。其不合者则悉去之，不使其接于耳目而入于胸次，要使方寸之中，无一字世俗言语意思，则其诗不期于高远而自高远矣。此其为说也，良亦倜乎远矣！

姜夔者，南宋一大词家也，然亦以诗与范成大、杨万里诸人相倡和。其诗亦简秀澹远，有《诗说》一卷，论作诗务以高妙为主。其诗稿自序云："尤延之先生为予言近世人士，喜言江西，温润有如范至能者乎？痛快有如杨廷秀者乎？高古如萧东甫、俊逸如陆务观，是皆自出机杼，亶有可观者，又奚以江西为？"是夔在当时，颇与诸大诗人相接纳。杨万里尝有绝句一首云："尤、萧、范、陆四诗翁，此后谁留第一功？新拜南湖为上将，更牵白石作先锋。"是夔之诗，亦万里所推重者也。夔自序又尝有说曰：

> 作诗求与古人合，不如求与古人异。求与古人异，不如不求与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与古人异而不能不异。

盖其论诗以精思独造为宗，故其诗亦运思精密，风格高秀，足以傲睨并世诸家。夔亦深于诗者，第为词名所掩耳。

尤袤语姜夔所云萧东甫，即杨万里以与尤、范、陆并举为“四诗翁”之萧千岩，又即罗大经《鹤林玉露》所称姜夔师事之萧䡵。万里尝序《千岩摘稿》曰：“余尝论近世之诗人，若范石湖之清新、尤梁溪之平淡、陆放翁之敷腴、萧千岩之工致，皆予所畏者。”是萧东甫亦名重一时之诗人，惜其诗不传于后耳。杨万里所云“南湖”，即张镃。著有《南湖集》，亦同时能诗者也。

是时永嘉学派诸子亦皆能诗。陈傅良号称学杜，与陈师道、陈与义相出入。叶适为晚唐体，已导四灵诗体之先河，徐照等尝师事适。《林下偶谈》云：“水心诗早已精严，晚尤高远。古调好为七言八句，语不多而味甚长，其间与少陵争衡者非一，而义理尤过之。”此则未免溢誉矣。薛季宣为学精于考证，不甚专心词翰，然于诗亦颇工七言，极踔厉纵横之致。陈亮才气雄毅，有志事功，后世鲜有论其诗者。

第十节　永嘉四灵与严羽

“永嘉四灵”者，徐照字灵晖、徐玑号灵渊、翁卷号灵舒、赵师秀号灵秀，皆永嘉人而能诗者也。

徐照为四灵之首。叶适作照墓志，称“其诗数百，琢思尤奇，皆横绝欻起，冰悬雪跨，使读者变掉憀栗，肯首吟叹，不能自已。然无异语，皆人所知也，人不能道耳”，所以推奖之者甚至。然适又尝谓：“进乎古人而不已，何必四灵？”盖照诗以清隽擅长，即亦不能无卑靡之病，当风会之升降，势有不得不然也。《四库总目提要》云：

> 四灵之诗，虽镂心钵肾，刻意雕琢，而取径太狭，终不免破碎尖酸之病。照在诸家中，尤为清瘦。

徐玑诗刻意雕琢，颇近武功一派。尝与徐照等论诗曰：“昔人以

浮声切响、单字只句计巧拙，盖风骚之至精也。近世乃连篇累牍，汗漫而无禁，岂能名家哉？"此可见其所从致力之端倪矣。

翁卷之诗，叶适称为自吐性情，靡所依傍。刘克庄尝赠以诗曰："非止擅唐风，尤于选体工。有时千载事，只在一联中。"徐玑亦有诗称之曰："五字极难精，知君合有名。磨砻双鬓改，收拾一篇新。"

赵师秀名居四灵之末，而诗为四灵之最。学晚唐而深有得于武功一派，专以炼句为工，而句法又以炼字为要。尝自言："一篇幸止有四十字，更增一字，吾末如之何矣！"按《梅涧诗话》，杜小山问句法于师秀，答曰："但能饱吃梅花数斗，胸次玲珑，自能作诗。"故其诗主于野瘦清逸，足以矫江西派粗犷之失。特其全事摹拟，不无琐碎之憾，此又四灵之通病也。宋陈世崇《随隐漫录》记曹东亩言曰："四灵诗如啖玉腴，虽爽不饱；江西诗如百宝头羹，充口适腹。"又《寒厅诗话》谓："四灵以清苦为诗，一洗黄、陈之恶气象、狰狞面，然间架太狭，学问太浅，更不如黄、陈也。"是皆比较持平之论。

严羽《沧浪诗话》之论诗也，超离尘俗，真若自有所得，而其所自作却少超拔警策之处。明李东阳尝谓："识得十分，只做得八九分。其一二分乃拘于才力，其沧浪之谓乎！"《四库总目提要》云：

> （羽）所自为诗，独任性灵，扫除美刺，清音独远，切响遂稀。（中略）志在天宝以前，而格实不能超大历之上。由其持"诗有别才，不关于学；诗有别趣，不关于理"之说，故止能摹王、孟之余响，不能追李、杜之巨观也。

此较李东阳之说，殆能道其所以然矣。

第十一节　江湖派与遗民诗

宋理宗宝庆初，钱塘书肆陈起能诗，凡江湖诗人俱与之善，刊《江湖集》以售。清《四库》著录《江湖小集》九十五卷，所录凡六十二家；《江湖后集》二十四卷，增录四十七家。当时所刊诸家诗，大抵皆

同时之人，随得随刊，殊无义例。惟宋季诗人姓名、篇什湮没不彰者，赖此传见于今，今之谈艺者亦可窥见所谓江湖派之面目耳。

按周密《齐东野语》云："宝庆间，李知孝为言官，与曾极景建有隙，每欲寻衅以报之。适极有春诗云：'九十日春晴日少，一千年事乱时多。'刊之《江湖集》中。因复改刘子翚《汴京纪事》一联云：'秋雨梧桐皇子宅，春风杨柳相公桥。'以为指巴陵及史丞相。及刘潜夫《黄巢战场》诗云：'未必朱三能跋扈，都缘郑五欠经纶。'遂皆指为谤讪，押归听读。同时被累者，如敖陶孙、周文璞、赵师秀及刊诗陈起，皆不免焉。"方回《瀛奎律髓》亦记此事，且谓刘克庄、敖陶孙皆缘此坐罪，陈起坐流配，劈《江湖集》版，并诏禁士大夫作诗。时当国者，史弥远也。迨弥远死，诗禁乃解。

"江湖派"云者，是时江湖游士，每好为吟咏，庸音杂体，不胜其敝。盖宋诗之衰，同于国运矣。其间惟刘克庄、戴复古、方岳尚可称。

刘克庄诗派近杨万里。大抵词病质俚，意伤浅露，然其清新独到之处，亦未可尽废。初年颇乐四灵刻琢之习，后乃自有所得。称其诗者，至谓："涉历老练，布置阔远，融合众作，自为一宗。"盖在江湖派中，诚亦夐乎不可尚已。

戴复古尝从学于陆游，以诗鸣江湖间凡五十年，尝自云："诗不可计迟速，每得一句，或经年而成。"盖亦苦吟求工，不能无四灵余习者。然清健轻快，无斧凿痕，精思研刻，实能自辟町畦也。

方岳诗文、四六皆见重于时，吴之振《宋诗钞》称之曰："诗主清新，工于镂琢，故刻意入妙则逸韵横流，其光怪足宝矣。"其在江湖派中，殆亦翛然俗外者也。

宋诗沦为江湖一派，已多五季衰飒之风。及端宗播迁，蒙元入主中国，诗人感宗社之化为丘墟，率以凄厉之调，写其悲愤之怀，殆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矣。其间屈指可数者，如文天祥、谢翱、谢枋得、刘辰翁、薛嵎、汪元量、林景熙、真山民。

文天祥诗格似少陵，具沉郁悲壮之概。读其诗，可以想见其人。《四库总目提要》引长谷真逸《农田余话》曰："宋南渡后，文体破碎，诗体卑弱。惟范石湖、陆放翁为平正，至晦庵诸子始欲一变时习，模仿古作，故有神头鬼面之论。时人渐染既久，莫之或改。及文天祥留意杜诗，所作顿去当时之凡陋，观《指南前、后录》可见。不独忠义贯于一时，亦斯文间气之发见也。"

谢翱以布衣为文丞相谘议参军，天祥卒，亡匿，所至辄感哭，故为诗颇有奇气。每语人曰："用志不分，鬼神将避之。"亦云刻苦矣。《宋诗钞》称其"古诗颇颉颃昌谷，近体则卓炼沉着，非长吉所及也"。

谢枋得诗淡而远，清寒入骨，《武夷山中》一首云："十年无梦得还家，独立青峰野水涯。天地寂寥山雨歇，几身修得到梅花。"可谓天地间妙文。

刘辰翁当贾似道柄国时，文章颇见重于世，《四库总目提要》称其"论诗评文，往往意取尖新，太伤佻巧。其所批点，如《杜甫集》、《世说新语》及《班马异同》诸书，今尚有传本，大率破碎纤仄，无裨来学。即其所作诗文，亦专以奇怪磊落为宗，务在艰涩其词，甚或至于不可句读，尤不免轶于绳墨之外。特其蹊径本自蒙庄，故惝恍迷离，亦间有意趣，不尽堕牛鬼蛇神。且其于宗邦沦覆之后，眷怀麦秀，寄托遥深，忠爱之忱往往形诸笔墨，其志亦多有可取者，固不必概以体格绳之矣"。

薛嵎，永嘉人，其诗亦不外四灵余习。有《云泉诗》一卷，《四库总目提要》谓："嵎之所作，皆出入四灵之间，不免局于门户。然尚永嘉之初派，非永嘉之末派。"

汪元量尝随三宫入燕，久之，为黄冠南归，往来匡庐、彭蠡间。其亡国之戚、去国之苦，间关愁叹之状，备见于诗。微而显，隐而彰，哀而不怨，欷歔而悲，甚于痛哭。时人称为"诗史"，比之杜少陵云。

林景熙诗多凄怨，其神妙不减刘长卿。《宋诗钞》云：“大概凄怆故旧之作，与谢翱相表里。翱诗奇崛，熙诗幽婉。”

真山民始末不可考，宋末窜迹隐沦，以所至好题咏，因传于世。或自呼“山民”，因以称之。《四库总目提要》论其诗曰：“黍离、麦秀，抱痛至深而无一语怼及新朝，则非惟其节至高，其安命知天，识量亦不可及。（中略）诗格出于晚唐，长短皆复相似。（中略）一丘一壑，足资延赏，要亦宋末之翘楚也。”

第五章　宋之词

第一节　词之由来

词起于中唐，大流行于晚唐五代，至宋而极盛。毛晋《宋六十一名家词》序有云：

> 夫词至宋人而词始霸，曼衍繁昌。（中略）各体始大备。其人韶令秀世，其词复鲜艳殢人。有新脱而无因陈，有圆倩而无沾滞，有纤丽而无冗长，有峭拔而无钩棘。一时以之赓和名家而鼓吹中原，肩摩于世云。

盖词之独盛于宋，犹诗之大昌于唐。近人胡适论词之历史有三大时期，而以自晚唐至元初为词之自然演变时期，故词之极盛于两宋实文学演变之自然过程，即其君主之提倡、乐工之需求、文士之竞尚。莫非随自然之支配，各为文学演变之一种原因而已。

自唐以迄宋初，词家作品皆为小令。旧说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为中调，九十一字以上为长调。其实唐人长短句皆名小令，每一小令可演为中调或长调，不必因字数而强为区分也。演小令为中调、长调，而系之以"近"、"犯"、"慢"、"引"，则宋词体制上之进化，显然与晚唐五代不同者也。如《浪淘沙》乃五代小令，每阕五十八字，而宋有《浪淘沙慢》，至一百三十三字。此外《江城子》则有《江城子慢》、《浣溪沙》则有《浣溪沙慢》、《卜算子》则有《卜算子慢》、《西江月》则有《西江月慢》，皆以每阕字数之加多，见其体制上之演进，而慢词与小令遂为词体之分疆矣。

宋初晏氏父子师法南唐，尚无慢词。创慢词者，柳永也。《乐府余论》云：

> （慢词）盖起于宋仁宗朝，中原兵息，汴京繁庶，歌台舞席，

竞赌新声。永以失意无俚，流连坊曲，遂尽取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使人传习，一时动听，散播四方。其后苏轼、秦观、黄庭坚等相继有作，慢词遂盛。

北宋文学史上之柳永，盖未可蔑视，后当详论。

又按宋王灼著《碧鸡漫志》，详述曲调源流。前七条为总论，述古初至唐、宋声歌递变之由；次列凉州、伊州、霓裳羽衣曲、甘州、胡渭州、六幺、西河长命女、杨柳枝、喝驮子、兰陵王、虞美人、安公子、水调歌、万岁乐、夜半乐、何满子、凌波神、荔枝香、阿滥堆、念奴娇、清平乐、雨淋铃、菩萨蛮、望江南、麦秀两歧、文溆子、后庭花、盐角儿，凡二十八条，一一溯其得名之缘起，与其渐变宋词之沿革。盖三百篇之余音，至汉而变为乐府，至唐而变为歌诗，及其中叶，词亦萌芽。至宋而歌诗之法渐绝，词乃大盛。其时士大夫多娴音律，往往自制新声，渐增旧谱，故一调或至数体，一体或有数名，其目几不可殚举，又非唐及五代之古法。灼作《碧鸡漫志》，就其传授分明可以考见者，核其名义，正其宫调，以著倚声所自始。今其书具传，欲详知词调源流，可寓目也。

第二节　宋词之概观

对于宋词作分析研究而施以概括评论，可如下列各方法：

（甲）以时间分北宋南宋　周济曰："两宋词各有盛衰，北宋盛于文士而衰于乐工，南宋盛于乐工而衰于文士。"又曰："北宋主乐章，故情景但取当前，无穷高极深之趣；南宋则文人弄笔，彼此争名，故变化益多，取材益富。然南宋有门径，有门径，故以深而转浅；北宋无门径，无门径，故似易而实难。"

（乙）以时间分初盛中晚　清尤侗序《词苑丛谈》云："唐诗有初、盛、中、晚，宋词亦有之。（中略）约而次之，小山、安陆，其词之初乎；淮海、清真，其词之盛乎；石帚、梦窗，似得其中；碧山、玉田，风

斯晚矣。唐诗以李、杜为宗，而宋词苏、陆、辛、刘有太白之风，秦、黄、周、柳得少陵之体，此又画疆而理，联骑而驰者也。”

（丙）以词作品之派别分家数　周济《宋四家词选》以周邦彦、辛弃疾、王沂孙、吴文英为宋词四领袖，以余人为附庸，犹之张为列唐代诗人为主客图也。其目录如下：

周邦彦

晏　殊	韩　缜	欧阳修	晏几道	张　先
柳　永	秦　观	贺　铸	韩元吉	

辛弃疾

徐昌图	韩　琦	范仲淹	苏　轼	晁补之
洪　皓	姜　夔	陆　游	陈　亮	赵以夫
陈经国	方　岳	蒋　捷		

王沂孙

林　逋	毛　滂	潘元质	吕本中	康伯可
范成大	史达祖	张　炎	黄公绍	练恕可
赵　珏				

吴文英

张　升	赵令畤	王安国	苏　庠	陈　克
严　仁	高观国	陈允平	周　密	王武子
黄孝迈				

（丁）以其演变之方向分段落　近人胡适分宋词为三段落，为歌者之词、诗人之词、词匠之词。苏东坡以前，乃教坊乐工与娼家妓女歌唱之词；东坡至稼轩后，乃诗人之词；白石以后直至宋末元初，乃词匠之词。

按胡氏以晚唐至元初为词之自然演变时期，又于此时期内分三段落，而两宋三百年实跨有之，是不啻为宋词分也。兹依胡氏之三段落，参酌周氏之四家，略述两宋之词，其演变可概见也。

第三节　宋初词人

宋王灼《碧鸡漫志》云："唐末五代文章之陋极矣，独乐章可喜，虽乏高韵，而一种奇巧，各自立格，不相沿袭。（中略）国初平一宇内，法度礼乐寖复全盛，而士大夫乐章顿衰于前日，此尤可怪。"循是说也，则词之第一段落歌者之词，视五代有逊色矣。按王灼论宋词，尊苏轼而抑柳永，于长短句中杂见滑稽语者，以为嫚戏污贱，古所未有。故其文学观念，乃贵族的而非平民的，宜其讥薄柳永，而以为宋初乐章衰于前日也。

胡适以为："此时代之词尚有一特点，即接近平民文学，而采用乐工、娼女之语调也。"按此即王灼之所以叹为衰于前日，而不知其正演而渐进，由贵族文学变而为平民文学也。故柳永浪迹娼寮，其作品悉被弦管。晏几道自序其词，亦云然。或未必荐诸郊祀，取重于朝耳，安可谓乐章顿衰于前乎？

沿五代余波而表表著声于词林者，要莫先于晏殊。冯煦云："词至南唐，二主作于上，正中和于下，诣微造极，得未曾有。宋初诸家靡不祖述二主。宪章正中（中略）晏同叔（殊）去五代未远，馨烈所扇，得之最先，故左宫右徵，和婉而明丽，为北宋倚声家初祖。"《四库总目提要》亦云："殊赋性刚峻，而词语特婉丽。"胡适谓晏殊之词，于闲雅富丽之中，带凄婉之意味，风格自高。盖不仅胎息南唐二主，直堪步武晚唐温、韦也。

承五代凄婉之敝而易以通俗之变者，是惟柳永。词至柳永，始衍小令为慢词，有缠绵之致，于声律能谐。叶梦得《避暑录话》云："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可见其流传之广，而见重于教坊乐工之甚矣。《四库总目提要》云："词本管弦冶荡之音，而永所作旖旎近情，故使人易入。虽颇以俗为病，然好之者终不绝也。"周济曰："耆卿（永）为世訾謷久矣，然其铺叙宛委，言近意远，森秀幽淡之趣在

骨。”刘熙载曰：“耆卿词细密而妥溜，明白而家常，善于叙事，有过前人。惟绮罗香泽之态所在多有，故觉风斯未上耳。”冯煦则谓：“耆卿词曲处能直，密处能疏，奡处能平，状难状之景、达能达之情而出之以自然，自是北宋巨手。然好为俳体，词多媟黩，有不仅如《提要》所云‘以俗为病’者。《避暑录话》谓：“‘凡有井饮水处即能歌柳词’，三变之为世诟病，亦未尝不由于此。盖与其千夫竞声，毋宁白雪之寡和也。”按永之词为世诟病，特以其浅近卑俗耳。王灼云：“柳耆卿《乐章集》（中略）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予尝以比都下富儿，虽脱村野而声态可憎。”永尝作《戚氏》一曲，有赞以诗者曰：“《离骚》寂寞千年后，《戚氏》凄凉一曲终。”而王灼则曰：“柳何敢知世间有《离骚》！”意以为柳氏之词，未可上追《离骚》也。其实文学作品果可以平民化，则其为效亦至宏远。《诗经》十五国风，莫非出于村野者也，何独柳永之词，遂有甚可憎之声态，不能见重于批评家欤？故王灼之说未足为训也。

柳永夺官后失意无聊，流连坊曲，往往不能珍重下笔，故其恶滥可哭者居多，然如《雨霖铃》一阕，要是词林绝唱。永以慢词擅名，偶作小令，亦有风格遒尚者，如《少年游》一阕有云：“长安古道马迟迟，高柳乱蝉栖。夕阳岛外，秋风原上，目断四天垂。（下略）”仍不失晚唐面目。

欧阳修之词秀逸委婉，与晏殊同出南唐，而渐开苏轼疏隽一派，亦如其诗文之承先启后也。冯煦曰：“宋初大臣之为词者，寇莱公、晏元献、宋景文、范蜀公与欧阳文忠，并有声艺林。然数公或一时兴到之作，未为专诣，独文忠与元献学之既至，为之亦勤，翔双鹄于交衢，驭二龙于天路，且文忠家庐陵而元献家临川，词家遂有西江一派。其词与元献同出南唐，而深致则过之。宋至文忠，文始复古，天下翕然师尊之，风尚为之一变。即以词言，亦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本传云：‘超然独骛，众莫能及。’独其文乎哉？”清姚椾尝

论欧阳修之文擅阴柔之美，盖其文情韵独胜，于其词尤可征焉。

欧阳修词缠绵悱恻者居多，盖仍是《花间》一派，故其词往往与冯延巳相溷。而当时奸党，尝因《望江南》双调一阕，诬修盗甥。陈质斋云："欧阳公词多有与《花间》相溷，鄙亵之语厕其中，当是仇人无名子所为也。"罗长源亦云："公词之浅近者，前辈多谓是刘烨伪作。"按欧词今有两种传本，一曰《六一词》，汲古阁本；一曰《醉翁琴趣外篇》，双照楼覆宋本。两种内容颇异，《琴趣》中艳词较多。陈、罗诸公以欧公为一代儒宗，不应有侧艳之语。其实北宋仁宗以后，道学方萌其端，士大夫偶制小令，付教坊被之管弦，殊不足为怪。曾慥纂《乐府雅词》，自序谓："当时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今悉删除。"然慥所收八十余首内，有"水晶双枕傍有堕钗横"，又有"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等词，莫非艳语也？何必为欧阳修讳耶！其写景之词，如《采桑子》赋颍州西湖十阕最称隽永。暮年所作，晚景颓唐，见于辞表，无复缘情绮丽之致。其运诗意于歌曲，已渐开苏轼诗人之词之先路矣。

同时韩琦、范仲淹，均以勋业取重当世，偶亦填词，如范之《御街行》、韩之《点绛唇》，皆极有情致。范有《渔家傲》一阕，则能传其悲壮之概，辛弃疾之先导也。

欧阳修之友，如梅尧臣、苏舜钦、石延年，皆间作小词。其后进如韩缜、司马光、王安石，词皆不多，而各有可传诵者。王安石尤能脱尽"花间"习气，承欧阳修之后，寓其不可羁群、独往独来之个性于长短句中。假使更能纵情于此，则诗人之词，殆不必让苏轼作领袖矣。故词学史上之王安石，亦欧后苏前之重要人物也。

张先与柳永齐名而享年独久，生于太宗淳化元年，卒于神宗元丰元年，年八十九，与苏轼相及。苏轼赠诗所谓"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即其人也。按《苕溪渔隐丛话》引苏轼语云："吾昔自杭移高密，与杨元素同舟，而陈令举、张子野皆从余。过李公择

于湖,遂与刘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词闻于天下,作《定风波令》。"轼又尝题其词集云:"子野诗笔老妙,歌词乃其余波耳。"然则先亦非专精于词者,其词乃独见称于世俗,时人或以之右于柳永。晁补之则曰:"人以为子野不及耆卿富。而子野韵高,是耆卿所乏处。"盖先之词格虽不可谓甚高,但不如柳永之近于俚俗,故李端叔评之曰:"子野词才不足而情有余。"周济亦曰:"子野清出处、生脆处味极隽永,只是偏才,无大起落。"《古今诗话》载:有客谓子野曰:"人皆谓公张三中,即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也。"公曰:"何不目之为张三影?"客不晓,公曰:"'云破月来花弄影','娇柔懒起,帘压卷花影','柳径无人,堕风絮无影',此余平生所得意也。"此三词,尤以"云破月来花弄影"最脍炙人口,盖《天仙子》调也。尚有《青门引》一阕,末句作"隔墙送过秋千影";《木兰花》一阕,末句作"无数杨花过无影"。皆清脆可喜。《遁斋闲览》又载宋祁尝过张先家,遣将命者曰:"尚书欲见'云破月来花弄影'郎中。"先内应曰:"得非'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耶?"先擅名于词之佳话,有如此者。

宋祁之于词,亦如欧阳修之以余力游戏为之,而李端叔称之曰:"风流闲雅,超出意表。"即其"红杏枝头春意闹"一语可见也。

第四节　苏轼及其门下词人

苏轼之词,在当时颇能容纳众流,自开新派,胡适尊之为"诗人之词之开山祖"。若论其渊源,则气味清隽似欧阳修而雄健过之,铺陈曼衍似柳永而奔放过之,其作品类能充分抒摅其怀抱,非复音律所能拘束。晁补之曰:"东坡居士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此种体势,可以《念奴娇·赤壁怀古》一阕为代表。

王灼《碧鸡漫志》于北宋词人,抑柳永而崇苏轼,尝云:"长短句

虽至本朝盛，而前人自立与真情衰矣。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今少年妄谓东坡移诗律作长短句，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虽可笑，亦毋用笑也。”

《吹剑续录》云：“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柳七？’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倒。”苏词之不同柳永，幕士之说，殆为定论。词之领土，由是而大拓，不仅儿女聚散之私情，可藉以陶写已也。故刘熙载曰：东坡词“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盖词至苏轼，一洗绮罗香泽之态，使人登高望远，举首浩歌，超乎尘埃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柳氏为舆台矣。

苏轼之小令，亦颇以韶秀隽永擅长，如《卜算子》一阕，无异晏氏父子、欧阳修诸作。黄庭坚称其“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东坡乐府篇帙甚富，美不胜收，世所传诵者，尚有《洞仙歌》、《水调歌头》等阕。

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皆能词，而黄庭坚与秦观各擅所长，然与苏轼之词不类，晁、张更无论矣。

黄庭坚之词，喜为曲中俚语。盖当时之软平勾领，往往杂以方言俗语，今日多不可解。故论黄词者，类皆訾其粗俗，《四库总目提要》评之云：“今观其词，如《沁园春》、《望远行》、《千秋岁》第二首、《江城子》第二首、《两同心》第二首、第三首、《少年心》第一首、第二首、《丑奴儿》第二首、《鼓笛令》四首、《好事近》第三首，皆亵诨不可名状。至于《鼓笛令》第三首之用‘䠞’字，第四首之用‘尿’字，皆字书所不载，尤不可解。”故当时晁补之讥其所作词“不是当行家语，乃着腔子唱好诗”。按庭坚富有创作天才，故于诗能自成一派，其于词之喜用曲中俚语，盖亦别开风气，本诸柳永而加厉焉耳。如《卜算

子》词有云："要见不得见，要近不得近。试问得君多少怜，管不解多于恨。"犹其差雅驯者也。

陈师道《后山诗话》尝云："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耳，余人不逮也。"冯煦曰："其实黄非秦匹也，若以比柳，差为得之。盖其得也，则柳词明媚，黄词疏宕，而亵诨之作，所失亦均。"黄词之近于柳永者，其佳处为疏宕，即晁补之所谓"着腔子唱好诗"也。补之又尝称其"小词固高妙"，如《采桑子》词有云："樱桃着子如红豆，不管春风归，闻道开时，蜂惹香须蝶惹衣。"则其韶秀又不减秦观也。

秦观之词以婉约胜，神韵独高，《四库总目提要》云："观诗格不及苏、黄，而词则情韵兼胜，在苏、黄之上。流传虽少，要为倚声家一作手。"盖观虽名列苏门，而词派遥挹《花间》，近规二晏，与苏轼之雄健豪放迥异。晁补之云："近来作者，皆不及少游。如《寒景》词云：'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虽不识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语。"蔡絛《铁围山丛谈》载：观女婿范温"尝预贵人家会，贵人有侍儿，善歌秦少游长短句，坐间略不顾温及酒酣欢洽，始问此郎何人。温遽起叉手而对曰：'某乃"山抹微云"女婿也。'闻者多绝倒。"故叶梦得称观曰："善为乐府，语工而入律，知乐者谓之作家歌。"按所谓"山抹微云"者，观有《满庭芳》词，开首云："山抹微云，天粘衰草。"当时被之管弦，至今犹脍炙人口者也。

蔡伯世云："子瞻辞胜乎情，耆卿情胜乎辞。辞情相称者，惟少游而已。"此言秦词能惩柳、苏二家之失也。冯煦则更进而论次其高下，以为："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得之于内，不可以传。虽子瞻之明隽，耆卿之幽秀，犹若有瞠乎后者，况其下耶？"又曰："少游以绝尘之才，早与胜流，不可一世，而一谪南荒，遽丧灵宝，故所为词寄慨身世，闲雅有情思，酒边花下，一往而深，怨悱不乱，悄乎得《小雅》之遗。后主之后，一人而已。"综而论之，观之小令尚不失《花间》面目，得于南唐后主者尤多；其慢词则明媚似柳永，而婉

约过之。其词格与黄庭坚固分道扬镳，即苏轼亦未能使之同化也。

晁补之之所为词，冯煦以为无苏轼之高华而沉咽过之，陈直斋以为佳者不逊于秦、黄。补之于秦、黄诸人之词，尝致品题，可知其于此事特深。惟其天才稍逊，其词亦有不事雕琢之趣，故集中虽游戏小词，亦不作绮艳语。

张耒之词，传于今者仅有《风流子》、《少年游》、《秋蕊香》三首。《苕溪渔隐丛话》云："文潜官许州，喜营妓刘淑，作《少年游》，又为《秋蕊香》寓意。元祐诸公皆有乐府，唯张仅见《风流子》及此二词。味其句意，不在诸公之下矣。"

陈师道亦游苏轼门下，《苕溪渔隐丛话》云："后山自谓他文未能及人，独于词不减秦七、黄九，其自矜如此。"然陆游则有说曰："陈无已诗妙天下，以其余作词，宜其工矣。顾乃不然，殆未易晓。"师道所自矜者，而游评之如此，何哉？

《复斋漫录》载晁无咎玉山过彭门，而无已废居里中，无咎出小鬟舞《梁州》佐酒，无已作《减字木兰花》词，有云："娉娉袅袅，芍药梢头红样小。舞袖低垂，心到郎边客已知。"无咎云："人疑宋开府铁石心肠，及为《梅花赋》清腴艳发，殆不类其为人。无已清适，虽铁石心肠不至于开府，而此词清腴艳发，过《梅花赋》矣。"

苏轼以后，词人辈出，其足与秦观抗衡者，厥惟贺铸。同时文士，颇有激赏其词者，如张耒云："贺铸《东山乐府》，妙绝一世。其盛丽如游金、张之堂，妖冶如揽嫱、施之袪，幽索如屈、宋，悲壮如苏、李。"黄庭坚尝赠以诗云："能道江南肠断句，只今惟有贺方回。"贺以《青玉案》一词擅名，其词有云："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贺少为武弁时作此词，时人因呼为"贺梅子"。大抵贺词风格与秦观为近，而造语秾丽，笔力遒劲，两者兼而有之。盖能熔景入情，是其所长也。

同时能词者，有程垓、李之仪、毛滂、谢逸、周紫芝、赵令畤、王

诜、王观等。程垓为苏轼中表之戚，其词颇有可观，冯煦称："其凄婉绵丽，与草窗所录《绝妙好词》家法相近，故是正锋。虽与子瞻为中表昆弟，而门径绝不相入。"李之仪之词，不脱《花间》本色，冯煦谓其"长调近柳，短调近秦，而均有未至。"毛滂尝以《惜分飞》词见奖于苏轼，轼为之延誉，滂以得名。谢逸之词温雅有致，盖于此事蕴酿甚深。周紫芝之词清丽婉曲，饶自然之趣。赵令畤为宋宗室，王诜为贵戚，皆尝与苏轼相酬答。赵词颇有传诵人口者，题《会真记》之《蝶恋花》诸阕是也。王词清丽幽远，黄庭坚称其工在江南诸贤季孟之间。王观之词，在当时流传殊盛，以"冠柳"名集。贬之者谓其风格不高，盖受柳永之影响甚深。此外尚有晁冲之、李廌、杜安世、朱服、刘泾、章楶等。王安石之弟安国、子雱及苏轼之子过，皆有传诵人口之作。此时期大抵自歌者之词渐变于诗人之词，而能望苏轼项背者，殆难得其人。

第五节　周邦彦与宋徽宗

周邦彦之词，集北宋大成，开南宋各派，诚宋代词坛重要人物。盖宋词经柳永衍其体制而慢词大盛，经苏轼扩其意境而词与诗有同样之效用，至是而周邦彦起。《宋史·文苑传》称："(邦彦)疏隽少检，不为州里推重。(中略)好音乐，能自度曲，制乐府长短句，词韵清蔚。"盖邦彦具有音乐的文学之天才，承北宋诸大词人之后，兼取众长，颇能运诗心以赴音律。其雄健横放或不及苏轼，而下字用韵皆有法度，富艳精工，善于铺叙，要为邦彦独诣之奥，确能兼柳永之长而有之也。自来论邦彦者，如陈郁《藏一话腴》云："美成号清真，二百年来，以乐府独步。贵人学士、市侩妓女，皆知美成词为可爱。"楼钥云："清真乐府播传，风流自命，顾曲名堂，不能自已。"陈直斋云：美成词"多用唐人诗语檃括入律，浑然天成，长调尤善铺叙，富艳精工，词人之甲乙也。"张炎云：美成词"浑厚和雅，善于融化诗

句”。沈义父云:“作词当以清真为主,(中略)下字运意,皆有法度。”清周济辑《宋四家词选》、戈载辑《宋七家词选》,皆以邦彦为魁。周济曰:“清真集大成者也。”戈载曰:“其意淡远,其气浑厚,其音节又复清研和雅,最为词家之正宗。”其推尊可谓至矣!至如彭孙遹云:“美成词如十三女子,玉艳珠鲜,政未可以其软媚而少之也。”此则可知其显然与苏轼分道扬镳者也。至如王国维云:“美成深远之致,不及欧、秦。惟言情体物,穷极工巧,故不失为第一流之作者。但恨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耳。”此则未免求全之责矣!

徽宗朝邦彦官汴都时,尝以词遭贬斥,按《贵耳集》载:“道君幸李师师家,偶周邦彦先在焉,知道君至,遂匿于床下。道君自携新橙一颗,云江南初进来,遂与师师谑语。邦彦悉闻之,檃括成《少年游》云云。他日师师歌此词,道君问谁作,师师奏云周邦彦词。道君大怒,宣谕蔡京:‘周邦彦职事废弛,可日下押出国门。’隔一二日,道君复幸李师师家,不见师师,问其家,知送周监税。坐久至更初,李始归,愁眉泪睫,憔悴可掬。道君大怒云:‘尔往那里去?’李奏:‘妾万死,知周邦彦得罪押出国门,略致一杯相别,不知官家来。’道君问:‘曾有词否?’李奏云:‘有《兰陵王》词。’即‘柳阴直’者是也。道君云:‘唱一遍看。’李奏云:‘容臣妾奉一杯歌此词,为官家寿。’曲终,道君大喜,复召为大晟乐正。”《少年游》、《兰陵王》两词,皆《清真集》中绝唱也。

词至周邦彦,虽渐已着意于炼字琢句,谐音协律,然终不失为诗人之词者。盖其天才特高,并非南宋吴文英、周密诸人所可企及者。近人胡适谓:“周邦彦为音乐家而兼诗人,故其词音调谐美,情旨浓厚,风趣细腻,为北宋一大家。”邦彦词中常用唐人诗句,而融化浑成,无斧凿痕可寻。此可见其渊博,未可漫以颇偷古句而讥之也。

宋徽宗虽亡国之君而雅善制词,其词可分前、后两期,在帝位

时为前期，北狩后为后期。前期为绮丽闲适之帝王生活，后期为颠沛凄凉之俘虏生活。其卷纾崇圯，大抵同于南唐李后主而尤加甚焉，其天才视李后主亦无多让。吴曾《能改斋漫录》称徽宗尝为《探春令》甚工，其词有云："清歌妙舞从头按，等芳时开宴。记去年对着东风，曾许不负莺花愿。"又如："龙楼一点玉灯明，箫韶远，高宴在蓬瀛。"皆其前期之作，从猥红倚翠中来者，至如北狩后，见杏花作《燕山亭》词，有云："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中略）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此则哀情哽咽，仿佛李后主"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之语，令人不忍卒读。

按宋代文学，往往得君主操持领袖于上。北宋之词，前有仁宗、后有徽宗，国运至徽宗而中斩。词派至徽宗时之周邦彦而集大成，徽宗自身亦雅擅词才。则当时之风靡一世，可概见矣。

是时词人辈出，殆不胜偻指计。其尤著者，有晁端礼、万俟雅言、吕渭老、向子諲、蔡伸、方千里、杨泽民、曹组、叶梦得、朱敦儒、王灼等。

晁端礼晚以蔡京荐为大晟府协律，不克受而卒。有《鸭头绿》一阕，胡仔称其清婉，堪与东坡《水调歌头》比肩。

万俟雅言自号词隐，崇宁中充大晟府制撰。黄升称其词曰："发妙音于律吕之中，运巧思于斧凿之外。平而工，和而雅。"又曰："雅言之词，词之圣者也。"则过誉矣。

吕渭老有声宣和、靖康间，赵师秀称其词婉媚深窈，视美成、耆卿伯仲。其《东风第一枝·咏梅》，或谓可与苏轼《西江月》并称。杨慎亦谓其诸调佳处，不让少游。盖周邦彦同时俊也。

向子諲自号芗林居士，胡致堂称其"步趣苏堂而哜其胾"。其《减字木兰花·咏瑞香》有云："真相妙质，不耐世间风与日。"毛子晋甚称之。盖不假雕琢而语挚情真，是其所长也。

蔡伸尝与向子諲同官，屡有赠子諲词。其词视子諲稍逊，而才致笔力亦略相伯仲，其婉约处亦未遽逊于子諲也。

方千里、杨泽民各有和周邦彦《清真词》一卷，时人尝合为《三英集》行世。盖邦彦提举大晟乐府，每制一调，名流辄依律赓和，方、杨二氏皆和其全词。《四库总目提要》谓千里和清真词"字字奉为标准"，殆不过亦步亦趋之流耳，然亦可见周词之风靡一世矣。

曹组以词见宠于徽宗，徽宗曾赏其《如梦令》之"风动一枝花影"、《点绛唇》之"暮山无数，归雁愁边去"。王灼《碧鸡漫志》云："有人过钧容班教坊，问曰：'某宜何歌？'必曰：'汝宜唱曹元宠。'"斯可见其词名之震于当世矣。惟王灼殊不重其词，讥其与柳永同科。

叶梦得之词，毛子晋称其"绰有林下风，不作柔语殢人，真词家逸品也"。盖在当时，其词颇与苏、柳并传，故关注曰："其词甚婉丽，绰有温、李之风。晚岁落其华而实之，能于简淡时出雄杰，合处不减靖节、东坡之妙。"

朱敦儒当南渡前后，词名藉甚，黄升称其"天资旷逸，有神仙风致"。《贵耳集》云："朱希真，南渡以词得名。词有'插天翠柳，被何人推上，一轮明月'之句，自是豪放。赋梅词'横枝消瘦一如无，但空里疏花数点'，语意奇绝，如不食烟火语。"盖希真在词坛，虽不能卓然自成大家，然其天资旷远，词旨亦不可以绳墨拘束，实能承苏轼之余绪而启辛弃疾之先路。特其人乐天自适，晚年绝意于仕进，遂以隐德掩词名耳。

王灼著《碧鸡漫志》，论北宋词人最崇苏轼，而自制之词乃不能稍望苏轼项背。其书颇详于曲调源流，盖亦熟于词林掌故者也。

第六节　女词人李清照

女词人李清照，不仅擅声两宋，实为中国文学史上有数之人物。世颇传诵其《声声慢》一词，《鹤林玉露》云："起头连叠七字，以

一妇人乃能创意出奇如此。"《贵耳集》云："易安秋词《声声慢》，此乃公孙大娘舞剑手，本朝非无能词之士，未曾有一下十四叠字者。后叠又云'到黄昏点点滴滴'，又使叠字，俱无斧凿痕。'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黑'字不许第二人押，妇人中有此文笔，殆间气也！"《琅环记》载清照作《醉花阴》词函致其夫赵明诚，明诚叹赏，苦思求胜之，乃忘寝食，三日夜得五十阕，杂清照作以示友人陆德夫。德夫玩之再三，说只有"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三句绝佳。又《苕溪渔隐丛话》云："近时妇人能文词如李易安，颇多佳句。如云'绿肥红瘦'，此语甚新。"黄升又称其"宠柳娇花"之语甚奇俊，前此未有能道之者"。盖清照之词，遣词创格，迥异凡流，直不啻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奚止求之于巾帼为不可多得哉！

清照于北宋诸大词人，多致贬辞，其论晏殊、欧阳修、苏轼也，尝曰："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其论柳永，则曰："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他如晏几道、黄庭坚、秦观、贺铸，皆有评语。而清照当时每有所作，无不传诵人口，《四库总目提要》称其词格"抗轶周、柳"，诚不愧为一大家也。

清照之词，至宋室南渡后声名尤著，辛弃疾《稼轩词》中尝有效李易安体者，朱熹亦尝云："本朝妇人能文者，唯魏夫人及李易安而已。"魏夫人者，魏泰之姊，曾布之妻。其词有《菩萨蛮》一阕，论者谓深得国风《卷耳》之遗，然视李清照，则未可同日语也。

王灼《碧鸡漫志》称，清照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妇人，当推词采第一。至论其词则曰："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藉也。"此则不免深文贬抑。盖相传有清照夫死改嫁之说，灼即云："再嫁某氏，讼而离之，晚节流荡无归。"《苕溪渔隐丛话》称其再适张汝舟，未几反目。晁公武《郡斋读书记》亦主是说，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

其与后夫搆讼事尤详。清俞正燮《癸巳类稿》内有《易安居士事辑》，则为之繁征博引，以辨其诬。陆心源、李慈铭皆尝辨及。李慈铭据其绍兴三年《上胡松年》诗有"嫠家祖父生齐鲁"之句，证明其确系老于孀妇，殆无疑也。

第七节 辛弃疾及辛派词人

论宋词者，苏、辛并称。辛弃疾际宋室南渡之时，承周邦彦之后，而能不流为雕琢纤艳，挹苏轼之遥源，树词坛之别帜，其才气纵横、见解超脱、情感浓挚，一一寄之于词，无论长调或小令，皆足以表现其人格。论者或病其音律欠谐，此其为失也，正与苏轼无异。故苏、辛一派之词，直已脱音乐而独立，诚如李清照所谓"句读不葺之诗"，胡适所谓"诗人之词"，至辛弃疾而登峰造极矣。王国维亦曰："南宋词人，堪与北宋颉颃者，惟一幼安耳。（中略）幼安之佳处，在有性情有境界，即以气象论，亦有傍素波、干青云之概，宁后世龌龊小生所可拟耶？"

周济《宋四家词选》退苏进辛，以辛弃疾为第二大家，而列苏轼为辛之附庸。其称辛弃疾曰："稼轩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又曰："稼轩不平之鸣，随处辄发，有英雄语，无学问语，故往往锋颖太露。然其才情富艳，思力果锐，南北两朝实无其匹，无怪流传之广且大也！"其退苏进辛，则有说曰："世以苏、辛并称。苏之自在处，辛偶能到之；辛之当行处，苏必不能到。二公之词不可同日语也。"

自来论辛词者，莫不赞其凌厉风发，前无古人。刘克庄云："公所作，大声鞺鞳，小声铿锵，横绝六合，扫空万古。"毛晋云："词家争斗秾纤，而稼轩率多抚时感事之作，磊砟英多，绝不作妮子态。"彭孙遹曰："稼轩之词，胸有万卷，笔无点尘，激昂排宕，不可一世。"王士祯云："石勒云'大丈夫磊磊落落，终不学曹孟德、司马仲达狐

媚’，读《稼轩词》，当作如是观。”刘熙载曰：“稼轩词龙腾虎掷，任古书中理语、瘦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天姿是何复异！”然稼轩词中调、小令亦间作妩媚语，观其得意处，真有压倒古人之概。故刘克庄曰：“其秾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盖其词大体以激扬奋厉为工，而如“宝钗分桃叶渡”一曲（调寄《祝英台近》），则昵狎温柔，魂销意尽。才人伎俩，真不可测。

岳珂《桯史》云：

> 辛稼轩守南徐，已多病谢客。（中略）每燕必命侍伎歌其所作，特好歌《贺新郎》一词，自诵其警句曰：“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又曰：“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每至此，辄拊髀自笑，顾问坐客何如，皆叹誉如出一口。既而又作一《永遇乐》，序北府事，首章曰：“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又曰：“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其寓感慨者，则曰：“不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特置酒召数客，使妓迭歌，益自击节，遍问客，必使摘其疵，逊谢不可。客或措一二辞，不契其意，又弗答，然挥羽四视不止。余时年少，勇于言，偶坐于席侧，稼轩因诵启语，顾问再四。余率然对曰：“待制词句，脱去今古轸辙。每见集中‘有解道此句，真宰上诉，天应嗔耳’之序，尝以为其言不诬。童子何知，而敢有议？然必欲如范文正以千金求《严陵祠记》一字之易，则晚进尚窃有疑也。”稼轩喜，促膝亟使毕其说，余曰：“前篇豪视一世，独首、尾二腔警语差相似，新作微觉用事多耳。”于是大喜，酌酒而谓坐中曰：“夫君实中予痼！”乃咏改其语，日数十易，累月犹未竟。其刻意如此。

按楼敬思尝称：“稼轩驱使《庄》、《骚》，无一点斧凿痕。”然用事太多，诚辛词之缺憾，而其刻意有如岳珂所称者，则其作品亦未始不由苦思得矣。

陆游生平精力尽于为诗，填词乃其余事。明杨慎《词品》谓其“纤丽处似淮海，雄快处似东坡”。《四库总目提要》则引伸其说曰：“游之本意，盖欲驿骑于二家之间，故奄有其胜而皆不能造其极。要之，诗人之言，终为近雅，与词人之冶荡有殊，其短其长故具在是也。”循是说也，则游偶作长短句而能不失其诗人面目，则其为“诗人之词”之一作家，允无疑也。况游与辛弃疾同一时代，其身世家国之感，往往发之于诗，间亦遣之于词，故刘克庄尝以辛、陆并称曰：“放翁、稼轩一扫纤艳，不事斧凿，但时时掉书袋，亦是一癖。”所谓“掉书袋”者，堆砌古典之谓也，要是才士通病。而宋室南渡后，游之诗固卓然自为大宗，词亦扫尽纤淫，足与辛弃疾抗颜，其集中豪放之作，实能胎息苏轼而与辛弃疾相伯仲。冯煦所谓“剑南屏除纤艳，独往独来，其逋峭沉郁之概，求之有宋诸家，无可方比”，是也！即其间有清丽之作，又往往与颓放相兼，此则匪仅投老忧国使然，其少年时代尝有一段哀情，足使诗人终身乏欢娱而多感慨焉！

按周密《齐东野语》载，陆游初娶唐氏，于其母夫人为姑侄。伉俪相得而弗获于其姑，既出而未忍绝之，则为别馆，时时往焉。姑知而掩之，虽先知挈去，然事不得隐，竟绝之，亦人伦之变也。唐后改适同郡宗子士程，尝以春日出游，相遇于禹迹寺南之沈氏园。唐以语赵，遣致酒肴，翁怅然久之，为赋《钗头凤》一词，末云：“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题园壁间，实绍兴乙亥岁也。游居鉴湖之三山，晚岁入城，必登寺眺望。尝赋二绝句，其二云：“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无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见惊鸿照影来。”盖游迫于母氏，与唐仳离，自不能无哀感蕴蓄于方寸之中，故偶作长短句，遂时时自暴其萧疏颓放。其《钗头凤》一词，毛晋称其“孝义兼挚，更有一种啼笑不敢之情形于笔墨之外，令人不能读竟”。此则游之胸次有独具之情，辛弃疾不能与之并论者也。

刘过乃辛弃疾之幕客，词多壮语，盖学辛者也。《词苑丛谈》载

刘过能诗词，酒酣耳热，出语豪纵。嘉泰癸酉，寓中都，时辛稼轩帅越，遣使招之。适以事不及行，因仿辛体作《沁园春》一词缄往，有云："斗酒彘肩，风雨渡江，岂不快哉！"下笔便真。辛得词大喜，竟邀之去。按过亦有志之士，慕辛之志业，因亦学其词格。冯煦云："龙洲自是稼轩附庸，然得其豪放，未得其宛转。子晋亟称其《天仙子》、《小桃红》二阕，云纤秀为稼轩所无。今视其语，《小桃红》亵矣，而未甚也，《天仙子》则皆市井俚谈，不知子晋何取而称之，殆与陶九成之称《沁园春》咏美人指足同一见地耶？"

刘克庄词，冯煦论之曰："后村词与放翁、稼轩犹鼎三足，其生丁南渡，拳拳君国，似放翁；志在有为，不欲以词人自域，似稼轩。(中略)又其宅心忠厚，亦往往于词得之。(中略)升庵称其壮语，子晋称其雄力，殆犹之皮相也。"可谓有褒无贬矣。然张炎颇讥其"直致近俗，效稼轩而不及"，《四库总目提要》亦云："虽纵横排宕，亦颇自豪，然于此事究非当家！"盖克庄亦有志事功者，其词亦抒情之诗耳。虽尝讥辛弃疾、陆游作词爱掉书袋，而其词之悲壮激昂，谓为辛派词人，无可疑也。

此外与辛弃疾同时之陈亮，好谈天下大略，以节气自居，而词亦疏宕有致，毛晋称其"不作一妖语、媚语"。相传亮作长短句，每一章成，辄自叹曰："平生经济之怀，略已陈矣！"是其伟大之怀抱，往往寓之于词，则其词亦辛稼轩之流亚也欤！《词苑丛谈》称"其《水龙吟》词，乃复幽秀"，是又异于辛者。

宋词自辛弃疾于诸大家外别树一帜，其后词家遂有门户、主奴之见，冯煦尝有说曰："才气横轶者，群乐其豪纵而效之，乃至里俗浮嚣之子亦靡不推波助澜，自托辛、刘以屏蔽其陋，则非稼轩之咎而不善学者之咎也。"此亦可以推见辛弃疾在两宋词史上之关系矣！

第八节　姜夔及姜派词人

姜夔在宋代词人中负名最盛,黄升云:"(白石)词极精妙,不减清真,其间高处有美成所不能及。"张炎云:"姜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许昂霄云:"词中之有白石,犹文中之有昌黎也,世固有以昌黎为穿凿生割者,则以白石为生硬也亦宜。"冯煦云:"白石为南渡一人,千秋论定,无俟扬榷。《乐府指迷》独称其《暗香》、《疏影》、《扬州慢》、《一萼红》、《琵琶仙》、《探春慢》、《淡黄柳》等曲,《词品》则以《齐天乐》咏蟋蟀一阕为最胜。其实石帚所作超脱蹊径,天籁人力,两臻绝顶。笔之所至,神韵俱到,非如乐笑、二窗辈,可以奇对、警句相与标目,又何事于诸调中强分轩轾也!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彼读姜词者,必欲求下手处,则先自俗处能雅、滑处能涩始。"按《吴兴掌故集》,夔长于音律,尝著《大乐议》,欲正庙乐,而时嫉其能,是以不获尽其所议,人大惜之。盖夔善于度曲,所为长短句无不协律,两宋词谱今无传者,惟夔自度腔十七支宫词乐谱犹存于今。至其人格之高尚,则有如陈郁所云:"白石道人气貌若不胜衣,而笔力足以扛百斛之鼎,家无立锥而一饭未尝无食客,图史翰墨之藏,汗牛充栋,襟期洒落,如晋、宋间人。"此亦推崇之说也。

惟周济纂《宋四家词选》,颇贬抑姜夔,置之于辛弃疾之附庸。其说曰:"白石脱胎稼轩,变雄健为清刚,变驰骤为疏宕。盖二公皆极热中,故气味吻合。辛宽姜窄,宽故容秽,窄故斗硬。"又曰:"北宋词多就景叙情,故珠圆玉润,四照玲珑。至稼轩、白石,一变而为即事叙景,使深者反浅,曲者反直。(中略)稼轩郁勃,故情深;白石放旷,故情浅。稼轩纵横,故才大;白石局促,故才小。惟《暗香》、《疏影》二词,寄意题外,包蕴无穷,可与稼轩伯仲。余俱据事直书,不过手意近辣耳。"又曰:"白石以诗法入词,门径浅狭,如孙过庭书,但便人模仿。"至谓"白石号为宗工,然亦有俗滥处、寒酸处、补凑处、

敷衍处、支处、复处，不可不知"，则未免苛细矣！刘熙载论宋词，亦主辛、姜同一渊源，尝曰："玉田盛称白石而不甚许稼轩，耳食者遂于两家有轩轾意。不知稼轩之体，白石尝效之矣，集中如《永遇乐》、《汉宫春》诸阕均次稼轩韵，其吐属气味皆若秘响相通，何后人过分门户也？"又曰："白石才子之词，稼轩豪杰之词。才子、豪杰，各从其类爱之，强论得失，皆偏辞也。"王国维则曰："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终不能与于第一流之作者也。"

周济以宽、窄别辛、姜之词格，刘熙载以才子、豪杰别辛、姜之人格，王国维不以第一流作者许白石，似矣。然未若近人胡适以历史之见解，以"诗人之词"与"词匠之词"表示辛、姜异点。盖词至辛弃疾，可谓造极登峰，亦即"诗人之词"之极盛时期。夔之于词，既服膺辛弃疾而兼擅音乐天才，故又从声律上痛下工夫，冀可凌驾前人。胡适谓姜白石乃音乐家，向音律上用工夫，自此以后，词便转到音律之专门技术上。史梅溪、吴梦窗、张叔夏皆精于音律者，不惜牺牲词之内容，迁就音律之和谐，只求音律谐婉，不顾内容之矛盾。此辈既非词人，又非诗人，只可名曰"词匠"耳。依是说，则词匠之宗，固舍姜夔莫属也。毛晋论夔词，称之曰："裁云缝月之妙手，敲金戛玉之奇声。"斯即"力求其工"、"务协于律"之说。王国维亦曰："读东坡、稼轩词，须观其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风。白石虽似蝉蜕尘埃，然终不免局促辕下。"然则称之曰"词匠"，谁曰不宜？

清朱彝尊选辑《词综》，其论姜夔词派曰："词莫善于姜夔，宗之者，张辑、卢祖皋、史达祖、吴文英、蒋捷、王沂孙、张炎、周密、陈允平、张翥、杨基，皆具夔之一体。基之后，得其门者寡矣！"张翥元人，杨基明人，本书皆不论。自张辑至陈允平，约论于后。其间吴文英、王沂孙二家又皆周济《宋四家词选》所奉为领袖者，张炎为宋词后劲，皆另为后节，论列较详。至高观国一家，《四库总目提要》称其与

史达祖同为姜夔羽翼，朱彝尊虽未齿及，兹连类论之。

张辑，鄱阳人，与姜夔为同邑。朱湛庐称其“得诗法于姜，世所传《欸乃集》，皆以为采石月下、谪仙复作，不知其又能词也”。其词集曰《东泽绮语》，皆倚旧腔而别立新名，亦好奇之故也。《草堂诗余》选其《疏帘淡月》一阕，《词品》则称其《垂杨碧》一阕。

卢祖皋与高观国、史达祖齐名，黄升称其“乐章甚工，字字可入律吕”，而冯煦则以为“以史较高，究未能旗鼓相当，惟卢差足与高肩随”。毛晋云：“蒲江词，余喜其‘柳色津头泫绿，桃花渡口啼红’，较之秦七‘莺嘴啄花红溜，燕尾点波绿皱’，不更鲜秀耶？”盖卢为楼钥之甥，学有渊源，尝与永嘉四灵以诗相倡和，故其词之佳处，要在工于雕琢，所谓“字字可入律吕”也。

史达祖为韩侂胄党，《四库总目提要》谓“其人不足道，而其词则颇工”。同时张镃称其“分镳清真，平睨方回（贺铸），而纷纷三变（柳永）行辈，不足比数”，推奖未免稍溢。姜夔亦尝称之曰：“梅溪词奇秀清逸，盖能融情景于一家，会句意于两得。”故《四库总目提要》论其词，终谓未可以其人掩其文。后世其以史与姜夔并称者，许昂霄论其高下曰：“白石、梅溪，昔人往往并称。骤阅之，史似胜姜，其实则史少减尧章。昔钝翁尝问渔洋曰：‘王、孟齐名，何以孟不及王？’渔洋答曰：‘孟诗味之，未能免俗耳。’吾于姜、史亦云。”史词如《绮罗香·咏春雨》中云：“临断岸，新绿生时，是落红，带愁流处。”又如《双双燕·咏春燕》中云：“看足柳昏花瞑，应自栖香正稳，便忘了天涯芳信。”皆尝为姜夔所称赏。《满江红·书怀》有云：“好领青衫，全不向《诗》、《书》中得。三径就荒秋自好，一钱不值贫相逼。”殆亦自怨其降志辱身，作权相堂吏欤！

高观国以词与史达祖叠相酬唱，《四库总目提要》称其旗鼓俱足相当，又曰：“词自鄱阳姜夔句琢字炼，始归醇雅，而达祖、观国为之羽翼。故张炎谓数家格调不凡，句法挺异，俱能特立清新之意、删

削靡曼之词。”当时陈造序其词曰：“要是不经人道语，其妙处少游、美成不及也。”其词如《齐天乐·中秋夜怀梅溪》一阕，姜夔称其“徘徊宛转，交情如见”。《古今词话》谓：“观国精于咏物，其佳者工而入逸，婉而多讽。”刘熙载则谓：“高竹屋词争驱白石，然嫌多绮语。”

周济《宋四家词选》于卢、高、史三家，皆列为附庸，其说曰：“竹屋(高)、蒲江(卢)并有盛名。蒲江窘促，等诸自桧；竹屋硁硁，亦凡响耳。”其论史达祖则曰：“梅溪好用偷字，品格便不高。”又曰：“竹屋得名最盛，而其词亦无可观，当由社中标榜而成耳！”周济持论多异恒人，聊备一说而已。

蒋捷、周密、陈允平皆生于南宋末造，其词皆不能免于亡国之音矣。蒋捷之词，《四库总目提要》称“其词炼字精深，调音谐畅，为倚声家之榘矱”，毛晋则曰：“竹山词语语纤巧，字字妍倩。”又谓其有《世说》之靡，六朝之腴，且比之二李、二晏、美成、尧章。而周济则曰：“竹山薄有才情，未窥雅操。”又曰：“竹山有俗骨，然思力沉透，可以起懦。”冯煦亦病其全集中多有可议者，又好用俳体，不可谓正轨云。

周济于周密之词推崇甚至，其说曰：“公谨敲金戛玉，嚼雪盥花，新妙无与为匹。”又曰：“公谨只是词人，颇有名心，未能自克，故虽才情诣力，色色绝人，终不能超然遐举。”又病其“立意不高，取韵不远”，谓当与张炎抗行，未可方驾王沂孙、吴文英云。密编《绝妙好词》，选料简甚精，去取甚严，宋词之零玑碎玉皆赖以存，在词选中最为善本。至密词佳者，如《玉漏迟·题吴梦窗〈霜花腴词集〉》一阕，缠绵深至，可泣可歌，新妙悲凉，兼而有之。戈载选宋七家词，周密与焉，称其词曰：“草窗词尽洗靡曼，独标清丽，有韶倩之色，有绵渺之思。”盖与周济之说相同。

陈允平词，张炎称其“平正亦有佳者，盖不失为和平婉丽”，而周济则訾之为馆阁词，谓其“疲软凡庸，无有是处”，盖未可与蒋、周

并论。朱彝尊齿之于姜派，或偶得姜词之一体耳。

第九节　吴文英、王沂孙、张炎

吴文英、王沂孙二家，皆周济所奉为宋词人之领袖者也，其称吴文英曰："梦窗奇思壮采，腾天潜渊，返南宋之清泚，为北宋之秾挚。"又称其"立意高，取径远，皆非余子所及"。文英在当时，号称能词，或以与周邦彦并论，而张炎则曰："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盖吴之未易与周邦彦比肩者，惟此之故。近人胡适谓周乃诗人而兼音乐家，吴能制曲调声而非诗人。《梦窗四稿》之词，几无一首非用典故与套语堆砌而成者。《四库总目提要》则曰："文英及与姜夔、辛弃疾游，唱和具载集中。（中略）其词则卓然南宋一大宗。（中略）其天分不及周邦彦，而研炼之功则过之。词家之有文英，亦如诗家之有李商隐也。"戈载《宋七家词选》亦及文英，称之曰："貌观之，雕缋满眼，而实有灵气行乎其间。（中略）犹之玉溪生之诗，藻采组织而神韵流转，旨趣永长，未可妄讥其獭祭也。"冯煦亦曰："梦窗之词丽而则，幽邃而绵密，脉络井井，而卒然不能得其端倪。"盖后世词人，论宋词各有主奴之见，周济、戈载、冯煦皆推崇吴文英，其不取吴文英者，今有胡适，前则有张惠言，即周济亦讥其为王沂孙门径所限焉。

周济之称王沂孙曰："烦心切理，言近指远，声容调度，一一可循。"又曰："最多故国之感，故著力不多，天分高绝，所谓意能尊体也。"张惠言亦曰："其咏物词并有君国之忧，《眉妩》喜君有恢复之志，而惜无贤臣也；《高阳台》伤君臣宴安，不思国耻，天下将亡也；《庆清朝》言乱世尚有人才，惜世不用也。"周济又称其善于咏物曰："咏物最争托意，隶事处以意贯串，浑化无痕，碧山胜场也。"近人胡适于此说则大加訾议，谓碧山词实无足取，咏物诸词，至多不过是晦涩之灯谜耳，无文学价值。又谓王沂孙曾食元禄，不可称为遗民

遗老。胡氏盖以"词匠"视王沂孙，故贬抑之尤甚于评吴文英焉。戈载《宋七家词选》，王沂孙亦其一家也，载称之曰："运意高远，吐韵妍和。（中略）真白石之入室弟子也！"是亦无异于张惠言、周济诸家之说也。

张炎之生，先于宋室之沦亡才二十九年耳。其六世祖俊有功宋室，祖含、父枢皆工于文。炎幼承家学，又与当时词家往来，商榷音律，用功逾四十年。著《词源》一书，专讲词之作法，于炼字造句用事，诸极雕琢之能事，故能卓然成为宋末元初一大词人。

胡适于吴文英、王沂孙、张炎之词，尝谓词至宋末，已成末运。吴文英、王沂孙一派之咏物词、古典词成为正宗，词家所讲者，只是如何能刻画事物，如何能使用古典，如何能调协音律。试观张炎之《词源》，便知当时词人所注重者，全属技术上之末节。词本从乐歌变化而出，但渐离音乐，成为文学新体。苏轼、辛弃疾诸人沿此方向进行，姜夔、吴文英、张炎、王沂孙等又将渐离音乐之词使反于音乐，宁牺牲词之意思迁就词之音律，不肯放松音律保存词之情意，于是词即成为少数专家之技术而非有生气之文学矣。胡氏以为词至宋末，将受淘汰于新起之曲，故有斯说。简言之，即谓词至苏、辛既已渐渐脱离音乐，则其后姜夔一派即不当再从音律上用工夫。而自姜夔至张炎诸人，于词虽穷极工细，终不过为"词匠之词"。有宋三百年之词，乃不幸而为退化之结局耳。

张炎以咏物词著称于时，颇有工者。而胡适终讥其十分用气力之刻画，且以为从文学史之观点观之，至多不过是初学技术工夫，拈题咏物，刻意形容，离开意境与情感，只是工匠之手艺而已。至向来推崇张炎之说，则有楼敬思所谓"南宋词人，姜白石外惟张玉田能以翻笔、侧笔取胜，其章法句法俱超，清虚骚雅，所谓脱尽蹊径，自成一家。"戈载曰："玉田之词，郑所南称其'飘飘徵情，节节弄拍'，仇山村称其'意度超玄，律吕协洽'，真是词家之正宗！填词者

必由此入手，方为雅音。”盖张炎亦戈载所选宋七家词之一也。惟周济于张炎则有微词，其说曰：“玉田近人所最尊奉，才情诣力亦不后诸人，终觉积谷作米，把缆放船，无开阔手段。然其清绝处，自不易到。”又曰：“玉田才本不高，专恃磨砻雕琢，装头作脚，处处妥当，后人翕然宗之。”又曰：“玉田所以不及前人处，只在字句上着工夫，不肯换意。若其用意佳者即字字珠辉玉映，不可指摘。”此与近人胡适之说，若可相通。胡适虽薄张炎为“词匠”，但亦取其《高阳台·西湖春感》一阕，谓其“意境情感，尚与音节和美相称”。而宋名家词评，尤称其《台城路》感旧一词，比之于杜诗、韩笔。至其小令之佳者，亦往往逼近《花间》，盖不失为有宋词人之后劲也。

第十节　南宋词人补遗

康与之当宋室渡江初，以词受知高宗。凡中兴粉饰治具及慈宁归养、两宫欢集，必假其歌咏，故应制之词为多。其立朝颇附秦桧，世鄙其人，遂以其词比柳永。沈义父云：“康伯可、柳耆卿音律甚协，句法亦多有好处，然未免有鄙俗语。”以康之阿附权臣，宜其不能免俗。至其清词丽句，如《满庭芳·寒夜》一阕，亦可见其才调。

赵鼎，中兴名臣，勋业冠世，而其词婉丽不减《花间》。如“香冷金猊，梦回鸳帐”、“余香嫩，更无人间，一枕江南恨”等句，与晏叔原、秦少游之作，殆无异致。

李邴、汪藻、楼钥，《小学绀珠》所称为南渡三词人者也。邴少作《汉宫春》词，有云“问玉堂何似茅舍疏篱”，颇传人口。其《玉楼春》咏美人书字一阕，有云：“云情散乱未成篇，花骨欹斜终带软。”《词品》称其新美可喜，其词盖亦以纤丽擅场者。

汪藻以四六文著，楼钥则究心于实学，以经世文擅名一时，词皆非所长。其与李邴同称南渡三词人者，殆未必以其作品为准则也。

陈克，绍兴中立官于朝，称其词者，以丽晏、周。至周济则称其“韵格绝高，晏氏父子俱非其敌。以方美成，则又拟于不伦”。其《菩萨蛮》调：“几处簸钱声，绿窗香梦轻。”《谒金门》调：“檀炷绕窗灯背壁，画檐残雨滴。”殊觉香倩，盖《花间》一派本色也。

张抡，南渡故老，好填词。应制之作极其华艳，每进一词，即播诸丝竹。尝与曾觌、吴琚辈进《柳梢青》词诸阕，赐赉甚渥。

周必大有《点绛唇》词赠歌者小琼，后段云：“见了还非，重理霓裳舞。虽无误，几年一遇，莫讶周郎顾。”周官孝宗朝，封益国公，而制词如此，儒雅、风流殆兼之矣。

张孝祥词，毛晋称其《六州歌头》诸曲，骏发踔厉，寓以诗人句法者也。冯煦谓其：“忠愤之气随笔涌出，并足唤醒当时聋聩，正不必论词之工拙。”《词林纪事》引汤衡云：“于湖平昔为词未尝著稿，笔酣兴健，顷刻即成。初若不经意，反复究观，未有一字无来处。”殆极才人之能事也已。

韩元吉，吕祖谦外甥也，黄升称其文学“为一代冠冕”。元吉每与张孝祥、陆游、辛稼轩诸人相赠答，颇为疏狂豪放之作。其小令之纤丽者，亦未脱《花间》面目。

张镃，词豪侈而有清尚，周密《武林旧事》记其佳话甚多。其词如《念奴娇》咏千叶海棠、《满庭芳》咏促织，皆能刻画入神。

曾觌亦东都故老，词多感慨，惜其邪佞不足称，与张抡辈应制倚声，志在铺张，故多雄丽之作。黄升谓其《金人捧露盘》、《忆秦娥》等曲，凄然有《黍离》之感，殆亦阿于时而然也。

韩玉尝与辛弃疾、康与之相酬唱。毛晋诋之曰：“虽与康、辛唱和，其相去不止苎萝、无盐。”《四库总目提要》则曰：“今观其词，虽庆贺诸篇不免俗滥，（中略）《感皇恩》、《减字木兰花》、《贺新郎》诸作，未尝不凄清宛转。”

张元干尝作《贺新郎》词送胡铨谪新州，又尝有词寄李纲，皆慷

慨悲凉，数百年后尚想其抑塞磊落之气。此外诸作则清丽婉转，《四库总目提要》称其“与秦观、周邦彦可以肩随”，故《花庵》、《草堂》所选者，皆极妩秀之致，殆其本来面目如此也！

侯寘为晁氏甥，有元祐旧家流风余韵。其词婉约娴雅，虽名不甚著，而在南宋诸家之中，要不能不推为作者。

扬无咎人品甚高，秦桧擅国时耻于依附，屡征不起，以能画墨梅掩其文名。而词格殊工，实南宋初一作家矣。

王千秋词体本《花间》，而出入于东坡门径，风格秀拔，要自不杂俚音。毛晋讥其词多酬贺之作，又评其绝少绮艳。《四库总目提要》力辟其误，以为南渡之后，亦卓然一作手也。

杨炎正，字济翁，或误作杨炎，字止济翁。考之稼轩词中，屡有与杨济翁赠答之作，及厉鹗所考证，当以名“炎正”为是。其词因辛弃疾而作者，颇具纵横排奡之气。虽不足敌弃疾，而屏绝纤秾，自抒清俊，要非俗艳所可拟。《四库总目提要》称之如此。

洪咨夔之词，尝以才艺自负，而为时相所忌，一官十年不调。《四库总目提要》称其：“淋漓激壮，多抑塞磊落之感，颇有似稼轩、龙洲者。”冯煦则曰：“平斋工于发端，其《沁园春》凡四首，起笔皆有振衣千仞气象，惜其下并不称。”岂限于才思耶？

赵长卿，宋宗室子也。恬于仕进，觞咏自娱，随意成词，多得淡远萧疏之致。虽音律间有不协处，固未易掩其所长也。

黄机之词，与岳珂唱酬者居多。珂乃飞孙，忠义之后，故机所赠词皆沉郁苍凉，不复作草媚花香之语。亦尝有寄辛弃疾之作，而其词格与辛殊不相及，大体平易近人而已。

毛幵以工词名当时，王木叔题其词集，有云：“或病其诗文视乐府颇不逮。”盖当时定论如此也。其《满江红·泼火初收》一阕，清丽芊眠，杨慎特为激赏。

黄公度之词，传于世者颇多寄托，洪迈称之曰：“宛转清丽，读

者咀嚼于齿颊而不能已。"曾丰则曰："清而不激，和而不流。"其词集，每词之中有子沃所附跋语，详记本事，殆他家词集所未有也。

戴复古为陆游门人，诗词皆有师承。《四库总目提要》称其："音韵天成，不费斧凿。(中略)以诗为词，时出新意，无一语蹈袭也。"陆游乃辛派词人，戴复古之词，粗豪处亦与辛弃疾相近。

黄升有《花庵词选》，前十卷曰"唐宋诸贤妙词选"，后十卷曰"中兴以来绝妙词选"。二书评骘词人，时中肯綮。其自作之词，《四库总目提要》谓可"上逼少游，近摹白石"。盖不事雕饰而才拙于情，不失为姜夔一派之末流也。

朱淑真，南宋之女词人也。世或以与李清照并举，而高下工拙，殆未可同日语。其词多写忧怨而已。

以上自康与之至朱淑真，凡二十五家。夫宋室南渡，迄于灭亡，才百数十年耳。词坛树帜，号称大家者，如前文各节所述，已可见其胜概。其尚可自名一家，未可置而不述者，犹若是其夥。而总计南宋词人，见于黄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者八十九人，见于周密《绝妙好词选》者又多至百有三十二人焉。词之独盛于两宋，至南渡以后，不已崇极矣乎？物极必反，故宋之亡即词之敝，承敝易变，是惟元、明之南北曲，而宋之文坛亦已萌其端矣。具如下章所论。

第六章　宋之戏曲

第一节　词与曲之递嬗

词之进而为曲，就体制言，自简单而趋于繁复；就其可兴可观之效用言，则自少数士子而广被于平民，所谓文学民众化也。刘熙载曰："曲之名近古矣。近世所谓曲者，乃金、元之北曲，及后复溢为南曲者也。未有曲时，词即是曲；既有曲时，曲可悟词。苟曲理未明，词亦难独善矣。"此又从修辞学而论词与曲之未易显分畛域也。昔人谓金、元所用之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故曲亦济词之穷者也，是固然已。惟词之蜕为变曲，北宋承平时已见其端，盖受当时优人演滑稽戏及诸色伎艺人等演史、说诨话之影响，其所表演之事实与意义非简单之词调所能赅括，于是乎繁其文以演述之，遂变词为曲。后来胡乐被于中原，而戏曲之体制乃大定耳。

王国维云："宋之歌曲，其最通行而为人人所知者，是为词。（中略）宋人宴集，无不歌以侑觞，然大率徒歌而不舞，其歌亦以一阕为率，其有连续歌此一曲者，如欧阳公之《采桑子》凡十一首，赵德麟之商调《蝶恋花》凡十首。一述西湖之胜，一咏会真之事，皆徒歌而不舞，其所以异于普通之词者，不过重叠此曲以咏一事而已。"此词进于曲之渐也。

然元代北曲盛行之后，词之被于管弦，仍为乐工所不废。按杨朝英《乐府新编阳春白雪》前集，首列大乐，著录晏叔原、苏东坡、邓子江、吴彦高、辛稼轩、柳耆卿、朱淑真、蔡伯坚、张子野诸人所撰《念奴娇》、《蝶恋花》、《鹧鸪天》、《摸鱼子》、《雨霖铃》、《天仙子》、《生查子》等词。盖其时尚与新声并行于世，此又词变为曲而词与音

乐之关系尚未遽替之证也。若曲谱与词同者亦不乏其例，要之，同一途径耳。

词变为曲，托体稍卑，搢绅先生渐罕言之，故宋、元两朝史志及清《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儒硕既鄙弃不复道，而为此学者大率以余力及此，亦未有能观其会通、窥其奥窔者，遂使足以代表一时代之一种文学，郁堙沉晦且数百年。至王国维读元人杂剧而善之，乃究其渊源，明其变化之迹，以为非求诸唐、宋、辽、金之文学弗能得也。既著《曲录》、《戏曲考原》、《唐宋大曲考》等书，从事既久，续有所得，复成《宋元戏曲史》一书，其自序谓："凡诸材料皆余所搜集，其所说明亦大抵余之所创获也。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非吾辈才力过于古人，实以古人未尝为此学故也。"本章所述，大抵本于王氏，盖亦未易有所增益云。

第二节　乐曲之种类

据王国维氏考定，宋代乐曲，自简单之词渐趋繁复者凡有数种。其歌舞相兼而仅以一曲反复歌之者，曰传踏；其遍数较多而仍限于一曲者，曰大曲；其少变大曲之例者，曰曲破；合数曲而成一乐者，曰诸宫调；取一宫调之曲若干以成一体者，曰赚词。兹就王氏原书，节叙于次：

（一）传踏　传踏之名，见于曾慥《乐府雅词》，即《碧鸡漫志》之所云"转踏"，又即《梦粱录》之所云"缠达"。恒以一曲连续歌之，每一首咏一事，共若干首则咏若干事。然亦有合若干首而咏一事者，《碧鸡漫志》谓石曼卿作《拂霓裳》转踏，述开元、天宝遗事，是也。其曲调，唯《调笑》一调用之最多。此种词前有"勾队词"，后以一诗、一曲相间，终以"放队词"，则亦用七绝。此宋初体格如此，然至汴宋之末则其体渐变，《梦粱录》："在京时，只有缠令、缠达。有引子、尾声为缠令，引子后只有两腔，迎互循环，间有缠达。"此缠达之音与传

踏同，其为一物无疑也。《梦粱录》所云与上文之传踏相比较，其变化之迹显然。盖勾队之词变而为引子，放队之词变而为尾声，曲前之诗，后亦变而用他曲，故云“引子后只有两腔，迎互循环”也。今缠达之词皆亡，唯元剧中正宫套曲，其体例全自此出。传踏之制，以歌者为一队，且歌且舞，以侑宾客。宋时有与此相似或同实异名者，是为队舞。《宋史·乐志》：“队舞之制，其名各十。小儿队凡七十二人，一曰柘枝队、二曰剑器队、三曰婆罗门队、四曰醉胡腾队、五曰诨臣万岁乐队、六曰儿童感圣乐队、七曰玉兔浑脱队、八曰异域朝天队、九曰儿童解红队、十曰射雕回鹘队；女弟子队凡一百五十三人，一曰菩萨蛮队、二曰感化乐队、三曰抛球乐队、四曰佳人剪牡丹队、五曰拂霓裳队、六曰采莲队、七曰凤迎乐队、八曰菩萨献香花队、九曰彩云仙队、十曰打球乐队。”其装饰各由其队名而异，如佳人剪牡丹队则衣红生色砌衣，戴金冠、剪牡丹花，采莲队则执莲花，献花队则执香花盘。其舞未详，其曲宋人或取以填词。其中有拂霓裳队，而《碧鸡漫志》谓石曼卿作《拂霓裳》传踏，恐与传踏为一，或为传踏所自出也。

（二）曲破　宋时舞曲，尚有曲破。《宋史·乐志》：“太宗洞晓音律，制曲破二十九。”此在唐五代已有之，至宋时又藉以演故事，史浩《鄮峰真隐漫录》之剑舞即是也。其乐有声无词，且于舞踏之中寓以故事，颇与唐之歌舞戏相似。而其曲中有破有彻，盖截大曲“入破”以后用之也。

（三）大曲　大曲自南北朝已有此名，南朝大曲则清商三调中之大曲，《宋书·乐志》所载者是也。北朝大曲则《魏书·乐志》言之而不详。至唐而雅乐、清乐、燕乐、西凉、龟兹、安国、天竺、疏勒、高昌乐中均有大曲（见《大唐六典》卷十四协律郎条注），然传于后世者唯胡乐大曲耳。其名悉载于《教坊记》，而其词尚略存于《乐府诗集·近代曲辞》中，宋之大曲即自此出。教坊所奏凡十八调、四十大

曲,《文献通考》及《宋史·乐志》具载其目。此外亦尚有之,故又有五十大曲及五十四大曲之称。其曲辞之存于今日者,有董颖《薄媚》(《乐府雅词》卷上)、曾布《水调歌头》(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二)、史浩《采莲》(《鄮峰真隐漫录》卷四十五)。三曲稍长,然亦非其全遍,其中间一二篇则于宋词中间遇之。大曲遍数多至一二十,其各遍之名,则唐时有排遍、入破、彻(《乐府诗集》卷七十九)。而排遍、入破又各有数遍;彻者,入破之末一遍也。宋大曲,则王灼谓:"凡大曲,有散序、靸、排遍、攧、正攧、入破、虚催、实催、衮遍、歇拍、杀衮始成一曲,谓之'大遍'。"沈括亦云:"所谓'大遍'者,有序、引、歌、歙、嗺、哨、催、攧、衮、破、行、中腔、踏歌之类,凡数十解。"沈氏所列各名与现存大曲不合,王说近之。惟攧后尚有延遍,实催前尚有衮遍,而散序与排遍均不止一遍,排遍且多至八九。故大曲遍数往往至于数十,唯宋人多裁截用之,即其所用者亦以声与舞为主,而不以词为主,故多有声无词者。自北宋时葛守诚撰四十大曲,而教坊大曲始全有词。然南宋修内司所编《乐府混成集》,大曲一项凡数百解,有谱无词者居半(周密《齐东野语》卷十),则亦不以词重矣。其攧、破、催、衮,以舞之节名之。此种大曲,遍数既多,自于叙事为便,故宋人咏事多用之。如董颖《薄媚》,其一例也。惟其遍数之多,虽便于叙事,而动作皆有定则,欲以完全演一故事,固非易易。且现存大曲皆为叙事体,而非代言体。即有故事,要亦为歌舞戏之一种,未足以当戏曲之名也。

(四)诸宫调　至合数曲而成一乐者,唯宋鼓吹曲中有之。宋大驾鼓吹,恒用《导引》、《六州》、《十二时》三曲,梓宫发引则加《袝陵歌》,虞主回京则加《虞主歌》,各为四曲。南渡后郊祀,则于《导引》、《六州》、《十二时》三曲外,又加《奉禋歌》、《降仙台》二曲,共为五曲。合曲之体例始于鼓吹见之,若求之通常乐曲中,则合诸曲以成全体者实自诸宫调始。诸宫调者,小说之支流而被之以乐曲也,《碧

鸡漫志》云："熙宁、元丰间，泽州孔三传始创诸宫调古传，士大夫皆能诵之。"《梦粱录》云："说唱诸宫调，昨汴京有孔三传，编成传奇灵怪，入曲说唱。"《东京梦华录》记崇观以来瓦舍伎艺，有孔三传《耍秀才》诸宫调，《武林旧事》所载诸色伎艺人诸宫调传奇，有高郎妇等四人，则南北宋均有之。今其词尚存者，唯金董解元之《西厢》耳。董解元《西厢》，胡元瑞、焦理堂、施北研笔记中均有考订，讫不知为何体，沈德符《野获编》且妄以为金人院本模范，今考之，确为诸宫调无疑。观陶南村《辍耕录》谓金章宗董解元所编《西厢记》时代未远，犹罕有人能解之。则后人不识此体，固不足怪也。此编之为诸宫调有三证，本书卷一《太平赚》词云："俺平生情性好疏狂，疏狂的情性难拘束。一回家想么，诗魔多爱选多情曲。比前贤乐府不中听，在诸宫调里却着数。"此开卷自叙作词缘起，而自云"在诸宫调里"，其证一也。元凌云翰《柘轩词》有《定风波》词赋崔莺莺传，云："翻残金旧日诸宫调本，才入时人听。"则金人所赋西厢词自为诸宫调，其证二也。此书体例，求之古曲无一相似，独元王伯成《天宝遗事》见于《雍熙乐府》、《九宫大成》所选者，大致相同，而元钟嗣成《录鬼簿》于王伯成条下注云："有《天宝遗事》诸宫调行于世。"王词既为诸宫调，则董词之为诸宫调无疑，其证三也。其所以名"诸宫调"者，则由宋人所用大曲传踏不过一曲，其在同一宫调中甚明，唯此编每宫调中多或十余曲，少或一二曲，即易他宫调合若干宫调以咏一事，故谓之"诸宫调"。此于叙事最为便利。盖大曲等先有曲而后人借以咏事，此则制曲之始本为叙事而设，故宋、金杂剧院本中后亦用之，非徒供说唱之用而已。

（五）赚词　诸宫调之外又有赚词。赚词者，取一宫调之曲若干，合之以成一体。此体久为世人所不知。案《梦粱录》"绍兴年间有张五牛大夫，因听动鼓板中有《太平令》或赚鼓板，即今拍板大节抑扬处是也，遂撰为赚。赚者，误赚之之义，正堪美听中，不觉已至

尾声，是不宜为片序也。又有覆赚，其中变花前月下之情及铁骑之类”云云。是唱赚之中亦有敷演故事者，今已不传。其常用赚词今可于《事林广记》考见之，其前且有《唱赚规例》，惟不著其为何时人所作。考之他书，则当出南渡之后。词前有《遏云要诀》，“遏云”者，南宋歌社之名。按《武林旧事》“二月八日为相川张王生辰，霍山行宫朝拜极盛，百戏竞集，如绯绿社（杂剧）、齐云社（蹴球）、遏云社（唱赚）等”云云。《梦粱录》“社会”条下亦载之。今其词之首有《遏云要诀》、《遏云致语》，又云唱赚、道赚，而词中又有赚词，则为宋遏云社所唱赚词无疑也。所唱之曲，题为“圆社市语”。“圆社”谓蹴球，《事林广记》戊集“圆社摸场”条，起四句云：“四海齐云社，当场蹴气球。作家偏著所，圆社最风流。”今曲题如此，而曲中所使皆蹴球家语，则圆社为齐云社无疑。以遏云社之人，唱齐云社之事，谓非南宋人所作不可也。其词自结构观之则似北曲，自其曲名则疑为南曲。盖其用一宫调之曲，颇似北曲套数。其曲名，则《缕缕金》、《好孩儿》、《越恁好》三曲，均在南曲中吕宫，《紫苏丸》则在南曲仙吕宫，北曲中无此数调，《鹘打兔》则南北曲皆有，唯皆无《大夫娘》一曲。盖南北曲之形式及材料，在南宋已全具矣（《事林广记》所载之词，王氏《宋元戏曲史》具录原文，今从略）。

第三节　滑稽戏及其他

戏剧之构成有三要素焉。颠末悉具之本事，一也；被于管弦赴节和声之歌辞，二也；与歌辞相间之舞蹈，三也。上节所述，乃宋代乐曲之种类，即被于管弦赴节和声之歌辞也。舞蹈之术，粉墨登场者之所从事，兹不赘及。其颠末悉具之本事，据王国维考定，大致分为两种。其托故事以讽时事，不必尽符事实。而以所含之意义为主者，曰滑稽戏；其以表演事实为主者，曰小说杂戏。此二者后与乐曲、舞蹈相融合，而戏剧之体裁乃具。兹节录王氏所论述，以见其梗

概，欲窥其详则有王氏原书在。

(一)滑稽戏　王氏谓滑稽戏始于开元而盛于晚唐，李义山《骄儿》诗所云："忽复学参军，按声唤苍鹘。""参军"者，脚色之主。与之对待者，则为"苍鹘"。入宋以后，流变渐繁。其寻常玩讽以博欢笑者，有如刘攽《中山诗话》所记：

> 祥符、天禧中，杨大年、钱文僖、晏元献、刘子仪以文章立朝，为诗皆宗李义山，后进多窃义山语句。尝内宴，优人有为义山者，衣服败裂，告人曰："吾为诸馆职挦扯至此。"闻者欢笑。

又如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所记：

> 顷有秉政者，深被眷倚，言事无不从。一日，御宴，教坊杂剧为小商，自称姓赵，以瓦瓿卖沙糖。道逢故人，喜而拜之，伸足误踏瓿倒，糖流于地。小商弹采叹息曰："甜采，你即溜也怎奈何。"左右皆笑。俚语以王姓为甜采。

若其因戏语而箴讽时政，有合于古矇诵工谏之义者，则有如洪迈《夷坚志》所称述者：

> 蔡京作宰，弟卞为元枢。卞乃王安石婿，尊崇妇翁，当孔庙释奠时，跻于配享而封舒王。优人设孔子正坐，颜、孟与安石侍侧。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居上，孟辞曰："天下达尊，爵居其一。轲近蒙公爵，相公贵为真王，何必谦光如此?"遂揖颜，曰："回也陋巷匹夫，平生无分毫事业。公为命世真儒，位貌有间，辞之过矣。"安石遂处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避位，安石惶惧拱手，云"不敢"。往复未决，子路在外情愤不能堪，径趋从礼室，挽公冶长臂而出。公冶为窘迫之状谢曰："长何罪?"乃责数之曰："汝全不救护丈人，看取别人家女婿!"其意以讥卞也。时方议欲升安石于孟子之上，为此而止。

又如曾敏行《独醒杂志》所记：

> 崇宁二年铸大钱，蔡元长建议俾为折十，民间不便。优人

因内宴，为卖浆者或投一钱饮一杯而索偿其余。卖浆者对以："方出市未有钱，可更饮浆。"乃连饮至于五六，其人鼓腹曰："使相公改作折百钱，奈何？"上为之动，法由是改。又大农告乏时，有献廪俸减半之议。优人乃为衣冠之士，自束带衣裾，被身之物辄除其半，众怪而问之，则曰："减半。"已而两足共穿半裤，躄而来前，复问之，则又曰："减半。"乃长叹曰："但知减半，岂料难行？"语传禁中，亦遂罢议。

若夫表演于稠人广座，触权奸之怒，致伶人下狱论死者，则有如岳珂《桯史》所记：

秦桧以绍兴十五年四月丙子朔赐第望仙桥。丁丑，赐银绢万匹两、钱千万、彩千缣，有诏就第赐燕，假以教坊优伶，宰执咸与。中席，优长诵致语，退，有参军者前，褒桧功德，一伶以荷叶交椅从之。诙语杂至，宾欢既洽，参军方拱揖谢，将就椅，忽坠其幞头，乃总发为髻，如行伍之巾，后有大巾镮为双叠胜。伶指而问曰："此何镮？"曰："二圣镮。"遽以朴击其首曰："尔但坐太师交椅，请取银绢例物，此镮掉脑后可也！"一坐失色。桧怒，明日下伶于狱，有死者，于是语禁始益繁。

亦有缘此以姗侮君子者，如罗大经《鹤林玉露》所记：

端平间，真西山参大政，未及有所建置而薨。魏鹤山督师，亦未及有所设施而罢。临安优人装一儒生，手持一鹤，别一儒生与之解后，问其姓名，曰："姓钟名庸。"问所持何物，曰："大鹤也。"因倾盖欢然，呼酒对饮，其人大嚼洪吸，酒肉靡有孑遗。忽颠仆于地，群数人曳之不动，一人乃批其颊大骂曰："说甚《中庸》、《大学》，吃了许多酒食，一动也动不得。"遂一笑而罢。或谓其为此以姗侮君子者，府尹乃悉黥其人。

当北宋时，滑稽剧亦盛行于辽，《宋史·孔道辅传》："道辅奉使契丹，契丹宴使者，优人以文宣王为戏，道辅艴然径出。"又邵伯温

《闻见前录》："潞公谓温公曰：'吾留守北京，遣一人入大辽侦事回，云见辽主大宴群臣，伶人剧戏作衣冠者，见物必攫取怀之。有从其后以挺朴之者曰，司马端明耶！君实清名在夷狄如此？'温公愧谢。"金既代辽，此风弥甚，而北曲之体制渐完矣。宋室南渡之后，南方杂剧流行亦广，朱熹鄙视当时诗派，尝以村里杂剧为喻。明祝允明《猥谈》云："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剧'。"

王国维云："此种滑稽剧，宋人亦谓之杂剧，或谓之杂戏。吕本中《童蒙训》曰：'作杂剧者，打猛诨入，却打猛诨出。'吴自牧《梦粱录》亦云：'杂剧全用故事，务在滑稽。'（中略）是宋人杂剧固纯以诙谐为主，与唐之滑稽剧无异，但其中脚色较为著明而布置亦稍复杂，然不能被以歌舞，其去真正戏剧尚远。故欲知宋、元戏剧之渊源，不可不兼于他方面求之也。"他方面者，即前节所述之乐曲、次节所述之各种杂戏及次章所述之小说是已。

（二）小说杂戏　小说亦宋代新兴文学之一大宗，其源流详见后章，王氏谓："其发达之迹虽略与戏曲平行，而后世戏剧之题目多取诸此，其结构亦多依仿为之，所以资戏剧之发达者，实不少也。"是小说与乐曲二者之融为戏剧，犹之章、贡二水汇为赣江。文学体制之迁变，宜其然也。此外足以资戏剧之完成者，尚有傀儡、影戏、三教、讶鼓、舞队各种，皆当时之支流别派，后来同归于戏剧之海者也。

（甲）傀儡　傀儡起于周季。《列子》以偃师刻木人事为在周穆王时，或系寓言。然谓列子时已有此事，当不诬也。汉唐载籍，关于此事，多有可考。至宋而傀儡最盛，种类亦最繁，有悬丝傀儡、走线傀儡、杖头傀儡、药发傀儡、肉傀儡、水傀儡各种（见《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梦粱录》）。《梦粱录》云："凡傀儡，敷衍烟粉、灵怪、铁骑、公案、史书、历代君臣将相故事、话本，或讲史，或作杂剧，或如崖词。（中略）大抵弄此，多虚少实，如巨灵神、朱姬大仙等也。"则宋

时此戏，实与戏剧同时发达，其以敷衍故事为主，且较胜于滑稽剧，此于戏剧之进步上不能不注意也。

（乙）影戏　傀儡之外，似戏剧而非真戏剧者，尚有影戏。此则自宋始有之。《事物纪原》云："宋朝仁宗时，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吴蜀三分战争之象。"《东京梦华录》所载京瓦伎艺，有影戏、有乔影戏，南宋尤盛。《梦粱录》云："有弄影戏者，元汴京初以素纸雕簇，自后人巧工精，以羊皮雕形，以绿色装饰，不致损坏。（中略）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大抵真假相半。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刻以丑形，盖亦寓褒贬于其间耳。"然则影戏之为物，专以演故事为事，与傀儡同，此亦有助于戏剧之进步者也。

（丙）三教　《东京梦华录》云："十二月即有贫者三教人，为一火，装妇人神鬼，敲锣击鼓，巡门乞钱，俗呼为夜胡。"

（丁）讶鼓　《续墨客挥犀》云："王子醇初平熙河，边陲宁静，讲武之暇，因教军士为讶鼓戏，数年间，遂盛行于世。其举动舞装之状与优人之词，皆子醇初制也。或云，子醇初与西人对阵，兵未交，子醇命军士百余人装为讶鼓队，绕出军前。虏见皆愕眙，进兵奋击，大破之。"《朱子语类》亦云："如舞讶鼓，其间男子、妇人、僧道、杂色无所不有，但都是假的。"

（戊）舞队　《武林旧事》所纪舞队，全与前二者相似，其装作种种人物，或有故事，所以异于戏剧者则演剧有定所，此则巡回演之。然后来戏名、曲名中多用其名目，可知其与戏剧非毫无关系也。

第四节　曲　本

周密《武林旧事》所载官本杂剧段数计二百八十本，王国维氏就其目精密考之，则其用大曲者一百有三、用法曲者四，用诸宫调者二、用普通词调者三十有五。兹分别节叙于次：

(一)大曲一百有三本

(一)六幺二十本　(二)瀛府六本　(三)梁州七本　(四)伊州五本　(五)新水四本　(六)薄媚九本　(七)大明乐三本　(八)降黄龙五本　(九)胡渭州四本　(十)石州三本　(十一)大圣乐三本　(十二)中和乐四本　(十三)万年欢二本　(十四)熙州三本　(十五)道人欢四本　(十六)长寿仙三本　(十七)剑器二本　(十八)延寿乐二本　(十九)贺皇恩二本　(二十)采莲三本　(二十一)保金枝一本　(二十二)嘉庆乐一本　(二十三)庆云乐一本　(二十四)君臣相遇乐一本　(二十五)泛清波一本　(二十六)彩云归二本　(二十七)千春乐一本　(二十八)罢金钲一本

以上百有三本皆为大曲,其为曲二十有八,而其中二十有六在教坊部四十大曲中,《宋史·乐志》及《文献通考》均可互勘。其《降龙》一曲别据张炎《词源》考定,《熙州》一曲据洪迈《容斋随笔》考定,当系不列坊部之大曲也。

(二)法曲四本　《宋史·乐志》有法曲部,其曲二,一曰道调《宫望瀛》,二曰小石调《献仙音》。《词源》谓大曲片数(即遍数)与法曲相上下,则二者略相似也。

(三)诸宫调二本　按此即以诸宫调填曲也。

(四)普通词调三十本

(五)其不见于宋词而见于金元曲调者九本

王氏云:"此二百八十本中,其用大曲、法曲、诸宫调、词曲调者共一百五十余本,已过全数之半,则南宋杂剧殆多以歌曲演之,与滑稽戏迥异。其用大曲、法曲、诸宫调者,则曲之片数颇多,以敷衍一故事自觉不难;其单用词调及曲调者只有一曲,当以此曲循环敷演,如传踏之例,此在元、明南曲中尚得发见其例也。"又谓此二百八十本不皆纯正之戏剧,其考证详见原书,文繁不具录。

此项官本杂剧虽著录于宋末，然其中实有北宋之戏曲，不可不知也。据王氏考证，有如《王子高六幺》一本，实神宗元丰以前之作。赵彦卫《云麓漫钞》载："王迥，字子高。旧有周琼姬事，胡徽之为作传，或用其传作六幺。"朱彧《萍洲可谈》亦云："王迥美姿容，有才思。少年时不甚持重，间为狎邪辈所诬，播入乐府。今六幺所歌奇俊王家郎者，乃迥也。元丰初，蔡持正举之，可任监司，神宗忽云：'此乃奇俊王家郎乎？'持正叩头请罪。"则此曲实作于神宗时，然至南宋末尚存，吴文英《梦窗乙稿》中《惜秋华》词自注尚及之，然其为北宋之作，无可疑也。又如《三爷老大明乐》、《病爷老剑器》二本，中国夙未闻有此，疑是契丹语。《唐书·房琯传》："彼曳落河虽多，岂能当我刘秩等。""曳落河"即《辽史》屡见之"拽剌"，《辽史·百官志》云："走卒谓之拽剌。"元马致远《荐福碑》杂剧尚有"曳剌"，为从傔之属。"爷老"二字，当亦"曳剌"之同音异译。此必北宋与辽盟聘时输入之语，则此二本当亦为北宋之作。以此推之，恐尚不止此数本。然则此二百八十本，与其视为南宋之作，不若视为两宋之作为妥也。

盖戏曲之作始于何时，虽无从为详实之考定，然宋《崇文总目》已有《周优人曲辞》二卷，原释云："周吏部侍郎赵上交、翰林学士李昉、谏议大夫刘陶、司勋郎中冯古纂录燕优人曲辞。"此燕为守光之燕或契丹之燕，其曲词为乐曲或剧曲，均不可考。《宋史·乐志》亦言："真宗不喜郑声，而或为杂剧词，未尝宣布于外。"《梦粱录》亦云："向者汴京教坊大使孟角球曾做杂剧本子，葛守诚撰四十大曲。"则北宋已有戏曲无疑矣。

第五节　脚　色

于此有当赘及者，戏剧中之脚色，宋人书中亦有可考之资料。据王氏所考定者，节录其要如次：

脚色之名，在唐时只有“参军”、“苍鹘”，至宋而其名稍繁。《梦粱录》云：“杂剧中‘末泥’为长，每一场四人或五人。（中略）‘末泥色’主张，‘引戏色’分付，‘副净色’发乔，‘副末色’打诨。或添一人，名曰‘装孤’。”《辍耕录》所述略同。唯《武林旧事》所载乾淳教坊乐部中，杂剧三甲，一甲或八人或五人，其所列脚色五，则有“戏头”而无“末泥”，有“装旦”而无“装孤”，而“引戏”、“副净”、“副末”三色则同，唯“副净”则谓之“次净”耳。《梦粱录》谓“杂剧中末泥为长”，则“末泥”或即“戏头”。然“戏头”、“引戏”实出古舞中之“舞头”、“引舞”，则“末泥”亦当出于古舞中之“舞末”。《东京梦华录》云：“舞旋多是雷中庆，舞曲破攧前一遍舞者入场，至歇拍，一人入场，对舞数拍，前舞者退，独后舞者终其曲，谓之‘舞末’。”末之名当出于此。又长言之，则为“末尼”也。“净”者，“参军”之促音。宋代演剧时，“参军色”手执竹竿子以句之（见《东京梦华录》），亦如唐代协律郎之举麾乐作偃麾乐止相似，故参军亦谓之“竹竿子”。由是观之，则“末泥色”以主张为职，“参军色”以指麾为职，不亲在搬演之列。故宋戏剧中，“净”、“末”二色反不如“副净”、“副末”之著也。

《梦粱录》所谓“‘末泥色’主张，‘引戏色’分付，‘副净色’发乔，‘副末色’打诨”，此四语实能道尽宋代脚色之职分也。“主张”、“分付”，皆编排命令之事，故其自身不复演剧。“发乔”者，盖乔作愚谬之态以供嘲讽，而“打诨”则益发挥之以成一笑柄也。试细玩滑稽剧，无在不可见“发乔”、“打诨”二者之关系。至他杂剧虽不知如何，然谓“副净”、“副末”二色为古剧中最重之脚色，无不可也。

至“装孤”、“装旦”二语，亦有可寻味者。元人脚色中有“孤”、有“旦”，其实二者非脚色之名。“孤”者当时官吏之称，“旦”者妇女之称，其假作官吏、妇女者，谓之“装孤”、“装旦”则可，若径谓之“孤”与“旦”则已过矣。“孤”者，当以帝王官吏自称孤寡，故谓之“孤”。“旦”与“姐”不知其义，然《青楼集》谓张奔儿为风流旦、李娇儿为温

柔旦，则“旦”疑为宋元倡伎之称。优伶本非官吏，又非妇人，故其假作官吏妇人者，谓之“装孤”、“装旦”也。

宋时杂剧，歌者与演者果否一人，亦所当考。滑稽剧之言语必由演者自言之，至自唱歌曲与否，则当视此时已有代言体之戏曲与否以为断。若仅有叙事体之曲，则歌唱与动作或尚分为二事。惜其剧本无一存者，今遂无从论定耳。

第七章　宋之小说

第一节　诨词小说之由来

小说家昉于两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云：

>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如淳注："细米为稗。街谈巷语，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此盖与周代国风相似。王者采以入官，可资政治得失之参考者也。魏晋六朝，代有作者，然皆细碎之言，大率以记佚事、志怪异为宗。至唐而作者弥众，始有专述一人一事之短篇，所谓传奇小说是也。其体裁为秾艳绮缛之文言，大抵骚人墨客著述上之余事也。

宋之小说所以度越前代者，盖其作者不以专门著作为事，而以对于一般社会传播灌输为事，是曰诨词小说。诨者，突梯滑稽博人笑粲，以视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其猥琐盖又加甚焉。

诨词小说在宋代渐次发达之程序，据近人考证，大抵萌芽于北宋仁宗以前，逮南渡以后至理宗朝而大盛，今所传世之话本数种，多南渡后作品也。仁宗时，宋兴方百年，海内承平，文物烂然，诨词小说遂应运而作，明郎瑛《七修类稿》云：

> 小说起宋仁宗，盖时太平甚久，国家闲暇，日欲进一奇怪之事以娱之，故小说得胜头回之后，即云"话说赵宋某年"。

是时不独宫禁以此为娱，民间亦有之。《东坡志林》云："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

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亦谓当时京瓦伎艺，有“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

别有所谓“淘真”者，说话而杂以谈唱，亦始于北宋。《七修类稿》又云：

> 闾阎淘真之本之起，亦曰：“太祖、太宗、真宗帝，四祖仁宗有道君。”国初瞿存斋过汴之诗有云：“陌头盲女无愁恨，能拨琵琶说赵家。”皆指宋也。

“淘真”一作“陶真”，《尧山堂外记》云：“杭州瞽女唱古今小说评话，谓之‘陶真’。”南渡后，孝宗受禅，以天下养太上，命侍从访民间故事，日进一回说话人，而诨词小说乃益盛行。明人刊《古今小说》序云：

> 南宋供奉局有说话人，如今说书之流。

是则禁中以此为娱，且有专司其事者矣。洪迈《夷坚志》云：“吕德卿偕其友同出嘉会门外茶肆中坐，见有幅纸云‘今晚讲说《汉书》。’”又吴自牧《梦粱录》云：“有王六大夫，于咸淳间敷衍《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听者纷纷。”是时民间相习成风，倘所谓草上之风必偃欤。

第二节　说话人之家数

由上节观之，今所传世之宋人平话，莫非当时说话人之底本。孝宗时，禁中有说话人隶供奉局，若在民间者则家数不一，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举其目凡五：

(一) 小说　　(二) 合生　　(三) 说诨话

(四) 说三分　　(五) 说五代史

吴自牧《梦粱录》则分为下列四家：

(一) 小说　　(二) 谈经——说参　　(三) 讲史书

（四）合生

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亦分为四家，大致同《梦粱录》。谈经说参者，谈佛学说参禅也。讲史与小说异派，而小说一家又分下列三类：

（一）银字儿　如烟粉、灵怪、传奇。

（二）说公案　如搏拳提刀赶棒及发迹变态之事。

（三）说铁骑儿　如士马金鼓之事。

周密《武林旧事》载诸色伎艺人，与杂剧、傀儡、影戏等并举者，亦分四家如下：

（一）演史　乔万卷以下二十三人（张小娘子、宋小娘子、陈小娘子三女流）

（二）说经诨经　长啸和尚以下十七人（有陆妙慧、陆妙静二女流）

（三）小说　蔡和以下五十二人（有女流史惠英）

（四）说诨话　蛮张四郎（一人）

《武林旧事》独缺"合生"一家。按高承《事物纪原》云：

《唐书·武平一传》："平一上书，此来妖伎胡人，于御坐之前，或言妃主情貌，或刊王公名质，咏歌舞蹈，名曰'合生'。始自王公，稍及闾巷。"即是合生之原起自唐中宗时也，今人亦谓之"唱题目"。

是则"合生"者，说话而兼有歌舞，合于杂剧之性质居多，与小说之关系较浅。

第三节　传世之话本四种

钱曾《也是园书目》戏曲部有宋人词话十二种，其目如下：

灯花婆婆　风吹轿儿　冯玉梅团圆　种瓜张老　错斩崔宁　简帖和尚　紫罗盖头　小亭儿　李焕生五阵雨　女报冤

西湖三塔　小金钱

"词话"者，说话而间以词也。宋人话本见于清代藏书家目录者只此。而此十二种中，今惟《冯玉梅团圆》及《错斩崔宁》两种复传于世，至《平妖传》卷首以《灯花婆婆》为引子，则已非全文矣。

宋人话本今所次第复出于人间者，《宣和遗事》最先。清嘉庆间黄丕烈刊入"士礼居丛书"中，近年商务印书馆复校定印行，有孙毓修跋云：

> 《宣和遗事》旧传士礼居二卷本，黄荛翁跋谓："戊辰冬得一本，己巳春游杭州登城隍山，于坊间又获一本，与前所得本正同，而前所缺失一一完好，原本多讹舛处，复赖旧钞校之。以卷中'惇'避讳作'惇'证之，当出宋刊"云云。是黄氏所据者，乃合二残刻、一旧钞参校而成。前年宗室盛意园之书散出，中有《宣和遗事》一种，卷首题"金陵王氏洛川校正重刊"一行，"惇"字亦阙笔作"惇"，以元、亨、利、贞离为四集，俗文讹字，弥望皆是。盖宋元人词话，多当时坊肆雕本，故写校不工，所见《五代史平话》等书亦然。取校黄刻，此本较多佳处，黄本缺字亦赖此补出，且首尾完善，偶有脱叶，亦经前人补足。黄先生未见全本，今居然见之，岂不可喜！因为付印，以广其传。至黄本二卷而此分四集，则《述古堂书目》、《百川书志》俱载四卷，当是高、钱二家编录之时改集为卷，免与他书歧出耳。此书宋时实有二本，如魏野《东观集》之类，不必致疑也。元本半叶九行，行二十字，今录副时误九行为十行，手民仍之，兹为记出，以存古书面目。乙卯八月，孙毓修跋于涵芬楼。

其次为《五代史平话》，清末曹元忠得于常熟张敦伯家，经董康影印行世。曹元忠跋云：

> 宋巾箱本《五代史平话》，于梁、唐、晋、汉、周各分上下二卷，惜梁史、汉史皆缺下卷，虽上卷尚存回目，而梁史已敚去数

叶，不能补矣。元忠于光绪辛丑游杭，得自常熟张大令敦伯家，以压归装。顾各家书目皆未著录，博访通人，亦惊以为罕见秘籍。偶忆《梦粱录》小说讲经史门有云："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有戴书生、周进士、张小娘子、宋小娘子、丘机山、徐宣教。"疑此平话或出南渡小说家所为而书贾刻之，故目录及每卷首尾辄大书"新编五代某史平话"也。惟刊自坊肆，每于宋讳不能尽避，其称魏徵及贞观处则皆作"魏证"、"正观"，要亦当时习惯使然。是书近为吾友武进董大理授经景刊行世，写刻之精，无异宋椠，他日藏书家或与士礼居本《宣和遗事》并传乎？宣统辛亥七月，吴曹元忠跋于京邸之凌波榭。

又其次为《京本通俗小说》，民国四年缪荃孙得于亲串妆奁中，刻入《烟画东堂小品》。所得凡九种，仅刻七种，其目如下：

碾玉观音　菩萨蛮　西山一窟鬼　志诚张主管　拗相公　错斩崔宁　冯玉梅团圆

以上七种，原第十卷至十六卷，盖残本也。缪荃孙跋云：

宋人平话即章回小说。《梦粱录》云："说话有四家，以小说家为最。"此事盛行于南北宋，特藏书家不甚重之，坊贾又改头换面，轻易名目，遂至传本寥寥天壤。前只士礼居重刻《宣和遗事》，近则曹君直重刻《五代史平话》，为天壤不易见之书。余避难沪上，索居无俚，闻亲串妆奁中有旧钞本书，类乎平话。假而得之，杂庋于《天雨花》、《凤双飞》之中，搜得四册，破烂磨灭，的是影元人写本。首行"京本通俗小说第□卷"，通体皆减笔小写，阅之令人失笑。三册尚有钱遵王图书，盖即也是园中物。《错斩崔宁》、《冯玉梅团圆》二回见于书目，而宋人词话标题"词"字乃"评"字讹耳。所引诗词皆出宋人，雅韵欲流，并有可考者。如《碾玉观音》一段，"三镇节度延安郡王"指韩蕲王、"秦

州雄武军刘两府"是刘琦、"杨和王"是杨沂中，官衔均不错。尚有《定州三怪》一回破碎太甚，《金主亮荒淫》两卷过于秽亵，未敢传摹。与也是园有合有不合，亦不知其故。岁在旃蒙单阏，江东老蟫跋。

缪氏所遗之《金主亮荒淫》两卷，后经叶德辉刊行，题曰《金虏海陵王荒淫》，则原第二十一卷也。叶德辉跋云：

此《京本通俗小说》中之二十一卷。所叙乃金主亮荒淫之事，一一与《金史·后妃列传》海陵妃嬖诸传相合，当时修史诸臣或据记载采入，非甚之之辞也。书中译名多同旧本《金史》，与今武英殿本重译者小异，然殿本固注明原译，可复按也。《京本小说》为虞山钱遵王述古堂藏书，其前《碾玉观音》、《冯玉梅团圆》、《拗相公》、《西山一窟鬼》等七种已经艺风老人影写刊行，馀此一卷，以秽亵弃之。吾谓金亮起自戎索，荼毒中原，恃其武威，淫暴无复人理，所谓罪浮于桀纣，虐过于政广。史臣谓其戾气感召，身由恶终，使天下后世，称无道主者以海陵王为首，洵不诬也。是书传自《金史》，译于宋人，非独恨其为国仇，亦有族类之感。故一则曰"虏中书"，再则曰"骚挞子"，描写金亮禽兽之行，颇觉酣畅淋漓。其稍异者，此书谓萧拱与柔妃有染，亮故杀之。史则谓妃入宫非处子，亮疑萧拱，竟致之死，意史臣为萧拱讳与？时在丁巳闰二月春分，郎园记。

又有再跋云：

中国风俗语言，皆随时随地而变更。三代以上有方言、有文言。其后蛮夷通道，侵入蛮语；五胡乱华，杂以胡言。迨用之日久，不独语言袭之，即行文亦袭之。周秦诸子、《史》、《汉》以后至于南北各史亦皆袭之。唐以来，古文义法行，而此等方言俚语，遂不见于文人记载之书，而或时见唐宋人小说中，然不能详也。详者惟传奇杂剧，及金元人北曲。按其辞多无意义，

且不知其来历也。今此书中所引谚语,如“鸡踏雄,狗交恋”、“羊肉不得吃,空惹一身臊”、“癞蛤蟆躲在阴沟洞里,指望天鹅肉吃”、“嘻嘻哈哈,不要惹他。脸儿狠狠,一问就肯”、“黄花女儿做媒,自身难保”等类,今皆有之。又如讥翁奸妇曰“爬灰”,屈指时光曰“约摸”,亦作“约莫”,称人貌美曰“标致”,听人戏弄曰“听人做作”,男女交合曰“干事”,拔擢人曰“抬举”,人有邪行曰“不正气”,设计诱人曰“圈套”,允诺此事曰“招架”,作事细致曰“水磨工夫”,求免曰“告饶”,此件事曰“这桩事”,舍此处往他处曰“跳槽”,骂人曰“狗才”,奴仆曰“小底”,获利曰“撰钱”,器物曰“家伙”,妇人称男子曰“活宝”,亦相沿至今而未改变。其他“竹夫人”、“汤婆子”等物名,今皆相同。假使当时此等小说流传尚多,正不知有多少隽语也。丁巳夏五再记。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最后出,亦话本也。而曰“诗话”者,以其说话而杂以诗句也。故《也是园书目》所谓“词话”,未必“评话”之讹。此乃日本三浦将军所藏,罗振玉假以影印,时在民国五年。叶德辉补刻《海陵王荒淫》一卷,尚在其后。王国维跋云:

宋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三卷,日本高山寺旧藏。今在三浦将军处,阙卷上第一叶,卷中第二三叶。卷末有“中瓦子张家印”款一行。中瓦子为宋临安府街名,倡优剧场之所在也。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云:“杭州之瓦舍,内外合计有十七处。如清冷桥熙春楼下谓之南瓦子、市南坊北三元楼前谓之中瓦子。”又卷十五:“铺席门保佑坊前张官人经史文籍铺,其次即为中瓦子前诸铺。”此云“中瓦子张家印”盖即《梦粱录》之张官人经史子文籍铺。南宋临安书肆,若太庙前尹家、太学前陆家、鞔鼓桥陈家,所刊书籍,世多知之。中瓦子张家,唯此一见而已。此书与《五代平话》、《京本小说》及《宣和遗事》体例略同。三卷之书,共分十七节,亦后世小说分章回之祖。其称“诗话”,

非唐宋士大夫所谓“诗话”，以其中有诗有话，故得此名。其有词有话者，则谓之“词话”。《也是园书目》有宋人词话十六种，《宣和遗事》其一也。词话之名，非遵王所能杜撰，必此十六种中有题词话者。此有诗无词，故名“诗话”，皆《梦粱录》、《都城纪胜》所谓说话之一种也。书中载玄奘取经皆出猴行者之力，即《西游演义》所本。又考陶南村《辍耕录》所载院本名目，实金人之作，中有《唐三藏》一本。《录鬼簿》载元吴昌龄杂剧，有《唐三藏西天取经》，其书至国初尚存。《也是园书目》有吴昌龄《西游记》四卷，《曹楝亭书目》有《西游记》六卷，无名氏传奇汇考，亦有《北西游记》云。今用北曲，元人作，盖即昌龄所撰杂剧也。今金人院本、元人杂剧皆佚，而南宋人所撰话本尚存。岂非人间希有之秘笈乎？闻日本德富苏峰尚藏一大字本，题“大唐三藏取经记”，不知与小字本异同何如也？乙卯春，海宁王国维。

又罗振玉跋云：

宋人平话传世最少，旧但有《宣和遗事》而已。近年若《五代平话》、《京本小说》，渐有重刊本，此外仍不多见。此三浦将军所藏，予借付景印，宋人平话之传人间者，遂得四种。《四库全书总目》杂史类存目《平播始末》条，言《永乐大典》有平话一门，所收至夥，皆优人以前代轶事敷衍成文而口说之。今《大典》已散佚，庚子拳匪之乱，翰林院火，《大典》烬余，有以糊油篓及包裹食物者，其幸完者皆流入海外。辛亥国变，官寺所储亦为人盗窃分散，今一册不存，平话一门不知人间尚存残帙否？念之慨叹！丙辰九月，上虞罗振玉记。

观上列诸家跋语，可知各种话本之次第复见于人间，除《宣和遗事》外，皆在近二十年内，至文学家津津乐道之，又最近十余年来事也。

宋代平话原本复见于世者，具如上述，其为明人所辑刻者，则

有《古今小说》及《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此四书我国今日已无传本，惟日本尚有之。据日本盐谷温所撰《论明之小说"三言"及其他》一文，及其"宋明通俗小说流传表"，则上述之《京本通俗小说》八种皆辗转传刻，易其名而存其实，兹列表于下：

《京本通俗小说》	《警世通言》
拗相公	拗相公饮恨半山堂
菩萨蛮	陈可常端阳仙化
碾玉观音	崔待诏生死冤家
冯玉梅团圆	范鳅儿双镜重圆
西山一窟鬼	一窟鬼懒道人除怪
志诚张主管	张主管志诚脱奇祸
	《醒世恒言》
金虏海陵王荒淫	金海陵纵欲亡身
错斩崔宁	十五贯戏言成巧祸

盐谷温氏"宋明通俗小说流传表"内具列《古今小说》及"三言"全目，其间当不乏宋人原本，不仅此八种已也。欲考其详，有盐谷温氏原书在，兹不赘述。

第四节　话本作者之时代

《宣和遗事》之复传于世，虽远在有清嘉庆间，然苟以文学眼光测之，其艺术殊劣。若更加考证，则此书作者或非宋人。此书可分两大部分。元集、亨集为白话，叙述宋江作乱及徽宗幸李师师两段故事；利集、贞集为浅近文言，叙述金兵南下、二帝北狩以迄高宗偏安、秦桧用事，皆史事也。贞集录刘后村咏史诗一首，作全书结束。按刘克庄生于宋淳熙十四年丁未，卒于宋咸淳五年己巳，又十年为己卯而宋亡。是此书之成，最早当在南宋垂亡之前。又元集述太宗与陈抟论治道一节云：

> 太宗欲定京都，闻得华山陈希夷先生名抟表德图南的，精于数学，预知未来之事，宣至殿下。太宗与论治道，留之数日。一日，太宗问："朕立国以来，将来运祚如何？"陈抟奏道："宋朝以仁得天下，以义结人心，不患不久长。但卜都之地，一汴、二杭、三闽、四广。"太宗再三诘问，抟但唯唯不言而已。在后高宗中兴，定都杭州，盖将前定之数，亦非偶然也。

此处虽未明言迁闽、迁广之事实，以符所谓前定之数，然自来小说家言，往往就过去之陈迹衍为豫知之神话。宋之亡也，陆秀夫负帝昺赴海死，或作者已及见其事，故于书中述陈抟豫知未来云云。遂附会之以神其说，是则此书之成或竟在入元以后，其作者或是宋之遗民耳！

又此书利、贞两集所叙事实，皆抄自宋人史部诸书，或直录、或节录、或夹录、或译录，即其元、亨两集，或当时另有两种通俗小说专述宋江与李师师故事，作者全部录入，稍加贯穿而名之曰"宣和遗事"，杂凑成书，故亦无复章法可言。近人著中国小说史，略谓"《宣和遗事》乃由作者掇拾故事，益以小说，补缀联属，勉成一书"，又因书中"吕省元"、"南儒"皆元代语，其称宋高宗直呼"皇子构"，不避庙讳，疑此书或出元人，或宋人旧本而元时增修，皆不可知。

《京本通俗小说》，今复出于世者八种，就其原文钩证，类多作于南宋。如《冯玉梅团圆》篇云"我宋建炎年间"，《错斩崔宁》篇云"我朝元丰年间"，《菩萨蛮》篇云"大宋绍兴年间"，《拗相公》篇云"我宋元气都为熙宁变法所坏"，此皆可证明通俗小说产生之时代为南宋。又《菩萨蛮》篇与《冯玉梅团圆》篇皆称高宗，高宗崩于公元1187年，则此等小说作于孝宗以后，又可证明。至《海陵王荒淫》一篇内称："我朝端平皇帝破灭金国，直取三京，军士回杭，带得虏中书籍不少。"按"端平"乃宋理宗年号，是时宋人与蒙古同灭金国，后四十余年蒙古南侵，南宋亦亡，则《海陵王荒淫》一篇必作于宋室垂

亡之时无疑也。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据王国维跋，以其卷末有“中瓦子张家印”款一行，定为南宋刊本。其为宋人著作，自可断言。

《新编五代史平话》，曹元忠跋疑其每于宋讳不能尽避，而又以当时习惯使然为解。今按《周史》卷下始叙及宋太祖，则曰“是时宋太祖赵匡胤为世宗宿卫将”，似非宋人口吻。又《周史》卷上叙郭威即位处，间以诗云：“忆昔潭州推戴时，欺人寡妇与孤儿。周朝才得九年后，寡妇孤儿又被欺。”又卷下开篇诗曰：“五代都来十二君，世宗英特更仁明。（中略）皇天倘假数年寿，坐使中原见太平。”似皆不为宋太祖留余地。其不能尽避宋讳，又不仅区区名字已也。然则今所传世之《五代史平话》，或亦宋人原本而经元人窜定者欤？故宋人平话之尚传人间者仅四种，而《宣和遗事》与《五代平话》又皆元人重订之本，非宋时原书矣。

第五节　各种话本之艺术观

若以体裁之优拙评次上述各平话之高下，则《京本通俗小说》八种，实为鼓舞元、明白话文学之前茅。盖此种短篇小说之体裁，为后来白话小说所沿袭者，可于后述两端见之。

每种开端有所谓“得胜头回”者，别叙他事，隐括全文大意。如《错斩崔宁》开端云：

> 这回书单说一个官人，只因酒后一时戏笑之言，遂至杀身破家，陷了几条性命。且先引下一个故事来，权做个得胜头回。

此种小说之体制，什九先以闲话或他事，后乃缀合以入正文，大抵诗词之外亦用故实，或取相类、或取不同而多为时事，取不同者由反入正，取相类者较有浅深，忽而相牵，转入本事，故叙述方始而主意已明。凡其上半谓之“得胜头回”，盖说书人开讲之前，听众未齐，打鼓开场，须先讲诗词或说故事。如《碾玉观音》用诗词为引

子，《西山一窟鬼》连用十五首词为引子，《错斩崔宁》以魏进士故事为引子，《冯玉梅团圆》以徐信夫妻团圆为引子，此皆说话开场之"得胜头回"也。此法后来遂成为小说开篇之公式，短篇小说如《今古奇观》、《醉醒石》等，长篇小说如《平妖传》、《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等，莫不沿用此例。

复次，每种或分若干回，其分回处，往往在一段事实之紧要关头，此法亦为后来章回小说所沿用。一回应作一次解，盖说书者说至紧要关头，听众正聚精会神，亟欲知其究竟如何之时，而说书者忽然起立，宣诵收场诗两句，而续其下曰："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于是息鼓收摊，向听众告别而去，此之谓"一回书"。

通俗小说中，《碾玉观音》分上下两回。上回之末，叙述崔宁与秀秀逃居潭州，某日，宁至湘潭县揽得玉作生活，回路归家。其下文云：

> 正行间，只见一个汉子，头上带个竹丝笠儿。（中略）挑着一个高肩担儿，正面来，把崔宁看了一看。崔宁却不见这汉面貌，这个人却见崔宁，大踏步尾着崔宁来。正是：
>
> 谁家稚子鸣榔板，惊起鸳鸯两处飞。

此正全书紧要关头，而说话人说至此处，诵收场诗两句，忽告停止，第一回遂完。下回说话人却另从刘两府之词说起，遥遥转入崔宁。此种分段法，与后来长篇小说分回完全相同。如《水浒传》第八回之末写林冲被绑在树上，下文云：

> 薛霸便提起水火棍来，望着林冲脑袋上劈将来，可怜豪杰束手就死。正是：
>
> 万里黄泉无旅店，三魂今夜落谁家。
>
> 毕竟林冲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试持此以例《碾玉观音》分段处，可以知其演变之迹矣。

上述两端，悉本近人胡适所撰《宋人话本八种序》。胡氏又评定此八种中，《拗相公》一篇章法井然，《错斩崔宁》一篇描写精细。据

此而论，不能不承认南宋末年白话文已臻发达，所谓活文学之基础已大定矣。其评《拗相公》也，谓《拗相公》一篇必属知识阶级中人所作，章法颇有条理，内容正代表元祐党人后辈之见解。但作者甚有剪裁之能力，单写王安石罢相南归时途中亲身经历之事，使读者深觉有天怒人怨之景象，《宣和遗事》亦有骂安石一大段，但无文学意味，与此篇相较实有天渊之别。今日读者或为安石不平，但终不能否认南宋时代有此种反对安石之舆论，亦终不能否认此篇《拗相公》有文学趣味，骂人之言词巧妙便成一种艺术。

又其评《错斩崔宁》也，谓以小说之结构观之，《拗相公》一篇固甚佳，但只是一种巧妙之政治宣传品，实不得称为“通俗小说”，从文学上观之，《错斩崔宁》一篇当推为八篇中第一佳作，乃纯粹叙述故事之小说，描写甚细腻而有趣味，使人一气读下不肯释卷，其中亦无牵涉神鬼迷信之不自然之穿插，全用故事之本身，始终一气贯注。其中关系全篇布局之一段写得最佳，记叙与对话亦佳：

> 却说刘官人驮了钱，一步一步捱到家中敲门，已是点灯时分。小娘子二姐独自在家，没有一些事做，守得天黑，闭了门在灯下打瞌睡。刘官人打门，他那里便听见？敲了半晌方才知觉，答应一声“来了”，起身开了门。刘官人进去，到了房中，二姐替刘官人接了钱，放在桌上，便问：“官人何处挪移这项钱来，却是甚用？”那刘官人一来有了几分酒，二来怪他开得门迟了，且戏言吓他一吓。便道：“说出来又恐你见怪，不说时又须道你得知。只是我一时无奈，没计可施，只得把你典与一个客人，又因舍不得你，只典得十五贯钱。若是我有些好处，加利赎你回来，若是照前这般不顺溜，只索罢了。”那小娘子听了，欲待不信，又见十五贯钱堆在面前；欲待信来，他平白与我没半句言语，大娘子又过得好，怎么便下得这样狠心辣手？狐疑不决，只得再问道：“虽然如此，也须通知我爹娘一声。”刘官人道：“若是

> 通知你爹娘，此事断然不成。你明日且到了人家，我慢慢央人与你爹娘说通，他也须怪我不得。"小娘子又问："官人今日何处吃酒来？"刘官人道："便是把你典与人，写了文书，吃他的酒才来的。"小娘子又问："大姐姐如何不来？"刘官人道："他因为不忍见你分离，待得你明日出了门才来。这也是我没计奈何，一言为定。"说罢，暗地忍不住笑，不脱衣裳睡在床上，不觉睡去了。那小娘好生摆脱不下："不知他卖我与甚色样人家？我预先去爹娘家里说知，就是他明日有人来要我，寻到我家，也须有个下落。"沉吟一会，却把这十五贯钱一垛儿堆在刘官人脚后边，趁他酒醉，轻轻的收拾了随身衣服，款款的开了门出去，拽上了门，却去左边一个相熟的邻舍叫做朱三老儿家里，与朱三妈借宿了一夜，说道："丈夫今日无端卖我，我须先去与爹娘说知，烦你明日对他说一声。既有了主顾，可同我丈夫到爹娘家中来讨个分晓，也须有个下落。"那邻舍道："小娘子说得有理。你只顾自去，我便与刘官人说知就里。"过了一宵，小娘子作别去了。

胡氏谓如此细腻之描写、漂亮之对话，乃白话散文文学正式成立之纪元。可以与此一段抗衡者，尚有《西山一窟鬼》中王婆说媒之一段，与《海陵王荒淫》中贵哥定哥说风情之一大段。此三大段，皆代表发达至甚高地步之白话散文，《五代史平话》、《宣和遗事》、《唐三藏取经诗话》中所未有也。

胡氏自述，始尝以为元人文学程度幼稚，元代尚是白话文草创时代，决非成人时代，两宋更无论矣。及见《京本通俗小说》，乃知南宋晚年之白话小说已甚发达。特其思想或尚幼稚，如《西山一窟鬼》；见解或甚错误，如《拗相公》；材料或不免杂乱，如《海陵王荒淫》及《宣和遗事》，未能尽美尽善耳。

第八章　宋文学作者小传

第一节　宋散体文作者(依第二章论述之先后为序)

柳开,字仲涂。大名人。著书自号东郊野夫,又号补亡先生,作二传以见意。开宝六年进士,历典州郡,终于如京使。有《河东集》十五卷、附录一卷。

梁周翰,字元褒。郑州管城人。十岁能属词。周广顺二年举进士,入宋为秘书郎,直史馆。真宗在储宫知其名,及即位,擢为翰林学士,迁工部侍郎。有集五十卷,不传。

高锡,字天福。河中虞乡人。幼颖悟能属文。汉乾祐中举进士,入宋官左拾遗、知制诰,加屯田员外郎。太平兴国八年卒。

范杲,字师回。大名宗城人,宰相质兄子也。太宗朝官知制诰,改右谏议大夫、知濠州,召修《太祖实录》,至京师而卒。与柳开善,更相引重,始终无间。

王禹偁,字元之。济州钜野人。太平兴国八年进士,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屡以事谪守郡,终于知蕲州。有《小畜集》三十卷、《小畜外集》七卷。

范仲淹,字希文。其先邠州人,后徙家江南,遂为吴县人。大中祥符八年进士,历官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知青州,卒赠兵部尚书、谥文正。有《文正集》二十卷、别集四卷、补编五卷。

丁谓,字谓之,后更字公言。苏州长洲人。淳化三年登进士甲科,真宗朝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进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平章事兼太子少师,旋拜司空,封晋国公。仁宗即位,进司徒兼侍郎,为山陵使,后贬崖州,明道中卒于光州。所著

诗文数万言，不传。

孙何，字汉公。蔡州汝阳人。十岁识音韵，十五能属文。淳化三年登进士甲科，真宗朝官至知制诰。有集四十卷，不传。

孙仅，字邻几。少勤学，与兄何俱有名于时。咸平元年登进士甲科，真宗朝官至左谏议大夫，知河中府。有集五十卷，不传。

孙甫，字之翰。许州阳翟人。少好学，慕孙何为古文章。举进士，历官中外，终于侍读，卒赠右谏议大夫。有文集七卷，不传。

夏竦，字子乔。江州德安人。景德三年举贤良方正，官至武宁军节度使，谥文庄。有《文庄集》三十六卷。

宋庠，字公序。安陆人，徙居雍丘。天圣二年进士第一，历官检校太尉平章事、枢密使，封莒国公，以司空致仕，卒谥元宪。有《宋元宪集》四十卷。

宋祁，字子京。庠弟也。天圣二年进士，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卒谥景文。有《宋景文集》六十二卷、补遗一卷、附录一卷。

苏舜钦，字子美。其先梓州人，家开封。景祐中进士，累迁集贤校理，监进奏院，坐事除名，后复为湖州长史而卒。有《苏学士集》十六卷。

穆修，字伯长。郓州人。苏舜钦集有修哀文，称其咸平中举进士得出身，而集中《上颍州刘侍郎书》称其以大中祥符中窃进士第，邵伯温《易学辨惑》亦称修为祥符二年梁固榜进士，《宋史》本传又云真宗东封，诏举齐鲁经行之士，修预选，赐进士出身。所述小异，似当以自叙为确也。有《穆参军集》三卷、附录遗事一卷。

尹洙，字师鲁。河南人。天圣二年进士，授绛州正平主簿，以荐为馆阁校勘，累迁右司谏、知渭州兼领泾原路经略公事，以争水洛城事移庆州，复为董士廉所讼，贬崇信军节度副使，徙监均州酒税卒。有《河南集》二十七卷。

孙复，字明复。晋州平阳人。举进士不第，退居泰山，仁宗朝

除秘书省校书郎、国子监直讲，后迁殿中丞卒。有《孙明复小集》一卷。

石介，字守道。兖州奉符人。天圣八年进士及第，初授嘉州判官，后以直集贤院出通判濮州。有《徂徕集》二十卷。

李觏，字泰伯。建昌南城人。皇祐初以荐授太学助教，终海门主簿、太学说书。有《盱江集》三十七卷、外集三卷。

祖无择，字择之。上蔡人。登进士第，历官龙图阁学士、知通进银台司，坐事谪忠正军节度副使，移知信阳军卒。有《龙学文集》十六卷。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天圣八年省元，中进士甲科，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历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朝，迁刑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赠太子太师、谥文忠。晚号六一居士。有《文忠集》一百五十三卷、附录五卷。

曾巩，字子固。南丰人。嘉祐二年进士，调太平州司法参军，召为集贤校理，出知福、明诸州，神宗时官至中书舍人。有《元丰类稿》五十卷。

王安石，字介甫。临川人。庆历二年进士，神宗朝累除知制诰、翰林学士，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封荆国公。卒谥曰文，崇宁间追封舒王。有《临川集》一百卷。

苏颂，字子容。南安人，徙居丹阳。庆历二年进士，官至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罢为集禧观使。徽宗立，进太子太保，累爵赵郡公，卒赠司空魏国公。有《苏魏公集》七十二卷。

王珪，字禹玉。成都华阳人，后徙舒。举庆历二年进士第二，授大理评事，累官翰林学士、知开封府兼侍读学士，神宗时拜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哲宗即位，封岐国公，卒赠太师、谥文恭。有《华阳集》六十卷、附录十卷。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以父池任入官，宝元初登进士

甲科，官至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薨于位，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有《传家集》八十卷。

刘敞，字原父，号公是。临江新喻人。庆历六年举进士，官至集贤院学士。有《公是集》五十四卷。

刘攽，字贡父，号公非。与其兄敞同登庆历六年进士第，官至中书舍人。有《彭城集》四十卷。

苏洵，字明允。眉山人。官秘书省校书郎，以霸州文安县主簿修《太常因革礼》，书成而卒。有《嘉祐集》十六卷、附录二卷。

苏轼，字子瞻，洵长子。嘉祐二年进士乙科，对制策入三等，累除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历端明殿学士、礼部尚书。绍圣初，坐讪谤，安置惠州，徙昌化。徽宗立，赦还，提举玉局观。建中靖国元年卒于常州，高宗朝赠太师，谥文忠。有《东坡全集》一百十五卷。

苏辙，字子由，洵次子。与兄轼同登进士，举制科。哲宗朝代轼为翰林学士，累拜尚书右丞，进门下侍郎。自绍圣初至崇宁，再被谪贬，晚居许州，复太中大夫致仕。自号颍滨遗老。卒，追复端明殿学士，淳熙中谥文定。有《栾城集》五十卷、后集二十四卷、三集十卷、《应诏集》十二卷。

黄庭坚（见第三节）。

秦观（见第四节）。

晁补之，字无咎。钜野人。元丰间举进士，试开封及礼部别院皆第一。元祐中除校书郎，绍圣末落职，监信州酒税。大观中起知泗州，卒于官。有《鸡肋集》七十卷。

张耒，字文潜。楚州淮阴人。登进士第，元祐中官至起居舍人，绍圣中谪监黄州酒税。徽宗朝召为太常寺卿，坐元祐党贬房州别驾，黄州安置。寻得自便，居于陈州，主管崇福宫卒。有《宛丘集》七十六卷。

陈师道（见第三节）。

李廌，字方叔。阳翟人。少以文字见知于苏轼。元祐初，轼知举，意在必得廌以魁多士，及考章援程文，以为廌无疑，遂以为魁，既拆号怅然，廌竟无成而卒。有《济南集》八卷。

周敦颐，字茂叔。道州营道人。以舅龙图阁学士郑向恩补官，熙宁初，累官至广东转运判官、提点刑狱，因疾求知南康军，筑室庐阜下，号曰濂溪。嘉定中谥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从祀孔子庙廷。有《周元公集》九卷。

邵雍，字尧夫。河南人。嘉祐中诏求遗逸，授将作监主簿，复举逸士，补颍州团练推官，皆称疾不起。名其居曰“安乐窝”，自号安乐先生。卒，赠秘书省著作郎，元祐中追谥康节。有《击壤集》二十卷。

张载，字子厚。先世大梁人，后居凤翔之横渠镇，学者称横渠先生。嘉祐二年进士，以荐为崇文院检书，同知太常礼院卒。有《崇文集》。

程颢，字伯淳。西洛人，大中大夫珦之子。举进士，神宗朝以荐为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罢知扶沟县，责监汝州盐税，卒。文潞公题其墓曰“明道先生”。嘉定中追谥曰纯，封河南伯，淳祐元年从祀孔子庙廷。有《明道集》。

程颐，字正叔，颢弟。元祐初以荐授崇政殿说书，绍圣中削籍窜涪州，徙峡州，卒。学者称“伊川先生”。嘉定中追谥曰正，封伊阳伯，从祀孔子庙廷。有《伊川集》。

杨时，字中立。将乐人。熙宁九年进士，游二程之门，官至工部侍郎兼侍读，以龙图阁直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卒，谥文靖，学者称“龟山先生”。有《龟山集》四十二卷。

谢良佐，字显道。上蔡人。释褐登进士第，授秦州教官。建中召对，除书局官，后复去为竞库，以飞语坐系诏狱褫官。学者称“上蔡先生”。

游酢，字定夫。建州建阳人。嘉祐间以文行知名，程明道典扶

沟学，招使肄业。登元丰五年进士第，仕至监察御史，历知汉阳军和、舒、濠三州。学者称“广平先生”。有《游廌山集》四卷。

吕大临，字与叔。蓝田人。受学伊川之门，登进士，监凤翔府司竹监。元祐中除太学博士，迁秘书省正字。有《玉溪集》。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世为徽州婺源人，父韦斋先生松宦游建阳之考亭，遂家焉。绍兴十八年中王佐榜进士，宁宗朝历官宝文阁待制，伪学禁起，落职奉祠，未几卒。累赠宝谟阁直学士，谥曰文。理宗朝赠太师，追封徽国公，从祀孔子庙廷。曾结草堂于建阳芦峰之云谷，扁以晦庵，亦号云谷老人。既又创竹林精舍，更号沧州病叟。最后因筮遇遯之同人，更名遯翁。有《晦庵集》一百卷、续集五卷、别集七卷。

吕祖谦，字伯恭。金华人。隆兴元年进士，复中博学宏词科，官至直秘阁著作郎、国史院编修。有《东莱集》四十卷。

陆九渊，字子静。金溪人，九韶弟。乾道八年进士，累官著作丞。光宗即位，除知荆门军务。卒，谥文安。自号象山翁，学者称“象山先生”。有《象山集》二十八卷、外集四卷，附语录四卷。

张栻，字敬夫。广汉人，浚子。以荫补官，孝宗朝历左司员外郎，除秘阁修撰，历知江陵府荆湖北路安抚使卒。嘉定中谥曰宣，从祀大成殿。有《南轩集》四十四卷。

周行已，字恭叔。永嘉人。师事程伊川，登元祐六年进士，官至秘书省正字。有《浮沚集》八卷。

郑伯熊，字景望。永嘉人。绍兴十五年进士，累授太子侍读、宗正少卿。卒，谥文肃。有集。

薛季宣，字士龙，号艮斋。永嘉人。绍兴二十九年，年甫十七，即从荆南帅辟写机宜文字，调鄂州武昌令，以王炎荐知常熟县，入为大理寺主簿，进大理寺正，知湖州。乾道元年迁知常州，未至卒。有《浪语集》三十五卷。

陈傅良，字君举，号止斋。温州瑞安人。乾道八年进士，官至中书舍人、宝谟阁待制。卒，谥文节。有《止斋文集》五十一卷、附录一卷。

叶适，字正则，自号水心居士。永嘉人。淳熙五年进士，官至宝文阁学士。卒，谥忠定。有《水心集》二十九卷。

陈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淳熙中诣阙上书，光宗绍熙四年策进士擢第一，授签书建康府判官厅公事，未至而卒。端平初谥文毅。有《龙川文集》三十卷、《龙川词》一卷、补遗一卷。

陈耆卿，字寿老，号篔窗。台州临海人。登嘉定七年进士，官至国子司业。有《篔窗集》十卷。

王象祖，字德甫。台州临海人。学于叶水心。

陆游（见第三节）。

楼昉，字旸叔，号迂斋。鄞县人。绍熙四年进士，历官守兴化军。卒，追赠直龙图阁。有《崇古文诀》三十五卷。

真德秀，字希元。浦城人。庆元五年进士，中词科，绍定中拜参知政事，进资政殿直学士，提举万寿观。卒，谥文忠。有《西山文集》五十五卷。

文天祥，字宋瑞，一字履善。吉安人。宝祐四年进士第一，度宗朝累迁直学士院、知赣州，德祐初除右丞相，兼枢密使。元兵至，奉使军前，被拘，亡入真州，泛海至温州。益王立，拜右丞相，以都督出江西，兵败被执，囚于燕京，四年不屈，死柴市。有《文山集》二十一卷。

谢枋得，字君直，号叠山。信州弋阳人。宝祐四年进士，咸淳中为江东提刑、江西招谕使。景炎帝以枋得为江东制置使，即弋阳起义兵，军溃，隐于闽。元征聘，累辞不就，后福建行省魏天佑迫胁至燕，不食死。门人诔之曰“文节先生”。有《叠山集》五卷。

魏天应，号梅野。建安人。谢枋得门人，厉鹗《宋诗纪事》据《叠

山集》录其《送叠翁老师北行》诗一首。《四库总目提要》谓其号曰“梅墅”，未知孰是。

第二节　宋四六文作者(依第三章论述之先后为序)

徐铉，字鼎臣。广陵人。仕南唐为翰林学士，随李煜归宋，官至直学士院、给事中、散骑常侍，淳化初坐累谪静难军司马，卒于官。有《骑省集》三十卷。

王禹偁(已见第一节)。

杨亿，字大年。建州浦城人。七岁善属文，雍熙初，年十一召试诗赋，授秘书省正字。淳化中，命试翰林，赐进士第。真宗朝历官知制诰，天禧中拜工部侍郎、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卒，赠礼部尚书，谥曰文。有《括苍》、《武夷》、《颍阴》、《韩城》、《退居》、《汝阳》、《蓬山》、《辞荣》、《冠鳌》等集，及《内外制》、《刀笔》。今惟《武夷新集》二十卷传世。

刘筠，字子仪。大名人。咸平元年进士，累迁御史中丞、知制诰、翰林承旨，兼龙图阁直学士，卒。有《册府应言》、《荣遇》、《禁林》、《肥川》、《中司》、《汝阴》、《三入玉堂》七集。

钱惟演，字希圣，吴越忠懿王俶之子。少补牙门将，归宋，累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坐事落职，为崇信军节度使。归镇卒，谥曰思，改谥文禧。有《拥旄集》、《伊川集》。

晏殊，字同叔。抚州临川人。七岁能属文。景德初，张知白以神童荐，赐进士出身，擢秘书省正字。庆历中，官至集贤殿学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卒，赠司空兼侍中，谥元献。《东都事略》谓殊有文集二百四十卷，今皆不传。清康熙中慈溪胡亦堂辑有《晏元献遗文》一卷，又别传《珠玉词》一卷。

张咏，字复之，自号乖崖。濮州鄄城人。太平兴国五年进士，太宗朝官至枢密直学士，出知益州。真宗初，入为御史中丞，出知杭

州，再知益州，进礼部尚书。卒，赠左仆射，谥忠定。有《乖崖集》十二卷、附录一卷。

夏竦（已见第一节）。

宋庠（已见第一节）。

宋祁（已见第一节）。

胡宿，字武平。常州晋陵人。天圣二年进士，历官两浙转运使，召修起居注、知制诰，由翰林学士拜枢密副使，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文恭。有《文恭集》五十卷、补遗一卷。

范仲淹（已见第一节）。

欧阳修（已见第一节）。

王安石（已见第一节）。

元绛，字厚之。钱塘人。天圣八年进士，神宗朝累官翰林学士，拜参知政事，出知亳州，改颍州，致仕。卒，赠太子少师，谥章简。有《玉堂集》。

王珪（已见第一节）。

司马光（已见第一节）。

苏轼（已见第一节）。

苏辙（已见第一节）。

曾巩（已见第一节）。

曾肇，字子开。南丰人，巩之弟也。治平四年进士，官至中书舍人、龙图阁学士，以元祐党籍贬濮州团练副使，汀州安置。崇宁中复朝散郎，归润州而卒。绍兴初追谥文昭。有《曲阜集》四卷。

刘敞（已见第一节）。

刘攽（已见第一节）。

吕诲，字献可。开封人，端之孙。登进士第，官殿中侍御史，熙宁初为御史中丞，与王安石不合，出知邓州，提举崇福宫，致仕。卒，赠通议大夫。

吕公著，字晦叔。寿州人。举进士，累官至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进拜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卒，赠太师、申国公，谥正献。有集。

黄庭坚(见第三节)。

秦观(见第四节)。

张耒(已见第一节)。

陈师道(见第三节)。

晁补之(已见第一节)。

晁咏之，字之道，补之弟。以荫入官，复登进士第，又中宏词科第一，除河中教授、元符上书，罢为京兆录事，以朝请郎提举崇福宫，卒。有《崇福集》。

李之仪，字端叔。《宋史》称沧州无棣人，而吴芾作前集序乃曰景城人。元丰中举进士，元符中监内香药库，以尝从苏轼幕府，为御史石豫劾罢。崇宁初，提举河东常平，坐草范纯仁遗表过于鲠直，忤蔡京意，编管太平。有《姑溪居士前集》五十卷、后集二十卷。

邓润甫，字温伯。建昌人。尝避高鲁王讳以字为名，别字圣求。第进士，累官至尚书左丞。卒，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安惠。

林希，字子中，号醒老。福州人。嘉祐二年进士，哲宗朝累迁翰林学士、同知枢密院事，建中靖国初罢知扬州，徙舒州。未几卒，追赠资政殿学士，谥文节。

吕惠卿，字吉甫。晋江人。嘉祐二年进士，为真州推官。神宗朝累官翰林学士、参知政事，元祐初除建宁军节度副使，建州安置。崇宁中安置宣州，再移庐州，卒。有《东平集》。

韩宗彦，字师朴，琦子。以父任为将作监簿，复举进士，累官至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封仪国公，谪磁州团练副使致仕。

张舜民，字芸叟，自号浮休居士，又号矴斋。邠州人。中进士第，为襄乐令，累官龙图阁待制，知定州。坐元祐党籍谪商州，复集贤殿修撰。娶陈师道之姊。有《画墁集》八卷。

李清臣，字邦直。魏人，韩琦妻以兄子。举进士，治平二年举制科，历尚书右丞，徽宗朝拜门下侍郎，出知大名府，卒。有《淇水集》。

李邴，字汉老。济州任城人。崇宁五年进士，绍兴初拜参知政事、资政殿学士。寓泉州卒，谥文敏。有《云龛草堂集》。

汪藻，字彦章。饶州德兴人。登崇宁二年进士，历官显谟阁大学士、左太中大夫，封新安郡侯。有《浮溪集》三十六卷。

王安中，字履道。中山曲阳人。登进士第，累擢尚书左丞，出知燕山府，除大名尹，兼北京留守司公事。靖康初安置象州，绍兴初复左太中大夫，卒。有《初寮集》八卷、《初寮词》一卷。

孙觌，字仲益。晋陵人。徽宗末，蔡攸荐为侍御史。靖康初，蔡氏势败，乃率御史极劾之。金人围汴，李纲罢御营使，太学生伏阙请留，觌复劾纲要君，又言诸生将再伏阙，朝廷以其言不实，斥守和州。既而纲去国，复召觌为御史，专附和议，进至翰林学士。汴都破后，觌受金人女乐，为钦宗草表上金主，极意献媚。建炎初贬峡州，再谪岭外，黄潜善、汪伯彦复引之，使掌诰命。后又以赃罪斥，提举鸿庆宫，故其文称《鸿庆居士集》，凡四十二卷。

綦崇礼，字叔厚。高密人，后徙潍之北海。登重和元年上舍第，高宋朝累官至宝文阁学士，知绍兴府，退居台州。卒，赠左朝议大夫。有《北海集》四十六卷、附录三卷。

翟汝文，字公巽。润州丹阳人。登进士第，事徽、钦两朝，至显谟阁学士，出知越州。高宗时历官参知政事，以伉直忤秦桧罢归。卒，谥忠惠。有《忠惠集》十卷、附录一卷。

洪皓，字光弼。鄱阳人。政和五年进士，建炎三年以徽猷阁待制假礼部尚书，为大金通问使。既至金，金人迫使仕刘豫，皓不从，流递冷山，复徙燕京，凡留金十五年方得归。以忤秦桧贬官，安置英州而卒。久之始复徽猷阁学士，谥忠宣。有《鄱阳集》四卷。

洪适，初名造，后更今名，字景伯，皓长子。绍兴十二年中博学

宏词科。孝宗朝历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提举太平兴国宫。卒，谥文惠。有《盘洲集》八十卷。

洪遵，字景严，皓仲子。与兄适同中博学宏词科，赐进士出身。孝宗朝，召除翰林学士承旨，拜同知枢密院事、江东安抚使、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卒，谥文安。有《小隐集》。

洪迈，字景卢，皓季子。绍兴十五年中博学宏词科，孝宗朝累迁中书舍人，兼侍读、直学士院，拜翰林学士，进焕章阁学士，知绍兴府，以端明殿学士致仕。卒，赠光禄大夫，谥文敏。有《野处猥稿》一百四卷，今惟《野处类稿》二卷行世。

周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庐陵人。绍兴二十一年进士，中博学宏词科，孝宗朝历右丞相，拜少傅，进益国公，宁宗朝以少傅致仕。卒，谥文忠。有《文忠集》二百卷、近体乐府一卷。

杨万里（见第三节）。

陆游（见第三节）。

楼钥，字大防。鄞县人。隆兴元年进士，官至参知政事，除资政殿大学士，提举万寿观。卒，谥宣献。有《攻愧集》一百十二卷。

李刘，字公甫，号梅亭。崇仁人。嘉定七年进士，历官中书舍人、直学士院、宝章阁待制。有《四六标准》四十卷。

真德秀（已见第一节）。

王子俊，字材臣，号格斋。吉水人。周益公杨诚斋之客，安丙帅蜀，尝辟为制置使属官。其始末未详。所著《三松类稿》不传，今惟传《格斋四六》一卷。

卫博，《宋史》无传，其集诸家亦未著录，惟散见《永乐大典》中。考宋《中兴百官题名记》载，乾道四年正月卫博以枢密院编修官，四月致仕，知其终于是职。有《定庵类稿》四卷。

周南，字南仲。吴郡人。淳熙庚戌登甲科，官至秘书省正字。有《山房集》九卷。

李廷忠，字居厚，橘山其号也。於潜人。淳熙八年进士，历知无为教官、旌德知县，终于夔州通判。有《橘山四六》二十卷。

陈耆卿（已见第一节）。

王迈，字实之。兴化军仙游人。嘉定十年进士，淳祐中知邵武军，予祠。卒，赠司农少卿。有《臞轩集》十六卷。

刘克庄（见第三节）。

方岳（见第三节）。

文天祥（已见第一节）。

王应麟，字伯厚。庆元人，自署浚仪，盖祖籍也。淳祐元年进士，宝祐四年复中博学宏词科，官至礼部尚书兼给事中。有《深宁集》不传，今惟《四明文献集》五卷行世。

第三节　宋诗作者（依第四章论述之先后为序）

徐铉（已见第二节）。

潘阆，大名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其字曰逍遥，江少虞《事实类苑》则谓其自号逍遥子。太宗时召对，赐进士第，后坐事亡命，真宗捕得之，释其罪，以为滁州参军。有《逍遥集》一卷。

寇准，字平仲。华州下邽人。年十九举进士，真宗朝官至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景灵宫使，进尚书右仆射、集贤殿大学士，遭谗贬死雷州。殁后十一年，封莱国公，又赐谥忠愍。有《寇忠愍公诗集》三卷。

王禹偁（已见第一节）。

林逋，字君复。杭州钱塘人。初放游江淮间，久之归杭州，结庐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真宗闻其名，赐粟帛，诏长吏岁时劳问。既卒，州为上闻，仁宗嗟悼，赐谥和靖先生，赙粟帛。有《和靖诗集》四卷。

魏野，字仲先，号草堂居士。先世蜀人，徙于陕州。真宗闻其名，

召之不出。天禧三年卒，赠秘书省著作郎。有《东观集》十卷。

杨亿（已见第二节）。

刘筠（已见第二节）。

钱惟演（已见第二节）。

李宗谔，字昌武。深州饶阳人，宰相昉之子。第进士，真宗朝为学士，历右谏议大夫。有集不传。

陈越，字损之。开封尉氏人。咸平中举贤良方正，历著作佐郎、直史馆，官至左正言。

李维，字仲方。肥乡人，平章沆之弟。雍熙二年进士，真宗初擢知制诰、翰林学士，历工部尚书、柳州观察使，出知陈州卒。有集。

刘骘，官工部员外郎、直集贤院。

丁谓（已见第一节）。

刁衎，字元宾。升州人。仕南唐为集贤校理，归宋授太常寺太祝，真宗朝累迁直秘阁、兵部郎中。有集。

张咏（已见第二节）。

钱惟济，字岩夫，惟演弟。归宋历恩州刺史，加检校司空，改保静军观察留后。卒，谥宣惠。有《玉季集》。

任随，仕太常丞，直集贤院。

舒雅，字子正。歙人。南唐时随计金陵，韩熙载知贡举，擢为第一。归宋，累迁职方员外郎，咸平末出守舒州，秩满乞致仕，就掌灵仙观。大中祥符二年直昭文馆，卒。

晁迥，字明远。澶州清丰人，其父始徙家彭门。太平兴国五年进士，擢右正言、直史馆、知制诰，为翰林学士承旨，天禧中判西京留司御史台，以太子少保致仕，加少傅。卒，赠太子太保，谥文元。有《翰林集》、《道院集》。

崔遵度，字坚白。本江陵人，后徙淄州。太平兴国八年进士，咸平中为左司谏、直史馆，后迁左谕德，卒官。有文集。

薛映，字景阳。蜀人。进士及第，历知制诰，右谏议大夫知杭州，仁宗朝官礼部尚书、集贤院学士，分司南京。卒，赠右仆射，谥文恭。

刘秉，官左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

晏殊（已见第二节）。

苏舜钦（已见第一节）。

梅尧臣，字圣俞。宣城人。以荫补斋郎，嘉祐初召试，赐进士，擢国子监直讲，历尚书都官员外郎，卒。有《宛陵集》六十卷、附录一卷。

石延年，字曼卿。先世幽州人，自其祖迁宋城，遂为宋城人。累举进士不中，真宗录二举进士以为三班奉职，遂得入仕，官至秘阁校理，迁太子中允，同判登闻鼓院。有集不传。

欧阳修（已见第一节）。

王安石（已见第一节）。

王令，元城人，幼随其叔祖乙居广陵，遂为广陵人。初字钦美，后王萃字之曰逢原。少不检，既而折节力学，王安石以妻吴氏之妹妻之，年二十八卒。有《广陵集》三十卷、拾遗一卷。

苏轼（已见第一节）。

苏辙（已见第一节）。

张耒（已见第一节）。

秦观（见第四节）。

晁补之（已见第一节）。

李廌（已见第一节）。

孔文仲，字经父，嘉祐六年进士，官中书舍人。武仲字常父，嘉祐八年进士，官礼部侍郎。平仲字毅父，治平二年进士，官金部郎中。有《清江三孔集》四十卷。

僧道潜，於潜人。苏轼守杭州，卜智果精舍居之，《墨庄漫录》载其本名昙潜，轼为改曰道潜。轼南迁，坐得罪返初服，建中靖国初诏

复祝发。崇宁末，归老江湖，尝赐号妙总大师。有《参寥子集》十二卷。

僧惠洪，一名德洪，字觉范。筠州人。大观中游丞相张商英之门，商英败，惠洪亦坐累谪朱崖。有《石门文字禅》三十卷。

黄庭坚，字鲁直。洪州分宁人。举进士，为叶县尉，历秘书丞。绍圣初坐修《神宗实录》失实，贬涪州别驾，黔州安置。建中靖国初召还，知太平州，复除名，编管宜州，卒。自号山谷道人。有《山谷内集》三十卷、外集十四卷、别集二十卷、词一卷、简尺二卷。

陈师道，字无己，一字履常。彭城人，号后山居士。元祐中以苏轼、傅尧俞、孙觉荐，授徐州教授。绍圣初，历秘书省正字，扈从南郊，不屑服赵挺之衣，以寒疾卒。有《后山集》二十四卷。

潘大临，字邠老。齐安人。有《柯山集》，不传。

谢逸，字无逸。临川人。屡举不第，以诗文自娱。有《溪堂集》十卷。

洪朋，字龟父。南昌人，黄山谷之甥。两举进士不第，年仅三十八而卒。有《洪龟父集》二卷。

洪刍，字驹父。绍圣元年进士，靖康中为谏议大夫。汴京失守，坐为金人括财，流沙门岛卒。有《老圃集》二卷。

饶节，字德操。抚州人。尝为曾布客，后与布书论新法不合，乃祝发为浮屠，更名如璧，挂锡灵隐。晚主襄阳之天宁寺，号倚松老人。有《倚松老人集》二卷。

僧祖可，字正平。丹阳人。苏伯固(坚)之子养直(庠)之弟，住庐山，被恶疾，人号“癞可”。有《东溪集》、《瀑泉集》。

徐俯，字师川。洪州分宁人。绍兴初赐进士出身，累官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权参知政事。有《东湖集》。

林敏修，字子来。蕲春人。有《无思集》。

洪炎，字玉父。元祐末登第，南渡后官秘书少监。有《西渡集》

二卷、补遗一卷。

汪革，字信民。自歙徙临川。绍圣四年试礼部第一，分教长沙，又为宿州教授。蔡氏当国，以周王宫教召不就，复为楚州教官，卒。有《青溪集》。

李錞，字希声。官至秘书丞。有集。

韩驹，字子苍。蜀之仙井监人。政和中召试，赐进士出身，除秘书省正字，累除中书舍人，兼权直学士院。高宗即位，知江州。有《陵阳集》四卷。

李彭，字商老。南康军建昌人，公择从孙。有《日涉园集》十卷。

晁冲之，字叔用，说之从弟。在群从中独不第，授承务郎。有《具茨集》十五卷。

江端友，字子我。陈留人，休复之孙。以元祐党隐居封丘门外，靖康初吴敏荐召见，以为承务郎，赐进士出身，为诸王宫教授。遭黜渡江，寓居桐庐之鸬鹚源，后为太常少卿。有《七里先生自然集》。

杨符，字信祖。有诗集。

谢薖，字幼槃。逸从弟，以诗文与逸媲美，时称"二谢"。有《竹友集》十卷。

夏倪，字均父。蕲州人，竦之孙。宣和中自府曹左官祈阳监酒，终知江洲。有《远游堂集》。

林敏功，字子仁。蕲州人，敏修之兄。以《春秋》预乡荐，不第。有《高隐集》。

潘大观，字仲达，大临弟也。有诗集，不传。

王直方，字立之。汴人。以荫补承奉郎，元祐中延致名士唱和，号归叟。有诗话并集。

僧善权，字巽中，靖安高氏子。人物清癯，人目为瘦权，落魄嗜酒。有《真隐集》。

高荷，字子勉，荆南人。自号还还先生。元祐太学生，晚为童贯

客，得兰州通判以终。有《还还集》。

吕本中，字居仁，好问之子。官至中书舍人，兼侍讲、权直学士院。学者称为“东莱先生”。有《东莱诗集》二十卷。祖谦其从孙也，后人因祖谦与朱子游，其名最著，亦称为“东莱先生”。而本中以诗擅名，诗家多称“吕紫微”，“东莱”之号稍隐。

陈与义，字去非，号简斋。洛阳人。登政和三年上舍甲科，绍兴中官至参知政事。有《简斋集》十六卷、《无住词》一卷。

曾几，字吉甫。赣县人，徙居河南。以兄弼恤恩授将仕郎，试吏部优等，赐上舍出身。高宗朝历官江西、浙西提刑，忤秦桧去位，侨寓上饶茶山寺，自号茶山居士。桧死，召为秘书少监，权礼部侍郎，提举玉隆观，致仕。卒，谥文清。有《茶山集》八卷。

陆游，字务观。越州山阴人，佃之孙。以荫补登仕郎，隆兴初赐进士出身。范成大帅蜀为参议官，人讥其颓放，因自号放翁。嘉泰初诏同修国史兼秘书监，升宝章阁待制。有《剑南诗稿》八十五卷、《渭南文集》五十卷、逸稿二卷。

尤袤，字延之。无锡人。绍兴十八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谥文简。《宋史》本传载所著《遂初小稿》六十卷、《内外制》三十卷，陈振孙《书录解题》载《梁溪集》五十卷，今并久佚。世所传《梁溪遗稿》一卷，则清康熙中尤侗所辑，盖百分仅存其一矣。

范成大，字致能，号石湖居士。吴郡人。绍兴二十四年进士，孝宗时累官权吏部尚书，拜参知政事，进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卒，谥文穆。有《石湖诗集》三十四卷。

杨万里，字廷秀，自号诚斋。吉水人。绍兴二十四年进士，光宗朝历秘书监，出为江东转运副使，再召皆辞，宁宗朝以宝谟阁学士致仕。卒，赠兴禄大夫、谥文节。有《诚斋集》一百三十三卷。

朱熹（已见第一节）。

姜夔（见第四节）。

陈傅良(已见第一节)。

叶适(已见第一节)。

薛季宣(已见第一节)。

陈亮(已见第一节)。

徐照,字道晖,一字灵晖。永嘉人。"四灵"之首也。有《芳兰轩集》一卷,尝自号曰山民,故其集又曰《山民集》。

徐玑,字文渊,一字致中,号灵渊。"永嘉四灵"之二也。有《二薇亭集》一卷。

翁卷,字续古,一字灵舒。"永嘉四灵"之三也。尝登淳祐癸卯乡荐,终于布衣。有《西岩集》一卷。

赵师秀,字紫芝,号灵秀。永嘉人,太祖八世孙。绍熙元年进士,浮沉州县,终于高安推官。"永嘉四灵"之四也。有《清苑斋集》一卷。

严羽,字仪卿,一字丹丘。邵武人。自号沧浪逋客,有《沧浪集》二卷。

陈起,字宗之。钱塘人。开书肆于睦亲坊,亦号陈道人。宝庆初,以诗祸为史弥远所流配。有《芸居乙稿》、《芸居遗诗》各一卷。

刘克庄,字潜夫。莆田人。以荫入仕,淳祐中赐同进士出身,官至龙图阁直学士。初受业真德秀,而晚节不终,年八十乃失身于贾似道。卒,谥文定。有《后村集》五十卷。

戴复古,字式之。天台人。尝登陆游之门,所居有石屏山,因以为号。有《石屏集》六卷、《石屏词》一卷。

方岳,字巨山,号秋崖。歙县人。绍定五年进士,淳祐中为赵葵参议官,移知南康军,以杖舟卒忤荆帅贾似道,后知袁州又忤丁大全,被劾罢归。有《秋崖集》四十卷。

文天祥(已见第一节)。

谢翱,字皋羽,一字皋父。闽之长溪人,后徙浦城。咸淳中试进士不第,文天祥开府延平,署为咨议参军,天祥兵败,避地浙东。有

《晞发集》十卷，《晞发遗集》二卷、遗集补一卷，附《天地间气集》一卷，《西台恸哭记注》一卷，《冬青引注》一卷。

谢枋得（已见第一节）。

刘辰翁，字会孟。庐陵人，须溪其所居地名也。少补太学生，景定壬戌廷试入丙第，以亲老请濂溪书院山长。宋亡，遂不复出。有《须溪集》十卷。

薛嵎，字仲止，一字宾日。永嘉人。宝祐四年进士，官长主溪簿。有《云泉诗》一卷。

汪元量，字大有，号水云。钱塘人。元陈泰《所安遗集》中尚有《送钱塘琴士汪水云》诗，泰乃延祐二年进士，则元量亦云老寿矣。有《水云集》一卷、《湖山类稿》五卷。

林景熙，一作景曦，字德阳，号霁山。温州平阳人。咸淳七年太学释褐，官礼部架阁，转从政郎。宋亡不仕，会杨琏真伽发宋诸陵，以遗骨建镇南塔，景熙以计易真骨葬之，其忠义感动百世。有《林霁山集》五卷。

真山民，始末不可考。或云，李生乔尝叹其不愧乃祖文忠西山，考真德秀号曰西山、谥曰文忠，以是疑其姓真。或云，本名桂芳，括苍人，宋末尝登进士。有《真山民集》一卷。

第四节　宋词作者（依第五章论述之先后为序）

晏殊（已见第二节）。

晏几道，字叔原，号小山，殊之幼子。熙宁中郑侠上书下狱，悉治平时所往还厚善者，几道亦在其中，从侠家搜得其诗，裕陵称之殆得释，事见《侯鲭录》。有《小山词》一卷。

柳永，初名三变，字耆卿。崇安人。景祐元年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故世号“柳屯田”。有《乐章集》一卷。

欧阳修（已见第一节）。

韩琦，字稚圭。安阳人。天圣中进士第二，历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累封魏国公。卒，赠尚书令，谥忠献。徽宗论定策勋，赠魏郡王。有《安阳集》五十卷。

范仲淹（已见第一节）。

韩缜，字玉汝。灵寿人，徙雍丘。登进士第，累官至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出知颍昌府，以太子太保致仕。卒，赠司空、崇国公，谥庄敏。

王安石（已见第一节）。

张先，案仁宗时有两张先，皆字子野。其一博州人，枢密副使张逊之孙，天圣三年进士，官至知亳州，卒于宝元二年，欧阳修为作墓志者是也。其一乌程人，天圣八年进士，官至都官郎中，精于填词者也。其词曰《安陆集》一卷、附录一卷。

宋祁（已见第一节）。

苏轼（已见第一节）。

黄庭坚（已见第三节）。

秦观，字少游，一字太虚。高邮人。举进士。元祐初，苏轼以贤良方正荐除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院编修官。绍圣初坐党籍削秩，监处州酒税，徙郴州，编管横州，又徙雷州，放还，至藤州卒。有《淮海集》四十卷、后集六卷、长短句三卷。

晁补之（已见第一节）。

张耒（已见第一节）。

陈师道（已见第三节）。

贺铸，字方回。卫州人。唐谏议大夫知章之后，自号庆湖遗老。初以婚于宗女，授右班殿直，元祐中李清臣奏换通直郎，通判泗州、太平州，卒。有《庆湖遗老集》九卷、《东山寓声乐府》三卷、补遗一卷。

程垓，字正伯。眉山人。有《书舟词》一卷。

李之仪（已见第三节）。

毛滂，字泽民。衢州江山人。官至祠部员外郎，知秀州。有《东堂集》十卷、词一卷。

谢逸（已见第三节）。

周紫芝，字少隐。宣城人。绍兴中登第，历官枢密院编修官，出知兴国军。自号竹坡居士。有《太仓稊米集》七十卷、《竹坡词》三卷。

赵令畤，字德麟，燕王德昭元孙。元祐中签书颍州公事，坐与苏轼交通罚金。绍兴初袭封安定郡王，同知行在大宗正事。

王诜，字晋卿。开封人。选尚英宗女秦国大长公主，为利州防御使，以党籍贬均州，历定州观察使、开国公驸马都尉。卒，赠昭化军节度使，谥荣安。

王观，字通叟。高邮人。嘉祐二年进士，累迁大理丞、知江都县，尝著《扬州赋》及《芍药谱》。

晁冲之（已见第二节）。

李廌（已见第一节）。

杜安世，字寿域。京兆人。其事迹本末，陈振孙已谓未详。有《寿域词》一卷。

朱服，字行中。乌程人。熙宁六年进士，徽宗朝官集贤殿修撰，知广州，黜知袁州，再贬蕲州安置。

刘泾，字巨济。简州阳安人。熙宁六年进士，历国子监丞，知处、虢、真、坊四州。元符末上书召对，除职方郎中，卒。有《前溪集》。

章楶，字质夫。浦城人。治平四年进士甲科，徽宗朝拜同知枢密院事，授资政殿学士、中太乙宫使。卒，谥庄简。

王安国，字平甫，安石弟。神宗召试赐第，为秘阁校理，吕惠卿引连郑侠狱夺官，卒。有集，不传。

王雱，字元泽，安石子。未冠登进士，累官龙图阁直学士。

苏过，字叔党，轼季子。仕至权通判中山府。家颍昌营湖阴，水

竹数亩，名曰“小斜川”，自号斜川居士。有《斜川集》。

周邦彦，字美成。钱塘人。元丰中献《汴都赋》，召为太乐正。徽宗朝仕至徽猷阁待制，出知顺昌府，徙处州卒，自号清真居士。有《片玉词》二卷、补遗一卷。

晁端礼，字次膺。熙宁六年进士，两为县令，忤上官坐废，晚以承事郎为大晟府协律。有《闲适集》。

万俟雅言，自号词隐。游上庠不第，崇宁中充大晟府制撰。有《大声集》五卷。

吕滨老，字圣求。嘉兴人。陈振孙《书录解题》作“吕渭老”，考嘉定壬申赵师岌序亦作“滨老”，未详孰是。有《圣求词》一卷。

向子諲，字伯恭。临江人，钦圣宪肃皇后再从侄。元符初以恩补官，南渡初，历徽猷阁直学士，知平江府。有《酒边词》二卷。

蔡伸，字伸道。莆田人，襄之孙。自号友古居士。宣和中，官彭城倅，历官左中大夫。有《友古词》一卷。

方千里，信安人。官舒州签判。有《和清真词》一卷。

杨泽民，乐安人。亦有《和清真词》一卷。

曹组，字元宠。颍昌人。宣和三年进士，召试中书换武阶，兼阁门宣赞舍人，仍给事殿中，官止副使。有《箕颍词》一卷。

叶梦得，字少蕴，号石林。吴县人。绍圣四年进士，南渡后官至崇信军节度使。有总集一百余卷，今惟传《石林居士建康集》八卷、《石林词》一卷。

朱敦儒，字希真。洛阳人。绍兴五年以荐起，赐进士出身，为秘书省正字，兼兵部郎官，迁两浙东路提点刑狱，上疏乞归，居嘉禾，晚除鸿胪少卿。有《樵歌》三卷。

王灼，字晦叔，号颐堂。遂宁人。绍兴中尝为幕官。有《颐堂词》一卷、《碧鸡漫志》五卷。

李清照，号易安居士。济南人。格非之女，湖州守赵明诚之妻

也。有《漱玉词》一卷。

辛弃疾，字幼安。历城人。官至龙图阁待制，进枢密都承旨。卒谥忠敏。有《稼轩词》十二卷。

陆游（已见第三节）。

刘过，字改之。庐陵人。当宋光宗、宁宗时，以诗游谒江湖，韩侂胄尝欲官之，使金国而轻率漏言，卒以穷死。有《龙洲集》十四卷、《龙洲词》一卷。

刘克庄（已见第三节）。

陈亮（已见第一节）。

姜夔，字尧章。鄱阳人。萧东甫爱其词，妻以兄子，因寓居吴兴之武康，与白石洞天为邻，自号白石道人，又号石帚。庆元中曾上书乞正太常雅乐，得免解，迄不第。有《白石诗集》一卷、附《诗说》一卷，《白石道人歌曲》四卷、别集一卷。

张辑，字宗瑞。鄱阳人，自号东泽。有《东泽绮语》一卷、《清江渔谱》一卷。

卢祖皋，字申之，又字次夔，号蒲江。永嘉人。登庆元五年进士，嘉定中为军器少监，权直学士院。有《蒲江词》一卷。

高观国，字宾王。山阴人。有《竹屋痴语》一卷。

史达祖，字邦卿，号梅溪。汴人。韩侂胄之堂吏也。有《梅溪词》一卷。

蒋捷，字胜欲，自号竹山。宜兴人。德祐中尝登进士，宋亡之后，遁迹不仕以终。有《竹山词》一卷。

周密，字公谨，号草窗。先世济南人，其曾祖随高宗南渡，因家湖州。淳祐中尝官义乌令，宋亡不仕，终于家。有《蘋洲渔笛谱》二卷。

陈允平，字衡仲，一字君衡。四明人，号西麓。有《西麓继周集》一卷、《日湖渔唱》一卷。

吴文英，字君特，号梦窗。庆元人。有《梦窗稿》四卷、补遗一卷。

王沂孙，字圣与，号碧山，又号中仙。会稽人。有《碧山乐府》一卷，一名《花外集》。

张炎，字叔夏，号玉田，又号乐笑翁，循王张俊之五世孙。家于临安，宋亡之后潜迹不仕，纵游浙东西，落拓以终。有《山中白云词》八卷。

康与之，字伯可。渡江初以词受知高宗，官郎中。有《颐庵乐府》。

赵鼎，字元镇，号得全居士。解州闻喜人。登崇宁五年进士第，累官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卒，赠太傅，追封丰国公，谥忠简。有《忠正德文集》十卷。

李邴（已见第二节）。

汪藻（已见第二节）。

楼钥（已见第二节）。

陈克，字子高。临海人。绍兴中为敕令所删定官，自号赤城居士，侨居金陵。有《天台集》。

张抡，字材甫，号莲社居士。有《莲社词》一卷，附《道情鼓子词》一卷。

周必大（已见第二节）。

张孝祥，字安国。历阳乌江人。绍兴二十四年进士第一，孝宗朝累迁中书舍人、直学士院，领建康留守，寻以荆南湖北路安抚使进显谟阁直学士致仕。有《于湖集》四十卷、词五卷，又拾遗一卷、补一卷。

韩元吉，字无咎，宰相维之元孙。以任子仕，历龙图阁学士、吏部尚书。尝居广信溪南，自号南涧居士。有《南涧甲乙稿》二十二卷。

张镃，字功甫。西秦人，居临安，俊诸孙。官奉议郎，直秘阁。有《南湖集》十卷。

曾觌，字纯甫，号海野老农。汴人。孝宗受禅，以潜邸旧人除权知阁门事，淳熙中除开府仪同三司，加少保、醴泉观使。有《海野词》一卷。

韩玉，有《东浦词》一卷。案是时有二韩玉。刘祁《归潜志》曰："韩府判玉，字温甫。燕人。少读书尚气节，擢第入翰林为应奉文字，后为凤翔府判官。大安中，陕西帅府檄授都统，或诬以有异志，收鞫死狱中。"《金史》、《大金国志》并同，此一韩玉也，其人终于金。叶绍翁《四朝闻见录》曰："司马文季使北不屈，生子名通国，盖本苏武之意。通国有大志，尝结北方之豪韩玉举事，未得要领。绍兴初，玉挈家而南，授江淮都督府计议军事。其兄璘在北，亦与通国善。癸未九月以扇寄玉诗，都督张魏公见诗，甲申春遣信往大梁，讽璘、通国等至亳州，为逻者所获，通国、璘等三百余口同日遇害。"此又一韩玉也，其人由金而入宋。撰《东浦词》者，后之韩玉也。

张元干，字仲宗，自号芦川老隐。长乐人，向伯恭之甥。绍兴中坐送胡邦衡词得罪除名。有《芦川归来集》十卷、《芦川词》一卷。

侯寘，案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寘字彦周，东武人。绍兴中以直学士知建康。有《嬾窟词》一卷。

扬无咎，字补之，自号逃禅老人。清江人。诸书"扬"或作"杨"，案《图绘宝鉴》称无咎祖汉子云，其字从"才"不从"木"，则作"杨"误也。有《逃禅词》一卷。

王千秋，字锡老，审斋其号也。东平人。有《审斋词》一卷。

杨炎正，字济翁。庐陵人。有《西樵语业》一卷。按陈振孙《书录解题》载《西樵语业》一卷，杨炎正济翁撰。马端临《文献通考》引之，误以"正"字为"止"字，毛晋刻六十家词遂误以"杨炎"为姓名，以"止济翁"为别号。近时所印，始改刊"杨炎正"姓名，跋中"止济翁"字亦追改为"杨济翁"。然旧印之本与新印之本并行，名字两歧，颇滋疑惑。故厉鹗《宋诗纪事》辨之曰："尝见《西樵语业》旧钞本，作

‘杨炎正济翁’。后考《武林旧事》载杨炎正《钱塘迎酒歌》一首，《全芳备祖》亦载此诗，称‘杨济翁’。是炎正其名，济翁其字无疑也。”

洪咨夔，字舜俞。於潜人。历官端明殿学士。有《平斋文集》三十二卷、《平斋词》一卷。

赵长卿，自号仙源居士。南丰人，宗室子也。有《惜香乐府》十卷。

黄机，字几仲，一云字几叔。东阳人。有《竹斋诗余》一卷。

毛幵，字平仲。信安人，旧刻题曰“三衢”，盖偶从古名也。尝为宛陵东阳二州倅。有《樵隐词》一卷。

黄公度，字师宪。莆田人。绍兴八年进士第一，历官考功员外郎。有《知稼翁集》二卷、词一卷。

戴复古(已见第三节)。

黄升，字叔旸，号玉林，又号花庵词客，以所居有玉林，又有散花庵也。有《散花词》一卷。

朱淑真，海宁女子，自称幽栖居士。有《断肠词》一卷。

辽金元文学



吴梅著

原名“辽金元文学史”

据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重排

第一章 辽

文字者，所以变鄙塞为文明之具也。地球文明，以亚洲为最古；亚洲文明，以中国为最古。宋、明以前，外部藩属一与中国交通，无不吸收中国之文明以去。汉则匈奴遣子入学，唐则日本翻译五经。其盛者固无论矣。即陵夷至于六朝、晋、宋之末，五胡、金、元鹰瞵虎视，蹴踏我土地，奴隶我人民。而问其官制词章，无不楷模于我先代。此何故哉？以鄙塞遇文明，欲不同化而不得也。辽之先本为契丹，雄于朔方。自太宗建国，始号大辽。造邦本藉于干戈，致治不资于黼黻。《五代会要》云：后唐天成三年，王晏球等获契丹绢书二封来进。明宗命宣示群臣，莫有识其文字者。契丹本无文记，惟刻木为信。汉人陷蕃者，以隶书之半，就加增减，撰为胡文。同光之后，稍稍有之。据此是辽本无文记，在后唐时已然。《辽史·文学传序》曰："太祖以兵略方内，礼文之事，固所未遑。及太祖入汴，取晋图书、礼器而北，然后制度渐修。至景、圣间，则科目聿兴"，骎骎崇儒之美。盖辽虽起塞外，不识汉文。而首立孔子庙，太祖即亲祭孔子。太宗及东丹王兄弟皆工绘事，其材艺有足称者。每科放进士榜百余人，故国多文学之士。原其所以能变僿野而为文明，则始于太宗得石晋之燕云十六州，盛于圣宗之与宋盟好，使命交通。由是中原文学之士仕于其朝，及奉使至彼者，日见其众。彼亦自惭其弇鄙，

遂渐舍弃其旧俗，而服从我中夏之文教矣。此种情状，为辽、金、元三朝所同。而辽其嚆矢也。

契丹开国，久于完颜。文教之彰，使命之美，亦与金、元彷佛。惟据宋沈括《梦溪笔谈》云："辽书禁甚严。传入中国者法皆死。"以致当日之记注典章可裨国史者，求之簿录家，不少概见。即家集野乘，亦散佚无传。今辽人遗书，止存《龙龛手鉴》、《焚椒录》、《星命总括》三种。其诗文历金、元、明三朝，无有为之注意收拾者。至清乾隆时，海宁周春始辑《辽诗话》二卷。后有韩君小亭尝手辑《辽文存》，自言大半得于荒原古社毡蜡之余。一刹那间，闻亦散亡（见赵之谦《沈氏论语孔注辨伪跋》）。至光绪中叶，江阴缪荃荪搜辑诗文六卷，亦名《辽文存》。吴县王仁俊以上古至隋唐至明皆有总集，惟五代及辽缺如，乃发愤先成《辽文萃》十四卷，继见缪氏书，遂删其所已刊者，复发箧陈书，搜缺补遗，刊为七卷。民国八年，南海黄任恒又掇拾丛残，为《辽文最》四卷，继亦以有缪氏书，遂删存为《辽文补录》一卷。诸君子竭其心力，抉隐扶微，洵为耶律氏之功臣。今编辽代文学史，舍诸书亦无所取材矣。

第一节　文　家

昔王渔洋语汪尧峰云："辽以制科取士。其间跻政府，登朊仕者甚众。而考之列传，自横帐诸院、国舅、别部三族之外，其事迹不少概见。惟文学传寥寥数人，岂制科之尽不足书耶？"尧峰答云："此史臣失于记载故也。辽、金立国，规模不甚相远。而金、元人物文章，得元好问、刘祁诸君子，遂能颉颃宋、元之间。夫子曰，文献不足，杞宋无征，正为是欤。"然经乾、嘉后学者一再搜罗后，未尝不灿然可观。今为整齐而汇列之，亦足为辽朝人士一雪此言矣。

道宗宣懿皇后萧氏，幼能诵诗，旁及经子，其行事与诗尤有关系，详见于后诗家内。然其文亦有非当时诸人所能及者，今录其《谏

道宗驰猎疏》云："妾闻穆王远驾，周德用衰，太康佚豫，夏社几屋。此游佃之往戒，帝王之龟鉴也。顷见驾幸秋山，不闲六御，特以单骑从禽，深入不测。此虽威神所届，万灵自为拥护。倘有绝群之兽，果如东方所言，则沟中之豕，必败简子之驾矣。妾虽愚暗，窃为社稷忧之。惟陛下尊老氏驰骋之戒。用汉文吉行之旨，不以其言为牝鸡之晨而纳之。"文仅百二十余言，而词意并茂，有宋人所不及者，谓非山川灵秀之气，独钟于后不可也。

耶律果啰善属文，圣宗重之。时妻弟之妻阿古与奴通，将奔女直国。果啰追及奴，杀之，阿古自经。阿古母有宠于太后，太后怒，杀之。人多冤之。在狱著《兔赋》、《寤寐歌》，为世所称。

耶律庶成，字喜隐，小字辰禄。幼好学，书过目不忘，善辽、汉文字，于诗尤工。重熙初，补牌印郎君，累迁枢密直学士，与萧罕嘉努各进《四时逸乐赋》，帝嗟赏。初，契丹医人鲜知切脉审药，上命庶成译《方脉书》行之。偕林牙萧罕嘉努等撰《实录》及《礼书》。有诗文行于世，今已佚。

耶律庶箴，字陈宫，庶成弟也。善属文，官都林牙。上表乞广本国姓氏曰："我朝创业以来，法制修明。惟姓氏止分为二，耶律与萧而已。始太祖制契丹大字，取诸部乡里之名，续作一篇，著于卷末。臣请推广之，使诸部各立姓氏。庶男女婚媾，有合典礼。"帝不听。尝寄《诫谕诗》与子富鲁。

耶律富鲁，字努展，庶箴子也。幼聪悟好学，甫七岁，能诵契丹大字。习汉文，未十年，博通经籍。重熙中，举进士第，寻命为牌印郎君。应诏赋诗，立成以进。帝嘉赏，顾左右曰："文才如此，必不能武事。"富鲁奏曰："臣自蒙义方，兼习骑射。"帝未之信。会从猎，三矢中三兔。帝益奇之。是时父庶箴尝寄《诫谕诗》，富鲁答以赋，众称其典雅。清宁初卒。

耶律昭，字述宁。博学善属文。萧达林为西北招讨使，爱之，礼

致门下，问曰："今军旅甫罢，三边晏然。惟准布伺隙而动，讨之则路远难至，纵之则边民被掠，增戍兵则馈饷不给。欲苟一时之安，不能终保无变。计将安出？"昭以书答曰："窃闻治得其要，则仇敌为一家；失其术，则部曲为行路。夫西北诸部，每当农时，一夫为侦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给纠官之役，大率四丁无一室处。刍牧之事，仰给妻孥。一遭寇掠，贫穷立至。春夏赈恤，吏多杂以糠秕，重以掊克。不过数月，又复告困，且畜牧者富国之本。有司防其隐没，聚之一所，不得各就水草便地，兼以逋亡戍卒，随时补调，不习风土。故日瘠月损，驯至耗竭。为今之计，莫若振穷薄赋，给以牛种，使遂耕获，置游兵以防盗掠，颁俘获以助伏腊，散畜牧以就便地。期以数年，富强可望。然后练简精兵，以备行伍。何守之不固，何动而不克哉？然必去其难制者，则余种自畏。若舍大而谋小，避强而攻弱，非徒虚费财力，亦不足以威服其心。此二者利害之机，不可不察。昭闻古之名将安边立功，在德不在众。故谢玄以八千破苻坚百万，休哥以五队败曹彬十万，良由恩结士心，得其死力也。阁下膺非常之遇，专方面之寄，宜远师古人，以就勋业。上观乾象，下尽人谋，察地形之险易，料敌势之虚实，虑无遗策，利施后世矣。"达林然之。此书雅健有西汉晁、贾之风，惜不多见。

耶律孟简，字复易，性颖悟。六岁，父瑠嘉努晨出猎，俾赋《晓天星月》诗，孟简应声而成，父大奇之。既长，善属文。太康初，枢密使耶律伊逊以奸险窃柄，出为中京留守，孟简表贺。未几，伊逊复旧职，衔之，谪巡磁窑关。时虽以谗见逐，不形辞色。遇林泉胜地，终日忘归。明年流保州，及闻皇太子被害，不胜哀痛，以诗伤之，作《放怀》诗二十首。自序云："禽兽有哀乐之声，蝼蚁有动静之形。在物犹然，况于人乎？然贤达哀乐，不在穷通祸福之间。《易》曰：'乐天知命故不忧。'是以颜渊箪瓢自得，此知命而乐者也。予虽流放，以道自安，又何疑耶？"太康中，始归乡里。诣阙上表曰："本朝之兴，几

二百年，宜有国史，以垂后世。”乃编耶律赫噜、乌哲、休格三人行事以进。上命置局编修。孟简谓余官曰：“史笔天下之大信。一言当否，百世从之。苟无明识，好恶徇情，则祸不测。故左氏、司马迁、班固、范晔俱罹殃祸，可不慎欤。”孟简史识既高，文亦雅澹有法，惜乎其诗之无传也。

耶律唐古，字敌隐，于越屋质之庶子，廉谨善属文。统和二十四年，述屋质安民治盗之法以进。又陈弭私贩安边境之要，太后嘉之。重熙间，改隗衍党项部节度使，四年致仕，乞勒其父功于石。卒年七十八。

耶律氏，太师适鲁之妹，小字常格。幼爽秀，有成人风。及长，操行修洁，自誓不嫁。能诗文，不苟作。读通历，见前人得失，历能品藻。咸雍间，作文以述时政，其略曰：“君以民为体，民以君为心。人主当任忠贤，人臣当去比周，则政化平，阴阳顺。欲怀远则崇恩尚德，欲强国则轻徭薄赋。四端五典，为治教之本；六府三事，实生民之命。淫侈可以为戒，勤俭可以为师。错枉则人不敢诈，显忠则人不敢欺。勿泥空门，崇饰土木；勿事边鄙，亡费金帛。满当思溢，安必虑危，刑罚当罪，则民劝善。不宝远物，则贤者至。建万世磐石之业，制诸部强横之心。欲率下则先正身，欲治远则始朝廷。”上称善。时枢密使耶律伊逊爱其才，屡求诗，常格遗以回文。伊逊知其讽己，衔之。太康三年，皇太子坐事。伊逊诬以罪，按无迹，获免。及太子被害，不胜哀痛。年七十，卒于家。按中国女子能为丽辞者，代有其人，其能留意于国政者，实鲜。常格此文，纳诲陈善，不亚于懿德后之《谏猎疏》。何辽邦闺阁之多才也？

萧罕嘉努，字纠坚。纳喇部人，中书令安图之孙。少好学，弱冠入南山读书，博览经史，通辽、汉文字。重熙初，同知三司使事。四年，迁天成军节度使，徙彰愍宫使。兴宗与语，才之，命为诗友。尝从容问曰：“卿居外有异闻乎？”对曰：“臣惟知炒栗：小者熟则大者

必生，大者熟则小者必焦。使大小均熟，始为尽美。不知其他。”盖尝掌栗园，故托栗以讽谏，帝大笑。诏作《四时逸乐赋》，帝称善。时诏天下言治道之要，罕嘉努对策甚美（文长不录）。擢翰林都林牙，兼修国史。仍诏谕之曰：“文章之职，国之光华，非才不用。以卿文学，为时大儒。是用授卿以翰林之职。”自是日见亲信，每入侍赐坐。遇胜日，帝与饮酒赋诗，以相酬酢。虽谐谑，不忘规讽。诏与耶律庶成录约尼汗至重熙以来事迹，集为二十卷进之。复被诏博考经籍，自天子达于庶人，情文制度可行于世，不缪于古者，撰成三卷进之。又诏译诸书。罕嘉努欲帝知古今成败，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拜归德军节度使，召修国史。卒年七十二。有《六义集》十二卷行于世，今佚。

李澣，字日新。幼聪敏，慕王、杨、卢、骆为文章。初仕晋，为中书舍人。晋亡归辽，授翰林学士，累迁工部侍郎。时兄涛在汴为翰林学士，密遣人召澣。澣易服夜出。至涿，为徼巡者所得，送南京下吏。帝欲杀之，枢密使高勋救止之，屡言于上曰：“澣富于文学，方今少有伦比。若留掌词命，可以增光国体。”帝令禁锢于奉国寺。会上欲建《太宗功德碑》，高勋曰：“非李澣无可秉笔者。”诏从之。文成以进，上悦，释囚。寻加宣政殿学士卒。陶岳《五代史补》载其轶事曰：“李澣有逸才。每作文，则笔不停辍。而性嗜酒。杨凝式尝受诏撰《钱镠碑》，自以才不逮澣，于是召澣饮，俟其酣，使代笔，经宿而成。凡一万五千字，莫不词理典赡。凝式叹服。”苏易简《续翰林志》亦称其词藻特丽，俊秀不群。即澣文之价值可知矣。惜其所著《丁年集》十卷，今已不传。

王鼎，字虚中，涿州人。幼好学，居太宁山数年，博通经史。清宁五年，擢进士第，累迁翰林学士。当代典章，多出其手。上书言治道十事，帝以鼎达政体，事多咨访。坐事下吏，杖黥夺官，流镇州。居数岁，召还复其职。乾统六年卒。鼎为《焚椒录》，记懿安后被诬事

甚悉，后人有疑其不出于鼎手者。然录中节目，多与辽史符合，未可武断为伪也。今录其自序云："鼎于咸、太之际，方侍禁近，会有懿德皇后之变。一时南北面官，悉以异说赴权，互为证足，遂使懿德蒙被淫丑，不可湔浣。嗟嗟！大墨蔽天，白日不照，其能户说以相白乎？鼎妇乳媪之女蒙哥，为耶律乙辛宠婢，知其奸构最详。而萧司徒复为鼎道其始末，更有加于妪者，因相与执手，叹其冤诬，至为涕淫淫下也。观变以来，忽复数载，顷以待罪可敦城。去乡数千里，视日如岁，触景兴怀，旧感来集。乃直书其事，用俟后之良史。若夫少海翻波，变为险陆。则有司徒公之实录在。大安五年春三月前观书殿学士臣王鼎谨序。"同时又作《固安县固城村谢家庄石桥记》云："噫！旧立徒杠，尚有常节。故水毕除道，水涸成梁，弗可缺已。过是未修，或修之不谨，则其为害也非细焉。若官司失豫备，则民下得蚤图，亦救弊之一端也。固安坤隅一舍内有谢家庄，为近川流，恒苦湫下。每春泽未透，秋潦尚渟则此河壖，大为坎窞。使人病涉马还泞。虽魏汾沮洳，荆土涂泥，不是过也。并由习惯，止务因循，致兹险阻之深，无有坦夷之望。慢防且久，改作者谁。则我邑主优婆夷实其人也。邑主事张姓，阎氏，自为女为妇为母以来，孝敬慈柔，乡邻藉甚，固不待言说而后知其美也。及称未亡见谅之死，以家二女选婿同居。感之悦之，俱同和顺，故其兴利，若一心焉。每自出财，或他与力，前后铸办洪钟一口，起建佛殿三间，叠成道路一十里，总其始终有立。虽勇毅英雄，蔑以加矣。惟兹远虑，尚未速成，似有待而然也。以谓沛然莫之御者水为大，确乎不可拔者石为坚，与其多易而致难，曷若暂劳而享逸。由是一之日，规断岸，计横流。二之日，就它山，下文础。云随根至，天与骨来。相继十霜，才及百两。犹未毕此愿也。会有涿州西七里小马村成济闻之，惠然来助。自时缘感，特异往初。老幼相呼，远近比至。上置碕岸，旁压壖泥。有同下坂以走丸，并欲挟山而超海。望之玉立，地欻变于宝严，过之砥平，人咸疑其化出。

自非悠久，颛得经营，则何以发自至诚，形于吉梦，得人为助，不日告成。若是之速耶，桥既成，又求文于下走，欲其同会，各录本名。如过见千佛之比，用齐坤厚，永弗坠焉。"鼎本生长中原，故其文具有唐代风格。

刘辉，好学，善属文，疏简有远略。寿隆二年，上书曰："宋欧阳修编《五代史》，附我朝于四夷，妄加贬訾。且宋人赖我朝宽大，许通和好，得尽兄弟之礼。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恬不经意。臣请以赵氏初起事迹，详附国史。"上嘉其言，迁礼部郎中。诏以贤良对策，辉言多中时病。擢史馆修撰，卒。

马得臣，南京人。好学博古，善属文。累迁政事舍人、翰林学士。圣宗即位，兼谏议大夫，知宣徽院事。时击鞠无度，上书谏曰："臣窃观房玄龄、杜如晦，隋季书生，向不遇太宗，安能为一代名相？臣虽不才，陛下在东宫，幸列侍从。今又得侍圣读，未有裨补圣明。陛下尝问臣以贞观、开元之事，臣请略陈之。臣闻唐太宗侍太上皇宴罢，则挽辇至内殿。玄宗与兄弟欢饮，尽家人礼。陛下嗣祖考之祚，躬侍太后，可谓至孝。臣更望定省之余，睦六亲，加爱敬，则陛下亲亲之道，比隆二帝矣。臣又闻二帝耽玩经史，数引公卿讲学，至于日昃。故当时天下，翕然向风，以隆文治。今陛下游心典籍，分解章句，臣愿研究经理，深造而笃行之。二帝之治，不难致矣。臣又闻太宗射豕，唐俭谏之；玄宗臂鹰，韩休言之。二帝莫不乐从。今陛下以球马为乐。愚臣思之，有不宜者三，故不避斧钺言之：窃以君臣同戏，不免分争，君得臣愧，彼负此喜，一不宜；跃马挥杖，纵横驰骛，不顾上下之分，争先取胜，失人臣礼，二不宜；轻万乘之尊，图一时之乐，万一有衔勒之失，其如社稷、太后何？三不宜。倘陛下不以臣言为迂，少赐省览，天下之福，群臣之愿也。"书奏，帝嘉叹良久。未几卒，赠太子太保。按此书雅健近汉人，故亟录之。

萧孝穆，小字和尔沁，淳钦皇后弟五世孙。廉谨有礼法，官宰

相、枢密使，封燕、秦、吴、楚、齐国王。虽椒房亲，位高益畏，所荐拔皆忠直士。时称为“国宝臣”，目所著文曰《宝老集》，今不传。

李宣仲，官知冀州军事判官，文林郎，试秘书省校书郎。《盘山志》载其《盘山祐唐寺创建讲堂碑铭》云：“峭壮灵峰，创兴华宇。式开讲肆，用陈法侣。物置人多，利圆三宝。庶几乎作善之祥，传名旷古。”又《固安县志》载涿州乡贡进士张希颜《重修法华寺募缘碣》，有云：“时迁岁暮，隳残蝃蝀之梁；雨坏风摧，打碎鸳鸯之瓦。”又云：“若抽鹅眼之资，必值龙华之会。”初唐四杰之遗响也。

韩昉，字公美，燕京人。仕辽，累世通显。天庆二年，中进士第一，补右拾遗。后仕于金。在礼部七年，凡朝廷典章制度，或因或革，皆经其擘画。官至开府仪同三司。昉虽贵，读书未尝去手，善属文，最长于诏册。作《太祖睿德神功碑》，当世称之。

僧行均，字广济，俗姓于氏。著《龙龛手鉴》四卷。沙门智光字法炬者为作序云：“夫声明著论，乃印度之宏纲；观迹成书，实支那之令躅。印度则始标天语，厥号梵文；载彼贯线之花，缀以多罗之叶。开之以字缘字界，分之以男声女声。支那则创自轩辕，制于沮诵。代结绳于既往，成进牍以相沿，辨之以会意象形，审之以指事转注。洎乎史籀变古文为大篆，程邈变小篆为隶书。蔡邕刊定于《石经》，束皙网罗于竹简。九流竞骛，若百谷之朝宗；七略遐分，比众星之拱极。寻源讨本，备载于埤苍广苍；叶律谐钟，咸究于韵英韵谱。专门则字统说文，开牖则方言国语。字学于是乎昭矣。矧复释氏之教，演于印度，译布支那，转梵从唐。虽匪差于性相，披教悟理，则必正于名言。名言不正，则性相之义差。性相之义差，则修断之路阻矣。故祇园高士探学海洪源，准的先儒，导引后进，挥以宝烛，启以随函。郭迻但显于人名，香严惟标于寺号。流传岁久，钞写时讹。寡闻则莫晓是非，博古则徒怀惋叹。不逢敏达，孰为编修？有行均上人，字广济，俗姓于氏。派演青齐，云飞燕晋。善于音韵，闲于字书。

睹香严之不精，写金河而载缉。九仞功绩，五变炎凉。具辨宫商，细分喉齿。计二万六千四百三十余字，注一十六万三千一百七十余字，并注总一十八万九千六百一十余字。无劳避席，坐奉师资。讵假担簦，立祛疑滞，沙门智光，利非切玉，分忝断金，辱彼告成，见命序引，推让而宁容阁笔，俯仰而强为抽毫。矧以新音，遍于龙龛，犹手持于鸾镜。形容斯鉴，妍丑是分，故目之曰《龙龛手鉴》。总四卷，以平上去入为次，随部复用列之。又撰《五音图式》附于后。庶力省功倍，垂益于无穷者矣。"行均之书，既有功于小学，而智光此序，亦复详赡雅伤，无惭作者。方外多才，正未可轻视也。

第二节　诗　家

唐、宋、元、明诗俱有总集。即金与辽同起朔方，而金有元遗山之《中州集》，一代诗人，灿然可观。辽之圣、兴、道三宗雅好词翰，咸通音律，有国乐、雅乐、大乐、散乐、铙歌、横吹乐，侍从诸臣多淹通风雅，特以无人为之缀缉，以致后世无传。海宁周春辑《辽诗话》二卷，极尽搜罗之能事，惟芜杂亦所不免。今择而取之，一时朝野彬彬之风，犹可想见焉。

圣宗，讳隆绪，小字文殊努，景宗长子。幼喜书翰，十岁能诗。既长，精射法，晓音律，好绘画。《契丹国志》云："圣宗好读唐《贞观事要》，至太宗《明皇实录》，则钦服。"又亲以契丹字译《白居易集》，召番臣等读之。又喜吟诗，御制曲百余首。宋仁宗时有使辽者，见其《传国玺诗》云："一时制美宝，千载助兴王。中原既失鹿，此宝归北方。子孙宜慎守，世业当永昌。"又有"乐天诗集是吾师"之句。

兴宗，讳宗真，小字济古尔，圣宗长子。幼而聪明，长而魁伟。好儒术，通音律。重熙五年四月，幸后弟萧无曲第，曲水泛觞赋诗。九月猎黄花山，获熊三十六。十月幸南京，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赋》、《幸燕诗》试进士于廷。帝幸礼部贡院及亲试进士，皆张俭发

之。进见不名，赐诗褒美。六年六月，赐南院大王耶律和睹衮命，上亲为制诰词，并赐诗以宠之。七月，以皇太弟重元生子，赐诗及宝玩器物。二十四年二月，召宋使钓鱼、赋诗。北枢密使萧惠请老，封魏国王。遇生日，辄赐诗，以示尊宠。

道宗，讳洪基，字纳琳，小字察喇，兴宗长子。清宁二年二月，以兴宗在时生辰宴群臣，命各赋诗。三月，御制《放鹰赋》赐群臣，谕任臣之意。三年八月，帝以《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进皇太后。六年五月，监修国史耶律白请编次《御制诗赋》，仍命白为序。陆游《老学庵笔记》载大安元年，尝赐诗褒北院枢密副使耶律斡特剌，相臣李俨尝作《黄菊赋》以献。道宗作诗题其后以赐之曰："昨日得卿《黄菊赋》，碎剪金英填作句。袖中犹觉有余香，冷落西风吹不去。"又释明河《补续高僧传》载法均族里失详。清宁中，被征校定诸家章抄，归隐马鞍山。咸雍间，辽主渴思一见，待以师礼，宠以诗章，有"行高峰顶松千尺，戒净天心月一轮"之句。

道宗宣懿皇后萧氏，小字观音，枢密使萧惠之女。姿容冠绝，工诗，善谈论。自制歌词，尤善琵琶。重熙中，道宗王燕赵，纳为妃。清宁初，立为懿德皇后。后为奸臣耶律伊逊、张孝杰等诬奏赐死。乾统初，追谥宣懿皇后。《辽史》拘于体例，载后事甚略。而王鼎《焚椒录》则言之颇详，云："清宁二年八月，上猎秋山，后率妃嫔从行在所。至伏虎林，命后赋诗。后应声曰：'威风万里压南邦，东去能翻鸭绿江。灵怪大千俱破胆，那教猛虎不投降。'上大喜，出示群臣曰：'皇后可谓女中才子。'三年，和上作《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后应制属和曰：'虞廷开盛轨，王会合奇琛。到处承天意，皆同捧日心。文章通蠡谷，声教薄鸡林。大寓看交泰，应知无古今。'上尤长弓马，常驰入深林邃谷。后上疏谏，上颇厌远。咸雍之末，希得幸御，后因作词曰《回心院》，被之管弦，以寓望幸之意。其词曰："扫深殿，闭久金铺暗。游丝络网尘作堆，积岁青苔厚阶面。扫深殿，待君宴。拂象

床，凭梦借高唐，敲坏半边知妾卧，恰当天处少辉光。拂象床，待君王。换香枕，一半无云锦。为是秋来展转多，更有双双泪痕渗。换香枕，待君寝。铺翠被，羞杀鸳鸯对。犹忆当时叫合欢，而今独覆相思块。铺翠被，待君睡。装绣帐，金钩未敢上。解却四角夜光珠，不教照见愁模样。装绣帐，待君贶。叠锦茵，重重空自陈。只愿身当白玉体，不愿伊当薄命人。叠锦茵，待君临。展瑶席，花笑三韩碧，笑妾新铺玉一床，从来妇欢不终夕。展瑶席，待君息。剔银灯，须知一样明。偏是君来生彩晕，对妾故作青荧荧。剔银灯，待君行。爇薰炉，能将孤闷苏。若道妾身多秽贱，自沾御香香彻肤。爇薰炉，待君娱。张鸣筝，恰恰语娇莺。一从弹作房中曲，常和窗前风雨声。张鸣筝，待君听。"时诸伶无能奏演此曲者，独伶官赵惟一能之。耶律伊逊因诬后与惟一通，欲乘此害后，更命他人作《十香》淫词，阴使宫婢单登乞后手书，绐后曰："此宋国忒里蹇所作。"更得御书，便称二绝。后读而喜之，既为手书一纸，纸尾复书己所作《怀古》诗一绝云："宫中只数赵家妆，败雨残云误汉王。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窥飞燕入昭阳。"伊逊得书，遂构词命登等陈首，以《十香词》为证。上大怒，命张孝杰与伊逊穷治其狱。狱既具，上犹未决，指《怀古》一诗曰："此是皇后骂飞燕也，如何便作十词？"孝杰进曰："此正皇后怀惟一耳。"上问曰："何以知之？"孝杰曰："宫中只数赵家妆，惟有知情一片月。"包"赵惟一"三字也。上意遂决，敕后自尽。后乞更面可汗一言而死，不许。乃望帝所而拜，作《绝命词》，遂闭宫自经，年三十有六。闻者莫不冤之。清徐釚《词苑丛谈》云："萧后《回心院》词，怨而不怒，深得词家含蓄之意。斯时柳七之调，尚未行于北国，故萧词大有唐人遗意也。"

按《十香词》世所艳称，然实为伊逊命他人所作。今附录如下：

青丝七尺长，挽出内家装。不知眠枕上，倍觉绿云香。

红绡一幅强，轻阑白玉光，试开胸探取，尤比颤酥香。　芙蓉失

新艳，莲花落故妆，两般总堪比，可似粉腮香。 蝤蛴那足并，长须学凤凰，昨宵欢臂上，应惹领边香。 和羹好滋味，送语出宫商。定知郎口内，含有暖甘香。 非关兼酒气，不是口脂芳。却疑花解语，风送过来香。 即摘上林蕊，还亲御苑桑。归来便携手，纤纤春笋香。 凤靴抛合缝，罗袜卸轻霜。谁将暖白玉，雕出软钩香。 解带色已战，触手心愈忙。那识罗裙内，消魂别有香。 咳唾千花酿，肌肤百和装。元非啖沈水，生得满身香。

天祚文妃萧氏，小字色色，国舅大父房之女。幼选入宫，聪慧闲雅。工文墨，善诗歌。天祚即位，册为文妃。女直既强，日见侵迫。帝畋游不恤，忠臣多被疏斥。妃作歌讽谏，其词曰："勿嗟塞上兮暗红尘，勿伤多难兮畏夷人；不如塞奸邪之路兮，选取贤臣。直须卧薪尝胆兮，激壮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云。"又歌曰："丞相来朝兮剑佩鸣，千官侧目兮寂无声。养成外患兮嗟何及！祸尽忠臣兮罚不明。亲戚并居兮藩屏位，私门潜畜兮爪牙兵。可怜往代兮秦天子，犹向宫中兮望太平。"天祚见而衔之。后为元后兄萧奉先所诬赐死。

东丹王，名贝，小字托云，太祖长子。幼聪明好学。神册元年春，立为皇太子。时太祖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常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对。太祖曰："佛非中国教。"贝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太祖破渤海大諲撰，改其国曰"东丹"，以贝为人皇王主之，仍赐天子冠服，建元甘露。太祖将还，贝作歌以献。后让位于太宗。太宗既立见疑，以东平为南京，徙贝居之，置卫士阴俟动静。贝既归国，命王继远撰《建南京碑》，起书楼于西宫，作《乐田园》诗。唐明宗闻之，使人跨海持书密招贝。贝谓左右曰："我以天下让主上，今反见疑；不如适他国，以成吴太伯之名。"立木海上刻诗曰："小山压大

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携高美人载书浮海而去。至汴见明宗，赐姓东名慕华，复赐姓李名赞华。后明宗养子从珂弑其君自立，贝密报太宗曰：“从珂弑君，盍讨之。”及太宗立石敬瑭为晋王，加兵于洛，从珂欲自焚，召贝与俱，贝不从。遂害之。世宗即位，谥“让国皇帝”。初，市书至万卷，藏于医巫闾绝顶之望海堂。通阴阳，知音律，精医药、砭焫之术。工辽、汉文章，尝译《阴符经》。善画本国人物，如《射骑》、《猎雪骑》、《千鹿图》，皆入宋秘府。

平王隆先，字团隐，东丹王子也。景宗即位，始封平王。未几兼政事令，留守东京。数荐贤能之士。为人聪明，博学能诗，有《阆苑集》行于世，今不传。

宁王长没，字和鲁，堇妃甄氏所生，世宗第三子也。敏给好学，通契丹、汉字，能诗。保宁八年，夺爵贬乌古部，赋《放鹤诗》，征还。统和九年，应太后命赋《移芍药》诗。

耶律学古，字伊实扬。颖悟好学，工译鞮及诗。乾亨元年，宋既下河东，乘胜侵燕。学古受诏往援，以功遥授保静军节度使。会宋将潘美率兵分道来侵，学古擒其将领。自是与潘美各守边约，无相侵轶，民获安业。以功为特哩衮，是祭彤、羊祜之流亚也。

耶律资忠，字乌延，小字札拉。博学，工词章，年四十未仕。圣宗知其贤，召补宿卫。数问以古今治乱，资忠对无隐，眷遇日隆。初，高丽内属，取女直六部地以赐，至是贡献不时至，诏资忠往问故。高丽无归地意。由是权贵数短于上，出为上京副留守。三年，再使高丽，留弗遣。资忠每怀君亲，辄有著述，号《西亭集》。帝与群臣宴，时一记忆，曰：“资忠亦有此乐乎？”后以为林牙，知特哩衮事，终昭德军节度使。天祚第二子雅里，每取唐《贞观政要》，与资忠所作《治国》诗，令侍从读之，其诗之足以感发人可知。惜《西亭集》今已不传矣。

耶律韩留，字索纽。有明识，笃行义，工为诗。性不苟合，为枢密使萧嘉哩所沮。重熙四年，召为北面林牙。诏进《述怀》诗，上嘉

叹。方将大用,遽卒。

耶律辰嘉努,字绵辛。重熙中,补牌印郎君。会太后生辰,进诗献驯鹿,太后嘉奖,赐珠二琲,杂彩二百段。清宁初,帝与燕国王射鹿俱中,王时年九岁,帝悦,辰嘉努应制进诗。帝喜,解衣以赐。官至节度使,年八十卒。

耶律古云,字纠坚。冲澹有礼法,工文章,官至南院大王。兴宗命为诗友,数问治要,多所匡建。奉诏与耶律庶成、萧罕嘉努编辽国上世事迹及诸帝《实录》,未成而卒。

耶律良,字锡纳。读书医巫闾山。学既博,将入南山肄业,友人止之曰:"尔无仆御,驱驰千里,纵闻见过人,年亦垂暮。今若即仕,已有余地。"良曰:"穷通,命也。非尔所知。"不听,留数年而归。重熙中,修起居注。会猎秋山,良进《秋游赋》,上嘉之。清宁中,上幸鸭子河。作《捕鱼赋》,由是恩遇稍隆,迁知制诰。奏请编御制诗文,目曰《清宁集》。上命良诗为《庆会集》,亲制其序。官至知中京留守事,追封辽西郡王,谥忠成。

耶律俨,字若思,析津人,本姓李。仪观秀整。经籍一览成诵,好学有诗名。登咸雍进士第,历官至知枢密院事,封越国公。修《皇朝实录》七十卷。乾统六年,封漆水郡王。薨谥忠懿。

耶律纯,于政和二年使高丽,传其国禅师星命之学。著《星命秘诀》四卷。自序云:"源髓老人得之于元斋,元斋得之于海上异人。"有《高丽国师赋》。其《步天警句》有云:"得富非难得寿难,寿星须把令星看,令星若是逢生旺,寿算巍巍等泰山。且说夫星是克星,高强必是聘贤人。若居父母并兄弟,端的因亲上致亲。"亦诗之流也。

王鼎,仕履见前。时马唐俊有文名燕、蓟间,适上巳,与同志祓禊水滨,酌酒赋诗。鼎偶造席,唐俊见鼎朴野,置下坐,欲以诗困之。先出所作索赋,鼎援笔立成。唐俊惊其敏妙,因与定交。流镇州,居数岁,有赦,鼎独不免。会守臣召鼎为贺表,因以诗贻使者,有"谁知

天雨露，独不到孤寒”之句。上闻而怜之，即召还复其职。

萧劳古，国舅少父房之族。以善属文，为圣宗诗友。

萧柳，字图们，淳钦皇后弟五世孙。多智能文，膂力绝人，尝伐宋为先锋。柳好滑稽，虽君臣燕饮，诙谐无所忌，时人比之俳优。耶律观音努集柳所著诗千篇，目曰《岁寒集》。今已佚。

刘经（一作京），为政事舍人。奉使至宋，路中有野韭可食，味绝佳，作诗云：“野韭长犹嫩，沙泉浅更清。”有集四十卷，今佚。

张俭，宛平人。统和十四年，举进士第一。官至左丞相、太师、中书令，封韩陈南国王。开泰五年秋大猎，虎将犯跸，陈昭衮捉虎两耳骑之，拔佩刀杀之。上命俭及吕德懋赋诗以美之。

杜防，涿州归义人。擢进士甲科，官至右丞相，加尚父。重熙二十一年秋，祭仁德皇后，诏儒臣赋诗，防为魁，赐金带。

杨佶，字正叔，南京人。幼颖悟异常，读书自能成句，弱冠声名籍甚。统和二十四年，举进士第一。累迁翰林学士，文章号得体。宋遣梅询贺千龄节，诏佶迎送，多唱酬，询每见称赏。后居相位，致仕卒。有《登瀛集》五卷行于世，今佚。

萧铎卢斡，字撒板。幼警悟异常儿。及长，好学善属文有才干。年三十始仕，为朝野推重。伊逊诬以罪，谪戍西北部。在戍十余年，始得还乡里，屏居谢人事。一日，临流闻雉鸣，三复孔子“时哉”语，作古诗三章见志。当时名士称其高情雅韵，不减古人。卒赠节度使。

刘三嘏，河间人，慎行子也。第进士，尚主为驸马都尉。尝献《一矢毙双鹿赋》，圣宗嘉其赡丽。与公主不谐，奔宋，归，杀之。刘壎《儒林公议》云，三嘏携嬖妾，挈一子，投宋广信军。情词悲切，自言主凶狠，必欲杀其妾与子，故归。朝廷颇询其国中机事，复为诗自陈云：“虽惭涔勺赴沧溟，仰诉丹衷不为名。寅分星辰将降祸，兑方疆寓即交兵。春秋大义惟观衅，王者雄师但有征。救得燕民归旧主，免于通问自称兄。”辽屡移文求索，宋恐开边衅，乃遣人拘送还辽。

诗人之不幸如是。

马尧俊，据《文昌杂录》云，元丰三年十二月一日，高丽正徽生辰。辽遣起居郎知制诰马尧俊充使，留仙宾馆。俊献徽诗云："始从钩裂海东天，世世英雄禀自然。掌上宝符钤造化，胸中神剑画山川。太宗莫取龙州道，炀帝难乘鸭绿船。真是金轮长理国，岂论八万四千年。"徽以锦细八百匹为谢云。

马希白。咸雍六年九月，上幸藕丝淀，以希白诗才敏妙，十吏书不能给，召试之。

孟初，官中书舍人。《东国史略》载其轶事云：高丽肃宗明孝王七年，辽遣初来贺生辰。兵部员外郎金缘为馆伴，初见其年少，颇易之。一日，并辔出郊，雷始雰，初唱云，"马蹄踏雪乾雷动。"缘即对曰："旗尾翻风烈火飞。"初愕然曰："真天才也。"由是情好日笃，相唱和，及别，解金带赠之。

左企弓，字君材，蓟人。读书通《左氏春秋》。天祚时宰相，降金，金人既定燕，欲从宋割地初约，契丹故大臣皆言南朝自来畏怯，又见刘延庆败走。企弓因献诗曰："君王莫听捐燕议，一寸山河一寸金。"金主初不听，卒畀宋，然阴有败盟之意矣。

马贤良不详其颠末。《封氏编年》云：宣和四年十月，郭药师等以常胜军入燕城，马贤良者献诗云："闻说将军晓入燕，满城和气接尧天。油然叆叇三千士，雨洗兵戈二百年。"

王枢，字子慎，良乡人。辽日登科，后仕金为直史馆。尝有《三河道中》诗云："十载归来对故山，山光依旧白云间。不须更读元通偈，始信人间是梦间。"

虞仲文，字质夫，武州宁远人。仕为辽相。归金，授枢密使平章政事。四岁作诗赋煎饼，有"鱼目蝉声"之句。又赋《雪花诗》云："琼英与玉蕊，片片落前池。问著花来处，东君也不知。"人以神童目之。

张通古，字乐之，易州易县人。读书过目不忘，该综经史，善属

文。天庆二年进士第，后仕金至平章政事。正隆初，以司徒致仕卒。其《灵壁寺》诗云："万壑千岩里，林开一径深。数年劳想望，此日快登临。胜境情难尽，危涂力不任。楼台相映抱，松柏自萧森。花散诸天雨，灯传古佛心。鹤泉寒漱玉，园地旧铺金。石磴崎岖上，桃溪窈窕寻。渊明能止酒，叔夜况携琴。所恨无长暇，徒勤惜寸阴。清宵谁我伴，乘兴待孤斟。"

第二章　金

金与辽同种，所居在白山黑水之间，即古肃慎氏之故壤也。其俗无书契，无约束。自函普来自高丽，居完颜部仆干水之涯，是为完颜氏之始祖。其后浸昌浸炽，三传而至献祖绥可，始教民筑室树艺。四传而至昭宗不鲁。乃欲以条教为治，几为部众所杀，可见榛狉之俗。施以整齐画一之道，已苦扞格，矧施以文教之治乎。故历景祖、世祖、肃宗、穆宗、太祖、太宗六世，皆以武力剪灭诸部。亡辽降宋。奄有中夏之半。洎乎武元开国，得辽旧人用之，使介往复，其言已文，文烈继统，乃行选举之法。迨伐宋取汴经籍图书，宋士多归之，文教由是兴焉。熙宗在位，诏以经义词赋取士。款谒先圣，北面如弟子礼。其倾心文学，何异汉武之表章儒术。世宗、章宗之世，儒风丕变，庠序日兴，由科第而位至宰辅者接踵。当时儒者虽无专门名家之学，然而朝廷典策，邻国书命，粲然可观矣。宣宗南渡而后，赵秉文、杨云翼诸公迭主文盟，文风蒸蒸日上。迨哀宗北迁，元好问以昌明博大之才，郁然为一代宗匠，执文坛牛耳者垂三十年。呜呼！盛矣。夫金源用武得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立于唐、宋之后，有非辽之所可及。此其故盖在得国之后，以文而不以武也。传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文之有裨于国家，不綦重哉？

自来论金代文学者，约有数说：以为大定中君臣上下以淳德相尚，士大夫之学，少华而多实；明昌以后，朝野无事，侈靡成风。士大夫之学，多华而实少者（杨奂之说也）。以为大定以还，文治既洽，教育亦至，一扫五代、辽季衰陋之俗者（元好问之说也）。以为南渡后文风一变，多学奇古者（刘祁之说也）。以蔡正甫为斯文正传之宗，党竹溪次之，闲闲公又次之者（萧贡之说也）。以为金百年来得文派

之正，而主盟一时者，皇统宇文公。大定明昌无可蔡公承旨党公，贞祐正大礼部赵公，北渡后则遗山先生者（徐世隆之说也）。之数说者，类能提纲挈领，洞见本源，荟萃而论列之，亦是非得失之林也。余以为金自抚有中土以来，投戈息马，稽古右文，绩学之士，后先相望。士大夫之润色鸿猷者，多产于幽并燕、赵、齐、鲁之间，得其山川雄深浑厚之气，习其北方整齐严肃之俗，发为文章，每能华实并茂，风骨遒上，绝胜江南之柔弱。试一读其遗文，当不以予言为河汉也。

夷考金有中夏，代历十纪，享国百二十年。其间文人学士，何虑数百。清钱大昕作《金史艺文志》，罗列专集，自完颜玮以下，计有七十余家。唯是存于今者，只王寂《拙轩集》、赵秉文《滏水集》、王若虚《滹南集》，李俊民《庄靖集》、元好问《遗山集》、蔡松年《明秀集》、段成己《克己二妙集》而已。其中《拙轩》一集，原本久佚。清修"四库"书，始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史称郑子聃有能赋声，海陵使其与翰林修撰等同进士杂试，子聃果第一。而子聃之赋，今不得其一篇。吁，可慨已！元修《金史》，其纂修者为欧阳玄、揭傒斯、李好文等，皆一代知名之士。而卫绍王纪至不能举其事实，又所录文字，只有《梁襄谏北幸》一书，其余湮没不传者，不知凡几。推其所由，则以金与元仇。元既灭金，并其文献而痛恶之，一任其散佚而荡尽。明则种族不同，又年远代湮，无怪其如秦越人之不关痛痒，故终明之世，未有裒集金源一代之文者。所幸元好问之《中州集》、《中州乐府》尚流播人间，堪为信史。而清人秀水庄仲方之《金文雅》、昭文张金吾之《金文最》，网罗放失，不遗余力，俾完颜文物绝而复存，其功为不可没矣。兹将其一代文学从事采撰，于上列之书，剥肤存液，以求至当。若夫遗文佚事，则刘祁《归潜志》、王恽《玉堂嘉话》，间亦节取，俾得见当日之风尚也。

第一节　文　家

金初未兴文学之先，诏令奏议，借才异国，文辞即斐然可观。其后振兴文教，济济多士，云蒸霞蔚，类皆北方之彦。考其著述，往往源本六经，多见道之语。其从事古文者，或宗昌黎，或学庐陵，清刚隽上，一洗南朝靡靡之习。平心而论，实足继北宋之正宗，开有元之先路云。

完颜勗，字勉道，本名乌野，穆宗第五子。好学问。国人呼为秀才。宗翰、宗望定汴州，受宋帝降。太宗使勗就军中往劳之。宗翰等问其所欲，曰："惟好书耳。"载数车而归。天会六年，诏求访祖宗遗事，以备国史，命勗与耶律迪越掌之。勗等采摭遗言旧事，自始祖以下十帝，综为三卷，事无隐讳，详略得宜。皇统中，又成《太祖实录》二十卷。金之有实录，自勗始也。又撰定《女真郡望姓氏谱》及他文甚众。大定中，诏以诗文镂板，今已不传。

完颜希尹，本名谷神，欢都之子也。自太祖举兵，常在行阵，或从太祖，或从撒改，或与诸将征伐，比有功。金初无文字，国势日强，与邻国交好，乃用契丹字。太祖命希尹撰本国字备制度。希尹乃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真字。天辅三年，字书成，太祖大悦，命颁行之。其后熙宗亦制女真字，与希尹所制字俱行用。希尹所撰谓之女真大字，熙宗所撰谓之小字。

完颜璹，字子瑜，世宗之孙，越王之长子。封密国公。金百年以来，宗室中第一流人也。文笔委曲，能道所欲言。朝臣自闲闲公、杨礼部、雷御史而下，皆推重之。资雅重，淡于世味。穷日力于书。读《通鉴》至三十余过，是非成败，道之如目前。越王薨后，稍得出游，文士辈亦时至其门。家所藏法书、名画，几与中秘等。所居有樗轩，故自号樗轩老人。卒年六十有一。

蔡松年，字伯坚。以行台尚书省令史出身，官至尚书右丞相。镇

阳别业有萧闲堂，自号萧闲老人。薨谥文简。松年事继母以孝闻，喜周恤亲党。文笔雅洁，有集行于世，今佚。

蔡珪，字正甫，右丞相松年之子。天德三年进士，擢第后，不赴选调，求未见书读之，其辨博为天下第一。除澄州军事判官，三河簿。正隆三年，铜禁行，官得三代以来鼎钟彝器无虑千数。礼部官以珪博物，且识古今奇字，辟为编类官，后改太常丞。朝廷稽古礼文之事，取其议论为多。初，两燕王墓旧在中都东城外，海陵广京城围，墓在东城内，前尝有盗发其墓。大定九年，诏改葬于城外。俗传六国时燕王及太子丹之葬，及启圹，其东墓之柩题其端曰“燕灵王旧”。“旧”，古“柩”字，通用。乃西汉高祖子刘建葬也。其西墓盖燕康王刘嘉之葬也。珪作《两燕王墓辨》，据葬制名物款刻甚详。十九年，出守潍州道卒。有《续欧阳文忠公集》、《古录金石遗文》六十卷、《古器类编》三十卷、《补南北史志书》六十卷、《水经补亡》四十篇、《晋阳志》十二卷、《续金石遗文跋尾》一十卷、《两燕王墓辨》一卷、文集五十五卷，今皆佚。元好问曰：“国初文学，如宇文大学、蔡丞相、吴深之等，不可不谓之豪杰之士，然皆宋儒，难以国朝文派论之。故断自正甫为正传之宗，党竹溪次之，礼部闲闲公又次之。”自萧户部真卿倡此论，天下迄今无异议云。

马定国，字子卿。宋茌平人。阜昌初，游历下亭，以诗撼刘豫，豫荐诸金，官至翰林学士。《石鼓》自唐以来无定论，子卿以字画考之，云是宇文周时所造，作辨余万言，出入传记，引据甚明，学者以比蔡正甫《两燕王墓辨》。自号荠堂先生，有集传于世，今佚。

施宜生，字明望，浦城人。宣和末，为颍州教官，仕于齐，不得志。又仕于金，官至翰林学士。正隆中，奉使于宋，坐漏泄国情烹死。初在颍州日，从赵德麟游，颇得苏门沾丐。其在金，与蔡松年为文字交，自号三住老人。有集行于世，今佚。

梁襄，字公赞，绛州人。性颖悟，日记千余言。登大定三年进士

第，由耀州同官主簿累迁至保大军节度使，为薛王府掾。时世宗将幸金莲川，有司具辨。襄上疏极谏，洋洋千七百余言，文载《金史本传》。世宗纳之，遂为罢行，襄由是以直声闻。史臣赞之曰："大定间人材辈出，文义蔚然，加以世宗之听纳，人各尽其所能，论议书疏有可传者，惜史无全文，仅存梁襄《谏北幸》一书。辞虽过繁，而意亦切至，故备载之。以见当时君明臣直，不以言为忌。金之致治，于斯为盛。呜呼休哉！"史又言襄长于《春秋左氏传》，至于地理、氏族，无不该博。又元好问《中州集》载襄《贺章宗即大位表》云："曾天子，祖天子，世嫡相承；舜何人，予何人，自强不息。"又自河南府倅移华州防御使，谢上表云："昔同雒尹，已陪嵩岳之呼；今领华防，愿效封人之祝。"是其骈俪文亦复可诵，正不徒以直言极谏见长也。

周驰，字仲才，济南人。经学出于醇德先生王广道，赋学出于泰山李时亨。至于党赵，又其忘年交也。资性古雅，而以襟量见称。大定中住太学，屡以策论魁天下，私试亦频中监元。辽东吴子英尝从仲才学，能记其所著《亚父撞玉斗赋》及他文数篇。

王庭筠，字子端，熊岳人。生未期，视书识十七字。七岁学诗，十一岁赋全题。稍长，涿郡王翛一见期以国士。登大定十六年进士，官至翰林修撰。子端诗文有师法，高出时辈之右。字画学米元章，其得意处颇能似之，墨竹殆天机所到，文湖州以下不论也。平生爱天平黄华山水，居相下十年，自号黄华山主。著有《丛辨》十卷，文集四十卷，今俱佚。其殁也，章宗悼之曰："玉堂、东观中，无复斯人矣。"又李纯甫《屏山故人外传》云："子端世家子，风流酝藉，冠冕一时，为人眉目如画，美谈笑，俯仰可观。外视若简贵，人初不敢与接。一见之后，和气津津，溢于衡宇间。又其折节下士，如恐不及，苟有可取，极口称道之。故人人恨相见之晚也。"

周昂，字德卿，真定人。年二十四擢第，释褐南和簿，历任监察御史、隆州都军、权行六部员外郎。其甥王若虚尝学于昂，昂教之

曰："文章工于外而拙于内者，可以惊四筵，而不可以适独坐。可以取口称，而不可以得首肯。"又云："文章以意为主，以言语为役。主强而役弱，则无令不从。今人往往骄其所役，至跋扈难制，甚者反役其主。虽极辞语之工，而岂文之正哉？"昂孝友喜名节，学术醇正，文笔高雅，诸儒皆师尊之。晚从宗室承裕军，承裕失利，跳走上谷，众欲径归，昂独不从。城陷，与从子嗣明同殉国难。

王竞，字无竞，安阳人。警敏好学，宋末登科，入金任县令。皇统初，参政韩昉荐之，召权应奉翰林文字。诏作《金源郡王完颜娄室墓碑》，竞以行状尽其实，乃请国史刊正之，时人以为法。二年，试馆阁，竞文居最，遂即真，累迁至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承旨，修国史。竞博学而能文，善草隶书，工大字，字或广长丈余，而结密如小楷，京都宫殿题榜皆其笔。赵秉文以为古今第一手，唯党篆差可配耳。元好问《遗山文集》有《王无竞题名记》，亦极推服之。

郭长倩，字曼卿，文登人。登皇统丙寅经义乙科。仕至秘书少监，兼礼部郎中，修起居注。与施明望、王无竞、刘嵓老、刘无党相友善。所撰《石决明传》为时辈所称。著有《昆嵛集》，已佚，今所存只大定十二年所撰《文登县学碑》，其文极华贵，而饶有经术气。

萧永祺，字景纯，本名蒲烈。少好学，通契丹大小字。广宁尹耶律固奉诏译书，辟置门下，因尽传其业。固卒，作《辽史》未就，永祺继之。作"纪"三十卷，"志"五卷，"传"四十卷上之。除太常丞，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同修国史。海陵为中京留守，永祺特见亲礼。海陵嗣位后，尚书左丞耶律安礼出守南京，海陵欲以永祺代之，永祺固辞。既出，或问曰："公遇知人主，进取爵位，以道佐时，何多让也？"永祺曰："执政系天下休戚，纵欲贪冒荣宠，如苍生何？"海陵尝选廷臣十人备咨访，独永祺议论宽厚，时称长者。是其为人，不徒以文字见长云。

曹望之，字景萧。其先临潢人，辽季移家宣德。天会间，以秀民

子选充女真字学生，除西京教授。世宗朝，官至户部尚书。尝与纥石烈良弼、张景仁、刘仲渊同修《太宗实录》。望之既贵，益刻苦读书，为人之所难能。有集行世，今已佚。

胡砺，字元化，磁州武安人。少嗜学。天会间，金兵下河北，为军士所掠。行至燕，韩昉见而异之，使赋诗以见志。砺操笔立成，思致清婉。因馆置门下，使与其子处，同教育之，自是学业日进。昉尝谓人曰："胡生才器一日千里，他日必将名世。"十年，举进士第一，授右拾遗，权翰林修撰。久之，改定州观察判官。定之学校为河朔冠，士子聚居者，常以百数。砺督教不倦，经指授者，悉为场屋上游，称其程文，谓之"元化格"。后官至刑部尚书卒。所著文久佚。其正隆三年所作《磁州武安县鼓山常乐寺重修三世佛殿碑记》尚存。

李晏，字致美，高平人。皇统六年，经义进士，释褐临汾丞。时张太师浩判平阳，一见爱其才，为之延誉。后入翰林为御史，高文大册，号称独步，拜御史中丞。明昌初，为礼部尚书，分诸道府试。复经义，设童科，皆自晏发之。晏之文今存者有《保德州重修城壁创开西门碑》一篇。

杨伯仁，初名伯英，避太子光英讳，改今名。字安道，真定藁城人。天性孝友，读书一过成诵。登皇统九年进士第，天德二年，除应奉翰林文字。海陵尝夜召赋诗甚亟，未二鼓，奏十咏。海陵喜，解衣赐之。海陵射乌，伯仁献《获乌诗》以讽。后改左拾遗，进士吕忠翰廷试，已在第一，未唱名。海陵以忠翰程文示伯仁，问其优劣，伯仁对曰："当在优等。"海陵曰："此今试状元也。"伯仁自以知忠翰姓名在第一，遂宿谏省，俟唱名乃出。海陵嘉其慎密，转翰林修撰。孟宗献发解第一，伯仁读其程文，称之："此人当成大名。"是岁宗献府试、廷试皆第一，号"孟四元"，时论以为知文。伯仁久在翰林，文词典丽。世宗尝言："本朝文学之臣，自韩昉、张钧后，则有翟永固。近日则张景仁、郑子聃。今则伯仁而已。其次未见能文者。"其见重如

此。官至太常卿。今《山左金石志》有大定二十二年伯仁承诏《重修东岳庙碑》,文长不录。

郑子聃,字景纯,大定人。父宏,辽金源令。子聃及冠,有能赋声。天德三年,杨丘行为太子左卫率府率。廷试明日,海陵以子聃程文示丘行,对曰:"可入甲乙。"及拆卷,果中第一甲第三人。调翼城丞,迁赞皇令,召为书画直长。子聃颇以才望自负,常慊不得为第一人。正隆二年会试毕,海陵以第一人程文问子聃。子聃少之。海陵问作赋如何,对曰:"甚易。"因自矜,且谓他人莫己若也。海陵不悦,乃使子聃与翰林修撰纂戬、杨伯仁、宣徽判官张汝霖、应奉翰林文字李希颜,同进士杂试。海陵御宝昌门临轩观试,以"不贵异物民乃足"为赋题,"忠臣犹孝子"为诗题,"忧国如饥渴"为论题,亲览试卷。中第者七十三人,子聃果第一,海陵奇之。有顷,进官三阶,除翰林修撰。赵献之贺启云:"丹桂一枝,不失旧物。青钱万选,无愧古人。"其为名流所称道如此。累官吏部侍郎,改侍讲学士,兼修国史。世宗曰:"修《海陵实录》,知其详无如子聃者。"盖以史事专责之也。平生所著诗文有二千余篇,今唯《宝丰县志》载其所著《汝州香山观音禅院慈照禅师塔铭》,惜文多脱落。

王寂,字元老,蓟州玉田人。登天德二年进士,历官中都路转运使。兴陵朝,以文章政事显。卒谥文肃。著有《拙轩集》、《北迁录》诸书。今《北迁录》已失传。其《拙轩集》,清修四库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厘为六卷以行世。其文博大疏畅。在大定、明昌间,卓然不愧为作者,足与赵秉文《滏水集》、王若虚《滹南遗老集》相为抗行。

路仲显,字伯达,冀州人。家世寒微。其母有贤行,教伯达读书。金初赋学家有类书名《节事》者,新出价数十金。大家儿得之者,辄私藏之。母为伯达买此书,撙衣节食,累年而后致,戒伯达言:"此书当致学舍中,必使同业者皆得观。少有靳固,吾即焚之矣。"伯达正

隆五年进士。明昌初，授武安军节度使，乡人荣之。云朔用兵，伯达奉使江左还，献赐币以佐军，未报而伯达卒。章宗诏以所献还其家。夫人傅氏曰："此非吾夫意。"复上之。有司不听，夫人付之州学，买上田二千亩有奇，以赡生徒。故相马琪德玉时判州事，闻于朝，赐号"成德夫人"。呜呼！贤母良妻萃于一家，是亦难能而可贵者矣。伯达善属文，有名于时，著有《成趣园记》。

党怀英，字世杰，冯翊人。其在孕也，母梦道士吴筠来托宿。及生，仪观秀整如神仙然。少颖悟，日授数千言。师亳社刘岩老，济南辛弃疾其同舍生也。尝试东府解魁，嗣后困于名场。遂不以世务撄怀，放浪山水间，诗酒自娱，箪瓢屡空，晏如也。既久，乡豪杰有知公，稍料理之。大定十年，擢进士甲科，调成阳军判官，汝阴令，入为国史院编修，应奉翰林学士，出为泰定军节度使。为政宽简，不言而人化，召为翰林学士承旨。泰和元年，诏修《辽史》编修官三员，诏分"纪"、"志"、"列传"，刊修官有改除者，以书自随，久之致仕。大安三年九月，年七十八卒于家，谥曰文献。赵秉文为其墓志云："公之文似欧公，不为尖新奇险之语。诗似陶、谢，奄有魏、晋，篆籀入神，李阳冰之后，一人而已。"在翰林日，皇叔允蹈伏诛，公作诏云："天下一家，讵可窥于神器；公族三宥，卒莫逭于常刑。非忘本根骨肉之情，盖为宗社安危之计。亦由凉德，有失睦亲，乃于间岁之中，连致逆谋之启。恩以义掩，至于重典之亟行。天高听卑，殆匪此心之得已。"兴言及此，惋叹奚穷。论者谓公之制诰，百年以来，亦当为第一。

孟宗献，字友之，开封人。大定三年，乡、府、省御四试皆第一。终金之世，号"四元"者只宗献与赵枢子克也。孟仕宦不甚显达，初供奉翰林，转曹王府文学，兼记室参军，经于同知单州军州事。丁母忧，哀毁致卒。刘祁《归潜志》云："孟之律赋，至今学者法之。然其源出于吾高祖南山翁。"故老云："孟晚进，初不识翁。因少年下第，

发愤辟一室，取翁赋剪其八韵类之，帖壁间，坐卧讽咏深思，已而尽得其法。下笔洞于微妙，再试遂得四元。迄今学者以吾祖为孟师也。”按，南山翁名拗，金国初辟进士，举词赋状元也。

耶律履，字履道，东丹王之七世孙。学通易太玄，至于阴阳历数，无不精究。尝以乡赋一试有司，以露索为耻，遂不就举。以荫起家，官至右丞。卒谥文献。世宗大定三年，特赐孟宗献榜进士第。世宗尝问宋名臣孰为优，履道以苏端明轼对。上曰："吾闻轼与王诜交甚款，至作歌曲戏及姬侍，非礼之甚。尚何足道耶？”履道进曰："小说传闻，未必可信。就使有之，戏笑之间，亦何足深责？世徒知轼之诗文，人不可及。臣观其论天下事，实经济之良才。求诸古人，陆贽而下，未见其比。陛下无信小说传闻，而忽贤臣之言。”明日，录轼奏议上之，诏国子刊行。自号“忘言居士”。有集已佚。

萧贡，字真卿，京兆咸阳人。大定二十二年进士。由泾州观察判官，仕至御史中丞，以户部尚书致仕。卒谥文简。真卿博学能文，人比之蔡正甫。官右司郎中时，预修《泰和律令》，所上条画，皆委曲当上心。世宗嘉叹曰："汉有萧相国，吾有萧贡。刑狱吾不忧矣。”其得君如此。真卿读书，至老不倦。注《史记》百卷，著《五声姓谱》五卷，文集十卷。又著《萧氏公论》数万言，评古今成败得失，甚有理。今俱佚。

赵秉文，字周臣，晚自号闲闲道人，磁州滏阳人也。幼颖悟，读书若素习。登大定二十五年进士第。起家安塞令，累迁至礼部尚书。哀宗即位，乞致仕，不许，改翰林学士，同修国史，兼益政院说书官。秉文自幼至老，未尝一日废书不观，著有《易丛说》十卷、《中庸说》一卷、《扬子发微》一卷、《太玄笺赞》六卷、《文中子类说》一卷、《南华略释》一卷、《列子补注》一卷，删集《论语》、《孟子解》各十卷、《资暇录》十五卷。正大间，同杨云翼作《龟鉴万年录》。又因进讲，与云翼共集自古治术，号《君臣政要》为一编，书成奏上之。今皆佚。其

所著诗文号《滏水集》，本三十卷，今存二十卷。秉文之文，出于义理之学，故长于辨析。极所欲言而止，不以绳墨自拘。为人至诚乐易，与人交，不立崖岸。继党怀英掌一世文柄者殆三十年。泰和、大安以来，科举之文，其弊益甚。盖有司惟守格法，所取之文，卑陋陈腐，苟合程度而已。稍涉奇峭，即遭绌落，于是文风大坏。贞祐初，秉文为省试，得李献能赋，虽格律稍疏，而词藻颇丽，擢为第一。舆论哗然，以为秉文大坏文格。然积习为之一去，识者以为"欧阳公再生"云。

史公奕，字季宏，大名人。大定二十八年进士，再中博学宏词科。程文极典雅，后无继之者。累迁著作郎、翰林修撰、同知集贤院。正大中，置益政院，与杨云翼同官，相得益彰。公奕文章书翰，皆有前辈风调。下至棋槊之技，亦绝人远甚。赵秉文称其"温厚谦退，与人交，愈久而愈不厌，其学问愈扣而愈无穷"。其见重如此。

杨云翼，字之美，乐平人。明昌五年经义进士第一人，词赋亦中乙科。天资颖悟，博通经传，至于天文、律历、医卜之学，无不臻极。事母孝。与人交，款曲周密，处事详雅，而能以大节自任。南渡后二十年，与赵秉文迭掌文柄，时人号"杨赵"。而公以后辈自处，不敢当也。官至翰林学士，卒谥文献。元好问曰："评者以为百余年来，士大夫身备四科者，惟公一人而已。"著有《周礼辨》一篇，《左氏》、《庄》、《列赋》各一篇，《五星聚井辨》一篇，《县象赋》一篇，文集若干卷，校《大金礼仪》若干卷，《续通鉴》若干卷。又有《勾股机要》、《象数杂说》等著，今俱佚。

韩玉，字温甫，渔阳人。少读书，尚气节。登明昌五年经义、词赋两科进士，入翰林为应奉，应制一日百篇，文不加点。又作《元勋传》称旨。章宗叹曰："勋臣何幸，得此家作传耶？"官至河平军节度副使。大安三年，北兵围燕都，夏人连陷邠、泾。陕西边帅檄玉为都统，募军得万人，出屯华亭，与夏战，败之，又败之于北原平凉，遂得

解围。而玉以都城隔绝，毅然有勤王志，因移檄关中，言词忠壮，闻者感动。其檄有云："事推其本，祸有所基。始自贼臣，贪容奸赂。继缘二帅，贪餂威权。既止夏台之师，旋致会河之败。"又云："齐魏以高垒为能坚，薄绛以穿空为得计。裹粮坐费，尽膏血于生民。弃甲复来，竭资储于国计。要权力而望形势，连岁月而守妻孥。"又云："命令不至，京师奈何。盼盼四集之师，悬悬半岁之上。人谁无死，有臣子之当然。事至于今，忍君亲之弗顾。勿谓百年身后，虚名一听史臣。只如今日目前，何颜以居人世。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富贵功名，当自致耳。"当路者忌其功，诬玉有异志，道出华州被囚。死于郡学。

陈规，字正叔，绛州稷山人。明昌五年进士。博学能文，为人敦厚，动有礼节。贞祐间，为监察御史，上宣宗便宜八事：一曰责大臣以身任安危；二曰任台谏以广耳目；三曰崇节俭以答天意；四曰选守令以结民心；五曰博谋群臣以定大计；六曰重官赏以劝有功；七曰选将帅以明军法；八曰练士卒以振兵威。其规画大计，本末兼赅。说者谓：金自南渡后，谏官称许古、陈规，而规不以讦直自名，尤见重云。刘祁《归潜志》云："公为人刚毅质实，有古人风。"笃于学问，至老不废。卒之日，家无一金，知友为葬之。

刘中，字正夫，渔阳人。《屏山故人外传》云："正夫为人短小精悍，滑稽玩世。"中明昌五年词赋经义第。赋得《楚辞》句法，尤长于古文，典雅雄放，有韩、柳气象。教授弟子王若虚、高法飏、张履，皆擢高第。学古文者翕然宗之曰"刘先生"。以省掾从军南下，改授应奉翰林文字。为主帅所重，常预秘谋，书檄、露布皆出其手。有文集藏于家。

李纯甫，字之纯，一字屏山，弘州襄阴人。承安二年经义进士。仕至尚书左司都事，终京兆府判官。幼颖悟异常，初业词赋，及读《左氏春秋》，大爱之，遂更为经义学。为文法庄周、列御寇、左氏、

《战国策》，后进多宗之。年少日，自负其材，谓功名可立致。作《矮柏赋》，以诸葛孔明、王景略自期。由小官上万言书，援宋事为证，甚切当。宰执以为迂阔，抑置之。中年，度其道不行，益纵酒自放，无仕进意。得官未成考，旋即归隐。日与禅僧士子游，以文酒为事。人有酒见招，不择贵贱往，往辄醉。虽沉醉，亦不废著书。晚年喜佛，力探其奥义。自类其文，凡论性理及关佛老二家者为"内稿"，其余应物文字为"外稿"。又解《楞严》、《金刚经》、《老子》、《庄子》、《中庸集解》、《鸣道集解》，号"中国心学，西方文教"。数十万言，以故为名教所贬云。

韩道昭，字伯晖，真定松水人。著有《五音集韵》十五卷。是书所收之字，以《广韵》为蓝本，而增入之字，以《集韵》为蓝本。取三十六字母，各分四等，排比诸字之先后，以见母牙音为首，终于求日字。注中所引之语，皆本于经训。凡《广韵》之讹舛者，一一厘订之。可谓广大悉备，始制有伦矣。与辽僧行均所著《龙龛手鉴》，同为小学中必备之书也。

刘祖谦，字光甫，安邑人。承安五年进士。正大初，为翰林修撰。家多藏书，一时名士如雷渊、李献能、王渥皆游其门。祖谦得人一诗可传，必殷勤称道，唯恐不闻。人以此称之。

冯延登，字子俊，吉州人。承安二年进士，秦和元年转为宁边令。适赵秉文守此州，与之考论文义，相得甚欢。故延登诗文皆有法度。天兴初元，授礼部侍郎。京城陷，自投井中。延登资禀淳雅，读书长于《易》、《左氏传》。好贤乐善，有前辈风调。有《横溪翁集》，今佚。

王特起，字正之，代州崞县人。智识精深，好学善论议，音乐技艺无所不能。长于辞赋，出入经史。摘其英华，以为句读。天造神出，至得意不减郭鏴，与李之纯为忘年交。泰和三年进士甲科，累迁司竹监使。朝议欲以馆职召试，会卒。

冯璧，字叔献，别字天粹。承安二年进士。历州县，召入翰林，再为曹郎。宣宗朝，屡以使指鞫大狱，毛发不贷。兴定末，以同知集庆军节度使事致仕。居崧山龙潭者十余年，诸生从之游，与四方问遗者不绝。赋诗饮酒，放浪山水间，人望之以为神仙焉。璧少日在太学，赋声藉甚。其学长于《春秋》，字画楚楚，有魏、晋风味，雅为赵秉文所激赏。制诰典丽，当代少有其比。尺牍又其专门之学，风流蕴藉，不减前世。李献甫谈笑此世为不足玩，见璧则必为之悚然。王若虚公于鉴裁，为海内称首，敬其名德，至不敢以同年生数之。北渡还乡里，年七十九终于家。

刘昂霄，字景玄，别字季房，陵川人。元好问《中州集》云："泰和中，予识景玄于太原。人有言是家读广记半月能背诵者，予未之许也。戏取市人日历，鳞杂米盐者，令读之一过，目无脱遗。"大率景玄之学，无所不窥。六经百氏外，世谱官制，与兵家所以成败者为最详。好横策危坐，掉头吟讽，幅巾奋袖，谈辞如云。四座耸听，噤不得语。故评者谓，承平以来，王汤臣论人物，李之纯玄谈，号称独步。景玄则兼众人之所独，愈叩而愈无穷，不知去古谈士为远近。余子不论也。

王若虚，字从之，自号慵夫，藁城人。承安二年经义进士，官至翰林直学士。幼颖悟，若夙昔在文字间者。其舅为周昂，龆龄时，即知其为伟器，教督周至，尽传所学。及官四方，又托之名士刘中，得卒业焉。以故学无不通，不为章句所困，颇讥宋儒经学以旁牵远引为夸。史学以探赜幽隐为功，谓天下自有公是，言破即足，何必呶呶若是。其论道之行与否云，战国诸子之杂说寓言，汉儒之繁文末节，近世士大夫参之以禅机玄学，欲圣贤之实不隐，难矣。经解不善张九成，史例不取宋子京，诗不爱黄鲁直。著论评之，凡数百条，人以刘子玄《史通》比之。为人强记默识，诵古诗至万余首，他文称是。文以欧、苏为正派，诗学白乐天。作虽不多，而颇能似之。秉史笔十五

年。新进入馆，日有纪录之课。书吏以呈，宰相必问："王学士曾点窜否?"又善持论。李纯甫以辨博名天下，杯酒淋漓，谈辞锋起，若虚能以三数语窒之。雅负人伦之望，典贡举二十年，门生半天下，而不立崖岸。虽小书生登其门，亦折行辈交之。朋会间春风和气，周浃四座，使人爱之而不忘也。北渡后，居乡里，癸卯三月卒。自其殁后，时人以为"经学、史学、文章、人物，公论遂绝。不知承平百年之后，当复有斯人否"也。所著《慵夫集》已佚。今存《滹南遗老集》四十五卷。元吴澄称其博学卓识，见之所到，不苟同于众云。

李俊民，字用章，泽州晋城人。承安五年进士第一。官应奉翰林文字。未几，弃官教授，隐于嵩山。自号鹤鸣老人。元世祖以安车召见，仍乞还山。卒谥庄靖先生。用章以遗老抗旨遁荒，于出处之际，能洁其身。入元后，只书甲子，隐然以陶潜自居。所为文冲澹和平，具有高致，亦复似其为人。虽博大不及元好问，抑亦其亚也。著有《庄靖集》十卷传于世。

李献能，字钦叔，河中人。苦学博览，于文尤长于四六。贞祐三年，特赐词赋进士，廷试第一人，宏词优等。授应奉翰林文字，在翰苑凡十年。正大末，以镇南军节度副使充河中帅府经历。河中陷，道梗不得归，就权陕府行省左右司郎中。军变殉节。献能为人眇小而墨色，颇有髯。善谈论，每敷说今古，声铿亮可听。在翰苑，应机敏捷，号得体。赵秉文、李纯甫尝曰："李献能天生今世翰苑材。"故每荐之，不令出馆。家故饶财，尽于贞祐之乱。京师冷官，食贫口众，无以自给。太夫人素豪侈，厚于自奉，小不如意，则呵谴随之，人视之殆不堪其忧，献能处之自若也。献能文章行业，过人处甚多，而天下独以其纯孝为不可及。尝谓人曰："吾幼梦官至五品，寿不至五十。"后竟如其言。

郝天挺，字晋卿，陵川人。少有赋声，早衰多疾。厌于名场，遂不复就举。元好问尝受业其门。天挺诏之曰："今人赋学，以速售为

功。六经百家，分磔缉缀。或篇章句读不之知，幸而得之，不免为庸人。"又曰："读书不为艺文，选官不为利养，惟通人能之。"又曰："今之仕多以贪败，皆苦饥寒不能自持耳。丈夫不耐饥寒，一事不可为。子以吾言求之，科举在其中矣。"或曰："以此学进士，无乃戾乎？"天挺曰："正欲渠不为举子尔。"贞祐兵乱，避于河南，往来淇、卫间。为人有崖岸，耿耿自信，宁落魄困穷，终不一至豪富之门。年五十七，终于舞阳。

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人。七岁能诗，太原王汤臣称为神童。年十一，从其叔父官于冀州。学士路宣叔赏其俊爽，教之为文。年十有四，其叔父为陵川令，改从郝晋卿学。于是肆意经传，贯串百家。六年而学成，下太行，渡大河，为《箕山》、《琴台》等诗。礼部赵闲闲见之，以为少陵以来，无此作也，以诗招之。于是名震京师，目为元才子。登兴定五年进士第，官至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金亡不仕。为文有绳尺，备众体。兵后故老皆尽，好问蔚为一代宗工，四方碑版铭志，尽趋其门。其所著诗文曰《遗山集》，实足涵盖金源一代文学焉。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作，己所当任。时《金国实录》，在顺天道万户张公府，乃言于张，愿为撰述，既而为乐夔所沮而止。好问曰："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传。"乃为《中州集》百余卷。凡金源君臣遗言往行，采摭所闻，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为记录，至百余万言，名曰《壬辰杂编》。元时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云。卒年六十八。好问著作甚富，《杜诗学》一卷，《东坡诗雅》三卷，《锦机》一卷，《诗文自警》十卷，《壬辰杂编》，皆佚。其存者为《中州集》、《中州乐府》、《遗山诗文集》、《新乐府》及《续夷坚志》。

麻革，字信之，临晋人。与元好问、刘祁交，唱酬之作甚多。为河汾诸诗老之一。金亡，隐居教授以终。为文长于写景，有《游龙山纪》，载《归潜志》。

杜仁杰，字仲梁，一字善夫，济南长清人。正大中，尝偕麻革、张澄隐内乡山中，名声与之相埒。元时屡征不起。仲梁性善谑，才宏学博，气锐而笔健，业专而心精。平生与李献能、冀禹锡最友善。其文今仅存《泰山天门铭》，见《泰安县志》。

第二节　诗　家

金源诗人专集之传于世者甚少。迄今尚能窥其渊源者，实赖元好问之《中州集》及清代御定之《全金诗》。余尝取二书而博观之，知其一代诗人，类皆从北宋欧、苏入手，以进窥乎三唐。其高者出入陶、谢，以写其自然之真趣。要与宋之西江、四灵、江湖各派，如泾渭之各别。其所以能如此者，盖其所处皆中原文献之邦，趋向独真，不为浮靡之习所移。故其所作，沉郁简淡，奇崛巧缛，各能自成一家，以振其风气，取而陈之。亦足见一代风骚之所尚也。

海陵庶人亮，字元功，辽王宗幹第二子。喜读书，有文才。为藩王时，尝书人扇云："大柄若在手，清风满天下。"又《书壁述怀》云："蛟龙潜匿隐苍波，且与蝦蟆作混和。等待一朝头角就，撼摇霹雳震山河。"人知其有大志。即位后，遣施宜生往宋为贺正使，隐画工于中，即敕密写临安之湖山城郭以归，绘为软壁，而图己像策马于吴山绝顶，后题以诗云："自古车书一混同，南人何事费车攻。提师百万临江上，立马吴山第一峰。"其意气亦复不浅。

世宗雍，本名乌禄，太祖孙，睿宗子也。即位后，易海陵之暴，而施之以仁政，人以"小尧舜"称之。其在位，对于女真旧俗，未尝须臾忘也。大定二十五年四月，幸上京，宴宗室于皇武殿，饮酒乐，上曰："吾来数月矣，未有一人歌本曲者。汝曹来前，吾为汝歌。"歌曰："乃眷上都，兴帝之第。属兹来游，恻然予思。风物减耗，殆非昔时。于乡于里，皆非初始。虽非初始，朕自乐此。虽非昔时，朕无异视。瞻恋慨想，祖宗旧宇。属属音形，宛然如睹。童嬉孺慕，历历其处。壮

岁纵行，恍然如故。旧年从游，依稀如昨。”歌中皆道祖宗创业艰难及所以继述之意，殊有周公无逸《豳风·七月》之思。称为一代令主，非虚语也。

显宗名允恭，世宗第二子。立为皇太子，在储位二十余年。有《赐右相石琚生日诗》曰：“黄阁今姚宋，青宫旧绮园。绣絺归里社，冠盖画都门。善训怀师席，深仁寄寿尊。所期河润溥，余福被元元。”尊贤下士之意，可想见也。其殂也，赐谥宣孝太子。章宗即位，赠皇帝之号，庙号显宗。

章宗名璟，显宗嫡子。大定中立为皇太孙。世宗崩，即皇帝位。天资聪悟。诗词多有可称，赋《云龙川泰和殿五月牡丹》云：“洛阳谷雨红千叶，岭外朱明玉一枝。地力发生虽有异，天公造物本无私。”《宫中绝句》云：“五云金碧拱朝霞，楼阁峥嵘帝子家。三十六宫帘尽卷，东风无处不扬花。”真帝王诗也。又有《送张建致仕归》、《吊王庭筠下世诗》，具载《飞龙记》中，今佚。

豫王允中，世宗第四子。好文，善歌诗。有《乐善老人集》，今佚。

密国公璹，仕履见前。晚年自刊其诗三百首，乐府一百首，号《如庵小稿》。赵秉文为之序，其佳句有《闻闲闲再起为翰林》云：“莲烛光中久废吟，一朝超擢睿恩深。四朝耆旧大宗伯，三纪声名老翰林。人道蛟龙得云雨，我知麋鹿强冠襟。宝岩箬谷西窗梦，不信秋来不上心。”又《过胥相墓》云：“亭亭华表立朱门，始信征南宰相尊。下马读碑人不识，夷山高处望中原。”甚有唐人远意。

宇文虚中，字叔通，成都人。宋黄门侍郎，以奉使见留。寄词张孝纯曰：“有人若问南冠客，为道西山采蕨薇。”又诗云：“定鼎未应周命改，登床合许宋人平。”又曰：“南冠终日囚军府，北雁何时到上林。”久之，金人重其才艺，官以翰林学士，掌词命。书金太祖《睿德神碑》，号为“国师”。虚中虽仕金，心不忘宋，以蜡书密奏不一事。秦桧忌之，私遣人告于金，遂致族诛。本传谓其恃才轻肆，好讥讪，凡

见女真人，辄以“矿卤”目之。贵人达官，往往积不能平，由是媒孽以成其罪。会有人告虚中谋反，鞫治无状，乃罗织其家图书为反具。虚中曰：“图籍，南来士大夫家家有之，高士谈图书尤多于我，岂亦反耶？”有司承顺风旨，并杀士谈。

张斛，字德容。仕宋为武陵守，入金官秘书省著作郎。有《南游》、《北归》等诗。赋《小孤山》云：“天围秋涨阔，山背夕阳孤。松门峡云，春木有秀色。野云无杂姿，秋兴楼云。碣石晚风催雁急，昭祁寒涨与云平。”五古《平安道中》云：“高林催青冥，柯叶森如织。阳光已转午，阴岭仍半黑。峥嵘乱石间，行子有苦色。临深地势入，陟险天宇塞。四顾无所投，迹茧去未息。怅然增百忧，冥冥羡归翼。”人多诵之。其文章字画，皆有前辈风调。宇文虚中甚激赏之。

高士谈，字子文，一字季默，宋高琼之后。宣和末，为忻州户曹。入金为翰林直学士。皇统初，遇宇文虚中之祸，时人悲之。有《蒙城集》，今佚。其断句如“寒花贪晚日，瘦竹强秋霜”。《禹庙》云：“可怜风雨胼胝苦，后世山河属外人。”并佳。

蔡松年仕履见前。其诗五古、七古为金文雅所采者，皆佳，因文长不录。兹录其《淮南道中》五首之一，以见一斑。诗云：“吾年过五十，所过知前非。颜鬓日苍苍，老境行相追。桔槔听俯仰，随人欲何为。归计勿悠悠，出处吾自知。”颇有陶、韦遗韵。

蔡珪仕履见前。七岁赋诗，见称于时辈。故其所作亦不亚于父。

马定国仕履见前。初学诗，未有入处，梦其父与方寸白笔，从此文章大进。宣政末，题诗酒家壁云：“苏、黄不作文章伯，童、蔡翻为社稷臣。三十年来无定论，到头奸党是何人。”用是得罪，亦用是得名。后游历下亭，以诗撼刘豫云：“男子当为四海游，又携书剑客东州。烟横北渚芰荷晚，木落南山鸿雁秋。富国桑麻连鲁甸，用兵形势接营邱。伤哉不见桓公语，千古绕城空水流。”遂因之而入仕途。

魏道明，字元道，易州人。仕至安国军节度使。暮年居雷溪，自

号“雷溪子”。著有《鼎新诗话》，今佚。

吴演，字子长，东平人。年三十，以食贫暂仕即归，隐于鱼山狼溪之侧。其《山居》云：“西首鱼山崦，北连黄石祠。崇冈在东南，我家山北陲。地僻少人事，终朝掩柴扉。尊酒不常得，书卷聊自怡。春风数日来，处处生蕨薇。寸心复何累，一饱良可期。当年终南人，捷径以贻讥。知我无心者，岂顾悠悠辞。”冲淡似柴桑翁。

刘著，字鹏南，舒州舒城人。宣政末登进士第。入金年六十余，始入翰林，充修撰。出守武遂，终于忻州刺史。皖城有玉照乡，既老，号玉照老人，示不忘本也。其《至日诗》云：“乱离南国忽经年，一线愁添未死前。心折灵台候云物，眼看东海变桑田。燕巢幕上终非计，雉蓄樊中政可怜。安得绝云行九万，却骑鲸背上青天。”饱经忧患者读之，当亦引为同调。

朱自牧，字好谦，棣州厌次人。皇统中南选，宋端卿榜登科。大定初，以同知晋宁军事卒官。其《郊行》诗云：“缓辔寻春水一涯，最怜朝雨浥轻沙。小溪烟重偏宜柳，平野云垂不碍花。青眼步兵元好酒，黑头江令未还家。兴长不觉归来晚，过尽城隅阵阵鸦。”有悠然自得气象。

刘汲，字伯深，天德三年进士。释褐庆州军事判官，入翰林为供奉。自号西岩老人。其集即以“西岩”为名。李纯甫为作序云：“刘西岩诗质而不野，清而不寒，简而有理，澹而有味。盖学乐天而酷似之。”顾其为人傲世而自重，颇喜浮屠，邃于性理之说。凡一篇一咏，必有深意，能道退居之乐。其《不如意》诗云：“朝亦不如意，暮亦不如意。今日只如此，来日复何异。一欢强欲谋，百忧已先至。乃知尘网苦，动辄心万计。高轩与华冕，倘来亦如寄。规规必欲求，愈劳终不遂。善哉荣启期，自宽以遣累。”读此一什，可知其诗之大凡也。

任询，字君谟，易州军市人。为人慷慨多大节。书为当时第一，画亦入妙品。登正隆二年进士第，官至北京盐使。六十四致仕，优

游乡里。家所藏法书、名画数百轴，日夕展玩，不知老之将至。年七十卒。平生诗数千首，殁后皆散失。其《山居》云："种竹六七个，结茅三四间。稍通溪上路，不碍屋头山。黄叶水清浅，白云风往还。"时人喜称道之。又有《西湖》云："西湖环武林，澄澄大圆镜。仰看湖上寺，即是镜中影。湖光与天色，一碧千万顷。堤径截烟来，楼台自昏暝。"可谓诗中有画矣。

冯子翼，字士美，大定人。正隆二年进士。官至临海军节度使事。致仕后居真定。有诗、乐府传于世，今皆佚。元好问称其诗"有笔力"。

边元鼎，字德举，丰州人。十岁能诗。中天德三年进士第，终邢州幕官。仕宦不达，为人疏俊。所作诗文有高意，时辈少及。如云："云钟号晓月，风絮乱春灯。""五更好梦经年事，三月残花一夜风。"皆佳句也。

王寂，仕履见前。诗有专长。其《经梁利器墓下》云："毁誉哓哓息盖棺，百年春梦大槐安。功名例挽九牛尾，富贵真成一鼠肝。故国莺花人事改，空山风雨夜台寒。平生老我心如铁，醉眼西州泪不干。"又《沁水山寺》云："两峡山高月半轮，五更人起马嘶频。无端又上长安道，输与僧窗饱睡人。"皆佳。其父础，字镇之，金初进士，官至归德府判官。亦善诗。

刘迎，字无党，东莱人。初以荫试部掾。大定十三年，用荐书对策为当时第一。明年，成进士第，除豳王府记室，改太子司经。显宗特亲重之，迎自称无诤居士。有诗文乐府，号《山林长语》。章宗时，诏国学刊行，今佚。金代中叶诗人，首推无党。《中州集》采其诗至七十六首之多，皆可诵也。

党怀英，仕履见前。赵秉文谓"其诗似陶、谢，奄有魏、晋"。今录其《穆陵道中》，其一云："沂山一何高，群峰郁孱颜。我行问遗老，云此小太山。望秩有常祀，其神号东安。草荒穆妃坟，雨剥汉武台。

神仙果何在，可想不可攀。千年等一息，俯仰悲人寰。东望蓬莱宫，咫尺沧波间。"其二云："重山复峻岭，溪路宛盘盘。流水滑无声，暗泻溪石间。岸草凄以碧，鲜葩耀红丹。高云映朝日，流景清林端。我行属朱夏，欲憩不得闲。山中有佳人，风生松桂寒。"

赵秉文，仕履见前。元好问谓其："七言长诗，笔势纵放，不拘一律；律诗壮丽；小诗精绝，多以近体为之；至五言大诗，则沉郁顿挫学阮嗣宗，真淳简澹学陶渊明。以他文较之，或不近也。"其游《华山寄元裕之》七古一首，纵横奇恣，为集中最高之作。篇长不备录。

王庭筠，仕履见前。其诗圆活脱洒，笔端有舌。今录其《题张礼部溪山真乐图》云："悠悠春天云，想见平时闲。朝游溪桥畔，暮宿山堂间。澹然不知愁，亦复忘所欢。出山初无心，既出还思山。人间待霖雨，欲归良独难。山堂怅何许，萧萧松桂寒。"

赵沨，字文孺，东平人。大定二十二年进士。官至礼部郎中。性冲澹，学道有得。"黄山"其自号也。赵秉文云："沨之正书，体兼颜、黄。行草备诸家体，超放又似杨凝式，当处黄鲁直、苏才翁伯仲间。"党怀英小篆，李阳冰以来，鲜有及者，而以沨配之，号曰"党赵"。著有《黄山集》，今佚。应制诗典雅清丽，最为坛场。史舜元言，章宗中秋赏月瑞光楼，召沨对御赋诗，以"清"字为韵。章宗读至落句，大加赏异，手酌金钟以赐，且字之曰："文孺，以此钟赐汝作酒直。"士林荣之。诗云："秋气平分月正明，蕊珠宫阙对蓬瀛。已驱急雨消残暑，不遣微云点太清。帘外清风飘桂子，夜深凉露滴金茎。圣朝不奏霓裳曲，四海歌讴即乐声。"

刘昂，字之昂，兴州人。大定十九年进士。有声场屋，其律赋轻便巧丽，差有捷法。早年得仕省掾，考满，授平凉路转运副使。昂天资警悟，作诗得晚唐体，尤工绝句，往往脍炙人口。有张秦娥者，颇能小诗。其赋《远山》云："秋水一抹碧，残霞几缕红。水穷霞尽处，隐隐两三峰。"其后流落。昂赠诗云："远山句好画难成，柳眼才多总

是情。今日衰颜人不识,倚炉长听煮茶声。"又云:"二顷山田半欲芜,子孙零落一身孤。寒窗昨夜潇潇雨,红日花梢入梦无。"秦娥为之泣下。

王硐,字逸宾。先世家临洺,至硐遂为汴梁人。博学能文,不就科举。孝友天至,非其食不食。家无甑石之储,晏如也。明昌中,宰相马惠迪判开封,举硐德行才能,诏授鹿邑主簿,即乞致仕。人以高士目之。赵秉文尝集党怀英、赵沨、路铎、刘昂、尹无忌、周昂与硐七人诗,刻木以传,目为《明昌辞人雅制》。其诗有《暮春郭南》七古。后人许之,谓语不迫切,婉转缠绵,有无限风神者也。诗云:"大梁城外孤台傍,烟荒水碧春林芳。凭高极目见归雁,风物令人思故乡。紫金山下斜阳暮,万里川光照云树。山间细雨花落时,何人来往东风路。"

师拓,字无忌,平凉人。举进士不中。明昌中,有司荐其才,以嗜酒不果。作诗有气象,而工于炼句。如《赋雁》云:"天低仍在眼,山没更伤心。"《浮上》云:"夕阳明菡萏,秋色静蒹葭。白曳冲烟鹭,红翻漾水霞。"《燕市酒楼》云:"气清天旷荡,露白野苍凉。"又"荷苍秋近叶,莲腻雨余花"。大为时人所称。其《冬夜》二首最佳,因文长不录。

史萧,字舜元,京兆人,侨居北京之和众。天资挺特,高才博学。作诗精致有理,尤善用事。古赋亦奇峭。工于字画。业科举,为名进士,优于政事,官至同知汾州事。著有《澹轩遗稿》,今佚。录《道傍》一首,以见崖略:"秋霜一何严,凋此道旁柳。残枝几叶在,其势不能久。忆昨三春时,濯洗烟雨后。弄姿舞婆娑,劝我一杯酒。别后遽能几,忽忽成老丑。人生非金石,长短百年寿。功名与富贵,于身亦何有。古人随物化,今已柳生肘。我独何为哉,穷年事奔走。长堤隐落月,驻马一回首。春风柳梢黄,定得西归否。"

庞铸,字才卿。又自号默翁,大兴人。家世贵显。明昌五年进

士，官至京兆路转运使。风流文采，为时辈所推。工诗，造语奇健不凡，世多传之。其《题山谷透绢帖》七古一首极高妙，文长不录。

李遹，字平甫，栾城人。明昌二年进士。高才博学，无所不通。泰和中，为大兴幕官。忤纥石烈执中，执中即以非罪诬染之，几至不测。虽有以自解，竟坐是仕宦不达。以东平治中致仕，闲居阳翟十余年。自号寄庵先生。平生诗文甚多，如《感事》云："半钱利路人乃虎，一钓名饵吾其鱼。"《鲁山道中》云："老夫自喜秋野僻，路人颇笑衣裳宽。"皆佳句也。

高宪，字仲常，辽东人，王庭筠之甥。幼学于外家，故诗笔字画，俱有舅氏之风。天资颖悟，博学强记。在太学中，诸人莫敢与抗。泰和三年，乙科登第。自言："于世味澹无所好，惟生死文字间而已。使世有东坡，相去万里，亦当往拜之。"年未三十，作诗已有数千首。兹录其《焚香》六言四首："茉莉花心晓露，蔷薇萼底温风。洗念六根尘外，忘情一炷香中。""满地落花春晓，一帘微雨轻阴。正要金蕉引睡，不妨玉陇知音。""纸帐收烟密下，松灰卷火常虚。午寂春闲小睡，人间自有华胥。""沉水浓薰甲煎，宫梅细点波津。奕奕非烟非雾，依依如幻如真。"

李经，字天英，锦州人。作诗极刻苦，喜出奇语，不蹈袭前人。李纯甫称为"今世太白"，由是名大震。再举不第，拂衣去。南渡后，其乡帅有表至朝廷，士大夫识之曰："此天英笔也。"朝议以武功就命倅其州，后不知所终。尝有诗云："雁奴失寒更，拍拍叫秋水。天长梦已尽，秋思纷难理。"又《四言杂诗》云："岩椒郁云，日夕生阴。雨雪缟夜，秋黄老林。人烟墨突，樵径云深。"最为得意也。

赵元，字宜之，定襄人。经童出身，举进士不中。以年及调巩西簿，未几失明。自少日博通书传，作诗有规矩。泰和以后，诗名益重。李纯甫为赋《愚轩》，有"落笔突兀无黄初"之句。愚轩，元之自号也。南渡后，往来洛西山中，赵秉文诸人皆爱之，所至必虚左以待。为人

有才干，处事详雅。既病废，无所营为，万虑一归于诗，故诗益工。其《村居夏日》云："官府不著名，散迹村落深。白云自朝暮，青山无古今。爱此夏日永，门巷多繁阴。呼儿具绳床，不履亦不簪。殷勤好风来，为我消烦襟。一饱万事了，何用腰黄金。羁勒困名马，网罗多珍禽。何如山鹿痴，呦呦恋长林。"此诗冲澹深邃，金人能为之者不多也。

冯璧，仕履见前。诗笔清峻，似其为人，素为赵秉文所激赏。《中州集》载宋景文左丞董公绍祖奉使江左，得璧诗饯行，喜见颜间。诗四韵，每诵一句，辄为一举觞。其见重当时如此。

王若虚，仕履见前。诗亦称金代作家。其《感秋》一首，为人传诵，今录之。诗云："西风撼庭柯，疏叶鸣策策。天地一萧条，羁怀亦岑寂。青春倪如昨，转瞬年半百。自从长大来，转觉日月迫。功名非所慕，老大不足恤。但然感时心，自亦不能释。清晨理短发，已见数茎白。刀镊虽可施，殆似儿子剧。此身委蛇耳，毁弃无足惜。况于毛发间，而乃强修饰。青青如陆展，星星行复出。毕竟白满头，复将何所摘。"

秦略，字简夫，陵川人。少举进士不中，即以诗为业。诗尚雕刻，而不欲见斧凿痕，故颇有自得之趣。《悼亡》一诗，高出时辈，殆荆公所云"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难"者耶。诗云："自古生离足感伤，争教死别便相忘。荒陂何处坟三尺，老眼他乡泪数行。多事春风吹梦散，无情寒月照更长。回家恰是新寒节，忍见堂空纸挂墙。"略自号西溪老人。有集行世，今佚。

元德明，太原秀容人，好问之父也。自幼读书，世俗鄙事，终其身不挂口。亲殁，遗产无几，德明布衣蔬食，处之自若。累举不第，放浪山水间，未尝不一日饮酒赋诗。所为诗不事雕饰，清美圆熟，无山林枯槁之气。年四十八终。今录其《同侯子晋赋雁》诗云："沉沉江浦云，浩浩朔漠雪。微生几寒暑，翅老飞欲折。楼中见新过，夕照

送明灭。欹枕数声来，疏窗耿残月。悲鸣或天性，南北随所惬。谁念孤旅人，年年为愁绝。”

麻九畴，字知几，易州人。三岁识字，七岁能草书及大字数尺者，有神童称。章宗召见，大奇之。弱冠入太学，有文名。南渡后，寓居郾、蔡间，入遂平西山，始以古学自力，博通五经，于《易》、《春秋》为尤长。兴定末，府试第一。正大三年，以侯挚、赵秉文荐试馆职，赐二甲第一人及第，授太祝。官至应奉翰林文字。九畴性资野逸，高蹇自便，不与世合。其诗精深峭刻，似其为人。有《读书北阳山中》诗云：“读书空山里，落月低岩幽。山鬼语夜半，怪我非巢由。”可以知其大概矣。

刘从益，字云卿，浑源人，南山翁㧑之曾孙。大安元年进士。拜监察御史被黜，起为叶县令，入授应奉翰林文字。旋卒。从益博学强记，于经学有所得。为文章长于诗，五言古诗又其所长。有《篷门先生集》，今佚。

宋九嘉，字飞卿，夏津人。为人刚直豪迈。少游太学，有能赋声。长从李纯甫读书，为文有奇气，与雷渊、李经相伯仲。中至宁元年进士第，历蓝田、高陵、扶风、三水四县令，咸以能称，入为翰林应奉。正大中，以疾去官。殁于癸巳之难。

雷渊，字希颜，别字季默，应州浑源人。至宁元年词赋进士甲科，释褐泾州录事，终于翰林修撰。渊少孤贫，无以为资，乃以胄子入国学，便能自树如成人。未弱冠，即游于公卿间。太学诸人莫敢与之抗。渡河后，学益博，文益奇，名益重。生平慕田畴、陈登之为人，而人亦以古人期之。兹录其《九日登少室绝顶同裕之分韵得萝字》五古云：“闲居爱重九，佳人重相顾。登高酬节物，少室郁嵯峨。迤逦谢尘土，夷犹出烟萝。欻如据鳌头，万壑赴蜂窝。浩浩跨积风，弥弥渺长河。日车仄红轮，天宇凝苍波。指点数齐州，始觉氛埃多。我无倚天剑，有泪空滂沱。惊鳞盼奥渚，倦翼占危柯。悔不举家来，

结茅老岩阿。归途眷老阮，广武意如何？”

张建，字吉甫，蒲城人。明昌初，举才行，授绛州教官，召为宫教、应奉翰林文字，以老乞身。章宗爱其淳素，不欲令去左右，眷眷久之，超授同知华州防御使事，仍赐诗，有“从今昼锦莲峰下，三乐休夸荣启期”之句，士林荣之。建自号兰泉老人。金时有集行世，今佚。其《论诗》云：“作诗不论长篇短韵，须要词理俱足，不歉不余。如荷上洒水，散为露珠。大者如豆，小者如粟，细者如尘。一一看之，无不圆成，始为尽善。”建诗虽不能尽如所言，然亦未为无所得也。

吕中孚，字信臣，冀州南宫人。孝友纯至，为乡人所称。累举不第，以诗文自娱。著有《清漳集》，今佚。其赋《红叶》云：“张园多古木，萧寺半斜阳。”元德明亟称之，其《写怀》诗云：“秦川西去远，不意过漳川。归梦三千里，羁愁二十年。谋生空白发，行路若青天。余事休相问，相留只醉眠。”可谓一片神行，化尽刻划之迹。

刘勋，字少宣，父祖以上为云中人，至勋客居济南，乐其风土，遂占籍焉。少日住太学，有文名。南渡后，专于诗学，往往为人传诵。其先世本衣冠族，风流蕴藉，都无科举气，见于文字者亦然。其诗大概尖新，长于属对。其佳句有“万里风沙怜病客，几年刁斗厌寒更”，“人怜直道违时好，自喜闲身与物疏”，“击筑漫留燕客泪，佩兰谁识楚臣心。”《元夜阴晦》云：“芙蓉城暖东风夜，杨柳楼深笑语春。”《济南》云：“午风襟袖知秋早，甲夜阑干得月多。”又云：“船行著色屏风里，人在回文锦字中。百和香薰风过处，万盘珠落雨来时。”可谓对仗工整，吐属风雅者也。

李俊民，仕履见前。其诗多幽深激烈之音，系念宗邦，寄怀深远，不徒以清新奇崛为工。今录其《姚子昂画马》云：“雄姿卓立开天骨，腾踏万里如神速。可怜不遇九方皋，空使时人指为鹿。自从大奴守天育，无由更骋追风足。中原一战收乾坤，白发将军髀生肉。”

王郁，字飞伯，大兴人。仪状魁奇，目光如鹘。少居钓台，闭门

读书，不接人事久之。为文法柳宗元，闳肆奇古，动辄数千言。歌诗俊逸效李白。尝作《王子小传》以自叙。天兴元年，汴京被围，挺身突出，为兵士所得。其将遇之甚厚。郁径行无机防，为其下所忌见杀。临终，怀中出书，曰："是吾平生著述，可传付中州士大夫，曰王郁死矣。"年三十余。其所作《伤别曲》，为人传诵，今录之："兰皋飞暗尘，征车纡去辙。长安虽咫尺，回首繁华歇。故人亭下酒，蛾眉眼中血。平生慷慨肠，忽作柔丝结。传闻紫塞傍，秋烽下危堞。班超未投笔，来填空嚼铁。谁能金闺中，坐眷娟娟月。"与郁同时以诗鸣者，雷琯、侯册、王元粹云。

雷琯，字伯威，坊州人。以荐书从事史馆，调入作司使。博学能文，时辈少有及者。并州人李汾与琯同入史馆，以高蹇得罪。琯作诗以送，颇讥翰林诸人不能少忍，至与一书生相角逐，使之狼狈而去。有"郎君未足留商隐，官长从教骂广文"。又云："明日春风一杯酒，与君同酹信陵坟。"人甚称之。生平所作，以乐府体古意四首为最得意。

王元粹，字子正，初名元亮，后止名粹，平州人。年十八九，作诗便有高趣。性习专固，世事不以撄其怀，故时辈无能及之。用门资叙为南阳酒官，遭乱，流寓襄阳。襄阳破，只身北归，遂为黄冠以终。其《西山避乱》诗三首之一云："野宿不得晓，飞霜沾敝袍。空山凝寒色，天边星月高。忆昨离鄂城，数家同遁逃。穿林恐相失，前后闻呼号。避乱但欲速，焉知登顿劳。俯临万仞壑，性命轻鸿毛。"此诗气骨苍健，有少陵风格。

元好问，仕履见前。其诗文乐府，实为金源一代之冠。天生斯人，俾以集北方人文之大成者也。郝经《遗山先生墓志铭》曰："先生当德陵之末，独以诗鸣。上薄风雅，中规李、杜。粹然一出于正，直配苏、黄氏。天才清赡，邃婉高古。沉郁大和，力出意外。巧缛而不见斧凿，新丽而绝去浮靡，造微而神采粲发。杂弄金璧，糅饰丹素，

奇芬异秀；洞荡心魄，看花把酒，歌谣跌宕。挟幽、并之气，高视一世。以五言雅为正。”沈德潜《说诗晬语》曰：“裕之七言古诗，气王神行，平芜一望，常得峰峦高插，涛澜动地之概。又东坡后一能手也。”赵翼《瓯北诗话》曰：“苏、陆古体诗，行墨间尚多排偶。一则以肆其辨博，一则以侈其藻绘。固才人之能事也。遗山则专以单行，绝无偶语，搆思窅渺，十步九折。愈折而意愈深，味愈隽，虽苏、陆亦不及也。七言律则更沉挚悲凉，自成声调。唐以来律诗之可歌可泣者，少陵十数联外，绝无嗣响，遗山则往往有之。如《车驾遁入归德》诗云：‘白骨又多兵死鬼，青山原有地行仙。蛟龙岂是池中物，虮虱空悲地上臣。’《出京》诗云：‘只知灞上真儿戏，谁谓神州竟陆沉。’《送徐威卿》诗云：‘荡荡青天非向日，萧萧春色是他乡。’《镇州》诗云：‘只知终老归黄土，忽漫相看是楚囚。日月尽随天北转，古今谁见海西流。’《还冠氏》诗云：‘千里关河高骨马，四更风雪短檠灯。’《座主闲闲公讳日》诗云：‘赠官不暇如平日，草诏空传似奉天。’此等感时触事，声泪俱下，千载后又使读者低徊不置。盖事关家国，尤易感人耳。”据以上三则而言，则遗山诗各体皆佳，实足以上继李、杜，平揖苏、黄，下开虞（集）、高（启）而无愧矣。

辛愿，字敬之，福昌人。自号女几野人。年二十五，始知读书。取白氏《讽谏集》自试，一日便能背诵。乃聚书环堵中读之。至《书·伊训》、《诗·河广》，若有所省，欲罢不能，因更致力焉。由是博极群书，于三传为尤精。杜诗、韩笔，未尝一日去其手。作文有绳尺，诗律精严，有自得之趣。性野逸，负高气，不修威仪。高廷玉为河南府治中，延为上客。廷玉为府尹陷诬，愿亦被讯掠，几不得免。自是生事益促，又不得不与世交接。其枯槁憔悴，流连顿踣，往往见之于诗。有诗数千首，佳句极多。如“自怜心似鲁连子，人道面如裴晋公”，“万事直须称好好，百年端欲付悠悠”，“院静宽留月，窗虚细度云”，“浪翻鱼出浦，花动鸟移枝”之类是也。元好问曰：“敬之业专而

心通，敢以是非白黑自任。"每读刘景玄、赵宜之、雷希颜、李钦叔、张仲经、李仲梁、王仲泽、麻知几之诗，必为之探源委，发凡例，解络脉，审音节，辨清浊，权轻重，片善不掩，微疵必指，如老吏断狱，文峻网密，细毫不相贷，如衲僧得正法眼，征诘开示，几于截断众流。人有难之者，则曰："我虽不解诗，解诗莫如我。"故朋辈中有公鉴而无姑息者，必以敬之为称首。盖不本于教育，不阶于讲习，不出于父兄，而卓然成就如此，然则若吾敬之者，真特立之士哉。

李汾，字长源，太原平晋人。少游秦中，喜读史书，览古今成败治乱，慨然有功名心。工于诗，专学唐人，其妙处不减李白、崔颢。为人尚气，跌宕不羁，颇褊躁，触之辄怒，以是多为人所恶。元光间，游大梁，举进士不第，能诗声一日动京师，用荐为史馆书写，以病目免归。复入南京，上书言时事，不报。出客唐、邓，会北兵入境，恒山公武仙署为行尚书省讲议官。仙与参知政事完颜思烈相异同，颇谋自安，惧汾言论，欲除之。汾觉，遁泌阳。仙令总帅王德追获之，锁养马平，绝食而死，年未四十。汾平生诗甚多，不自收集，故往往散落。其《再过长安》有云："三辅楼台失归雁，上林花木怨啼鹃。空余一掬伤时泪，暗堕昭阳石马前。"又《下第绝句》云："学剑攻书事两违，回头三十四年非。东风万里衡门下，依旧中原一布衣。"又《记时事》云："捕得酒泉生口说，众酋嫠面哭单于。"《望少室》云："圭影静涵秋气老，剑峰横倚斗杓寒。"《夏夜》云："鸦衔暝色投林急，萤曳余光入草深。"《鹳鹤楼》云："白鸟去边红树小，断云横处碧山多。"乐府歌行尤雄峭可喜。

李献甫，字钦用，献能从弟也。博通书传，尤精"左氏"及地理学。兴定五年登进士第，为咸阳簿，累仕至镇南军节度副使。年四十，死蔡州之难。所为诗号《天倪集》，今佚。其《秋风怨》一首，置诸《昌谷集》中，几无以辨。

麻革，仕履见前。其诗亦卓卓可传。今录其《置酒半山亭》一诗

云："抱怀久不写，兀坐如縶囚。永怀西山胜，浩荡成兹游。岩壑互窈窕，丛萝郁深幽。飞烟入虚无，长风跨昆丘。楚甸散林莽，商颜亦绸缪。雷雨天地空，景物入夜浮。况当节律变，万物飒以秋。云来白石惨，天澹清江流。西望渺关河，沉沉生暮烟。兰苕暗幽谷，芰荷老芳洲。一笑举酒觞，浩歌聊自酬。幽赏欣未极，慨叹心悠悠。世事苍茫外，寒沙明白鸥。"

段克己，字复之，号遯庵，别号菊庄，稷山人。弟成己，字诚之，号菊轩，皆举进士。入元不仕，结河汾诗社，徜徉山水以终。昆弟擅名文章，尚书赵秉文目之曰"二妙"。故其合编诗集，即以为名。

第三节 词 家

金人之词，留传绝鲜。在今日可得见者，自元好问《中州乐府》外，则四印斋之《明秀》、《天籁》二集。《彊村丛书》所列之金词五家，余则一鳞一爪，仅见于徐釚《词苑丛谈》、陶梁《词综补遗》而已。夫金主中夏，亦越百年。而倚声一道，只此寥寥数家，不得不谓之难能而可贵。然诸家之精心结撰，要自有不可磨灭者在，故能阅千载而常新。余尝取而籀绎之，知其声宏气壮，振其北风雄直之音，发抒其意内言外之辞，以与南宋诸词人对抗，洵无愧色。至诸词家之得力所在，类皆取径于东坡乐府。以上窥乎"花间"者也。昔人云，"宋自南渡后，程学盛于南，苏学盛于北"，职是言之。知金人之瓣香玉局，固不仅诗文为然。即"大江东去"一派，亦奉之为金科玉律矣。

海陵庶人诗固雄鸷，词亦如之。其《鹊桥仙·中秋待月不至》云："停杯不举，停歌不发。等候银蟾出海，不知何处片云来。做许大通天障碍，虬髯撚断，星眸睁裂，惟恨剑锋不快，一挥截断紫云腰。子细看嫦娥体态。"《喜迁莺·赐御前都统骑卫大将军韩邪》云："旌麾初举，正駃騠力健，嘶风江渚，射虎将军，落雕都尉。绣帽锦袍翘楚，怒磔戟髯争奋。卷地一声鼙鼓，笑谈顷长江齐楚。 六师飞

渡，此去，无自堕金印如斗，独把江名携取，断锁机谋，垂鞭方略，人事本无今古。试展卧龙韬蕴，果见成功旦暮。问江左，想云霓切望，玄黄迎路。"其桀骜之态，溢于言表，他盖可知也。

世宗诗见前，亦能词。《法苑春秋》载其《减字木兰花·赐元悟玉禅师》云："但能了净，万法因缘何足问。日月无为，十二时中更不疑。　常须自在，识取从来无挂碍，佛佛心心。佛若休心也是尘。"此以禅语为词，是别开生面者也。

章宗尝有《蝶恋花·咏聚头扇》云："几股湘江龙骨瘦，巧样翻腾，叠作湘波皱。金缕小钿花草斗，翠条更结同心扣。　金殿珠帘闲永昼，一握清风，暂喜怀中透。忽听传宣须急奏，轻轻褪入香罗袖。"《生查子·擘橙为软金杯》云："风流紫衣郎，痛饮乌纱岸。柔软九回肠，冷怯玻璃杯。　纤纤白玉葱，分付黄金弹。借得洞庭春，飞上桃花面。"倚声之工，可见一斑。

完颜从郁，字文卿，本名璃，字子玉，卫绍王改赐焉。以父任充符宝。章宗试一日百篇赐第。元好问曰："朝廷经略西蜀，宗室纲遣太尉中孚之子公辅说吴曦称藩。文卿私谓梁经父言，诱人以叛。岂有天下者所宜为。"其后蜀事竟不成，识者称焉。仕至安肃刺史。其词有《西江月·题邯郸王化吕仙翁祠堂》云："壁断何人旧字，炉寒隔岁残香。洞天人去海茫茫，玩世仙翁已往。　西日长安道远，春风赵国台荒。行人谁不悟黄粱，依旧红尘陌上。"

吴激，字彦高，自号东山，建州人，宋宰臣拭之子，而米芾之婿也。工诗能文，字画俊逸，得妇翁笔意。尤精乐府，造语清婉，哀而不伤。将宋命至金，金以知名留不遣，命为翰林待制。皇统二年，出知深州。到官三日而卒。著有《东山集》十卷，并乐府，今俱佚。《古今词话》载激在会宁府，遇一老姬善琵琶者，自言故宋梨园旧籍。激对之凄然，为赋《春从天上来》词云："海角飘零，叹汉苑秦宫。坠露飞萤，梦回天上，金屋银屏，歌吹竞举青冥。问当时遗谱，有绝艺鼓

瑟湘灵。促哀弹，似林莺呖呖，山溜泠泠。　梨园太平乐府，醉几度春风，鬓变星星，舞破中原，尘飞沧海，风雪万里龙庭。写胡茄幽怨，人憔悴不似丹青。酒微醒，对一窗凉月，灯火青荧。”又《词品》载洪迈云：“先公在燕山日，偶赴北人张总侍御家集。出侍儿佐酒，中有一人进止温雅，意态摧抑可怜。问其姓名，乃宣和殿宫姬也。坐客翰林直学士吴彦高作《人月圆》词纪之云：‘南朝千古伤心事，犹唱《后庭花》。旧时王谢堂前燕子，飞向人家。　恍然一梦，仙肌胜雪，宫髻堆鸦。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是天涯。’举座凄然，有挥涕者。”

蔡松年，仕履见前。元好问谓“百年以来，乐府推伯坚与吴彦高”，号“吴蔡体”。其词名《明秀集》。其《念奴娇·追和赤壁》词用韵者，元好问取以压卷，并谓此歌以“离骚痛饮”为首句。公乐府中最得意者，读之，则其平生自处为可见矣。词云：“离骚痛饮，笑人生佳处，能消何物。夷甫当年成底事，空想岩岩玉壁。五亩苍烟，一丘寒碧，岁晚忧风雪，西州扶病，至今悲感前杰。　我梦卜筑萧闲，觉来岩桂。十里幽香发，磈磊胸中冰与炭。一酌春风都灭，胜日神交，悠悠得意，离恨无毫发。古今同致，永和徒记年月。”子珪传其家学，亦优于词。

邓千江，临洮人。《词品》谓金人乐府称千江，所作《望海潮》为第一。其词《全步骤沈公述上王君贶》一首，而繁缛雄壮，何啻十倍过之，不止出蓝已也。词云：“云雷天堑，金汤地险。名藩自古皋兰，营屯绣错，山形米聚，襟喉百二秦关。鏖战血犹殷，见阵云冷落，时有雕盘。静塞楼头晓月，依旧玉弓弯。　看看定远西还。有元戎阃令，上将斋坛。区脱书空，兜铃夕解，甘泉又报平安。吹笛虎牙间。且宴陪珠履，歌按云鬟。招取英灵毅魄，长绕贺兰山。”

张中孚，字信甫，世为安定望族。初以父任知宁环镇戎三州，官至南京留守。其《蓦山溪》一词，极为悲慨淋漓。词云：“山河百二，自古关中好。壮岁喜功名，拥鞍雕裘绣帽。时移事改，萍梗落江湖，

听楚语，厌蛮歌，往事知多少。 苍颜白发，故里欣重到。老马省曾行，也频嘶冷烟残照。终南山色，不改旧时青，长安道。一回来，须信一回老。”

赵可，字献之，高平人。贞元二年进士，仕至翰林院直学士。风流有文采，诗、乐府皆传于世，号《玉峰散人集》，今佚。其《蓦山溪·赋崇福（在太原晋溪）荷花》云：“云房西下，天共苍波远。走马记狂游，正芙蕖平铺锦面。浮空栏槛，招我倒芳尊，看花醉，把花归，扶路清香满。 水枫旧曲，应遂歌尘散。时节又新凉，料开遍横塘清浅。冰姿好在，莫道总无情，残月下，晓风前，有恨何人见。”

王寂，仕履见前。诗文固卓然可称，其词亦具“花间”之丰神。今录其《点绛唇·闺思》云：“疏雨池塘，一番雨过花成阵。海榴红褪，燕语低相问。 冰簟纱幮，玉骨凉生润。沉烟喷日长人困，枕破斜红晕。”

冯子翼，仕履见前。著有乐府，附集以行，今佚。兹录其《江城子》一首：“胭脂波上月如钩，问青楼，觅温柔。庭院深沉，窗户掩清秋。月下香云娇堕砌，花气重，酒光浮。 清歌皓齿艳明眸，锦缠头。若为俦，门外三更，灯影立骅骝。结习未忘吾老矣，烦恼梦，赴东流。”读来颇觉无限感怆。

刘迎，仕履见前。诗文、乐府皆擅长。兹录其《乌夜啼》一首：“菱鉴玉篦秋月，蕙炉银叶朝云。宿酲人困屏山梦，烟树小江村。 翠甲未消兰恨，粉香不碍梅魂。离愁分付残春雨，花外注黄昏。”昔人评此词谓纤秾多姿。“无一字不艳，无一字不愁。”

党怀英，仕履见前。其少日师事刘嵓老，与济南辛幼安为同学。幼安回南，词名大振。怀英在北，诗、文、词并臻佳妙。故言大定以还之文学，必以怀英为首屈一指。其词有《感皇恩·七夕》云：“一叶下梧桐，新凉风露。喜鹊桥成渺云步。旧家机杼，巧织紫绡如雾。新愁还织就，无重数。 天上何年，人间朝暮。回首新津又空渡。盈

盈别泪，散作半空疏雨，离魂都付与，秋将去。”

王庭筠，仕履见前。其词秀逸，高出侪辈。今录两阕：一、《凤栖梧》云：“衰柳疏疏苔满地。十二栏干，故国三千里。南去北来人老矣。短亭依旧残阳里。　紫蟹黄柑真解事，似倩西风，劝我归欤未。王粲登楼寥落际，雁飞不断天连水。”二、《诉衷情》云：“夜凉清露滴梧桐，庭树又西风。薰笼旧香犹在，晓帐暖芙蓉。　云淡薄，月朦胧，小帘栊。江湖残梦，半在南楼，画角声中。”

赵秉文，仕履见前。其为人宏奖风流，备载于元遗山《中州集》、刘京兆《归潜志》，可谓不遗余力矣。所作词高古简淡，以《青杏儿》一调为最。词云：“风雨替花愁，风雨罢花也应休。劝君莫惜花前醉，今年花谢，明年花谢，白了人头。　乘兴两三瓯，拣溪山好处追游。但教有酒身无事，有花也好，无花也好，选甚春秋。”

折元礼，字安上。世为麟抚经略使。父定远，侨居于忻，遂占籍焉。明昌五年两科擢第。学问该博，为文有法度，仕至延安侍中，死于葭州之难。《中州乐府》列其《望海潮》一阕，题为《从军舟中作》，词云：“地雄河、岳，疆分韩、晋，潼关高压秦头。山倚断霞，江吞绝壁，野烟萦带沧洲。虎旆拥貔貅，看阵云截岸，霜气横秋。千雉严城，五更残角月如钩。　西风晓入貂裘，恨儒冠误我，却羡兜鍪。六郡少年，三明老将，贺兰烽火新收。天外岳连楼。想断云横晓，谁识归舟。剩着黄金换酒，羯鼓醉凉州。”读此可知边城月夜清肃光景。

王特起，仕履见前。词工长调，极细腻熨贴，与南宋史邦卿如骖之靳。其《喜迁莺·别内》云：“东楼欢宴，记遗簪绮席。题诗纨扇，月枕双敧，云窗同梦，相伴小花深院。旧欢顿成陈迹，翻作一番新怨。素秋晚，听阳关三叠，一尊相饯。　留恋！情缱绻。红泪洗妆，雨识梨花面。雁底关河，马头星月。西去一程程远。但愿此心如旧，天也不违人愿。再相见，把生涯分付，药炉经卷。”评者谓此词缠绵凄恻，令人不能为怀。

李俊民，仕履见前。金亡后，隐遁不出。其词与诗文并传。今录两阕于下：一、《谒金门・寄梅》云：“开未彻，先把一枝偷折。看取黄昏今后别，暗香浮动月。　谁为寻芳时节，误了前村踏雪。为问花间能赋客，如何心似铁。”二、《感皇恩・出京门有感》云：“忍泪出门来，杨花如雪。惆怅天涯又离别，碧云西畔。举目乱山重叠，据鞍归去也，情凄切。　一日三秋，寸肠千结。敢向青天问明月。算应无恨，安用暂圆还缺。愿人长似月圆时节。”

元好问，仕履见前。张炎评其词，谓“深于用事，精于炼句。其风流蕴藉处，不减周秦”。其《迈陂塘咏雁丘叙》云：“太和五年乙丑岁，赴试并州。道逢捕雁者，云今日获一雁，杀之矣。其脱网者悲鸣不能去，竟自投于地而死。余因买得之，葬之汾水之上，累石为识。号曰‘雁丘’。并作《雁丘》词：‘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别离苦。就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暗啼风雨，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可谓一往情深，含有无限悲感者也。

段克己及弟成己，仕履俱见前。克己《水调歌头》一阕，题为《癸卯八月十七日逆旅平阳夜闻笛声有感而作》。词云：“乱云低薄暮，微雨洗清秋。凉蟾乍飞破镜，倒影入南楼。水面金波滟滟，帘外玉绳低转，河汉截天流。桂子坠无迹，爽气集征裘。　广寒宫，在何处，可神游。一声羌管谁弄，吹彻古梁州。月自与人无意，人被月明催老，今古共悠悠。壮志久寥落，不寐数更筹。”成己《满江红》词云：“点检花枝，风雨外雪堆琼矗。春去也朱丝弦断，鸾胶难续。眼底光阴原可惜，旧游回首寻无迹。对青山一晌倚枯藤，滩声急。　人已老，身犹客，家在迩。归犹隔。纵语音如旧，形容非昔。芳草绵绵随意绿，平波渺渺伤心碧。到愁来惟觉酒杯宽，人间窄。”盖寓身世之

感者也。

白朴，字仁甫，又字太素，号兰谷，澳州人。父贲，仕金为枢密判官，以事远适，将朴鞠养于元好问。元、白为中州世契，两家子弟，每举长庆故事，以诗文相往来。朴为贲之仲子，于好问为通家侄。甫七岁，遭壬辰之难，明年春，京城变，好问遂挈以北渡。读书颖悟异常儿，日亲炙于好问父子，卜筑于滹阳，律赋为专门之学。而朴有能声，号后进之翘楚。好问每过之，必问为学次第。常赠之诗曰："元、白通家旧，诸郎独汝贤。"未几，生长见闻，学问博览。然自幼经丧乱，苍皇失母，便有山川满目之叹。逮亡国，恒郁郁不乐，以故放浪形骸，期于适意。元中统初，丞相史天泽将荐之于朝，再三逊谢。后侨寓金陵以终。平生留意于长短句，清隽婉逸，意惬韵谐，可与张炎相匹。惟以制曲掩其词名。今《天籁集》尚行于世。

按：清定《四库全书提要》列《天籁集》于金人著作中。以其入元不仕，有晋陶渊明遗风，列入金人。从其志也。

第四节　曲　家

曲盛于元，实创于金。金以院本著名。院本者，明宁献王以为行院之本也。顾不知"行院"一语作何解。后读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引元刊《张替杀妻》杂剧云："你是良人良人宅眷，不是小末小末行院。"则行院者，大抵金元倡伎所居，其所演唱之本，即谓之院本云尔。其名见于陶九成《辍耕录》者，有六百九十种之多。惜在今日，无一存留。莫能窥其本末，然就词曲调内之诸牌名证之，如"似娘儿"、"归塞北"、"斗鹌鹑"、"憨郭儿"等，今并列北曲谱中，其为金人所创无疑。且金时董解元之《西厢》，奉为北曲之祖，至今无异议。而号为元曲四大家，半皆金末遗民。欲不谓之创始，其可得乎？

董解元名字爵里无考。据《辍耕录》定为金章宗时人。其称解元，非科举中之解元，实为金元士子之普通称谓（详拙著《元剧研

究》)。例如小说中富人之称“员外”,妻之称“安人”,概为一时之方言。其记张君瑞与崔莺莺事,谱入弦管,当时谓之搊弹词,后人遂称之曰《弦索西厢》。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云:“董曲今尚行世,精工巧丽,备极才情。而字字本色,言言古意。当是古今传奇鼻祖。金人一代文献尽之矣。”清施国祁《礼耕堂杂说》云:“《董西厢》分上下二卷,无出名关目。行间全载宫调引子,尾声率填乐府方言。不采类书故实,曲多白少,不注工尺。时论其品如朱汗碧蹄,神采骏逸。”此又涵虚子(宁献王之别号)评目所未及。“董西厢”文,由以上二说证之,其价值可知矣。至搊弹词之体,尚未说明。今为之详述焉。夫搊弹词之体格,与评话弹词相类,由一人弹唱,一人动作。概自其口中说出,通体是旁人叙述口气,不似元剧之扮演登场,代人言语,作为种种之角色者也。且其套数极短,往往一二曲后,即用尾声。尾声之后,别联他曲。其长者亦不过五六支而止。又每曲之上下叠,皆用全调整齐画一。盖从头至尾成一篇之大文章也。兹录其《长亭送别》一段,俾知其采当时方言,而作为绝妙之文字也:“莫道男儿心如铁,君不见满川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且休上马,苦无多泪与君垂,此际情绪你争知? 马儿登程,坐车儿归舍,马儿往西行,坐车儿往东拽。两口儿一步儿离得远如一步也。我郎休怪强牵衣,问你西行几日归著。路里小心呵,且须在意,省可里晚眠早起,冷茶饭莫吃好将息。我专倚门儿专望你。驴鞭半袅,吟肩双耸,休问离愁轻重,向个马儿上驼也驼不动。帝里酒酽花浓,万般景媚,休取次共别人便学连理。少饮酒,省游戏,记奴言语,必登高第。妾守空闺,把门儿紧闭,不拈丝管,罢了梳洗。你咱自必把音书频寄。一个止不定长吁,一个顿不开眉黛。两边的心绪,一样的情怀。”

白朴事实见前。涵虚子评其词“如鹏抟九霄”。又谓“风骨磊块,词源滂沛,若大鹏之起北溟,奋翼凌乎九霄,有一举万里之志,宜冠于首。”元钟嗣成《录鬼簿》载其所作杂剧有十七种,今存者为《梧桐

雨》、《墙头马上》两种。兹录其小令四支，题为《知几》(阳春曲)："知荣知辱牢缄口，谁是谁非暗点头。诗书丛里且淹留，闲袖手。贫煞也风流。　今朝有酒今朝醉，且尽樽前有限杯。回头沧海又尘飞，日月疾。白发故人稀。　不因酒困因人困，常被吟魂恼醉魂。四时风月一闲身，无用人。诗酒乐天真。　张良辞汉全身计，范蠡归湖远害机。乐山乐色总相宜，君细推。今古几人知。"

关汉卿名失考，号已斋叟，大都人。金末为太医院尹。金亡不仕，以曲自娱。所撰杂剧，《录鬼簿》列有六十三种之多，今存者为《西蜀梦》、《拜月亭》、《谢天香》、《金线池》、《望江亭》、《救风尘》、《单刀会》、《玉镜台》、《诈妮子》、《蝴蝶梦》、《窦娥怨》、《鲁斋郎》、《续西厢》共十三种。玄虚子评其词"如琼筵醉月"。又谓"观其词语，乃可上可下之才"。盖所以取者，初为杂剧之故，卓以前列。兹录其散套《闺怨》"(北仙吕翠裙腰)晓来雨过，山横秀野。水涨汀洲，阑干倚遍空回首，下危楼，一天风物暮伤秋。""(六么遍)乍凉时候西风透，碧梧脱叶，余暑才收。香生凤口，帘垂玉钩，小院深闭晴昼，清幽。听声声鹊噪柳梢头。""(寄生草)为甚忧？为甚愁？为萧郎一去经今久。玉台宝槛生尘垢，绿窗冷落闲针绣。岂知人玉腕钏儿松，岂知人两叶眉儿皱。""(上京马)他何处共谁人携手？小阁银瓶殢歌酒。况忘了咒，不记得低低耨。""(后庭花煞)掩袖暗含羞，开尊越酿愁。闷把苔墙画，慵将锦字收。最风流，真真恩爱，等闲分付等闲休。"关之夫人亦娴吟咏。关悦其媵婢，欲纳之，作小令以贻夫人云："鬓鸦脸霞，屈杀了将陪嫁。规模全似大人家，不在红娘下，巧笑迎人，文谈回话，真如解语花。若咱得他，倒了蒲桃架。"夫人答以诗云："闻君偷看美人图，不似关王大丈夫。金屋若将阿娇贮，为君唱倒醋葫芦。"关见之，付之一叹。关好谈鬼怪，著有《鬼董》行世。

按白朴、关汉卿二人，自来谈曲者皆置诸元四家中。兹以其为金之遗民，援元好问例，入于此编。

第三章　元

元氏本造家于朔漠，以杀戮为耕作，逐水草而居处，初无文学之可言。迨至太祖成吉思汗聚会斡难河之上，方尊位号，始定教条；既近取乃蛮，复远攻回纥；渡黄河以蹴西夏，逾居庸以瞰中原。太宗继之，而灭金源，于是金之文士悉为元有矣。世祖承之，而讫宋箓，于是宋之文士悉为元有矣。当其未入塞时，沿用元昊所造之畏吾字，谓之卫兀。中统时，八思巴作蒙古字千余，其母四十有一。今所传之《元秘史》及“金石书”中所载琳宫梵宇中之《圣旨碑》，原本皆此等文字，译为汉文，俚俗堪嗤。然草昧之际则然，洎乎大业告成，并不以此取士。太宗始得中原，辄用耶律楚材言，以科举选士。世祖既定天下，王鹗献计，许衡立法，事未果行。至仁宗延祐间，始斟酌旧制而行之，取士以德行为本，试艺以经术为先。士褎然举首，应上所求者，皆彬彬辈出矣。赵郡苏天爵曰：“国家平定中原，士踵金、宋余习，率皆粗豪衰苶，涿郡卢挚始以清新飘逸为之倡。延祐以来，则有蜀郡虞公、浚仪马公，以雅正之音鸣于时，士皆转相慕效。而文章之习，今独为盛焉。”虞文靖公序傅与砺诗曰：“国初中州袭赵礼部元裕之之遗风，宗尚眉山之体，至涿州卢公处道稍变其法，始以诗名东南。宋季衰陋之气，亦已销尽。大德中，文章辈出，赫然鸣其治平者，则浦城杨仲弘、江右范德机其人也。其后马伯庸中丞用意深刻，思致高远，亦自成一家。进士萨天锡者，最长于情，流丽清婉，作者皆爱之。而德机里人傅君与砺诗，其风韵足以追前所道诸君。”二公皆一代名家，其言足为定评。惟文章一道，不出骈散二途。历代风会虽殊，而体格不甚相远。至于有韵之作，则体格每随声律而转变。乐府、古诗变而为唐之五七言律诗。自五代至宋，诗又变而

为词。自宋至元,词又变而为曲,文人学士往往以是擅长。如关汉卿、马致远、郑德辉、宫大用之类,皆藉以知名于世。其抒情写景,时能得乐府之遗,而于杂剧尤可考见当时社会之情状,至足耐人研讨。是又奇渥温氏一朝之特色已。

第一节　文　家

昔欧阳元功尝谓“中统、至元之文庞而蔚,元贞、大德之文畅而腴,至大、延祐之文丽而贞,泰定、天历之文赡而雄”。百余年间,魁儒硕彦,相继挺生,匠心所运,发为词华,蔚然自成一代文章之体,规矩渊源,历历可溯。自王元美创“为元无文章”之说,耳食者遂信为实然,于是视元人著作若敝屣,可胜叹哉!予惟有元之文,分南北二宗。北宗以元裕之为圭臬,辅之者为郝伯常、杨焕然,其接武而兴者,则有刘梦吉、王仲谋、姚端甫、马伯庸、卢处道、许可用。南宗又分两派:在江右者倡于吴幼清,而其后虞伯生、揭曼硕、欧阳元功卓然为大家;浙东之在鄞者,戴帅初、任叔实、袁伯常,在婺者则有许益之、吴立夫、黄晋卿、柳道传、吴正传。洎夫末造,北学久衰,江右之人才亦不振。惟浙东一派,英贤辈出,郁为后劲,有若李季和、陈子上、戴叔能、杨廉夫、陈敬初若而人,亦云盛矣。其文或苍茫浑灏,或渟泓演迤,或崛强可喜,或潇洒不群。上足以嗣响唐、宋,下亦无惭于有明。罗而列之,元美诬词,不攻自破矣。

郝经,字伯常,陵川人。官至翰林侍读学士,赠昭文馆大学士,追封冀国公。谥文忠。著有《陵川集》。经以中统元年使宋,为贾似道所拘,留仪真者十六年,其大节炳耀古今。而学问文章,亦具有根柢,如《太极先天诸图说》、《辨微论》数十节,及论学诸书,皆深切著明,洞见阃奥,《周易》、《春秋》诸传,于经术尤深。故其文雅健雄深,无宋末肤廓之习,与其师元好问可以雁行,不但以忠义著也。

姚枢,字公茂,号雪斋,营州柳城人,后迁洛阳。少笃于学,自期

甚高。岁壬辰，中书杨惟中与偕觐元太宗，为燕京行台郎中，未几辞去。中统元年，拜东平宣抚使，历官中书左丞、昭文馆大学士、翰林学士承旨。卒封鲁国公。谥文献。著有《雪斋集》。初公茂与惟中从太子阔出南征，军中得名儒赵复，始得程、朱之书。后弃官居卫州，自板诸经，散之四方。时河内许衡平仲、广平窦默汉卿并在卫，三人互相讲习，而北方之学者，始闻进学之序焉。许有壬曰，“宋、金之际，兵燹频仍，版帙散亡殆尽。文献公独首倡经学，阐明斯道。厥后名儒接踵而出，气运昌隆，文章尔雅。推回澜障川之功，论者谓公之功不在禹下”云。

戴表元，字帅初，一字曾伯，庆元奉化人。宋咸淳中，登进士乙科。元大德中，以荐除信州教授，调婺州，以疾归。再以修撰、博士荐，不起，终于家。著有《剡源集》。表元少从王应麟、舒岳祥游，学问渊源，具有授受。宋季文章，气萎苶而词骫骳，帅初慨然以振起斯文为己任。其学博而肆，其文清深雅洁，化朽腐为神奇，间事摹画，而隅角不露。尤自秘重，不妄许与。至元、大德间，东南之士，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时，帅初一人而已。

陆文圭，字子方，江阴人。幼而颖悟，博通经史，及天文、地理、律象、医药、算数之学。宋咸淳初，以《春秋》中乡选，延祐设科。再中乡举，以老疾不应征召，卒于家。著有《墙东类稿》，史称“文圭为文，融会经传，纵横变化，莫测其涯际，东南学者皆宗师之”。细核所作，史言非过誉也。

刘诜，字桂翁，庐陵人。生于宋末，犹及见诸遗老，得其绪论。迨延祐复科举后，益肆力于名物度数，训诂笺注之学。既十年不第，乃刻意于诗古文，江南行御史台屡以教官馆职、遗逸荐，皆不报。至正十年卒。著有《桂隐集》，欧阳玄谓其文根柢六经，属餍子史，躏轹百家，渟滀演迤，资深取宏，榘矱哲匠，达于宗工，涖古融今，自执其鞴，应虑不惑，靡施弗宜。虽未尝露其隽杰廉悍、踔厉风发之状，韫

玉在椟，气如白虹，不可掩抑。又谓其文温柔敦厚似欧，明辨雄隽似苏。至论其妙，非相师非不相师，盖深得诜之用意者也。

邓文原，字善之，一字匪石，绵州人。随其父流寓钱塘。宋末应浙西转运司试，中魁选。至元间，行中书省辟为杭州路儒学正，官至集贤直学士，兼国子监祭酒，致仕。致和元年，卒于家，谥文肃。文原学有本源，所作皆温醇典雅。当大德、延祐之世，独以词林耆旧主持风气，袁桷、贡奎左右之。操觚之士，响附景从。元之文章，于是时为极盛，文原实有独导之功。所著有《内制集》、《素履斋稿》，今并未见传本，仅传《巴西文集》一卷。

任士林，字叔实，号松乡，绵竹人。六岁能属文，诸子百家靡不周览。乡子弟多从之学。至大初，中书左丞郝天挺荐授安定书院山长，俄而得呕疾，卒于杭之客舍。著有《松乡文集》十卷。赵文敏公曰："叔实之文，沉厚正大，不作瘦语，棘人喉舌，而含蓄顿挫，使人读之而有馀味。"明祭酒胡俨曰："其文笃实而宏博，深厚而舒齐；锵然而金石奏，灿然而琅玕呈。"盖卓乎有道之言也。

赵孟頫，字子昂，宋太祖之后。以秀王伯圭赐第湖州，故为湖州人。年十四，以父荫入仕。宋亡家居。会程钜夫访遗逸于江南，以孟頫入见，即授兵部郎中，累官翰林学士承旨，卒追封魏国公。谥文敏。著有《松雪斋集》。孟頫以宋朝皇族，改节仕元，故不谐于物论。然论其才艺，则风流文采，冠绝当时。不但翰墨为元代第一，即其文章，亦揖让于虞、杨、范、揭之间，不甚出其后也。

吴澄，字幼清，号草庐，崇仁人。宋咸淳末，举进士不第。入元，以荐擢翰林应奉文字，官至翰林学士。卒谥文正。著文集百卷。幼清为元代大儒，与许文正公衡并称，号为"南吴北许"。而幼清阐经铸文，则过许远甚。其为文指要，见于《别赵子昂》序，谓"文者气之为也。人之气与天地之气流通为一。气有升降，而文随之，必有豪杰之士出其间。养之异，学之到，足以变化其气，其文乃不与世而俱

今”。又言“理到气昌，意精词达，如星灿云烂，如风行水流，文之上也”。初不待倔强其言，蹇澁其句，怪僻其字，隐晦其意，而后为工且奇。故其为文，一遵唐、宋诸公遗矩，而实不名一格。良由胸中充实，不可以已。如溥博渊泉，随地涌出，任其所至，而混混自如。孟子所谓“居安资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者也。

杨奂，字焕然，又名知章，乾州奉天人。生于金世宗大定二十六年。凡秋试四中选，而春试辄不第。入元，以耶律楚材荐，授河南路征收课税所长官，兼廉访使。越十年，致仕归。著有《还山集》。奂诗文皆光明俊伟，有中原文献之遗。其《汴故宫记》述北宋大内遗迹，《与姚公茂书》论朱子家礼神主之式，举所见唐杜衍家庙及汴京宋太庙为证，《东游记》述孔林古迹尤悉。皆可以备文献之征也。

刘因，字梦吉，号静修，容城人。至元十九年，征授承德郎，右赞善大夫，未几辞归。再以集贤学士征，不起。著有《静修集》。因笃信朱子，与许衡同，而其文遒健排奡，迥在衡上。张纶《林泉随笔》曰：“梦吉文章，动循法度，春容有馀味。”如《田孝子碑》、《桐川图记》等作，皆正大光明，较文士之气象不侔。由其学养功深也。

王恽，字仲谋，卫辉汲县人。中统元年，由详议官授中书省详定官，官至翰林学士。谥文定。著有《秋涧集》。恽文章源出元好问，故其波澜意度，皆不失前人矩矱。诗篇笔力坚浑，亦能嗣响其师。论事诸作，有关时政者，尤为疏畅详明，了如指掌。史称恽有才干，殆非虚语，不止词藻之工也。

姚燧，字端甫，号牧庵，河南人，姚枢之从子也。初以荐为秦王府文学，历官至翰林学士承旨、集贤大学士，谥曰文。著有《牧庵文集》。张养浩作是集序，称其“才驱气驾，纵横开合，纪律惟意。如古劲将率市人战，鼓行六合，无敌不北”。柳贯作《燧谥议》，称其“典册之雅奥，诏令之深醇，抉去浮靡，一返古辙。而志铭箴颂雄伟光洁，家传人诵，莫得而掩”。宋濂撰《元史》，称其文“闳肆该洽，豪而不

宕，刚而不厉，舂容盛大，有西汉风”。黄宗羲选《明文案》，其序亦云：“唐之韩、柳，宋之欧、曾，金之元好问，元之虞集、姚燧，其文皆非有明一代作者所能及。”则名家论定，其语若合符节，燧之文品，亦可概见矣。

程钜夫，初名文海，以字行，建昌人。少与吴澄同学。宋亡后，从季父飞卿入元，遂留宿卫，改授应奉翰林文字，累官翰林学士承旨，追封楚国公。谥文宪。著有《雪楼集》。钜夫宏才博学，被遇四朝，忠亮鲠直，为时名臣。文章亦舂容大雅，有北宋馆阁余风。苏天爵《文类》录其文十余篇，大抵皆诏诰碑版、纪功铭德之作。明太祖尝诏取其文入秘阁，盖数十年后，虽隔异代，犹重为著作典型云。

袁桷，字伯长，庆元人，宋同知枢密院事韶之曾孙。少为丽泽书院山长，以荐改翰林国史院检阅官，累迁侍讲学士。卒赠江浙行省参知政事，追封陈留郡公，谥文清。著有《清容居士集》。伯长少从戴表元、王应麟、舒岳祥诸遗老游。学问渊源，具有所自。其在朝践历清华，再入集贤，八登翰苑，凡朝廷制册、勋臣碑铭，多出其手。故其文章博硕伟丽，有盛世之音。尤练习掌故，长于考据。集中议郊祀诸篇，援引经训，原原本本，当时以其精博，并采用之。盖伯长本旧家文献之遗，又当大德、延祐之间，为元治极盛之际，故其著作宏富，气象光昌，蔚为承平雅颂之声，文采风流，遂为虞、杨、范、揭等先路之导。其承前启后，称一代文章之钜公，良无愧矣。

马祖常，字伯庸。世为雍古部人，居靖州之天山。高祖锡里济苏，金末为凤翔兵马判官。子孙用以官为氏之例，遂称马氏。延祐初复科举。祖常乡贡、会试皆第一，廷试第二，授应奉翰林文字，擢监察御史。累迁礼部尚书、参议中书省事。元统初，拜御史中丞，转枢密副使，乞归。至正四年卒，谥文贞。著有《石田集》。其文精赡鸿丽，一洗柔靡卑冗之习。大德、延祐以后，为元文之极盛。而主持风气，则祖常等数人为之巨擘云。

虞集，字伯生，蜀郡人，宋丞相允文五世孙。父汲，侨寓临川之崇仁。大德初，荐授大都路儒学教授，官至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奎章阁侍书学士。卒谥文靖。著有《道园学古录》。文章至南宋之末，道学一派侈谈心性。江湖一派矫语山林。庸沓猥琐，古法荡然。理极数穷，无往不复。有元一代，作者云兴。大德、延祐以还，尤为极盛。而词坛宿老，要必以集为大宗，迹其陶铸群材，不减庐陵之于北宋。呜呼，盛矣！

揭傒斯，字曼硕，龙兴富州人。延祐初，以荐授国史院编修官，应奉翰林文字，迁国子助教，告归。复召还。天历初，开奎章阁，首擢为授经郎，与修《经世大典》。累官翰林侍讲学士，总修辽、金、宋三史。卒于官。追封豫章郡公，谥文安。有集十四卷。傒斯与虞集、范椁、杨载齐名。其文章叙事严整，语简而当。凡朝廷大典册及碑铭之文，多出其手，一时推为巨制。杨维桢谓"曼硕文章，居虞之次，如欧之有苏、曾"。此平心之论也。

许谦，字益之，金华人。延祐中，以讲学名一时。儒者所称"白云先生"是也。著有《白云集》。益之初从金履祥游，讲明朱子之学，不甚留意于词藻。然其诗理趣之中，颇含兴象，五言古体尤谐雅音，非《击壤集》一派惟涉理路者比。文亦醇古，无宋人语录之气，盖讲学家之兼擅文章者也。

阎复，字子靖。其先平阳和州人，徙居高唐。复始生，有奇光照室。性简重，美丰仪。七岁读书，颖悟绝人。至元八年，荐为翰林应奉，官至翰林学士承旨，遥授平章政事。乞骸骨，卒，谥文康。著有《静轩集》。复在翰林最久，以文学自任，不肯为执政官。上亦嘉其谦退。宜其文气春和融粹，绝去町畦，卓然为一代大宗矣。

元明善，字复初，大名清河人。其先盖拓跋魏之裔。复初天资颖悟绝出，读书过目辄记，诸经皆有师法，而尤深于《春秋》。官至翰林学士，至治二年，卒于位。泰定间，赠资善大夫，河南行省左丞，追

封清河郡公，谥曰文敏。有文集行世。复初早以文章自豪，晚益精诣。吴伯清称其文“脱去时流畦径，而进古作者之道”。虞伯生谓其“发扬蹈厉，藐视秦、汉”。马伯庸亦谓公文“刻而不见其迹，新而必自己出。蔚乎其华敷，镄乎其古声。倡古学于当代，为一代之文宗者，柳城姚燧暨公而已”。其为名流所推重如此。

吴莱，字立夫，浦阳人。延祐中，复科举之制，以《春秋》贡于乡，试礼部不第。后以荐署饶州路长芗书院山长，未行而卒，年仅四十四。其门人金华宋濂等，私谥为渊颖先生，编其集为十二卷。莱与黄溍、柳贯并受业于宋方凤，再传而为宋濂，遂开明代文章之派。故年不登中寿，身未试一官，而在元人中屹然负词宗之目，与溍、贯相埒。黄溍称其文“崭绝雄深，类秦、汉间人”，未免溢量。胡助谓“他人患其浅陋，而莱独患其宏博”，斯为笃论矣。

黄溍，字晋卿，金华人。延祐二年，赐同进士出身。历官翰林侍讲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同知经筵事。谥文献。著有《日损斋稿》。其文原本经术，应绳引墨，动中法度，学者承其指授，多所成就。宋濂、王祎皆尝受业焉。

欧阳玄，字原功，浏阳人。延祐乙卯，以乡贡首荐，登进士第，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谥曰文。著有《圭斋文集》。玄平生三仕成均，两为祭酒，六入翰林，三拜承旨。凡朝廷高文典册，多出其手。孔齐至《正直记》曰：“欧阳玄作文，必询其实事而书。未尝代世俗夸诞，时人谓文法不及虞集、揭傒斯、黄溍，而事实不妄则过之。”然宋濂称其文“如雷电恍惚，雨雹交下，可怖可愕。及乎云散雨止，长空万里，一碧如洗，实亦未减于三人也”。

柳贯，字道传，浦江人。大德四年，荐为江山县教谕。延祐四年，授湖广儒学副提举。六年，改国子助教。至治元年，迁博士。泰定元年，迁太常博士。三年，出为江西儒学提举。至正元年，擢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卒。有集四十卷。贯虽受经于金履祥，其文章

轨度，则出于方凤、谢翱、吴思齐、方回、龚开、仇远、戴表元、胡长孺。其史学及掌故旧闻，则出于牟应龙（具见宋濂所作行状中）。学问渊源，悉有所受。故其文章原本经术，精湛闳肆，与金华黄溍不相上下。

许有壬，字可用，汤阴人。延祐二年进士。历官集贤大学士，中书左丞，兼太子左谕德。致仕，卒谥文忠。著有《至正集》。有壬立朝五十年，三入政府。于国家大事，侃侃不阿，多有可纪。文章亦雄浑闳肆，餍切事理，不为空言，称元代馆阁巨手。

吴师道，字正传，兰溪人。至治元年进士，仕至国子博士。致仕后，授礼部郎中。有集二十卷。师道少与许谦同师金履祥，又与黄溍、柳贯、吴莱往来倡和，故为文具有法度，多阐明义理，排斥释老，能笃守师传。

陈旅，字众仲，莆田人。以荐为闽海儒学官。中丞马祖常奇之，与游京师。又为虞集所知。平章事赵世延引为国子助教。又出为浙江儒学副提举。又召入为应奉翰林文字。至正元年，迁国子监丞。越二年，卒于官。著有《安雅堂集》。史称其文"典雅峻洁，必求合于古作者，不徒以徇世好"。又称虞集见所作，有"我老将休，付子斯文"之语。张翥序亦称"天历、至顺间，学士虞公以文章擅四方，其许与君特厚，君亦得相与薰擩，而法度加密，盖纪实也"。

苏天爵，字伯修，真定人。延祐四年，马祖常以御史监试国子生，拔置第一，释褐，授大都路蓟州判官。历官至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大都路都总管、两浙都转运使。至正十二年，淮右江东盗起，仍命参政江浙行省，总兵于饶信，卒于军中。著有《滋溪集》。天爵少从学于安熙，然熙诗文粗野不入格，天爵乃词华淹雅，根柢深厚，蔚然称元代作者。其波澜意度，往往出入于欧、苏，突过其师远甚。至其序事之作，详明典核，尤有法度。集中碑版百余篇，于元代制度人物、史传阙略者，多可藉以考见。《元史》本传称其身任一代文献之

寄，非溢美也。

郑元祐，字明德。至正丁酉，除平江路儒学教授，移疾去。后七年，复擢浙江儒学提举。卒于官。本遂昌人。其父希远徙钱塘，元祐又流寓平江，故其集以“侨吴”名。其文颇疏宕有奇气，诗亦苍古。盖元祐生于至元之末，犹及见咸淳遗老。中间又得见虞集诸人，得其绪论。末年所与游者，亦皆顾阿瑛、倪瓒、张雨之流，互相熏染。其气韵不同，固亦有自来矣。

陈基，字敬初，临海人。至正中，以荐授经筵检讨。张士诚据吴，引为学士，书檄多出其手。著有《夷白斋稿》。敬初受业黄溍之门，所作诗文，皆操纵驰骋，而自有雍容揖让之度，能不失其师传。

第二节　诗　家

飙流所始，同祖风骚。骚人以还，作者递变。五言始于汉魏，而变极于唐。七言盛于唐，而变极于宋。迨于有元，其变已极。故由宋返于唐，而诸体备焉。其间名人志士，项背相望，抒芬铺藻，各竭其才，上接唐、宋之渊源，而后启有明之文物，此元诗之所以不可废也。论者谓元诗不如宋，其实不然。宋诗多沉僿，近少陵；元诗多轻扬，近太白。以晚唐论，则宋人学韩、白为多，元人学温、李为多。要亦伯仲娣姒耳。间尝浏览诸家，伯常、焕然、静修诸公导其先，虞、杨、范、揭鸣其盛，铁崖、玉笥、叔能、元吉持其乱，沨沨乎亦具一代之音，讵可轻加贬词哉？

耶律楚材，字晋卿，辽东丹王突欲八世孙，金尚书右丞履之子也。生三岁而孤。比长，博极群书，旁通天文、地理、衍数及释老、医卜之说。贞祐初，辟左右司员外郎，从太祖平定四方。太宗时，官至中书令。至顺元年，追封广宁王。谥文正。著有《湛然居士集》。平水王邻曰：“中书湛然有天然之才，如宝鉴无尘，寒冰绝翳。今观其诗，语皆本色，惟意所如，不以研炼为工，而大旨必归于风教。”邻之

所云，殆为能得其真矣。

耶律铸，字成仲，楚材之子也。累官中书左丞相。卒，追赠懿宁王，谥文忠。铸少而聪敏，尤工骑射。从宪宗征伐，足迹涉历，多西北极远之区。故其所著《双溪醉隐集》中所述塞外地理典故，往往详核，有裨于考证。又其家在金、元之间，累世贵显，谙习朝廷旧闻，如《琼林园》、《龙和宫》诸赋，叙述海陵、章宗轶事及宫室制度，多《金史》所未及。其他题咏，亦多关系燕都故实，足以资博识也。

方回，字万里，号虚谷，徽州歙县人。宋景定壬戌别省登第，知严州。元兵至，迎降，即以为建德路总管，寻罢。著有《桐江集》。回人品卑污，其诗专主江西。生平宗旨，悉见所编《瀛奎律髓》中。虽不免以粗率生硬为老境，而当其合作，实出宋末诸家上，更不能以人废言矣。

黄庚，字星甫，天台人。尝客山阴王英孙家。试越中诗社枕易题，庚为第一，盖甚为当时所推重。著有《月屋漫稿》。其诗体格虽不高，而触处延赏，时逢警语。如五言之"斜阳明晚浦，落叶瘦秋山"，"柳色独青眼，梅花同素心"，"鸣榔丹叶聚，撒网浪花圆"诸句，七言之"钟带斜阳来远寺，碑和春雨卧平芜"，"细柳雨中垂绿重，残花风里乱红轻"，"清夜梦分千里月，故乡人各一方天"，皆风致婉约，具晚唐之一体。

刘诜，仕履见前。其诗长于五言古体短篇，律诗亦多佳句。五言如"山作登楼色，天留隔巷阴"，"云分潭际树，帆上驿边洲"，"落日湖阴笛，凉风水郭秋"，"一灯遗老鬓，四海后元春"，"树悬山雨白，门掩佛灯红"，七言如"桃花浪起春风阔，燕子寒生社雨多"，"鸟断空山孤树梢，马嘶小驿一灯昏"，"江湖宦客孤舟夜，城郭诗翁白发春"，"刺绣帘栊莺语倦，读书院落絮飞忙"，"草意欲供新得句，桃花犹记旧来人"，当时诸老宿评其诗，以为高逼古人云。

吾邱衍，字子行，钱塘人。竹素、竹房、贞白皆其号。隐居教授。

至大三年，为人所累，被摄得释，不胜其恚，自投西湖死。其诗颇效李、贺体，不能尽脱元人窠臼。然胸次即高，神韵自别，往往于町畦之外，逸致横生。所谓王、谢家子弟，虽不复端正者，亦奕奕有一种风气也。

赵孟頫，仕履见前。戴表元序其集，谓“子昂古赋凌历顿迅，在楚、汉之间。古诗沉涵鲍、谢，自余诸作，犹傲睨高适、李翱”。又陶宗仪《辍耕录》述虞伯生“尝以所作诣公，有句云：‘山连阁道晨留辇，野散周庐夜属櫜。’公曰：‘美则美矣，若改山为天，野为星，则尤美。’伯生深服之”。观此，则子昂诗学之深可知矣。

仇远，字仁近，一曰仁父，钱塘人，因居余杭溪上之仇山，自号曰“山村民”。远在宋咸淳间，即以诗名。至元中，尝为溧阳教授，旋罢归，优游湖山以终。著有《金渊集》。远在宋末，与白珽齐名，号曰“仇白”。厥后张翥、张羽以诗鸣于元代者，皆出其门。他所与唱和者，周密、赵孟頫、吾邱衍、鲜于枢、方回、黄溍、马臻，皆一时名士。故其诗格高雅，往往颉颃古人，无宋末粗犷之习。方凤序述远之言曰：“近体吾主唐，古体吾主选。”其宗法之正如此。

白珽，字廷玉，钱塘人。入元，荐授江浙儒学副提举。有《湛渊集》。戴表元称其赋《铜浮沤》一篇，尤清驯可念。诗甚似渡江陈去非，刘辰翁言其“不为雕刻苛碎，有云山韶濩之音”。

马臻，字志道，号虚中。钱塘道士。著有《霞外诗集》。仇远序其集，称其“隐约西湖之滨，士大夫慕与之交。不过习清虚，谈淡泊，无一言及势力声利”。集中所作，“皆神骨秀骞，风力遒上，琅琅有金石之音”，无酸寒细碎，虫吟草间之态。观其《述怀》一诗，殆宋末遗老寄托黄冠，而其豪迈俊逸之气，无所不可，正不以枯寂恬淡为高耳。

杨宏道，字叔能，淄川人。生金之季。哀宗正大元年，尝监麟游酒税。后又仕宋，以理宗端平元年为襄阳府学教谕。未久，旋入于

元。其后遂鲜所表见。著有《小亨集》。其诗在当日最为有名。元好问序其集，谓“金南渡后，学诗者惟辛敬之、杨叔能以唐人为指归”。又有《赠宏道诗》云：“海内杨司户，声名三十年。”又云：“星斗龙门姓氏新，岂知书剑老风尘。”其倾倒于宏道甚挚。同时若赵秉文、杨云翼见其诗，并称叹不已。今观所作，五言古诗得比兴之体，时时近汉、魏遗音。律诗风格高华，亦颇有唐调。虽不及好问之雄浑苍坚，然就一时诗家而论，固不可谓非北方之巨擘也。

刘因，仕履见前。《林泉随笔》曰：“梦吉之诗，古选不减陶、柳。其歌行律诗，直溯盛唐，无一字作今人语。”今考其论诗，有曰：“魏、晋而降，诗学日盛，曹、刘、陶、谢其至者也。隋、唐而降，诗学日变，变而得正，李、杜、韩其至者也。周、宋而降，诗学日弱，弱而复强，欧、苏、黄其至者也”云云，所见深悉源流。故其诗风格高迈，而比兴深微，闯然升作者之堂。王渔洋作《古诗选》，于诗家流别，品录颇严。而七言诗中，独录其歌行为一家，可谓豪杰之士矣。

刘将孙，字尚友，庐陵人，辰翁之子。尝为延平教官，临汀书院山长。著有《养吾斋集》。将孙濡染家学，颇习父风。其《感遇》诸作，皆效陈子昂、张九龄，虽音节不同，而寄托深远，时有名理。近体亦多佳句。

曹伯启，字士开，砀山人。至元中，荐除冀州教授。天历初，官至陕西诸道行台御史台中丞，卒谥文正。著有《汉泉漫稿》。伯启生于宋末元初，而家世江北，不染江湖末派，亦不沿豫章余波。所作乃多近元祐格，春容娴雅，沨沨乎和平之音。虽不能与虞、杨、范、揭角立争雄，而直抒胸臆，自谐宫徵，要亦不失为中原雅调也。

陈孚，字刚中，天台临海人。历官奉直大夫，台州路总管府治中。至元二十九年，世祖命梁曾以吏部尚书再使安南，孚以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摄礼部郎中为副使。还，擢翰林待制，仍兼国史院编修官。著有《观光稿》、《交州稿》、《玉堂稿》各一卷。“观光”、“交州”二

稿，皆纪道路所经山川古迹，盖仿范成大《使北》诸诗，而大致亦复相埒。《玉堂稿》多春容谐雅，沨沨乎治世之音。其上都纪行之作，与前二稿工力相敌，盖摹绘风土，最所留意矣。

周权，字衡之，号此山，处州人。尝游京师，以诗贽翰林学士袁桷。桷深重之，荐为馆职，竟报罢。然诗名日起，唱和日多。赵孟頫赠权诗，有“青青云外山，炯炯松下石。顾此山中人，风神照松色”之句。且亲写“此山”二字为额以赠。有集四卷，陈旅序称其“简淡和平，无郁愤放傲之色”。欧阳玄序称其“无险劲之词，而有深长之味；无轻靡之习，而有春容之风”。皆知言也。

黄玠，字伯成，慈溪人，宋黄震之曾孙。清苦力学，无所不通。周游西湖，乐吴兴山水，因卜居弁山，与赵文敏游，文敏称许之。著有《弁山集》、《知非稿》。其诗不为近体，视宋末江湖诸人惟从事五七言律者，志趣殊高，中多劝戒之词。其上者得元结遗意，次者亦近乎白居易。虽宏阔深厚，不能及二人。要于俗音嘈囋之中读之，如听古钟磬矣。

何中，字太虚，一字养正，抚州人。至大初，携所著书来京师，公卿列荐之，命未下而归。至顺二年，江西行省平章全岳柱聘为宗濂、东湖二书院山长。明年二月，以疾卒。著有《知非堂集》。太虚藏书万卷，手自校雠。其学宏深该博。程钜夫、元明善、姚燧、揭傒斯皆推服之。吴澄序其集曰：“太虚少负逸才，弱冠已能诗，而亦用意于文。予于病中授集读之，喜之不及。”其倾倒如此。

贡奎，字仲章，宣城人。官集贤直学士，追封广陵郡侯，谥文靖。李黼为之状，马祖常奉敕撰碑，皆天下重望也。著有《云林集》。仲章诗格，在虞、杨、范、揭之间，为元人巨擘。王渔洋《居易录》，论其“境地未能深造，殆专以神韵求之欤”。

郭豫亨，自号梅岩野人，里籍未详。性爱梅花，见古今诗人梅花杰作，必随手钞录，而歌咏之。暇日，辄集其句，得百篇，目为“字字

香”。其中工妙之句，如“不禁夜雨轻欺著，却怕春风漏泄香”，“春回积雪层冰里，人倚闲庭小槛前”，“岚气欲飞山隔岸，生香不断树交花”，“动摇腊信随征使，裁剪春风入小诗”，“定知深院黄昏后，多在青松白石间”，“家为逆旅相逢处，人倚阑干欲暮时”，“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风月笑横枝”，“几处酒旗山影下，一川风物笛声中”，“白雪却嫌春色晚，好风吹送暗香来”，“已成白发潘常侍，自弃明时孟浩然”，豫亨自谓“句煅意炼，璧合珠联”。亦有天然之巧，非夸语也。

袁易，字通甫，长洲人。不求仕进。部使者拟荐于朝，谢不应。行中书省署徽州路石洞书院山长，旋亦罢归。居吴淞、具区之间，筑堂曰“静春”。聚书万卷，手自校定。易殁之后，其子泰编其集为四卷。其诗吐言天拔，与陈与义为近。有元作者，绮缛居多。易诗风骨遒上，固足以高步一时也。

马祖常，仕履见前。其诗才力富健，如《都门》、《壮游》诸作，长篇巨制，回薄奔腾，具有不受羁靮之气。至元间，苏天爵请于朝，刊行其集，而自为之序，称其“接武隋、唐，上追汉、魏”。后生争效慕之。与会稽袁桷、蜀郡虞集、东平王构，更迭倡和，如金石相宣，而文益奇，其推之者至矣。

虞集，仕履见前。《辍耕录》载“尝有问于虞先生曰：‘杨仲宏诗何如？’先生曰：‘仲宏诗如百战健儿。’‘范德机诗如何？’曰：‘德机诗如唐临晋帖。’‘揭曼硕诗如何？’曰：‘曼硕诗如美女簪花。’‘先生诗如何？’笑曰：‘集乃汉廷老吏。’公论以为然。”清翁方纲《石洲诗话》曰：“道园兼有六朝人酝藉，而全于含味不露中出之。所以其境高不可及。”又曰：“伯生七律清深，自王荆公以后，无其匹敌。”又曰：“伯生七古，高妙深浑，所不待言。至其五古，于含蓄中吐藻韵，乃王龙标、杜牧之以后所未见也。”

杨载，字仲宏，浦城人，后徙杭州。初以布衣荐，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调海船万户府照磨。会仁宗复行科举之制，遂中延祐二年

进士，授饶州路同知浮梁州事，终于宁国路总管府推官。有集八卷。元代诗人，世推虞、杨、范、揭，史称其文章"一以气为主，而于诗尤有法度。自其诗出，一洗宋季之陋"云云。瞿宗吉《归田诗话》曰："仲宏以《宗阳宫玩月》诗得名。然他作如'风雨五更鸡乱叫，江湖千里雁相呼'，'挟书万里朝明主，仗剑三年别故乡'，'窗间夜雨销银烛，城上春云压彩旗'，'空桑说法黄龙听，贝叶翻经白马驮'，沉雄典实，先叔祖每称之。长篇如《古墙行》、《梅梁歌》，亦皆为时所称。"

范梈，字亨父，一字德机，清江人。以荐为左卫教授，迁翰林院编修官，出为岭海廉访使照磨，历转江西湖东。后选充翰林应奉，又改闽海道知事。移疾归。天历二年，授湖南岭北道廉访使经历，以母老未赴。明年母丧，竟以毁卒。有集七卷。揭傒斯序之曰："虞伯生称德机'如唐临晋帖，终未逼真'。予改评之曰：'范德机诗如秋空行云，晴雷卷雨，纵横变化，出入无朕；又如空山道者，辟谷学仙，瘦骨崚嶒，神气自若；又如豪鹰掠野，独鹤叫群，四顾无人，一碧万里'"云云。其言虽务与虞反，未免形容过当。然德机诗格实高，其机杼亦多自运，未尝规规刻划古人。固未可以"唐临晋帖"一语据为定论矣。

揭傒斯，仕履见前。其诗清丽婉转，别饶风韵，与其文如出二手。然神骨秀削，寄托自深，非嫣红姹紫、徒矜姿媚者可比。胡应麟《诗薮》谓元五言律"可摘者，如曼硕之'大舸中流下，青山两岸移'，'鸦啼木郎庙，人祭水神祠'等，皆有唐人遗响。"

宋无，字子虚。家于晋陵，以兵乱迁吴。中丞王西溪举茂才，以奉亲辞。著有《翠寒集》一卷。赵子昂称其诗"风流蕴藉，皆不经人道语"。邓中父云："其大篇如天孙织绡，云经雾纬，自出机杼。小律则日光虹彩，浑然金璧，秾丽缜密而不艳，含郁静婉而不怨。其深于唐之变也。"冯海粟与知最晚，一见其集，亟叙而锓之。谓如"承恩金马诏，失意玉环词"，"落月今谁吊，长庚夜自明"，虽使太白复生，亦

当为子虚击节。子虚诗雅秀绝伦，宜为当时名辈所推重也。

丁复，字仲容，天台人。延祐初，游京师，与杨载、范梈同被荐，而复辞不就，放情诗酒，浪迹江淮间，凡三徙居，晚乃侨寓于金陵之城北。著有《桧亭集》。复诗不事雕琢，而意趣超忽，自然俊逸。其才气横溢，魏文帝所谓"笔墨之性，殆不可胜"者，几乎近之。

卢挚，字处道，一字莘老，号疏斋，涿州人。至元五年进士，博洽有文思，累迁河南路总管。大德初，授集贤学士，出持宪湖南，迁江东道廉访使。复入为翰林学士，迁承旨卒。所著曰《疏斋集》。元初中州文献，东人往往称"李阎徐"，推能文辞有风致者，曰"姚卢"。盖谓李谦受益，阎复子靖，徐琰子方，姚燧端父及疏斋也。而推诗专家，必以刘因静修及疏斋为首。疏斋尝著文章宗旨云："大凡作诗，须用'三百篇'与《离骚》，言不关于世教，义不存于比兴，诗亦徒作。"观其言可以知其诗矣。

吴莱，仕履见前。宋景濂称其"赋咏捷如风雨"。一日，于故人家见几上堆剡纸数十番，戏为长歌，顷刻而尽，属对严巧，文采缛丽，观者惊以为神。王士祯《论诗绝句》有曰："铁崖乐府气淋漓，渊颖歌行格尽奇。耳食纷纷说开宝，几人眼见宋元诗。"而其所选七言古诗，乃录莱而不录维桢。盖维桢为词人之诗，莱则诗人之诗，恃气纵横，与覃思冶炼，门户固殊。士桢《论诗绝句》，作于任扬州推官时。而《古诗选》一书，则其后来所定，所见尤深也。

陈泰，字志同，别号所安，长沙茶陵人。延祐二年进士，除龙泉县主簿。栖迟薄宦，惟以吟咏自适，竟终于是官。其曾孙朴编其遗稿为一卷。翁方纲《石洲诗话》云："志同歌行，如《赵子昂画马歌》、《朔方歌》、《万里行》诸篇，嵚崎磊落，在元人诸名家中，卓然有风骨，不徒以金粉竞丽者。"昔渔洋先生从人借宋、元人诗集数十种，独手钞《所安遗稿》一卷，良是具眼。又先生《居易录》云："志同歌行，驰骋笔力，有太白之风。在元人中，当居道园之下，诸公之上。而

名不甚著，岂以名位卑耶？”

吴师道，仕履见前。其诗风骨遒上，意境亦深，褎然升作者之堂。胡应麟《诗薮》云：“正传五言古，清新峭拔，一洗议论纤靡之习。七言古最长，《十台怀古》诗气骨铮铮，时咸脍炙。其他句如《大水》云：‘三月云愁百里阴，大湖浪激三州白。’《观潮》云：‘浙江亭远乱帆飞，西兴渡暝千花湿。’《秋山图》云：‘千年绝艺洪谷子，身在太行秋色里。万里云飞木落时，遥写阑干半空起。’长篇如《南城纪游》、《修河道中》等作，老笔纵横，殊得工部叙事体。五言律如‘长天孤鸟没，落日大江深’，‘水夹徐邳去，河兼汴泗来’，‘飞云浮画栋，旭日丽高牙’，‘悬空飞万瀑，拔地立千峰’，‘落花萦剑佩，高柳映帆樯’。皆整丽有格。”

宋褧，字显夫，大都人。泰定元年进士，历官翰林直学士，兼经筵讲官。谥文清。著有《燕石集》。欧阳元功谓其诗“务去陈言。虽大堤之谣，出塞之曲，时或驰骋乎江文通、刘越石之间，而燕人凌云不羁之气、慷慨赴节之音，一转而为清新秀伟之作，齐、鲁老生不能及也”。苏伯修亦谓其诗“清新飘逸，间出奇古。若卢仝、李贺之流，益喜其词以模拟之”。危太朴曰：“公之于诗，精深幽丽，而长于讽谕，用成一家之言。”显夫之诗，于诸公之评尽之矣。

黄镇成，字元镇，邵武人。以荐授江南儒学提举，未上而卒。著有《秋声集》。其诗边幅稍狭，气味稍薄，盖限于才弱之故。然近体出以雅洁，古体出以清省，亦复善用其短。故格韵楚楚，颇得钱郎遗意。较元代纤秾之体，固超然尘壒之外也。

萨都剌，字天锡，别号直斋。本答失蛮氏，祖父以勋留镇云代，遂为雁门人。弱冠登泰定丁卯进士第，应奉翰林文字，出为燕南经历，擢御史于南台。以弹劾权贵，左迁镇江录事。历进淮西兼访经历。著有《雁门集》。干文传序其诗曰：“其豪放若天风海涛，鱼龙出没；险劲如泰华云开，苍翠孤耸。其刚健清丽，则如淮阴出师，百战

不折。而洛神凌波，春花霁月之婉娟也。”明张习书其集后曰：“元诗之盛，倡自遗山。而赵子昂、袁伯长辈附和之，继而虞、杨、范、揭者出，号为大家。天锡之诗，清而不佻，丽而不缛，真能于袁、赵、虞、杨之外，别开生面者也。”

傅若金，字与砺，新喻人。家贫力学，为同郡范梈所知，得其诗法，以布衣至京师。数日之间，词章传诵，名胜之士，莫不倒屣而迎，以为上客。虞集、宋褧以异材荐之，佐使安南，归除广州文学教授卒。有集二十卷。揭傒斯云：“余每读与砺诗，风格不殊，神情俱诣，如复见范德机也。德机七言歌行胜，与砺五言古律胜，馀亦在伯仲之间。”

余阙，字廷心，一字天心，色目人。世居武威，以父官合肥，遂家焉。元统元年进士。累官淮南行省左丞，分守安庆。陈友谅陷城，自刭死。赠行省平章，谥忠宣。著有《青阳集》。阙以文学致身，而力障东南，与许远、张巡后先争烈。故集中所著，皆有关当世安危。其诗以汉、魏为宗，优柔沉涵，于元人中别为一格。

周伯琦，字伯温，鄱阳人。当顺帝时，伯琦以文章知遇，出入禁廷。后出为浙西肃政廉访使，招谕张士诚，拜江浙行省参知政事，进左丞。至正二十四年，除江南诸道行御史台侍御史。后三年，浙西平，引归鄱阳。著有《近光集》三卷、《扈从诗》一卷。《近光集》中述朝廷典制为多，可以备掌故。《扈从诗》中记边塞闻见为详，可以考风土。而伯琦文章淹雅，亦足以摹写而叙述之。溯元季之遗闻者，此二集与杨允孚《滦京百咏》，亦略具其梗概矣。

张翥，字仲举，晋宁人。至元初，用隐逸荐，召为国子助教，分教上都。寻退居淮东，会修宋、辽、金三史，起翰林国史院编修官，累迁翰林学士承旨。致仕，加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给俸终身。著有《蜕庵集》。翥诗法受于仇远，得其音律之奥。其诗清圆稳贴，格调颇高。近体长短句极为当时所推，然其古体亦伉爽可诵。词多讽谕，往往

得元、白、张、王之遗。王渔洋《居易录》曰:“蜕庵元末大家,古今诗皆有法度,无论子昂、伯庸辈,即范德机、揭曼硕,未知伯仲何如。”其论当矣。

李孝光,字季和,乐清人。隐居教授。至正七年,诏征隐士,以秘书监著作郎召。明年,升文林郎、秘书监丞。著有《五峰集》。季和为人,美髯伟干。《茅山张伯雨赠诗》有“孰与言诗李髯叟,载闻新作过黄初”之句。元诗绮靡者多,孝光独风骨遒上,力欲排突古人。乐府古体,皆刻意奋厉,不作庸音。近体五言,疏秀有唐调。七言颇出入江西派中,而俊伟之气,自不可遏。

迺贤,字易之。本葛逻禄氏,译言马也。南阳人。荐授翰林编修官。著有《金台集》。迺贤天才宏秀,去元好问为近。虽晚年内登翰林,外参戎幕,而仕进非所汲汲,惟以游览唱酬为事。故气格轩翥,无世俗猥琐之态。其名少亚萨都剌,核其所作,视萨都剌无不及也。

吴景奎,字文可,兰溪人。年三十,海道万户刘贞为浙东宪副掾,尝辟为从事。明年贞去,景奎亦归。久之,用部使者荐,署兴化县儒学录,以母老辞不就。至正十五年,卒于家。著有《药房樵唱》。五言古体皆原出白居易,七言古体间似李贺,近体亦音节宏敞,豪放自喜。宋濂为作集序,亦极相推挹。

贡师泰,字泰甫,宣城人。以国子生中江浙乡试,除泰和州判官,荐充应奉翰林文字,累官至户部尚书。著有《玩斋集》。师泰本以政事传,而少承其父奎家学,又从吴澄受业,复与虞集、揭傒斯游,故文章亦具有源本。其在元末,足以凌厉一时。诗格尤为高雅,虞、杨、范、揭之后,可谓挺然晚秀矣。

成廷珪,字原常,一字元章,又字礼执,扬州人。好学不求仕进,惟以吟咏自娱。奉母居市廛,植竹庭院间,颇有山林意趣。晚遭世乱,避地吴中,踪迹多在松江,后竟没于云间。著有《居竹轩集》。廷

珪与河东张翥为忘年交。其诗音律体制，多得法于翥，而声价亦与之相亚。诗中所载酬答者，如杨维桢、危素、杨基、李黼、余阙、张雨、倪瓒，皆一代胜流。刘钦为作集序，称其“五言务自然，不事雕刿。七言律最为工深，合唐人之体”。然其七言古诗，亦颇遒丽也。

郭翼，字羲仲，昆山人。尝献策张士诚，不用，归耕娄上。老得训导官，偃蹇而终。翼学问博洽，既不得志，惟刻意于诗古文。尝自号东郭生，又称野翁。而名所著集曰《林外野言》。翼从杨维桢游，诗颇近其流派。其间如《望夫石》、《精卫词》诸篇，皆用铁崖乐府体，尤为酷似。要其笔力挺劲，绝无懦响，在元季诗人中，可谓矫然特出者矣。

张雨，字伯雨，一名天雨，别号贞居子，钱塘人。隐于黄冠，至正间卒。著有《句曲外史集》。伯雨诗文豪迈洒落，体格遒上。早年及识赵孟頫，晚年犹及见倪瓒、顾阿瑛、杨维桢，中间如虞集、范椁、袁桷、黄溍诸人，皆以方外之交，深为投契。故耳濡目染，具有典型。而谈艺诸家，亦置之于文士之列，不复以异教视之矣。

许恕，字如心，江阴人。至正中，荐授澄江书院山长，旋弃去。会天下已乱，乃遁迹卖药于海上，与山僧野人为侣。善自晦匿，罕相识者，故征召不及。著有《北郭集》。恕诗格力颇遒，往往意境沉郁，而音节高朗，无元季靡靡之音。近体颇似陈与义，遭逢丧乱，故多愁苦之词。然如《偶成》诗之“一径豆苗绿，独行溪水西”，“繁露坠丛竹，新流涨芳堤”，“偶与樵者语，忽闻幽鸟啼”云云，亦未尝不翛然清远也。

张宪，字思廉，山阴人。家玉笥山，因以为号。少负才不羁，晚为张士诚所招，署太尉府参谋，稍迁枢密院都事。元亡后，变姓名，寄食僧寺。旦暮手一编，人不得窥。死后视之，其平生所作诗也。宪学诗于杨维桢，维桢许其独能古乐府。今集中乐府琴操，皆颇得维桢之体。其他《感时》、《怀古》诸作，类皆磊落肮脏，豪气坌涌。维桢

又云："吾铁门称能诗者，南北凡百余人。求其似宪及吴下袁华辈者，不能十人。"

丁鹤年，字亦曰鹤年，盖用孟浩然字浩然例也。色目人。本世家子，遭乱不求仕宦，笃志尚操，兼以孝闻。元亡，避地四明，后归老武昌山中，著有《海巢集》。鹤年既绝意于功名，惟覃思吟咏，故所得颇深。尤长于五七言近体，往往沉郁顿挫，逼近古人，无元季纤靡之习。至顺帝北狩以后，兴亡之感，一托于诗。悱恻缠绵，眷眷然不忘故国。瞿宗吉《归田诗话》所称"行踪不异枭东徙，心事惟随雁北飞"句及《逃禅室与苏生话旧》一篇，可以知其素志矣。

钱惟善，字思复，自号心白道人，钱塘人。领至正元年乡荐，官至儒学副提举。张士诚据吴，退隐吴江之筒川，又移居华亭。明洪武初卒。著有《江月松风集》。陈旅序称其"妥适清茜，娓娓乎有唐人之遗风"。品题颇当。

谢应芳，字子兰，武进人。为人耿介尚节义。至正初，江浙行省举三衢清献书院山长。阻兵，居吴之葑门，转徙吴淞江上。教授之暇，以诗酒自娱。著有《龟巢集》。应芳䌷绎经史，作为文章，咸有根柢。闽人张志道评其诗"雅正纯洁，可与傅与砺相伯仲。"识者以为名言。

周霆震，字亨远，安成人。早年刻意学问，多从宋诸遗老游，得其绪论。延祐中，行科举法，再试不售，遂杜门，专意诗、古文。著有《石初集》。霆震生于前至元末，卒于明洪武间，亲见元代之兴亡，故其诗忧时伤乱，感愤至深。如《古金城谣》、《李浔阳死节歌》、《杜鹃行》、《过玉成砦》、《关城曲》、《郡城高》、《人食人》、《延平龙剑歌》、《寇至杂咏》、《军中苦乐谣》、《宿州歌》诸篇，并叙述乱离，沉痛酸楚，使异代尚如见其情状。昔汪元量《水云集》，论者以为宋末之诗史。霆震之集，其亦元末之诗史欤！

王逢，字原吉，自称席帽山人，江阴人。当至正间，被荐不就，避

地吴淞江。适张氏据吴，东南之士咸为之用，逢独高蹈远引。及洪武初，征召甚迫，又以老疾辞。著有《梧溪集》。逢少学诗于陈汉卿，得虞集之传，才气宏敞，而不失谨严。集中载宋、元之际忠孝节义之事甚备，每作小序，以标其崖略，足补史传所未及，盖其微意所寓也。

戴良，字叔能，浦江人。尝学文于柳贯、黄溍、吴莱，学诗于余阙。至正辛丑，顺帝用荐者言，授淮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儒学提举。后至吴中依张士诚，知士诚不足与谋，挈家泛东海，欲间道归扩廓军，不得达，侨居昌乐。洪武六年南还，变姓名，隐四明山。明太祖征入京，欲官之，以老疾固辞，忤旨自裁。著有《九灵山房集》。良诗风骨高秀，迥出一时。眷怀宗国，慷慨激烈，发为吟咏，多磊落抑塞之音。故其自赞谓"歌黍离麦秀之诗，咏剩水残山之句"。苏伯衡赞其画像，亦谓"其跋涉道途，如子房之报韩。其彷徨山泽，如正则之自放"云。

贡性之，字友初，宣城人。尚书师泰之族子。元季以胄子除簿尉，后补闽省理官。洪武初，大臣以性之荐，性之避居山阴，更名悦，躬耕自给，以终其身。著有《南湖集》。其《题画马》诗云："记得曾陪仙仗立，五云深处隔花看。"《题葡萄》诗云："忆骑官马过滦阳，马乳累累压架香。"盖惓惓不忘故国。又《题陶靖节像》曰："解印归来尚黑头，风尘吹满故园秋。一生心事无人识，刚道逢迎愧督邮。"其不事二姓之意，尤灼然可见。

顾瑛，一名阿瑛，又名德辉，字仲瑛，昆山人。少轻财结客。年三十，始折节读书，与天下胜流相唱和，卜筑玉山草堂，池馆声伎，图画器玩，甲于江左，风流文采，倾动一时。著有《玉山璞稿》。尝自题其画像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说旧时豪侠兴，五陵衣马洛阳街。"纪其实也。杨循吉苏谈曰："阿瑛好事而能文，其所作不逮诸客，而词语流丽，亦时动人，故在当时得以周旋骚

坛之上，非独以财故也。”

杨维桢，字廉夫，号铁崖，山阴人。泰定四年进士。初署天台尹，改钱清场盐司令，转建德总管府推官，擢江西儒学提举，未及上而兵乱，遂不复仕，放浪于诗酒歌舞之间。明初，命修礼乐书，旋以老病辞归。著有《东维子集》、《铁崖古乐府》、《复古诗集》、《丽则遗音》等书。乐府始于汉武，后遂以官署之名为文章之名；至鲍照而始见奇矫；至李白而极于变化；幽艳奇诡，别出蹊径，歧于李贺；元之季年，多效温庭筠体，柔媚旖旎，全类小词。铁崖以横绝一世之才，乘其敝而力矫之，根柢于青莲昌谷，纵横排奡，自辟町畦，其高者直突过古人。特其才务驰骋，意务新异，不免滋末流之弊，是在学者善择之矣。

张昱，字光弼，庐陵人。左丞杨旺扎勒镇江浙，昱参谋军府，官至左右司员外郎，行枢密院判官。元末弃官不仕，放浪山水，年八十三乃卒。著有《可闲老人集》。光弼才气纵逸，其诗学出于虞集，故具有典型。如《五王行春图》、《歌风台》诸作，皆苍莽雄肆，有沉郁悲凉之概；《天宝宫词》、《辇下曲》、《宫中词》诸作，不独咏古之工，且足备史乘所未载。

陈高，字子上，温州平阳人。至正十四年进士，授庆元路录事。平阳陷，弃妻子，往来闽、浙间。至正十六年，浮海过山东，谒河南王库库特穆尔于怀庆，密论江南虚实。库库特穆尔欲官之，会疾作卒。著有《不系舟渔集》。子上文格颇雅洁，诗惟七言古体不擅场，绝句亦不甚经意。其五言古体，源出陶潜；近体律诗，格从杜甫。面目稍别，而神思不远，亦元季之铮铮者矣。

第三节　词　家

词体成于晚唐、五代，而盛行于两宋。极盛难继，此亦自然之理。然元人去宋未远，如赵松雪、仇山村、张师道、姚圣瑞、陆墙东、

刘起潜等，皆目击天水之亡，亲濡染于宋季遗老。又如张伯雨、张仲举、萨雁门等，薪火相传，远有端绪。故或则致慨于兴亡之际，得灵均、美人、香草之遗；或则寄情于山水之间，继志和、青箬、绿蓑之唱。声辞并茂，足以追踪南北宋名家者，未尝无人。而好为高论者，辄谓元代无词。致毛氏汲古阁刻"宋词"六十一家之多，而元人乃无一焉。明珠大贝，听其消沉；放言之害，一至于此。洎乎清末，长沙张氏、临桂王氏、归安朱氏始搜坠举逸，次第刊行。于是元贤之词，方得大显于世，功不在顾侠君下。兹以限于篇幅，仅举其荦荦大者，然已足证元无词说之悠谬矣。

王恽，仕履见前。著《秋涧词》四卷。其《点绛唇·送董秀才西上》云："杨柳青青，玉门关外三千里。秦山渭水，未是消魂地。　坦卧东床，恐减风云气。功名际，愿君著意。莫揾春闺泪。"《后庭花破子·晚眺临武堂》云："绿树远连州，青山压树头。落日高城望，烟霏翠满楼。木兰舟，彼汾一曲，春风佳可游。"已有黄河远上之概。而《春从天上来见故宫人感赋》云："回头五云双阙，恍天上繁华，玉殿珠栊，白发归来，昆明灰冷。十年一梦无踪。"写杜娘哀怨，和"泪点弹与孤鸿"等句，尤有无限兴亡之感。《乐府纪闻》称其效吴彦高作此词，不引用故实，而澹宕可喜。不诬也。

刘因，仕履见前。其《菩萨蛮》云："元龙未改当年气，呼山卧向高楼底。今日到山村，青山故意昏。　商歌聊一振，千里浮云静。老子气犹豪，山灵未可骄。"《西江月·山亭留饮》云："看竹何须问主，寻村遥认松萝。小车到处是行窝，门外青山属我。　张叟腊醅藏久，王家红药开多。相留一醉意如何？老子掀髯曰'可'。"《念奴娇·忆仲良》云："中原形势东南壮，梦里谯城秋色。万水千山收拾就，一片空梁落月。烟雨松楸，风尘泪眼，滴尽青青血。平生不信，人间更有离别。　旧约把臂燕南，乘槎天上，曾对河山说。前日后期今日近，怅望转添愁绝。双阙红云，三江白浪，应负肝肠铁。旧游新恨，一生

都付长铗。”近人况周仪谓其“真挚语见性情,和平语见性养,洵精鉴不磨也”。

刘秉忠,字仲晦,邢州人。少为僧,随其师海云入见,世祖遂留之。从世宗,时人称为聪书记。至元初,拜光禄大夫,位太保,参预中书省事。卒赠太傅,谥文正,追封常山王。著有《藏春散人集》。其《点绛唇》词云:“十载风霜,玉关紫塞都游遍。驿途方远,夜雨留孤馆。　灯火青荧,莫把吴钩看。歌声软,酒斟宜浅,三盏清愁散。”又云:“古寺萧条,十年再到经行路。旧题新句,总是关心处。　睡起西轩,转觉添幽趣。斜阳暮,淡烟疏雨,湿遍山前树。”又云:“客梦初惊,雪晴风冷千山晓。塞烟沙草,又上邮亭道。　石窟萝龛,为我君应扫。何时到,放怀吟啸,相伴山间老。”仲晦奇人,不藉文章传,而词之工乃如是。

陆文圭,仕履见前。其《探春慢・和心渊己巳元夕韵》云:“细草粘冰,疏林补雪,衰翁未觉春暖。曝背低檐,燎衣破灶,谁识舞台歌馆。乐事如今懒,谢邻伴东招西唤。何消看试华灯,月光今夕圆满。　念昔繁华帝里,侍凤辇夜游。棚晓人散,迓鼓方催,韵箫正美,忽被西风吹断。蔌蔌梅花落,忍听得一声羌管。怀古伤情,泪痕湿、春衫短。”悲怆故国,似读兰成《哀江南赋》矣!

姚云文,字圣瑞,高安人。宋咸淳进士。入元授承直郎,抚建两路儒学提举。有《江村遗稿》。其《摸鱼儿・赋艮岳》云:“渺人间蓬瀛何许,一朝飞入梁苑。辋川梯洞层崖出,犹带鬼愁龙怨。穷游宴,谈笑里,金风吹折桃花扇。翠华天远,怅莎沼萤粘,锦屏烟合,草露泫苍藓。　东华梦。好在牙樯雕辇,画图历历曾见,落红万点孤臣泪,斜日牛羊春晚。摩双眼,看尘世鳌宫,又报鲸波浅。吟鞭拍断,便乞与娲皇,化成精卫,填不尽遗憾。”苍凉沉郁,苏、辛后劲也。

张伯淳,字师道,崇德人。宋末举童子科。至元间,以荐除杭州教授,迁浙东道按察使知事,官至翰林侍讲学士。有《养蒙先生词》

一卷。《柳梢青·赋枯梅寄张郎中、马同知》云："冷淡根荄，小春时候，两蕊三花，栽向西湖。移来东阁，一任安排。　绝怜瘦影横斜，但宜在、山巅水涯。花里平安，岭头孤秀，荣悴争些。"按宣德七年重刊本《养蒙集》，有其曾孙铨跋云："伯淳为安抚使赵与訔婿。"与訔者，子昂父也。伯淳自跋称"与内弟子昂、赵公同时"。集中《书梁中砥画卷》云："子昂，余所亲。"《萧山县学重建大成殿记》，伯淳撰，子昂书，则伯淳之在元初，风流儒雅，固与天水王孙相伯仲也。

刘壎，字起潜，号水村，南丰人。宋季隐居不仕。入元，以荐官延平教授。著有《水云村吟稿》，附词。其《谒金门自序》云："临汝有歌者，稍慧。咸淳中，尝与吟朋夜醉其楼，对予唱《贺新郎》词，至'刘郎正自当年少，更那堪天教赋与许多才调整'之句，笑谓予曰：'古曲儿今日恰好使得。'予因以此意作小调题壁，明日遂行。后二年再访之，壁间醉墨尚存，而人已他适矣。然旧词多有见之者，姑录于此。词云：'眉月小，红烛画楼歌绕。唱到刘郎频笑道，古词今恰好。　深夜银屏香袅，明日雕鞍尘杳。一晌春风容易晓，三生思不了。'温柔旖旎，不减飞卿端己也。"

仇远，仕履见前。著有《无弦琴谱》。其《应春宫》词云："江影涵空，山光浮水，画楼直倚东城。落叶声稀，归鸿声杳，晚风却递钟声。去天咫尺，只疑是齐云摘星。阑干凝伫，愁见垂杨烟絮萦萦。　官梅冷笑相迎，怕繁枝容易凋零。因念吟仙鹤去，断桥谁赋疏清。染云如黛，这雪意看看做成。有谁知得庾信闲愁，陶令闲情。"此词用周美成《清真词》原韵，则必依周旧谱可知。今以周词相较，换头第二句少一字，"因念吟仙鹤去"一句少二字，且当分作四字两句。然词意已足。或山村意为变通欤？

赵孟頫，仕履见前。侯文灿《名家词集》收《松雪斋词》，较本集多十二阕。其《虞美人·浙江舟中》云："潮生潮落何时了，断送行人老。消沉万古意无穷，尽在长空淡淡鸟飞中。　海门几点青山小，

望极烟波渺。何当驾我以长风，便欲乘桴浮到日华东。"又《木兰花慢·和李簣房韵》云："爱青山绕县，更山下，水萦回，有二老风流。故家乔木，旧日亭台，梅花乱零春雪。喜相逢置酒藉苍苔，拚却眼迷朱碧，惭无笔写琼瑰。　徘徊，俯仰兴怀，尘世事，本无涯，偶乘兴来游。临流一笑，洗尽征埃。归来算能几日，又青回柳叶燕重来，但愿朱颜长在，任他花落花开。"邵复孺云："公以承平王孙，而婴世变，黍离之悲，有不能忘情者。故长短句深得骚人意度。"

卢挚，仕履见前。其《摸鱼子·奉题雪楼先生鄂宪公馆岁寒亭诗卷》云："为君歌岁寒亭子，无烦洲畔鹦鹉。江山胜概风霜地，要近鲁东家住。丘壑趣，应素爱昂霄，老柏孤松树。登高作赋，想白雪阳春，碧云日暮。别有倚楼处。　金闺彦，尚忆西清接武，年来乔木如许。团茅时复羲皇上，我醉欲眠卿去。歌欲举，还自悟君亭，琢就琼瑶句，疏斋试与。倩倚竹佳人，湘弦赴节，凉满北窗雨。"

刘将孙，仕履见前。著有《养吾斋诗余》。其《踏莎行·闲游》云："水际轻烟，沙边微雨，荷花芳草垂杨渡。多情移徙忽成愁，依稀恰似西湖路。　血染红笺，泪题锦句，西湖岂忆相思苦，只应幽梦解重来，梦中不识从何去。"又《阮郎归舟中作》云："斜阳江路柳青青。传杯那放停，上船不记送人行，南风吹酒醒。　江曲曲，路萦萦，月明潮水生，送将残梦作浮萍，角声何处城。"殊有南唐风味。

刘敏中，字端甫，章邱人。至元中，为监察御史，累迁翰林学士承旨，卒谥文简。著有《中庵集》，附诗余。其《清平乐自序》云："西野内翰奉使，寄示佳篇累幅。三韩山川风土之胜，了然目中。夫能以吟咏之乐，而忘其跋涉之劳，固君子所尚也。披赏之余，少答雅贶，且以奉旋旆一笑。词云：'云窗月户，水秀山奇处。画里二三千里，一步哦诗一住。　诗中却也思家，寄来满纸烟霞。办了皇华事业，做成冷淡生涯。'"与集中《老病自戏》、《南乡子》等调，均倜傥可喜。

曹伯启，仕履见前。著有《汉泉乐府》。其《酹江月·次王君阳、李敏之过龙门韵》云："洪崖中断，似层楼幻出，层檐叠脊，欲问真源凌绝顶，安得乘风羽翮。势利相忘，驱驰不惮。面背皆京国，源泉混混，恍如夹右碣石。　遥想巢父襟怀，东溟烟雾里。片帆如席，逸气峥嵘今老矣。惆怅剑门千尺，细草平沙，敝裘羸马，长路无人识。家山回首，不应犹作行客。"

姚燧，仕履见前。有《牧庵词》二卷。其《虞美人·牧庵即事为李元素作》云："竹风吹落疏疏雨，纨扇收残暑。小轩蓦地细香来，莫是邻家早有木犀开。　玉环穿耳谁家女？自献歌金缕。新声和出紫檀槽，袖出乌丝，才说要挥毫。"《绿头鸭·赠辛尚书家琵琶妾何氏》："锦堂深，兽炉香喷沉烟，紫檀槽金泥花面，美人斜抱当筵。轻罗绥素肌莹玉，近鸾翅云鬓梳蝉。玉笋轻抛，鱼文细拨，凤皇飞上四条弦。牙板烦襟消尽，秋气满庭轩。今宵月，依稀向人欲斗婵娟。　变新声能翻旧曲，眼前风物凄然。路漫漫汉妃出塞，夜悄悄商妇移船。马上愁思，江边怨感，分明多向曲中传。因无力，劝人金盏，须要倒垂莲。"小令如欧、晏，慢词近姜、张。文人之词，乃与专家竞胜矣。

吴镇，字仲圭，自号梅花道人，嘉兴人。著有《梅花庵稿》。其《渔父》云："红叶村西夕影余，黄鹂滩畔月痕初。轻拨棹，且归欤，挂起长竿不钓鱼。"又云："点点青山照水光，飞飞寒雁背人忙。冲小浦，转横塘，芦花两岸一朝霜。"又云："醉倚渔舟独钓鳌，等闲入海即乘潮。从浪摆，任风飘，缩手怀中放却桡。"此词家逸品也。

赵文，字仪可，号青山，庐陵人。东湖书院山长。著《青山诗余》一卷。其《阮郎归梨花》云："冰肌玉骨淡裳衣，素云生翠枝。一生不晓谪仙诗，雪香应自知。　微雨后，禁烟时，洗妆君莫迟。东风不解惜妍姿，吹成蝴蝶飞。"凤林书院《草堂诗余》录其《瑞鹤仙·刘氏园西湖柳》云："绿杨深似雨，西湖上旧日情丝恨缕，风流似张绪。

羡春风依旧，年年眉妩，宫腰楚楚，倚画阑曾斗妙舞。想而今似我零落，天涯却悔相妒。　病绝长秋去后，杨白花飞，旧腔谁谱，年光暗度。凄凉事，不堪诉，记菩提寺路，段家桥水，何时重到梦处！况柔条老去，争奈系春不住。”低徊宛转，置之宋遗民汐社词中，几难辨别。仪可亦有心人哉。

虞集，仕履见前。著有《道园乐府》一卷。其《贺新郎自序》云："五月中，以小疾家居。陈众仲助教言乳燕飞华屋调，最宜时连度数曲。病其辞妙则声劣，律稳者语逼。适有友人期家，人到官所而弗至。赋此词云：'丹荔明如火，想江城薰风乍透，绣帘青锁，宝篆香销初睡起，叶底流莺又过。算几度思归未果，欲剪冰绡凭谁寄，恐腰围渐减愁无那，临岸曲，命轻舸。　凉宵冉冉银蟾堕，望清辉千里照人，雾低云亸。准拟雕梁栖飞燕，早晚薪巢定妥。叹会少离多似我，留滞文园头先白，念琴心久为芳尘锁。将旧恨，赋江左。'"观其自序，知其所致力矣。

王旭，字景初，东平人。家贫力学，教授四方。尝为砀山令所宾礼，与同郡王构及永平王磐俱以文章名世，天下号为"三王"。著有《兰轩集》，惟"四库"有辑本。近归安朱氏刻其词一卷，其《大江东去·离豫章舟泊吴城山下》云："南游三载，只江山不负中原诗客，万里行装无别物，满意风云泉石。牛斗星边，灵槎缥缈，鬓影银河湿。哀歌谁和，剑光摇动空碧。　回首帝子长洲，洪崖仙去，风雨鱼龙泣。海外三山何处是，黄鹤归飞无力。天半佳人，袖中瑶草，日暮空相忆。乾坤遗恨，月明吹入长笛。"吐气如虹，想见其胸襟不凡。

萨都剌，仕履见前。著有《雁门词》一卷。其《满江红·金陵怀古》云："六代繁华，春去也，更无消息。空怅望，山川形胜，已非畴昔。王谢堂前双燕子，乌衣巷口曾相识。听夜深寂寞打空城，春潮急。　思往事，愁如织。怀故国，空陈迹。但荒烟衰草，乱鸦斜日。玉树歌残秋露冷，胭脂井坏寒螿泣。到如今惟有蒋山青，秦淮碧。小

阑干云。去年人在凤皇池，银烛夜弹丝。沉水香消，梨云梦暖，深院绣帘垂。　今年冷落江南夜。心事有谁知！杨柳风柔，海棠月澹，独自倚阑时。"俊逸雅令，足以嗣响清真。

张翥，仕履见前。著有《蜕岩词》二卷。翥幼从父官于杭，与贞居子、张伯雨俱学于仇山村之门。故其词笔俊雅不凡，足继白石、梅溪、草窗、玉田诸公之后。其《沁园春·广陵九日与刘士幹、成元璋泛舟邗沟》云："何许登临，路绕芜城。冈连楚皋，爱流云低响。歌催琼树，微波照影。人艳仙桃，松院移尊。柳桥携袖，随处兰舟且暂捎。秋无际，望空江雁远，落木天高。　不妨左手持螯，更右把金尊送浊醪。叹鸡台草暗，凄然兴废，龙山烟冷，老矣英豪。白发宁饶，黄花尽插，要裹西风破帽牢，刘郎醉，把吴笺笑擘，试与题糕。"

张雨，事迹见前。著有《贞居词》。其《浪淘沙自序》云："周晋仙讳文璞者，有词云：'还了酒家钱，便好安眠。大槐宫里著貂蝉。行到江南知是梦，雪压渔船。　盘礴古梅边，也信前缘，鹅黄雪白又醒然。一事最奇君听取，明日新年。'晋仙，宋南渡末名士，一号方泉老人。此词鲜于困学每爱书之。百年后，方外士张雨追和一章，以为笑乐，惜困学公不能为我赏音。"词云："抛下杖头钱，取次高眠。玉梅金缕孟家蝉。说著钱塘都似梦，懒问游船。　谁信酒垆边，别有仙缘，自家天地一陶然。醉写桃符都不记，明日新年。"词品之高，适如其人。

舒頔，字道原，绩溪人。年十五六，与同郡程文讲明经史之学。后至元中，辟贵池教谕。秩满，转台州学正，遭逢世乱，奉亲归遁山中。尝避寇岩谷被执，頔正色叱贼，贼感而释之。其诗盘郁苍古，不染纤巧织衽之习。书法尤朴拙，识者以为得汉隶法。学者称贞素先生。著有《华阳贞素斋集》，附词。其《满江红自序》："时雪快晴，苗民攻宣，未克往来，郡邑间扰攘尤甚。宪府移司于徽，视而不问。叹时事之靡宁，哀生灵之涂炭，因赋此曲。"词云："天也多情，巧幻出

天河寒水。多态度悠悠飏飏，轻粘窗纸。万里岂无祥瑞应，四方已在饥寒里。把溪山好处纵模糊，须臾耳。　江海阔，风尘起，狐兔狡，鹰鹯耻。假蛮夷威柄，侵渔而已。诸老忠良皆柱石，九重仁圣真天子。待明朝晴霁看青山，清如洗。”其望治之思，溢于言表。

朱晞颜，字景渊，长兴人。著有《瓢泉吟稿》，词附。其《满庭芳·和赵仲敬咏雪》云：“剪水飞花，裁冰作絮。龙宫不管严寒。斜侵风帽，吟鬓忽衰残，谁念梁园倦客，黄金尽作赋才悭。飘流久，寒欺敝褐，犹是马蹄间。　儿时曾从猎，呼鹰野外，落雁云端。猛呼酒霜鞲湿遍红鸳，倚马酣歌秦妓，紫貂暖不上裘船。今迟暮，翩翩孤剑，寂寞渡桑乾。”具有白石、玉田风骨。

张埜，字古夫，邯郸人。著有《古山乐府》二卷。临川李长翁序之云：“仆游京师，古山张公一见招置馆下。灯窗雪案，披诵公所著乐章。湛然如秋空之不云，烨然如春华之照谷，凄然如猿啼玉涧，昂然如鹤唳清霄，砉然如庖丁鼓刀，翩然如公孙舞剑。千变万态，意高语妙，真可与苏、辛二公齐驱并驾！”其《八声甘州·戊申再到西湖》云：“忆湖光醉别几春秋。飘泊寓京师，恨无穷烟水，无情岁月，无限相思。万里风沙梦觉，山色碧参差。忙对玻璃镜，照我尘姿。　欲写从前离阔，便安排画舸，准备新诗。见六桥遗构，烟雨强撑支。怨东风红消翠减，比向来浑是老西施。如何得刘郎双鬓，长似当时。”

倪瓒，字元镇，无锡人。尝自谓“懒瓒”，亦曰“倪迂”。工诗善书画，所居曰清閟阁。有洁癖，盥濯不离手。家本素封，至正初，忽散其财给亲友故人，咸怪之。未几兵起，富室悉被祸，瓒扁舟蓑笠，往来江湖上，独免于难。著有《清閟阁集》。其《江城子·感旧》云：“窗前翠影湿芭蕉。雨潇潇，思无聊。梦入故园山水碧迢迢。依旧当年行乐地，香径杳，缘苔饶。　沉香火底坐吹箫，忆妖娆，想风标，同步芙蓉花畔赤栏桥。渔唱一声惊梦觉，无觅处，不堪招。”殊洒脱可喜。

谢应芳，仕履见前。其《水调歌头自序》云：“余卜居千墩，尝作

《水调歌头》。今也人事乘违，欲还故土，故复和前韵，以述其情，并以留别吴下诸友。”词云：“齿牙豁来久，老气尚横秋。买得归耕黄犊，儿辈幸无愁。相近六龙城下，只在三家村里，结屋小如舟。倚树览山色，且免赋登楼。　看官爵，都不似，醉乡侯。里翁闲话，便同学士坐瀛洲。寄语东吴朋友，乘兴能来隔浦，舣棹听渔讴。无酒不须虑，解我破貂裘。”又《菩萨蛮·七夕作》云：“锋棱磨尽方藏拙，老怀羞对天孙说。风叶动清商，依稀似九章。　飘萧双鬓雪，卧看弯弯月。月缺有时圆，人无再少年。”其恬淡自适之趣，可与梅花道人、清閟阁主颉颃矣。

邵亨贞，字复孺，号清溪，华亭人。有《蛾术词选》四卷。有隆庆壬申四明沈良臣后序，称复孺元末人，博通敏赡，虽阴阳、医卜、佛老书，靡不精核。训导松江府学，以子诖误戍颍上，久乃赦还，卒年九十三。自著者名《野处集》，其《摸鱼子·吴门客中九日次魏彦文韵》云：“雁来时晚寒初劲，青灯摇动窗户，商声暗起邻墙树，触景乱愁还聚。秋又暮，奈四野凄凉，无处无笳鼓，狂吟醉舞。记满帽簪花，分筹藉草，骑马忘归路。　怀人远，有恨凭谁寄语，虚名长是相误。天涯节序浑非旧，留得满城风雨。心万缕，漫自喜孤高，不惹沾泥絮。羁怀倦诉，好分付儿曹。耘耔三径，早晚赋归去。”集中慢词大率类此，均饶有二窗笔致。谁谓词衰于元耶！

第四节　曲　家

元之文学，见重于世者，曲也。曲之为艺，虽曰小道，其难实倍于诗词。何以言之？诗之近体，求其格律声调，古体求其气韵风骨而已。欲与汉、魏、唐、宋作家，驰骋文坛，固非易事，若论初步，则平仄妥适，格调工稳，已斐然可观。至词虽有短调、中调、长调之别，苟能清词丽句，悉中律调，则步武花间，继踪两宋，非难事也。曲则不然。由小令而散套而杂剧而传奇，递推递进，历一境自有一境之程。

作曲者于平仄四声而外，又须顾及字之清浊高下，宜阴者不可填以阳声，宜阳者不可填以阴声。此种束缚，一似重茧。加以曲牌名目，千百类聚；宫调配属，南北异宜。一有乖违，千夫指摘。苟非洞明窍要，不足以言曲也。顾作曲如是之难，几令人望尘却步。然明于个中三昧，亦有乐事可寻。譬如帝王神仙，非凡人所能为也。而作曲者，不妨以一身兼之：时而帝王，则万国衣冠，纶綍立施；时而神仙，则九天珠玉，咳吐生风。推而至于万汇品类，莫不出之以维妙维肖之言论，所谓以生花灿舌之笔，寄其怡情悦性之趣者是也。且其定律，亦有较他种文字为宽者。例如作赋，通篇不得有重韵；曲则不拘也，往往前曲所押之韵，于后曲中重押，不足为病。又诗文作法，须一意到底；曲则以出之关目为变化，故曲文前后不连属，不相害也。是曲律虽严，未尝不有通融之处。凡此准则，皆是元人倡之。元人之曲，上自士大夫，下至倡夫，无不为也。为之未尝不工，风飙云举，遂擅一代之长。后之谈文学史者，乃与楚骚、汉赋、唐诗、宋词，连类而并称，有以哉！

元之曲，皆有所本。宋之词及大曲，为其胚胎；金之院本、挡弹词，为其雏形。试分别言之。小令则作曲一支，与词无甚区别，仅词句间加以衬字而已。联散曲而成一套，谓之散套。散套所用曲牌，在一宫调中，审其缓急，定其先后，或用尾声，或不用尾声，其连络次序，与宋之大曲相彷佛焉。杂剧则一本四折为通例，五折为变例。在一折中，必一调一韵，与散套无异。扮演剧文，与院本无异，有白有唱，与挡弹词无异。所异者，其体为代人立言也。至于联数十套之曲，汇成一本，是曰传奇。传奇之作，南曲为多，体制自由：（一）出目之多少不拘；（二）每出无一定之宫调，视排场为转移；（三）破一人独唱之例；（四）楔子易以家门；（五）篇末必有下场诗。此体盛行，已在元末。要而言之，小令、散套，则为自抒胸襟之作；杂剧、传奇，则全是代人立言之作。此其大别也。其间作者，据王国维《宋元戏

曲史》云："元初名臣中，有作小令套数者。唯杂剧之作者，大抵布衣，否则为省掾令史之属。蒙古、色目人中，亦有作小令套数者。而作杂剧者，则唯汉人。盖自金末重吏自掾史出身者，其任用反优于科目。至蒙古灭金，而科目之废，垂八十年，为自有科目来未有之事。故文章之士，非刀笔吏无以进身。则杂剧家之多为掾史，固自不足怪也。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及臧懋循《元曲选序》均谓蒙古时代曾以词曲取士。其说固诞妄不足道，余则谓元初之废科目，却为杂剧发达之因。盖自唐、宋以来，士之竞于科目者，已非一朝一夕之事，一旦废之，彼其才力无所用。而一于词曲发之，且金时科目之学，最为浅陋。此种人士，一旦失其业，固不能为学术上之事，而高文典册，又非其所素习也。适杂剧之新体出，遂多从事于此。而又有一二天才出于其间，充其才力。而元剧之作，遂为千古独绝之文字。据是言之，则元剧之发达，转因科举之废，遂使蒙古异族，入主中夏，亦得文学之光荣。此事之不可逆料者也。余尝读元钟嗣成《录鬼簿》，知其盛衰，可分三时期也：(一)蒙古时代，自太宗取中原，至世祖至元一统之初。此四十余年，作者最盛，著作之存留亦多。即钟书所谓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二)一统时代，自世祖至元十六年，至顺帝后至元时。此五十余年，除二三名家外，不多觏焉。即钟书所谓方今已亡名公才人，余相知者，及已死才人不相知者。(三)为顺帝至正二十七年间，作者更罕，作品亦如强弩之末，卑卑不足道矣。即钟书所谓方今才人相知者，及闻名而不相知者也。综是三时，较而录之，亦一代文学得失之林也。爰本《录鬼簿》参以明宁献王《太和正音谱》，将其作家择要而陈。至于作品，则小令套数，间登一二。杂剧则限于篇幅，取其一二支，聊作管中之窥豹云尔。

刘秉忠，仕履见前。秉忠自遇世祖，功名事业，载在史册，兹可无论矣。其词曲亦婉丽可诵。其《干荷叶》曲云："干荷叶，色苍苍，

老柄风摇荡。减清香，越添黄，都因昨夜一番霜，寂寞秋江上。”此为秉忠自度曲咏干荷叶，即用干荷叶为牌名，犹是唐辞之意。又有一首《吊南宋》云：“南高峰，北高峰，惨淡烟霞洞。宋高宗，一场空，吴山依旧酒旗风，两度江南梦。”此为借腔别咏，其曲凄恻感慨，千古寡和。又《三奠子曲》云：“念行藏有命，烟水无涯。嗟去雁，羡归鸦，半生身累影，一事鬓成华。东山客，西蜀道，且回家。(么篇云)壶中日月，洞里烟霞，春不老，景长佳，功名眉上锁，富贵眼前花。三杯酒，一觉睡，一瓯茶。”亦如置身羲皇以上，而无与尘世之纷华也。

商挺，字孟卿，别字左山，曹州济阴人。其先本姓殷氏，避宋讳改焉。挺年二十四，汴京破，北走，依冠氏赵天锡。与元好问、杨奂游。元初为行台幕官，为京兆宣抚司郎中。中统三年，改宣抚司为行中书省，遂佥行省事。明年，进参知政事，坐言事罢。起为四川行枢密院事，累迁副使。至元九年，出为安西王相。十五年，王薨。十七年，王府相罢，坐事得免。二十年，复为枢密副使，寻以疾辞。二十五年薨，年八十，赠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鲁国公，谥文定。元初西北巨公，如杨西庵之蕴藉、姚雪斋之才鉴、王鹿庵之品洁一世、商左山之凝重朝右，皆为词林所宗，惜全集散亡，未窥全豹，而左山作，流传更少。今录其数曲，俾读者知元朝文章气运之盛，皆开国诸公有以启之也。散曲有《步步娇》十九首最著。今录其四：“绿柳青青和风荡，桃李争先放。紫燕忙，队队衔泥戏雕梁。柳丝黄，堪画在帏屏上。”又云：“闷向危楼凝眸望，翠盖红莲放。夏日长，萱草榴花竞芬芳。碧纱窗，堪画在帏屏上。”又云：“败柳残荷金风荡，寒燕声嘹亮。闲盼望，红叶皆因昨夜霜。菊今黄，堪画在帏屏上。”又云：“暖阁偏宜低低唱，共饮羊羔酿。宜醉赏，金池蜡梅香。雪飞扬，堪画在帏屏上。”

王元鼎，字里无考。以曲得重名。有《折桂令》一支，咏桃花马云：“问刘郎骥控亭槐。觉红雨萧萧，乱落苍苔，溪上笼归，桥边洗

罢，洞口牵来。摇玉辔春风满街，摘金鞍流水天台，锦绣毛胎，嘶过玄都，千树齐开。”时歌儿郭氏顺时秀者，为刘时中所赏，与元鼎交密，偶有疾，思马版肠充馔。元鼎即杀所骑五花马，取肠以供，都下传为佳话（后《绣襦记》借用此事）。其时中书参政为阿鲁温，尤属意于郭，至则戏谓之曰：“我比王元鼎何如？”对曰：“参政宰相也，元鼎才人也。燮理阴阳，致君泽民，则学士不及参政；嘲风咏月，惜玉怜香，则参政不如学士。”阿鲁温大笑而罢。事见《尧山堂外记》。

杨果，字正卿，祁州蒲阴人。金正大中，登进士第。元初，起为幕官，官至参知政事，谥文献。有《西庵集》。《太和正音谱》评其词如花柳芳妍。兹录其《小桃红·咏采莲女》三支，其一云：“采莲湖上采莲娇，新月凌波小。记得相逢对花酌，那妖娆，殢人一笑千金少。羞花闭月，沉鱼落雁，不恁也魂消。”其二：“采莲人唱采莲词，洛浦神仙似。若比莲花更强似，那些儿，多情怕解风流事。淡妆浓抹，轻颦微笑，端的胜西施。”其三：“采莲湖上采莲人，闷倚兰舟问。此去长安路相近，恨刘晨，自从别后无音信。人间好处，诗筹酒令，不管翠眉颦。”

盍志，字西村，盱眙人。官至学士。《正音谱》评其词如清风爽籁。生平以散曲著名。其越调《小桃红·鲸川八景》八首，又《杂咏》八首、仙吕《醉中天》八首均佳。兹录《醉中天》第一支，以见一斑。词云：“粉面如花朵，云髻绾香螺，眉拂春山翠碧波，唇坠樱桃颗。一捻腰肢袅娜，宜行宜坐，强如月里姮娥。”

胡紫山，以字行，又号少凯。籍贯失考。官至宣慰使。《正音谱》评其词，如秋潭孤月。词不多见。时有歌儿珠帘秀朱氏，姿容姝丽，杂剧为当时第一，紫山极钟爱之，尝谱《沉醉东风》一支以赠云：“锦织红边翠竹，绒穿海上明珠。月淡时，风清处，都隔断落红尘土。一片闲情任卷舒，挂尽朝云暮雨。”由是其名益彰。

张养浩，字希孟，号云庄，济南人。官至陕西行台中丞，谥文忠。

有《归田类稿》。《正音谱》评其词如玉树临风。兹录其中吕《红绣鞋》、《警世》二首。其一:"才上马齐声儿喝道,只这的便是那送了人的根苗,直引到深坑里恰心焦。祸来也何处躲?天怒也怎生饶?把旧来时威风不见了。"其二:"正胶漆当思勇退,到参商才说归期,只恐范蠡、张良笑人痴。腆著胸,登要路,睁著眼履危机,直到那其间谁救你?"其胸懐恬退,有如此者。

卢挚,仕履见前。挚不仅以诗文见长,所作词曲,亦疏朗有致,与刘秉忠齐名。有珠帘秀者,为当时官伎。挚于送别时,曾作双调《落梅风》一支云:"才欢悦,早间别,痛杀俺好难割舍。画船儿载将春去也,空留下半江明月。"可谓一往情深矣。然挚不第以情韵见长,亦有感喟苍凉之作。其《折桂令·怀古》十八支,类皆感慨淋漓。兹录其《邺下怀古》一首:"笑征夫伏枥悲吟,才鼎足功成。铜爵春深,鼓动歌残,天愁梦断,明月西沉。算只有韩家画锦,对山川辉映来今。乔木空林,几度西风,感慨登临。"

姚燧,仕履见前。燧以古文词名世,曲则不经见。顾其所作,亦婉丽可诵。其《凭栏人·寄征衣》曲云:"欲寄君衣君不还,不寄君衣君又寒。寄与不寄间,妾身千万难。"深得词人三昧。其双调《拨不断春景》,亦佳。词云:"草萋萋,日迟迟,王孙士女春游戏。宫殿风微燕雀飞,池塘沙暖鸳鸯睡,正值著养花天气。"

徐琬,字子方,号容斋,一号养斋,又自号汶叟,东平人。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卒谥文献。其《怨别》一套甚佳,篇长不备录,兹录其尾声:"几时得柔条儿,再接上连枝树。暖水儿重温活比目鱼,那的是着人断肠处。窗儿外夜雨,枕边厢泪珠。则我这一点芳心做不得主。"

不忽木,一名时用,字用臣,世为康里部人。康里,即汉高车国也。父燕真,从世祖征伐有功。不忽木资禀英特,进止详雅,世祖奇之,命给事东宫,师事赞善王恂、祭酒许衡。至元十四年,授利用少

监。十五年，出为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终世祖世，拜平章政事。成宗即位，拜昭文馆大学士。大德四年卒。武帝时追谥文贞。《正音谱》评其词如闲云出岫。其《辞朝》散套中《鹊踏枝》云："醉江楼，卧山丘，淡笑虚名。小子封侯，仕路上为官倦手，沉埋了锦带吴钩。"其铢视轩冕，尘视金玉，要是不可及。

青山骨可埋。若说旧时豪侠兴，五陵衣马洛阳街。"纪其实也。杨循吉苏谈曰："阿瑛好事以故国王孙，作新朝显宦，风流文采，辉映一时。世传其尝欲置妾，以小词调管夫人云："我为学士，你作夫人。岂不闻陶学士有桃叶、桃根，苏学士有朝云、暮云？我便多娶几个吴姬、越女，有何过分？你年纪已过四旬，只管占住玉堂春。"夫人答云："你侬我侬，忒煞情多，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捻一个你，再捻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叶果）。"此词各家笔记，多已载过。所以不忍弃者，以其词妙也。惟不知曲名耳。

白无咎，字里未详。官学士。《正音谱》评其词如太华孤峰。又云："孑然独立，岿然挺出，若孤峰之插晴昊，使人莫不仰视也。"宜乎高荐。无咎以散套名，无剧。其《鹦鹉曲》尤为人传诵，词云："侬家鹦鹉洲边住，是个不识字渔父。浪花中一叶扁舟，睡煞江南烟雨。（么篇云）觉来时满眼青山，抖擞绿蓑归去。筭从前错怨天公，甚也有安排我处！"

冯子振，字海粟，攸州人，自号怪怪道人。仕为承事郎，集贤待制。与天台陈孚刚中友善，刚中极敬畏之，自以为不可及。子振所作曲至多，以和白无咎《鹦鹉曲》为最著。其自序云："余壬寅岁留上京，有北京伶妇御园秀之属，相从风雪中。恨此曲无续之者，且为前后多亲炙士大夫，拘于韵度，如第一个'父'字，便难下语。又'甚也有安排我处'，'甚'字必须去声字，'我'字必须上声字，音律始谐，

不然不可歌。此一节又难下语。诸公举酒索余和之，以汴吴、上都、天京风景试续之。”今摘录一支。《山亭逸兴》云：“嵯峨峰顶移家住，是个不唧嗰樵父，烂柯时树老无花，叶叶枝枝风雨。（么篇云）故人曾唤我归来，却道不如休去。指门前万叠云山，是不费青蚨买处。”洵戛戛独造语。

虞集，仕履见前。集在翰苑时，宴散散学士家，有歌儿顺时秀者，唱《折桂令》，一句而两韵，名曰“短柱”，极不易作。集爱其新奇可喜，时席上适谈及三国蜀汉事，即依调赋之云：“鸾舆三顾茅庐，汉祚难扶。日暮桑榆，深渡南泸。长驱西蜀，力拒东吴。美乎周瑜妙术，悲夫关羽云殂。天数盈虚，造物乘除。问汝何如？笑赋归欤。”两字一韵，平仄通押。较一句两韵者，其难倍蓰矣。先生道义文章，照耀千古。出其余绪，尤能工妙若此。洵乎天才不可多得也！

鲜于枢，字伯机，渔阳郡人。至元间，为浙江行省都事，官至太常典簿。有《困学斋集》。枢以书名擅一代，文章政事，皆为所掩。即以政事论，任行省都事时，意气雄豪。晨出载笔牍，与其长廷争是非，一语不合，辄欲拂袖而去，亦可见其风骨。至于文章，则虞道园曾题其画像，谓“敛风沙裘剑之豪，为湖山图史之乐。翰墨比米、蔡而有余，风流拟晋、宋而无怍”。可以想其风致矣。所作散曲不多，《八声甘州·江天暮雪》一套，最著名。《太和正音谱》载其《大安乐》一支，今录之。词云：“后人笑我愚和戆，潇湘影里且徜徉。不谈刘项与孙庞，近小窗，谁羡碧油幢。”子去矜，字必仁，平生以散曲著。《尧山堂外纪》录其《寨儿令》一支，甚佳。词云：“汉子陵、晋渊明，二人到今香汗青。钓叟谁称？农父谁名？去就一般轻。五柳庄月白风清，七里滩浪稳潮平。折腰时心已愧，伸脚处梦先惊。听千万古圣贤评。”馀不多见。《正音谱》评其词如奎壁腾辉。尝与海盐杨氏昆仲（长国材、次少中，为康惠公之子）善，尽以乐府作法授之。故杨氏家乐，有海盐腔之名，皆去矜教之也。

刘致，字时中，号逋斋，石州宁乡人。广东怀集令彦文字。致初任永新州判，历翰林待制，出为浙江行省都事卒。贫无以为葬，王真人寿衍，躬往吊哭，周其遗孤，举其柩，葬于德清县，与己之寿穴相近，春秋祭扫不怠。其曲以《水仙子》四支最著盛名。自序曰："'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玉局翁诗也。填词者窃其意，演作世所传唱《水仙子》四首，仍以'西施'二字为断章。崧麓有樵者，闻而是之，即以春夏秋冬赋四章，命之曰'西湖四时渔歌'，共约首句韵，以'儿'字'时'字为之，次'西施'二字为句绝。然后一洗而空之。邀同赋，谨如约。"今录其曲云："湖山堂下闹竿儿，烂熳韶华三月时。朝来风雨催春事，把莺花撺断死。映苏堤红绿参差，浅绛雪缬桃萼，嫩黄金搓柳丝。风流呵，斗草的西施。"又云："虾须帘卷水亭儿，玉枕桃笙睡起时。荷香勾引薰风至，掬清涟雪藕丝。嫩凉生璧月琼枝，鸾刀切银丝脍，蚁香浮碧玉卮。受用呵，避暑的西施。"又云："西风逗入北窗儿，一扇新凉暑退时。白蘋红蓼多情思，写秋光无限诗。占平湖树抹胭脂，云拥扇青摇柄，粟飘香金缀枝。快活啊，玩月的西施。"又云："梅花初试胆瓶儿，正是逋郎得句时。同云把断山中寺，软香尘不到此。怯清寒林下风姿，侵素体添肌粟，妒云鬟老冰丝。清绝呵，赏雪的西施。"

贯云石，阿里海涯之孙。父名贯只哥，云石遂以贯为氏，字酸斋。年十二三，膂力绝人。使健儿驱三恶马疾驰，持槊立而待，马至腾上之，越二而跨三，运槊生风，观者辟易。或挽强射生逐猛兽，上下峻阪如飞，诸将咸服其矫捷。稍长，折节读书。初袭父官，为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镇永州。一日，解所绾黄金虎符，让弟忽都海涯佩之，北从姚燧学。燧见其古文峭厉有法，及歌行古乐府慷慨激烈，大奇之。俄选为英宗潜邸说书秀才。仁宗践祚，拜翰林侍读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乃称疾辞，还江南。泰定元年五月八日卒，年三十九。赠集贤学士，中奉大夫护军，追封京兆郡公，谥文清。

酸斋晚年，为文日邃，诗亦冲淡。草隶等书，变化古人，自成一家。其视死生若昼夜，绝不入念虑。临终有《辞世诗》云："洞花、幽草结良缘，被我瞒他四十年。今日不留生死相，海天秋月一般圆。"洞花、幽草，盖二妾名也。酸斋休官辞禄后，或隐屠沽，或侣樵牧。常于临安市中，立碑额，货卖第一人间快活丸。人有买者，展两手大笑示之。领其意者，亦笑而去。一日，钱塘数衣冠士人，游虎跑泉，饮间赋诗，以泉字为韵。中一人但哦"泉泉泉……"久不能就。忽一叟曳杖而至，应声曰："泉泉泉，乱进珍珠个个圆。玉斧斫开顽石髓，金钩搭出老龙涎。"众惊问曰："公非贯酸斋乎？"曰："然然然。"遂邀同饮，尽醉而去。其依隐玩世多类此。生平不作杂剧，以套数小令著。《正音谱》评其词如天马脱羁。时与徐再思甜斋齐名，后人集之，名曰"酸甜乐府"云。

萨多剌，仕履见前。萨以诗名，曲亦不愧作家。《正音谱》评其词如天风环佩。其所作《伎女蹴踘》一套，最脍炙人口。中有《梁州第七》一支尤佳，词云："素罗衫垂彩袖低笼玉笋，锦靿袜衬乌靴款蹴金莲。占官场立站下人争羡，似月殿里飞来的素女，甚天风吹落的神仙。拂花露榴裙荏苒，滚香尘绣带蹁跹。打着对合扇拐全不斜偏，踢着对鸳鸯扣且是轻便。对泛处使穿肷抹膝的撺搭，撄俊处使拂袖沾衣的撇演，妆翘处使回身出鬓的披肩。猛然笑喘，红尘两袖纤腰倦。越丰韵，越娇软，罗帕香匀粉汗妍，拂落花钿。"读此词，可谓形容尽致矣。

杨梓，字失考，海盐澉浦人。至元末，以从征爪哇功，为安抚总使，后为杭州路总管。卒谥康惠。梓性节侠风流，尤善音律。与贯云石交善，得其乐府之传。杂剧中《豫让吞炭》、《霍光鬼谏》，皆其手制，教家僮歌之。州人传其家法，以能歌闻于浙右，即俗所谓海盐腔也。今录其《豫让吞炭》第四折中吕《上小楼》："说着呵心头怒拥，无处发送。恨塞长空，气结秋云，泪洒西风。将俺主公头作器皿，筵前

使用，则你道波俺这为的痛也不痛？（么）你道顺天者昌，逆天者凶。我怎肯二意三心，背义忘恩，有始无终？者么教鼎镬烹、铁钺诛、凌迟苦痛，休想俺这铁心肠，半星儿改动。”

以上名公钜卿，于文章政事外，寓情乐府，出其绪余，亦能刻画宫商，以为娱乐。盖由于和顺积中，英华自然发于外也。最而录之，以冠斯篇。

庾天锡，字吉甫，大都人。中书省掾，除员外郎，中山府判。《正音谱》评其词，如奇峰散绮。所作杂剧十五种，今皆不传。惟《南昌怀古》一套，尚存《阳春白雪》中，录见一斑：“（商角调黄莺儿）怀古怀古，物换千年，星移几度。想当日帝子元婴，阎公都督。（踏沙行）彩射龙光，云埋铁柱。迷津烟暗，度水平湖。高士祠堂，旌阳殿宇，洪恩路，藕花无数。（盖天旗）残碑淋雨，留得王郎佳句。信步携笻，登临闲伫。雁惊寒，衡阳浦，秋水长天，落霞孤鹜。（应天长）东接吴，南甸楚。绀坞荒村，苍烟古木。俯挹遥岑伤未足，夕阳暮。空无语，昔人何处？（尾声）孤塔插晴空，高阁临江渚。栋飞南浦云，帘卷西山雨。观胜概，壮江山，叹鸣銮，罢歌舞。”

马致远，号东篱。江浙行省务官。所作杂剧有十四种，今存者，为《青衫泪》、《岳阳楼》、《陈抟高卧》、《汉宫秋》、《荐福碑》、《任风子》六种。《正音谱》评其词如朝阳鸣凤。又云：“其词典雅清丽，可与灵光、景福相颉颃，有振鬣长鸣、万马皆喑之意。又若神凤飞鸣于九霄，岂可与凡鸟共语哉！宜列群英之上。”当时乐府，盛称关、马、郑、白。关为关汉卿，马为马东篱，郑为郑德辉，白为白仁甫。四家之词，直如钧天韶武之音，后有作者，不易及也。臧晋叔《元曲选》所录四家词至多，学者可以读之。汉卿、仁甫事迹已见金代。东篱以《秋思》一套负盛名，周德清评为元人之冠。录之如下：“（双调夜行船）百岁光阴一梦蝶，重回首往事堪嗟。昨日春来，今朝花谢，急罚盏夜阑灯灭。（乔木查）想秦宫汉阙，都做了衰草牛羊野。不恁么渔

樵无话说，纵荒坟横断碑，不辨龙蛇。(庆宣和)投至狐踪与兔穴，多少豪杰。鼎足三分半腰折，知他是魏耶？晋耶？(落梅风)天教富，莫太奢，没多时好天良夜。看财奴硬将心似铁，空辜负锦堂风月。(风入松)眼前红日又西斜，疾似下坡车。晓来青镜添白雪，上床与鞋履相别。休笑俺巢鸠计拙，葫芦提一恁妆呆。(拨不断)利名竭，是非绝，红尘不向门前惹，绿树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补墙头缺，竹篱茅舍。(离亭宴带歇拍煞)蛩吟一觉才宁贴，鸡鸣万事无休息，争名利何年是彻！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急攘攘蝇争血。裴公绿野堂，陶令白莲社。爱秋来那些，和露摘黄花，带霜烹紫蟹，煮酒烧红叶，人生有限杯。几个登高节，分付俺顽童记者，便北海探吾来。道东篱醉了也。"此外如越调《天净沙》一支，直空今古。词云："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明人最喜摹仿此曲，而终无如此自然。故余以为不可及者此也。

李直夫，女真人。德兴府住，即蒲察李五。官至湖南廉使，与元明善交好。《正音谱》评其词如梅边月影。作剧十二种，今仅存《虎头牌》一种。今录其第四折第一支："(正宫端正好)则为他误军期，遭残害，依国法断的明白。寻思来这期亲尊长多妨碍，俺今日谢罪也在宅门外。"

李寿卿，名无考，太原人。将仕郎，除县丞。《正音谱》评其词如洞天春晓。又云："其词雍容典雅，变化幽玄，造语不凡。非神仙中人，孰能致此！"所作杂剧十种，今存《伍员吹箫》、《月明和尚》二种。今录《伍员吹箫》第四折第一支："(双调新水令)困红尘十载受驱劳，常记得走樊城那时年少。虽不能千金酬节侠，我也曾四海结英豪。投至得末尾三梢，不觉的头上老来到。"

宫天挺，字大用，大名开州人。历学官，除钓台书院山长。为权豪所中，事获辨明，亦不见用。卒于常州。钟嗣成云："先君与之莫

逆交，故余常得侍坐，见其吟咏。文章笔力，人莫能敌。乐章歌曲，特余事耳。”《正音谱》评其词如西风雕鹗。又云：“其词锋颖犀利，神彩烨然。若健翮摩空，下视林薮，使狐兔缩颈于蓬棘之势。”所作杂剧六种，今存《范张鸡黍》。

李致远，仕履不详。有杂剧一种，曰《还牢末》。散曲除《乐府群玉》所载小令外，《太平乐府》载散套四套。《正音谱》评其词如玉匣昆吾。今录其《朝天子·秋夜吟》一首：“梵宫晚钟，落日蝉声送。半规凉月半帘风，骚客情尤重。何处楼台笛声悲动？二毛班，秋夜永。楚风几重，遮不断的相思梦。”

郑光祖，字德辉，平阳襄陵人。以儒补杭州路吏。为人方直，不妄与人交。卒葬西湖。所作声振闺阁，伶伦辈称“郑先生”，皆知其为德辉也。《正音谱》评其词如九天珠玉。又谓其词“出语不凡，若咳唾落乎九天，临风而生珠玉，诚杰作也”。杂剧有十九种，今存《㑳梅香》、《周公摄政》、《王粲登楼》、《倩女离魂》四种。德辉所作《王粲登楼》一剧，其中《迎仙客》一支，极脍炙人口。词云：“雕檐红日低，画栋彩云飞，十二玉阑天外倚。望中原，思故国，感慨伤悲，一片乡心碎。”至其所作情词，亦自令黠可喜。如《㑳梅香》第一折《寄生草》：“不争琴操中单诉你飘零，却不道窗儿外更有个人孤另。”又《六么序》：“却原来群花弄影，将我来唬一惊。”此等语何等蕴藉！又《大石调·初问口》一支内云：“又不曾荐枕席，便指望同棺椁。（叶稿音）只想夜偷期，不记朝闻道。”又《好观音》一支内云：“上覆你个气咽声吞的张京兆，本待要填还你枕剩衾薄（叶跑音）。”语不着相，情意独至，真得词家三昧者。又第三折用“越调小桃红”，即为南曲先声也。词中有云：“是害得神魂荡漾，也合将眼皮开放，你好个热莽也沈东阳。”又《调笑令》云：“擘面的便抢白杀那病襄王，呀怎生来番悔了巫山窈窕娘。满口里之乎者也没拦挡，都喷在那生脸上。吓的那有情人恨无个地缝藏，羞杀也傅粉何郎。请学士休心劳意

攘，俺小姐他只是作要难当。”正是寻常说话，略带讥讪，中间意趣无穷。此便是作家手笔。又《倩女离魂》一剧，有《圣药王》一支云：“近蓼花，缆钓槎，有枯蒲衰草绿蒹葭。过水涯，傍浅沙，遥望见烟笼寒水月笼沙。我只见茅舍两三家。”如此等句清丽流便。全是本色。

金仁杰，字志甫，杭州人。钟嗣成云：“余自幼时闻公之名，未得与之见也。公小试钱谷，给由浙江，遂一见如平生欢，交往二十年如一日。天历元年戊辰冬，授建康崇宁务官。明年己巳正月叙别，三月，其二子护柩来杭，知公气中而卒。呜呼惜哉！作《凌波曲》以悼之。词云：‘心交元不问亲疏，契饮那能较有无？谁知一上金陵路，叹亡之，命矣夫。梦西湖何不归欤？魂来处，反故居，此梅花想更清癯。”仁杰作品，虽不奇丽，而其大概，多有可取焉！《正音谱》评其词如西山爽气。作剧七种，今存《萧何追韩信》一种。

鲍天佑，字吉甫，杭州人。《录鬼簿》云：“初业儒，长事吏。簿书之役，非其志也。跬步之间，惟务搜奇索古而已。故其编撰，多使人感动咏叹。余与之谈论节要，至今得其良法。才高命薄，今犹古也。竟至昆山州吏而止。”《正音谱》评其词如老蛟泣珠。作剧八种，皆不存。其正宫《白鹤子》一支，见《钦定曲谱》，标目为《尸谏卫灵公》第四折之一，亟录之，以见其鳞爪焉。词云：“四边风凛冽，一望雪模糊。行过小溪桥，迷却前村路。行行里心恍惚，前进也，意踌躇。我则道断岸有舟横，却元来野水无人渡。”

周文质，字仲彬。其先建德人，后居杭州，因家焉。体貌清癯，学问该博，资性工巧，文笔新奇。家世业儒，俯就路吏。善丹青，能歌舞，明曲调，谐音律。性尚豪侠，好事敬客。元统二年卒。有杂剧四种，《教女兵》、《杜韦娘》、《苏武还乡》、《唐庄宗》，均不存。所作散曲见《乐府群玉》，套曲见《太平乐府》。《正音谱》评其词如平原孤隼。今录其《思忆》一套：“（双调新水令）落红风里不闻声，叹东君渐成薄幸。却艳冶，又飘零，叶底残英。刚留住，惜花性。（乔牌儿）对

景愁倍增，追思旧行径。苏卿偏识临川令。俏心肠，忒志诚。（风入松）笑将风月好前程，轻付与俊书生。奈春晴庭院关不定，被东风吹满宸京。隐隐仙姬去也，悠悠环佩无声。（拨不断）柳青青，竹亭亭，观绝楼头潇潇景。想尽花间怯怯情，添沉心上厌厌病，都只为剖钗分镜。（一定银）寂寂黄昏户半扃，犹立闲庭，谁道下一言为定。俺执手到数千回，划地孤零。（离亭歇指煞）相逢常约西厢等，到来不奉东墙命。无言暗省，秦楼何夕彩云回，瑶琴昨日冰弦断，碧天今夜孤星耿，露寒衣袂轻，风定帘笼静。偏觉更长漏永，香消不暖梦蝶魂。月明应搅幽禽宿，灯青偏照离鸾影。谁将才子情，说与佳人听！今夜里休来俺梦境。纵知道枕儿单，也填不得被儿冷。"其艳丽处，不减《西厢》。

吴仁卿，字弘道，号克斋，人以"克斋先生"称之，蒲阴人。历任府判致仕。其所作《金缕新声》及杂剧五种，均失传。《正音谱》评其词如碧山明月，其佳可知也。今录其越调《咏元宵》四支："（紫花儿序）香馥馥绮罗还往，密匝匝车马喧阗，光灼灼灯月交辉。满街上王孙贵子，相携着越女吴姬。偏宜，风烛高张，照珠履果然豪贵。只疑是洞府神仙，闲游在阆苑瑶池。（小桃红）归来梅影小窗移，兰麝香风细，翠袖琼簪两行立。捧金杯，绛绡楼上笙歌沸。冰轮表里，通宵不寐，是爱月夜眠迟。（金蕉叶）拚沉醉频倾绿蚁，恣赏玩朱帘挂起，歌舞动欢声笑喜，一任铜壶漏滴。（尾）须将酩酊酬佳致，乐意开怀耍喜。但愿岁岁赏元宵，只这的是人生落得的。"其描写灯节景物，历历如绘，可喜也。

张可久，字小山，一作张伯远，字可久，号小山，庆元人。以路吏转首领官。生平不作杂剧，以散曲著名。著有《北曲联乐府》三卷，外集一卷，补遗一卷，《吴盐》一卷，《苏堤渔唱》一卷，《小山小令》二卷。终元一代，作曲之多，无出其右。余最爱其《一半儿调》，清词丽句，最擅胜场，兹录之如下。《秋日宫词》云："花边娇月静妆楼，叶底

沧波冷翠沟，池上好风闲御舟，可怜秋，一半儿芙蓉，一半儿柳。”又云：“数层秋树隔雕檐，万朵晴云拥玉蟾，几缕夜香穿绣帘。等潜潜，一半儿开门，一半儿掩。”又《酬耿子春海棠》词云：“海棠香雨污吟袍，薜荔空墙闲酒瓢，杨柳晓风凉野桥。放诗豪，一半儿行书，一半儿草。”又云：“梅枝横翠暮寒生，花淡纱窗浅月明，人倚画楼羌笛声。恼诗情，一半儿清香，一半儿影。”皆佳句也。《正音谱》评其词如瑶天笙鹤。又云：“其词清而且丽，华而不艳，有不吃烟火食气，真可谓不羁之材。若‘被太华之仙风，招蓬莱之海月’，诚词林之宗匠也。当以九方皋之眼相之。”其钦佩有如此者。

曹明善，衢州路吏，甘于自适。钟嗣成称其乐府“华丽自然，不在小山之下”。即赋《长门柳》二词者，词云：“长门柳丝千万结，风起花如雪。离别复离别，攀折更攀折。苦无多旧时枝叶也。”又云：“长门柳丝千万缕，总是伤心树。行人折嫩条，燕子衔轻絮。都不由凤城春做主。”按以上二词，见《尧山堂外纪》七十四卷。谓伯颜擅权之日，剡王彻彻都、高昌王帖木儿不花，皆以无罪见杀。山东宪吏曹明善，时在都下，作《岷江录》二曲，以风之，大书揭于午门之上。伯颜怒，令左右暗察得实，肖形捕之。明善出避吴中一僧舍，居数年，伯颜事败，方再入京云。

高克礼，字敬德，一说字敬臣，号秋泉，河间人。以荫入仕。曾任县尹，官至庆元理官。治政以清净为务，不为苛刻，以简淡自处。所作小曲、乐府，极为工巧。兹录其《黄蔷薇・过庆元贞》一支：“燕燕别无甚孝顺，哥哥行在意殷勤。三纳子藤箱儿问肯，便待要锦帐罗帏就亲。唬得我惊急列蓦出卧房门，他措支刺扯住我皂罗裙，我软兀刺好话儿倒温存。一来怕夫人情性哏，二来怕误妾百年身。”中多白话，此元曲本色也。

张鸣善，扬州人。任宣慰司令史。《正音谱》评其词如彩凤刷羽。又云：“藻思富赡，烂若春葩。郁郁焰焰，光彩万丈。可以为羽仪词

林者也。诚一代之作手，宜为前列。”所作杂剧二种，一为《包待制判断烟花鬼》，二为《党金莲夜月瑶琴怨》，今不传。小令除见《辍耕录》及《尧山堂外纪》外，《正音谱》载有二曲：一《北正宫·脱布彩》云：“草堂中夏日偏宜，正流金烁石天气。素馨花一枝玉质，白莲藕两弯琼臂。”二《小梁州》云：“门外红尘衮衮飞，飞不到鱼鸟清溪。绿阴高柳听黄鹂，幽栖意。俗客几人知？山林本是终焉计。用之行舍之藏兮。悼后世，追前辈，对五月五日，歌楚些吊湘累。”此协律之曲也。

以上为省掾台属，除张可久等一二人外，皆杂剧名家。想其退食自公，屏居斗室，创为悲欢离合之人事，吐其引商刻羽之雅词，不亦令人生羡乎？表而出之，用志一代文学之盛焉。

王鼎，字和卿，大都人也。与关汉卿同时，且相识。和卿数讥谑关，关虽极意还答，终不能胜。一日，王忽无疾而逝，而鼻垂双涕尺余，人皆叹骇。关来吊唁，询其由。或对云：“此释家所谓坐化也。”复问：“鼻悬何物乎？”或又对云：“此玉筋也。”关云：“我道你不识。不是玉筋是嗓。”咸发一大噱（凡六畜劳伤，则鼻中常流脓水，谓之嗓病。又爱讦人之短者，亦谓之嗓。）或戏关云：“你被王和卿轻侮半世，死后还得一筹。”关亦不与辩也。和卿滑稽佻达，传播四方。中统初，燕市有一胡蝶，其大异常。或以为仙蝶，娆王赋小曲一支。和卿遂拈《醉中天》小令云：“挣破庄周梦，两翅驾东风，三百处名园，一采一个空。难道风流种，唬杀寻芳蜜蜂？轻轻的飞动，卖花人扇过桥东。”又妓有于浴房中被打者，诉苦于王。王作《拨不断》一支云：“假胡伶，聘聪明。你本待洗腌臜，倒惹得不干净，精尻上匀排七道青。扇圈大膏药刚糊定，早难道假装无病。”其所作诸词，诙谐杂出，多半类此。

高文秀，东平人。府学生。早卒。《正音谱》评其词如金瓶牡丹。所作杂剧三十四种，今存《双献功》、《谇范叔》、《遇上皇》三种。所作

散曲不多见，仅《北宫词纪》卷五有《惜花春起早》一套，馀则《正音谱》载其南吕《草池春》一支，联叙古人名入曲，颇新奇。词云："自思忖，自议论，从混沌初分。耕田隐姓伊尹，聚萤读书车胤，会稽担柴买臣，淮阴乞食韩信，太公垂钓渭滨，伍员吹箫吴郡，孔子绝粮在陈，颜回甘贫守分，王陵沽酒待宾，相如题桥发愤，萧何司吏出身，樊哙屠户得运，高祖元是庶民，光武居在村镇。自古来朝中贤人，阃外将军，登基明君，开国功臣，谁不生在白屋寒门？当日苏秦，几曾胎胞里便带黄金印？千丈志，一跳身，独步青云。须为将相，定立功勋。"

王实甫，名无考，大都人。事实不概见。《正音谱》评其词如花间美人。又云："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极有佳句。若'玉环之出浴华清，绿珠之采莲洛浦'。所作杂剧十三种，今存二种：一《西厢记》，二《丽春堂》。《西厢记》之艳丽，臻于绝顶。金人瑞列之才子书中，以与左、庄、骚、迁、杜律相并，其名贵可知，无待赘述（金多窜改，余别有论著）。而《丽春堂》亦甚佳妙。其第一折首数支，极冠冕堂皇，录之如下："（仙吕点绛唇）破虏平戎，灭辽取宋。中原统，建四十里金墉，率万国来朝贡。（混江龙）端的是走轮飞鞚，车如流水马如龙。绮罗香里，箫鼓声中，盛世黎民歌岁稔，太平圣主庆年丰。正遇着蕤宾节届，今日个宴赏群公。光禄寺酝江酿海，尚食局炮凤烹龙。教坊司趋跄妓女，仙音院整理丝桐。都一时向御苑来供奉。恰便似众星拱北，万水朝东。（油葫芦）则见贝阙蓬壶一望中，从地涌，看了这五云楼阁日华东，恰似访天台误入桃源洞，端的便往扬州移得琼花种。胜太平独秀岩，冠神龙万寿峰。则他这云间一派箫韶动，不弱似天上蕊珠宫。"可见才人之笔，无所不能。同时若郑廷玉、吴昌龄、王伯成，所作剧本，均名重一时。

费君祥，大都人。与关汉卿交，有《爱女论》行于世。作剧已逸。其子唐臣，《正音谱》评其词如山峡波涛。又云："神风耸秀，气势纵

横。放则惊涛拍天，敛则山河倒影。自是一般气象，前列何疑。”所作杂剧三种，《斩邓通》、《韦贤籯金》已逸，惟《贬黄州》数支，散见《正音谱》。今日本西京大学，刻入《杂剧三十种》中。

杨朝英，字澹斋，青城人。曾选《阳春白雪》、《太平乐府》二集，为散曲渊薮。邀贯酸斋作序，贯曰：“我酸则子当澹矣！”遂自号“澹斋”云。《正音谱》评其词如碧海珊瑚。兹录其《题吴彩鸾写云轩》一支：“（越调小桃红）当年相遇月明中，一见情缘重。谁想仙凡隔春梦。杳无踪，凌风跨虎归仙洞。今人不见，天孙标致，依旧笑春风。”

刘庭信，为南台御史刘庭翰族弟，俗呼曰“黑刘五”是也。有《水仙子》二支，今录其一：“虾须帘控紫铜钩，凤髓茶闲碧玉瓯，龙涎香冷泥金兽。绕雕栏，倚画楼，怕春归绿惨红愁。雾濛濛丁香枝上，云淡淡桃花洞口，雨丝丝梅子墙头。”细腻流丽，亦不愧小山东篱也。

周德清，字挺斋，高安人。著有《中原音韵》一书。平声之分阴阳，自挺斋始之也。所作小令、散套，绰有大家风格。尝过庐山，赋《朝天子》云：“早霞晚霞，妆点庐山画。仙翁何处炼丹砂，一缕白云下。客去斋余，人来茶罢，叹浮生指落花。楚家、汉家，都做了渔樵话。”此词字字稳洽，移动不得一丝，固是斫轮老手。挺斋家况奇窘，时有断炊之虞。戏咏开门七件事《折桂令》云：“倚蓬窗无语嗟呀，七件儿全无，做什么人家。柴似灵芝，油如甘露，米若丹砂，酱瓮儿恰才梦撒，盐瓶儿又苦消乏，茶也无加，醋也无加。七件事尚且艰难，怎教我折柳攀花！”其贫可想见也。

侯克中，字正卿，镇定人。号艮斋先生，幼丧明，聆群儿诵书，不终日，能悉记之。稍长习词章，自谓不学可造诣。既而悔之，以为刊华食实，莫先于理，原《易》以求，乃为得之。于是精意读《易》，著有《大易通义》、《艮斋诗集》等书。正卿以散套得盛名，有《客中寄情》一套尤佳。兹录其二支：“（高过金盏儿）举金杯，倒金杯，金杯未倒心先醉。酒醒时候更凄凄，情似织，招揽下相思无尽期，告他谁。

（牡丹春）忽听楼头更漏催，别凤又孤凄。暂朦胧枕上重欢会，梦惊回又是一别离。”

任昱，字则明，四明人。少年狎游平康，以小乐章流布裙钗间。晚乃锐志读书。所作散曲，见于《乐府群玉》者至多。今录其《上小楼题情》云：“团圆未成，婵娟空病。桂子虚庭，翠羽围屏，雁足寒檠。巴到明，空自省，青楼薄幸，恨分开凤钗鸾镜。”又《朝天子信笔》云：“九霄，早朝，曾赴金门诏。珠玉在挥毫，胸次谁同调。谈笑枚皋，风流温峤，恣疏狂直到老。尽教醉了，走马长安道。”

范康，字子安，杭州人。钟嗣成谓其“明性理，善讲解，能词章，通音律。因王伯成有‘李太白贬夜郎’，乃编‘杜子美游曲江’。一下笔即新奇，盖天资卓异，人不可及也。”《正音谱》评其词如竹里鸣泉。所作剧二种，《杜甫游春》已逸，今存《竹叶舟》。录其第二折中之二支。一《新水令》云：“我曾向五湖四海自遨游，则我这拂天风两枝袍袖。唤灵童采瑞草，供仙子上瀛洲。散诞优游，叹尘世几昏昼。”又《梅花酒》云：“休待两鬓秋，与天子分忧，叹岁月如流，早白了人头。待献赋长杨临帝阙，我乘彩凤上瀛洲。俺三人是故友，一个吹玉笛对岩幽，一个倚银筝步沧洲，一个弹锦瑟上扁舟。”情节固佳，词亦不弱。

曾瑞，字瑞卿，大兴人。自北来南，喜江浙人才之多，羡钱塘景物之盛，因而家焉。神采卓异，衣冠整肃，优游于市井，洒然神仙中人。志不屈物，故不愿仕，自号褐夫。江淮之达者，岁时馈送不绝，遂得以徜徉卒岁。临终之日，诣门吊者以千数。钟嗣成谓其“擅丹青，能隐语小曲”。有《诗酒余音》行于世。今录其散套《催拍子》一支。词云：“爱共寝花间锦鸠，恨孤眠水上白鸥，月宵花昼。大筵排回雪韦娘，小酌会窃香韩寿。举觞红袖，玉纤横管，银甲弹筝，酒令诗筹。曲成诗就，韵协声律，情动魂消，腹稿冥搜，宿恩当受。水仙山鬼，月妹花妖，如还得遇，不许干休，会埋伏未尝泄漏。（么）群芳

会首，繁英故友，梦回时绿肥红瘦。荣华过可见疏薄，财物广始知亲厚。慕新思旧，簪遗佩解，镜破钗分，蜂妒蝶羞。恶缘难救，痼疾常发，业贯将盈，努力承头。冷飧重馅，口揺舌剑，吻搠唇枪，独攻决胜，混战无忧，不到得落人机彀。”

徐再思，字德可，嘉兴人。好食甘饴，故号“甜斋”。与贯酸斋齐名，有《酸甜乐府》行于世。其子善长，颇能继其家声。再思所作小令，余最爱其《水仙子》三支：一、《夜雨》云：“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三更归梦三更后。落灯花，棋未收，叹新丰孤馆人留。枕上十年事，江南二老忧，都到心头。”二、《红指甲》云：“落花飞上笋牙尖，宫叶犹将冰筋粘，抵牙关越显得樱唇艳。怕伤春不卷帘，捧菱花香印妆奁。雪藕丝霞十缕，镂枣斑血半点，掐刘郎春在纤纤。”三、《佳人钉履》云：“金莲脱瓣载云轻，红叶浮香带雨行，渍春泥印在苍苔径，三寸中数点星，玉玲珑环佩交鸣。溅越女红裙湿，沁湘妃罗袜冷，点寒波小小蜻蜓。”可谓语语俊，字字艳矣！《正音谱》评其词如桂林秋月云。

沈和，字和甫，杭州人。能词翰，善谈谑。天性风流，兼明音律。所作《潇湘八景》、《欢喜冤家》，皆用南北合套法，极为工巧。后居江州，江西人称为“蛮子关汉卿”是也。《正音谱》评其词如翠屏孔雀。作剧六种，今不传。

范居中，字子正，冰壶其号也，杭州人。父玉壶，前辈名儒，假卜术为业。居杭之三元楼前，每岁元夕，必以时事题于灯纸之上，杭人聚观，远近皆知父子之名。居中精神秀异，学问该博。尝出大言矜肆，以为笔不停思，文不阁笔。诸公知其有才，不敢难也。善操琴，能书法。其妹亦有文名。大德年间，被旨赴都，居中亦北行，以才高不见遇，卒于家。有乐府及南北腔行于世。散曲有《秋思》一套，其《赛鸿秋》云：“想那人妒青山愁蹙在眉峰上，泣丹枫泪滴在香腮上，拔金钗划损在雕阑上，托瑶琴哀诉在冰弦上。无事不思量，总为咱

身上。争知我懒看书、羞对酒也只为他身上。”一支中连用六“上”字为韵，洵奇格也。

施惠，字君美，杭州人。居吴山城隍庙前，以坐贾为业。巨目美髯，好谈笑。钟嗣成云：“尝与赵君卿、陈彦实、颜君常至其家。每承接款，多有高论。诗酒之暇，惟以填词和曲为事。有《古今砌话》，亦成一集。”其好事也如此。所著有《幽闺记》一种，今尚传播于昆剧中。

乔吉，字梦符，太原人，自号惺惺道人，又号笙鹤翁。美容仪，能词章，以威严自饰，人敬畏之。居杭州太乙宫前。有《西湖词》、《梧叶儿》百篇，名公为之序。胥疏江湖，垂四十年，欲刊行所作，竟无成事者。陶宗仪《辍耕录》云：“梦符博学多能，以乐府称重于世，尝云‘作乐府亦有法，曰凤头、猪肚、豹尾六字，大概起要美丽，中要浩荡，终要响亮，尤贵在首尾贯串，意思清新。能若是，斯可以言乐府矣。’”所作杂剧，有《认玉钗》、《两世姻缘》、《扬州梦》、《死生交》、《勘风情》、《金钱记》、《荆公遣妾》、《节妇牌》、《贤孝妇》、《九龙庙》、《黄金台》十一种。臧晋《元曲选》仅刻《两世姻缘》、《扬州梦》、《金钱记》三种而已。其小令至有风情，尝记其《咏竹衫》云：“并刀剪龙须为本，玉丝穿龟背成文，襟袖清凉不染尘。汗香晴带雨，肩瘦冷搜云，是玲珑剔透人。”又《天净沙》小令云：“莺莺燕燕春春，花花柳柳真真。事事风风韵韵娇娇嫩嫩，停停当当人人。”所作皆清俊秀丽，不愧大家。梦符又长于诗余，其《和黄子常卖花声》词云：“侵晓园丁，道叫嫩红娇紫，巧工夫攒枝缀蕊。行歌伫立，洒洗妆新水，卷香风看街帘起。深深巷陌，有个重门开未。忽惊它寻春梦美，穿窗透阁，便凭伊唤取。惜花人在谁根底。”盖杭城春日妇女喜为斗草之戏，故梦符词云云也。《正音谱》评其词如神鳌鼓浪。又云：“若天吴跨神鳌，噀沫于大洋，波涛汹涌，截断众流之势。”所作杂剧十一种，今存三种耳。

睢景臣，后字景贤，扬州人。大德七年，至杭州，与钟嗣成订交。

嗣成谓其"自幼读书，以水沃面，双眸红赤，不能远视。心性聪明，酷嗜音律"。维扬诸公，俱作《高祖还乡》套数，惟景臣哨遍，制作新奇，皆出其下。又有《南吕一枝花·题情》云："人闲燕子楼，被冷鸳鸯锦。酒空鹦鹉盏，钗折凤凰金。"亦为工巧，人所不及也。《正音谱》评其词如凤管秋声。作剧三种：《千里投人》、《莺莺牡丹记》、《楚大夫屈原投江》。其子玄明，擅散曲，有《咏鼓》一套，见《太平乐府》。兹录其《耍孩儿煞》一支云："迎宣诏将我身上掩，接高官回把我背上驮，棚角头软索是我随身祸。一声声怨气都言尽，一棒棒冤仇即渐多。肚皮里常饥饿。论着您腔新谱旧，显得我恨满言多。"

钟嗣成，字继先，号醜斋，大梁人。寄居杭州，为邓善之、曹克明高弟。累试有司不遇，从吏则有司不能辟，亦不屑就，因作《录鬼簿》二卷以寄意。上卷记前辈才士有杂剧者，略记姓字、爵里及剧目。下卷则记并世才士，各作一小传，记其剧目，又作《凌波曲》吊之，盖亦风雅好事者也。《正音谱》评其词如腾空宝气。所作乐府小曲，大篇长什，传之于人，每不留稿，故未能就编焉。如《冯驩收券》、《诈游云梦》、《钱神论》、《斩陈余》、《章台柳》、《郑庄公》、《蟠桃会》等，皆不传。《太平乐府》中载其自序醜斋一套，极为诙谐可喜。如《梁州》云："只为外貌儿不中抬举，因此内才儿不得便宜。半生未得文章力，空自胸藏锦绣，口吐珠玑。争奈灰容土貌，缺齿重颏，更兼着细眼单眉人中短，髭鬓稀稀。那里取陈平般冠玉精神，何晏般风流面皮，潘安般俊俏容仪。自知就里，清晨倦把青鸾对，恨杀爹娘不争气。有一日黄榜招收丑陋的，准夺高魁。(余略)"

钱霖，字子云，松江人。弃俗为黄冠，更名抱素，号素庵。多游名公卿间，类辑时人之作，曰《江湖清思集》。其自作乐府，名《醉边余兴》，皆失传。今于《乐府群玉》中，录其《清江引》一支。词云："梦回昼长帘半卷，门掩荼蘼院。蛛丝挂柳棉，燕嘴粘花片，啼莺一声春去远。"真一枝写景好笔也。

秦简夫，字里无考。《录鬼簿》云："见在都下擅名，近岁回杭。是与钟嗣成同时。"《正音谱》评其词如峭壁孤松。作剧五种，今存《破家子弟》、《赵礼让肥》二种。

萧德祥，杭州人。以医为业，号复斋。凡古文俱檃括为南曲，街市盛行。又有南曲戏文。杂剧有《四春园》、《小孙屠》、《杀狗劝夫》、《四大王歌舞丽春园》、《包待制三勘蝴蝶梦》，今仅存《杀狗劝夫》一种。散曲有《秋怀》一套。今录其双调《夜行船》一支。词云："一夜秋声入井梧，碧纱厨枕剩珊瑚。秦风东归，楚云西去，旧欢娱等闲辜负。"

朱凯，字士凯。自幼孑立不俗，与人寡合。小曲极多。所编《升平乐府》及隐语，包罗天地谜韵，皆钟嗣成作序。而嗣成《录鬼簿》，又士凯为之序。二人之文字交谊，概可相见。凯所作杂剧二种，今只存《昊天塔》一本。

王晔，字日华，杭州人。体丰肥而善滑稽，能词章乐府，临风对月之际，所制工巧。有《与朱士凯题双渐小卿问答》，人多称赏，俱存《乐府群玉》中。又有杂剧三种：《桃花女》、《卧龙冈》、《双卖华》，今只存《桃花女》一本。

《琵琶记》，为南曲之祖。明人以为高栻所作，其实舛错。盖元末高明所撰，非高拭也。按高明，字则诚；高栻，别字则成。"成"与"诚"字形既相似，而声又相同，且同为永嘉人，所以贻误至今。又按高明为至正五年张士坚榜中第，授处州录事，辟丞相掾。方谷真叛，省臣于温人知海滨事，择以自从，与幕府论事不合，谷真就抚，欲置幕下。即日解官，旅寓鄞之栎社，因作《琵琶记》。记成时，清夜按拍歌舞，几上蜡炬二枝，光忽交合，因名曰"瑞光楼"。明太祖闻其名召之，以老疾辞还，卒于家。所著有《柔克斋集》，见顾侠君《元诗选》序录。

以上所录者，为优游家弄乐道守志之士，于读书之余，移宫换羽，搜奇索怪。以笔底之烟霞，供闲中之岁月，作此妙品，自成馨逸。汇而录之，以殿斯篇。

明代文学



宋佩韦著

原名“明文学史”

据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重排

引 言

明代的正统文学——或称传统文学——约可分为五个时期来叙述：

一、明开国至永乐初；

二、永乐初到成化、弘治间；

三、弘治、正德之际；

四、嘉靖、万历之际；

五、从天启初以迄明清之交。

在第一个时期里，散文方面，则如黄宗羲《明文案序》所说："有明之文莫盛于国初。……当大乱之后，士皆无意于功名，埋身读书，而光芒卒不可掩。"（见《南雷文约》，序文分上、下篇，此所引见上篇）韵文方面，则如陈田《明诗纪事序》所说："明初诗家，各抒心得，隽旨名篇，自在流出，无前后七子相矜相轧之习。"（陈田《明诗纪事甲籤序》）而因时代环境之不同所引起文学上作风的变迁，也很显然地可以见到的：明初的大作家如宋濂、刘基、王祎等，虽以"师友讲贯，学有本原"（语本《明史·文苑传序》）之故，其作品犹承胜代遗风；然元末杨维桢一派的纤秾缛丽的诗文，已引起一般人的反对（如王彝至作《文妖》一篇，以诋斥维桢的诗文），而后人批评明初有名作家的诗文，往往称其能脱元末纤秾之习。在这里，我们可以知

道末代和盛世，文学上的作风是不相同的。

第二个时期是比较长期的太平时代，诗文亦趋於雍容平易之一途，而三杨的台阁体便就风行了一时。虽有不少才气横溢的作家，其诗文并不为台阁体所囿，但风会所趋，终流于和平啴缓之音。

到了第三个时期，已经不是一个太平的时代了。那时候西北被寇患，权阉专朝政，往日的太平时代已一去而不复还，而雍容平易的诗文，遂不为时代所许。于是李东阳一系所谓"茶陵派"的诗文起而代之，台阁体的末流为之一振。到了李梦阳、何景明等所谓"前七子"者出，倡文学复古之论，天下靡然从风，诗文的作风为之大变；而茶陵派终等于衰周弱鲁，力不足以御强横。

在第四期之初，复古派摹拟秦、汉、盛唐的诗文，已稍稍为人厌弃。于是王慎中、唐顺之等提出"变秦、汉为欧、曾"的口号；归有光继起，为文务在文从字顺，一洗聱牙诘屈之弊，天下又靡然从风。然王、唐、归等的文章，一以唐、宋人为矩矱，虽跳出了秦、汉的圈套，但还是落入唐、宋的圈套。尤其是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以机调摹唐、宋，而唐、宋又成了窠臼。于是李攀龙、王世贞等所谓"后七子"者，承李、何余绪，再倡文学复古之说。前后七子隔绝数十年，而此唱彼和，如出一辙，后七子的声势且驾前七子而上之。其后效颦者陈陈相因，几等于万喙一音，物极则变，于是浅率的"公安体"、纤仄的"竟陵体"相继代兴。这一个时期是政局上不安定的时期，同时也就是文学作风变迁多端的时期。

明代文学从复古派的肤廓数变而至公安、竟陵派的浅陋，其弊已极。然而从天启以后一直到明亡，因社会的剧烈变动，士大夫受了非常的刺激，发为诗文，遂多慷慨激昂之作。南都以后，残山剩水，再也不能支持的了，于是《繁霜》、《板荡》之诗，《黍离》、《麦秀》之篇，悲感凄惋，成了一时的作风。明代文学到了那时候显然又换了一个时期。

明代文学的几个变迁时期，已略如上述。而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

文学复古运动的起来，很明显地是对于雍容平易的台阁体和格律谨严的茶陵派的诗文的反动。但是还有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对于八股文的反动。明初用八股取士，实行散文的骈体化。成化以后，体式益完备，结果造成一种比六朝的骈文更做作、更不自然的排偶体。国家以此取士，士大夫以此为进身的工具。当时士大夫的精神大半都消费于八股文的练习，作诗做散文是他们的余事。而士大夫的才思聪明既为八股文所束缚，又值太平时代，感不到什么刺激，发为诗文，自然逃不出雍容平易之一途。到了时代将变，那些平淡无奇的诗文，固已为一般人所厌弃，同时对于"体用排偶"(语本《明史・选举志》)的八股文，更起了一种下意识的厌恶。这时候文章方面化排偶为散体，诗歌方面反啴缓为雄健，差不多已成为时代的要求。李梦阳等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使人家知道四书、五经外还有古书，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文外还有散体的秦汉文，啴缓的台阁体的诗外还有雄健的盛唐诗，正合着时代的要求。所以振臂一呼，应者四起。这个文学复古的新趋势，到了嘉靖中归有光等倡为欧、曾之文，其势稍杀。然归等为文，亦以古人为矩矱；而其作品，除几篇叙事文外，往往阑入八股文的境界，这当然不能把复古派完全打倒的。后七子的第二次文学复古运动，是必然要到来的事情，那更不用惊奇了。

在复古派的诗文的作风上，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点时代的背景。复古派的诗文，有两点最为后人口实：第一是摹拟或剽窃；第二是虚矫或肤廓。剽窃是由于摹拟而来，凡摹拟未有不流于剽窃的。然而这摹拟习惯的养成也是由于八股文。八股文须"代古人语气为之"(语本《明史・选举志》)，其精神全在摹仿古人，不说自己的话。明代士大夫经过了长期的八股文的训练，已不知不觉养成了摹仿

的根性，复古派尽以起衰救弊为己任，尽怎样地高唱“文必秦、汉”，却终于逃不出这“摹仿古人”的圈套。这是时代的桎梏，任凭你怎样聪明睿智，都摆脱不了这个桎梏！至于虚矫或肤廓，终归一句就是不切实的强作壮语。这也是时代使然，因为那时候朝政不纲，乱象已成，士大夫都有匡救时俗的壮怀，然却没有感受到切实的苦痛。强作壮语，正是这个时代士大夫阶级意识的表现。到后来国事日非，士大夫由浮夸而颓唐了，公安、竟陵体的诗文风行的时候，并这“强作壮语”的豪气而无之。一等到大变动来临，士大夫们才遽然惊觉，文学作风也就趋于慷慨激昂。然而到那时候已经是明代文学总结账的时候，更不容他们争论什么文必秦、汉或文师欧、曾了。

我们拿全部中国文学史来观察明朝一代的正统文学，谁也不能无寂寞之感。黄宗羲辑《明文案》，以明代有名的散文作家宋濂等十人为甲案，然而他说：“然较之唐之韩、杜，宋之欧、苏，金之遗山，元之牧庵、道园，尚有所未逮；盖以一章一体论之，则有明未尝无韩、杜、欧、苏、遗山、牧庵、道园之文；若成就以名一家，则如韩、杜、欧、苏、遗山、牧庵、道园之家，有明固未尝有其一人也。”（《明文案序》上）至于韵文方面，只有一高启可当一代大作家，其他也不过就一章一体以论其短长而已。这三百多年文坛上的黯淡的空气，是怎样造成的呢？那又不能不归咎于八股文。黄宗羲说：“此无他，三百年人士之精神专注于场屋之业，割其余以为古文，其不能尽如前代之盛者，无足怪也。”（《明文案序》上）散文如是，韵文何尝不然！因此，我们论述明代文学，便不能无视八股文，在本书的末章，要特别把八股文作一个有系统的论述。

最后，编者有重要的声明：本书中把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极重要的地位的时代的传奇和小说置之不论，是因为另有郑振铎先生的专篇叙述，为避免重复，就将这一部分删去了。

第一章　明初文学

第一节　明初的散文作家

明初文学，承元末遗风，而散文作家，首推宋濂。元末文章，以吴莱、黄溍、柳贯为一朝后劲：莱文崭绝雄深，以宏博著称；溍、贯的文章，都原本经术，应绳引墨，动中法度；学者承其指授，多所成就。濂初从莱学，继又师事溍、贯，学问渊源，悉有所受，其散文遂为一代之宗。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其先金华之潜溪人，徙居浦江。元至正中荐授翰林院编修，以亲老辞不赴。明初以书币征，除江南儒学提举，命授太子经，修《元史》，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以老致仕。长孙慎坐法，举家谪茂州，道卒。正统中追谥文宪(《明史》卷一二八)。所著有《宋学士全集》三十六卷。他小时候读书是非常刻苦的，家贫，没有书读，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尝读书青萝山中，几年没有下书屋，得郑氏所藏书数万卷，无不尽阅。学既刻苦，授受复有渊源，故所为文雄峙一代，为开国文人之首。当时他文名远播异域，外国使臣来朝贡时，每问："宋先生安否？"高丽、日本都出重价购买他的文集。《明史》濂本传说他"于学无所不通，为文醇深演迤，与古作者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说："濂文雍容浑穆，如天闲良骥，鱼鱼雅雅，自中节度。"今录其《王冕传》，以见一斑：

> 王冕者，诸暨人。七八岁时，父命牧牛陇上，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听已，辄默记，暮归忘其牛，或牵牛来责蹊田，父怒，挞之，已而复如初。母曰："儿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琅琅达

旦，佛像多土偶，狞恶可怖，冕小儿，恬若不见。安阳韩性闻而异之，录为弟子，学遂为通儒。性卒，门人事冕如事性。时冕父已卒，即迎母入越城就养。久之，母思还故里，冕买白牛驾母车，自被古冠服随车后，乡里小儿竞遮道讪笑，冕亦笑。著作郎李孝光欲荐之为府史，冕骂曰："吾有田可耕，有书可读，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备奴使哉？"每居小楼上，客至，僮入报，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马上求见，拒之去；去不百武，冕倚楼长啸，使者闻之惭。冕屡应进士举，不中，叹曰："此童子羞为者，吾可溺是哉！"竟弃去。买舟下东吴，渡大江，入淮、楚，历览名山川。或遇奇才侠客，谈古豪杰事，即呼酒共饮，慷慨悲吟，人斥为狂奴。

北游燕都，馆秘书卿泰不花家。泰不花荐以馆职，冕曰："公诚愚人哉！不满十年，此中荆棘生矣，何以禄仕为？"既日将南辕；会其友武林卢生死滦阳，惟两幼女一童留燕，伥伥无所依，冕知之，不远千里，走滦阳取生遗骨，且挈二女还生家。冕既归越，复大言天下将乱；时海内无事，或斥冕为妄，冕曰："妄人非我，谁当为妄哉？"乃携妻孥隐于九里山，种豆三亩，粟倍之，树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区，薤韭各百本，引水为池，种鱼千余头，结茅庐三间，自题为梅花屋。尝仿周庐，著书一卷，坐卧自随，秘不使人观，更深人寂，辄挑灯朗讽，既而抚卷曰："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吕事业不难致也。"当风日佳时操觚赋诗千百不休，皆鹏骞海怒，读者毛发为耸。人至，不为宾主礼，清谈竟日不倦，食至辄食，都不必辞谢。善画梅，不减杨补之，求者肩背相望，以缯幅短长为得米之差；人讥之，冕曰："吾藉是以养口体，岂好为人家作画师哉？"未几，汝颍兵起，一一如冕言。

皇帝取婺州，将攻越，物色得冕，置幕府，授以咨议参军，

一夕，以病死。冕状貌魁伟，美须髯，磊落有大志，不得少试以死，君子惜之。

史官曰：予受学城南时见孟寀，言越有狂生，当天大雪，赤足上潜岳峰，四顾大呼曰："遍天地间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胆澄澈，便欲仙去。"及入城，戴大帽如簁，穿曳地袍翩翩行，两袂轩翥，哗笑溢市中。予甚疑其人，访识者问之，即冕也。冕真怪民哉！马不覂驾，不足以见其奇才，冕亦类是夫？

明初的散文作家，宋濂外要推刘基、王祎。而方孝儒受业于濂，努力继之，虽所养不及濂之粹，要亦不失为一代作家。

刘基（1311—1375），字伯温，青田人。元末进士，官高安丞。有廉直声，后弃官归。明太祖定括苍，聘至金陵，佐太祖定天下，授太史令，累迁御史中丞。明初诸大典制，都是他与宋濂等议定。封诚意伯，以弘文馆学士致仕。后为胡惟庸所构，忧愤卒。正德中追谥文成（传见《明史》卷一二八）。有《诚意伯集》二十卷。《明史》基本传说他的文章"气昌而奇，与宋濂并为一代之宗"。然他讲经世之略，所学不及濂之醇，所以他尝在太祖前论当世文章，亦推濂为第一，而自拟第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他的散文"闳深肃括，亦宋濂、王祎之并"。今录其《卖柑者言》以示例：

杭有卖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溃，出之烨然，玉质而金色……剖其中，干若败絮。予怪而问之，曰："若所市于人者，将以实笾豆，奉祭祀，供宾客乎？将炫外以惑愚瞽乎？甚矣哉为欺也！"卖者笑曰："吾业是有年矣！吾赖是以食吾躯，吾售之，人取之，未闻有言，而独不足于子乎？世之为欺者不寡矣，而独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皋比者，洸洸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孙、吴之略邪？峨大冠，拖长绅者，昂昂乎庙堂之器也，果能建伊、皋之业耶？盗起而不知御，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理，坐縻廪粟而不知耻。观其坐高堂，

骑大马，醉醇醴而饫肥鲜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予默默无以应。退而思其言，类东方生滑稽之流。岂其忿世嫉邪者耶？而托于柑以讽耶？

王祎（1321—1372），字子充，义乌人。明初征为中书省掾。修《元史》成，拜为翰林待制，同知制诰。使云南，抗节死。追谥文节，改字忠文（《明史》卷二八九《忠义》一）。有《王忠文公集》二十四卷。他少师事柳贯、黄溍，与宋濂为同门，又同修《元史》。太祖尝对他说："江南有二儒，卿与宋濂耳。学问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宋濂叙他的集，说他的文章凡三变："初年所作，幅程广而运化宏；壮年出游之后，气象益以沉雄；暨四十以后，乃浑然天成，条理不爽。"大概他的文章，其长处在平易切实，脱去元人冗沓之病。后人因他抗节死义，文以人重，对于他的文章遂多溢誉，至有说他"体制明洁，当在宋濂之右"者，实非笃论。郑瑗《井观琐言》说他的文章"精密而气弱"，庶乎近之。其《时斋先生俞公墓表》云：

元既有江南，以豪侈率直变礼文之俗，未数十年，薰渍狃狎，胥化成风，而宋之遗俗销灭尽矣。为士者怒马短衣，效其语言容饰以自附会于上，冀速获仕进，否则讪笑以为鄙怯；非确然自信者，鲜不为之变。是时金华俞先生独率其家以礼，深衣高冠，谈说古道。客造门，肃威仪俯首拱而趋以迓；至门，左右立三揖；至阶，揖如初，乃升；及位，又揖者三；每揖皆有辞，相称慰庆赞，周旋俯仰，辞气甚恭。乡人小子去家久，不知宋俗皆然，或窃指先生为异，或尤以为迂缓，先生不顾也。年七十有二，卒于元至治四年正月十七日。先生既亡，而宋之遗俗无有知者矣。

先生讳金，字叔器，别号时斋。其先杭人。吴越钱氏时有仕其国为户部尚书兼营田使者，曰公帛；尚道务义，为爱其地，

遂迁邑之凤林乡。户部生德诠，德诠生谏，又徙金华之孝顺镇。谏生海，海生善转、善智，各有子四人，皆为儒。惟善智子言昌，宋大观三年上舍释褐进士，知永丰、萧山二县。而善转子奉，复家溪南之琴山。奉生某县主簿允中，允中生性，性生恣益，恣益生寿，寿生义：先生父也。母金氏。

先生少好学，善自程督，钩发窥索，水涵木滋，月长岁化，壮而有名。一试不合有司，既退修于家。于经史尤潜心搜订，较辨疑昧，多所附益。学者师尊之，受业者继于门。先生年愈加，志愈笃，为学晚而弥成。人望其致于用，而宋亡矣。故先生之名不大显于世，惟发之文章以自见，久亦散佚不传，世由是无从知先生。知而言之者，乡人而已。然先生所存，乡人未必知之。知其详者惟子暨孙，至曾孙则已疏矣，使更阅数世，复有知者乎？笃于自信者，固不恤乎人之知否。然德如先生而弗传，则天下之为善者寡矣。祎是以论列之，以见不苟合乎一时者，乃所以合乎后世也。……

方孝孺(1359—1402)，字希直，一字希古，号正学，天台人。以荐授汉中府教授。建文中，官至翰林侍讲学士，改文学博士。燕王篡位，抗节死(《明史》卷一四一)。所著有《逊志斋集》二十四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他："学术醇正，而文章乃纵横豪放，颇出入于东坡、龙川之间。盖其志在驾轶汉、唐，锐复三代，故其毅然自命之气，发扬蹈厉，时露于笔墨之间。"他的文章素养，虽不及宋濂那样醇粹，然而他做文章主张"神会于心"，和后来之摹拟剽窃者全然不同。他在《苏太史文集序》中说：

天下之事，出于智巧之所及者，皆其浅者也。寂然无为，沛然无穷，发于智之所不及知，成于巧之所不能为，非几乎神者，其孰能与于斯乎？故工可学而致也，神非学所能致也。惟心通乎神者能之：神诚会于心，犹龙之于雨，所取者涓滴之微，而可

以被八荒，泽万物。无所得者，譬之抱瓮而灌，机械而注，为之不胜其劳，而所及仅至乎寻丈之间。庄周之著书，李白之歌诗，放荡纵恣，惟其所欲而无不如意。彼岂学而为之哉？其心默会乎神，故无所用其智巧，而举天下之智巧莫能加焉。使二子者有意而为之，则不能皆如其意，而于智巧也狭矣。庄周，李白，神于文者也，非工于文者所及也。文非至工则不可以为神，然神非工之所至也。当二子之为文也，不自知其出于心而应于手，况自知其神乎？二子且不自知，况可得而效之乎？效古人之文者，非能文者也。惟心会于神者能之，然亦难矣。庄周殁殆二千年，得其意以为文者，宋之苏子而已。苏子之于文犹李白之于诗也，皆至于神者也。……

明初的散文作家，当以上述诸人最为大家，其次如：陶安，字主敬，当涂人（《明史》卷一三六）。有《陶学士集》二十卷。他的文章平正典实，有先正遗风。危素，字太朴，金溪人（《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一》）。有《说学斋集》四卷、《云林集》二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他的文章于欧、虞、黄、柳之后，屹为大宗。苏伯衡，字平仲，金华人（《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一》）。有《苏平仲集》十六卷。他的文章蔚赡有法，然病在用意太苦，遣词太繁缛云。胡翰，字仲子，一字仲申，金华人（《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一》）。有《胡仲子集》十卷。他少从吴师道、吴莱学为古文，故其文多得二吴遗法。徐一夔，字大章，天台人（《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一》）。有《始丰稿》十四卷。他的文章谨严有法度，无元末冗沓之习。王彝，字常宗，其先蜀人，迁嘉定（《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一》附赵壎传）。有《王常宗集》四卷、补遗一卷、续补遗一卷。他的文章以淳谨见长，但往往持论过激，集中《文妖》一篇，系诋斥杨维桢而作，后人颇病其诟詈伤雅。张孟兼，名丁，以字行，浦江人（《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一》附赵壎传）。有《白石山房逸稿》二卷。他文章温雅清丽，具有体裁；刘基尝推宋濂为第一，

自已居第二，第三就是孟兼，时人以为定评。孙大雅，名作，以字行，江阴人(《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一》附陶宗仪传)。他的文磊落奇伟而隐有程度。自号东家子，宋濂为作《东家子传》，推挹甚至。赵㧑谦，名古则，后更名谦，余姚人(《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一》)。有《考古文集》二卷，又有《六书本义》等。他以小学名家，不甚以文章著，然所作意度波澜，颇存古法。乌斯道，字继善，慈溪人(《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一》附赵㧑谦传)。有《春草斋集》十卷。他的文章夷犹淡宕，颇近自然，不为剑拔弩张之状。龚敩，铅山人(《明史》无传，可参考《四库提要》别集类《鹅湖集》提要及《列朝诗集》、《明诗综》、《明诗纪事》等)。有《鹅湖集》六卷。他的文章原本经术，以结构谨严称。郑真，字千子，鄞县人(《明史》无传。可参考《四库提要》别集类《荥阳外史集》提要)。有《荥阳外史集》七十卷。他与其兄驹、弟凤并以文学擅名，而他的古文尤称于时，说者谓可肩随宋濂。陶宗仪，字九成，黄岩人(《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一》)。他虽不以诗文著，然所作《辍耕录》、《说郛》等书，博雅为一时冠。赵壎，字伯友，新喻人(《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一》附赵壎传)。他在明初和宋濂等同修《元史》，濂兄事之，史称其好学工属文。吴伯宗，名佑，以字行，金溪人。精《春秋》，有《荣进集》四卷。他的文章雍容典雅，为后来台阁体的滥觞。此外作家尚多，然大都为诗名所掩，故不列举了。

第二节　明初的韵文作家

明初的韵文作家，大都能矫元末纤秾之弊，各抒心得，自然流露，没有什么倾轧与标榜，为这个时期的特色。而伟大作家，首推高启。他不仅是明初的大作家，而且明朝一代的诗人，再没有能胜过他的了。他在明代文学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高启(1336—1374)，字季迪，长洲人。元末张士诚据吴，他依外家居吴淞之青丘，因自号青丘子。洪武初，召修《元史》，授翰林院国

史编修。寻擢户部侍郎，固辞，放还田里。他归居青丘，授书自给。知府魏观为移其家郡中，旦夕相见甚欢。观以改修府治获罪被诛，他尝为观撰《府治上梁文》，帝见之大怒，并逮至京，腰斩于市，年仅三十九岁(《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一》)。其诗有《江馆》、《青丘》、《吹台》、《凤台》、《南楼》、《槎轩》、《姑苏杂咏》等集，凡二千余首，自选定为《缶鸣集》，凡九百余首。他死后无子，其侄立于永乐初刻行之。至景泰初，徐庸缀拾遗逸，合为一编，题曰《大全集》，凡十八卷。清雍正中桐乡金坛为校正之，复加笺注，并其文曰《凫藻》，词曰《扣舷》，合二十四卷，重刻行世。

启的死状极惨，而其得祸的远因，据《明史》启本传说，因他尝赋诗有所讽刺之故。究竟他所赋的是什么诗，《明史》没有明言，据后人的推测，以为就是《宫女图》一诗。所谓《宫女图》诗是这样的：

　　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

这诗似乎对于当时的后宫有所讽刺。所以钱谦益《列朝诗集》在这首诗下注道："吴中野史载季迪因此诗得祸。余初以为无稽，及观国初"昭示"诸录所载李韩公子侄小侯爰书，及高帝手诏豫章侯罪状，初无隐避之辞，则知季迪此诗盖有为而作。讽谕之诗虽妙绝今古，而因此触高帝之怒，假手于魏守之狱，亦事理之所有也。"然据《明史》，豫章侯胡美坐法死在洪武十七年(1384)；二十三年韩国公李善长败，帝手诏条列奸党，言胡美因长女为贵妃，偕其子婿入，乱宫禁，事觉并伏诛。考其时距高启之死已十多年，则因诗得祸之说，未为可靠。清朱彝尊亦颇不以为然，他以为启集中又有《题画犬诗》：

　　猧儿初长尾茸茸，行响金铃细草中。莫向瑶阶吠人影，羊车夜半出深宫。

此则不类明初掖庭事。二诗或是刺庚申君而作，启坐魏观事以

死，好事者因之附会也（见《静志居诗话》）。究竟他是否为《宫女图》一诗而取杀身之祸，今已无法证实。但他为了一篇《上梁文》，竟受腰斩的酷刑，其间必有远因在。他当元末，不做张士诚的官，屏居江村，吟咏自得。入明后，力辞户曹，去之惟恐不速。他对于新朝，没有多大情感，而对于旧朝却颇有些《黍离》、《麦秀》之感，在他诗里常常可以见到的。如："重见花开非旧赏，初闻麦秀是新谣"，如"山川寂寞衣冠泪，今古消沉简册尘。"这些弦外之音，都是开国君主所不喜的。而况他于隐士身分中带有不少狂士的色彩，如《青丘子歌》所云"不肯折腰为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像这种傲岸不挠的态度，又是为专制皇帝所深恶的。明太祖是一个刻薄寡恩的人，用细故以诛戮他平日所猜忌或嫌恶的文人，又是他的惯技。刘基、宋濂尚不得善终，何况高启！所以他的横遭冤诬的远因，固不必定指为《宫女图》一诗，但太祖早就嫌恶他而借魏观之狱以杀之，那是可以断言的。

启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他的态度颇有几分像李白，如他的《青丘子歌》说：

> 青丘子，臞而清。本是五云阁下之仙卿，何年降谪在世间？向人不道姓与名。蹑屩厌远游，荷锄懒躬耕。有剑任羞涩，有书任纵横。不肯折腰为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但好觅诗句，自吟自酬赓。……

人家称李白为天上谪仙，他却自比于"五云阁下之仙卿"。李白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他也"不肯折腰为五斗米"。谁说古今人不相及呢？他做诗成了癖，几乎一天到晚沉醉在诗里。《青丘子歌》又说：

> 朝吟忘其饥，暮吟散不平。当其苦吟时，兀兀如被酲。头发不解栉，家事不及营，儿啼不知怜，客至不果迎。……

他这样的一天到晚做诗，既不想标榜自己的诗名，更不和流俗争短长。所以当时杨维桢以诗称雄东南，弟子数千人，尚险怪靡丽之习，

他独屏居江村，歌唱他自己的诗。《青丘子歌》又说：

江边茅屋风雨晴，闭门睡足诗初成。叩壶自高歌，不顾俗耳惊。……

但他自己很知道自己的诗的好处，在《青丘子歌》里曾经这样的赞美过：

微如破悬虱，壮若屠长鲸，清同吸沆瀣，险比排峥嵘。霭霭晴云披，轧轧冻草萌。高攀天根探月窟，犀照牛渚万怪呈。妙意俄同鬼神会，佳景每与江山争。星虹助光气，烟露滋华英。听音谐韶乐，咀味得大羹。世间无物为我娱，出自金石相轰铿。……

其自负亦颇不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他的诗"拟汉魏如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如宋，凡古人所长，无不兼之。……特其摹仿古调之中，自有精神意象存乎其间。譬之褚临禊帖，究非双黄硬钩者可比"。前人做诗，为格调所限，摹仿古调原是不得已，但精神意象却是诗的生命。否则学像了古人，忘却了自己，那便是"诗匠"，算不得诗人了。高启的诗，其长处就在用古人的调子而说自己的话，所以硬派他某诗体近汉、魏，某诗直追唐、宋，未免滑稽而多事。如他的《兵后出郭》：

俯仰兴亡异，青山落照中。民归邻树在，兵去垒烟空。城角犹悲奏，江帆始远通。昔年荆棘路，又满阛阓宫。

是一首写乱后光景的好诗，如说他"直摩杜陵之垒"，便是废话。又如《秋柳》：

欲挽长条已不堪，都门无复旧毵毵。此时愁杀桓司马，暮雨秋风满汉南。

格调辞华，都臻妙境，在唐人集中也是难得的佳作。我们说他远追盛唐，已属多事；倘拿来王士祯的《秋柳》诗相比较而批评其短长，那更滑稽了。其他如：

去年筑城卒，霜压城下骨。今年筑城卒，汗洒城下尘。大家举杵莫住手！城高不用官军守。

——筑城词

这诗是讥讽元末张士诚拉浙西民夫筑杭州城。同时刘基也做了一首，其末句为“独不念至元延祐年，天下无城亦无盗”，便拙劣浅露，失却诗趣了。又如：

琼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

——梅花

重臣分陕去台端，实从威仪尽汉官。四塞河山归版籍，百年父老见衣冠。函关月落听鸡度，华岳云开立马看。知尔西行定回首，如今江左是长安。

——送沈左司从汪参政分省陕西任，由御史中丞出

满衣血泪与尘埃，乱后还乡亦可哀。风雨梨花寒食过，几家坟上子孙来？

——送陈秀才归沙上省墓

各有不同的境界而同为后人传诵。总之，高启的诗，是高启自己的诗，既没有元末纤秾之习，又不像后来前后七子的摹拟古人，饾饤成篇。所以清汪端说：“青丘诗众长咸备，学无常师。才气豪健而不剑拔弩张，辞句秀逸而不字雕句绘。俊亮之节，醇雅之旨，施于山林江湖、台阁、边塞，无所不宜。”（见《明三十家诗选》）然亦有对他表示不满者，如沈德潜说他“才调有余，蹊径未化，故一变元风，未能直追大雅”（见《明诗别裁》）。沈氏的批评，未免有门户之见，颇为后人訾议，汪端就很不服气，她质问沈氏说：“然则必如空同古诗，沧溟乐府，摹拟饾饤，局促辕下，乃可谓直追大雅耶？”（见《明三十家诗选》）

明初刘基亦以诗鸣，声价亚于高启。王世贞《艺苑卮言》说："才情之美，无过季迪；声气之雄，次及伯温。"基早年见知于虞集，集称他的诗"发感慨于性情之正，存忧患于敦厚之言，是不可及。若其体制音韵，无愧盛唐"。大抵基诗纯以高古见长，论其才华，远逊高启。沈德潜《明诗别裁》推他为一代之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他的诗足与高启相抗，都未免誉过其实。他以五言古诗为最佳。汪端说："五言古，元季多近纤靡，刘文成起而振之，醇古遒炼，抗行杜陵。"（见《明三十家诗选》）其《感怀》云：

> 结发事远游，逍遥观四方：天地一何阔，山川杳茫茫。众鸟各自飞，乔木空苍凉。登高见万里，怀古使心伤。伫立望浮云，安得凌风翔？

一代大诗人高启出自吴中，一时吴中遂为诗人渊薮，有所谓"吴中四杰"、"北郭十友"之称。

吴中四杰为高启和杨基、张羽、徐贲。但杨基等虽各有所长，要非高启之匹。今述如下。

杨基，字孟载，其先嘉州人，徙吴中。明初为荥阳县知县，历官山西按察使，寻以事夺官输作，卒于工所（《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一》附高启传）。所著有《眉庵集》十二卷。他少以《铁笛诗》为杨维桢所赏，"无题"、"香奁"诸体，颇沿其派，后人遂病其沾染元习，体近纤巧。王世贞《艺苑卮言》至说他"情至之语，风雅扫地"。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亦摘其诗语类词者至数十联。然平心而论，他的五古冲逸峭拔，近体皆秀藻清润，风度翛然；其绝人处尤在才锋英锐，神致俊爽，了无晦涩填砌之病。虽不足方驾高启，要亦不失为一时作家。其诗五古如《送方以享还吴兴》云：

> 草有不可偃，木有不可雕。人心非秋蓬，安得随风飘？怜君玉雪姿，明月当清宵。葳蕤紫荆花，辉映非一朝。嗈嗈寒江雁，去去谁能招！

贤女失之陋，壮夫失之贫。相逢无所遗，慷慨不得伸。临歧歌短章，所道皆苦辛。淮阴未去楚，江总复仕陈。聊沽客中酒，用酌还乡人。

张羽（1333—1385），字来仪，后以字行，更字附凤。本浔阳人，侨寓吴兴，元末为安定书院山长，再徙于吴。洪武初征就太常寺丞。后坐事窜岭南，半道召还，自知不免，投江死（《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一》附高启传）。所著有《静居集》四卷。他文学欧阳修，画师小米。尤长于诗，虽高雅不及高启，俊爽不如杨基，而覃思冶炼，佩实衔华，自是诗人之诗。近体诗尤清遒淡逸，有不尽之味，如《送刘仲鼎归杭州》：

欲别又牵衣，伤心故旧稀。自怜为客久，不忍送君归。远岫明残雪，空江淡落晖。东风重回首，一雁背人飞。

——送刘仲鼎归杭州

徐贲，字幼文，其先蜀人，徙常州，再徙平江。张士诚辟为属，已而谢去，居湖州蜀山。吴平，谪徙临濠，寻放还。洪武初，被荐至京。尝奉使晋、冀，有所廉访，及还，检其橐，惟纪行诗数首，太祖悦，授给事中，历官河南左布政使。会征洮、泯过其境，坐犒劳不时，下狱死（《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一》附高启传）。所著有《北郭集》六卷。他工于为诗，尤善画山水。其诗在四杰中气格最弱，然才调娴雅，绝无俗韵。《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他的诗"法律谨严，字句熨贴，长篇短叶，并首尾温丽，于三家别为一格"。其诗如《过荷叶浦》云：

粼粼水溶春，淡淡烟销午。不见唱歌人，空来荷叶浦。无处寄相思，停舟采芳杜。

吴中四杰除去杨基，加入王行、高逊志、唐肃、宋克、余尧臣、吕敏、陈则等七人，称"北郭十友"，因为他们都住在吴城北郭的齐门一带，交情是很密切的。

王行（？—1393），字止仲，长洲人。少授徒于城北齐门。明初，有司延为学校师，寻馆凉国公蓝玉家。玉荐之太祖，得召见。后玉

以罪诛，他亦被杀(《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一》附高启传)。所著有《半野集》十四卷。他喜作泼墨山水，时称“王泼墨”。他的诗以清刚俊爽见长，如《吴下咏怀》云：

吴地方千里，齐民总荷戈。人生无可奈，天运竟如何？米市黄金贱，沙场白骨多。故山时一望，老眼泪悬河。

高逊志，字士敏，萧县人，侨寓嘉兴。元末为鄮山书院山长。明初征修《元史》，累官至太常寺少卿。靖难后，遁迹雁荡山中以卒(《明史》卷一四三附王艮传)。所著有《青庵遗稿》。他的诗为当时高启等所交口称誉。今录其《苕川夜宿》，以见一斑：

山绕荒城水自流，霜空月色满溪楼。夜长攲枕浑无寐，二十五声都是愁。

唐肃(1328—1371)，字处敬，会稽人。元末，官嘉兴学正。洪武初，召修礼乐书，擢应奉翰林文学，兼国史院编修，以失朝罢归里，谪佃濠之瞿相山，岁余卒(《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一》附王行传。以下宋克、余尧臣、吕敏、陈则同)。所著有《丹崖集》八卷。他少与上虞谢肃齐名，时称“会稽二肃”。以故寓吴，和高启等为诗友。其诗以婉丽称。如《秋江图》云：

妾家住银塘，石楠秋叶香。忆君荡桨去，江水与愁长。西风夜泣蘋花露，鸭嘴岸低人不度。冷莎如针刺烟素，鸳鸯飞来鸂鶒去。

宋克，字仲温，长洲人。少好任侠，学兵法。张士诚想罗致他，他不就，杜门谢客，日挥毫作书，遂以善书名天下。明初征为侍书，出为凤翔府同知卒。他的《秋日怀兄弟》一诗，至情流露，为时称诵。其诗云：

秋至忆兄弟，萧萧木落初。如何去乡国，不见有音书？漂泊全无定，存亡半是虚。风尘几时靖？还似昔同居。

余尧臣，字唐卿，永嘉人。明初为新郑丞。侨居吴中，和高启等

相唱和。所著有《菜苙集》，今已不传，仅存《秀野轩》一诗，见陈田《明诗纪事》，诗长不录。

吕敏，字志学，常州人，徙无锡。元末为道士。洪武初官教谕。洪武十三年(1380)举人才。不知其官所终。所著有《无碍居士集》。集已不传，《列朝诗集》录其诗七首，大抵皆离愁别恨之作。律句为后人所传诵者，如：

> 春风寂寞莺花梦，落日悲凉鼓角声。

但未能摆脱元末纤秾靡丽之习。

陈则，字文度，昆山人。元末，僦屋授徒，以赋紫菊诗知名，时称"陈紫菊"。明初举秀才，官至大同知府。他的诗以清丽胜。如《题云林画》云：

> 落花愁杀未归人，乱后思家梦更频。纵有溪头茆屋在，也应芳草闭深春。

前人分明初诗为五派。胡应麟《诗薮》说："国初越诗派昉于刘伯温，吴诗派昉于高季迪，闽诗派昉于林子羽(鸿)，岭南诗派昉于孙仲衍(蕡)，江右诗派昉于刘子高(崧)。五家才力，咸足雄据一方，先驱当代。"刘、高两家已如上述。兹从闽派讲起。

闽派亦称晋安派，林鸿为其开山祖。鸿，字子羽，福清人。洪武初以荐授将乐县训导，历官礼部员外郎。年未四十，以性脱落不善仕，自免归(《明史》卷二八六《文苑二》)。所著有《鸣盛集》四卷。他的论诗大旨，以为："汉、魏气骨虽雄，而菁华不足。晋祖玄虚，宋尚条畅。齐、梁以下，但务春华少秋实，惟唐作者可谓大成。然贞观尚习故陋，神龙渐变常调，开元、天宝间，声律大备。学者当以是为楷式。"他做诗既以盛唐为归，绳趋尺步，不免蹈摹拟蹊径，后人至以"唐临晋帖"讥之。而其末流，甚至为世诟病。然鸿诗春容大雅，视率易粗犷、貌为杜、韩者，有上下床之别，未可以作法于凉，遽相诋斥。其诗如：

> 别离无远近，暂去亦伤神。正是千山雪，谁悲独往人？江空螺女夜，花暗冶城春。不见同游侣，酣歌泪满巾。
>
> ——留别蔡秀才原
>
> 汉使临边日，天骄已请和。看花辞紫陌，犯雪渡交河。水草留行帐，云沙想玉珂。从来清漠北，娄敬策居多。
>
> ——送高郎中使北

都能得唐人神理，而无摹拟痕迹。

鸿与闽中善诗者王恭、王偁、高棅、陈亮、郑定、王褒、唐泰、周玄、黄玄称“闽中十子”(《明史》卷二八六《文苑二》附林鸿传)。十子中，鸿为之冠，其次要推王恭、王偁，高棅为最著。

王恭，字安中，自号皆山樵者，闽县人。永乐四年(1406)以儒士荐修《大典》，年纪已六十多岁。书成，授翰林院典籍，未几，投牒归。所著有《白云樵唱》二卷、《草泽狂歌》五卷，而《风台清啸》不传。他的诗，整练不及林鸿，而性耽山野，故风笔跌宕，多缥渺之音。如《春雁》：

> 春风一夜到衡阳，楚水燕山万里长。莫怪春来便归去，江南虽好是他乡。

王偁，字孟扬，其先东阿人，父翰流寓闽中，著籍永福。永乐初荐授翰林检讨，与修《大典》。英国公张辅攻交趾，奉命参军事，还，守故官。后坐解缙党，下狱死。所著有《虚舟集》五卷。他的诗以温厚和平见长。如《车遥遥》云：

> 车轮何遥遥，西上长安道。不见车中人，空悲道旁草。君行日已远，恩爱难自保。忧来当如何，一夕梦颠倒。岂无中山酒，一浣我怀抱；但恐三春花，颜色不再好。车声何辚辚，风吹马蹄尘。愿为马蹄尘，飞逐君车轮。

高棅(1350—1423)，一名廷礼，字彦恢，号漫士，长乐人。永乐初以布衣征为翰林待诏，迁典籍，卒于官。所著有《啸台集》二十卷、

《木天清气集》十四卷。他少与林鸿、王泰等为诗友。书得汉隶笔法，画师米南宫。尝选唐诗论之，分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变、余响、旁流凡九品，其宗旨则归于开元、天宝之间，为《唐诗品汇》九十卷、《唐诗拾遗》十卷。终明之世，馆阁宗之。但他的诗摹唐太甚，生气索然，惟五古差为清拔。如《峤屿春潮》云：

> 瀛洲见海色，潮来如风雨。初日照寒涛，春声在孤屿。飞帆落镜中，望入桃花去。

陈亮，字景明，长乐人，有《储玉斋集》。郑定，字孟宣，闽县人，有《澹斋集》。王褒，字中美，闽县人，有《养静集》。唐泰，字亨仲，闽县人，有《善鸣集》。周玄，字微之，闽县人，有《宜秋集》。黄玄，字玄之，侯官人，有……集。这几个诗人的诗，较之林鸿自然不及。即以比王恭等亦逊一筹。中间惟陈亮诗以冲淡见长。王褒与王恭等齐名，然钱谦益《列朝诗集》讥其“殊乏才情”。至周玄、黄玄皆林鸿弟子，当时有“二玄”之目，然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说他们俩的诗“句续字凑”，更无详述的必要了。

闽诗派虽昉自林鸿，然为其先驱者，则有张以宁及蓝氏兄弟。

张以宁(1301—1370)，字志道，古田人。家居翠屏山下，自号翠屏山人。元定泰中举进士，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明师取元都，例徙南京。召对称旨，复授侍读学士。洪武二年奉使安南，以不辱君命，为太祖所嘉，赐玺书，比之陆贾、马援。及还，道卒(《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一》)。其诗文有《翠屏集》四卷。他的诗格兼唐、宋诸体，一洗元末纤缛之习，后来的闽派诗人都不及他。钱谦益说：“国初诗派，西江则刘槎翁，闽中则张翠屏。槎翁以雅正标宗，翠屏以雄丽树帜。”(《列朝诗集》)他实在是闽诗派的先驱者。其诗如《峨眉亭》云：

> 白酒双银瓶，独酌峨眉亭。不见谪仙人，但见三山青。秋色淮上来，苍然满云汀。欲将五十弦，弹与蛟龙听。

蓝氏兄弟，为崇安人蓝仁、蓝智。仁，字静之，元末杜本隐居武

夷，崇尚古学，他和其弟智俱往师之。本授他的四明任士林诗法，遂谢科举，一意为诗。明初内附，随例徙濠，不久得放归。以寿终。所著有《蓝山集》六卷。智，字明之（一作性之），与兄仁并学行高峻，元末隐居。洪武初荐授广西按察佥事（《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一》附陶宗仪传）。有《蓝涧集》六卷。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说："二蓝体格，专法盛唐，间入中晚。盖十子之先，闽中诗派，实其昆友倡之。"他们兄弟俩的诗，和粹冲逸，既正体裁，复灭蹊径。智五律尤老成，几欲超度乃兄。今录二人诗各一首如下：

乱来村野几家全？近长丁男亦戍边。办得军装牛已卖，门前荒草是官田。

——蓝仁《南村》

鸡鸣庭树寒，白露满秋草。候虫悲夜长，愁人起常早。出门衣裳单，怅望千里道。归来守衡茅，藜藿犹可饱。

——蓝智《晓起》

闽诗派皆宗林鸿之说，一以盛唐为轨，其末流剽窃形似，日益肤陋。钱谦益说："自闽诗一派盛行永（永乐）、天（天顺）之际六十余载，柔音漫节，卑靡成风。风雅道衰，谁职其咎！自是厥后，弘（弘治）、正（正德）之衣冠老杜，嘉（嘉靖）、隆（隆庆）之嚬笑盛唐，转变滋多，受病则一。"（《列朝诗集》）语虽过激，然闽派诗实开后来摹拟盛唐之先河，是无可讳言的。

岭南诗派亦称粤派，其开山祖为孙蕡。孙蕡（1334—1389），字仲衍，顺德人。洪武三年（1370）领乡荐，旋登进士，授工部织染局使，历迁至翰林典籍，与修《洪武正韵》。出为平原主簿，坐累逮系，俾筑京师城垣。起苏州经历，坐累，戍辽东。又以尝为蓝玉题画，以玉党论死（《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一》）。所著有《西庵集》九卷。他的诗和林鸿一样，亦以盛唐为轨，然林鸿以风格胜，他以才情胜。朱彝尊说他的"歌行尤琳琅可诵，微嫌繁缛耳"（《静志居诗话》）如《下

瞿塘》云：

> 我从前月来西州，锦官城下十日留。回船正值重九节，巫山巫峡风飔飔。人言滟滪大于马，瞿塘此时不可下。公家王事有程期，敢惮微躯作人鲊！人鲊瓮头翻白波，怒流触石为漩涡。舵工敲板助船客，破浪一撇如飞梭。滩声橹声历乱聒，紧摇手滑橹易脱。沿洄划转如旋风，半侧船头水花没。船头半没船尾高，水花作雨飞鬓毛。争牵百丈上崖谷，舟子快捷如猿猱。停船把酒聊自劳，因笑吾生真草草。吟诗未解追谪仙，万里经行蜀中道。巴东东下想安流，便指归州向峡州。船到岳阳应渐稳，洞庭霜降水如油。

蕡居岭南时，与黄哲、王佐、李德、赵介(《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一》附孙蕡传)结南园诗社，时称“南园五先生”，亦称“岭南五先生”。

黄哲，字庸之，番禺人。明初以荐拜翰林待制，入书阁侍太子读书，寻兼典签，出为东阿知县，迁东平通判，罢归，寻坐法死。所著有《雪篷集》。他孤贫，刻苦为学，尝借他人“文选”手抄之，沉玩究竟，遂能作诗。性好山水，往来罗浮、峡山、南华诸名胜。他初北上的时候，以岭南人没有见过雪，尝倚篷听雪，以为天下奇音，莫过于是，归构一轩，名“听雪篷”，故所著曰“雪篷集”。他的诗五古源本六朝，七言亦具体唐音，品在孙蕡之下，王佐之上，惜所传不多。如《送刘仁仲昆季还浙东》云：

> 沉忧自多绪，复此送归人。昨夜淮南雨，不知芳树春。揭来持别酒，相与慰兹晨。日暮行舻渺，东南弥越津。

王佐，字彦举，其先河东人，元末侍父官南雄，遂占籍南海。洪武六年(1373)征至京师，拜给事中。居二载，乞骸骨归。所著有《听雨轩》、《瀛洲》等集。他与孙蕡踪迹最密。时人谓构思敏捷，王不如孙；句意沉着，孙不如王，有一时瑜亮之目。然严格而论，他的诗品

还在黄哲之下。以之方驾孙蕡，未免誉过其当。其诗如《听雨》云：

池草不成梦，春眠听雨声。吴蚕早食叶，汉马夕归营。花径红应满，溪桥绿渐平。南园多酒伴，有约候新晴。

李德，字仲修，番禺人。洪武初以明经荐，官终广西义宁知县。所著有《易庵集》，多散佚不传。嘉靖中闽人陈暹搜访残稿，合孙蕡、王佐、黄哲、赵介诗刻之，共四卷，即世所传《南园五先生集》。他作诗好效李长吉，孙蕡尝戏他说："子诚混元皇帝孙也。"然其诗恬澹，实与长吉相远，如《亭亭水上蕖》云：

亭亭水上蕖，皎皎沼中藕。花落子亦成，色衰心不朽。中藏千万丝，处污恒自守。不学杨白花，随风入窗牖。

赵介，字伯贞，番禺人。洪武中坐家累，逮赴京，道卒。有《临清集》，其诗如《南楼对月》云：

夜上南楼看月色，水晶帘卷银河碧。冰轮倒射沧波寒，对此清光是何夕？举酒邀月真吾俦，夜长不用秉烛游。万里凉风满襟袖，洞庭七泽涵清秋。秋声冷拂珊瑚树，湘娥鼓瑟鲛人语。试吹玉管遏行云，曲中仿佛霓裳舞。霓裳舞罢回明珰，北斗已挂西山傍。但愿清樽长对月，今人古人何足伤？

江右诗派亦称西江派，其开山祖为刘崧。崧（？—1381），字子高，初名楚，泰和人。洪武初以荐授职方郎中，累官至吏部尚书，致仕归。复召为国子司业，未旬日卒（《明史》卷一三七）。所著有《槎翁集》十卷。他七岁能赋诗，及长，日课一篇，天寒皲裂不少辍，豫章人宗之为西江派。清汪端说他的诗"妍静疏爽，如新篁摇风，幽花挹露；又如空山听雨，曲磵鸣泉。盖取材中唐、南宋，而不流于佻浅。洵一时雅宗也"（见《明三十家诗选》）。然朱彝尊犹病其"体弱局于方程，不能展拓"云（见《静志居诗话》）。他的《姑苏曲》，凄艳颇似温飞卿：

姑苏城头乌夜啼，姑苏台上风凄凄。芙蓉露冷秋香死，美

人夜泣双蛾低。铜龙咽寒更漏促，手拨繁弦转红玉。鸳鸯飞去屧廊空，犹唱吴宫旧时曲。

明初诗人，共推高启为冠，而何景明独以袁凯为第一。（景明《大复集》说："我朝诸名家集，独海叟诗为长。"）凯，字景文，华亭人。洪武中以举人荐授监察御史。太祖尝欲杀一人，太子请释之。太祖召他来，问道："朕与太子孰是？"他回答说："陛下法之正，太子心之慈。"太祖大怒，以为他持两端，下之狱。已而宥之，每临朝，辄指着他说："是持两端者。"他惧祸，一日趋朝，伪为得风疾，仆地不起。太祖固疑其伪，便说："风疾当麻木不仁。"命以木钻钻之，他忍死不为动，得放归田里。他在家中，以铁索锁项，自毁形骸。太祖每每记起他，遣使者即其家起为本郡儒学教授，他瞠目视使者，歌《月儿高》一曲。使者还奏，太祖以为他真的疯了，遂置之不问。永乐初，以寿终（《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一》）。所著有《海叟集》四卷，集外诗一卷。他负权谲，有才辩，卒以佯狂免祸。晚年自号海叟，尝背戴乌巾，倒骑黑牛，游行九峰间，好事者至绘为图。元至正末，杨维桢尝与客共赋《白燕诗》，某客有"珠帘十二中间卷，玉剪一双高下飞"之句，杨以为善。时凯亦在座，意若不满，因赋一首云：

故国飘零事已非，旧时王、谢见应稀。月明汉水初无影，雪满梁园尚未归。柳絮池塘香入梦，梨花庭院冷侵衣。赵家姊妹多相忌，莫向昭阳殿里飞。

杨大赞赏，遍示座客，人遂称他为"袁白燕"。他古诗学魏、晋，近体学杜甫，后来何景明喜其持论与己相符，推为明初诗人之冠，誉过其实，颇为后人所讥。如清王士祯《香祖笔记》说："明初诗人共推季迪为冠；而大复独以海叟为冠，空同许为知言。今观其诗，古诗学魏、晋，近体学杜，皆具体而微耳；遽跻之青丘之上，未免失伦。"平心而论：他的五古，具体汉、魏，殊乏警策。七古法少陵，描写乱离，一往易尽，无纵横开合之笔。近体则更颓唐衰飒，曾不足当少陵下

驷。然他天才本自秀洁，短古及律诗之佳者，和平典雅中时出俊语，往往不着议论，余韵悠然。虽不足与高启比肩，若位置于孙蕡、林鸿之间，当无愧色。后人因何景明等誉之过当，遂毛举其疵，以为一无可取，亦非笃论。他的诗如：

上林木落雁南飞，万里萧条使节归。犹有交情两行泪，西风吹上汉臣衣。

——李陵泣别图

江水三千里，家书十五行，行行无别语，只道早还乡。

——京师得家书

皆凄婉可诵，不愧为名家作品。第二首纯出天籁，尤非专事摹拟者所能着笔。

明初宗室颇多能诗者，而要以周定王橚、宁献王权为最著。

周定王橚，太祖第五子。洪武三年(1370)封吴，十一年改封周，洪熙元年(1425)薨(《明史》卷一一六《诸王一》)。有《元宫词》一卷。他好学能词赋，工书，从帝所赐元妪得闻元宫故事，制《元宫词》百章，时人比之《三辅黄图》。今录其一首如下：

奎章阁下文词盛，太液池边游幸多。南国女官有翰墨，外间钞得《竹枝歌》。

宁献王权，太祖第十七子。洪武二十四年(1391)封，二十七年就藩大宁，永乐二年(1404)移南昌，正统十三年(1448)薨(《明史》卷一一七《诸王二》)。晚慕冲举，自号臞仙，又别号涵虚子、丹丘先生。其诗有《采芝吟》四卷。他的不朽在传奇方面，所著《荆钗记》传奇，传诵至今。诗亦清雅端洁，卓然名家。如《宫词》云：

忽闻天外玉箫声，花下听来独自行。三十六宫秋一色，不知何处月偏明。

此外如蜀献王椿，太祖第十一子。洪武十一年封，二十三年就藩成都，永乐二十一年(1423)薨(《明史》卷一一七《诸王二》)。有

《献园集》。他儒雅好学，太祖呼他为蜀秀才。尝奉命讲武中都，辟西堂，延名士李叔荆、苏伯衡等商榷文史。惜《献园集》不传，不能像榑、权那样著名后世。

明初的方外诗人，很有几个值得一提的。大概方外诗人的诗，以语带烟霞、不染尘俗胜。但明初的方外诗人，往往托迹缁流，而和士大夫相交游，故所作颇有士风。而当元末明初天下扰攘之时，感事抒怀，往往激昂可诵。如妙声、宗泐之流，便是其代表。而道衍（姚广孝）以方外人参预燕王起兵之谋，尤为特色。诗亦险易并陈，浓淡迭显，如其为人。

妙声，字九皋，吴县人。元末居景德寺，后居常熟慧日寺，又主平江北禅寺。洪武三年与释万金同被召，莅天下释教。所作诗文，有《东皋录》三卷。他入明已六十多岁，诗文多元末所作，大都是些感事抒怀之作。他和危素等相友善，故所作颇有士风，虽未能语带烟霞，犹非气含蔬笋者。其《秋兴》云：

> 溪上凉风吹早秋，长空淡淡水东流。芙蓉露泣吴宫怨，苜蓿烟连汉苑愁。贡赋未全通上国，王师近报下西州。关山万里同明月，偏照诗人自白头。

宗泐，字季潭，临安人。洪武初举高行沙门，命住天界寺。寻往西域求遗经，还，授左善世。太祖欲授以官，固辞，太祖为撰《免官说》。其后胡惟庸谋逆，词连宗泐，特原之。其诗文有《全室外集》九卷、续集一卷。他虽托迹缁流，而笃好儒术，故其诗风骨高骞，可抗行于作者之间。徐一夔替他的集子作序，称其诗“如霜晨老鹤，声闻九皋；清庙朱弦，曲终三叹，仿佛近之”。其诗如《战城南》云：

> 进兵龙城南，转战天山道。烽烟涨平漠，杀气霾荒徼。将军重爵位，天子尚征讨。不辞斗死多，但恨生男少。

道衍（1335—1418），长洲人。本姚姓，医家子，年十四度为僧，名道衍，字斯道。洪武中选高僧，以病免。又诏通儒书僧试礼部，不

受官还。燕王与语甚合，请于帝，徙至北平，住持庆寿寺，常居府中。燕王常怀窥觊，而其阴谋都成于他。帝崩，太孙立，削诸王，畏燕强未发。他劝王反，遂起兵。燕王立，录功第一，拜太子少师，复其姓，赐名广孝。教他蓄发，不肯。赐第及两宫人，都不受。尝监修《太祖实录》，又纂修《永乐大典》，书成，帝褒美之。卒赠荣国公，谥恭靖（《明史》卷一四五）。有《逃虚子集》十卷。他工诗善画，和高启相友善，启赠诗有"衍师本儒生"之句。盖他虽托迹缁流而不忘用世，固有异于一般的方外诗人。史称"洪武中诏通儒书僧试礼部，道衍不受官，赐僧服，还经北固山，赋诗怀古，其侪宗泐曰：'此岂释子语耶？'道衍笑不答。"其《京口览古》诗云：

> 谯橹年来战血干，烟花犹自半雕残。五州山近朝云乱，万岁楼空夜月寒。江水无潮通铁瓮，野田有路到金坛。萧梁事业今何在？北固青青客倦看。

此外尚有西斋和尚梵琦、蒲庵禅师来复等，并以诗称，现在不列举了。

明初作家中尚有几个值得一提的：

宋讷（1311—1390），字仲敏，滑县人。明初征修礼乐诸书，官至国子祭酒。谥文恪（《明史》卷一三七）。有《西隐集》十卷。他学问赅博，师道尊严，为一代典型。诗文浑健古雅，为时所重。其过元故宫诸诗，悲凉酸楚，为朱彝尊所极口称赞。今录一首如后：

> 清宁宫殿闭残花，尘世回头换物华。宝鼎百年归汉室，锦帆千古似隋家。后宫鸾镜投江渚，北狩龙旗没塞沙。想见扶苏城上月，照人清泪落胡笳。
>
> ——壬子秋过故宫

詹同，字同文，婺源人。幼颖异，见知于虞集，集以其弟女妻之。元至正中举茂才异等，除郴州学正。遇乱，家黄州，仕陈友谅为翰林学士承旨。明太祖下武昌，召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吏部尚书，致仕

归。久之，起承旨。卒谥文宪(《明史》卷一三六)。所著有《天衢舒啸》三卷。他学识淹贯，尤深《易》、《春秋》。为文敏捷，一时莫并；诗尤清峭爽朗，自成一家。虽历事三姓，大节全亏，然在这里觉得未可以人废言。其诗如《舟过黄陵庙》云：

黄陵庙下倚船窗，水浅沙平白鹭双。山外断云寒日晚，半篷残雪下湘江。

胡翰(已见前节)素有"学林老虎文渊鲸"之目，他不仅长于古文，诗亦卓然成家。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说："明初金华承黄、柳、二吴诸公之后，多以古文辞鸣，顾诗非所好。以诗论，吾必以仲申(翰字)为巨擘焉。"他的诗以五古最佳，如：

郁郁孤生桐，托根邹峄巅。皎皎白素丝，出自岱畎间。一朝奉庭贡，妙合良自然。桐以为君琴，丝以为君弦。中含希世音，置君离别筵。征马惨不嘶，仆夫跽当前。君行千里道，岂惜一再弹。南风日渺渺，清商动山川。和者昔已寡，听者今亦难。

——郁郁孤生桐

梁寅，字孟敬，新喻人。世业农，家贫自力于学，淹贯五经百氏。明初征修礼书，书成，将授官，以老病辞还。结庐石门山，四方士多从之学，称为梁五经，又称石门先生。卒年八十二(《明史》卷二八二《儒林一》)。有《石门诗文集》七卷。他不独以博学见长，诗亦矫矫可传。其《归醴溪》一诗，颇有陶、韦风致，今录如下：

久厌都市喧，俯思山岩静。归饮醴溪泉，怡我淳朴性。神峰杂树拥。石门翠崖并。萝悬晨露滋，巘秀夕霞映。搴裾荫云松，脱屣悦风磴。悠然遁客心，垒出野人咏。方期谷口耕，毋诮终南径。

贝琼，字廷琚，一名阙，字廷臣，崇德人。元末张士诚屡辟不就。明初征修《元史》，既成，受赐归。洪武六年(1373)以儒士举，除国子助教，与张美和、聂铉齐名，时称"成均三助"(《明史》卷一三七附宋

讷传)。所著有《清江诗集》十卷,文集三十一卷。他学诗于杨维桢,而能不阿所好。其诗五古温雅;七古清新;五律沉警者,宗法杜甫;七律工丽者,方驾虞集。在明初诸家中,品居高启、刘基之下,余子之上。我们且读他的《五月十六夜独坐》诗:

大野喧豺虎,深林集羽毛。天空云气尽,夜久月轮高。士卒悲秦戍,儿童唱董逃。此时空感慨,漂泊叹吾曹。

刘永之(《明史》无传),字仲修,清江人。父应奇,知归州。他少随父宦游,治春秋学,能文词。明初征至金陵,入礼局,竟以耳疾辞归。嗣子奉,坐事死,县官籍其家,他亦徙东莱,至桃源,病死。他好书甚笃,篆楷行草皆有法,因自号山阴道士。所著有《山阴集》五卷。汪端《明三十家诗选》评他的诗:"猗猗明润,楚楚清发。绝句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堪与松雪连镖,云林接轸。铁门诸子,罕此雅音。"其绝诗如《题画鹰》云:

犹记鸣鞘出霸陵,新丰市北醉呼鹰。于今豪气都消尽,闲看新图剔雁灯。

胡奎(《明史》无传),字虚白,海宁人。元末尝游贡师泰之门,又与高启友善。明初以儒学荐,官宁王府教授。有《斗南老人诗集》六卷。他的诗神韵清澈,有金膏水碧之致。相传他泊舟鄱阳望湖亭,见石刻东坡"黑云翻墨未遮山"绝句,次韵和之,书于壁间。忽见一老叟来诵其诗,问他道:"子非斗南老人耶?"因以斗南老人自号。其《和望湖亭东坡原韵》诗云:

鸥外清波雁外山,望湖亭下系归船。夜深起坐占风信,人在珠宫月在天。

李昱(《明史》无传),字宗表,钱塘人。少从永嘉郑僖学,僖奇其才,以女妻之。又受诗法于李孝光。见世乱,不仕,结草阁居北关门外,自号识字耕夫。后避兵金华。洪武初荐授国子助教,未几,以病乞归卒。有《草阁集》十卷。子辕,字公载,亦能诗。朱彝尊《静志居

诗话》说："草阁得诗法于李季和，然季和犹为廉夫(杨维桢)熏染，草阁歌行则一气孤行，独开生面，正如淮阴之师，多多益善，沙囊拔帜，辟易万人。当时四杰、十友、二肃、二玄各有标榜，如此逸气高格，顾诗家月旦不及焉。信夫知音之难也！"其《踏车行》云：

> 南岸北岸声咿哑，东邻西邻踏水车。车轮风生雷转轴，平地雪寒生浪花。借问老农何太苦？低头欲语还咨嗟："前月有雨田未耘，非其种者纷如麻。县令捉人应差役，令严岂得营私家！况当今日滴雨无，陂塘之水争喧哗。虽如抱瓮沃焦釜，蹄涔岂足供泥沙！"语罢踏车车转急，田水何如汗流湿。老妻贷谷犹未归，力疾无奈吞声泣。

凌云翰(《明史》无传)，字彦翀，钱塘人。洪武初除成都府学教授，以乏贡举，谪南荒卒，归葬西湖。有《柘轩集》。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说："彦翀学于陈众仲，故其诗华而不靡，驰骋而不离乎轨。五言如《陪祭作》，七言如《鬼猎图》，才情奔放，不可羁勒，直可搴郁离之旗，摩青丘之垒。集中与张行中论诗云：'艰深文浅近，臭腐化神奇，每到真成趣，由来不费辞。'其自得之深矣。"他的《陪祭作》、《鬼猎图》二篇，众推名作，然铺叙平实，绝少生气。今录其七律《曾瑞卿山水图》一首如下：

> 关山迢递野桥斜，策杖幽寻岂惮赊。路转峰回连佛寺，鸡鸣犬吠隔人家。白云作雨多于絮，红叶惊风少似花。不是褐夫能貌得，空令泉石老烟霞。

李延兴(《明史》无传)，字继本，东安人，占籍北平。元末进士，授太常奉礼，兼翰林检讨，遭乱，弃官隐居。洪武中，属典邑校。有《一山集》。他的诗文都拔俗，今录其七律《别易水诸公》以示例：

> 一家远隔万重山，古道人稀独自还。夜月屡倾燕市酒，春风又度雁门关。晴天雨散千峰外，野屋云生半席间。兄弟何时重会面？灯前相对话时艰。

甘瑾(《明史》无传),字彦初,临川人。元末张翥侨居云锦山中,和他及张可立等往还唱和,翥尝评他的诗如美女簪花,可立诗如贞妇守节,时称"临川诗派"。他于明初为严州同知,或云官翰林待制,其始终无考,遗集罕传。清汪端从诸选本中采集二十首,吉光片羽,弥足珍重。他的诗专工律体,辛酸婉丽,饶故国旧君之思。如《登拟岘台》云:

高台俯仰大江驰,南尽瓯闽树影微。白草秋烟遗战骨,青天寒照落人衣。襄阳耆旧心如昨,华表仙翁事已非。东望故园三百里,不堪搔首片云飞。

刘炳(《明史》无传),字彦昺,鄱阳人。倜傥知兵。元末兵乱,与弟煜结里闬相保,寇至辄却走,依余阙于安庆,以其孤军不振,辞归。洪武初,献书言事,授中书典签,出为大都督府掌记,除东阿知县,寻引疾归,久之卒。有诗集五卷,杨维桢为评点,极推重之。他以驰骋戎马,决胜筹帷,有古烈士风。故其诗悲壮沉郁,虽未足八面应敌,亦不失为坛坫的偏裨。其诗如《闻鲁志敏讣音》:

故国犹传箭,中原未解戎。遥闻故人死,双泪落秋风。

王蒙,字叔明,吴兴人。元末官理问,隐居黄鹤山,自号黄鹤山樵。洪武初,荐授泰安知州。后太祖大治胡惟庸党,或说他尝在惟庸家中饮茶看画,被逮论死,卒于狱(《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一》)。他是赵孟頫的外孙,工画山水人物,然其画法自立门户,没有一笔和孟頫相似。孟頫书画诗皆尚工致,而他则意在活脱,所写溪山林木,或有柯无叶,画家叫做"不了树"。其诗亦然,往往不费推敲,而有自然之致。如《过苏州》云:

山围平野绿烟中,江苇萧萧两岸风。谁种阖闾城外柳?年年飞絮入吴宫。

浦源,字长源,无锡人。洪武中官晋府引礼舍人。后舟经淮河,堕水死,年仅三十六(《明史》卷二八六《文苑二》附林鸿传)。有诗集

十卷，今不尽传。他善画山水竹石，师倪瓒（云林）。其诗秀句络绎，韵远情深。但专工造句，往往不能顾到全篇的起结，是其所短。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尝举其“衣上暮寒吴苑雨，马头秋色晋陵山”，“今夜风传何处笛，他乡月照故园衣”等数联，谓均有风致。全首如《并州寒食》，亦颇新颖可诵：

梦入故园千里远，觉来寒食在并州。垂杨不是相思树，那得花开便白头？

管讷（《明史》无传），字时敏，华亭人。洪武中征拜楚王府记善，升左长史，乞致仕，王留之本国，禄之终身。有《蚓窍集》十卷，又有《秋香百咏》、《还乡记事行》等集。他是杨维桢的弟子，然其诗能劙除纤弱，不染习气。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评他的诗春容疏越，不在袁凯之下。如《纪梦》云：

小宴初阑罢玉笙，东风庭院好春情。流莺啼过东楼去，一树梨花正晚晴。

程本立，字原道，崇德人。洪武中以经学荐为秦王府引礼舍人，改周府礼官，坐累，谪云南。建文中历官至右佥都御史，燕兵入，自缢死（《明史》卷一四三）。有《巽隐集》四卷。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说：“建文诸臣，文莫过于方正学（孝孺），诗莫过于程巽隐。正学之文，取法昌黎，下亦不失为苏子瞻。巽隐之诗，刻意杜陵，下亦不失为陈简斋也。”他为贝琼弟子，其诗力足相伯仲。滇中诸作，尤惊奇独造。今录其《宿晋宁》一首以示例：

汉妇良家子，从军岁月多。生来小儿女，唱得楚人歌。

其他如戴良、王逢、丁鹤年、谢徽等（戴良见《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一》，王逢、丁鹤年均附戴良传，谢徽附同卷赵壎传），都是元末明初的作家。又如郭奎（《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一》附王冕传）、汪广洋（《明史》卷一二七）、袁华（字子英，昆山人，《明史》无传）、钱宰（《明史》卷一三七附赵俶传）、童冀（《明史》无传）、殷奎（字孝章，号

强斋，昆山人，《明史》无传）、虞堪（字克用，一字胜伯，长洲人，《明史》无传）、王璲（《明史》卷一五二附邹济传）等，诗皆卓然可传，徒为诸家盛名所掩，世不甚称。至建文中殉难诸臣，如练子宁（《明史》卷一四一）、程通、王叔英、周是修（均见《明史》卷一四三）、刘璟（基子，《明史》卷一二八附刘基传）等，诗文都兀傲不群；但他们自有其不朽之处，在这里不一一列举了。

第二章 永乐以后的文学

第一节 台阁体

明朝从成祖永乐以迄宪宗成化(1403—1487)八十多年,是一个长期的比较太平的时代,文学亦渐趋雍容平易,所谓台阁体的诗文,便流行一时。

台阁体的创始者为杨士奇、杨荣、杨溥(均见《明史》卷一四八)三人并以文雅见任,历事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号"三杨"。他们的诗文都平正典雅,后来馆阁著作,沿为流派,称台阁体。

杨士奇(1365—1444),名寓,以字行,泰和人。建文中充翰林编修官。永乐初入内阁典机务,官至华盖殿大学士。卒谥文贞。所著有《东里全集》九十七卷、别集四卷。当时三杨并称,而他的文章特优。制诰碑版,多出其手。仁宗极喜欧阳修的文章,而他的文章亦平正纡余,得其仿佛。《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文虽乏新裁而不失古格,前辈典型,遂主持数十年之风气,非偶然也"。其文如送《李永怀归东平序》云:

> 永乐十九年冬,士奇侍储君自南京入朝,道出彭城以北。属岁饥,民男女老弱累累道傍,拾草实以食,而滕与邹尤甚。储君悯焉,不忍于民之及于此也,遽命山东布政使暨郡县长吏,计口而赈贷之。侍从之臣亦皆动念矜恤,且窃其长吏不以豫闻也。
>
> 既渡济宁,入东平之境,视其民皆充然,意气和悦,似无不足者。而老者数百人,皆须发如雪,冠方巾,褒衣而长裾,济济焉夹道东西聚立,候展祗谒之礼。从臣见者,皆惊喜驻马,就而问之:"此邦庶几有收乎?"曰:"然。""州其有贤守乎?"曰:

"然。"辄举手加额，言曰："皆上之赐也。"又问州守氏名及其乡郡。曰："前守杨公，今之守李公，皆出庐陵。"而并举其宜民之政。闻者既为东平喜，又喜其民之言达于礼也。……

他的诗雍容平易，亦如其文。如《同蔡尚远等游东山》：

步出城东门，逍遥望云巘。累月怀佳游，兹晨乃登践。梵宇绕层阿，飞楼凌绝岘。方塘涵湛碧，乔林茂敷衍。繁翳幽莫通，丰茸纷不剪。攀登穷高跻，缘径屡回转。是时微雨收，轻霞澹舒卷。睇遥素横川，俯视绿盈畎。陟降体自便，顾眄心已缅。况接旷士言，复偶释子辨。析空理弗昧，违喧抱愈展。何因此间栖，永令浮虑遣。

杨荣(1371—1440)，初名子荣，字勉仁，建安人。建文二年(1400)进士，授编修。永乐初入直内阁，赐今名。历官工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卒谥文敏。有《杨文敏集》二十五卷。他生当盛明，历事四朝，恩礼始终无间，儒生遭遇，可谓至荣。故发为诗文，具有富贵福泽之气。其诗如《蓟门烟树》云：

蓟门春雨散浮埃，烟树溟蒙霁欲开。十里青云连紫陌，半空翠影接金台。东风叶暗留莺语，落日林声看鸟回。记得清明携酒处，碧桃花底坐徘徊。

杨溥(1372—1446)，字弘济，石首人。与杨荣同举进士，授编修。永乐初进洗马，以事系锦衣卫狱。仁宗即位，擢翰林学士，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卒谥文定。有文集十二卷，诗九卷。他和二杨位望相匹，富贵老寿。然他曾尝过十多年的牢狱滋味，遭遇和二杨又微有不同。诗文之名，亦稍逊二杨。钱谦益《列朝诗集》尝称其《丙午扈驾》诗(《宣德丙午扈驾巡边途中感兴》)，以为可以见劳臣之苦心，今举二首为例：

膏车度重关，重关路漫漫。两厢既充牣，四牡何盘桓。翘首望前轨，迢迢不可攀。任重难为力，临歧发长叹。

策马登崇冈，一览洞八荒。山川限南北，华夷有定疆。猗欤商周盛，以德为保障。秦隋勤远略，祸乱起萧墙。

论台阁体者每举三杨。其实三杨之前，吴伯宗的诗文雍容典雅，有开国之规模，实为台阁体的滥觞。与三杨同时的，如金幼孜、黄淮、周述、王直之流，诗文都和平典雅，与三杨体格略同。今分述如下：

金幼孜，名善，以字行，新淦人。建文初，以举人授户科给事中。永乐初，改翰林检讨。宣德中，历官至礼部尚书，卒谥文靖(《明史》卷一四七)。有集十二卷。他在永乐初，和杨荣等为成祖所亲幸，征伐巡幸，尝侍左右，有诗云："御前视草冰生砚，帐下题诗雪满毡。"又云："近苑猎回犹赐馔，行宫朝罢更题诗。"文臣荣遇，于斯已极。其诗平正典雅，俨然台阁一派。如《云山草堂为杨庶子赋》云：

闻道幽居近翠微，好山多与白云齐。柳堂日暖花争发，门巷春深鸟自啼。酒醒每从松下坐，诗成闲向竹边题。一从射策金门去，风雨年年梦建溪。

黄淮，字宗豫，永嘉人。洪武三十年(1397)进士，除中书舍人。永乐初入直文渊阁，升翰林编修，累进右春坊大学士，辅皇太子监国，为汉王高煦所谮，坐系诏狱十年。洪熙初复官，授武英殿大学士，累加少保，卒谥文简(《明史》卷一四七)。所著有《省愆》、《退直》、《入觐》、《归田》等集。他诗文春容安雅，与三杨体格略同，如《怀院中竹寄杨学士士奇诗》云：

一别词垣数月余，娟娟修竹近何如？梦回还想林间醉，诗就谁从节下书？翠色凝烟春院寂，清阴笼月夜窗虚。料得同袍能爱护，平安莫遣信音疏。

周述，字崇述，吉水人。永乐二年(1404)，以第二人及第，授翰林编修，官至左庶子(《明史》卷一五二)。有《东墅集》六卷。他及第时，与从弟孟简同榜，成祖至比之二苏。史亦称其文章雅赡。然其

诗不出当时台阁之体。如《维扬怀古》云：

广陵河上路，炀帝昔曾过。不见琼花发。犹传《玉树》歌。台荒衰柳在，宫废乱萤多。欲问前朝事，悲风起夕波。

王直，字行俭，泰和人。永乐二年进士。正统间拜吏部尚书，天顺初以老疾乞休。卒谥文端(《明史》卷一六九)。他自永乐初为庶吉士，即承命入阁，典司制诰，后在翰林二十余年，朝廷著作多出其手。当时与王英齐名，有"东王"、"西王"之目，而他尤为老寿，巍然负一代重望。《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他的文章"貌似平易，而温厚和平，实非后来所及"。其诗亦冲融雅饬，可以肩随三杨。如《夜泊》云：

滩水微茫清见沙，隔河荒草少人家。舟中夜起看北斗，霜露满天山月斜。

此外如夏原吉，字维喆，湘阴人(《明史》卷一四九)。有《夏忠靖集》六卷。他以政事著，不以文章著。然致用之言，疏通畅达，犹有淳实之遗风，以肩随杨士奇、黄淮诸人，亦无愧色。李时勉，本名懋，以字行，安福人(《明史》卷一六三)。有《古廉集》十一卷。他学术刚正，官至国子祭酒，和南京祭酒陈敬宗号"南陈北李"，而他尤为人所归。至其文则平正通达，不露圭角，近于台阁一派。倪谦，字克让，上元人(《明史》卷一八三附倪岳传)。有《倪文僖集》三十二卷。其文步骤谨严，朴而不俚，简而不陋，体近三杨，而无其末流之失。韩雍，字永熙，吴县人(《明史》卷一七八)。他当时以武略雄一世，不屑以雕章绘句为工，然英桀磊落之气，时时发见于文章，故虽未变台阁体裁，而时饶风骨。柯潜，字孟时，号竹岩，莆田人(《明史》卷一五二)。有《竹岩诗文集》。他的诗冲澹清婉，不落蹊径。文亦峻整有法度，虽未能一变台阁之体，然犹不失明初先正之风。

三杨台阁之体，平正纡余，缺少了深湛幽渺的思想，纵横驰骤的气度，所以平正有余而精劲不足。流弊所及，肤廓冗长，几于万喙

一音。后来李梦阳等复古派崛起，对于台阁体诗文，攻击不遗余力，而三杨遂为众矢之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士奇等）秉国既久，晚进者递相模拟，城中高髻，四方一尺，余波所及，渐流为肤廓冗长，千篇一律。物穷则变，于是何（景明）、李（梦阳）崛起，倡为复古之论，而士奇等遂为艺林之口实。平心而论，凡文章之力足以转移一世者，其始也必能自成一家，其久也亦无不生弊，微独东里一派，即前后七子亦孰不皆然。不可以前人之盛，并回护后来之衰；亦不可以后来之衰，并掩没前人之盛也。"这真是持平之论！

第二节　台阁体以外的诗人

成祖起靖难之师，夺得了皇帝的宝座以后，虽诛戮了不少文士，但他却能于刀砧之余，从事樽俎。他罗致了不少的文士学者，编辑《永乐大典》，一切遗文坠简，赖以传世。当时参预其事的文人如解缙之流，类皆才气放逸，所作诗文，不为台阁一体所囿。扶舆蕴灵，风雅代兴，在朝则如陈琏、梁潜、李昌祺、曾棨、于谦、吴惠、郭登、陈献章、平显、童轩、丘濬、彭泽，在野则如谢晋、赵迪、刘绩，均不愧一代作者。而体格才情，各有不同，均未可和台阁体相提并论的。

解缙（1369—1415），字大绅，吉水人。洪武二十年（1388）进士，永乐初官翰林学士，出为江西参议，改交阯，为汉王高煦所谮，下狱死（《明史》卷一四七）。有《文毅集》十六卷。先是，他上封事说："陛下好观韵府杂书，钞辑秽芜，略无文彩。若喜其便于检阅，愿集一二儒英，随事类别，勒成一经。"其后成祖修《永乐大典》，他实为总裁。惜《大典》到现在十不存一了。他的诗稿，也多出于后人窜乱，今所存者亦真伪相半。然他才气放逸，当时有才子之目，虽诗无全稿，真伪相半，而其中佳句间存，亦复不减作者。如《西行》云：

八千里外河湟客，乌鼠山头望故乡。欲问别来多少恨，黄

河东去与天长。

逸情胜概，可以想见他的风流人豪。

陈琏（《明史》无传），字廷器，东莞人。洪武二十年（1387）举人。永乐初知许州，累迁至礼部侍郎。有《琴轩稿》三十卷。他在永乐初铺张朝廷盛德，尝进《平安》等颂，大为成祖所惊赏，以滁州守超擢四川按察使。文人遇主之隆，论者以比相如奏赋，殆有过之云。其诗格意清新，天然秀拔，和当时的台阁体气象稍殊。如《杨白花》云：

杨白花，随风飞去落谁家？美人沉思抱幽怨，连臂踏歌情恋恋。江南江北春茫茫，何不仍飞归洛阳！

梁潜（？—1417），字用之，泰和人。洪武二十九年（1396）举人。永乐中会修《大典》，官至侍读，中谗死（《明史》卷一五二附邹济传）。有《泊庵文集》十六卷、诗钞一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他的"文格清隽，而兼有纵横浩瀚之气，在明初可自成一队"。其诗集世少传本，钱谦益、朱彝尊皆未见，陈田得《泊庵诗钞》一卷，乃是潜的曾孙于嘉靖中刻于辰州者。其诗五言选体为多，近体有唐人格律而时参宋派，永乐诗家中最为杰出。如《试马台》云：

朔风猎猎尘沙起，塞草茫茫几千里。西楚无人识霸王，空有高台临泗水。想当西被秦兵时，诸侯膝行不敢窥。万金宝剑赤如电，麒麟锦带悬青丝。日光鳞鳞射银甲，赤骠乌骓相杂遝。帐中美人白玉珰，辕门壮士红锦帕。此时欢乐登高台，一览四方何壮哉！三秦自可塞汉路，咸阳气色如冷灰。岂知汉兵能楚歌，八千子弟竟蹉跎！芒砀王气成五彩，玉斗撞破当奈何！

李昌祺，名祯，以字行，庐陵人。永乐二年（1404）进士，历官广西、河南左布政司（《明史》卷一六一）。有《运甓漫稿》七卷，又有《容膝轩草》。他预修《永乐大典》，凡僻书疑事，人多就质。其诗清新华赡，音节自然，诸体并工，在永乐诗家中独标一格。我们且读他的《春日与高逸人行秦淮河上作》诗：

端居苦无悰，今旦得良契。逍遥出近郭，散策淮水际。草软倦堪眠，林香醉宜憩。鸟哢晴始和，川容晚逾媚。筱深风筝密，沙没夕潮至。野鹭浑忘机，似识静者意。幽怀颇得惬，逝景苦难系。候卒晡欲还，春城暝将闭。因知市朝隐，兼有林壑致。永言终此生，涵泳太平世。

“因知市朝隐，兼有林壑致”，所以他的诗虽是歌咏太平，但没有台阁派的富贵福泽气，而和山林枯槁者，又自不同。

曾棨（《明史》无传），字子启，永丰人。永乐二年以第一人及第，官至詹事府少詹事。卒谥襄敏。有《巢睫集》十卷。他少年时见赏于解缙，为作《莲竹堂记》，其文章烂漫，亦颇似缙。他的诗佳处不失唐家声，然颇以繁靡为累。陈子龙《明诗选》批评他的诗“如南金在握，未入丹鼎”。然论才人于永乐时，他终为轶群之骏。其诗如《维扬怀古》云：

广陵城里昔繁华，炀帝行宫接紫霞。玉树歌残犹有曲，锦帆归去已无家。楼台处处迷芳草，风雨年年怨落花。最是多情汴堤柳，春来依旧带栖鸦。

薛瑄（1392—1464），字德蕴，号敬轩，河津人。永乐十九年（1421）进士，除御史。英宗朝，拜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入阁预机务，乞归卒。成化初谥文清（《明史》卷二八二《儒林一》）。有《薛文清集》二十四卷。明初理学，以他和曹端（月川）为最醇正。端诗文皆质直朴素，不以章句为工。他的诗却冲澹高秀，吐言清拔，往往有陶、韦之风，和一般理学家的作品不同。其诗如《徐州见黄河》云：

我家正在龙门下，流出黄河几曲长。忽向徐州城外见，牵情一水正思乡。

于谦（1394—1457），字廷益，钱塘人。永乐二年进士，授御史，历官兵部尚书，为徐有贞、石亨等诬陷弃市。弘治初追谥肃愍。万历中改谥忠肃（《明史》卷一七〇）。有《于忠肃集》十三卷。生平著

述甚富，祸变之余，仅存什一。他一生大节，炳垂竹帛，本不藉文字以传。然其诗风格遒上，兴象深远，虽志存开济，未尝于吟咏求工，而品格乃转出文士之上。如《上太行》云：

雨风落日草斑斑，云薄秋容鸟独还。雨鬓霜华千里客，马蹄又上太行山。

吴惠(《明史》无传)，字孟仁，吴人。宣德二年(1427)进士，除行人，历官桂林知府、广西参政。他在永、宣间为有名的作家。其《入义宁峒》一诗，具体昌黎，为后人所称：

天设此邦险，乃为蛮僚窟。乱峰青入天，万石云中突。峭壁矗崇墉，古洞嵌碑屼。关门守一夫，仰面攻岂得。从来诈力徒，恃此每狂悖。抚驭失其宜，祸作劳剪伐。嗟彼蛮僚人，生亦具肤发。天性匪尽乖，顺逆理可夺。单车抵其垒，开诚破迷惑。涕泣尽投刃，盟心牲载割。兵气潜以消，约束鲜睢剌。顿觉崄巇处，岚光堪拄笏。乃知边衅开，十五激之发。柔远有经纶，禁网尚疏阔。

郭登(？—1472)，字元登，濠人。洪熙时授勋卫，正统中擢锦衣卫、指挥佥事，超拜都督佥事。景帝监国，进都督同知，再进右都督，景泰初封定襄伯。英宗复辟，掌南京府事，以事论死，寻得宥，降都督佥事。宪宗即位，复伯爵。成化中卒，谥忠武(《明史》卷一七三)。有《联珠集》二十二卷，又有《春秋左传直解》。他的诗气韵沉雄，格调遒上，明朝一代武人能诗者，无过于他。李东阳尝推他为明朝武臣之冠；朱彝尊以为“岂惟武臣，一时台阁诸公，孰出其右？”(见《静志居诗话》)朱氏又盛推其《山王》、《楸树》、《咏枭》诸篇。然仅《山王》尚不失为佳作；《楸树》则纵笔挥洒，漫无指归，《咏枭》尤堕卢同、马异恶习。他的擅长，固不在此。今录其短诗两章，说是他的代表作品，亦无不可：

天迷离，水呜咽。战马无声宝刀折，冤鬼凄酸啼夜月。青

燐荧荧明又灭，照见征夫战时血。

——哀征人

白壁何从摘旧瑕，才开罗网向天涯。寒窗儿女灯前泪，客路风霜梦里家。岂有鸩人羊叔子？可怜爱国贾长沙！独醒空和骚人咏，满耳斜阳噪晚鸦。

——保定途中偶成

陈献章(1428—1500)，字公甫，新会人。正统十二年(1447)举人，以荐授翰院检讨。万历初，从祀孔庙，追谥文恭(《明史》卷二八三《儒林二》)。有《白沙集》九卷。他也是一个有名的理学家，其学以静为主，颇近于禅，至今毁誉参半。其诗文偶然有合，或高妙不可思议；偶然率意，或粗野不可向迩，至今毁誉亦参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他"以高明绝异之姿，而又加以静悟之力，如宗门老衲，空诸障翳，心境虚明，随处圆通，辨才无碍。有时俚词鄙语，冲口而谈；有时妙义微言，应机而发。其见于文章者，亦仍如其学问而已。虽未可谓之正宗，要未可谓非豪杰之士也。"其诗如《经鳄洲》云：

夕舫凌大波，北风吹我席。冥冥鳄洲烟，宛对君山碧。来雁知天寒，归人看月色。超超尘外心，浩矣周八极。

平显，字仲微，钱塘人。以荐授藤县知县，谪戍云南，晚授校官(《明史》卷二八六《文苑二》附王绂传)。有《松雨轩集》八卷。他的诗变怪豪放，在当时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作家。如《赠蔡彦吉》云：

仙客骑鲸下葛湾，白头尘迹幸相攀。诗留翠壑苍崖上，名在丹台紫府间。风泖不波莼正滑，雪篱将冻菊犹斑。洞真观里桃开日，尚欲重来问大还。

童轩(《明史》无传)，字士昂，鄱阳人，侨寓南京。景泰二年(1451)进士，除南吏部给事中，官至南礼部尚书，卒赠太子少保。有《清风亭稿》七卷，又有《枕肱集》二十卷，及《海岳涓谈》、《谕蜀稿》等。他的性情落落寡合，在南京的时候，家人衣食或不给，人家送他

米及白金，他往往拒而不受。其人品本来高洁，诗亦雅淡绝俗，在景泰间当首屈一指。如《咸阳晚眺》云：

> 渭水东流落日西，咸阳秋色望中迷。荒烟古渡人稀到，衰柳空城马自嘶。霸业已消三月火，断碑犹载数行题。东门牵犬人何在？空见年年碧草齐。

丘濬(1421—1495)，字仲深，琼山人。景泰五年(1454)进士，选庶吉士，累官至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兼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加少保。卒谥文庄(《明史》卷一八一)。有《琼台会稿》二十四卷。他的诗不事锻炼，而矩度自合。其《与友人论诗绝句》云：

> 吐语操持不用奇，风行水上茧抽丝。眼前景物口头语，便是诗家绝妙辞。

可以窥见他的作诗方法。其诗如《古意》云：

> 独守空闺不自怜，怜君岁晚尚防边。秋来莫作还家梦，妾貌于今异少年。

彭泽(《明史》无传)，字民望，攸人。景泰七年(1456)举人，除应天通判。有《老葵集》。他的诗风调遒上，七律尤推擅场，在正统、景泰间是不易多得的作家。七律如《歌风台》云：

> 豨破黥奔几战争，亲于此地驻旌旌。荒台曾见高歌日，小县犹存古沛名。几载艰难天下业，千秋魂魄故乡情。危亭寂寞山河泪，剥落残碑野草生。

谢缙(《明史》无传，《四库提要》说他的始末不甚可考)，缙一作晋，字孔昭，吴人。自号兰庭生，亦号深翠道人。又尝自题葵丘谢缙(据《姑苏志》，葵丘也是他的别号)。有《兰庭集》二卷。集首有汝南周传序，说："姑苏之诗，莫盛于杨孟载、高季迪，而孔昭得二君之旨趣。"其诗的价值，可想而知。他的诗以蕴藉称，在宋人中似陆游一派。如《春日写怀》云：

> 好怀无复似前时，一半春过尚未知。惟有白门桥下柳，见

人憔悴也颦眉。

赵迪，字景哲，怀安人，自号白湖小隐（见《明史》卷二八六《文苑二》林鸿传中。按：明初有两赵迪，一为宜阳人，洪武中，官吏部侍郎，见《弇山堂别集》卿贰表，此见俞汝成《明百家诗》。钱谦益《列朝诗集》误为一人，朱彝尊《明诗综》辩之极详）。有《鸣秋集》。他是林鸿的弟子。善画山水，学米芾。诗格修整，五言尤有远韵。如《题雨竹》云：

黄陵日已昏，萧瑟凉飙起。残雨挂空江，溟濛若千里。暝色夕鸟前，寒声暮猿里。应知叶上秋，尽入湘潭水。

刘绩（《明史》无传），字孟熙，山阴人。深于经学，教授乡里，不干仕进。家贫，转徙无常地。所至署卖文榜于门，有所得，辄沽酒饮。又很喜欢招待宾客。有一回，客人来了，他喊着倒茶，许久没有人出来，他奇怪了，进去一看，原来他的妻正在拾破纸以代薪，他只有一笑而已。家有西江草堂，人家就称他为西江先生。所著有《崇阳集》。他的诗以雄健胜。如《结客行》云：

结客千金尽，酬恩一剑存。羞与狗盗伍，不傍孟尝君。

豪人豪语，可以想见他的气概。又如《征夫词》及《征妇词》，短章沉痛，抵得杜甫《新婚别》、《兵车行》诸咏。其诗云：

征夫语征妇：生死不可知，欲慰泉下魂，但视襁中儿。

——征夫词

征妇语征夫：有身当殉国，君为塞下土，妾作山头石。

——征妇词

这一时期在朝在野的诗人，差不多已如上述。然景泰间又有所谓“景泰十才子”者，诗虽不能超过上述的几个人，然他们既负盛名于当代，在这里似乎应该一提的。

景泰十才子为刘溥、汤胤勣、苏平、苏正、沈愚、晏铎、王淮、邹亮、蒋主忠、王贞庆（均见《明史》卷二八六《文苑二》刘溥传）。然十

人中惟刘溥、汤胤勣、沈愚的诗稍可称述，其他大都染台阁末流之习，不过浪得虚名而已。

刘溥，字原博，长洲人。宣德初，授惠民局副使，调太医院吏目。有《草窗集》二卷。他在景泰中负盛名，然惟律体及绝句差有可观。正统末，瓦剌入寇，英宗亲征，师溃，虏执帝北去，他作《感怀》一首，慷慨悲歌，一时传诵。其诗云：

塞雁南飞又北旋，上皇音问转茫然。孤臣自恨无容地，逆虏谁能共戴天！王衍昔年知石勒，谢玄何日破苻坚？京城四塞山河固，一望龙沙一泪涟。

汤胤勣，字公让，濠梁人。东瓯襄武王曾孙。授锦衣百户，转千户。景泰中，进指挥佥事，坐事谪为民，编籍常州。成化初复官，充参将，守延绥战没。有《东谷集》十卷。他也是一个武人而能诗者，然才调远逊郭登。王世贞《艺苑卮言》说他的"诗如淮阴少年，斗健作暾人状"，大概这是武人的本色吧？其诗如《侠》：

四郊射虎渐纵横，雁子都儿怕出征。解办月钱供内省，终身常隶国西营。

沈愚，字通理，昆山人。自号崆峒生。有《筼籁》、《吴歈》二集。他善画工诗，在景泰十才子中，特为翘楚。其诗如《长安道》云：

西望长安道，东风吹绿尘。斗鸡三市晓，跃马五陵春。柳色迷行客，花得扑丽人。金张居戚里，游宴不辞频。

苏平，字秉衡，海宁人。有《雪溪渔唱》。苏正，字秉贞，平弟，有《云壑集》。晏铎，字振之，富顺人，有《青云集》。王淮，字柏原，慈溪人。有《大块稿》。邹亮，字克明，长洲人，有《鸣珂》、《漱芳》等集。蒋主忠，字存恕，仪真人，徙句容。有集。王贞卿，字善甫，定远人。有《茗芋集》。这几个虽名列十才子，然作品都自桧以下，不足深论。

在这一时期的贵族诗人要推周宪王有燉，闺秀诗人要推朱妙端。

周宪王有燉，周定王长子，太祖孙。洪熙元年（1425）袭封，景泰三年（1452）薨（《明史》卷一一六《诸王一》周王橚传）。有《诚斋录》、《新录》诸集。他遭世隆平，奉藩多暇，所作杂剧最多，名《诚斋乐府》。虽警拔稍逊古人，而调入弦索，稳叶流丽，犹有金、元风范。诗亦风华和婉，沨沨乎盛世之音。如《柳枝歌》云：

苏小门前万缕垂，白家园内两三枝。听歌看舞人何在？惟有东风展翠眉。

朱妙端，字仲娴，号静庵，海宁人。周济之妻。明代弘正以前，妇女作家甚少，能自成一家者，恐只有她一个人。所著《静庵集》，诗格高古，景泰间的诗人，对她都有愧色。如《虞姬》云：

力尽重瞳霸气消，楚歌声里恨迢迢。贞魂化作原头草，不逐东风入汉郊。

此外还有几个在这里应该一提的：王绂，字孟端，无锡人（《明史》卷二八六《文苑二》）。有《友石山房文稿》五卷。他博学工书画，所作山水竹石，风韵潇洒，妙绝一时。其诗虽结体稍弱，而清雅有余，胡俨，字若思，南昌人（《明史》卷一四七）。有《颐庵文选》二卷。他尝为《永乐大典》总裁官。其诗颇近"西江"一派，寄托深远，和三杨之和平安雅者，气象稍殊。王洪，字希范，钱塘人（《明史》卷二八六《文苑二》，附林鸿传）。有《毅斋诗文集》八卷。他尝为《永乐大典》副总裁官。其文以博雅称，又工骈体文，诗尤具有唐格。郭文，字仲炳，昆明人。永乐间滇中诗人，称"平居陈郭"（此四人惟平显见《明史》卷二八六《文苑二》王绂传中，朱彝尊从《柯东冈集》附录《滇南别志》诗中考得四人的作品，见《静志居诗话》）。平，名显，钱塘人。居，名广，海昌人。陈，名谦，吴人。都以事客居云南，与郭齐名。然郭诗独有唐风，三子远不及他。唐文凤（《明史》无传），字子仪，号梦龄，歙县人。有《梧冈集》八卷。他在永、宣之际以文学擅名，著作甚多，今所存者，惟诗文各四卷，已不到十之三四了。王谊，字内敬，

山阴人。有《鉴止集》;王怿,字内悦,谊弟。有《娱清集》(《明史》均无传)。他们兄弟称"山阴二王",并以诗鸣,而悦诗较丽密。唐庠,字惟周;弟广,字惟勤,皆湖州人(《明史》均无传),时称"吴兴二唐"。二唐的诗都有风致,惜传诗极少。聂大年,字寿卿,临川人(《明史》卷二八六《文苑二》)。有《东轩》、《冷斋》两集。他在宣德、景泰之际,以诗名。陈田称他的诗,词新调爽,而朱彝尊则颇病其平熟云。其他如华亭人沈度及其弟粲,昆山人夏昺及其弟昶,吴县人滕用亨,长乐人陈登等,皆见《明史·文苑传》,然都以书画或考古见长;至成、弘之际,如吉水人罗伦(《明史》卷一七二)、兰溪人章懋、江浦人庄昶、莆田人黄仲昭(以上均见《明史》卷二七九)、辽东人贺钦、莆田人周瑛(以上均《明史》卷二八二《儒林一》),诗皆卓然可传,然他们都以理学著名,兹不赘述。

第三章　弘治、正德间的文学

第一节　茶陵诗派

弘治、正德之际，因台阁体的极弊而引起的反动，文学走上了复古的一途。但我们在这里须得把年代向前拉长一些，先将成、弘之际李东阳一派的诗文叙述过了，然后再讲到复古派。

成化以后，台阁体的流弊益甚，啴缓冗沓，陈陈相因，几于千篇一律，在势已不容不变。于是李东阳崛起，以深厚雄浑之体，一洗啴缓冗沓之习。三杨台阁之末派，为之一振，同时又做了复古派的先驱。

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茶陵人。天顺八年(1464)进士，官至谨身殿大学士，卒谥文正(《明史》卷一八一)。有《怀麓堂集》一百卷。他在孝宗之朝参预机务，多所匡正，又受遗命辅翼武宗，立朝五十年，清节不渝，高才绝识，独步一时。当国的时候，门生满朝，他又喜奖掖后进，推挽才秀，出其门者，大都粲然有所成就，天下翕然宗之，称“茶陵诗派”。明兴以来，宰臣以文章领袖缙绅者，杨士奇之后，他一人而已。然当时他和刘瑾同朝，颇为一般气节之士所非难，以为他依附权奸，相率诋毁，他的门生罗玘甚至寄书相责，请削门生之籍；更有人作诗讥讽他，说：“声名高与斗山齐，伴食中书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绿，鹧鸪啼罢子规啼。”但史称其“扶植善类，培滋元气”，可见他和刘瑾同朝时，未始不阳为调剂而阴护正人，他也有他不能去的苦衷。一时的毁誉，未可据为定论。单就文学一方而论，他虽才情秀发，不及高启，而气度雍容，风骨遒健，其才学自足以笼罩一世。后人或过相推挹，以明朝第一人目之；或肆口毁斥，以为其诗文软靡熟滑。都不是持平之论。他的诗文，

深厚雄浑，不为倔奇可骇之辞，而法度森严，意味隽永，有古作者风。叙事的古乐府尤擅长，如《花将军歌》，是咏明名将花云事，事既奇绝，笔力更雄健，实为不可多得的作品。其歌云：

花将军，身长八尺勇绝伦。从龙渡江江水浑。提剑跃马走平陆，敌兵不能逼，主将不敢嗔。杀人如麻满川谷，遍体无一刀枪痕。太平城中三千人，楚贼十万势欲吞。将军怒呼缚尽绝，骂贼如狗狗不狺。樯头万箭集如猬，将军愿死不愿生作他人臣。郜夫人，赴水死，有妻不辱将军门。将军侍婢身姓孙，收尸葬母抱儿走，为贼俘献随风尘，寄儿渔家属渔姆，死生已分归苍旻。贼平身归窃儿去，夜宿陶穴如生坟；乱兵争舟不得渡，堕水不死如有神。浮槎为舟莲为食，空中老父能知津。孙来抱儿达行在，哭声上彻天能闻。帝呼"花云儿！风骨如花云"，手摩膝置泣复叹："云汝不死犹儿存！"儿年十五官万户，九原再拜君王恩。忠臣节妇古稀有，婴、杵尚是男儿身。英灵在世竟不朽，下可为河岳，上可为星辰。君不见，金华文章石室史，嗟我欲赋岂有笔力回千钧！

出东阳门下传茶陵诗派者，有石珤、邵宝、顾清、罗玘、鲁铎、何孟春等，钱谦益比之以"苏门六君子"(见《列朝诗集》)。而石、邵、顾三人尤为真得东阳衣钵者。

石珤(？—1528)，字邦彦，藁城人。成化末年(1487)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卒谥文隐，改文介(《明史》卷一九〇)。有《熊峰集》十卷。他为东阳的得意门生，东阳每称后进可托以柄斯文者，只有他一人。他虽才力不及东阳，然当复古派骎骎代兴之日，独坚守师说，力斥浮夸，亦不失为坚立之士。他的长歌颇有师风，如《清夜游》云：

宫夜泠泠月华白，娇骑踏空红堕雪。西园门外驮鼓声，十六院中乐齐发。杨郎萧郎各一席，千牛啮臂宫娃泣。坐中谁是

陈宣华？宝带犹拴绣同结。芰荷风柔酣洒霞，锦缯绷树啼双鸦。侍臣自舞王自歌，蜥蜴香销金缕纱。佛经仆射呼不起，梁燕才人竟冤死。潼门烽火照宫红，犹自心轻汉天子。龙舟翩翩蔽白日，醉拥笙歌南下疾。一声悲铎不堪听，至今江柳生愁色。

邵宝，字国宝，无锡人。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官至南礼部尚书。卒谥文庄，学者称二泉先生(《明史》卷二八二《儒林一》)。其诗文有《容春堂集》。他诗文矩度宗法东阳，东阳也很推奖他，比之以欧阳修之知苏轼。他的诗亦颇神似东阳，如《孙翊妻》云：

夫死矣，妾何敢生！夫仇为重身为轻。贼尚生，妾何敢死！军中幸有报恩子，号召如风赴如水，断贼头，祭夫墓。白日下高天，何处黄泉路？

顾清，字士廉，华亭人。弘治五年(1492)进士，官至南礼部侍郎，以尚书致仕。卒谥文僖(《明史》卷一八四)。有《东江家藏集》四十二卷。他的诗清新婉丽，天趣盎然，文亦简炼醇雅，自娴法律。虽波澜气焰，未能极俶奇伟丽之观，在茶陵派中亦算是挺然翘楚的了。其诗如《渡江》云：

昨日渡长淮，今日渡长江。长江更比长淮阔，凌空自有飞凫双。双凫飞，风不起；天青青，江弥弥。眼中不复见尘沙，只有青山如画里。青山如画画不如，十年归梦绕吾庐。山中猿鹤休惊咤，从今日日青山下。

罗玘，字景明，南城人(《明史》卷二八六《文苑二》)。有《圭峰集》三十卷。当东阳依违刘瑾时，他曾遗书相责，劝东阳辞职，不要和小人同朝，书中有"伏望痛割旧志，勇而从之。不然，请削门生之籍"等语。然他后来祝东阳寿诗中有"白头王孝逸，北面敢徐徐"之句，可见未背师门。他散文绰有矩度，诗非所长。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诗文"振奇侧古，必自己出"，要非摹拟饾饤者可比。鲁铎，字振之，景陵人(《明史》卷一六三)。有《文恪集》十卷。他以素

行孤高称，文皆不甚措意，盖其平生志趣，不在于此。然其诗于朴质中时有风趣，譬如老树著花，亦饶姿致。何孟春，字子元，郴州人(《明史》卷一九一)。有《燕泉集》十卷。他服膺东阳，传茶陵一派诗，惟才力稍弱，句调平易，然学术既深，亦自远于俗调。

当茶陵诗派主持骚坛的时候，为之羽翼者，有杨一清、吴宽、马中锡、吴俨等。

杨一清，字应宁，安宁州人。成化八年(1472)进士。世宗朝官至华盖殿大学士，以被谗削籍，愤恚，疽发背死。后复故官，谥文襄(《明史》卷一九八)。所著有《石淙类稿》四十五卷、诗二十卷，又有《西征日录》等。他的诗安和典丽，其杰出之篇，可与东阳旗鼓相当，然就全体而论，终不免如绛、灌之于韩、彭。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甚至说他的诗实有高出于东阳者，实非笃论。他的《山丹题壁》诗，苍凉似杜甫，今录如下：

关山偪仄人踪少，风雨苍茫野色昏。万里一身方独往，百年多事共谁论？东风四月初生草，落日孤城早闭门。记取汉兵追寇地，沙场犹有未招魂！

吴宽，字原博，号匏庵，长洲人。成化八年进士，官至掌詹事府，礼部尚书。卒谥文定(《明史》卷一八四)。有《家藏集》七十七卷。他学有根柢，为当时馆阁巨手。学宗苏氏，字法亦酷肖东坡，缣素流传，赏鉴家视为至宝。诗文亦和平恬雅，有鸣鸾佩玉之风，以之羽翼茶陵，实如骖之有靳。黄宗羲《明文案序》说："成、弘之际，西涯雄长于北，匏庵、震泽发明于南，从之者多有师承。"震泽指王鏊，以制义(八股文)名，固不若宽之足以为茶陵羽翼也。宽诗如《秋雪叹》云：

吾生本江南，不惯见秋雪。见之自北都，都人亦不说。初偕雨兼零，忽逐风急刮。渐看瓦沟平，似畏石類滑。陡然作寒威，贫家势难活。米炭几时储？齑盐何处斡？以至裹曲身，况也无衣褐。病体强自支，忧世亦颇切。兹事已两见，浃旬未辽

阔。月令不深考，政事何所缺？惟天量有容，阳气终奋发。赤日中天行，穷檐遍昭晰。凉飔只凄然，勿遽变凛冽。霏霏嘉瑞成，却待嘉平节。

马中锡，字天禄，故城人。成化十一年(1475)进士，累官至兵部侍郎。以忤刘瑾改南京工部，寻勒致仕，逮系诏狱，斥为民。瑾诛，起抚大同，迁右都御史，提督军务，进左都御史，以师老无功，下狱，瘐死(《明史》卷一八七)。有《东田集》六卷。他的诗句律浑成，有明珠走盘、弹丸脱手之妙。那时候东阳报盟诗坛，他虽别派孤行，然能摆脱台阁陋习，固亦足以与东阳相羽翼的了。其诗如《幽居》云：

幽居人不到，抚景自流连。露重花垂地，风狂絮上天。莺声行酒曲，榆荚买春钱。只恐王维过，相疑是辋川。

吴俨，字克温，宜兴人。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谥文肃(《明史》卷一八四)。有《吴文肃公摘稿》四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他"当何、李未出以前，犹守明初旧格，无钩棘涂饰之习。其才其学虽皆不及东阳之宏富，而文章局度春容，诗格亦复娴雅，往往因题寓意，不似当时台阁流派，沿为肤郭。虽名不甚著，要与东阳肩随，亦足相羽翼也"。然而我们读他的诗，觉得近乎雕琢，如《听郑伶琵琶》云：

郑伶名价重江东，五百梨园伎尽空。子夜猿啼残月白，上林莺老落花红。江头商妇愁无限，塞外明妃恨不同。可惜曹纲今去远，何繇两市斗西风。

其他和东阳同时者，如程敏政，字克勤，休宁人。有《篁墩集》九十三卷。他以学问赅博为一时冠，然存诗太多，芜蔓不剪，以之羽翼东阳，不免稍有愧色。张弼，字汝弼，华亭人。有《东海集》九卷。为诗有豪气，和东阳友善。张泰，字亨父，太仓人。有《沧洲集》十二卷。陆釴，字鼎仪，昆山人。有《春雨堂稿》三十卷。陆容，字文量，太仓人。有《归田稿》三十七卷。他们三人，少齐名，号"娄东三凤"，然诗

名均在东阳下。储巏，字静夫，泰州人。有《柴墟集》十五卷、《驷野集》一卷。他为东阳弟子，其后又和李梦阳为友，故诗力雄厚，迥异当时台阁之体（均见《明史》卷二八六《文苑二》）。

第二节　文学的复古

当弘治、正德之际，内外渐多事，因时代环境的变迁，雍容平易的台阁体已不为潮流所容，于是茶陵一派起而振之。然茶陵派的诗文虽足以笼罩一时，还有人嫌其萎弱不足法，于是有李梦阳等起而倡言复古，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弗道，唐以后事不得用。振臂一呼，应者四起，茶陵派的光焰几为之尽熄，而文学复古遂成一代风气。

李梦阳（1472—1529），字献吉，庆阳人。弘治六年（1493）进士，授户部主事，迁郎中，以劾张鹤龄系狱，寻宥出，代韩文草疏劾刘瑾，谪山西布政司经历，复摭他事下狱，得释，瑾诛，起故官，出为山西提学副使，坐作宸濠阳春书院记削籍。天启中，追谥景文（《明史》卷二八六《文苑二》）。有《空同集》六十六卷。他恃才傲物，遭时不遇，行为遂多乖戾：尝为劾张皇后的弟弟鹤龄而得罪下狱，后来路上碰到了鹤龄，便乘着酒醉大骂他一顿，用马鞭子摧折了他两个门牙。居官的时候，僚属有不协的，便手披其颊；宴客则自居上坐，使客居下坐。其狂僻大抵如此。又当刘瑾把他下在监狱里想杀他的时候，他求救于康海，海为他去见刘瑾，替他说情。后来刘瑾败了，康海就为了救他的缘故，坐刘瑾党落职为民。他不但不为康海设法，反在那里讥议康海。马中锡为作《中山狼传》，讥斥他的负心。康海《对山集》有《读中山狼传》诗云："平生爱物未筹量，那计当年救此狼！笑我救狼狼噬我，物情人意各无妨。"他和李东阳有师生之谊（李梦阳曾师事李东阳，《空同集》诗有"吾师崛起杨与李，力挽一发回千钧"之句可证。杨指杨一清），他的坐事系狱，东阳也曾出全

力救他。他后来对于东阳的诗文，也尽情诋斥，至讥为“工雕浮靡丽之词，取媚时眼”（见《空同集·朱凌汉墓志》）。他尝在大梁书院田碑中有过这样的两句话：“宁伪言欺世而不可使天下无信道之名，宁矫情干誉而不可使天下无仗义之称。”后人以为这两句不啻他自己招供。然他当时以劾刘瑾得祸，士大夫震其气节，而才力雄健，持论又高，实足以竦当代之耳目，所以学者翕然从之。他对于文学上的见解，以为：“今人摹临古帖，不嫌太似，反曰能书，诗文之道，何独不然！”所以他主张散文及古体诗必效汉、魏，近体诗当法盛唐，教天下毋读唐以后书。他既提出了这个主张，自己便依了这个主张去实行模仿古人。所以他的散文，貌似秦、汉，故作聱牙，以艰深文其浅陋；诗则古体必汉、魏，近体必盛唐，往往句拟字摹，犯了食古不化的毛病。他的文不必深论，诗则颇有为后人所传诵者，如《石将军战场歌》：

清风店南逢父老，告我己巳年间事：店北犹存古战场，遗镞尚带勤王字。忆昔蒙尘实惨怛，反覆势如风雨至。紫荆关头昼吹角，杀气军声满幽、朔。胡儿饮马彰义门，烽火夜照燕山云。内有于尚书，外有石将军。石家官军若雷电，天清野旷来酣战。（钱谦益评云：叙事上下文不相关锁。）朝廷既失紫荆关，吾民岂保清风店。牵爷负子无处逃，哭声震天风怒号。儿女床头伏鼓角，野人屋上看旌旄。将军此时挺戈出，杀敌不异草与蒿。追北归来血洗刀，白日不动苍天高。万里风尘一剑扫，父子英雄古来少。天生李晟为社稷，周之方叔今元老。单于痛哭倒马关，败军半死飞狐道。处处欢声噪鼓旗，家家牛酒犒王师。休夸汉室嫖姚将，岂说唐朝郭子仪。沉吟此事六十春，此地经过泪满巾。黄云落日枯骨白，沙砾惨淡愁行人。行人来折战场柳，下马坐望居庸口。却忆千官迎驾初，千乘万骑下皇都。乾坤得见中兴主，日月重开再造图。枭雄不数云台士，杨、石齐名

天下无。(钱评云:内于外石,至此忽举杨、石,何其突兀不相照应?)呜呼战功今已无,安得再生此辈西备胡!

此诗音节激昂,在他的诗集中不可多得的作品,然细按其内容,诚如钱谦益所说:"叙事错互,比拟失伦,但矜才气,绝无脉理。"(见《列朝诗集》)后人对于他的诗文,颇多讥评。今列举钱谦益、陈文述的批评如下:

钱谦益说:

"献吉以复古自命,曰:'古诗必汉、魏,必三谢;今诗必初、盛唐,必杜,舍是无诗焉。'牵率摹拟,剽贼于声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如童子之洛诵,字则字,句则句,篇则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天地之运会,人世之景物,新新不停,生生相读,而必曰'汉后无文,唐后无诗',此数百年之宇宙日月,尽皆缺陷晦蒙,必待献吉而洪荒再辟乎?献吉曰'不读唐以后书',献吉之诗文,引据唐以前书,纰谬挂漏,不一而足,又何说也?"(见《列朝诗集》)

陈文述说:

"……即言其诗,亦甚乖谬:诗宗汉、魏,似已,然汉、魏之诗不一家;唐人宗少陵,似已,然唐人之名家不少,即少陵诗亦不一格。梦阳全以摹仿为能,夫摹仿未有不流剽窃者也。……若就其体制而论,沈归愚《明诗别裁》谓'梦阳五古,宗法陈思、康乐,过于雕刻,未极自然'。其实岂止不自然而已。七古如诗者不过数篇,余则学杜有作贼伤事主之病,何仲默讥为'小儿倚壁能行,否则仆地',良非过苛。七律为世所推,不知最无足观,摹仿少陵皆其下驷及拗体耳,求其完善堪厌卷者,指不能一再屈也。至绝句本非少陵所长,亦复效之,其无识不待言矣。"(见《颐道堂文集·书〈李空同集〉后》)

钱、陈两氏的批评,颇能切中梦阳之病。平心而论,梦阳才思纵

横，亦自不可多得，假使他不走入魔道，在文学上的成就必有可观。后人有推奖他的复古之功为不可没的，如陈田说："追李、何起而坛坫下移郎署，古则魏、晋，律必盛唐，海内翕然从之。譬之力侔贲、育则勇夫夺气，音希韶、濩则他乐不请，取法乎上，势不得而阻也"。又说："茶陵诗文固自可传，而空同复古之功亦不可没。"（见《明诗纪事丁籤序》）亦有指斥他为贻误后学的，如黄宗羲说："空同矫为秦、汉之说，……其后王、李嗣兴，持论益甚，招徕天下，靡然而为黄茅白苇之习，……百年人士染公超之雾而死者，大概便其不学耳。"（《南雷文约·明文案序》下）我们如果说他是功之首、罪之魁，大概没有什么不对的吧。

李梦阳倡言复古，为之犄角者有何景明，为之羽翼者有徐祯卿、边贡，号称"弘正四杰"。

何景明(1484—1522)，字仲默，信阳人。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授中书舍人。正德初，刘瑾乱政，遂谢病归。瑾诛，用李东阳荐，再除中书、直内阁制敕房。久之，转吏部员外郎，出为陕西提学副使，嘉靖初引疾归，抵家六日而卒(《明史》卷二八六《文苑二》)。其诗文有《大复集》三十八卷。他先和梦阳倡复古之论，名成之后，互相诋諆，两家壁垒，屹不相下。然摹拟蹊径，所短略同。他论诗文，以为："诗溺于陶(潜)，谢(灵运)力振之，古诗之法亡于谢；文靡于隋，韩(愈)力振之，古文之法亡于韩。"其好为高论大言，以欺世吊诡，亦和梦阳略同。所以弘、正间的文学复古派，他和梦阳实为首领，后人亦每以何、李并称。然平心而论，他才气实高出梦阳，虽诗宗李、杜，文仿马、班，而不像梦阳那样的字规句模，故词采秀逸，往往有之。当李、何两家断断争辩的时候，薛蕙有诗批评两家说："俊逸终怜(怜作爱字解)何大复，粗豪不解李空同。"是在当时已有定评了。清汪端《明三十家诗选》对于空同颇致不满，而对他却多好评。她说："大复天才高瞻，体被文质。五言撷三谢之菁英，近体臻

嘉州之堂奥，本不必以学杜为重。惟七古及在京时律诗，法杜之气格而不规抚字句，雄深宕逸，时或近之，度越空同，奚止十倍！余尝与澄怀共论李、何得失，以为空同学杜，新莽之于周公也；大复学杜，王景略之于诸葛武侯也。前后七子，自当以大复为冠，试取诸人诗平心读之自见矣。"我们且读景明的诗：

十二峰头秋草荒，冷烟寒月过瞿塘。青枫江上孤舟客，不听猿声也断肠。

——竹枝词

清晨发平越，雾暗山益密。仆夫各相戒，路远恐迷失。薄午游气清，参差众峰出。鸡鸣溪谷中，始见崖上日。云叶分杳冥，高原被华实。秋风起丛林，兴感乃非一。悠悠远行游，历险难具述。

——平越

徐祯卿(1479—1511)，字昌谷，一字昌国。本琴川人，徙家吴县。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除大理寺左寺副，乞徙南就养，会失囚，降国子监博士，卒于京师，年仅三十三(《明史》卷二八六《文苑二》)。有《迪功集》六卷、《谈艺录》一卷。他天性颖异，为诸生时已工诗歌，作诗有"文章江左家家玉，烟月扬州处处花"之句，为时传诵。登第后，与李梦阳游，悔其少作，既而趋汉魏、盛唐，吴中名宿，颇讥诮他学步邯郸。他的论诗宗旨，见于《谈艺录》及《与李梦阳书》，如说："古诗三百可以博其源，遗篇十九可以约其趣，乐府雄高可以励其气，《离骚》深永可以裨其愚。然后法经而植旨，绳古以崇辞。或未臻其奥，吾亦罕见其失也。"又说："绳汉之武，其流也犹至于魏；宗晋之体，其弊也不可以悉。"据其所谈，仍旧是梦阳摹古的门径。然而他虽和梦阳同调，而其丰神、气魄故自不同，中原习气未深，江左流风犹在，所以梦阳说他"大而未化，蹊径存焉"。他的诗和景明源流略同，然景明俊逸而他矜贵，又有不同之处。他的诗如《偶

见》云：

深山路曲见桃花，马上匆匆日欲斜。可奈玉鞭留不住，又衔春恨到天涯。

边贡(1476—1532)，字廷实，历城人。弘治九年(1496)进士，官至南京户部尚书(《明史》卷二八六《文苑二》)。有《华泉集》十四卷。他少负才名，美风姿，所交多海内名士。少与李梦阳善，晚年亦与之不协，所以他染梦阳的习气未深。其近体诗秀整婉约，有盛唐遗韵。如《重赠吴国宾》云：

汉江明月照归人，万里秋风一叶身。休把客衣轻浣濯，此中犹有帝京尘。

李、何、边、徐四人，加入王廷相、康海、王九思，号"七才子"，亦称"前七子"。

王廷相(1474—1544)，字子衡，仪封人。弘治十六年(1503)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明史》卷一九四)。有《王氏家藏集》六十八卷。他起李、何之后，而凌厉驰骋，欲与并驾齐驱。他对于李梦阳推崇备至，称其"掩蔽前贤，命令当世，秦、汉以来，罕见其俦"。但后来梦阳既已浪得大名，目空一切，不把他放在眼里，他对于梦阳也就颇有微辞。然而轨辙相循，他的诗亦不出李、何一派的门户。如《赭袍将军谣》云：

万寿山前擂大鼓，赭袍将军号威武。三边健儿猛如虎，左提戈，右张弩，外庭言之赭袍怒。牙旗闪闪军门开，紫云罩甲如云排。大同来？宣府来？

康海(1475—1540)，字德涵，武功人。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第一，授翰林修撰，以救李梦阳落职为民(《明史》卷二八六《文苑二》附李梦阳传)。有《对山集》十卷。他罢免以后，纵情声伎，闲作乐府小令，使二青衣被之弦索，歌以宥觞。于文章不复精思，诗尤颓放。然他于诗文持论甚高，初和梦阳兴起古学，排抑茶陵，一时奉为

标的，也是复古派中的一个健将。他的散文，逸气往来，悠然自异，比较李梦阳的割剥秦、汉者，又自不同。诗亦利钝互见。今录其《艳词》一首，以见他晚年纵情声伎之一斑：

杳拨朱弦舞袖长，杨花默默杏花香。几时逐得春游队，烂向东风醉海棠。

王九思，字敬夫，鄠县人。弘治九年(1496)进士，官至吏部郎中，坐刘瑾党，降寿州同知，寻勒致仕(《明史》卷二八六《文苑二》，附李梦阳传)。有《渼陂集》十六卷，又有《碧山乐府》五卷。他的诗文初学茶陵一派，其后李梦阳等倡言复古，他舍所学而从之。其自序《渼陂集》说："始为翰林时，诗学靡丽，文体萎弱。其后德涵、献吉导予易其习，献吉改正予诗稿今尚在，而文由德涵改正者尤多。"然他长于乐府，诗则雄健不如梦阳，文尤粗率甚于康海。诗如《浒西庄春日行乐词》云：

渭北神仙府，春来乐事多。花枝侵舞榭，日色艳宫罗。丽曲娇莺妒，红颜细马驮。更怜明月上，流影入金波。

前七子中去王廷相，加入顾璘、朱应登、陈沂、郑善夫，号"十才子"。

顾璘，字华玉，上元人。弘治九年(1496)进士，官至南刑部尚书(《明史》卷二八六《文苑二》，下朱、陈二人均附璘传)。所著有《浮湘集》四卷、《山中集》四卷、《凭几集》五卷、续集二卷、《息园存稿》诗十四卷、文九卷。他初与同里陈沂、王韦号"金陵三杰"，后朱应登继起，号"四大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他的诗"远挹晋安之波，近骖信阳之乘，在正德、嘉靖间固不失为第二流之首也"。如《懊恼曲》云：

小时闻长沙，说在天尽处。人言见郎船，已过长沙去。

朱应登，字升之，宝应人。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官至云南布政使参政。有《凌溪集》十八卷。他生平推李梦阳、康海为宗，尝口

占绝句云："文章康、李传新体，驱逐唐儒驾马迁。"其推服如此。然才力不及康、李，诗之可诵者极少，今姑录其《滇中怀归》诗以示例：

连岩望不极，唯见鸟飞还。乡心落何处？日没禺同山。

陈沂，字鲁南，先世鄞人，徙上元。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官至山西参政，行太仆卿。有《遂初斋》、《拘墟馆》二集。他长于持论，极言一时学杜之弊，虽名列十才子，而和复古派气味不相投。当时大江南北，文士称朱、顾、陈、王，王指王韦，和他都善于持论，而诗不尽工。

郑善夫，字继之，闽人。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官终南吏部郎中(《明史》卷二八六《文苑二》)。有《少谷山人集》二十五卷。他的诗以学杜为多，王士祯《池北偶谈》说宋、明以来诗人学杜者，惟他得杜骨。但摹拟极肖，融化为难，所以他的作品，拙直枯悴，终不免诗囚之目。

第三节　这一时期的独立作家

当茶陵派、复古派的诗文相继风行的时候，有几个卓然自立、不依门傍户的作家，应该特别提出来的叙述在这里。我们立在文学的见地上，先把比较重要的作家王守仁升列于其他作家之前，年代虽有些错乱，但这是无法避免的。

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其先琅琊人，徙余姚。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授刑部主事，改兵部，以忤刘瑾，谪贵州龙场驿丞。瑾诛，历官至太仆寺少卿、鸿胪寺卿、兵部尚书等，封新建伯。卒谥文成(《明史》卷一九五)。尝筑室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阳明先生。有《王文成全书》三十八卷。他尝平大帽山、断藤峡诸贼，定宸濠之乱，勋业事功，炳烛一代。他又是一个理学大家，他的不朽并不在于诗文。然而他的散文特雅健有光采，上承宋濂、方孝孺之绪，下开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之先，诗格尤典正不尚奇巧。在明代文

学史上，他不愧为一个卓然自立的作家。他十一岁的时候，随他的祖父到京师，过金山寺，他的祖父和许多客人饮酒赋诗，大家正在沉吟的时候，他早已做成了一首，大为座客所惊叹。后来他为触犯了刘瑾，被谪为龙场驿丞，南下到了钱塘江。刘瑾差了他的心腹跟随了来，想加以杀害，他假托着投江，避去了刘瑾差来的人，附商船向舟山出发。船在海上遇着大风，竟流到了福建海岸。他有一首诗咏这回航海的事情道：

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

在月明的静夜中，险恶的风涛上，他却毫不惊惧地把目前的危险看做浮云之过太空，这是何等的胸襟！他有过一个时期溺于词章之学，后来自己懊悔了，说："吾焉能以有限精神为无用之虚文也！"便断然舍去，一意研究心性之学。谪迁龙场以后，居夷处困，始悟"格物致知"的奥妙，从此他跑出了文学界，成为一位理学大师了。他在龙场驿时所作的《瘗旅文》，情文并至，使数百年后读之犹为泪下。其文云：

维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来者，不知其名氏，携一子一仆，将之任，过龙场，投宿土苗家，予从篱落间望见之，阴雨昏黑，欲就问讯北来事不果。明早遣人觇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来，云："一老人死坡下，傍两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伤哉！"薄暮复有人来，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哭。"询其状，则其子又死矣！明日复有人来云："见坡下积尸三焉。"则其仆又死矣！（中略）二童悯然涕下，请往，就其傍山麓为三坎埋之。又以只鸡、饭三盂。嗟吁涕洟而告之，曰：

呜呼伤哉！繄何人？繄何人？吾龙场驿丞余姚王守仁也。吾与尔皆中土之产，吾不知尔郡邑，尔乌为乎来为兹山之鬼

乎？古者重去其乡，游宦不逾千里，吾以窜逐而来此，宜也，尔亦何辜乎？闻尔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尔率妻子躬耕，可有也，乌为乎以五斗而易尔七尺之躯；又不足而益以尔子与仆乎？呜呼伤哉！尔诚恋兹五斗而来，则宜欣然就道，曷为乎吾昨望见尔容蹙然，盖不任其忧者？夫冲冒雾露，扳援崖壁，行万峰之顶，饥渴劳顿，筋骨疲惫；而又瘴疠侵其外，忧郁攻其中，其能无死乎？吾固知尔之必死，然不谓若是其速；又不谓尔子尔仆亦遽尔奄忽也！皆尔自取，谓之何哉！吾念尔三骨之无依而来瘗尔。乃使吾有无穷之怆也。呜呼伤哉！纵不尔瘗，幽崖之狐成群，阴壑之虺如车轮，亦必能葬尔于腹，不至久暴露尔。尔既已无知，然吾何能为心乎？自吾去父母乡国而来此二年矣，历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尝一日之戚戚也。今悲伤若此，是吾为尔者重，而自为者轻也，吾不宜复为尔悲矣。吾为尔歌，尔听之！"歌曰：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游子怀乡兮，莫知西东。莫知西东兮，惟天则同。异域殊方兮，环海之中。达观随寓兮，奚必予宫？魂兮魂兮，无悲以恫！

又歌以慰之曰：与尔皆乡土之离兮，蛮之人言语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于兹兮。率尔子仆来从予兮，吾与尔遨以嬉兮，骖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乡而嘘唏兮。吾苟获生归兮，尔子尔仆尚尔随兮，无以无侣悲兮！道旁之冢累累兮，多中土之流离兮，相与呼啸而徘徊兮。飧风饮露，无尔饥兮。朝友麋鹿，暮猿与栖兮。尔安尔居兮，无为厉于兹墟兮！

当复古派没有兴起，茶陵诗派执盟骚坛的时候，长洲沈周以画名一代，诗亦挥洒淋漓，自写天趣，在茶陵诗派外别树一帜。其后文徵明、唐寅、祝允明等皆以书画名，诗亦各有所长，而都近于山林隐逸一流，在这个时代里虽算不得伟大的作家，但亦可称教外别传了。

沈周(1427—1509)字，启南，长洲人。隐居不仕(《明史》卷二九八《隐逸传》)。有《石田诗选》十卷、《耕石斋石田集》九卷。他以画名，诗非所留意，然以栖心丘壑，名利两忘，风月往还，烟云供养，其胸次本无尘累，故所作亦不雕不琢，自然拔俗，寄兴于町畦之外，可以意会而不可加以绳削，在当时也不愧是一个独立的作家。其《从军行》云：

马上黄沙拂面行，汉家何日不劳兵！匈奴久自忘甥舅，仆射今谁托父兄？云外旌旗娑勒渡，月明刁斗受降城。左贤早待长绳缚，莫遣论功白发生。

文徵明(1470—1559)，初名璧，以字行，更字徵仲，号衡山，长洲人。以岁贡荐授翰林院待诏(《明史》卷二八七《文苑三》)。有《甫田集》三十五卷。他和沈周都以书画名，亦并能诗。周诗挥洒淋漓，但自写天趣，如云容水态，不可限以方圆；他的诗则雅饬之中，时饶逸韵。他和徐祯卿、唐寅、祝允明有"吴中四子"之目，后祯卿从何、李游，他和唐寅等独能卓然自立，不屑依傍门户。他有《病中遣怀》二律，为却宁王宸濠的征聘而作，辞婉而峻，拒人于千里之外，读其诗便可想见其为人：

潦倒儒冠二十年，业缘仍在利名间。敢言冀北无良马，深愧淮南赋《小山》。病起秋风吹白发，雨深黄叶暗松关。不妨穷巷频回辙，消受炉香一味闲。

经时卧疾断经过，自拨闲愁对酒歌。意外纷纭知命在，古来贤达患名多。千金逸骥空求骨，万里冥鸿肯受罗？心事悠悠那复识，白头辛苦服儒科。

唐寅(1470—1523)，字伯虎，一字子畏，吴人。弘治十一年(1498)乡试第一，坐事下狱，放归。宁王宸濠尝用厚币征聘他，他察其有异志，便佯狂使酒，故意使宸濠不能堪，宸濠才放他还吴中。其后归心佛氏，取四句偈，自号六如居士(《明史》卷二八六《文苑三》

附徐桢卿传)。有《六如居士集》。他以画名，于诗文不甚措意，尝说："后世知我不在此。"晚年益自放，做诗不计工拙，然才气烂漫，时复斐然。他有《言志》诗云：

> 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

祝允明(1460—1526)，字希哲，长洲人。弘治五年(1492)举于乡，除兴宁知县，迁应天通判，自免归(《明史》卷二八六《文苑三》附徐桢卿传)。其诗文有《怀星堂集》三十卷。他右手枝指，故自号枝指生。他和唐寅并以放诞为世指目，寅善画而他以书名。他的诗取材颇富，造语颇妍；文亦潇洒自如，不甚倚门傍户。其诗如《秋日闲居》云：

> 逃暑因能暂闭关，不须多把古贤攀。并抛杯勺方为懒，少事篇章未碍闲，风堕一庭邻寺叶，云开半面隔城山。浮生只说潜居易，隐比求名事更艰。

和文、唐、祝等同时的，有孙一元者，以山林隐逸之流，发为清爽冲和之音，其诗在这一时期的独立作家中，亦可说是挺然翘楚的了。

孙一元(1484—1520)，字太初，自称秦人，或传为安化王之孙，也有说他是四川人的(《明史》卷二九八《隐逸传》)。王世贞题他的墓诗说："死不必孙与子，生不必父与祖。突作凭陵千古人，依然寂寞一抔土。"盖他的踪迹诡异，在当时已不能确定他是哪一地方的人了。他尝栖太白之巅，故自号太白山人。又尝西入华山，南入衡山，东登泰山。又曾到过吴中，和刘麟、吴琉、陆昆、龙霓称"苕溪五隐"。又尝和文徵明、朱朴等相唱和。后来和施姓的女儿结婚，遂终老于吴兴。今所存有《太白山人漫稿》八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一元才地超轶，其诗排寡凌厉，往往多悲壮激越之音。"《静志居诗话》谓其"瓣香在黄庭坚"，体格固略相近。然庭坚之诗沉思研

练而入之，故蟠拏倔强之势多；一元之诗轩豁披露而出之，故淋漓豪宕之气盛，其意境亦小殊也。然在我们看来，他究竟是山林隐逸之流，其诗不完全以淋漓豪宕见长。清汪端说他的诗“如山红涧碧，冷艳可人”。比之以林逋，庶几近之。我们且读他的诗：

来往不逢人，家住山深处。独鹤忽飞来，风动月中树。

——山中

瓦瓶倒尽醉难醒，独抱渔竿卧晚汀。风露满身呼不起，一江流水梦中听。

——醉吟

在这一时期的贵族中，如秦简王诚泳、肃靖王真淤，都以能诗名。

秦简王诚泳，号宾竹道人，太祖五世孙。弘治元年(1488)以镇安王袭封，十一年薨(《明史》卷一一六《诸王一》秦王樉传)。所著有《经进小鸣稿》十卷。他当十岁的时候，嫡母陈妃教他唐诗，日记一首。嗣位后，日赋一篇，从没有间断过。其诗古体清浅而质朴，近体谐婉可诵，七绝尤为擅场，往往有晚唐格意，那时候的馆阁之中，倒没有这样的清音了。如《秋夜》云：

秋声溢耳不堪听，燕坐高斋户半扃。霁月满窗明似昼，梧桐如雨下空庭。

肃靖王真淤，恭王贡锍子，太祖五世孙。成化中封世子，嘉靖五年(1526)薨(《明史》卷一一七《诸王二》肃王楧传)。有《星海集》。他博雅好文，善为诗，诗调高古，言边塞事尤感慨有意。如《塞上》云：

远出渔阳北击胡，将军谈笑挽雕弧。千金底购单于首，赎得沙场战骨无？

此外尚有几个应该提及的：在成、弘之际，莆田林俊(《明史》卷一九四)，为文体裁不一，大都奇崛博奥，不沿台阁之派；诗学山谷、

后山两家，颇多隐涩之词，而气味颇能远俗。余干人张吉（《明史》无传），诗文兢守先民矩矱，高明不及王守仁，而笃实胜之；才雄学富不及李、何，而平正通达则胜之。合州人邹智（《明史》卷一七九），诗文多发于至性，不假修饰之功，虽间伤朴遬，而真气流溢，感人者深。吴江人史鉴（《明史》无传。按：明宪宗、孝宗时有两史鉴，其一长洲人。此史鉴著有《西村集》八卷，见《四库总目提要》别集类），为诗落落无俗韵。莆田人方良永（《明史》卷二〇一），为文信笔挥洒，虽不刻意求工，而和平坦易，转比钩棘摹拟者为佳。其同乡人郑岳（《明史》卷二〇三），为诗深于讽谕之体，文亦落落远俗。安仁人刘麟（《明史》卷一九四），尝依姻家吴琉于长兴，和孙一元、文徵明等相唱和，其诗都盎然天趣，读之足消鄙吝。泰兴人张羽（明史有传。按：此张羽字举风，泰兴人。与明初"吴中七杰"之张羽同姓名，而皆工诗，岂有心仿效蔺相如之慕欤），为诗规摹盛唐，不落纤巧之习。故城人孙绪（《明史》无传），为文沉著有奇气，其所著《无用闲谈》，深以李梦阳等貌袭秦、汉为非，亦当时一卓然自立的作家。宜兴人杭济（《明史》无传），及其弟淮，并负诗名，和李梦阳等唱和，其诗格清体健，在弘、正之际，不高谈古调，亦不沿袭陈言，颇谐中道。德清人陈霆（《明史》无传），以填词称一时能手，其词豪迈激越，有苏、辛遗范，如《踏莎行·晚景》云：

> 流水孤村，荒城古道，槎牙老木乌鸢噪。夕阳倒影射疏林，江边一带芙蓉老。风暝寒烟天，低衰草。登楼望极群峰小，欲将归信问行人，青山尽处行人少。

金华人潘希曾，为文直抒胸臆，不尚模仿。上海人陆深（《明史》卷二八六《文苑二》），当正、嘉之际，七子之派盛行，而他的诗文独以雅正和平为宗，毅然不失其故步。嘉定人安磐（《明史》卷一九二），为诗风神独绝，尤长于批评，尝讥当时的复古派的诗为纸牡丹，也是一个皎然拔俗的作家。朝邑人韩邦奇（《明史》卷二〇一），

记闻淹通，学有根柢，当正、嘉之际，李、何方以复古相号召，他独不相附和，以著书余事，发为文章，不必沾沾求合于古人，而学有根柢，和掇拾浮华者不同。南城人夏良胜(《明史》卷一八九)，诗文虽无意求工，而皆岳岳有直气，虽不以词藻著名，要非雕章绘句之士所可同日语。吴县人杨循吉(《明史》卷二八六《文苑二》附徐祯卿传)，生平诗文杂著几千卷，然以任诞不羁，其诗往往近俳体。其他如增城人湛若水(《明史》卷二八三《儒林二》)、安阳人崔铣、泰和人罗钦顺、怀庆人何塘(均见《明史》卷二八二《儒林一》)、昆山人魏校，永丰人夏尚朴(《明史》卷二八三《儒林二》附娄谅传)，并以理学名，其诗大都作击壤体，虽不至为有韵之语录，但在此可置之不论的。此外见于《明史·文苑传》者，如常熟人桑悦、祥符人李濂等，皆以诗文名一代，然比较上述诸家，似都未逮。至杨慎、薛蕙、王廷陈等，在正德、嘉靖之际卓然名家，当在下章叙述。

第四章　嘉靖、万历间的文学

第一节　嘉靖间的诗人

复古派的诗文，到了嘉靖初，声势虽盛，而后生英俊已稍稍厌弃，诚如陈田《明诗纪事序》所说的："城中高髻，里妇捧心。下士趋风，有识走避。"于是散文方面有王慎中等起，变秦、汉为欧、曾；诗歌方面则有高叔嗣、四皇甫等，都能摆脱窠臼，自抒情性。这一个时代，是黄宗羲所谓"二三君子振起于时风众势之中"（《明文案序》上）的时代。现在先从诗歌方面讲起。

在这里，我们又须把年代提前些，当正、嘉之际，杨慎、薛蕙、王廷陈等都能卓然自立，不随风会为转移。嘉靖初文体将变，这几个是承先启后的作家。

杨慎（1488—1559），字用修，新都人。正德六年（1511）第一人及第，授修撰，以议礼杖谪永昌。天启初追谥文宪（《明史》卷一九二）。有《升庵集》八十一卷、遗集二十六卷。他以宏才硕学，创为渊博之体，自谓得初唐之格，想于李、何外拔戟自成一队。但可惜专言格调，未免和复古派一样的堕入摹仿古人的魔道，所以钱谦益说他"摹仿惯则瑕疵互见"（见《列朝诗集》）。然而在正、嘉之际，他实不失为一个承先启后的作家。其诗如《于役江乡归经板桥》云：

> 千里长征不惮遥，解鞍明日问归桡。真如谢朓宣城路，南浦新林过板桥。

他又长于填词，所辑《百琲真珠》、《词林万选》，后人推为词家功臣。其词如《误佳期》云：

> 今夜风光堪爱，可惜那人不在！临行多是不曾留，故意将人怪。　双木架秋千，两下深深拜，条香烧尽纸成灰，莫把心

儿坏。

薛蕙(1489—1541),字君采,亳州人。正德九年(1514)进士,授刑部主事,历官至员外郎中,以议大礼下诏狱,寻复职,未几罢归(《明史》卷一九一)。有《考功集》十卷。当正、嘉之际,李、何声势方盛,他独以清削婉约介乎其间。其诗虽亦拟议多而变化少,然当其自得,觉笔墨之外别有微情,非生吞汉、魏,活剥盛唐者比。其后诗文之体渐变,论者以为蕙实启之。其诗如《莫愁曲》云:

侬家住石头,绿水绕歌楼。不是工娱客,何缘字莫愁?

王廷陈,字稚钦,黄冈人。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改庶吉士,授吏部给事中,谏南巡杖谪裕州知州,寻免归(《明史》卷二八六《文苑二》)。有《梦泽集》二十三卷。他少年高第,恃才傲物,致放废终身。其诗意足语圆,轩然出俗,在正、嘉之际亦称一时之秀。当武宗将南巡的时候,他和同馆汪应轸等上书谏阻,学士石珤恐其获罪,特阻止他们,他作《乌母谣》书于翰林院壁间,其词云:

乌母谓乌子:弋人在傍汝勿啼!弋人得知将汝归,我但高飞起,安能救汝为?

杨慎等虽欲一变李、何之体,但自己也落了摹仿古人的窠臼,终未能于李、何外别树一帜,求能直抒胸臆,摆脱窠臼,不拘拘于一家一格。而婉恻悲凉,恬吟密咏,可称中立而不倚的,在嘉靖初要推高叔嗣。

高叔嗣(1501—1537),字子业,祥符人。嘉靖二年(1523)进士,官至湖广按察使(《明史》卷二八七《文苑三》)。有《苏门集》八卷。他十六岁的时候作《申情赋》几万言,由是知名。初受知于李梦阳,然其诗摆脱窠臼,自抒情性,乃迥与梦阳异调。王世贞《艺苑卮言》说:"高子业诗如空山鼓琴,沉思忽往,木叶尽脱,石气自清。又如卫洗马言愁,憔悴婉笃,令人心折。"王世懋《艺圃撷余》亦说:"诗有必不能废者,虽众体未备而独擅一家之长,如孟浩然洮洮易尽,止以五

言隽永，千载并称王、孟，我明其徐昌谷、高子业乎？二君诗有不同而皆巧于用短：徐以高韵胜，有蝉蜕轩举之风；高以深情胜，有深闺愁妇之能。更千百年，李、何有时兴废，二君必无绝响。”世贞、世懋论诗颇有异同，而品题叔嗣则两相符契，可见至当之论是无从变易的。其诗如《病起偶坐》云：

空斋晨起坐，欢游罢不适。微雨东方来，阴霭倏终夕。久卧不知春，茫然怨行役。故园芳草色，惆怅今如积。

嘉靖初诗人除高叔嗣外，华察的诗冲淡闲旷，近乎陶潜一流。皇甫冲兄弟以造诣古澹，为吴中后起之秀。

华察（1497—1574），字子潜，号鸿山，无锡人。嘉靖五年（1526）进士，官至侍读学士，掌南院，罢归（《明史》卷二八七《文苑三》附王慎中传）。有《岩居稿》八卷。他里居时，和施渐、王懋明、姚咨相唱和，称“锡山四友”。其诗才思不及高叔嗣，然在当时亦不失为一有名作家。如《惠山寺与子羽话别》云：

看山不觉暝，月出禅林幽。夜静见空色，身闲忘去留。疏钟隔云度，残叶映泉流。此地欲为别，诸天生暮愁。

皇甫冲，字子浚，长洲人。嘉靖七年（1528）举人（《明史》卷二八七《文苑三》皇甫涍传，冲、汸、濂均附涍传）。有《华阳集》六十卷。他和其弟涍、汸、濂并以诗名，号“四皇甫”。涍先卒，汸、濂都已成进士，而他犹上公车，蹭蹬了二十多年而死。他的诗摹古不化，远出汸、濂之下。钱谦益《列朝诗集》引金陵张文约的话说“四甫之才，子浚为冠”，要非笃论。今举其可诵的一首《见新草》如下：

北地无暄候，不知冬与春。朝来原上草，忽见一丛新。能乱行边思，浑迷望里神。天涯三月暮，犹作未归人。

涍，字子安，冲弟。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官至浙江按察使佥事。有《少玄集》二十六卷、外集十卷。他的诗以五言为最工，萧疏古澹，谡谡如松下风。才思少逊其弟汸，而格韵固未多让。其诗如

《长安官舍对新月》云：

雨后延新月，杯前共此身。微晖不照绮，清汉欲生尘。自惜行将老，相看只合贫。开秋思无限，重感独归人。

汸，字子循，别号百泉子，浡弟。嘉靖八年(1529)进士，官终云南按察佥事，以大计免官。有《司勋集》六十卷。他在兄弟中最为老寿，死的时候，年纪已经八十岁了。其诗古体源出三谢，近体源出中唐，而雅饬雍容，不事雕琢，在兄弟中最为白眉。其后和王世贞齐名，时人谓"百泉如齐、鲁，变可至道；弇州如秦、楚，强遂称王"。他的咏月诗最可诵，如《对月答子浚怀诸兄弟作》云：

南北何如汉两京，迢迢吴越两乡情。谢家楼上清秋月，分作关山几处明？

濂，字子约，一字道隆，冲弟。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官终兴化同知。有《水部集》二十卷。他的诗虽不及他的哥哥，然善于言情，吴中先辈盛称他的《悼子乘》诗，以为不减安仁《悼亡》，能叙悲怨。今录其第二篇如下：

冥冥雨露集，熙熙岁始更。灵蠢各有化，人理独无生！念我泉下子，一绝如朝荣。生男以待终，胡为遘天茕？清尘布虚室，寒晦凝轩屏。流目无存影，涕泪交沾缨。恫怀何能已，叹息每遗声。堂闲旷綦迹，诗书空复盈。奚但肠九回？心膂成颓崩！愧乏延陵达，无乃伤吾明？

其他如许宗鲁(《明史》无传)，字伯诚，一字东侯，咸宁人。有《少华》、《陵下》、《辽海》，《归田》等集五十二卷。其诗音亮气遒，寓和婉于悲壮之中，为关中有名的诗人。黄佐(1490—1566)，字才伯，香山人(《明史》卷二〇九)。有《泰泉集》六十卷。他的诗吐属冲和，颇见研练，那时候茶陵之焰已熸，北地之锋方锐，犹能力存古格，不失雅音。南园后五子中如梁有举、区大任等，都是他的弟子。又当嘉靖初，益都人石存礼(《明史》无传)，致仕归，和蓝田、冯裕、刘澄

甫、陈经、黄卿、刘渊甫、杨应奎八人，结海岱诗社，其诗都清雅可观，无三杨台阁之习，亦无七子摹拟之弊。又海盐人朱朴（《明史》无传），尝和文徵明、孙一元等相唱和，尝结小瀛洲诗社，一时林下诸贤并邀入社。其诗虽未脱临摹之迹，在嘉靖初亦不失为一时一地的领袖。而杨继盛（《明史》无传）以经济气节重一代，诗文多披肝裂胆之作。其手书“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一联，今犹流传。遗嘱一篇，作于临命前一夕，数千言无一字涂改，至今世守，尤足见其所养；词虽质朴，而忠孝之意油然，足以感动百世。其他万历间的诗人，将于第六节中述之。

第二节　变秦汉为欧、曾

自何、李提出“文必秦、汉”的口号以后，一字一句，摹拟古人，其结果徒袭秦、汉的面貌，生吞活剥，诘屈聱牙，散文方面遂没有可读的作品。嘉靖初，王慎中、唐顺之等起而为欧（阳修）、曾（巩）之文，以矫李、何之弊，茅坤、归有光为之羽翼，李、何文集几遏不行。虽然王、唐等还是一样的摹仿古人，但变秦、汉为欧、曾，易诘屈聱牙为文从字顺，究竟比较的是近代些，自然些，所以那时候便有几篇散文可以供我们讽诵了。

王慎中（1509—1559），字道思，晋江人。嘉靖五年（1526）进士，官至河南布政使参事。后罢官，屏居二十年卒（《明史》卷二八七《文苑三》）。有《遵岩集》二十五卷。他当时和唐顺之、陈束、李开先、熊过、任瀚、赵时春、吕高称八才子，相与切劘为诗文。初亦高谈秦、汉，以为汉以下著作无足取。后来取宋人书读之，觉其味长，而曾巩、王安石、欧阳修之文尤可喜，像苏洵兄弟，犹以为过于豪而失之放。以此自信，遂取旧所为文如秦、汉者焚之。唐顺之见了，以为他头巾气太重，他说：“此大难事，君试举笔自知之。”没有多少时候，唐顺之也即变向来的主张，和他一样学做曾、欧一流的文章了。他

壮年废弃以后，益肆力于文，演迤详赡，卓然成家，尝说："吾之诗文，不外古人，而有高出古人者。"其自负亦不浅。朱彝尊《明诗综》说他的五言诗："文理精密，嗣响颜、谢，而论者辄言文胜于诗，未为知音。"今考他集中五言，如《游西山普光寺》、《睡起》、《登金山》、《游大明湖》诸篇固皆邃穆简远，然综其全集之诗与文相较，则深浅高下，自不能掩，他终究是一个散文作家。朱彝尊的话，未足凭信。他的散文一意师仿曾、欧，而得力于曾者较多。如《海上平寇记》的起段云：

守备汀、漳俞君志辅，被服进取，退然儒生也，瞻视在鞞芾之间，言若不能出口，温慈款悫，望之知其有仁义之容。然而桴鼓鸣于侧，矢石交乎前，疾雷飘风，迅急而倏忽，大之有胜败之数，而小之有死生之形，士皆掉魂摇魄，前却而沮丧，君顾意喜色壮，张扬矜奋，重英之矛，七注之甲，鸷鸟举而虓虎怒，杀人如麻，目睫曾不为之一瞬，是何其猛厉孔武也！……

唐顺之(1507—1560)，字应德，一字义修，毗陵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后罢官入阳羡山读书十八年，复召用，拜佥都御史，巡抚淮、扬，力疾巡海，卒于广陵舟中。崇祯初追谥襄文(《明史》卷二〇五)。所著有《荆川集》十二卷。他早年和王慎中论文不合，其后客气渐尽，乃互相倾挹。在八才子中他和慎中名最高，天下称之曰"王唐"。他文学欧、曾，诗学初唐，律体亦有佳篇，厥后谈兵讲学，不复能唱渭城，然其散文，在明朝中叶屹然为一大宗。他有《答茅鹿门主事书》，论文章本色，颇多特见，今节录于后：

熟观鹿门之文及鹿门与人论文之书，门庭路径，与鄙意殊有契合，虽中间小小异同，异日当自融释，不待喋喋也。至如鹿门所疑于我本是欲工文字之人，而不语人以求工文字者，此则有说。鹿门所见于我者，殆故吾也，而未尝见夫槁形灰心之吾乎？吾岂欺鹿门者哉！其不语人以求工文字者，非谓一切抹杀

以文字绝不足为也，盖谓学者先务，有源委本末之别耳。文莫犹人，躬行未得，此一段公案姑不敢论，只就文章家论之。虽其绳墨布置、奇正转折，自有专门师法，至于中间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则非洗涤心源，独立物表，具今古只眼者，不足以与此。今有两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谓具千古只眼人也，即使未尝操纸笔呻吟，学为文章，但直据胸臆，信手写出，如写家书，虽或疏卤，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字。其一人犹然尘中人也，虽其颛颛学为文章，其于所谓绳墨布置则尽是矣，然翻来覆去，不过是几句婆子舌头话，索其所谓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绝无有也，则文虽工而不免为下格。此文章本色也。即如以诗为喻，陶彭泽未尝较声律、雕句文，但信手写出，便是宇宙间第一样好诗。何则？其本色高也。自有诗以来，其较声律、雕句文，用心最苦而立说最严者，无如沈约，苦却一生精力，使人读其诗只见捆缚龌龊，满卷累牍，竟不曾道出一两句好话。何则？其本色卑也。本色卑，文不能工也，而况非其本色者哉！且夫两汉而下文之不如古者，岂其所谓绳墨转折之精之不尽如哉？秦、汉以前，儒家者有儒家本色，至如老、庄家有老、庄家本色，纵横家有纵横家本色，名家、墨家、阴阳家皆有本色，虽其为术也驳，而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之见，是以老家必不肯剿儒家之说，纵横必不肯借墨家之谈，各自其本色而鸣之为言。其所言者，其本色也，是以精光注焉，而其言遂不泯于世。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语性命、谈治道，满纸炫然，一切自托于儒家，然非其涵养畜聚之素，非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之见，而影响剿说，盖头窃尾，如贫人借富人之衣，庄农作大贾之饰，极力装做，丑态尽露，是以精光枵焉，而其言遂不久湮废。然则秦、汉而上，虽其老、墨、名、法、杂家之说而犹传，今诸子之书是也。唐、宋而下，虽其一切语性命、谈

治道之说而亦绝不传，欧阳永叔所见唐四库书目百不存一焉者是也。后之文人，欲以立言为不朽计者，可以知所用心矣。然则吾之不语人以求工文字者，乃其语人以求工文字者也。鹿门其可以自信我矣。……

王、唐既倡论尽洗一时剽拟之习，同时有李开先、陈束、赵时春、任瀚、熊过、吕高为之羽翼，称八才子（八才子中，赵时春见《明史》卷二〇〇，余均附见《明史》卷二八七《文苑三》陈束传）。开先，字伯华，章丘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官至太常少卿。有《中麓闲居集》十二卷。他做太常少卿的时候，为九庙灾，罢归田里。既不得志于时，遂置田产，畜声妓，徵歌度曲，为新声小令，搊弹放歌，自谓马东篱、张小山无以过也。所著词多于文，文多于诗，改定元人传奇乐府数百卷。然而他是一个以功名自负的人，汲汲于经世，不甚争文苑之名，所作随笔挥洒，散文不及王、唐，诗尤颓放，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他"持论确于李、何，而终不能夺李、何之坛，盖有由矣"。陈束，字约之，鄞县人。嘉靖八年进士，官至河南提学副使，卒于官，年仅三十三。有《后冈集》二卷。他初与唐顺之辈共倡为初唐、六朝之作，以矫李、何之习，晚而稍厌缛绯，心折于高叔嗣。然所学不逮顺之，又伤早逝，文章亦未成就，所以顺之终以古文鸣，而束无称焉。赵时春，字景仁，平凉人。嘉靖五年（1526）进士，官至右佥都御史。有《浚谷集》十六卷。他以将略自命，不屑屑以诗文名。《明史》本传称其"读书强记，文章豪肆，与唐顺之、王慎中齐名"。然他的散文实不及王、唐，诗亦在二三流之间，史所谓"文章豪肆"者，大概因为他当时与王、唐齐名，不得不略加赞美耳。任翰，字少海，南充人。嘉靖八年进士，官至春坊司直兼翰林检讨。有《忠斋集》。他和唐顺之等肆力为诗文，后皆被谴去。他闭门读书，常从幽人文士徜徉山水间，或传其入青城山，遇异人，授鸿宝修炼法，同时熊过亦好道家服食炼形之书，其后蜀人谈玄怪者，皆本任氏、熊氏。他的

散文不及王、唐，诗亦自为一派，和前后七子略近。熊过，字叔仁，富顺人。嘉靖八年进士，官至礼部员外郎中，坐事斥为民。有《南沙文集》八卷。他留心经学，其集中诸作，大抵应酬之文，诗亦罕见，选家多不及，仅《明诗纪事》载其《题王先生卷》一首，亦平淡无足称述。吕高，字山甫，丹徒人。嘉靖五年进士，官至太仆少卿。有《江峰漫稿》。他的散文失之方板，钱谦益说他"不堪与诸子骖乘"（见《列朝诗集》）。

嘉靖八子大都通经史，谙世务，往往为通儒魁士，以实学有闻。然严格地说，在文学方面，只有王、唐二人为一代杰出。其后茅坤、归有光治古文有声，然以年代的关系，其名不在所谓"才子"之列。

茅坤（1512—1601），字顺甫，别号鹿门，归安人。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官至大名兵备副使，中吏议罢归，林居五十余年卒（《明史》卷二八七《文苑三》）。有《白华楼藏稿》十一卷、续稿十五卷、《吟稿》八卷、《玉芝山房稿》二十二卷、《耄年录》七卷，又选唐、宋人自韩、柳、欧、三苏、曾、王八家文为《唐宋八大家文钞》一百六十四卷。他好为古文，于同时最佩服唐顺之。然根柢稍薄，摹拟有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秦、汉文之有窠臼，自李梦阳始；唐、宋文之亦有窠臼，则自坤始。故施于制义则为别调独弹，而古文之品，终不能与唐顺之、归有光诸人抗颜而行也。"我们但看前面所引唐顺之答复他论文的信，有谓"绳墨布置、奇正转折，虽有专门师法，至于中间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则非洗涤心源，独立物表，具今古只眼者，不足与此"云云，对于他的专讲文章格调、不讲文章精神的不满意，已意在言外了。黄宗羲说："观荆川与鹿门论文书，底蕴已自和盘托出，而鹿门一生，仅得其转折波澜而已，所谓'精神不可磨灭'者，未之有得。缘鹿门但学文章，于经史之功甚疏，故只小小结束。……不知者遂与荆川、道思并称，非其本色矣。"（《南雷文约·答张尔公论茅鹿门批评八大家书》）又他选的《唐宋八大家文钞》评

语疏舛，圈点批抹亦多不得要领。黄宗羲说他于韩文内“孔司勋志”不晓句读，《贞曜先生志》所云“来吊韩氏”谓不知何人，柳文内《与顾十郎书》误疑十郎为宗元座主，欧文内“薛简举进士第一让王严”疑其何以得让，又以张谷墓表“迁员外郎，复知阳武县”为当时特重令职，又孙之翰志学究出身进士及第为再举进士，皆不明宋制而妄为之说（同上）。然平心而论，八家全集浩博，学者遍读为难，他的选本，烦简尚称得中，实有惠于后学，所以几百年来其书盛行，至今研究唐宋文的莫不知有《八大家文钞》，更莫不知有茅鹿门，也可算一个豪杰之士了。

归有光（1506—1571），字熙甫，昆山人。少师事同邑魏校，应嘉靖十九年（1540）进士不第，退居安亭江上，讲学著文二十余年，学者称震川先生。到了嘉靖四十四年（1565）始成进士，年纪已经六十岁了。官至太仆寺丞（《明史》卷二八七《文苑三》）。有《震川文集》三十卷、别集十卷。他所为古文，虽视王、唐稍晚，而趣尚略同，当时王世贞等继李梦阳、何景明之后，提倡做秦、汉的古文，天下无不靡然从风，相与剽剟古人，求附坛坫。他独抱唐、宋诸家遗集，和二三弟子讲授于荒江老屋之间，毅然与之抗衡，对于王世贞辈排抵不遗余力。他在《项思尧文集》序中，有过这样一段激烈的话：

> 盖今世之所谓文者难言矣！未始为古人之学，而苟得一二妄庸人为之钜子，争附和以诋排前人。韩文公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文章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颃，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毋乃一二妄庸人为之钜子以倡导之欤？

王世贞听见了说：“妄诚有之，庸则未敢闻命。”他说：“唯庸故妄，未有妄而不庸者也。”然世贞晚年倒颇心折于他，赞他的遗像说：“风行水上，涣为文章，风定波息，与水相忘。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予

岂异趣，久而自伤。”盖所持者正，虽以世贞的高名盛气，终无以夺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自明季以来，学者知由韩、柳、欧、苏沿回以溯秦、汉者，有光实有力焉。”他的《李罗村行状》及《赵汝渊墓志》，为钱谦益所极口赞叹，以为“虽韩、欧复生，何以过此”。然不如他的《先妣事略》，能把琐屑的事，委曲写出，是极懂得文学上的剪裁方法的。其文云：

> 先妣周孺人，弘治元年二月十一日生。年十六来归，逾年生女淑静，淑静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殇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逾年生有尚，妊十二月；逾年生淑顺，一岁又生有功。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数颦蹙顾诸婢曰：“吾为多子苦！”老妪以杯水盛二螺进，曰：“饮此后，妊不数矣。”孺人举之尽，喑不能言。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诸儿见家人泣，则随之泣，然犹以为母寝也，伤哉！于是家人延画工画，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画有光，鼻以下画大姊。”以二子肖母也。
>
> 孺人讳桂。外曾祖讳明；外祖讳行，太学生。母何氏。世居吴家桥，去县城东南三十里，由千墩浦而南直桥，并小港以东，居人环聚，尽周氏也。外祖与其三兄皆以赀雄，敦尚简实，与人姁姁说村中语，见子弟甥侄无不爱。孺人之吴家桥则治木棉，入城则缉纑，灯火荧荧，每至夜分。外祖不二日使人问遗，孺人不忧米盐，乃劳苦若不谋夕。冬月炉火炭屑，使婢子为团，累累暴阶下，室靡弃物，家无闲人。儿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纫缀不辍，户内洒然也。遇僮奴有恩，虽至箠楚，皆不忍有后言。吴家桥岁致鱼蟹饼饵，率人人得食，家中人闻吴家桥人至，皆喜。有光七岁，与从兄有嘉入学，每阴风细雨，从兄辄留，有光意恋恋，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觉寝，促有光暗诵《孝经》，即熟读无一字龃龉，乃喜。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卒。周氏家有羊

狗之痾，舅母卒，四姨归顾氏又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与二舅存。孺人死十一年，大姊归王三接，孺人所许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补学官弟子，十六年而有妇，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抚爱之，益念孺人，中夜与其妇泣，追惟一二，仿佛如昨，余则茫然矣。世乃有无母之人，天乎痛哉！

像这样的文章，真如唐顺之所谓“绝无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间第一样绝好文章！”怪不得清代桐城派作者，推尊有光甚于王、唐了。然有光又以制义称雄一代，他老于场屋，到六十岁才成进士，对于制义是用过十二分的苦功的，因此，他所作的散文也颇受些影响。黄宗羲说：“议者以震川为明文第一，似矣；试除去其叙事之合作，时文境界，间或阑入。”（见《明文案序》上）这便是他的无可讳饰的短处。

第三节　复古派的再兴

当王、唐、归等倡为欧、曾之文，以矫李、何貌袭秦、汉之弊，海内靡然从风；同时高叔嗣、华察、四皇甫的诗，都能摆脱窠臼，自立门户。论理，复古派的诗文是不会再兴的了，然而事实却不如此。在嘉靖之季，有李攀龙、王世贞等所谓“后七子”者，又以复古相号召。前后七子相隔数十年，而此唱彼和，声应气求，如出一轨，灭灶再炊，死灰复燃。李、王的声势，几驾李、何而上之，而王、唐、归诸人，终等于衰周弱鲁，力不足以御强横。

李攀龙(1514—1570)，字于鳞，历城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官至河南按察使，以母死哀毁卒(《明史》卷二八七《文苑三》)。有《沧溟集》三十卷。他九岁就没了父亲，家贫，自奋于学。成进士的时候，李先芳、谢榛、吴维岳辈方倡诗社，先芳介绍他入社。其后王世贞、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先后加入，都年少才高，互相标榜，于是九个人中间，除去先芳、维岳，称“七才子”，而他却

做了魁首。尝告病归乡里，构白雪楼居之，东眺华不注，西挹鲍山，读书吟咏其中者十年，宾客造谒，都谢不见。他一生清介自持，身后寥落得很。相传他的宠姬蔡氏，万历中年已七十余，在济南的西郊卖胡饼自给，王士祯的叔祖季木见了，做了一首诗，有"白雪高埋一代文，蔡姬典尽旧罗裙"之句。一代文豪，身后寥落到如此，真值得后来的诗人为之低徊沉吟，感慨不已了。他天资英迈，实未易才，惜堕入了复古的魔道，其散文貌为秦、汉，聱牙戟口，读者至不能终篇。如《送赵处士还曹序》起段云：

> 赵子为获鹿者垂三年矣，则处士自曹来问为获鹿状也。曰："尔为获鹿则良哉。将下车视事而百姓煦煦自昵乎？宁能闵闵俟去后思也？维此多士，从游甚欢，而亦谔谔不可致乎？欲焉而丞若簿以至它县之令丞若簿，不一其才而一其衷乎？宁能倾夺不肖，从事独贤也？欲焉而秋毫是析，察其渊中，称神明乎？宁百里翕然，示慈敷惠，如我视尔于此也？不知中丞台若御史台若监司陈臬若郡大夫共理，所欲于尔发擿奸伏，聚敛租赋；孰与元元相安，美俗相劝也？不知豪贵人若中使者若诸长吏，所欲于尔骏奔磬折，出乎左右，意未及色，奉之如机；孰与强项正辞，援礼交际，临以横逆，搁然相竞也？"……

又他的拟古乐府，往往把古人原作更改数字，便算是自己的作品，如《拟陌上桑》云：

> 日出东南隅，照我西北楼。……罗敷贵家子，足不逾门枢。性颇喜蚕作，采桑南陌头。上枝结笼系，下枝挂笼钩。堕髻何缭绕，颜色以敷愉。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担故绸缪；少年见罗敷，袒裼出臂韝；……来归但怨怒，且复坐斯须。（按：原作云："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是原作的"坐"字，作因为解，李氏竟误会作行坐的"坐"字

解了。)

使君自南来,驻我五马车。遣吏前致问:“为是谁家姝?”“罗敷小家女,秦氏有高楼,西邻焦仲卿,兰芝对道隅。”“罗敷年几何?”“十五为人妇,嫁复一年余。”“力桑以作苦,孰与使君俱?”“使君复为谁?蚕桑所自娱。小吏无所畏,使君一何迂!罗敷他人妇,使君他人夫。”

“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左右三河长,负弩为先驱。何用识夫婿?飞盖随高车,象牙为车轸,桂树为轮舆,白马为上襄,两骖皆骊驹,青丝为马靷,黄金为辔头;腰中千金剑,自名为鹿卢。起家府小吏,拜为朝大夫,稍迁郡太守,出入专城居。月朔朝京师,观者盈路衢。为人既白皙,鬑鬑有髭须。四十尚不足,三十颇有余。座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

像这样的拟古,真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不值识者一哂。然而王世贞还在恭维他,说:“于鳞拟古乐府,无一字一句不精美。”阿其所好,一至于此,难怪要被后人掊击诟厉了。他的古乐府不足道,诸体诗亦亮节较多,微情差少,今举其两首以示例:

饥且从漂母食,寒且从巢父栖。石不为周客笑,玉不为楚王啼。菅茅但塞路,桃李自成蹊。

——猛虎行

天山雪后北风寒,抱得琵琶马上弹。曲罢不知青海月,徘徊犹作汉宫看。

——明妃曲

我们单读一二首,果然觉得清亮可诵,但读其全集,便觉用字雷同,这一首和那一首往往意思相差不远。从前人尝集他所常用的江湖、乾坤、落日、浮云、秋色、风尘、中原、吾辈等字,作成一诗,以相戏谑。艾南英、钱谦益、朱彝尊等,对于他的诗都表示不满。然平心而论,他资地本高,记诵亦博,其才力富健,凌轹一时,亦有不可磨灭

者，倘不堕入魔道，他的成就一定是很可观的。

后七子和前七子一样，不能等量齐观。何景明和李梦阳故自不同，王世贞和李攀龙也大有径庭。其他如谢榛、梁有誉，虽名列七子，而习染不深。和攀龙沆瀣一气的，在七子中只有宗臣、徐中行、吴国伦而已。

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自号凤洲，亦称弇州山人，太仓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官至刑部尚书（《明史》卷二八七《文苑三》）。有《弇州山人四部稿》一百七十四卷、续稿二百七卷、读书后八卷，自古文集之富，没有再过于他的。他和李攀龙绍述梦阳复古之说，攀龙既死，他著作日多，地望日高，独操文章之柄垂二十年。但到了晚年，论调渐变，论乐府则亟称李东阳，论诗文则推服陈献章、宋濂，而赞归有光的画像且说："余岂异趣？久而自伤。"又颇悔其四十岁时所做的《艺苑卮言》评论多失当之处。他初不喜苏轼的文章，但病亟时，有人见他还手执《东坡集》讽玩不置。所以他晚年的文章，反复条畅，颇类苏轼，无复摹秦仿汉的习气。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说他"才气十倍于鳞。……当时名虽七子，实则一雄"，并非过奖。他的父亲做蓟辽总督，为严嵩父子构死，及严氏父子败，他作《袁江流》、《钤山冈》乐府，数严氏父子的罪恶，多至千六百言，朱彝尊等交口称赞。诗过长，不录，录其五、七绝各一首如后：

> 旌旗春偃白龙堆，教客休停鹦鹉杯。歌舞未残飞骑出，月中生缚左贤来。
>
> ——塞上曲
>
> 阿姊扶床泣，诸甥绕膝啼。平安只两字，莫惜过江题！
>
> ——送妻弟魏生还里

谢榛（1495—1575），字茂秦，自号四溟山人，一号脱屣老人，临清人（《明史》卷二八七《文苑三》）。有《四溟集》十卷，又有《诗家杂说》。他眇一目，少好游侠，已而折节读书，刻意为诗歌。嘉靖间挟

诗卷游京师，以救卢柟，攀龙等重其行谊，推为盟长。当时攀龙之名未盛，称诗选格，多取决于他。其后攀龙名渐盛，位渐高，与他论诗不合，又因他以布衣跻显贵，遂遗书和他绝交，王世贞等多袒攀龙，不把他放在七子、五子之列。然而他游道日广，秦、晋诸藩争延为上客，河南北都称他谢榛先生，虽终于布衣，而声价重一代。他的诗近乎前七子中徐祯卿一流。清汪端说："昌谷诗尽洗芜词，故澹远而色韵自古。茂秦诗不专虚响，故精深壮丽，而怀抱极和。虽当空同、沧溟声焰大炽之时，为所牢笼推挽，参前后七子之席，然本色自存，究非叫嚣痴重，随人作计者比。是以昌谷始未输心，而茂秦终且避面，宜其造诣皆卓而不群也。"(《明三十家诗选》)其诗如《暮秋即事》云：

十见黄花发，孤樽思不胜。关河秋后雁，风雨夜深灯。留滞愁王粲，交游忆李膺。相随年少子，走马猎韩陵。

梁有誉，字公实，顺德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官至刑部主事(有誉和宗臣、徐中行、吴国伦均附见《明史》卷二八七《文苑三》李攀龙传)。有《兰汀存稿》八卷。他恬静好学，少与欧大任、黎民表并游黄佐之门，又和大任、民表及吴旦、李时行结南园诗社，号"南园后五子"，其诗得于师友者深，故虽名列七子而习染未甚。在后七子中，谢榛而下，要算他的诗最自然的了。如《秋夜过黎氏山房》云：

瑶琴不复理，空余山水情。弃置石床上，风来时一鸣。

宗臣(1525—1560)，字子相，兴化人。嘉靖二十九年进士，官终福建提学副使。有《宗子相集》十五卷。他性耿介，不附权贵，当时严嵩擅权，俱是乞怜昏暮、骄人白日的一辈人，他在《报刘一丈书》中写其丑形恶态，淋漓尽致，为后人传诵。其诗跌宕俊逸，而意境未深，闲伤俚俗，自入七子之社，渐染习气，日以窘弱，最可惋惜。然若汰其芜浅，存其精华，隽句名篇往往有之。如《送吴山人》云：

黄菊故人杯，青山游子路。匹马向垂杨，回首燕云暮。

徐中行（？—1576），字子与，号龙湾，长兴人。读书天目山下，故自称天目山人。嘉靖二十九年进士，官至江西布政使。有《天目山堂集》二十卷。他是复古派中的忠实同志，陈子龙《明诗选》说他“虽追摹古哲，而心慕手追，常在济南”。他的诗和李攀龙相近，如《初入滇关》云：

苍然平楚望，云是古滇疆。白日开南徼，青天豁大荒。河山犹内地，花木自殊方。吹尽浮云色，雄风万里长。

吴国伦，字明卿，兴国人。嘉靖二十九年进士，官终河南参政。有《甔甀集》五十四卷、续稿二十七卷。他在后七子中最为老寿。王世贞死了以后，他和李维桢、汪道坤狎主诗坛。然朱彝尊说：“三君皆不知诗。王、李既没，海内不敢有违言，刘子成、冯元成、屠讳真辈相与附和之，《甔甀》、《太函》、《大泌》等集，几与《四部》（《弇州山人四部稿》）争富，而《由拳》、《白榆》等集尤而效之，海内之为真诗者寡矣。”（见《静志居诗话》）当时胡应麟作《诗薮》，亦已讥其“用句多同，一篇而外，不堪多读”。他的诗如《高州杂咏》云：

粤南天欲尽，风气迥难持。一日更裘葛，三家杂汉夷。鬼符书辟瘴，蛮鼓奏登陴。遥夜西归梦，惟应海月知。

王世贞自李攀龙死后，独执诗坛牛耳，和他交接的，大都见于他的《四部稿》中，而又各为标目，以李攀龙、徐中行、梁有誉、吴国伦、宗臣为“前五子”，其他又有“后五子”、“广五子”、“续五子”、“末五子”等名称，后且广为“四十子”。然所弃取，颇以好恶为高下。今分述如次：

后五子为张佳胤、余曰德、张九一、汪道昆、魏裳（后五子除张佳胤见《明史》卷二二二外，余均附见《明史》卷二八七《文苑三》王世贞传）等。佳胤，字肖甫，初号岼山，更号居来山人，铜梁人。嘉靖二十九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总督蓟、辽。有《居来山房集》六十五

卷。曰德，初名应举，南昌人。与佳胤同成进士，官至福建按察副使。有《余德甫集》十四卷。张九一，字助甫，新蔡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官至右佥都御史，巡抚宁夏。有《绿波楼文集》五卷、《诗集》十四卷。他们三人的字都有一个“甫”字，王世贞称为“吾党三甫”。后来魏裳入社，裳字顺甫，便又称“四甫”。道昆，字伯玉，歙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官至兵部侍郎，有《太函集》一百二十卷。魏裳，字顺甫，蒲圻人。嘉靖二十九年进士，官至济南府知府。有《云山堂集》六卷。他们的诗，大都沿袭七子格调，余、魏尤卑弱。道昆虽高自标置，尝大言说：“苏轼文章一字不通，当以劣等处之。”然而他的文章刻意摹古，往往引古语以证今事，扞格不畅；于诗本无所解，沿袭七子末流，妄为大言以欺世而已。

广五子为卢柟、欧大任、俞允文、吴维岳、李先芳(卢、欧分别附见《明史》卷二八七《文苑三》谢榛传、黄佐传，俞附见卷二八八《文苑四》王穉登传，吴、李均附见卷二八七《文苑三》李攀龙传)。柟，字少楩，一字次楩，又字子木，浚县人。以赀为国子监生。有《蠛蠓集》五卷。他尝被诬系狱，谢榛救之，得不死。后游江、浙，无所遇而还，抑郁以没。其诗真气坌涌，虽名列广五子，而绝不染句棘涂饰之习，如《陇水曲》云：

陇山当面起，陇水向西流。中含妾堕泪，几日到凉州？

大任，字桢伯，顺德人。以岁贡选江都训导，历官至南户部郎中。有《虞部集》二十二卷。他虽名列广五子，同时又为南园后五子之一。诗虽未脱时习，然往往有温厚庄雅、自写性情的作品。允文，字仲蔚，昆山人。有《仲蔚集》二十四卷。他和王世贞最要好，世贞尝称其《宝剑篇》中有“海内常令万事平，匣中不惜千年死”，为不可多得之句。然就其全体而论，殊少神解，其品尚在卢柟之次。维岳，字峻伯，孝丰人。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官至右都御史，巡抚贵州。有《天目山斋岁编》二十四卷。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评他的诗，以为如

“铅刀土花，不堪洒削”。然又举其五律佳句如“关河春雁少，风雨梦中多”等，以为不可多得的名句云。李先芳，字伯承，号北山，监利人，寄居濮州。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官至尚宝司少卿。有《东岱山房稿》三十卷。他先和维岳等倡诗社，李攀龙之入社，还是由他介绍。其后攀龙等名日以盛，竟摈斥他不预七子之列，他非常愤慨，世贞乃收之于广五子之中。然他的诗格实在攀龙等之下，在广五子中也未免稍为逊色。

续五子为黎民表、石星、王道行、朱多煃、赵用贤(黎附见《明史》卷二八七《文苑》黄佐传，石、王、朱均附王世贞传，赵见《明史》卷二二九)，而民表最为杰出。民表，字惟敬，从化人。嘉靖十三年(1534)举人，官终布政使参议。有《瑶石山人稿》十六卷。他的诗风骨典重，无绮靡涂饰之习。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说：“元美所取续五子，无愧大小雅者，仅此一人而已。”其诗如《阻风李阳河驿》云：

> 满目川原百战余，旅情芳草共萧疏。苍山古堠逢秋骑，野水残烟见夜渔。地近潇湘多暮雨，风来湓浦少乡书。故人忆我停云外，惆怅烟波不定居。

星，字拱宸，东明人。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加太子少保，以事下狱死。道行，字明甫，阳曲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官至四川布政使，有《桂子园稿》。多煃，字用晦，宁献王六世孙，封奉国将军。有《朱用晦集》。用贤，字汝师，常熟人。隆庆五年(1571)进士，官至吏部侍郎，卒谥文毅。有《松石斋文集》三十卷、《诗集》六卷。续五子中除民表外，诗都在第二流下。惟多煃以贵族工诗。取舍所谓广五子、续五子等，大都出于一时标榜，未足据以为定论的。

末五子为李维桢、胡应麟、屠隆、魏允中(李见《明史》卷二八八《文苑四》，胡附卷二八七《文苑三》王世贞传，屠附卷二八八《文苑四》徐渭传，魏附卷二三二《魏允贞传》)，而赵用贤也加入在内。维

桢(1547—1626),字本宁,京山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官至礼部尚书。有《大泌山房集》一百三十四卷。他为人乐易阔达,文章宏肆有奇气,然多率意应酬,体格不高;诗亦选词征典,不善持择,多陈因之言。应麟,字元瑞,兰溪人。万历四年(1576)举人。有《少室山房类稿》一百二十卷、《诗薮》十八卷、《少室山房笔丛》正续稿共四十八卷。他依附王世贞得名,所作《诗薮》大都奉世贞《艺苑卮言》为律令而敷衍其说。诗文亦仰承七子余派,少可称述。然所著《笔丛》皆其生平考据杂说,虽利钝互陈,而可资考证者不少。在当时心学横流,他独研索旧文,参校疑义,以稽古为事,亦不失为读书种子。隆,字长卿,鄞县人。万历五年进士,官至礼部员外郎中。有《由拳集》二十三卷、《栖真集》三十卷。他为人放诞,诗文纵情奔放,不知剪裁;文尤语多藻绘,漫无持择。盖沿李、王之涂饰而兼染当时袁中道兄弟之纤佻,实无可称述者。允中,字懋权,南乐人。万历八年(1580)进士,官至吏部主事。有《仲子集》八卷。他的诗五律以疏爽称,七律调高而多浮响,总不脱当时习气。

世贞于前、后、广、续、末五子外,又纪远交近游,作《四十子咏》,为皇甫汸、莫如忠、许邦才、周天球、沈明臣、王祖嫡、刘凤、张凤翼、朱多煃、顾孟林、殷都穆、文熙、刘黄裳、张献翼、王稚登、王叔承、周弘禴、沈思孝、魏允贞、喻均、邹迪光、余翔、张元凯、张鸣凤、邢侗、邹观光、曹昌先、徐益孙、瞿汝稷、顾绍芳、朱器封、王廷绶、徐桂、王伯稠、王衡、汪道贯、华善继、张九一、梅鼎祚、吴稼登之属。然四十子中或有为前面所已叙述过的,或为下面所当特别叙述的,其余大都沿七子余派,未能卓然成家,只有置之存而不论之列。

第四节　复古派的反对者

当复古派再兴的时候,海内靡然从风,不奉李、王之教者,几等于夷狄之不奉正朔。然亦有对复古派的诗文及其所持的论调表示

反对者，如徐渭、汤显祖、于慎行、公鼐、王叔承等都是。而王世贞的弟弟世懋，论诗独持己见，不随声附和，尤为难得。

徐渭(1521—1593)，字文清，更字文长，一字天池，晚年又号青藤，山阴人(《明史》卷二八八《文苑四》)。有《徐文长集》三十卷。他知兵好奇计，胡宗宪督师浙江，招致幕府，和鄞人沈明臣(沈明臣字嘉则，有诗名，尝作铙歌有句云"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为后人传诵)等同管书记。宗宪擒徐海，诱王直，他都参预其谋。宗宪下狱，他惧祸发狂，几次自杀，都不死。又以击杀后妻，系狱当死，赖张元汴的援救得免。于是他游金陵，北走宣、辽，纵观诸边阨塞，入京师，住在张元汴的家里。元汴导以礼法，他很不高兴，说："吾杀人当死，颈一茹刃耳。今乃碎磔吾肉！"便一怒而去。回到家里，挟一犬同居，闭户不见一人。后元汴死，他白衣往吊，抚棺大恸，不告姓名而去。十年中间，只有这一次出了家门。贫甚，卖书画自给。家里有书千卷，斥卖殆尽。帱莞破敝，至藉藁以寝。他天才超轶，诗文迥出伦辈，尤善书画。少受业于同里季本，传姚江纵恣之派，不幸而学问未充，声名太早，一为权贵所知，遂侈然不复检束，到了时移事易，侘傺穷愁，自知决不见用于时，益愤激无聊，其人品颇近于清朝金圣叹一流。到现在徐文长、金圣叹的大名，几乎三尺童子都知道的。其诗往往鬼语幽坟，近乎李贺一流，文亦为金圣叹等之滥觞。然而他指斥当时复古派末流的摹拟剽窃，颇中其失。如说：

> 人有学为鸟言者，其音则鸟也，而性则人也。鸟有欲为人言者，其音则人也，而性则鸟也。此可以定人与鸟之衡哉？今之为诗者，何以异是！不出于己之所自得，而出于人之所尝言，曰某篇是某体，某篇似某人，此虽极工，逼肖而已，不免于鸟之为人言矣。

他的诗如《龛山凯歌》云：

> 无首有身只自猜，左啼魂魄右啼骸。凭将老译传番语，此地他生敢再来？

又如《望夫石》云：

> 海天万里渺无穷，秋草春花插髻红。自送夫君出门去，一生长立月明中。

则所谓凄清幽渺，流于魔趣者也。

汤显祖（1550—1617），字义仍，号若士，临川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历官吏部主事，以事谪徐闻典史，后迁遂昌知县，投劾归（《明史》卷二三〇）。有《玉茗堂集》二十九卷。他以传奇名一代，所著《荆钗》、《还魂》、《南柯》、《邯郸》四记，世称"临川四梦"。诗文均在第二流，少可称述。然他对于前后七子及其末流，很大胆地攻击过。他说：

> 本朝古文当以宋景濂为宗。李献吉、李于鳞、王元美，气力强弱，巨细不同，等赝文耳。

又说：

> 何、李色枯薄，余子定安有。

在举世风靡于复古派的诗文的时候，他独诋之为"赝文"，讥之以"枯薄"，独持己见，不随风会为转移，亦可算是一个豪杰之士了。

于慎行（1545—1607），字无垢，东阿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官至东阁大学士（《明史》卷二一七）。有《谷城山馆集》二十卷，又有《谷山笔麈》、《读史漫录》等。他诗文宏丽，一时推大手笔。当时李攀龙一派诗盛行海内，他独不以为然。其论古乐府说：

> 唐人不为古乐府，是知古乐府也。辞声相杂，既无从辨，音节未会，又难于歌，故不为耳。然不效其体而时假其名以达所欲言，斯慕古而托焉乎？近世一二名家，至乃逐句形模，以追遗响，则唐人所吐弃矣。

又论五言古诗说：

魏、晋之于五言，岂非神化，学之则迂矣。何者？意象空洞，朴而不敢琱；涂轨整严，制而不敢骋。少则难变，多则易穷，古所谓鹦鹉语不过数声耳。原本性灵，极至物态，洪纤明灭，毕究精蕴，唐果无五言古诗哉？余既知其解矣，而不能舍魏、晋者，取其可以藏拙，且适所便，非遂能似之也。海内赏真之士，有以吾言为是者，吾诗虽不观可矣。

他的话都是攀龙的对疾针砭。而说话婉转，又不自以为是，其风度尤为人所难及。

公鼐，字孝兴，蒙阴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卒谥文介(《明史》卷二一六)。有《问次斋集》三十卷。他诗文淹雅，朱彝尊推他为当时巨擘。其论诗大旨是说：

风雅之后有乐府，犹唐诗之后有词曲。声听之变，有所必趋；情词之迁，有所必至。古乐之不可复也久矣，后人之不能汉、魏，犹汉、魏之不能风雅，势使然也。……近乃有拟古乐府者，遂专以拟名其说，但取汉、魏之辞句摹而字合之，中间岂无陶阴之误，夏五之脱，悉所不校，或假借以附益，或因文而增损，局蹐床屋之下，探胠縢箧之间，乃艺林之蠹贼，学人之陷阱矣。以此语于作者之门，不亦愿乎？……李于鳞曰："拟议以成其变化。"噫！拟议将何以成其变化也？不能变化而拟议奚取焉？

他很懂得文学进化的原则，对于指斥李攀龙等的摹拟饾饤的弊病，尤能慨乎言之。至如《赠邢子愿长歌》说：

为君历代数宗工，前称宏、正后嘉、隆。北地雄浑真大雅，步趋尽出少陵下。信阳俊逸诚天然，边幅姿态未全捐。济南匠心奇且丽，藻缋无乃伤辞意。武昌才力谢诸君，节制之师独出群。东吴囊括靡不有，利钝未能免人口。大抵明兴只数家，瑜者从来不掩瑕。余子纷纷未易说，拟议原非吾所悦。大夫树立

自有真，何必效彼西家颦！

不但力攻复古派摹拟之非，且对于李梦阳等下了一个严正的批判。

王叔承，初名光允，以字行，更字承夫，晚更字子幻，又自号昆仑山人，吴江人（《明史》卷二八八《文苑四》附王稚登传）。所著有《壮游篇》、《吴越游》等。他早弃举子业，纵游齐、鲁、燕、赵、闽、楚间，足迹半天下，然多不遇。他和王世贞交好，然论诗却不甚倾心王、李。他始终不和世贞等诗，就因为持论不同的缘故。其论诗大旨说：

事与景者，天地所自有之物，偶遇而收之；情与意者，吾所本有之物，偶触而发之。彼吾役也，吾不彼役也。

是很反对复古派的摹仿古人的。只可惜他自己的作品，牵率者十居八九，又不能和公鼐等相提并论了。

此外如王稚登（《明史》卷二八八《文苑四》）等对于复古派的诗文，亦迭有违言，在这里不能一一列举。独王世贞的弟弟世懋，诗虽不及世贞，持论却颇精确，和七子的夸诞不能并观。他不但是世贞的诤弟，也可算是一个复古派的反对者。

王世懋，字敬美。嘉靖三十八年（1559）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明史》卷二八七《文苑三》附王世贞传）。他著述极多，诗文有《王奉常集》六十九卷。又《艺圃撷余》一卷，是关于文学批评的。如说：

李于鳞七律俊洁响亮，余兄极推毂之，海内为诗者争事剽窃，纷纷刻鹜，愈使人厌。余谓学于鳞不如学老杜，学老杜不如学盛唐。何者？老杜结构自为一家言，盛唐散漫无宗，各如意象声响得之，正如韩、柳之文，何有不从《左》、《史》来者？彼学成为韩为柳，吾却又从韩、柳学，便又落一尘矣。轻薄子遽笑韩、柳非古，与夫一字一语必步趋两家者，皆非也。

这是为复古派的末流说法，教他们取法乎上，和李、王之主张诗必盛唐者不同。至如说：

> 今世五尺之童，才拈声律，便薄弃晚唐，自诩初、盛，有称大历而下，色便赧赧然。然使诵其诗，果为初邪？盛邪？中邪？晚邪？大都取法固当上宗，论诗亦莫轻道。诗必自运而后可以辨体，诗必成家而后可以言格。余谓今之作者，但须真才实学，本性求情，且莫理论格调。

这真是对于当时复古派之但辨格调，不讲情性的当头棒喝！

第五节　公安体与竟陵体

反对复古派的诗文的虽有如上述，然皆不能夺李、何之席。但复古派的诗文，到了万历中叶以后，流弊日甚，譬如琴瑟既敝，不能不改弦更张。于是袁氏三兄弟乘机而起，一方面排诋复古派，一方面自创清新轻俊之体，于是王、李之风渐熄，三袁的"公安体"又风行一时。

袁宗道，字伯修，公安人。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官终右庶子(《明史》卷二八八《文苑四》附袁宏道传)。有《白苏斋集》二十二卷。他在翰苑与同馆黄辉及其弟宏道、中道力排复古派假借盗窃之失，于唐好白乐天，于宋好苏轼，因名其斋曰白苏。他才思不及其弟，而公安一派的作俑者实在是他。他的诗名为自家本色，异于李攀龙一流人，然学无本源，吐属鄙俚，晚年全仿苏轼，而又一无似处。今姑录其五言古《咏怀效李白》以示例：

> 人各有一适，汝性何独偏？爱闲亦爱官，讳饥亦讳钱。一心持两端，一身期万全。顾此而失彼，忧愁伤肺肝。人生朝露促，世福谁能兼？裴相岂不达，白发方壮年。北窗高卧人，垂老缺朝餐。良无丘壑贵，安有火食仙？陵谷且难平，稊米宁不然？一毛附马体，安问缺与完！角者夺其齿，尽者不能潜。鹏飞不笑莺，夔行不爱蚿。尔莫信尔意，两粥拥衾眠。

宏道，字中郎，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官终稽勋郎中(《明史》

卷二八八《文苑四》)。有《袁中郎集》四十卷，此外尚有《明文隽》、《瓶花斋杂录》等。他在兄弟中得名最甚，倡言排斥复古派亦最力，以为："唐自有古诗，不必选体；中、晚皆有诗，不必选体；欧、苏、陈、黄各有诗，不必唐人。唐诗色泽鲜妍，如旦晚脱笔砚者，今诗才脱笔砚已是陈言，岂非流自性灵，与出自剽拟，所从来异乎？"一时闻者涣然冰泮，都舍王、李而从之。然其诗诙谐调笑，间杂鄙俚，如《西湖》云：

一日湖上行，一日湖上坐，一日湖上住，一日湖上卧。

简直没有意思。又如《偶见白发》云：

无端见白发，欲哭翻成笑，自喜笑中意，一笑又一跳。

又诙谐得没有一些"谐趣"。这些还可以说是他一时滑稽之作，本不自以为诗。然其所谓清新轻俊流自性灵者，集中亦不多见，今姑举二首以示例：

横塘渡，郎西来，妾东去，感郎千金顾。妾家住江桥，朱门十字路。认取辛夷花，莫过杨柳树。

——横塘渡

落花去故条，尚有根可依。妇人失夫心，含情欲告谁？灯光不到明，宠极心还变。只此双蛾眉，供得几回盼！看多自成故，未必真衰老。譬彼既开花，不若初生草。织发为君衣，君看不如纸。割腹为君餐，君咽不如水。旧人百宛顺，不若新人骂。死若可回君，待君以长夜。

——妾薄命

中道，字小修。万历四十四年(1616)始成进士，官至南京礼部郎中(《明史》卷二八八《文苑四》附袁宏道传)。有《珂雪斋集》二十四卷。他游迹半天下，诗文亦尚性灵，不拘格套。其自序《珂雪斋集》有云：

文法秦、汉，古诗法汉、魏，近体法盛唐，此词家三尺也。予

> 敬佩焉，而终不学之。非不学也，古人之意至而法即至焉，吾先有成法据于胸中，势必不能尽达吾意，达吾意而或不能尽合于古之法，合者留，不合者去，则吾之意其可达于言者有几，而吾之言其可传于世者又有几，故吾以为断然不能学也，姑抒吾意所欲言而已。夫古之人岂易言哉？岂惟古人，即本朝诸君子，各有所长，成一家言，敢自谓超乘而上之耶？

他盖不以粉饰蹈袭为然，而同时又有自知之明。他的诗亦病在轻佻浅露，其七言佳句如《汉阳感旧》云：

> 芳草偏怜衡处士，桃花不梦息夫人。

《怀中郎》云：

> 青山到处悲王粲，明月曾经照谢庄。

然全篇可诵者，竟没有几首。

公安派承七子之弊，居然也风靡一时，然七子犹根于学问，三袁则全靠一些聪明，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学七子者不过赝古，学三袁者乃至矜其小慧，破律而坏度，名为救七子之弊，而弊又甚焉。"于是有所谓"竟陵体"者，复起而矫公安之弊。

竟陵体创自竟陵人钟惺、谭元春，故亦称"钟谭体"。钟惺，字伯敬，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官至福建提学佥事(《明史》卷二八八《文苑四》附袁宏道传)。有《隐秀轩集》三十二卷。他的著作甚多，《四库存目》收至十一种，然非谬误则浅陋，更有出自后人伪托者，兹不列举。他少负才名，擢第之后，思别出手眼，另立幽深孤峭一派，以驾驱古人之上，同里谭元春为之应和，海内称诗者靡然从之。元春，字友夏，名辈后于惺，至天启七年(1627)始举乡试第一，那时候钟惺已经死了(《明史》卷二八八《文苑四》附袁宏道传)。然元春因为尝和钟惺合编《诗归》，故与齐名，当时言诗者，并称"钟谭"。所谓《诗归》者，是评选唐以前的诗为"古诗归"，唐人的诗为"唐诗归"，总称《诗归》，凡五十一卷，大旨以纤巧幽渺为宗，点逗一二新隽字句，矜为玄妙；

又于连篇之诗随意割裂，甚或妄改古诗句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至斥为“小人而无忌惮者”。《提要》又说：“朱彝尊《诗话》谓是书乃其乡人托名。今观二人所作，其门径不过如是，殆彝尊曲为之词也。”然他们二人确曾取名一时，《诗归》一书亦尝洛阳纸贵，这是什么缘故呢？钱谦益说：“譬之春秋之世，天下无王，桓、文不作，宋襄、徐偃德凉力薄，起而执会盟之柄，天下莫敢以为非伯也。”这是很确当的譬喻。至于他们两人的诗，钟惺苦心吟事，雕镂才削，不遗余力，如《舟晚》云：

舟栖频易处，水宿偶依岑。山暝江逾远，天寒谷自深。隔墟烟似晓，近峡气先阴。初月难离雾，疏灯稍著林。渔樵昏后语，山水静中音。莫数归鸦翼，徒惊倦客心。

他一味雕镂镵削，有时候竟只顾雕饰字句，连诗题都不顾到。有人笑他《早朝》诗有“残雪在帘如落月，轻烟半树信柔风”之句，以为“如此措大寒乞相，乃欲周旋金华殿中，将欲易千门万户为茅茨土阶耶”（见《古夫于亭杂录》）。至谭元春的诗更刻画无盐，几无一首可读，钱谦益说他比钟惺“学术尤浅，谫劣弥甚”（《列朝诗集》），实非苛论。今姑录其六言诗《得蜀中故人书》如下：

蜀川兵定人静，老友天寒信来。莫怪草堂深闭，小桥边有门开。

当公安、竟陵体风靡的时候，和公安派沆瀣一气者，有陶望龄、黄辉、江盈科、雷思霈等（陶望龄，《明史》卷二一六《唐文献传》。黄辉，《明史》卷二八八《文苑四》附焦竑传。江盈科，字进之，常德人，《明史》无传。雷思霈，字何思，夷陵州人，《明史》无传）等。降而至沈承（字君烈，太仓人，《明史》无传）辈，尤在桧下无讥之列。至醉心钟、谭者，如蔡复一、张泽、华淑（蔡复一，传见《明史》卷二四九。张泽，字草臣，吴人；华淑，字闻修，无锡人，《明史》均无传。《静志居诗话》说“《诗归》出而一时纸贵，闽人蔡复一等即降心以相从，吴人张泽、华淑等复闻声而遥应，无不奉一言为准的，入二竖于膏肓。取名

一时，流毒天下，诗亡而国亦随之矣”）等，都系滥调浮响，卑不足道。然沈德符（字景倩，一字虎臣，秀水人，《明史》无传。他著书甚多，《顾曲杂言》尤为后人所称重）以博览史乘，渔猎词藻称于时，而其所作犹不免有“著色竟陵体”之讥（见《明诗纪事》），则竟陵体之风靡一时，可以想见了。

第六节　万历间的诗人

万历一朝，复古派再兴于前，公安、竟陵体继行于后，当时的独立作家，每为所掩，名篇佳什，知者盖寡，在这里应该特别提出来叙述的。

陈田《明诗纪事庚签序》：“余博览篇章，精核艺薮（万历一朝），若区海目之清音亮节，归季思之澹思逸韵，谢君采之声情激越，高孩之之骨采骞腾，并足以方轨前哲，媲美昔贤。汤若士、李伯远、谢在杭、程松圆、董遐周、吴凝父、孙宁之、晋安二徐，抑其次也。”他所列举的几个作家，除汤若士即汤显祖前面已经叙述过的外，其余的分述如下：

区大相（《明史》无传），字用孺，号海目，高明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官至南京太仆寺丞。有《海目集》二十七卷。他是“南园后五子”之一，天才俊逸，以诗名岭南，为诗思深而不苦，律细而不狭，气壮而不厉，调高而不浮。朱彝尊曾赞叹说：“岭南山川之秀，钟此国琛，非特白金水银、丹砂石英已也！”（《静志居诗话》）我们且读他下面的《古有所思》诗：

> 我所思兮大海南，何以致之紫云缄，青瑶为字金作函，波涛万里不可涉，白日忽破扶桑岚。我欲乘龙，龙不可攀，我欲附青鸟，青鸟不可衔。将泪滴海水，为我流入明珠潭。我既无羽翼，君亦一去无消息。从今勿复思，相思何终极。堂前琼树枝，把君旧颜色。携酒高堂复几时？君在天南我天北。

归子慕，字季思，有光子。万历十九年（1591）举于乡，再试不第，遂不复应试，屏居江村，和高攀龙等讲理学，所居陶庵，槿墙茅屋，咏歌以为乐，学者称“清远先生”（《明史》卷二八七《文苑三》附归有光传）。有《陶庵集》四卷。他是一个乐天知命的隐士，人品襟抱像陶渊明，所以他的诗也是学陶而得其神髓。朱彝尊说他的诗“韦苏州后鲜有其伦，读之令人增箪瓢陋巷之乐”（《静志居诗话》）。其诗如《岁暮别诸生》云：

> 恻恻不可道，临歧但依依。常恐语言多，貌胜中情微。感兹寒色厉，北风吹尔衣。岁暮家室好，各各念尔归。群居虽云乐，人情理难违。所患不同心，不患相见稀。尼父重久要，如醴久已非。勖哉仪先民，雅道庶可几。

谢三秀（《明史》无传），字君采，一字元瑞，贵阳人。万历间以贡生为教官。有《雪鸿堂集》。明代黔中以诗名者绝少，朱彝尊说：“君采诗甚清稳，由其生于天末，习染全无，此黔人之轶伦超群者。”（《静志居诗话》）其《澧兰道中》云：

> 敝裘萧瑟剑装轻，一望平芜怆客情。杨柳津亭聊驻马，梨花村馆渐闻莺。家家换火榆烟湿，处处收茶谷雨晴。江国采芳三月路，春江如练绕春城。

高出（《明史》无传），字孩之，莱阳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后官按察副使为西平堡监军，辽阳失，被逮下狱。所著有《初删》、《槎亭》、《山中识遗》、《卢隐》、《郎潜》等稿及《拘幽集》。他的诗不袭李、何遗派，《初删集》拟古为多，痕迹未化，《卢隐》、《郎潜》骨劲气沉，如厉翮之鹰，凡鸟当之，无不披靡，然以力避软的缘故，不免过于猛健。其诗如《看梁塘铺后竹》云：

> 冥冥三百尺，掩带秋色碧。一片江南山，飞来乱相射。

李应徵（《明史》无传），初名衷毅，字伯远，嘉兴人。万历癸酉举人，官至南国子博士。有《素莲馆》、《澄远堂》、《偶寄轩》、《汗漫游》

等集。《檇李诗系》说他“以骏宕之才，雄视一世，平生感愤，一发于诗，故能众体兼长，风流俊爽，情旨婉切，不徒以写景述事为工”。其诗如《秋江夜泊》云：

木落疑秋雨，寒江增夜波。青山移棹远，明月逐帆多。近岸投渔火，遥汀出榜歌。还将故园梦，千里寄烟萝。

谢肇淛，字在杭，长乐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官至左布政使（《明史》）卷二八六《文苑二》附郑善夫传）。有《小草堂集》五十八卷，又有《文海披沙》、《小草斋诗话》等。汪端说：“明初闽中十才子专学盛唐，万历间徐幔亭昆季、曹石仓及在杭诸人则兼法钱、刘、元、白并洪武诸家，虽前后宗尚微有不同，要皆精研格律，无忝正声。在杭诗清圆俊朗，远胜王百谷，而虞山（钱谦益）深诋闽派庸熟蹈袭，如出一手，又谓在杭风调谐合，得之百谷为多，其月旦颠倒如此，绛云一炬，岂非天哉？”（《明三十家诗选》）他的诗如《雨霁寄陈隐君》：

新晴动花气，鸟啼漳水春。出门见芳草，忽忆山中人。种药劚云母，煮石炊松薪。甲子谁能识？空山无四邻。

颇有隐逸者的风趣。

程嘉燧，字孟阳，号松圆，休宁人，侨寓嘉定（《明史》卷二八八《文苑四》附唐时升传）。有《浪淘集》。他少学制科不就，遂刻意为歌诗，善画山水，晓音律，恬澹自喜，不事奔竞，崇祯中客游常熟，阅十年返休宁，死的时候已经七十九岁了。王士祯《蚕尾续文》说：“孟阳七言绝句，出入于梦得、牧之、义山之间，不名一家，时诣妙境。”他的诗清丽温婉，诵之令人意消，在万历、天启间确可自成一家，钱谦益《列朝诗集》至谥为“诗老”。而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说他“格调卑卑”，才庸气弱，盖因钱谦益论诗每毁誉失实，遂迁怒嘉燧，连类讥讪，未名惩羹吹齑了。他的《忆金陵·杂题画扇》三首，清疏凄艳，有吹竹弹丝之音，最为王士祯所叹赏，今录如下：

最忆西风长板桥，笛床禅阁雨潇潇。只今画里犹知处，一抹寒烟似六朝。

青门杨柳白门乌，秋雨秋阴旧酒垆。何处蘼芜最相忆？缫丝风雨暗西湖。

秋阴殢客思腾腾，木末荒台尽日登。谁信到家翻远忆，雨斋含墨画金陵。

《忆金陵·杂题画扇》

董斯张（《明史》无传），字遐周，乌程人。国子监生。有《静啸斋集》十四卷。他的诗颇参宋派，当时竟陵派已盛行，他独冥心苦构，不受竟陵派的影响。其《落日》诗云：

落日汀洲静，高夫转泬寥。烟横沙岸白，波急远山摇。野水倚孤棹，前村归暮樵。清歌何处起？无数荻花飘。

吴鼎芳（《明史》）无传），字凝父，吴县人，世居洞庭山。性耿介，不事干谒。中岁有悟，遂弃家为僧，居乌程之霞幕山。有《披襟唱和集》。他的诗萧闲简远，有出尘之致。我们读他的诗，觉得清气袭人，天然澹秀：

十里寒山路，香风正采茶。偶随樵客去，一到隐君家。细语生清月，闲心托片霞。别来湖水阔，秋水上苹花。

——寄赵凡夫

孙镇（《明史》无传），字宁之，掖人。他的诗五言颇学汉、魏、三谢，七言学杜，拟古乐府更能得其神似，历来选明诗的都舍弃他，惟清代的王世录颇称颂他，很可惜他“长辔未骋而芳兰早凋”，大概他是死得很早的。《明诗纪事》选录他十三首，其《群盗》云：

杀气生群盗，妖氛失汉旌。黄巾横四野，白日闭孤城。守吏无人色，苍生有哭声。恐烦东郡顾，垂望正含情。

晋安二徐者，闽县徐𤊹及其弟徐熥也（《明史》卷二八六《文苑二》附郑善夫传）。熥，字惟和。父棉，以《易》学名家，官永宁令。他

领万历十六年(1588)乡荐，数上公车不第，与弟𤊹刻意吟咏，年三十九而卒。有《幔亭集》十五卷，又选闽中诸先辈诗，名《晋安风雅》。𤊹，初字惟起，更字兴公。万历中，和其兄熥及曹学佺同主闽中诗坛，后生都称"兴公诗派"。以布衣终。有《鳌峰集》二十六卷。他们兄弟俩为诗并宗高启，虽未登峰造极，然当雾霾充塞时，独能不师伪体，远溯正宗，亦可谓超然尘外的了。他们的诗如：

征途微雨动春寒，片片飞花马上残。试问亭前来往客，几人花在故园看。

——徐熥《邮亭残花》

落花飞絮委东流，春去行人不可留。却恨春风已归去，岂能吹梦到交州！

——徐𤊹《送友人之安南》

陈田所列举的几个诗人，固皆一时之彦，然而还须加以补充，例如：李流芳、娄坚、唐时升(均见《明史》二八八《文苑四》)当时和程嘉燧称"嘉定四先生"，固皆一时一地的风雅领袖。居节、董其昌、李日华(居节，字士贞，吴县人，《明史》无传。董见《明史》卷二八八《文苑四》。李附见同卷王惟俭传)等以书画名一代，诗亦卓然可传。顾宪成(《明史》卷二三一)、高攀龙(《明史》卷二四三)为东林党魁，声气倾动四方，诗文亦冲澹清遒，不染当时纤仄之习。臧懋循、吴稼竳、吴梦旸以诗名苕中，茅维与之抗衡，有"苕中四子"之目(以上四人见《明史》卷二八七《文苑三》附茅坤传)。其他如施渐、焦竑、黄辉、陈仁锡、王惟俭、郑明选、屠隆、林章、沈懋学、陈昂、范汭、吴兆(施渐，字子羽，无锡人，《明史》无传。焦竑、黄辉、陈仁锡、王惟俭、屠隆均见《明史》卷二八八《文苑四》。郑明选，字侯升，归安人；林章，字初文，《明史》均无传。沈懋学，附见《明史》卷二一六田一儁传。陈昂，字尔瞻，一字云仲，莆田人；范汭，字东生，乌程人；吴兆，字非熊，休宁人，《明史》均无传)等，诗文都卓然自立，不染时下习

气。而屠隆的子妇沈氏和他的女儿瑶瑟并能诗，为当时有名的闺秀诗人(《明史》卷二八八《文苑四》附徐渭传》)。至如文翔凤、王思任辈(文翔凤，字天瑞，三水人；王思任，字季重，山阴人，《明史》均无传)，变而多歧，朱彝尊斥之为异端(《静志居诗话》云“学有异端，诗亦有异端，文太青、王季重是已”)，陈田诋之为魑魅(《明诗纪事》按云“季重诗扬竞陵之余波，如入幻国，诡变莫穷；如游深山，魑魅出现”)，所谓亡国之音，当置之桧下无讥之列了。

第五章　明末文学

第一节　明末的散文作家

黄宗羲《明文案序》称明代散文有三个最盛的时期：第一是明初，第二是嘉靖间，第三是崇祯时。他说："崇祯之盛，王、李之珠盘已坠，郑、莒不朝，士之通经学古者，耳目无所障蔽，反得以理既往之绪言。"他并且举出了许多作家的姓字来说：

> 崇祯时，昆山（归有光）之遗泽未泯，娄子柔（坚）、唐叔达（时升）、钱牧斋（谦益）、顾仲恭（大韶）、张元长（大复）皆能拾其坠绪。江右艾千子（南英）、徐巨源（世溥）、闽中曾弗人（异撰）、李元仲（世熊），亦卓荦一方。石斋（黄道周）以理数润泽其间。……

但是他所举的几个作家，实在是随意取舍，凌乱无次。例如娄坚、唐时升诗胜于文，在前章已提及过了。钱谦益在启、祯之际亦以诗名，顾大韶学识渊博，然他的古文似未足与当时的高手抗衡。张大复和归有光同时，亦不以古文鸣。曾异撰史称其"究心经学，为诗有奇气"；然曾诗太近诡，文亦不及艾南英辈。徐世溥、李世熊的文章能矫当时文体琐碎之弊，不愧"卓荦一方"之称，然二人都由明入清，在清初的明遗民中为古文者如王猷定、陈宏绪等，名不在徐、李下，何以仅举他们二人？黄道周理学气节重一代，他本来不是文章之士，乃强说他以理数润泽文学，尤为不伦。平心而论，明末的散文，万不及明初和嘉靖间。他所列举的几个作家，只有一艾南英稍可称述。其次要推张溥，然而他却没有提到。

艾南英，字千子，东乡人。好学，无所不窥。万历末场屋文腐败已极，他和同郡章世纯、罗万藻、陈际泰以兴起斯文为任，世人翕然

归之。天启七年(1627)举于乡,因对策有讥刺魏宗贤的话,罚他停考三科。到了崇祯初,诏许会试,然终不第。他虽没有第进士,而文名却日盛。两京继覆,他入闽见唐王,唐王授他兵部主事,改御史,没有几时就死在延平(《明史》卷二八八《文苑四》)。所著有《天佣子集》。当王、李之学大盛的时候,天下谈古文者都奉为宗匠,到了钟、谭出,文风一变,然其弊尤甚于王、李。那时候钱谦益负重名于词林,痛相纠驳,南英和之,集同志倡豫章社,排诋李、王,不遗余力。他在《重刻罗文肃公集序》中论明朝一代的古文是这样说的:

> 有明文章之盛,莫盛于太祖朝,刘文成、宋文宪、王文忠、陶姑孰辈,不独帷幄议论,佐圣神文武,牖启后人之模型,而文章遂为当代之冠。至于苏平仲、高季迪、方希古,或专以诗文,或兼有节义。后先两祖之世,虽由草昧开天,士崇实学,不惑于流俗苟且之见,亦由唐、宋大家之流风遗韵,典型未远。洪、永而后,文章浸衰矣。杨文贞、王文成虽卓然自成一家,而两公以相业事功,不专名文章,风气所激,后进无由睹其标指。一时文章之权无所主持,于是弘治之世,邪说始兴,至劝天下无读唐以后书,又曰"非三代、两汉之书不读",骄心盛气,不复考韩、欧大家立言之旨。又以所持既狭,中无实学,相率取马迁、班固之言,摘其字句,分门纂类,因仍附和。太仓、历下两生,持北地之说而又过之,持之愈坚,流弊愈广,后生相习为腐剿,至于今而未已。

然而他虽排诋李、王,矩矱唐、宋,他自身却为了太致力于八股文,终不免为俗学所累,其作品遂多带时文气息,倒不如张溥比较亢爽。

张溥(1602—1641),字天如,太仓人。崇祯四年(1631)进士。他和同里张采共学齐名,时号"娄东二张"。崇祯间他集郡中名士,相与复古学,名其文社曰复社。及成进士,交游日广,自谓以嗣东林,

执政恶之。里人陆文声求入社，被他拒绝，文声遂赴京告他倡复社，乱天下，严旨穷究不已，到他死了事犹未竟(《明史》卷二八八《文苑四》)。他的诗文有《七斋录集》十五卷，又尝编《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三十八卷，又有《诗经注疏大全合纂》等。他诗文敏捷，四方征索者，不起草，对客挥毫，俄顷立就，以故名高一时。其《五人墓碑记》云：

> 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愤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即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呜呼！亦盛矣哉！
>
>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没不足道者，亦已众矣，况草野之无闻者欤！独五人之皦皦，何也？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敛资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缇骑按剑而前，问谁为哀者？众不能堪，抶而仆之。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吴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则噪而相逐，中丞匿于溷藩以免。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按诛五人，曰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买五人之脰而函之，卒与尸合。故今之墓中，全乎为五人也。
>
> 嗟夫！大阉之乱，缙绅而不能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且矫诏分出，钩党之捕遍于天下，卒于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由是观

之，则今之高爵显位，一旦抵罪，或脱身以逃，不能容于远近，而又有剪发杜门，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贱行，视五人之死，轻重固何如哉？……

第二节　明末诗人

明末诗人，以陈子龙为首屈一指。朱彝尊说："王、李教衰，公安之派浸广，竟陵之焰顿兴，一时好异者诪张为幻。关中文太青倡坚伪离奇之言，致改三百篇之章句；山阴王季重寄谑浪笑傲之体，几不免绿衣苍鹘之仪容。如帝释既远，修罗、夜叉交起搏战，日轮就暝，鹏子鸮母四野群飞，卧子张以太阴之弓，射以枉矢，腰鼓百面，破尽苍蝇、蟋蟀之声，其功不可泯也。"（《静志居诗话》）

陈子龙（1608—1647），字人中，更字卧子，号大樽，青浦人（或作华亭人）。崇祯十年（1637）进士，选绍兴推官，以定乱功，擢兵科给事中，命甫下而京师陷，乃事福王于南京，以时事不可为，乞终养去。南京陷，遁为僧。后来受鲁王院部职衔，结太湖兵想起事，事露被执，乘间投水死（《明史》卷二七七）。所著诗文甚夥，有《岳起堂稿》、《湘真阁稿》等十几种，多散佚不传。清嘉庆八年（1803），青浦王昶及同郡人士访搜汇集，得赋二卷、诗十七卷、词一卷、文十卷，并他自撰的年谱二卷、王沄所撰的乙酉（1645）后年谱一卷，刻之行世。他诗文均有名，吴伟业说："卧子旷世逸才，……其四六跨徐、庾，策论视二苏，诗特高笔雄浑，睥睨一世。"（《梅村诗话》）当复社名盛时，他和同郡夏允彝、徐孚远、李雯、宋徵舆等结几社，遥相应和，当时几社名闻天下。他的论诗宗旨，虽以前后七子为归，然自为一格，有齐、梁之丽藻，兼盛唐之格调，早岁少过浮艳，中年骨干老成，国变以后之作，悲歌激烈，可泣鬼神。他不愧为残明一代诗的首屈一指的殿将。他以七律诗最为擅长，时际沧桑，故多感事之篇。如《钱塘东望有感》云：

清溪东下大江回，立马层崖极望哀。晓日四明霞气重，春潮三浙浪云开。禹陵风雨思王会，越国山川出霸才。依旧谢公携伎处，红泉碧树待人来。

他的五律也多凄怨之作。如《扬州》云：

江南年少子，处处逐青娥。怕问雷塘事，终怜水调歌。牙樯淮雨暗，玉管楚声多。夜半城头角，飘零怨紫罗。

他的五绝如《三洲歌》：

相送巴陵口，含泪上行舟。不知三江水，何事亦分流。

正是吴伟业所说的"高华雄浑"之作。

陈子龙和夏允彝、徐孚远、周立勋、王光承、李雯、宋徵舆（夏、徐均附《明史》陈子龙传。周立勋，字立卣，华亭人；王光承，字玠石，上海人，《明史》均无传。李雯，字舒京，上海人。宋徵舆，字直方，华亭人）等同为几社的中坚分子。然允彝以经义见长，诗非专尚；孚远存诗不多；立勋与子龙为素交，然子龙选明诗仅录其《咏怀》一首；光承诗亦不足与子龙比肩；惟李雯和子龙当时有"陈李诗"之称，徵舆诗亦以博雅见长，然两人都仕清，诗亦不及子龙。所以子龙序《几社六子诗》说："周、徐辈六子，皆与余同学诗者也。其才情深微，十倍于余，然览其诗，可以渺独立而俪古人者，人不数篇耳。"

明末诗人足与陈子龙抗行者，要推曹学佺。学佺（1574—1647），字能始，号石仓，侯官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天启间官广西参议，以著《野史纪略》直书梃击案本末，为刘廷元所劾，指为著书诽谤，遂削籍为民。崇祯中起广西副使，力辞不就。家居二十年，著书甚富。唐王立闽中，起授太常卿，迁礼部侍郎，进尚书。清兵下闽，入山中自经死（《明史》卷二八八《文苑四》）。他著书甚多，诗文方面有《石仓诗文集》一百卷。他才气少让子龙，而温婉过之。王士祯说："明万历中年以后迄启、祯间无诗，惟侯官曹能始先生诗得六代、三唐之格，一时名士如徐桂、吴兆、林古度皆附之。"

(《古夫于亭杂录》)我们且读他下面的《癸未上巳李子素直社，城楼即事》诗：

> 豫章诸郡彻哀笳，闽海犹然天一涯。三月风光临上巳，两京消息隔中华。登楼预想鱼丽阵，入幕谁为燕子家？世味不知如此恶，且将清况试新茶。

明末文社四起，张溥等十余人始结应社，其后更集南北各省文社，会于吴郡，继东林以讲学，取“兴复绝学”之义，名为复社，而溥与张采为之主盟，声势日盛，忌者颇多，福王时，阮大铖以报复私怨，尽逮复社名士陈贞慧等(那时候张溥已经死了)，为明末党祸之一。

张溥的诗文，名高一时，其散文已如前节所述，诗如《送侯豫瞻北上》云：

> 春气吴山早，风来水国初。社村今日酒，床笏旧时书。燕子迎新舫，桃花奉板舆。尚持司马节，珍重佩金鱼。

亦颇工稳可诵。

张采，字受先，太仓人。崇祯元年(1628)进士，除临川知县。福王时，官礼部主事，进员外郎(《明史》卷二八八《文苑四》附张溥传)。有《知畏堂文存》十一卷、《诗存》四卷。他和张溥齐名，时号“娄东二张”。溥性宽，泛交博爱；他特严毅，喜甄别可否。做临川知县的时候，摧强扶弱，声誉大起。南京失守，一向衔恨他的人，乘乱搏击刺劚，几无完肤，绝而复苏，避居邻邑，以抑郁死。其诗如《漫兴》云：

> 岂自求仙道，须因避世争。无官多暇日，有病得长生。不食安期枣，谁吹子晋笙？开帘寻落影，残月已三更。

可以想见他的胸怀。

复社名士以气节相尚，故明亡后颇多殉节者，如吴应箕、孙临、杨廷枢(吴应箕、孙临分别附见《明史》二七七《丘祖德传》、《杨文骢

传》，杨廷枢附见卷二六七《徐汧传》)等，更仆难数，而应箕诗文尤著。

吴应箕(？—1644)，字次尾，贵池人。崇祯十五年(1642)副榜。唐王立，除池州推官，监纪军事，兵败被执，不屈死。有《楼山堂集》二十七卷。他博极群书，通世务，善古文及诗。其论诗宗旨，以为："诗本性情，述意志，心口相传，宜无他假者，而以谐声倚韵，裁取成章，已不能不在离合间，况复资之掇拾，专尚华丽哉？其失也伪，是为无诗。吾生平不为拟古，强笑不欢，非中怀所达故也。"其诗如《闲看》云：

> 闲看处堂喜，真称举国狂。人犹杀李、范，运不及齐、梁。寂寞临春阁，悲凉石子冈。只余诸葛恨，颈血溅淮扬。

明末士大夫殉国者，指不胜屈。如黄道周、刘宗周以理学著(均见《明史》卷二五五)。史可法、金声(史见《明史》卷二七四，金见《明史》卷二七七)等，都大节棱棱，其诗文亦名重一时。而张煌言(《明史》无传，见《南疆逸史》卷五)在明亡后犹以残兵支撑于海岛者二十多年，艰阻崎岖，百折不回，尤为难能，其诗亦多宏伟之作。其他忠节之士同时以诗文名者，更不胜枚举。然他们都自有其不朽之处，不在文学上争短长。我们在文学的立场上，求其诗能卓然成家，足为明朝一代诗人的后劲，同时以忠节著称，不愧为一代完人的，则有如下列的几个：

邝露(1604—1650，《明史》无传)，字湛若，南海人。诸生。永明王立，授中书舍人。清兵破广州，抱琴死。其诗集名《峤雅》，系其手书开雕，古香可掬。他为阮大铖的门生，然以后来大节为世所称。其诗清旷超妙，不染人间烟火，五言律具有李白的意境，如《采石怀袁宏李白》：

> 牛渚青天月，长县供奉祠。如何今夕酒，不共昔人持？高咏那能旦？登舟安所之？溯洄殊未已，言折楚江蓠。

黎遂球(？—1645)，字美周，番禺人。天启七年(1627)举于乡。唐王立，授兵部职方主事，守赣州，城陷，巷战死(《明史》卷二七八《杨廷麟传》，又《南疆逸史》卷三)。其诗文有《莲须阁集》二十六卷。粤东诗派自南园五子以迄区大相，皆讲风格，未及靡曼。到了他，醉心六朝、初唐，乃为轻艳之词，歌行短曲，风致嫣然。他盖以才情胜，不为格律所束缚的。如《花下歌》云：

> 生平不事求神仙，愿上东海求仙船。童男童女各三千，教之歌舞及管弦。逍遥行乐二十年，遂令婚配同力田。可得万人驰九边，大雪国耻铭燕然。老夫须眉图凌烟。结屋花国临酒泉，名儒侠客列四筵。等闲赋诗人争传，乞得一字十万钱。

夏完淳(1631—1647)，允彝子，字存古，华亭人。他生有异禀，五岁通五经，九岁善词赋古文。师事陈子龙，子龙很器重他。崇祯十七年(1644)他十四岁，和杜登春等数人称“江左少年”，上书缙绅四十家，乞举义师勤王。京师陷，他又草檄讨从贼诸臣，时人壮其忠义。次年清师下松江，他的父亲殉节死。他从陈子龙起兵太湖，事败，走吴阳军为参谋，后阳军溃死，他屏处草野，益不自聊。尝慨两都继覆，拟庾信作《大哀赋》，文采宏逸。唐王称号，遥授他中书舍人的官衔，他上表谢恩，托人把表秘密带到福建，不料半途为逻卒所搜获，他遂被逮捕了，解往南京受审。他却一些没有畏惧，慨然说道：“天下岂有畏人避祸夏存古哉！我得归骨于高皇帝孝陵，千载无恨。”在途中吟咏不绝。既受审，经略某想保全他的生命，他却侃侃而陈，辞色不稍屈，遂和进士刘曙同被斩西市(《明史》卷二七七《陈子龙传》附)。那时候是清顺治二年的九月，他年纪只有十七岁！他所著有《玉樊堂集》、《内史集》、《南冠草》，清嘉庆间郡人庄师洛、何其伟等编辑付刻，凡十卷，补遗二卷。又有《代乳集》是他九岁时作，及《续幸存录》八卷，今多散佚。他天姿特秀，古体诗窥汉魏、初唐堂奥，五七言律高华沉郁，兼擅其长，而十五从军，十七授命，磨盾草

檄，不异老生宿儒，那么轻的年纪便具有这样的天才，其人其文，古今无匹。他赴义时所作诗，语气纵横淋漓，读之令人悲歌起舞：

孤儿哭无泪，山鬼日为邻。古道麻衣客，空堂白发亲。循陔犹有梦，负米竟谁人？忠孝家门事，何须问此身！

——拜辞家恭人

孤臣魂已断，况复见长安！歌舞愁云散，池台落日寒。重来中贵宅，空挂侍臣冠。一片银铛影，还同佩剑看。

——被羁待鞫在皇城故珰宅

城上钟山色，松杉落翠微。朝光群鸟散，暝色二龙飞。璧月沉银海，金风剪玉衣。孤臣瞻拜近，泉路奉恩辉。

——御用监被鞫拜瞻孝陵恭记

范景文，字梦章，吴桥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崇祯末官至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京城陷，投井死(《明史》卷二六五)。有《大臣谱》及遗集。朱彝尊说："启、祯之际，秦声变而至文天瑞，楚调变而至尹宣子，越吟变而至王季重，正音扫地矣。吴桥博综旧章，领袖群雅，其诗发扬而不厉，新警而不佻，独自成家，不饮狂泉之水。"(《静志居诗话》)他的诗如《石头城》云：

荒荒凭故垒，传是石头城。返照三山影，江流六代声。露华临夜白，天气入秋清。俯仰悲人代，还看古月明。

黄淳耀(1605—1645)，初名金耀，字蕴生，嘉定人。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家居，城陷自缢于清凉庵(《明史》卷二八二《儒林一》)。有《陶庵集》二十二卷。他的文章和平温厚，矩矱先民；诗亦浑雅天成，绝无傏响，于王、李、钟、谭余派，去之惟恐若浼。他和归子慕一样以"陶庵"名集，古诗也拟陶，然归诗率真，他的诗俊爽，又各不同，大抵归有忘世之意，他却有用世之意，这就是不同的所在。他的诗如《和陶九日闲居》云：

羁心如秋草，方枯已旋生。良辰过我前，端忧乃无名。厉

厉惊飚严，皑皑山雪明。朔雁流寒影，边鞞动悲声。古之豪俊人，感此多促龄。我独胡为尔，开樽且徐倾。平吟怀惠连，默对思公荣。知音不在侧，何以诉中情。愿为双飞鸿，羽翼不可成。

刘孔和（1614—1644，《明史》无传），鸿训子，字节之，长山人。崇祯末起兵长白山中，率众南下，忤刘泽清被害。有《日损堂诗集》、《练要堂文集》。他少倜傥好谈兵，慕陈亮、辛弃疾之为人。文章豪迈，诗尤奇恣。王士祯说他的诗雄迈豪放，有东坡、放翁之风，一代奇才也。如《过访幼量书圃》：

阶前修竹绿成林，侍子清朝拊素琴。听尽明光三十段，碧池凉雨一时深。

明末诗人善言风怀者，无过王彦泓（《明史》无传）。彦泓，字次回，金坛人。以岁贡为华亭训导。有《疑雨集》。他博学好古，诗多艳体。朱彝尊说："风怀之作，段柯古《红楼集》不可得见矣。存者玉溪生最擅长，韩冬郎次之，由其缄情不露，用事艳逸，造语新柔，所以擅绝也。后之为此体者，言之惟恐不尽，诗焉得工？故必琴瑟钟鼓之乐少，而寤寐反侧之情多，然后可以追韩轶李。金坛王次回结撰深得唐人遗意，诵之感心娉目，回肠荡气。"（《静志居诗话》）他的《疑雨集》传诵到今，喜艳体诗者没有不曾读过的。他的诗如《对花杂恸》云：

琼香一片委轻埃，犹忆春时傍砌开。肠断江南陈叔宝，丽华身后却归来。

和王彦泓分镳并驱者为冯班（《明史》无传）。班（1614—1671），字定远，号钝吟，常熟人。明末诸生。所著有《定远集》、《钝吟诗文集》，又有《评点才调集》。他博学多闻，说诗力排严羽，尤不取江西宗派。他的诗和彦泓微有不同，彦泓以律诗胜，他以绝句见长；彦泓全学温（庭筠）、李（商隐），他于齐、梁及唐人温、李无所不仿，其源出于《才调集》。我们且读他的《戏题》诗：

世间无赖是豪家，处处朱门锁好花。惟有梦魂难管束，任他随意到天涯。

第三节　明清之交的文学家

清初文学家大都是明末遗臣。他们为明代文学之后劲，又同时振新朝文学之先声。如侯（方域）、魏（禧）之于文，钱（谦益）、吴（伟业）之于诗，其关系于后来风气极大。然侯、魏等在清代文学史上自有其地位。独顾炎武少入复社，以诗文名，入清后博洽众学，为清初的伟大学者，诗文之名反为所掩。陆世仪以理学著于清初，然明季逸民诗中，他和顾炎武实最为巨擘。此外于明亡后隐居不仕，以前朝遗逸的资格，憔悴行吟，终其天年，他们都和新朝没有发生什么关系，而在明、清之交的文学界中，也自有其地位，在这里是应该特别提出来叙述的。

顾炎武（1613—1682），本名绛，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昆山人，学者称“亭林先生”。生有异禀，少读书数行并下，年十四为诸生。明亡，其嗣母王夫人不食死，遗命无事二姓。自是流寓四方，尝居华阴，康熙中大臣屡欲荐起，至以死辞（《清史稿》列传二六八《儒林二》）。他的学问博大精深，自天文、地理以至河渠、兵法、音韵、金石，无不口举其辞，心通其义，折衷定论，确不可移。所著书数十种，于六书音义尤有独得，诗文犹其余事。然他少入复社，和同里归庄以诗文名，都耿介不入俗，当时有“归奇顾怪”之目。明亡后，其诗凭吊沧桑，语多激楚，茹芝、采蕨之志，《黍离》、《麦秀》之悲，渊源朴茂，直合靖节、浣花为一手，不愧为明三百年文学之后劲。他的《天寿山》诗，煌煌巨篇，为杜甫《北征》以后所仅见者，诗长不录，今录其《落日》一首，尝鼎一脔，可以知其味了：

落日江津送伍员，秋风垅上别徐君。偶来圯下逢黄石，便去山中卧白云。

归庄(1631—1673),字元泰,昆山人,有光曾孙。所著有《恒轩集》、《山游诗》。他和顾炎武同里,又同年生,同入复社。明亡,隐居不出,佯狂以终。其《落花诗》云:

枝上黄莺渐露身,飞英历乱堕红尘。将随薜荔依山鬼,难共蘼芜待美人。河北名园贪结子,武陵归棹欲迷津。香车宝马缘都尽,天与幽人一锦茵。

陆世仪(1611—1671),字道威,太仓人。明末诸生。尝从刘宗周学,博洽无所不通。明亡,拓地十亩,筑亭其中,自号桴亭。以讲学终其身,门人私谥尊道先生(《清史稿》列传二六七《儒林一》)。所著有《桴亭全集》。他虽以理学著名,诗亦卓然成家,在明季逸民诗中,他和顾炎武最为巨擘,顾以悲壮胜,他以浑灏胜。清汪端盛称其《新蒲录》二首,说是"血泪凝和而成,读者亦为凄然肠断",今录如下:

新蒲绿,新蒲绿,韶华满眼纷成触。伤心又是十年余,转眼沧桑几翻覆。燕子飞飞高下逐,衔泥依旧巢华屋。杜鹃何处不归来,月上三更啼未足。

新蒲绿,新蒲绿,嫩柳夭桃斗妍馥。独有萋萋芳草痕,天涯望断王孙目。秦宫汉苑游麋鹿,楚水吴山栽苜蓿。日落苍梧帝子愁,纷纭泪满潇湘竹。

陈瑚,字言夏,太仓人。崇祯十五年(1642)领乡荐。明亡,绝意仕进,与陆世仪、江士韶、盛敬遁迹荒村,被褐谈道,人称"娄东四先生"。卒年六十三,门人私谥安道先生(《清史稿》列传二六七《儒林一》附陆世仪传)。有《确庵集》。他的诗以沉雄胜,和陆世仪可称工力悉敌。其诗如《映碧先生见遗地图》云:

图画山川感慨多,边陲风景近如何?入关无复萧丞相,聚米空思马伏波。两戒一江横似线,九州五岳小于螺。错疑留守魂归夜,风雨声声唤渡河。

韩洽，字君望，长洲人。明末隐居不仕。有《寄庵诗存》。吴人诗多澹雅，他独沉厚磊落，不屑一语因人。朱彝尊说："崇祯之际，言诗于吴下，吾必以君望为巨擘焉，匪特高节轶群也。"（《静志居诗话》）其诗如《张良椎》云：

一击或幸中，扶苏作天子。刘、项虽亡秦，未必速如此。

沈钦圻，字得舆，长洲人。明末诸生，入清不仕。他是沈德潜的祖父，后来德潜贵，清朝赠他礼部侍郎，他却早已死了。他的诗自摅胸臆，感时之作，声泪俱下，如《书事》云：

天地兵戈满，江湖逋窜频。白头难许国，泪眼不逢春。玉阙悲龙驭，雄关丧虎臣。唐家灵武业，望断素衣人。

邢昉，字孟贞，高淳人。崇祯时诸生，以隐终。他在明末布衣诗中称第一，诸体皆工，七律尤凄婉可诵，如《黄州寄杜于皇》云：

苇岸风凄日渐微，长堤系艇晚依依。十年红树辞乡去，八月黄州见雁飞。烧罢林庐残址在，战余茅屋几家归？翻怜此夕君思我，扬子潮回木叶稀。

屈绍隆，字介子，番禺人。明末诸生。明亡后去为僧，名今种，字一灵。返儒服，更名大均，字翁山（《清史稿》列传二七一附陈恭尹传）。所著有《道援堂诗文集》及《广东新语》等。他的诗自写性情际遇，尤长于山林边塞之作，不失为明季一奇才。如《天边》诗：

天边明月迥含霜，夜夜哀笳怨望乡。一片愁心与鸿雁，秋风吹不到衡阳。

陈恭尹（1629—1699），字元孝，顺德人。明亡隐居不仕（《清史稿》列传二七一）。有《独漉堂集》七卷。他和屈大均、梁佩兰齐名，号"岭南三大家"。大均已如上述。佩兰应清试，不在明朝遗民之列，今不具述。他操行介洁，博学工诗。其诗意在笔先，力透纸背。五古出入汉、魏，七古不屑摹仿杜、韩，而纵横变化，实兼擅其胜，五律气格高古，七律奇警苍凉。明末岭南诗人，他要算是一个超然拔俗

的了。他的《耕田歌》，是一首绝好的白话诗，在现代白话诗集中也很难找到这样好诗，今录如下：

耕田乐，耕田苦，乐哉乐有年，苦哉不可言。春未至，先扶犁，霜华重，土气肥。春已至，农事始，鸡未鸣，耕者起。泥汩汩，水光光。二月稻芽，三月打秧，五月收花，六月垂垂黄。再熟之田始有望。三月打秧，六月薅草，一熟之田，九月始得获稻。近路畏马，马食犹寡，近水畏兵，兵刈何名！上官不待熟不熟，昨夜取钱今取谷。西邻典衣东卖犊，黄犊用力且勿苦，屠家明日悬尔股。

杜濬，字于皇，号茶村。明末副榜贡生。国变后侨寓金陵，时往来淮、扬间，食贫苦吟以终（《清史稿》列传二八八《遗逸二》）。他论诗极严，于时人多所排诋，有富人重价购其集而焚之。后乡人某搜得其遗稿行世，然所存不及十之三。他的诗逸情孤诣，迥出尘表，奇崛而绝雕刻，警健而谢粗豪，虽边幅稍狭，要不失为明季一作家。如《过蒋子》诗：

维舟折桂花，香色到君家。露气潋秋水，江天卷暮霞。南轩人去尽，碧月夜来华。寂寂忘言说，心亲一碊茶。

徐夜，字东痴，初名元善，字长公，后慕嵇叔夜之为人，改今名，新城人。明末诸生，入清隐居不仕（《清史稿》列传二八八《遗逸二》，附王世录传）。有《嵇庵集》。他的《咏怀》诗云：

凡骨难遽化，仙药不可求。一身为物役，未可轻王侯。旷士洞达心，无为生远游。远游亦有方，九洲非一洲。常恐血气躯，车马生坟丘。试听蟪蛄声，语默成春秋。山岳自终始，江海日夜流。

吴骐（1620—1695），字日千，华亭人。明季诸生。以诗文受知于陈子龙、夏允彝。明亡后，绝意仕进，屏迹荒僻，不求人知。自号九峰遗黎。间作诗文，辄弃去。其诗集名《颇颔集》，皆出友人所选

录。他的诗于苍凉古直之中，极沉郁顿挫之致，虽亲炙陈子龙。而不尽沿其派。同郡李雯、宋徵舆辈名居其上，而才调出处均不及他。其诗如《宫人斜》云：

镜面铜花杂翠绯，步摇零落散珠玑。红衫化尽双蝴蝶，自采梧桐制舞衣。

哀感顽艳，不数鲍家之唱。

钱澄之，字饮光，原名秉镫，字幼光，桐城人。崇祯诸生。国变后，杜门课耕，自号田间老人(《清史稿》列传二八七《遗逸一》)。有《藏山阁集》。他的诗自抒情性，无意求工而自无不工。五言似陶潜，亦在神理，不在字句，和归子慕异曲同工。我们读他的《田园杂诗》，可以想见其品概：

人生会有尽，行止非自由。止亦不可趣，行亦不可留。如何柴桑叟，汲汲为此忧？终年痛饮酒，冀以忘其愁。吾身听物化，化及事则休。当其未化时，焉能弃所谋。有子亦须教，有田亦望收。天心于人事，何息不同流。我不离世间，而愿与天游。安能外亲戚，视之同浮沤？乃知黄、老书，不如孔与周。

他是研究过理学的，所以完全是儒家的乐天知命的人生观。

张纲孙，字祖望，一名丹，字秦亭，钱塘人。有《从野堂集》。他性恬淡，入清隐居不仕，自号竹隐君。他和陆圻、毛先舒、柴绍炳、吴百朋、陈廷会、孙治、丁澎、沈谦虞、黄昊相倡和，称“西泠十子”。他的诗悲凉沉远，矫然不群。如《白竹村》云：

路盘白竹村，崎岖探穷谷。居人八九家，林杪构破屋。下惟四柱立，亭亭不附木。仰视如鸟巢，夕暝梯云宿。已防虎豹害，复惧麋鹿触。我行多彷徨，不敢歧路哭。从者勿苦饥，餐松毛羽足。

方以智，字密之，桐城人。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授检讨。明亡后为僧，名弘智，字愚者，一字无可，别字药地(《清史稿》列传二

八七《遗逸一》)。有《桴山全集》。他是巡抚方孔炤的儿子，当时和陈贞慧、冒襄、侯方域称“四公子”。四公子中陈、冒入清皆隐居不仕，侯方域尝一应举，在清初和魏禧并以古文著称。四公子中要算以智的诗最工，其《题方孝孺祠》诗，有句云“十族可怜无姓字，三杨终不是功名”，为时所传诵。

王翃，字介人，嘉兴人。居梅里，与周筼、李绳远、朱彝尊诸人相倡和，以布衣终。著作甚多，遇盗弃于水，族弟庭掇拾残稿刻之，名《二槐草存》。他初擅词曲，后研声诗，启、祯之间，大雅不作，毅然以起衰自命。汪端说：“介人诗敛才就范，因意遣词，冲淡处似襄阳，深婉处似龙标，沉挚处亦似少陵。禾中诗人，自清江、巽隐以后，竹垞以前，此其卓然成家者也。”他的《金陵怀古》诗掩抑流丽，可匹元好问《过故宫》诸作，今录其一首如下：

钟山云气绕飞龙，空外参差紫阁重。想见当时残月夜，宫人初听景阳钟。

朱舜水(1600—1682)，名之瑜，字鲁玙，舜水其号也，余姚人。明亡后亡命日本，至今日本人还很敬仰他(日人今井弘济、安积觉合撰的《舜水先生行实》颇详尽，见《舜水先生集》)。今所传有《舜水先生集》，是民国初汤寿潜等所刊。他的诗如《钱塘》云：

天际银幡立，鸱夷怒未消。定知千载上，江水不生潮。

至如万斯年、黄宗羲、毛奇龄、朱彝尊、王士祯等，都生在明、清之交，但是他们于清朝的关系较深，让编清代文学史的去叙述吧。

第六章　明代的八股文

第一节　八股文的起源及其演变

讲近世中国文学史的，每每将八股文忽视了。八股文虽不足入于文学之列，惟明、清两代五百年间的文士学者，差不多没有不曾经过此种文体的练习的。国家以此取士，士大夫以此为进身的工具。艾南英说得好："非是途也，虽孔、孟无由得进。"（详见下节）它和近世文学界结缘至深，近世文学界受它的影响至巨。黄宗羲论明文不及前代之盛者，以为"此无他，三百年人士之精神专注于场屋之业，割其余以为古文，其不能尽如前代之盛，无足怪也。"（《明文案序》上）其实八股文的影响，岂但是古文一方面，又岂但在文学一方面，简直可以大胆一点说中国的文化也受它不小的影响咧！而它的生长，它的成熟，却在明代。论明代文学而不及八股文，正和剌剌于前后七子而置小说传奇于不论的同一错误。

在未说到本文之前，应先把"八股文"这个名称加以说明。《明史·选举志》说：

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

股是对偶的意思，但为什么叫做"八股"，《明史》语焉不详。据顾炎武《日知录》说：

经义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演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

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其两扇立格，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复如之，故今人相传谓之“八股”。若长题则不拘此。嘉靖以后，文体日变，而问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谓矣。

然则八股文的名称并不始于明初，它的内容也屡有变迁，在明嘉靖以后，一般人已经不知道为什么叫做八股文了。又据清崔学古的解释，以为八股文中有所谓“起股”、“虚股”、“中股”、“后股”，每项二股，故云“八股”（崔学古，字又尚，清当涂人。著《少学》一篇，对于八股文的作法言之颇详，见《檀几丛书》二集）。然明初的作品并没有这样一定的格式，起股、虚股的变法尤多，不一定用股，亦有每篇多至十余股者。大抵八股文名称之由来，当如顾炎武所说。其后流俗相传，这个名称遂一成不变了。

八股文的异名甚多，因为它是代圣贤立言，范围不出四书五经，所以又有“四书文”、“经义文”之称。其他如“制义”、“制艺”、“时文”等，都是八股文的异名。但我们为便于称述起见，关于这一类的文章，不论它的年代是否在成化以后，内容是否整整的八股，统叫它八股文，反正这名称久已通俗化了。

八股文的生长、成熟都在明代，但其源流则甚远，古代散文中亦常用偶句，惟出于自然，非有特意，故不多见。到了汉朝已渐有排偶之趋尚，贾谊的《过秦论》已颇有对偶的痕迹；后来司马相如作赋，亦常间以偶句；到宣帝时，王褒作《圣主得贤臣颂》，排偶之句渐多；光武时，冯衍为文，几乎纯用排衍笔法。魏、晋以还，排偶之文益多。到了六朝，骈体文便做了正宗的文学。唐韩愈号称“文起八代”之衰，化骈为散，然而他的《与陈给谏书》中有二段：

亦尝一进谒于左右矣，温乎其容，若加其新也，属乎其言，若闵其穷也。退而喜也，以告于人。……

亦尝一进谒于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惧也，不敢复进。……

这一类所谓文章的双关法，屡屡被人引用为例，实际上已具有八股文的雏形。至于律诗，尤其是唐朝的应制六韵诗，可以说是有韵的八股文。清毛奇龄说：

世亦知试文八比之何所自昉乎？汉武以经义对策，……此试文所自始也。然而皆散文也。……惟唐制试士，改汉、魏散诗而限于比语，有破题，有承题，有领比，有颈比，有腹比，有后比，而后结以收之，六韵之首尾，即起结也，其中四韵，八比也，然则试文之八比视此矣。（见《西河集》）

如上所述，八股文的渊源于文之骈俪、诗之排律，殆无疑义。然其大辂椎轮，则为宋朝的经义。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王安石当国，用经义取士，考试以经文为题，使引申其义，叫做“经义”，后人以为八股文所自昉。但体制和八股文不同，并不是“体尚排偶”，不过代圣贤立言是一样的。我们可以说宋经义和明、清的八股，精神是一贯的，而面目却全然不同。清俞长城辑北宋至清经义一百二十名家，所录有王安石、苏辙诸人的作品，然不言所据何本，后人颇疑其伪(如《四库总目提要》之《经义模范》提要云“康熙中，编修俞长城尝辑北宋至国初经义一百二十名家，然所录王安石、苏辙诸人之作皆不言出自何书，世或疑焉”)。惟《宋文鉴》中所载张庭坚《自靖人自献于先王》一文即当时程试之作。庭坚亦北宋人，其文亦较可靠，今录如下：

君子之去就生死，其志在于天下国家而不在于一身。故其死者非沽名，其生者非惧祸，而引身以求去者，非要利以忘君也。仁之所存，义之所主，鬼神其知之矣。昔商之三仁，或生或死，或为之奴，而皆无愧于宗庙社稷，岂非谋出于此欤？此其相戒之言曰：“自靖，人自献于先王。”盖于是时，纣欲亡而未寤

也。其臣若飞廉、恶来，皆道王为不善，而不与图存。若伯夷、太公，天下可谓至贤者，则洁身退避，而义不与俱亡。夫为商之大臣而且与王为亲，惟王子比干、箕子、微子也。三人者，欲退而视其败则不忍，欲进而与王图存则不可与言，虽有忠孝诚悫之心，其谁达之哉？顾思先王创业垂统以遗其子孙，设为职业禄位以处天下之贤俊，俾相与左右而扶持之，期不至于危亡而后已。子孙弗率，亡形既见，而忠臣义士之徒，犹不忘先王所以为天下后世之意，以为志不上达，道与时废，乱者弗可治也，倾者弗可支也，而臣子所以报先王者，惟各以其能自献可也。

虽然，君子之志不同，而欲生死去就，各当于义，不获罪于先王，非人所能为之谋，其在于自靖乎！盖若商祀之颠跻，则微子以为心忧，而辱于臣仆不与其君俱亡者，箕子、比干之所羞为也。微子抱祭器适周以请后，则奉先之孝得矣。比干谏不从，故继以死，则事君之节尽矣。箕子以父师为囚奴，犹眷眷不去，则爱君之仁至矣。其死者若愚，其囚者若污，而其辄去者若背叛非忠也。然三子皆安然行之，不以所不能为自愧，而亦不以所能为愧人，更相劝勉，以求合于义而不期于必同。夫谓先王所以望于后世，臣子者惟忠与孝也。故微子之去，自献以其孝；比干以谏死，箕子以正囚，则自献以其忠，则是三子之非苟为也。处垂亡之世，犹眷眷乎天下国家而不在一身，故其志之所谋，各出其所欲为，以期先王知之耳。古所谓"较然不欺其志"者，非斯人之谓乎？

虽然，《书》载微子与箕子相告诫之辞，而比干不与焉。何哉？人臣之义，莫易明于死节，莫难明于去国，而屈辱用晦者，亦所难辨者也。比干以死无足疑，故不必告人；而箕子、微子不免云云者，重去就之意而厚之故也。不然，安得并称三仁哉？

到了元朝，仁宗皇庆二年(1313)复行科举，仍用经义，然体式上已

小有变迁，综其格律，有所谓“破题”、“接题”，接题之下为“小讲”亦称“冒子”，小讲后入“官题”，官题下有“原题”，有“大讲”，有“余意”（亦称“从讲”），又有“原经”（亦称“考经”），有“结尾”。承袭既久，以冗长繁复为可厌，或稍稍变通之，而大要有“冒题”、“原题”、“讲题”、“结题”，则一定不可易（以上据《四库总目书提要》之《书义矜式》提要）。像这样的在一定规律之下以次逐段构成，已渐近八股文的体裁。明太祖洪武初，下诏特设科举，以洪武三年（1370）八月为始。不久复罢科举不用，但令有司举察贤才。到十五年（1381）复设，十七年始定科举之式，命礼部颁行各省，后遂以为永制（以上据《明史·选举志》）。十八年的会试，就是有名的所谓“洪武乙丑科”。那年会试的题目是“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第一名为分宜人黄子澄，其文云：

> 治道隆于一世，政柄统于一人。夫政之所在，治之所在也。礼乐征伐皆统于天子，非天下有道之世而何哉？
>
> 昔圣人通论天下之势，首举其盛为言。若曰：天下大政，固非一端；天子至尊，实无二上。
>
> 是故民安物阜，群黎乐四海之无虞；天开日朗，万国仰一人之有庆。主圣而明，臣贤而良，朝廷有穆皇之美也；治隆于上，俗美于下，海宇皆熙皞之休也。非天下有道之时乎？
>
> 当斯时也，语离明则一人所独居也，语乾纲则一人所独断也。一制度，一声容，议之者天子，不闻以诸侯而变之也；一生杀，一予夺，制之者天子，不闻以大夫而擅之也。皇灵丕振，尧封之内咸懔圣主之威严；王纲独握，而禹甸之中皆仰一王之制度。信乎，非天下有道之世，孰能若此哉？

这篇文章还是八股文的初体，虽体尚排偶，尚无一定之限制。成化以后，体式渐完备，有所谓破题（破题限两句，将题字破开，综括全篇意旨）、承题（顾炎武云“制义发端两句，谓之‘破题’，大抵对句为

多，此宋人相传之格。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谓之‘承题’。然后提出圣贤为何而发此言，谓之‘原起’。至万历中，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圣贤言毕，自陈所见，或数十字，或百余字。谓之‘大结’。后功令益密，恐有藉以自炫者，则但言前代，不及本朝，至有大结止用三四句者矣”）、起讲（崔学古云：“又名‘小讲’、‘开讲’，是文章说起处。破、承是我断古人的，起讲以下便替古人说话了。”按：起讲下有“领题”，是承上落下处。但明文对于起讲、领题的界限，不若清代作家的明划，有时候起讲下竟找不出领题）、起股（崔云“又名‘提股’，是挂题线索处。亦有不用股，只单一行以代起股者，是起股之变法”）、虚股（崔云“又名‘小股’，是点出题面处。每股以两句为率。亦有不用股，只作一两句点题者；或顿一二语，方点出题面者；更有不即点题，先只顿一二语者”）、中股（崔云“是正发题义处”）、后股（崔云“是推廓余意处”）、大结（《制义丛话》引《书香堂笔记》云“前明制义，每篇之后多有大结”）等名目，以次逐段构成。今录天启间金声的“言不顺”两句一文以示例：

事不可以逆成，而正名之义切矣。（破题）夫言以行事，不得于言而求诸事，不亦左乎？（承题）

若曰，子迂吾说，将谓拘于理而不达于事也，而不知吾说诚计事之深者也。（起讲）

以为吾欲为政，则必以兴事为期，有如为之而无成，此其君无乐乎有国，而其相亦无贵乎当国。且吾业为政则无自操事之体，亦惟是申命以行之，岂徒惟其言而莫予面违，亦必服其言而莫予心非。（起股）

今者，名不正而言已不顺矣。顺逆之故，初不必验于言后，而成败之机，吾早已见于事前。（虚股）

将有事于国中，则明诏大号，百姓于是乎望德音焉。君臣上下，义有所错，要必始于父子。而今大义先蔑如矣，则而象

之，又何诛乎？虽令之不听，呼之不应，吾见其废然而反耳。将有事于境外，则尺简寸牍，四方于是乎观辞命焉。朝聘会盟，继好息民，则又必称我先君。而今紊然于所自承矣，文而告之，又何称乎？或诘我而无辞，即欲盖而弥彰，吾见其动辄得咎耳。（中股）

盖勋业之在天壤，未有可独立而就。天与人归，即帝王尚烦其拟议，故谟必讦而后定命，猷必远而后辰告。岂其抗衡中外而可以遂其侥幸之图？天理之在人心，不可以一日而欺。理短辞窘，虽英雄无所用其势力。彼作誓而尚有叛，作诰而尚有疑，况乎决裂典则而漫以行其矫诬之意！（后股）

由斯以观，不顺于言而求成于事，必不得之数矣，而其弊皆自名始。子谓为政而不期于成事则可，不然，安得迂吾言乎？（大结）

这篇作品，首尾完备，中间又是整整的八股，可以说是八股文的正格。但我前面说过，八股文并非一成不变的整整的八股，明文中往往有多至十几股者；到了清朝，后股可做可勿做，所以名为八股，实际上往往只有六股。凡此，其例甚多，现在不一一列举了。

第二节　八股文的作用及其影响

八股文的作用是很明显的：专制帝王用以作愚弄士子的工具，而士大夫用以作进身荣显的敲门砖。明洪武元年（1368）太祖下诏说：

……今朕统一中国，外抚四夷，与斯民共享升平之治，所虑官非其人，有伤吾民，愿得君子而用之。自洪武三年八月始，特设科举，以取怀才抱德之士，务在经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质得中，名实相称。其中选者，朕将亲策于廷，观其学识，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材学出众者，待以显擢。使中朝文武，皆

由科举而进，非科举无得与官！……

这真是专制帝王把士大夫养成很顽固的服从性与模仿根性的绝妙方法！"非科举无得与官"，你倘不甘贫贱终身，你须得遵守功令，在应该说什么与应该怎样的范围内，尽力地显出本领来，显得好时便是"中选"，便有官给你做。简单地说，你要做官，你须得先练习好了应试的文章。而这些文章，又须"代古人语气为之"，不容你妄参意见，结果是自己没有思想，没有话说，这又是养成奴隶根性的绝妙方法！然而这还不够，还得用尽种种方法，先把士子的廉耻气骨都消磨尽了，然后可以帖然就范，做专制帝王的忠臣义士。我们一看明朝对付应举生的种种方法，便可知道其中的玄妙了。艾南英《应试文自序》说：

嗟乎！备尝诸生之苦，未有如予者也。旧制，诸生于郡县有司，按季课程，名"季考"；及所部御史入境，取其士什一而校之，名为"观风"。二者既非诸生黜陟之所系，而予又以懒慢成癖，辄不与试。独督学试者于诸生为职掌，其岁考，则诸生之黜陟系焉，非患病及内外艰无不与试者；其科考，则三岁大比，县升其秀以达于郡，郡升其秀以达于督学，督学又升其秀以达于乡闱，不及是者又于遗才大收以尽其长，非是涂也，虽孔、孟无由而进。故予先后试卷，尽出是二者。试之日，衙鼓三通，虽冰霜冻结，诸生露立门外，督学衣绯衣坐堂上，灯烛围炉，轻暖自如，诸生解衣立，左手执笔砚，右手持布袜，听郡县有司唱名，以次立甬道，至督学前，每诸生一名，搜检军二名，上穷发际，下至膝踵，倮腹赤踝，至漏数箭而后毕，虽壮者无不齿震悚栗，以下大都寒沍不知为体肤所在；遇天暑酷烈，督学轻绮荫凉，饮茗挥箑自如，诸生什佰为群，拥立尘坌中，法既不敢扇，又衣大布厚衣，比至就席，数百人夹坐，蒸薰腥杂，汗流浃背，勺浆不入口，虽设有供茶吏，然率不敢饮，饮必朱钤其牍，疑以为

弊，文虽工，降一等，盖受困于寒暑者如是。既就席命题，一以教官宣读，便短视者，一书牌上，吏执而下巡，便重听者，近废宣读，独以牌书某学某题，一日数学，则数吏执牌而下，而予目短视，不能咫尺，必屏气询旁舍生问所目，而督学又望视台上，东西立瞭望军四名，诸生无敢仰视，有四顾离立倚语者，则又朱钤其牍，以越规论，文虽工，降一等，用是腰脊拘困，虽溲溺不得自由，盖所以系其手足便利者又如此。所置坐席，取给工吏，吏大半取渔所费，仓卒取办，临时规制，狭迫不能舒左右肱，又薄脆疏缝，据坐稍重即恐折仆，而同坐诸生常十余人，虑有更号，率十余坐以竹联之，手足稍动则诸坐皆动，竟日无安境，且自闽中一二督学重怀挟之禁，诸生并不得执砚，砚又取给工吏，率皆青刓顽石，滑不受墨，虽一事足以困其手力，不幸坐漏痕承帘所在，霖雨倾注，以衣覆卷，疾书而毕，其受困于胥吏之不谨者又如此。比阅卷，大率督学以一人阅数千人之文，文有平奇虚实、繁简浓淡之异，而督学之好尚亦如之，取必于一流之材，则虽宿学不能以无恐。高下既定，督学复衣绯衣坐堂上，郡县有司候视门外，教官立阶下，诸生俯行以次至几案前，跪而受教，噤不敢发声，视所试优劣，分从甬道西角门而出，当是时，面目不可以语妻孥，盖所谓拘牵文法，以困折其气者又如此。至入乡闱，所为搜检、防禁、囚首垢面、夜露昼曝、暑暍风沙之苦，无异于小试，独起居饮食稍稍自便，而房师非一手，又皆簿书狱讼之余，非若督学之专静屏营，以文为职，而予七试七挫，改弦易辙，智尽能索，始则为秦、汉、子、史之文，而闱中目之为野，改而从震泽、毗陵，成、弘正大之体，而闱中又目之为老，近则虽以《公》、《谷》、《孝经》、韩、欧、苏、曾大家之句，而房师亦不知其为何语，每一试已，则登贤书者，虽空疏庸腐、稚拙鄙陋，犹得与郡县有司分庭抗礼。而予以积学二十余

> 年，制义自鹤滩、守溪，下至弘、正、嘉、隆大家，无所不究，书自六经子史、濂洛关闽、百家众说、阴阳兵律、山经地志、浮屠老子之文章，无所不习，而顾不得与空疏庸腐、稚拙鄙陋者为伍，入谒上官，队而入，队而出，与诸生等。每一念至，欲弃举业不事，杜门著书，考古今治乱兴衰以自见于世，而又念不能为逸民以终老。嗟乎！备尝诸生之苦，未有若予者也。……

像这种对付应举生的方法，几乎并囚犯而不如。但读书人到了那时候羞耻是忘记了，气节是不讲了，什么“士可杀不可辱”的古话也置之脑后了，宁受搜检、防禁、囚首垢面、夜露昼曝、暑暍风沙之苦，跪而受教，噤不敢声之辱，虽当时面目不可以告妻孥，还是乐此不疲。所为何来？无非是为“不能为逸民以终老”，换句话是为要做官。程颐说：“科举之学，不患妨功，惟患夺志耳。”（《程子语录》）其实他何尝知道聪明的专制帝王创立科举，就在要夺士大夫的志，不夺其志，怎的养成他们的奴隶性呢？而用八股文取士，比较任何方法更来得巧妙。在另一方面，读书人有了这块敲门砖，不用谈什么学术思想，只教哼几篇烂八股，迎合了考官的意旨，不管你空疏庸腐，稚拙鄙陋，一旦中式，就是新贵人的“举人”、“进士”了。像艾南英一流人还是笨伯，要从什么“六经子史、浮屠老子之文章”的中间去练习做八股文，无怪要“七试七挫”，“备尝诸生之苦”了。

八股文为专制帝王及士大夫互相利用，它的运命从明初到清末，就维持了五百多年。这五百多年中受它影响的，不仅在文学一方面。单就文学一方面说，单就明代文学界说，正统派的文学家中间，有几个没有经过八股文的练习？归有光在明代的散文作家中算是有数的人物，然而黄宗羲说他“试除去其叙事之合作，时文境界，间或阑入”（《明文案序》上）。其他也就可想而知了。明代的几次文学复古，虽原因不一，但对于八股文的反动至少是原因之一（参阅本书“引言”）。然而他们——如前后七子——受八股文的代古人说

话的影响太深了，虽跳出了八股文的圈套，却又自然而然地落到别一个圈套里，这个圈套，就是不说自己的话，专事模拟古人，又叫做“窠臼”。八股文替古人说话，美其名为“代圣贤立言”，其实是落了圣贤的窠臼。复古派高唱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以及号称反复古派的变秦、汉为欧、曾，其实不过打着秦、汉、盛唐或欧、曾的腔调来说话。可笑从来的所谓文章道统，不过博得几种窠臼而已，而八股文便是这几种窠臼的代表。我们再扩大一些说，八股文的精神，是在不许对古人的说话及当时的文物制度有丝毫怀疑，不许发挥自己的思想。懂得这一贯的精神的，身前则身名俱泰，身后则垂范后人，天下才智之士，哪一个不想走上这一条路！同时把一切描写社会状况表现自己思想的小说、传奇等，都认为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中国文坛上的黯淡空气，多半是从这里来的。再往后一些说，八股文的精神，在科举废止后，在不曾习练过它或竟不曾见它的人们的心里还是活着。从前做八股文的妙诀就在谨遵功令替古人说话，换句话就是奉命说话。这“奉命说话”四字差不多又是中国人做官及处世的妙诀，专制时代不懂得这个妙诀，便会变成“非圣无法”的叛徒，不给你官做还是小事。

第三节　明代的八股文作家

八股文在明代是生长及成熟的时期，故三百年中，作家虽多，而体制格调各不相类。清方苞说：

> 明人制义体凡屡变，自洪（武）、永（乐）至（成）化、（弘）治百余年中，皆恪遵传注，体会语气，谨守绳墨，尺寸不逾。至正（德）、嘉（靖），作者始能以古文为时文，融液经史，使题之义蕴隐显曲畅，为明文之极盛。隆（庆）、万（历）间兼讲机法，务为灵变，虽巧密有加而气体苶然矣。至（天）启、（崇）祯诸家，则穷思毕精，务为奇特，包络载籍，刻雕物情，凡胸中所欲言者皆借题

以发之，就其善者，可兴可观，光气自不可泯。凡此数种，各有所长，亦各有其蔽。故化、治以前择其简要亲切，稍有精彩者，其直写传注，寥寥数语，及对比改换字面而意义无别者不与焉。正、嘉则专取气息醇古，实有发挥者，其规模虽具，精义无存，及剿袭先儒语录，肤廓平衍者不与。隆、万为明文之衰，必气质端重，间架浑成，巧不伤雅，乃无流弊者，其有专事陵驾，轻剽促隘，虽有机趣而按之无实理真气者。至启、祯名家之杰特者，其思力所造，途径所开，或为前辈所不能到，其余杂家，其偭弃规矩以为新奇，剽剥经子以为古奥，雕琢字句以为工雅，书卷虽富，辞气虽丰，而圣经贤传本义转为所蔽蚀矣。（见《钦定四书文·凡例》）

方氏所论偏于作风方面，而八股文的体制格调，也随各时代而变迁。我们为便于叙述起见，把它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自洪武中到成化初；第二个时期，自成化中到嘉靖末；第三个时期，从隆庆到万历末；第四个时期，从天启以迄明末。前人曾把这四个时期的作品，比之于诗之有初、中、盛、晚唐。苏翔凤说：

文（指八股）之在明，犹诗之在唐也，初唐浑穆，盛唐昌明，中唐名秀，至晚唐而忧时悯俗之意发而为言，感激淋漓，动人也易。洪、宣（德）之文，初唐也；成、弘、正、嘉之文，盛唐也；隆、万之文，中唐也；……启、祯则晚唐矣。（见所选《启祯文自序》）

第一时期是八股文的初生时期，作家可称述者甚少。相传刘基有“敬事而信”一文，为明朝一代八股文之祖，然是初体之尤者，故后人选录明代八股文，大都以黄子澄的“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一文为第一篇文字。子澄，初名湜，以字行，更字伯渊，分宜人。洪武乙丑科会元，官至太常寺卿兼翰林学士（《明史》卷一四一）。他那篇作品，前面已经选录了，兹不赘录。

在第一期的作家中，姚广孝以“通儒书僧”资格，召试礼部入

格，真是明代八股文作家中之别开生面者。广孝本吴中僧，名道衍，与高启为诗友，在第一章里已经讲起过他。《明史》说他在洪武中以通儒书僧试礼部入格，不愿为官，仍赐僧衣。相传其有所谓“诚其意者”两节一文，殆即试于礼部时的作品，文云：

盖闻明德以天下为体，然每为天下之念所昏。圣经以致知言诚意，而求端于格物，此有深意焉。

夫所格者何物也？若曰：一人明德耳。何为天下国家之皆贯其间？则必有为人一念，欺吾初心，是与小人之不格物者一也。如何修身然后齐、治、平皆在其间？又有求人一念，并欺我知，是与小人之不能致知者一也。

凡好恶发于赤子之真，皆可通之天下，此圣贤之意，自慊也。凡好恶为天下而饰，即非赤子之真，此杂霸之意，即盗跖之意，自欺也。虽以圣人帝王而不能无杂霸之心，即不能无盗跖之心，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慎之何如？时时格物则时时致如矣。小人惟致知格物之间略有不慎，而求之天下；圣人王者方持大鉴以照心中之盗跖，而天下之盗跖皆入其鉴，此小人之所以不能免也。

嗟乎！小人亦误求之天下之间，而失之于先后焉者也，其害如此，可不慎哉！惟慎故格物致知，格物致知正慎也，此明明德也，诚意者可不知哉！

这篇作品和黄子澄那篇一样，都是未成熟的八股文。然而以“通儒书僧”的资格，居然也有机会一显八股文的手段，想见明初仕途之广，而明太祖笼络读书人的手段，亦可谓无微不至了。

第一期之末的八股文，渐渐地由初生而快到长大的时候了，像邱濬便是一个承先启后的有名作家。邱濬在第二章里已经讲起过他。他的“周公兼夷狄百姓宁”文云：

惟圣人有以除天下之害，则民生得其安矣。夫人类所以不

安其生者，异类害之也，苟非圣人起而任除害之责，则斯民何自而得其安哉？

昔孟子因公都子好辨之问，历举群圣之事而告之及此。谓夫周公以元圣之德，为武王之相，斯时也，成周之王业方兴，有殷之遗患未息，其所以为天下害者，非独奄、飞廉而已，而又有所谓夷狄者焉。夷狄交横，不止害民之生，而彝伦亦或为之渎矣。不力去之不可也。其所以为中国患者，非独五十国而已，而又有所谓猛兽者焉。猛兽纵横，不止妨民之业，而驱命亦或为之戕矣。不急除之不可也。

周公生于是时，以世道为己任，宁能视民之害，而不为之驱除乎？是以于夷狄也则兼而并之，而使之不得以猾夏；于猛兽也则驱而逐之，而使之不至于逼人。夷狄既兼，则夷狄不得以乱华，而凡林林而生者，莫不相生相养，熙然于衣冠文物之中，而无渎乱之祸。猛兽既驱，则鸟兽之害人者消，而凡总总而处者，莫不以生以息，恬然于家室田畴之内，而无惊扰之忧。

谓之曰："百姓宁"，信乎无一人之不安其生也。周公以是而相武王，其及人之功何其大哉！

第二期的作家，首推王鏊。鏊(1450—1524)，字济之，又字守溪，吴县人。成化甲午(1475)解元，乙未会元、探花，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卒谥文恪(《明史》卷一八一)。其制义有《王守溪文稿》。他是明代最有名的八股文作家。俞长城说："制义之有王守溪，犹史之有龙门，诗之有少陵，书法之有右军，更百世而莫并者也。前此风会未开，守溪无所不有；后此时流屡变，守溪无所不有。理至守溪而实，气至守溪而舒，神至守溪而完，法至守溪而备。"(见俞所辑《百二十家名家集》及梁章钜《制义丛话》)今录其"百姓足君孰与不足"文如下：

民既富于下，君自富于上。盖君之富藏于民者也，民既富

矣，君岂有独贫之理哉？

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以告哀公，盖谓公之加赋以用之不足也，欲足其用，盖先足其民乎！诚能百亩而彻，恒存节用爱人之心；什一而征，不为厉民自养之计。则民力所出，不困于征求；民财所有，不尽于聚敛。闾阎之内，乃积乃仓，而所谓仰事俯育者无忧矣；田野之间，如茨如梁，而所谓养生送死者无憾矣。

百姓既足，君何为而独贫乎？吾知藏诸闾阎者，君皆得而有之，不必归之府库而后为吾财也；蓄诸田野者，君皆得而用之，不必积之仓廪而后为吾有之也。取之无穷，何忧乎有求而不得？用之不竭，何患乎有事而无备？牺牲粢盛足以为祭祀之供，玉帛筐篚足以资朝聘之费，借曰不足，百姓自有以给之也，其孰与不足乎？饔飧牢醴足以供宾客之需，车马器械足以备征伐之用，借曰不足，百姓自有以应之也，其孰与不足乎？

吁！彻法之立，本以为民，而国用之足乃由于此，何必加赋以求富哉！

清方苞批评这篇文章说："曾次洗发，由浅入深，题义既毕，篇法亦完，此先辈真实本领。后人虽开阖照应，备极巧变，莫能继武也。"（见《制义丛话》引《钦定四书文》）

与王鏊齐名者为钱福，时称钱、王两大家。福，字鹤滩，华亭人。在前几章里已经讲过他，俞长城说他的八股文"发明义理，敷扬治道，正大醇确，典则深严，即至名物度数之繁，声音笑貌之末，皆考据精详，摹画刻肖，中才所不屑经意者，无不以全力赴之"。他的"非帷裳必杀之"一文，为后人传诵，以为在《论语・乡党》篇中最难著笔的题目，他独能考据精详，言之娓娓。今录其文中四比如下：

朝祭之裳，贵乎直方，故正幅如帷，虽费而不及奢也。自此之外，何所取义于正幅，而为是奢且僭耶？于是省为削幅，而以

> 齐视要上，则杀乎其下矣。如帷之幅，要齐同广，故襞积就要，虽华而不及靡也。既用削幅，何所设夫襞积，而为是靡以混耶？于是旁无襞积，而要有杀缝，亦澹如其下齐矣。
>
> 杀其幅而不嫌于前后之联裂，昭其俭也。先王之制无之，不敢增也。杀以缝而取给于前后之联属，贵其完也。先王之制有之，不敢缺也。

据说后人做这个题目的都不能胜过他，但据江永的批评，这篇作品有“六失”，说他“读书不细，考古不精”，对于这个题目的上下文误解了，对于古代制服帷裳和深衣的不同处也弄错了（见《制义丛话》）。大概前人之仅以八股文传者，都免不了一个“陋”字。但八股文不重在考据，钱福也不是考据家，他之所以在文学史上有相当地位，全在他做的词曲，八股文何足传世！管他帷裳是否“旁无襞积而腰有杀缝”，在这里置之不论可也。

到了嘉靖间，唐顺之、归有光等以古文为时文，其体又稍变。

唐顺之为嘉靖己丑（1529）会元，以古文鸣于时，已见前第四章。他又精于八股文，有自为诗云“文入妙来无过熟，书逢疑处更须参”，是他自道其所得。他的八股文有熟中生巧者，如“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两节，叠下两比喻，一反一正，文气流走不齐，在明代八股文中又别具一格者，文云：

> 且夫两物相形而高下异焉，所以辨其高下者，未尝不兼本末而较之也，故寸木之与岑楼，其高下至易知也。今也不复揣其下之平而但取其上之齐，是寸木固使之高于岑楼矣。今论礼者，不究其本，而必曰礼食亲迎而已；论食色者，不究其本，而必曰饥死与不得妻而已，是食色固可使之重于礼矣。任人之说，似亦无足怪者。
>
> 虽然，此特自其一偏而言之耳，而非所以道其常也。何者？两物相形，轻重异焉，所以辨其轻重者，未尝不等其轻重而较

之也，故金之与羽，其轻重至易知也。今以一钩金之寡而较一舆羽之多，而谓足以概金羽之轻重也，岂理也哉？今论礼者，不量其多寡，而必曰礼食亲迎而已；论食色者，不量其多寡，而必曰饥死与不得妻而已，如是而谓足以权礼与食之轻重，又岂理也哉？任人之论，其不可也明矣。

俞长城说："此等作法，成、弘、正、嘉间多有之，隆庆以后则绝响矣。"

归有光较唐顺之为晚出，其成进士在嘉靖乙丑(1565)。他亦以古文称，同见前第四章。以古文为时文，始于唐顺之，而有光又恢之以闳肆，如"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两节文中后二比云：

盖天下之理，不以内外而或殊，必理无不格，而后天下之是非不能眩，发无不实，而后吾心之体得其平，此致由于格，诚由于致，正由于诚，功固有不得不然者，非务其外而遗其内也。天下之势，不以远近而或异，必皇极之既建，而后推行之本以立，刑于之既成，而后感化之道以神，此自身而家，自家而国，自国而天下，机固有不容自御者，非泥于近而戾于远也。

方苞说："清透简亮，有一气挥洒之乐。"

在第二期作家中尚有几个值得一提的，胡友信博通经史，学有根柢。史称明代举子业最擅名者，前则王鏊、唐顺之，后则归有光、胡思泉，思泉是友信的别号(均见《明史》卷二八七《文苑三》)。唐寅以风流放达、玩世不恭闻于时，而其八股文乃方正严洁，近于老师宿儒。陈献章倡学东南，为世儒宗，而其文乃潇洒有度，顾盼生姿，一洗腐风。俞长城说："吾固知人造其绝者，未尝不有所兼也。道学绝者兼风流，吾求其人合其文，其陈白沙乎！风流绝者兼道学，吾求其人合其文，其唐子畏乎！"(《明史》卷一八一)而王守仁以理学为一代大儒，他的"心即理说"和朱熹的理气二元论截然不同，然他所做"《诗》云鸢飞戾天"一节文起讲云："今夫天地间惟理气而已矣，

理御乎气而气载乎理……"谨遵朱注，不敢稍有逾越。其他如诸燮、茅坤、许孚远（诸燮，字理斋，嘉靖中进士，《明史》无传。许见《明史》卷二八三《儒林一》）等，在嘉靖间都是有名的作家。而胡定（字二溪，《明史》无传）在嘉靖之季，文尚博大，尤称一时之隽云。

第三期的作家，兼讲机法，务为灵变，盖作风又随时代环境而一变。徐越说："嘉靖以前文以实胜，隆、万以后文以虚胜；嘉靖文转处皆折，隆、万文始圆；嘉靖文妙处皆生，隆庆、万历始熟。"（见《制义丛话》）。然这个时期中却有一个特色，那时候朝政日非，士心郁结，文多借题发挥，不若以前之体会古人语气，谨守绳墨，尺寸不逾了。当时的代表作家，要推赵南星、顾宪成、汤显祖等。

赵南星，字梦白，又字侪鹤，高邑人。万历甲戌（1574）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卒谥忠毅（《明史》卷二四三）。他赋性刚介，不能容物，悲时悯俗，恶佞嫉邪之旨，尽发之于文。相传其"非其鬼而祭之谄也"文，最得圣人言外之意，或以为当时宰相张居正当国，朝士阿附，他借题发挥而作。其中间四比云：

> 世之可以富人、可以贵人者，亦既尊而奉之矣，而富贵之未至，意者其乏冥助耶？是故为之，祭以祈之，而逢迎之态何所不备！世之可以困人、可以苦人者，亦既柔而下之矣，而困苦之未祛，意者其有阴祸耶？是故为之，祭以禳之，而颠蹶之清岂所忍闻！
>
> 自下而干上，是谓之僭，僭之所不敢避，乃足以明虔，冀所祭者之亮之而据之也。有废而私举，是谓之乱，乱之所不敢辞，乃足以效其诚。

而其大结云：

> 藉灵宠于有位，既以谄鬼者而谄人；求凭依于无形，又以谄人者而谄鬼。吾不意世道之竞谄，一至于此！

这是很明显地有所感激而为此论。

顾宪成为万历丙子(1576)解元,庚辰(1580)进士,在第四章里已经讲起过他。清王夫之说:“承嘉靖末苏、曾泛滥之余,当万历初俚调咿嚘之始,顾泾阳先生独以博大宏通之才,竖大义,析微言,屹然岳立,有制艺以来无可匹敌。”其“尽其心者”一节文的破承云:

> 君子致知之学,一知性焉尽之矣。盖天下无性外之理也,知性则可以尽心,可以知天矣,其机岂有二乎?

他当时讲学东林书院,发挥程朱派的学说,这破承题里的几句话,抵得过他的《小心斋札记》全部。

汤显祖为万历癸未(1583)进士,也在第四章里讲起过。俞长城说他的八股文“择理精醇而出之以名隽,以六朝之佳丽写五子之邃奥,足以自名一家”。他的“父为大夫”八句题文,最为传诵,其起讲云:

> 且礼以终始人道之节,而屈伸其无已之心,其分莫明于葬祭。葬者藏也,所以藏而安之也,不于其分则不安;祭者食也,所以食而享之也,不于其分则不享。忍亲于不安不享者,非孝也,于是乎有制焉。

据前人的批评,以为这个起讲老干无敌,而题之精蕴已该,非时手所及。又他的“不有祝鮀之佞”文后段云:

> 在朝廷而不佞,难于终宠,即侪党之间,不佞不足以全其身;处怨敌而不佞,难以巧全,即骨肉之际,不佞不足以全其爱。

这几句话发挥末流情弊,痛快已极,然而究竟不像圣贤的口气,和八股文代圣贤立言的主旨不合,于此可见当时的作风,和第一二两期大有径庭的了。

第三期的作家中尚有几个应该一提的,黄汝亨(《明史》无传),字贞父,仁和人。万历辛卯(1591)举人,戊戌(1598)进士,官终江西参议。他和秀水黄洪宪(葵阳)齐名,称“浙中二黄”。他的文精峭而意胜于词,在洪宪之上。许獬(《明史》无传),字子逊,又字钟斗,同

安人。万历辛丑(1601)会元,官翰林编修,有《许钟斗稿》。俞长城说:"古文之尽,莫如欧阳永叔;时文之尽,莫如许钟斗。万物始而含孕,继而发荣,终而烂漫,其必趋于尽者势也,惟善用尽者作以持之。永叔之文尽矣,而骨力峭拔,风度委折,使人不觉其尽;钟斗之文亦尽,而遒炼古腴,人又不厌其尽也,钟斗其时文中之永叔乎!"(见俞所辑《百二十家名家集》及梁章钜《制义丛话》)然黄、许二人的八股文,皆学王(鏊)、钱(福)一派,王夫之至诋为"吟舌娇涩,如鸲鹆学语"。至万历末科(己未科,1619)进士昆山顾锡畴(《明史》卷二三一)、汉阳李若愚(字公愚,汉阳人,《明史》无传),一则容雅简练,婉而多讽,一扫忿激粗厉之音;一则以坚实苍老,一洗软媚冗俗之弊,不愧第三期作家中有力殿将。

第四期的作风又和第三期有不同处,第三期到万历中年以后,八股文渐趋俗陋,往往堆砌成篇,无一字从心坎中过;至第四期启、祯间的名作家,则如方苞所说的"穷思毕精,……凡胸中所欲言者,无不借题以发之。……其思力所造,涂径所开,或有为前辈所不能到"(《钦定四书文·凡例》)其代表作家则有章世纯、艾南英、罗万藻、陈际泰(章世纯、罗万藻、陈际泰均附《明史》卷二八八《文苑四》艾南英传),号四大家。

章世纯,字大力,临川人。天启辛酉(1621)举人,官柳州知府。有《章大力稿》。当万历末,场屋文腐烂,艾南英深嫉之,约他和罗万藻、陈际泰以兴起斯文为任,乃刻四人所作行之世,世人翕然归之,称为"章罗陈艾"。他的作品以幽深沉鸷胜,而说理精深,尤为时流所不及。他的"君娶于吴为同姓"两句文,最为后人传颂,其前幅云:

> 且先王于合之甚者,皆求有以别之,别之而为合,故其合也固而能久。异而后事同,睽而后志通,此其义乎?然而义不止于此,天地阴阳之气,皆以异类相求,异气相益,而至于一本之亲,通其情昵则有美尽之忧。人道礼义之始,常使疏不至离,

亲不至渎，而至以燕亵之私，讲于骨肉则有道苦之害。

其在太古之时者，其取义精，盖智足以辨微，故所详者专于阴阳之际。同德者为同气，同气者同姓；异德者为异气，异气者异姓。同姓虽远，不通婚姻；异姓虽近，不避婚姻，故同为黄帝之子而著姓之殊。所以然者，记异德以别所生之气也，古道然也。其在中古而后者，其据义显，盖其智不足以及微，故所辨者专于礼义之严。为正姓以统远，远者行饮食；为庶姓以统近，近者议服数。男子则称氏以别贵贱，女子则称姓以别婚姻，故有"买妾不知姓则卜"之文。所以然者，本所从以厚男女之别也，周道然也。

什么叫做"同气者同姓，异气者异姓"，现在看来，真不值一笑。然前人却以为这段文字"非参天人之秘蕴，具制作之精心者，不能道其只字"。

艾南英为天启甲子科(1624)举人，在第五章里已讲起过他。他少负异才而屡试不第，备尝诸生之苦，结果还只是一个举人，终不能成进士。然他的文名，却早倾动海内，他集同志所刊的四家稿，几于家诵户习，而朴质坚粹，为三家所不及。其"危行言孙"文中二比云：

当持禄苟容之秋，而我且与举朝同其汶暗，则斯世之精神，何所属哉？天地之气欲尽，而吾以其行留之。至于怨诽而不乱，主文而谲谏，言之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亦遭逢之一局耳。以天性孤行之体，而我且与世人混其波流，则一身之名义，又安所逃哉？鬼神之责莫逭，而吾以其行盟之。至于所闻则词显，所见则词微，志隐而味深，婉曲而多姿，亦寸衷之独异耳。

浑朴醇古，在八股文中确是高品。

罗万藻，字文止，临川人。天启丁卯(1627)举人，崇祯戊辰(1628)进士。有《罗文止稿》。他的作品，多借题摅发胸臆，而忧时

剀切之旨，出之以蕴藉风流，如“才难不其然乎”文之后幅云：

> 有帝王之君，然后能有帝王之臣，此其难难在得君，盖有然矣。顾以难委君，非责备人臣之旨也。帝臣王佐，其用间见于世，而流风余迹，尝留其睹记于人之心。称此以求，目中升降之微，宛然可参。王之才，视帝复何如哉？而况其下乎！
>
> 通治乱之世，然后能别治乱之才，此其难难在逢世，抑有然矣。顾以难予世，非深悉圣贤之论也。绥治戡乱，其力俱竭于世，而时过数从，尽听其微言于事之理。由斯以谈，古今盈虚之势，岌然莫反。乱之才，观治竟何如哉？又况其降乎！

陈际泰（1567—1641），字大士，临川人。父流寓汀州武平，生于其地。家贫，不能从师，又无书，时取旁舍儿书屏人窃诵。从外兄所获《书经》，四角已漫灭，且无句读，自以意识别之，遂通其义。十岁，于外家药笼中见《诗经》，取而疾走，父见之怒，督往田，则携至田所，踞高阜而哦，遂毕生不忘。久之，反临川，与艾南英辈以时文名天下。其为文敏甚，一日可二三十首，先后所作至万首，经生举业之富，在明代要算他首屈一指。崇祯三年（1630）举于乡，又四年成进士，年纪已经六十八岁了。官终行人司行人。有《太乙山房稿》、《已吾集》。他的崇祯甲戌科（1634）会试“其行已也恭”四句题文末二比云：

> 夫恭与敬，事之相合以为理者也。君子以已事君，而得其所行之大，使无兢业之心为主于内，将为人臣者之大节已乖。抑惠与义，事之相济以为功者也。君子得君以治民，而见其所行之实，使无竞绿之用矫拂其间，则为人长者之精神不备。

四大家以外，金声、黄淳耀等都是有名的作家。

金声（？—1645），字正希，嘉鱼人，休宁籍。天启甲子（1624）举人，崇祯戊辰（1628）进士，官山东佥事，唐王时以右都御史总督诸道军，清师破旌德诸县，被执，死之，谥文毅（《明史》卷二七七）。有

《金正希稿》。他少好学，为应举业多湛深之思，名倾一时。他的"德行颜渊"一节文最脍炙人口，其中二比云：

道大莫能容，所欲杀者夫子，而于诸贤无忌也。设诸贤非从夫子游，挟其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以博取人间富若贵与一切功名才望，固自易易，何困厄若斯也。而诸贤不愿也。

圣人无厄地，所自信者天命，而人心则不敢必也。设诸贤但以从夫子之故，奉其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以投凶暴之一烬，而师弟朋友无一存者，固事势之常，亦无可如何也！而诸贤不惧也。

黄淳耀，崇祯癸未(1643)进士，在第五章里已经讲起过他。方苞说："黄蕴生文较金、陈、章、罗气质略粗，而指事类情，肝胆呈露，精神自不可磨灭。"又说："金、黄二家之文，言及世道人心，便能使读者义理之心勃然而生，故知言者心之声，不可以伪为也。如'见义不为无勇也'篇与'人而无信章'篇皆脍炙人口，而'见义'篇尤卓练。"(均见"钦定四书文")。今录其中二比云：

选愞出于性生，则虽学问经术本异庸流，而举平日之所知所能尽以佐其浮沉之具。

畏葸积于阅历，则虽醇谨老成不无可取，而因此日之一前一却遂以酿篡弑之阶。

其他如文震孟、陈子龙、杨以任、夏允彝(陈、夏已见第五章。文震孟是文徵明的曾孙，他的诗文也名重一时，传见《明史》卷二五一。杨以任，字维节，瑞金人，《明史》无传)等，皆为当时有名作家。而曹勋(字允大，又字峨雪，嘉善人。《明史》无传)奋起明末，振万历、天启腐烂之习，而入之于妙悟，出之于风雅，俞长城说："万历甲辰(1604)以来四十年间，会元之文，无可录者。……斟酌古今，调和文质，继推峨雪。"(见俞所辑《百二十家名家集》及梁章钜《制义丛话》)亦不愧为一代有名作家。又明、清之交有德清章金牧(字云

李)者,为文惊才绝艳,而不为时辈所推。后俞长城选入《百二十名家》,而云李之名始显,到清乾隆间操觚家无有不读其文者,亦可谓豪杰之士了。

明代八股文作家,大概已如上述。黄宗羲辑《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至三百十三卷皆录各家时文之序共七十八首,今考各家文多已湮没不传,惟藉此书所载之序,略存梗概而已。又梁章钜《制义丛话》所列明代代表作家刘基以下一百五十二人,兹不列举。

清代文学



张宗祥著

据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重排

第一章　绪　论

凡文学之变迁分为三种，而世人所谓工拙者不与焉。一、因递演而变者。例如西汉变为东汉，东汉变为魏晋，魏晋变为六朝，以次推移，化散为整，化整为工，化工为丽；苟执六朝之文与西汉文并观，相去之远，奚啻霄壤；自西汉、东汉、魏、晋、六朝循序诵之，乃正如四时之代谢，不见有推移之迹，此所谓递演者也。二、因极盛而生反响者。凡物盛则必敝，文学习尚，何独不然？六朝之敝，至唐初而极，李谔论文体书曰："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惟是风云之状"，非虚语也。韩昌黎、柳柳州起而矫之，救之以质，其势若逆而实顺，于是文学上自汉至六朝递演之习革，而古文辞之名成立矣。此所谓反响也。三、特立不受拘束者。举世风靡，凡草皆偃，聪明特达之士，决不随之而靡；非故立异，兔网不能弋鸿鹄、严霜不能凋松柏，彼自遂其志，全其真耳。故楚有屈原、汉有王充，此所谓特立独行之文也。此三例者，几于一定。

三例既明，请言三习：一、文章之士必以学问为根据，根据既定，文之发现于外者其气象亦自不同。然学问之途千流万派，既有所偏，遂以成习。刘更生父子深于经，其文渊雅质直；刘知几深于史，其文议论叠出；柳子厚、苏老泉深于子，其文峭刻恣肆，此学问之习成之也。二、时代变迁，文字随异。《史记》字少，叙及三皇；班

书字多，仅记一代，昔人断为《史》、《汉》优劣，实亦时代囿之。若必以近世为劣，往古为工，则纪事必仿《尚书》之“粤若稽古”，编年必仿《春秋》之“春王正月”，正如新莽学周公耳，优孟衣冠，精神不寄，有何可取？故时代之习既成，学者但当知此是时代之习，不当因其习以分优劣也。三、自唐以下，文始有派，昌黎虽有矫正轻薄之功，亦实开门户纷争之弊。自此之后，不先求文之本源，但先论文之形式：章法如何，句法如何；是否某派，抑或有异。所争者在此不在彼，于是乎学问荒落而文章独立矣。此犹无粮储、无器械而名之曰兵，其服装、步伐望之诚哉似兵矣，能一战耶？此派别之习最为误人者也。予之著此篇也，欲人知文章之变迁及其根本，而了然于习惯、习弊之间，故先举其凡如此。

第二章　清初文学概述

清初文学上承明代，然明代自王阳明治学、归震川治文、前后七子治诗之后，其薪火之传复何如耶？无论王氏之学谈性命，参禅理，一无实际；归氏之文囿于乡里，但工小品，绝无钜制；七子之诗活剥工部，生吞谪仙，一无自然之趣，就其末流以言，弊更滋甚；即舍此数子外，复有何人可以相继耶？是本源之地薄矣。其所以薄者，聪明才智之士，尽为制艺试帖所牢笼，目文章为古文杂作，目学问为杂学外道，故汩没于代圣立言之八股、剪裁工丽之五言八韵中，而文学遂不可问也。迨明之季，辽事日棘，流寇披猖，海内大扰，有识之士知时艺之无用，弃而治学，务求实在，于是士习一变，学问一新，而文学亦以之改弦易辙。其究也，未救明季之危亡，适开清代之文运。入清之后，故国之念不绝于心，既不愿食周粟，遂乃潜心殚虑，治学殁世。故其人则明代之遗民，其实则清代文学开国之元勋也。当是时，湖广则有王船山，江浙则有顾亭林、黄梨洲，皆高尚其志，不事王侯；而应之者若关中李二曲，太原傅青主、阎百诗，浙东万氏兄弟，江西魏氏兄弟；其不安于西山薇蕨者，复有若钱牧斋、吴梅村、侯朝宗；以视明代开国之际仅有刘诚意、宋学士、高青丘寥寥数人，盖大有间矣。

述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

顾炎武，初名绛，字宁人，世称“亭林先生”，江南昆山人。生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本世家子，自幼性情耿介而聪颖绝伦，家中藏书素富，先生因得博览载籍。鉴于国事日非，乃留心经世之学，遍览诸史及明代各朝实录、先贤遗文，以至天下图经、公移邸抄之类，

凡有关民生利害者辄记录之，参以旁证，著《天下郡国利病书》。未成而国难作。清师南下，先生抗义失败，其母王氏绝粒殉国，遗命先生不仕两姓。先生眷念故国，观察东南，知难集事，四十以后，浩然北游，往还于河北诸边塞者十余年。所至载书与俱，遇关河阨塞，辄招老兵退卒、田父野老而咨询之，如有不合则出书勘对。或于冲要地方从事垦殖，最后卜居陕西之华阴，以为："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势。"志士心肠，于焉可见。康熙二十一年(1682)，客死山西曲沃，年七十。著述甚夥，《日知录》三十六卷最精，自言"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余如《音学五书》、《天下郡国利病书》诗文集亦皆传世之作。先生自少工文，尝与同里归庄(字玄恭，有光之孙)共游复社，会文讲艺。其与徐原一书云："未登弱冠之年，即与斯文之会，随厨俊之后尘，步杨、班之逸躅，人推月旦，家擅雕龙。"后则益自矜重，告人曰："《宋史》言刘忠肃每戒子弟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仆自一读此言，便绝应酬文字，所以养其器识而不堕于文人也。悬牌于室，以拒来请。中孚为其先妣求传再三，终已辞之。盖止为一人一家之事，而无关于经术、政理之大，则不作也。"(《与人书》十八)又曰："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与人书》二十五)

黄宗羲，字太冲，世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生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父尊素，天启间为魏阉所害。崇祯即位，先生年十九，入都讼冤，袖长锥击杀害父狱卒，事得昭雪。归而折节读书。时山阴刘宗周讲学于蕺山，先生秉遗命从之游，学大进。国变以后，崎岖海峤，屡兴义师，又为鲁王乞师日本，终无成功。其自述有云："自北兵南下，悬书购余者二，名捕者一，守围城者一，以谋反告讦者三，绝气沙墠者一昼夜，其他连染逻哨所及，无岁无之，可谓濒于十死

者矣。”(《南雷余集·怪说》)明统既断，乃绝意国事，奉母乡居，从事述作。先生之学，博大精深，全祖望曰：“公以濂洛之统，综合诸家：横渠之礼教、康节之数学、东莱之文献、艮斋之经济、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自来儒林所未有也。”尝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故兼令读史书。又谓：“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故凡受先生之教者不坠讲学之流弊。其所著《明儒学案》六十二卷及《宋元学案》之一部(仅成十七卷，余为其子百家与全祖望所续编)，则我国学术史之创作也。《明夷待访录》二十篇，力倡民权，同时如顾亭林辈已极重视之，而影响于晚近思想界者，盖尤巨焉。此外，经部有《易学象数论》、《孟子师说》、《春秋日食历》、《深衣考》、《律吕新义》等。其《授书随笔》乃未全之书，今所见仅传钞之本，故或误为一卷。书中所述，自书籍聚散以至尺寸度量，所载至广，非一端也，而传者泥于书之一字，断为因阎百诗问《尚书》而告之者，无乃妄欤？史部有《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今水经》、《四明山志》、《赣州失事纪》、《永历纪年》、《绍武争立纪》、《四明山寨纪》、《海外恸哭纪》、《日本乞师纪》、《舟山兴废》、《沙定洲纪乱》、《赐姓始末》、《汰存录》。历算有《授时历注》、《大统历推法》、《授时历假如》、《回回历假如》、《历代甲子考》、《勾股图说》、《开方命算》、《割圜八线解》、《测圜要义》等。其遗文则有《南雷文定》，凡五集，晚年自删为《南雷文约》四十卷。又尝辑明代文为《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又续辑《宋文鉴》、《元文钞》等，皆未成。先生文不名一家，晚年忽爱谢皋羽，所处之境同也。全祖望议先生“文人之习气未尽，以正谊明道之余技，犹留连于枝叶”，亦颇中肯。

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世称“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生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少负异才，读书十行俱下。张献忠陷衡州，

士类多污以伪命，不从者投之湘江，先生几遭不测。旋从桂王，授行人，为群小所扼，弃职归。桂王既败亡，乃晨夕杜门不复出与社会接近。著书极多，然以僻在偏隅，绝少知者。嘉、道间，新化邓显鹤湘皋始为编一书目。同治间，湘乡曾国荃为刻成七十七种，未刊及已佚者尚不少，其最通行者为《读通鉴论》、《宋论》、《俟解》等，文章坚劲，别具风格。卒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七十四。

亭林先生与友人论学书曰："窃叹夫百余年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然不得解也。命与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与天道，子贡之所未得闻也。性命之理，著之易传，未尝数以语人。其答问士，则曰：'行己有耻。'其为学，则曰：'好古敏求。'……颜子之几乎圣也，犹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学。自曾子而下，笃实无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则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今之君子则不然。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是必其道之高于夫子，而其门弟子之贤于子贡……也，我弗敢知也。《孟子》一书，言心言性，亦谆谆矣。乃至万章、公孙丑、陈代、陈臻、周霄、彭更之所问，与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间。……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之所罕言也。……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

张宗祥曰：亭林先生此书实在惩宋学末流专讲性命、妄立门户，空疏之弊既深，攻讦之习复起，志欲救之以节气、导之以实学，故一篇之中，反复谆嘱如此。若认为汉学与宋学分道扬镳之宣言，

犹浅见也。而予之录此书及兼引黄、王诸先生者，就表而论，若与文学无关，实则文学之士非好古多闻不可，倘仅就文求文，此正贼假衣服、稗贩如来耳，遑有生天之望耶？故论清初文学，与其归功于侯、魏诸人纯粹文学之士，不如归功于顾、王诸先生硕学之士。此予所以断清初文学必以诸先生为元勋，而侯、魏反居其次也。

述侯朝宗、魏叔子、汪钝翁

侯方域，字朝宗，河南商丘人。生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父祖皆为显宦，先生以贵介公子负异才，豪迈不羁，有声士林。其文驰骋纵横，务尽其才，著有《壮悔堂文集》、《四忆堂诗集》。顺治十一年卒(1654)，年仅三十有七。

魏禧，字冰叔，世号叔子，江西宁都人。生明天启四年(1624)。明亡，先生隐居教授，与长兄伯子、弟季子及彭士望、林时益等共居翠微峰，朝夕讲贯，肆力古文辞。喜读史，尤好《左氏传》及苏洵。其为文主识议，凌厉雄杰，遇忠孝节烈事则益感慨，摹画淋漓。年四十乃出游，涉江逾淮，至吴越，思益交天下奇士。康熙十七年(1678)，征举博学鸿儒，以疾辞。后二年(1680)，赴扬州故人约，卒于客次，年五十七。著有文集二十二卷、诗八卷、目录三卷、《左传经世》十卷。兄祥，字善伯，世号伯子，更名际瑞。所著有文集十卷、《杂俎》五卷。弟礼，字和公。所著有诗文集十六卷。世称“宁都三魏。”

汪琬，字苕文，号钝翁，江苏长洲人，与魏禧同年生，后禧十年殁。顺治中进士，历官皆有政绩。举康熙十七年博学鸿儒，与修《明史》。公退，无时不致力于古文，颇有造诣。而性狷急，动见人过，又好诋诃，见文章必摘其瑕疵，故恒不满人，亦极不满于人。著有《尧峰文集》五十卷。

侯、魏在清初最为文学之士，声名藉甚。究其实，侯则自名其集曰“壮悔”，将刻集，集中文字未脱稿者一夕补缀成之，享年又不及

四十，使至五十、六十，其可悔之处安可计耶？魏氏文章其同时朋辈已有未享上寿，文未洁净，且多谀墓酬应之作，以为可惜者。纪晓岚有言："古文一派，自明代肤滥于七子、纤佻于三袁，至启、祯而极敝。国初风气还淳，一时学者始复讲唐、宋以来之矩矱，而琬与魏禧、侯方域称为最工。然禧才杂纵横，未归于纯粹；方域体兼华藻，稍涉于浮夸；惟琬学术既深，轨辙复正，其言大抵原本六经，与二家迥别。其气体浩瀚，疏通畅达，颇近南宋诸家，蹊径亦略不同。庐陵、南丰固未易言，要之，接迹归、唐无愧色也。"此亦未为的当之论。若以三家之文，较之亭林、梨洲、船山，无论见解不同，即文笔亦有间矣，吾故曰：文学必须先有根据之学也。

附论应酬文之弊病

魏氏之文，论者既有谀墓太多之诮，予则以为此弊相沿久矣。自唐以来，文学之士专好刻集，集中之文，传记墓铭居十四五。凡人一有文名，志在成集，当世富贵者必攀援请托，以撰其先世之传志，意在假此人之集传之无穷。无论所载是否真实，但世间集部则愈多而愈滥矣。不独事不足传，且累其文亦不足传。《洛阳伽蓝记》载赵逸之言曰："生时中庸之人尔，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穷天地之大德、尽生民之能事：为君共尧、舜连衡，为臣与伊、皋等迹。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尘；执法之吏，埋轮谢其梗直。"所谓生为盗跖，死为夷齐，妄言伤正，华辞损实，在后魏已有此弊，在唐后尤为通病。噫！安得使文学之士绝笔不为，以保其文格人品耶？

述钱牧斋

黄、顾诸先生既惩明季士习之空疏，侯、魏复惩明季文学之猥靡，故一救之以切实、一救之以雄放，此予绪论中所谓反"响者"也。然当时尚有特出者一人，则钱牧斋，是已。牧斋，名谦益，字受之，号

牧斋，晚又自号蒙叟，江苏常熟人。生明万历十年(1582)，登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第。天启间，以东林党人被摈。崇祯初，起官至侍郎，与温体仁、周延儒互争阁臣，落职里居。甲申之变，赴南京与诸大臣议立君，属意潞王常淓。马士英等既拥戴福王由崧，阉党阮大铖又用事，牧斋媚之，上疏颂士英功，又为大铖讼冤，因任为礼部尚书，然终为马、阮所轧。清师渡江，牧斋迎降，仕新朝，为礼部侍郎。未几去官，退处林泉，建绛云楼，庋书万卷，以著述自遣。康熙三年(1664)卒，年八十三。

牧斋天才卓越，学力充实，诗文雄深哀艳，无奇不备，侪辈又居国初诸士先，奉为一代正宗，当之实无愧色。徒以晚节猖披，贻讥士林，且乾隆帝列之《贰臣传》中，所著《初学》、《有学》二集令行禁毁，流传既少，知者遂寡。彼尝从憨山大师德清游，辑有《内典文藏》一书，凡历代关于释教之文分类辑入，既有总序，每类前复有小序(此书久佚，所存者南京图书馆有残册数卷，余得其残目一册，而《南京图书馆目》则不知其为牧斋所辑也)，晚年又著《楞严蒙钞》，精参内典，于焉可见。然牧斋之为人，趋功名，富嗜欲，决非佛徒，所得者独其文法耳。文字得释典之髓，故能别开生面，独树一帜也(按中国文学六朝别有气象，亦因佛教大昌之故，详结论中)。后之学者，皈佛未必能文，工文半好辟佛，不独佛法难传，即内典文字之法亦乏传人，此牧斋之后所以竟成绝调也。清初有文名而入《贰臣传》者，牧斋而外，周亮工栎园、吴伟业梅村，其诗文皆传于世，未若牧斋受厄之酷也。然牧斋以一书生，其诗文所述亦无政治上重要关系，专制帝王之力毅然禁之而仍未绝迹，且历久而弥光，此非文学上有极大之价值，能如是耶？

述清初有关于文学二大事

清初文学既如上述，当时诸先哲提倡于下，功固伟矣，然尚有

二大事与文学至有关连者，则开博学鸿词科、编《四库全书》是也。康熙十七年(1678)诏开博学鸿词科，其意在网罗名宿，卒之清廷所欲罗而致之者虽未预试，而预试者亦半为博闻广记之士。所得之士若朱彝尊、汪琬、陈维崧、潘耒等皆名重海内，学传后世。盖诸人者亦皆好古敢求，博问强记，如顾、黄诸先生，所不逮者，偏工文学耳。清廷既以鸿博为取士之巨典，而又搜剔山泽，招徕草莽，以虚名笼之，以清职处之。当时布衣读书之士有声誉者，亦皆赐官，召直南书房。如康熙四十一年(1702)冬南巡，驻涿洲，召直隶巡抚李光地询草泽遗才，光地以何焯荐，诏赐举人，复赐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命侍读皇八子兼武英殿纂修官，即其例也(何焯，字屺瞻，江苏长洲人，世称义门先生者也)。盖其时取士之法虽仍为科举制艺，而待实学之士则破格录用，此所以遗老守节之士耻食周粟，不入网罗，而其余才俊之士则几于人尽登庸，入彀中而无遗珠也，有才名而冤抑不遇者，独一吴兆骞耳(兆骞，字汉槎，江苏吴江人。顺治中领乡荐，以科场事中蜚语被斥，徙尚阳堡，在戍所历二十余年，纳兰性德、徐乾学捐金赎之得归，著有《秋笳集》)。由此观之，鸿博之开，虽为人主罗致人才之术，然其表彰实学之士，以救当世空疏之习，则功亦不小。浸淫至于乾隆，亡国之恨日渐消磨，遗老零落尽矣，又当人主好尚文藻之士，虽亦两开是科，然相尚以诗赋记诵之学，其末流亦无殊于制艺，此鸿博之所以废也。

乾隆三十八年(1773)，诏各省采进书籍，修《四库全书》，乾隆四十七年(1782)告成。《四库》仿自《永乐大典》，《大典》仿自《太平御览》，同为帝王消磨才智之一法。然余独断为有关清初文学极巨者，盖《御览》剪裁古籍，分类编辑，实无意义；《大典》分韵辑书，书虽未经割裂，然但有保存古书之功，并无宗旨可言。《四库》去取之间，实未尽当(其弊如改削原书、割裂卷数、非清者屏弃无遗，不一而足)，然在当时，则固所谓表彰儒术、排斥异端者也。且搜罗海内

书籍，进书之家多至百种以上者皆有奖励，则藏书者知勉矣；辑及当代学者述作，则著书者知奋矣。虽当时总其成者为词章记诵之纪昀(晓岚，任总纂官)，然总阅官中则有朱珪，分校官中则有戴震、王念孙，纂修官中则有姚鼐、翁方纲、朱筠等，皆硕学博通之士，故全书部署秩然有序，一部《书目提要》，赫然为目录学之巨制也。清既假修书之名以罗致人才，复因所辑之书以鼓励学者，故曰《四库全书》与博学鸿词两事实清初文学有关之事也。自开国至于嘉庆，文学不至衰落，盖以此耳。

第三章　乾隆文学概述

述袁枚　述桐城派　述汪中

乾隆所尚与康熙不同。康熙音韵、数理各究其妙，谓为受明末遗老之熏陶也可，谓为开清代学术之先路亦可；乾隆则专尚华辞，独喜赋颂，且去清初渐远，文习以华丽，使非鸿博之科犹存影响、《四库》之辑可振学风，恐清代之文学至此已摇落无存矣。是时应运而起者，则有袁子才、胡稚威、洪稚存等，而子才尤著。子才，名枚，一号简斋，浙江钱塘人。生康熙五十五年（1716）。乾隆四年（1739）进士，散馆为江宁知县，年四十即致仕，筑随园于南京小仓山麓，赋诗吟咏，逍遥山水，主东南坛坫者且五十年，当世识与不识皆称为才子。其为文也，骈、散兼工，以惊才侧艳之笔，运流转横逸之思，用轻清俊快之语，化陈腐习见之典，独自成家，一代文豪也。尔时诽议，或因其行止不检，放浪为怀，以人品之故议及文品，岂笃论哉？著有《小仓山房诗文集》七十余卷，尺牍、诗话以及说部之属都三十余种。嘉庆二年卒（1797），年八十二。

稚威，名天游，浙江山阴人。生康熙三十五年（1696）。少有异才，于书无所不窥。工诗文，尤擅骈丽，沉博奥衍，方驾燕、许。乾隆元年（1736）举博学鸿词科，名冠一时。袁子才与同赴试，亦甚折服曰："吾于稚威则师之矣。"尝言："古今人皆死，惟能文章者不死。虽有圣贤豪杰，瑰意琦行，离文章则其人皆死。"诚快论也。著有《石笥山房集》。

洪亮吉，字稚存，一字君直，江苏阳湖人。生乾隆十一年（1746），举乾隆五十五年（1790）进士。著有《春秋左传诂》二十卷、《公羊谷梁古义》二卷、《六书转注录》八卷、《汉魏音》四卷、《比雅》

十二卷、《弟子职笺识》一卷，《传经表》二卷、《通经表》二卷、《四史发覆》十二卷、《三国疆域志》二卷、《东晋疆域志》四卷、《十六国疆域志》十六卷、《西夏国志》十六卷、《乾隆府厅州县图志》五十卷、《卷施阁诗文甲乙集》三十二卷、《更生斋诗文甲乙集》十六卷、词二卷、《外家纪闻》二卷、《伊犁日记》二卷、《天山客话》二卷、《北江诗话》六卷、《晓读书斋杂录》八卷。嘉庆十四年(1809)卒，年六十四。

北江之学博通淹贯，训诂、音韵皆极有根柢，其于舆地之学尤为深邃，方之次风先生(天台齐召南，著有《水道提纲》三十卷)实无多让，而其所为文章亦尚骈丽，与稚威、子才并驱中原，则当时风尚如此，虽贤者不能不就其范故也。

文体、文习既以次渐变，于是有薄之而不为，有正之思复古，有矫之以立异者，派别因之而分矣。所谓薄之而不为者，戴震、段玉裁、王念孙诸人也。震，字东原，安徽休宁人。生雍正元年(1723)。其为学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谓："义理不可空凭胸臆，必求之于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必求之古训。古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义理明矣。义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也。彼歧训诂、义理而二之，是训诂非以明义理，而义理不寓典章制度，势必流入于异学曲说而不自知也。"又以宋儒言性、言理、言道、言才、言诚、言明、言权、言仁义礼智、言智仁勇，皆非六经孔孟之言，而以异学之言糅之。故就《孟子》字义开示，使人知人欲净尽，天理流行之语病，于是作《孟子字义疏证》及《原善》、《论性》诸篇，以明古圣贤以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为得理之义。其生平所治之学凡分三类，曰小学、曰历算、曰典章制度，而其归则为哲学，所著述者亦不外此数者。其舆地之学超越前贤(如《水经注注》、《直隶河渠书》等)犹其余事也。卒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五十五。玉裁，字若膺，江苏金坛人。生雍正十三年(1735)。乾隆时至京师，见东原，师事之，而专从事于小学，成《说文解字注》三十卷。王念孙序之

曰:"千七百年无此作矣。"及其卒也(1815),又曰:"若膺死,天下遂无读书人矣。"诚哉是言。段氏不独叔重之功臣,实《说文》开山之鼻祖也。念孙,字怀祖,江苏高邮人。生乾隆九年(1744)。父安国、子引之,三代皆以学术名海内。怀祖幼受业于东原,故其学一宗戴氏,说无依据,不敢妄断。其校勘之精、记诵之博、立言之确、说义之明,当代推为经师,后世无可诽议,人以为惟元和惠氏祖孙父子(惠周惕、子士奇、孙栋)可以并驾耳。此一师二弟所成就之学历劫不磨,而对于并世所谓文学者殆若无睹,求学问有绍先启后之功,决不争文章虚名于一日,此予所谓"薄之而不为"者也。

乾隆之际,文既日丽,丽则必靡,靡则救之以质,于是桐城派古文辞乃应运而起。桐城初祖推方望溪氏。望溪,名苞,字灵皋,安徽桐城人。生康熙七年(1668),卒乾隆十四年(1749)。康熙间举进士,历官至侍郎,当时以理学家自命。其为文由归震川以上接欧阳永叔、韩退之,虽雅洁清秀而少光焰气魄。著有《望溪集》八卷。望溪一传而为刘大櫆。大櫆,字才甫,亦桐城人。生康熙三十七年(1698)。望溪之文以义法为重,才甫之文则并古人神气音节皆欲摹拟之,而实则仍甚怯弱。著有《海峰集》八卷。才甫一传而为姚鼐、吴定。鼐,字姬传,亦桐城人。生雍正九年(1731)。世父范,与大櫆友善,命鼐受文法于大櫆,然鼐又传经学于家庭之间,故其为文,理深于刘氏。其论学之言曰:"说经古今自有真是非,勿徇时人之好尚。如近年海内诸贤所持汉学,与明以来讲章诸君,何以大相过哉?夫汉儒之学非不佳也,而今之为汉学乃不佳,偏徇而不论理之是非,琐碎而不识事之大小,哓哓聒聒,道德涂说,正使人厌恶耳。且读书者欲有益于身心也,程子以记史书为玩物丧志,若今之为汉学者,以搜残举碎、人所少见者为功,其为玩物,不弥甚耶?"又与人书曰:"秦、汉以来,诸儒说经者合与离固非一途。程、朱出,多得古人精深之旨,而其生平修己立德又实足践行其言,为后世所向慕,故

元、明皆以其学取士。自利禄之途开，为其学者以为进趋富贵而已，其言有失，奉而不敢稍违，其得亦不知所以为得，斯固数百年来之陋习。今世学者乃思一切矫之，专宗汉学，以攻驳程、朱为能，倡于一二专己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遂大为学术之害。”盖是时汉学之习既成风尚，饾饤破碎以为古，支离断烂以为博，其弊不可以药，袁枚、纪昀等又以无实之学、轻薄之言，诋讪宋儒。于是顾、黄诸先生之绪将绝，而躬行实践如李二曲、孙夏峰先生辈尤不多见，故姬传议论，欲以实在之宋学救其衰也。至专治文学之书，则所编《古文辞类纂》已尽言之，自来言古文法则者，殆莫详于姬传。姬传既衍方、刘之绪，而又年登耄耋（卒嘉庆二十年1815，时年八十五），久主东南各大书院讲座，相从问业者甚多。历城周永年书昌复为之语曰：“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士大夫复相与敩其体，而于是桐城派遂成立焉。鼐所著有《九经说》十九卷、《三传补注》三卷、《老子章义》一卷、《庄子章义》十卷、《惜抱轩集》十六卷、后集十二卷、诗集十卷、书录四卷、法帖题跋一卷、笔记十卷。治古文于举世不为之时，此予所谓“有正之思复古”者也。

当是时，文学之中特出者无过于汪中。中，字容甫，江苏江都人。生乾隆九年（1744），卒乾隆五十九年（1794）。其治学宗戴东原，而尤善为文。文之旨归，既不喜浮丽之习，更不入桐城之派，坚卓典赡，下无唐、宋。著有《述学》内外篇。若《广陵对》、若《汉上琴台铭》，皆近世所无之绝作也。此予所谓“有矫之以立异”者也。自此以降，学日以颓，文日以敝，盖盛极将衰矣。

清初至乾隆各家略述

自清初以及乾隆，以上所述乃其大者，其他硕学能文之士尚难胜数，今略叙之于次。

以聪明才辨争胜，欲以一人之智压服一世者，萧山毛奇龄大可

也。生明天启三年(1623),卒康熙五十五年(1716)。大可少为诗文,声誉甚著。自举鸿博入京,时方盛言经学,乃亦骛而治经,而性好胜,往往骋其天才、矫立异说以炫其能,驳难他人以快其意,惟济之以纵横博辩,傲睨一世之文,故亦恒有独到之处。观其所著经说,达五十种。辨《子贡诗传》、《申培诗说》(二书皆明嘉靖间丰坊伪作)而成《诗传诗说驳议》五卷,辨河图、洛书之伪而成《河图洛书原舛编》、《太极图说遗议》,此当辨者也;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遂作《古文尚书冤词》以反之,此不当辨者也。他如上诋宋儒,攻讦顾炎武、胡渭,皆好胜之心蔽之也。其后全祖望作《萧山毛氏纠谬》以正其非,尝谓:"大可之才要非流辈所易及,使其平心易气以立言,其足以羽翼儒苑无疑。"盖公论也。同时合肥李天馥(字湘北,顺治进士,历官至武英殿大学士)称:"大可有不可及者三,不挟书册而下笔有千万卷,一也;少不避人,中年在道路得怔忪疾,遇疾发,求文者在门,扪腹四应,顷刻付去无误,二也;读书务精核,群经诸子及诸项屑事皆极其根柢而贯其枝叶,偶一论及,辄能使汉、宋儒者拄口不敢辨,三也。"亦实情也。所著文集多至二百三十四卷。

积学勤苦,至老弥笃,则有若慈溪姜宸英西溟。生明崇祯元年(1628),卒康熙三十八年(1699)。西溟以气节、文章名当时。魏叔子尝谓:"朝宗肆而不醇,尧峰醇而不肆,先生在醇肆之间。"时韪其论。诗亦著名,著有《湛园未定稿》八卷、《苇间诗集》十卷。

贯串事理,成一家言,则有若达州唐大陶铸万。生明崇祯三年(1630),卒康熙四十三年(1704)。铸万为学,自身心性命以达事务条理,莫不原原本本,确然有得。著书九十七篇,名曰《潜书》,体例类周、秦诸子,文章亦精切不泛。魏叔子初见其书,大惊曰:"此周、秦之书也,今犹有此人乎?"潘次耕为序,有云:"斯编远追古人,貌离而神合,不名'潜书',直名'唐子'可矣。"梁启超则谓:"大约王符《潜夫论》、荀悦《申鉴》、徐幹《中论》之亚,在古今著作之林有相当

位置。"可以识其涯略矣。

淡于功名，笃志文学，而为选文先导者，则有若宜兴储欣同人。生明崇祯四年(1631)，卒康熙四十五年(1706)。欣之文谨洁明畅，体格与桐城为近。而选文自明茅坤以来，皆意在制义，求合时尚，去法日远，文习日陋。欣之《唐宋十家选文》五十一卷出，而选政一变，上革明季之陋，下开《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之先。储氏文学虽无大绩可载，而此事则实为选文上一大变迁，不可不纪者也。尝谓自汉以降，集部日多，既难遍诵，而作者一生得意之文，可以传后、可以取法，殆亦无几。与其泛览，不如选读。然选文全恃选者之见地学力，苟一不慎，流弊无穷。盖读专集虽费时日，尚可深明作者之义理寄托，读选文而选者不当，则作者之身分反因选而失却矣。试举一例，选文之祖为《文选》，昭明究尚辞华，不喜质直，故读《文选》者，对于自战国至六朝之文学，其感想皆觉庄重典丽，而无质朴恬逸、奇横高迈之趣。其实楚文则屈原、宋玉之外有庄子在，而在汉以后若诸葛忠武之《出师表》，王羲之之《兰亭集序》，陶渊明之《归去来辞》、《闲情赋》、《桃花源记》，皆千古不磨之作，后世文士所欲急于一读者也，《文选》不之选，则选文者昭明太子故也。自梁之后，此风竟乏嗣响。唐人所选，诗集为多。至宋而有吕祖谦之《古文关键》、真德秀之《文章正宗》、谢叠山之《文章轨范》。《文章轨范》之评点，已专为当时应试人说法，开明代之陋习。茅坤《八家文选》，虽以《文章正宗》为根据，而专论文法，且评论亦不精确。独储氏此书虽不及后来之详尽，而规模粗具，实选文家之圭臬也。选文至重，故特详论之如此。

得通儒之传，以博洽宏肆著称者，则有若吴江潘耒次耕。生顺治三年(1646)，卒康熙四十七年(1708)。次耕从亭林学最久，复游子徐枋、戴笠(均明末遗民)之门，故其学贯穿淹洽，无所不通，发为文章，精博无涯矣。著有《遂初堂诗文集》三十九卷，余著尚多。

好为妙远不测之文，以开后来方、姚一派者，则有若桐城戴名世褐夫。生顺治十年(1653)，卒康熙五十二年(1713)。褐夫雅负史才，有志自撰《明史》而未有成，所著《南山集》尝采明末遗事入文，致遭大忌，卒召文字之祸。第观其文，生动清妙，高出方、刘，桐城文章实宜有奉为开山之祖。乃姬传纂述，自才甫、灵皋以上接熙甫，而未及褐夫，或者有所顾忌而不敢为欤？

以良史之才，擅文章之能事者，则有若鄞县全祖望绍衣。生康熙四十四年(1705)，卒乾隆二十年(1755)。始黄梨洲既以学术倡导于浙东，及门弟子甚众，而四明万斯大、斯同兄弟实绍其绪：斯大字充宗，传梨洲之经学；斯同，字季野，传梨洲之史学；绍衣则又衍季野之绪者也。所著《鲒埼亭集》五十卷，其中所载传记墓志，大率皆明末遗民，仗节死义，与夫抗志高蹈者。又最善论述学术流派，描写学者个性。盖志在表扬正义人道，不徒为乡邦文献之征也。性极狷介而方严，对于伪学者如钱谦益、李光地辈，则又直揭其假面具，笔削心诛，凛然古之直史哉！其后会稽章学诚实斋，生乾隆三年(1738)，卒嘉庆六年(1801)。尝著《浙东学术》篇，论列梨洲、二万学风与浙西不同之点，在能究心史学，有曰："黎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兄弟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世推顾亭林氏为开国儒宗，然自是浙西之学。不知同时有黎洲出于浙东，虽与顾氏并峙，而上宗王、刘，下开二万，较之顾氏，源远而流长矣。……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习而习。……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朱、陆异同所以纷纶，则惟腾空言而不切于人事耳。知史学之本于《春秋》，知《春秋》之将以经世，则知性命无可空言，而讲学者必有事事，不特无门户可持，亦且无以持门户矣。"观此则相递之迹釐然可寻焉。实斋精究文史，辨章学术，其学风绝似绍衣。所著《文史通义》八卷、《校雠通义》三卷，于历史、哲学独标心悟，虽文字不甚高古，然固著作之文也。

骈俪之文虽盛于乾隆，然清初不乏能者，而宜兴陈维崧其年最著。生明天启五年(1625)，卒康熙二十一年(1682)。幼承家学(其父贞慧字定生，明季与侯朝宗及桐城方密之、如皋冒辟疆称“四公子”)，擅诗文。时江南大兴文会，其年入座，索笔赋诗数十韵立就。时或用六朝俳体作记序，顷刻千言，巨丽无比。尝曰：“吾胸中尚骈体文千篇特未暇写出耳。”后举康熙己未博学鸿词科。汪苕文称之曰：“唐以前，不敢知。自开宝后，七百年无此等作矣。”所著有《湖海楼集》五十卷。乾隆间，袁、洪诸家外，尚有曲阜孔广森㧑约。生乾隆十七年(1752)，卒乾隆五十一年(1786)。少受经于戴东原，专《春秋公羊传》，著《春秋公羊通义》十一卷以绍汉儒师法，余著尚多。其《仪郑堂骈体文》三卷，雍容华贵，汪容甫读之叹为绝手，然特其余绪耳。

第四章　嘉庆文学概述

述阮元、焦循　述阳湖派

嘉庆之际，遗老凋零尽矣，文学一途日见衰落，而遗风未息，独有可述。盖当时朝廷虽乏宏奖之举，疆吏尚有罗爱之美。自乾隆间秋帆毕沅（生雍正八年[1730]，卒嘉庆二年[1797]，江苏镇洋人，历官至湖广总督）爱才养士，倾动一世之后，至嘉庆而芸台阮元（生乾隆二十九年[1764]，卒道光二十九年[1849]）继之，且较毕氏尤为切实。专延朴学之士，不以浮文相尚。幕府之中，东南名宿尽在其间，不独《輶轩》一录足以表彰人伦，鼓励士气也。其《十三经校勘记》尤为有功于经术，《揅经室文集》中辅翼经传之作亦不在少数。阮氏在仪征以武世家，芸台特起，独能以文学撑东南之残局。与之齐名，且属至戚，相依幕中切磋商略者，则有甘泉焦循理堂。生乾隆二十八年(1763)，卒嘉庆二十五年(1820)。焦氏之学，最精于《易》，著有《易学三书》、《易余籥录》、《易话》、《注易日记》、《易广记》等书，其他《诗》、《书》、《礼》、《春秋》、《论》、《孟》，小学皆有著述，而数理亦复研究至深。文有《雕菰楼集》二十四卷、词三卷、诗话一卷。彼以一人之力，享五十八年之寿，倦游之后，村居谢客，绝迹尘市者十余年，其所成就乃能如此。以视芸台取精用宏、间藉宾客之力，其难易盖不可同年而语矣。理堂为文，最喜柳子厚，习之不倦，以为唐、宋以来一人而已。然读其遗文，坚卓典雅，颇近汪容甫，其实盖得力于乡先生者为多也。有清一代，广陵文学，吾必以汪氏、焦氏为其首擘矣。

乾隆之间治古文者，桐城诸子而外，尚有阳湖恽子居、武进张皋文。子居，名敬，生乾隆二十二年(1757)，卒嘉庆二十二年

(1817)。皋文，名惠言。生乾隆二十六年(1761)，卒嘉庆七年(1802)。乾隆之末，子居以举人充官学教习，居京师，与皋文商磋经义，研治古文。未几，出宰浙赣，锐意抚字。比皋文殁于京师时，子居亦以忤上官罢归，闻之慨然曰："古文自元、明以来渐失其传，吾向不多作者，以有皋文在也。今皋文死，吾当并力为之。"于是益务为文以自壮。著有《大云山房文稿》八卷。其论事得力于韩非、李斯，与苏明允相上下，近法家言。其叙事似班孟坚、陈承祚，而先生自谓："吾文皆自司马子长出，子长以下，无北面者。"皋文少为词赋，尝拟司马相如、扬雄。及壮，为古文，效法韩愈、欧阳修，而气体与修为近。著有《茗柯文编》五卷。两家之文，风格不同。且皋文深于经，尤精虞氏《易》，粹然儒者；而子居之学则非汉非宋，不主故常，于阴阳、名、法、儒、墨、道德之书既无所不读，又兼通禅理，其学术又不一途。人以其同为常州人也，则称之曰阳湖派，以示别于桐城派。其实桐城、阳湖皆出海峰(阳湖钱伯坰受业才甫传授乡人)，皆法唐、宋。惟桐城太拘曲，而阳湖较开展，似胜一筹耳。

论辑文、选文

嘉庆一朝，最有功于中国文学者，莫过于嘉庆十三年诏开全唐文馆。一代之文，有专集者，数传之后尚易湮没，无专集者，虽其著作极关重要，于何依托以传于后？倘非全辑，明珠良玉见弃于渊中岩下者多矣。然自古以来，全代之文，皆以为繁重而不敢辑。以康熙全盛之时、右文之主，仅辑《全唐诗》九百卷、《全金诗》七十四卷，文则尚未暇顾问也。前乎此者，明梅鼎祚为最有功，若《西汉文纪》二十四卷、《东汉文纪》三十三卷、《三国文纪》二十四卷(魏十八卷、蜀二卷、吴四卷)、《西晋文纪》二十卷、《东晋文纪》若干卷(此书久佚，故莫详其卷数)、《宋文纪》十八卷、《南齐文纪》十卷、《梁文纪》十四卷、《陈文纪》八卷、《北齐文纪》三卷、《后周文纪》八卷、《隋文

纪》八卷、《皇霸文纪》十三卷、《释文纪》四十五卷，虽太半依据正史，而以一人之力所辑之多如此，以视张溥之编《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一百十八卷，其难易盖不同矣。然梅氏所辑者既皆据经见之书，未尝潜搜冥讨，则一代之文仅得大概，尚未全备。自黄梨洲有《明文海》之辑(《四库全书》作四百八十二卷，其实有六百卷。盖《四库》因有忌讳之文，删节成四百余卷也)，所收较广，而论者或议其体例糅杂，未尽精审，其弟子阎若璩亦以为出其子主一之手(见《潜邱札记》)，则亦为全璧也。《全唐文》之辑也，一依《全唐诗》之例，凡属唐文尽皆罗列，剔岩搜谷，惟恐或遗，存而不断，最为得体。以帝王之力成此巨编，前无古人矣。庸讵知当时尚有一草茅儒士，力能自全上古辑至六朝，若浙江乌程严可均其人耶?严氏全书七百六十四卷，《全上古三代文》十六卷、《全秦文》一卷、《全汉文》六十三卷、《全后汉文》一百六卷、《全三国文》七十五卷、《全晋文》一百六十七卷、《全宋文》六十四卷、《全齐文》二十六卷、《全梁文》七十四卷、《全陈文》十八卷、《全后魏文》六十卷、《全北齐文》十卷、《全后周文二十四》卷、《全隋文》三十六卷、《先唐文》一卷(尚有《韵编全文姓氏》五卷未刊)。当嘉庆开馆编辑唐文之日，严氏不预，慨然以成此书。书中作者各附小传，字句异同无不校订，一手写定，不假人力。唐以前文章咸萃于此，噫！盛矣！余尝以为选文不如辑之为得，盖选文之权不在撰文之人而在选者，选者各有见地、各有宗旨，往往不能尽善。譬如《戏鸿堂帖》为香光董氏所钩勒，不论晋唐名家手迹、尺牍遂皆各具董意，不若辑文任后之阅者自择较为合宜。此严氏之力不可及，而严氏之功为尤不可没也。可均，字景文，生乾隆二十七年(1763)，卒道光二十三年(1843)。辑文之外，尚有《说文长编》之作，又订正石经，所著有《铁桥漫稿》十三卷。

同时江苏阳湖李兆洛申耆，生乾隆三十四年(1769)，卒道光二十一年(1841)。于宋学、汉学之外，复有唐宋文、汉魏文之论，以为

"自秦迄隋，其体递变而文无异名，自唐以来始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为骈体，为其学者亦自以为与古文殊路。夫气有厚薄，天为之也。学有纯驳，人为之也；体格有变迁，人与天参焉者也；义理无殊途，天与人合焉者也。得其厚薄、纯驳之故，则于其体格之变可以知世焉。于其义理之无殊，可以知文焉。文之体至六代而其变极矣，沿其流而溯之以至乎其源，则其所出者一也"。申耆本此旨辑《骈体文钞》七十一卷，盖病当世之为文者知宗唐、宋而不知宗两汉故也。夫文之起源不分骈散，文之归宿讵有古今？昌黎变六代之习，始有古文之名；后世若复有变昌黎之习返之六朝者，将名为今文乎，古文乎？今文则固宗六朝而在昌黎之前者也。古文则昌黎一派又以古文之名自居矣。噫！此余所以有实开门户纷争之弊之说也。清至嘉庆，桐城、阳湖二派古文之名既成，而继之者文体日以萎靡，申耆之为此说、辑此书，盖不徒辨文学之本源，实以针当时之膏肓，起累代之废疾也。当举世风靡之日，既不随之以靡，复不以乾隆时骈俪之习为然，毅然出此，洵有识矣。所著有《养一斋集》二十卷。

述王仲瞿

当是时有异军突起者一人，则秀水王昙也。昙，字仲瞿，一名良士。生乾隆二十五年(1760)，卒嘉庆二十二年(1817)。学博而肆。文奇以僻。通兵家言，习奇遁术，善弓矢，上马如飞。嘉庆教匪之役起，荐之者获罪被放；仲瞿亦摈居秋泾之上，慷慨悲歌，郁郁以终。据其《虎邱山穸室志》云：所著有诗文集若干卷，《西夏书》若干卷，《读竺贯华》若干卷，《洪范五事官人书》若干卷，《历代神史》若干卷，《居今稽古之录》若干卷，《随园金石考》若干卷，《缯帑集》若干卷，《鱼龙爨传奇辽萧皇后十香传奇》若干卷，经解三卷，史论三卷，传家六法一卷，《归农乐传奇》九出，《玉钩洞天传奇》四十八出，《万花缘传奇》四十八出。独其诗文集八卷为钱梅溪、陈云伯两先生曾

序而刊之，即世所传《烟霞万古楼集》是也。其他诸稿皆散佚不存。仲瞿诗文，或曰得力于秦会之。案：秦氏文集，各藏书家目录未见，独宋尤氏《遂初堂书目》有奏议集一种。以秦氏少时之所为断之，亦恃才不羁之士，其为文必有可观，岂仲瞿先生独得枕中鸿宝，故文笔之奇特如此耶？要之，王氏之文可谓凌烟霞而直上，旷万古而无俦，虽非正轨，大异凡响。等身著作，仅传诗文，不独人嫉其奇，天亦憎其才矣。文学之道不外三途，曰才、曰学、曰识，学者人力，才者天秉，识者介于天人之间，由学问经验资秉而成者也。以中人之资，治学不倦，又享大年，虽不学为文章，其文必传，此无他。人力既尽，见闻既博，必然之理也。若其下者，所治之学沾沾记诵之间，不辨纲领，不识蹊径，摹仿以为法，粉饰以为工，此无识之故也。至于绝尘而驰，超轶凡马，一瞬千里，抉云而飞，不见鷃雀，风斯在下，所非天秉奇才，讵可至耶？自清初以来，若钱牧斋、若袁子才，差可以语此矣。毛大可好以辩胜人，侯朝宗但得纵横雄肆之气，尚有间也。仲瞿之文瑕瑜互见，读其集者皆能辨之。至其天才横逸，不恃辩以惊人，不使气以凌物，使读其文者自觉望尘莫及，非得天独厚者能之耶？以天才论，此为清代之最矣。前乎此者，钱、袁二家尚守绳墨；后乎此者，定盦龚氏尚嫌胆小也（近者张公束先生鸣珂慕乡先哲之为文，刻意搜辑，仅得《黻黼图》一卷、未刻诗十余册，曾为选钞成卷。后辗转假人，为兵燹所毁。《黻黼图》皆回文诗，其书未全，亦未付印。其余残稿一卷、制艺三十余篇，曾为刊行。公束亦近世文学之士，其为诗文皆循循规矩之中。尝自署曰“王仲瞿私淑弟子”，使公束及身受业于烟霞万古楼中，亦正如毛大可之门而有李恕谷塨其人耳）。

嘉庆时各家略述

嘉庆一朝，为文不宗汉、魏，不法唐、宋，本之于训诂，出之于性

情，气和体醇，蔼然仁者之言，则嘉兴钱仪吉、泰吉昆季也。仪吉，字衎石，著有《衎石斋记事稿》十卷、续稿十卷、《刻楮集》四卷、《旋逸小稿》两卷。泰吉，字警石，著有《海昌学职禾人考》、《海昌备志》、《甘泉乡人诗文稿》等。二钱之文，盖儒家之文也。

意思深刻，议论澜翻，其为文也深入显出，矫捷沉快；其立意也不落寻常，自辟蹊径，则泾县包世臣也。世臣，字慎伯，以词章始，以经济中，以书法终。著有《小倦游阁文集》三十卷、《中衢一勺》七卷、《艺舟双楫》六卷、附录三卷、《管情三义》八卷、《齐民四术》十二卷、《说储》三卷。慎伯之文，盖子家之文也。

第五章 道光文学概述

自清初至于嘉庆，以学术论，汉多宋少；以文学论，桐城一派在学术上根据于汉、宋之间，在文字上专宗唐、宋。其他则皆汉、魏与唐、宋互攻并治。而自乾隆之际，骈俪大盛，且开后来宋四六、唐四六之争，此李申耆《骈体文钞》之选所以为可贵也。然自清初至嘉庆，虽外有回疆之役，内有教匪之祸，而大局固定，时势不变，故学者所治，皆谨守国故，断断于汉学、宋学、汉魏、唐宋之间。至道光之初，遗风流韵日以衰歇，道光之季，欧力东渐，鸦片一役，丧师失地，时局变矣，环境易矣，知向所为汉学、宋学者，皆中国固有之学，不足以应世界之变。墨守师说者，固惟旧是保；究心时事者，已慨然思变。然其几尚微，作者至少，且中西文字既未沟通，远道传闻，羌非事实，即有所见，亦正皮毛。然自后观前，则觉其未明世界大势，以中国旧日之观念评判时事，未免可笑；自当日论之，实思想变迁之渐，学术转移之机也。夫文学既以学术为根据，学术复以思想为推移，而思想则又受主宰于环境。以何证之？如佛之谈极乐国土也，必以金沙铺地，天雨香花为言。所谓金沙、所谓香花，皆根据非极乐国土之人之心理。究竟极乐国土是否以天雨香花、金沙铺地为乐，实未敢必，则知思想之不能超越环境者，一定之理也。以刀剑杀人，不如弓箭之及远；以弓箭杀人，不如枪炮之及远。以枪炮杀人，不如氯气炮之烈；以氯气炮杀人，不如毒瓦斯之烈。使当世争战皆用毒瓦斯，而为文者犹以刀剑为杀人至烈之兵器，必无之理矣。故曰文学者随环境为变迁者也，此即予绪论中时代之说也。道光之季，环境渐易矣，此所以有魏源其人也。源，字默深，湖南邵阳人。生乾隆五十九年(1794)，卒咸丰六年(1856)。初治宋学，弃而治汉。所著

有《书古微》十卷、《诗古微》二十卷、《董子春秋发微》七卷、《圣武记》十四卷，皆尚承乾、嘉诸儒之绪。至《海国图志》百卷及“以夷攻夷”之论，则时代之书矣。其时贺长龄方辑《皇朝经世文编》，源复襄助成之。盖魏氏虽未敢公言汉、宋之学不可以应当世之务，而其趋向浸浸有非明了世界大势不足以图存之概矣。故其为文，不法汉、魏，不宗唐、宋，务在明畅条达。著有《清夜斋集》二十卷。其选文亦惟注意于有裨时局之作，不以文法为归。使默深生于乾、嘉之际，固汉学之信徒。若其不然，迟生六七十年，亦戊戌诸君子之俦也。清文至此，盖将一变矣。

述龚定盦

同时传汉学者莫若仁和龚自珍。自珍，字璱人，号定盦。生乾隆五十七年（1792），卒道光二十一年（1841）。定盦为金坛段玉裁外孙。年十二，亲承外祖之教，即有志于小学训诂之学。所著有《尚书序大义》一卷、《泰誓答问》一卷、《尚书马氏家法》一卷、《左氏春秋服杜补义》一卷、《左氏决疣》一卷、《春秋决事比》一卷、《西汉君臣偁春秋之义》一卷、《典客道古录》一卷、《奉常道古录》一卷、《羽琌山金石墨本记》五卷、《羽琌山典宝记》二卷、《镜苑》一卷、《汉官拾遗》一卷、《泉水记》一卷、《布衣传》一卷、《定盦文集》三卷、续集四卷、文集补二卷、补编四卷。定盦之为学，凡训诂、掌故、舆地、目录、金石之学，无不精究；定盦之为文，凡九经七纬、诸子百家无不熔贯；定盦之为诗，非宋非唐，非汉、魏，运缥缈之思，用雄奇之笔，独往独来，无可羁绊，当时推为文雄。然论者以为桐城之文如泰山主峰，不可亵视；定盦之文如徂徕新甫，相与揖让俯仰于百里之间。为此说者，盖不能掩定盦之奇，又不甘桐城一派因此而轻，故有此似是而非之论。使桐城之文果为泰山，则定盦之文正当譬诸华岳，奇峰峭壁，峻险莫攀，岂徂徕新甫所能喻之？非定盦者独其子龚橙。孝

拱之学亦宗汉，亦有独到之处。若以文论，则固定盦不肖之子也。又圆明园一役，孝拱导之，后遂流落海上，郁悒放浪以死，不独定盦之文不传，定盦之嗣亦斩矣。以道光一朝之汉学文章论，舍定盦其谁归。

述桐城派渊源

是时守桐城师法者，莫若梅曾亮、管同二人。曾亮，字伯言，江苏上元人。少好骈俪，后游姚惜抱之门，始治古文辞，著有《柏岘山房文集》十六卷、骈文二卷。同，字异之，亦上元人。与伯言同学于姚氏，皆称高第弟子，著有《因寄轩文集》十六卷。桐城派之文，自望溪至梅、管，凡四传矣。自梅、管而后，桐城之派愈衰愈微，浸以不振矣。予以为自韩昌黎以来至于梅、管，其源可溯，其派至明。今举其证：昌黎《与崔立之书》曰："或出礼部所试诗赋策等以相示，仆以为可无学而能。闻吏部有以博学宏辞选者，就求其术，或出所试文章，亦礼部之类。"又《答窦秀才书》曰："念终无以树立，遂发愤笃专于文学。学不得其术，凡所辛苦而仅有之者，皆符于空言而不适于实用。"欧阳修《与张秀才第二书》曰："寻足下之意，岂非悯世病俗，究明古道，欲援今以复古。而剪剔齐整，凡今之分殽驳冗者欤。"归有光《与潘子美书》曰："科举之学驱一世于利禄之中，而成一番人材世道，其敝已极。士方没首濡溺于其间，无复知有人生当为之事。荣辱得丧，缠绵萦系，不可脱解，以至老死而不悟。"方苞《储执礼文稿序》曰："夫时文者，科举之士所用以牟荣利也，而世之登高科、致膴仕者出其所业，众或弃掷而不陈。"就以上诸家之言证之，则知诸家之所以治文学而名之曰"古文辞"者，其起源盖皆痛恶科举时文之不可为，思所以矫而正之，若出一辙也。昌黎之为文也，其言曰："或问：'文宜何师？'必谨对曰：'宜师古圣贤。'人曰：'古圣贤人所为书具存，辞皆不同，宜何师？'必谨对曰：'师其意，不师其辞。'又问曰：

‘文宜易宜难?’必谨对曰:‘无难易,惟其是尔。’”又曰:“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以古圣贤为法者,虽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之徒出,必自于此。”愈之学则见之《原道》、《原毁》诸文。又其言曰:“周后文弊,百子为书,各自名家,乱圣人之宗。后生习传,杂而不贯。”又曰:“汉兴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后始除挟书之律,稍求亡书,招学士。经虽少得,尚皆残缺,十亡二三。故学士多老死,新者不见全经,不能尽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见为守,分离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群圣人之道于是大坏。后之学者无所寻逐,以至于今泯泯也。其祸出于杨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又曰:“释、老之害过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欧阳修《与石推官第一书》曰:“修闻君子之于学,是而已,不闻为异也。好学莫如扬雄,亦曰如此。”又其第二书曰:“夫释、老,惑者之所为;雕刻文章,薄者之所为。”永叔之学则见之本论。以此证之,欧阳之于韩,盖亦步亦趋者也。归震川学欧阳而稍异矣,望溪之言曰:“震川之文,乡曲应酬者十六七,而又徇请者之意,袭常缀琐,虽欲大远于俗言,其道无由。”又曰:“震川之文,于所谓有序者盖庶几矣,而有物者则寡焉。又其辞号雅洁,仍有近俚而伤于繁者。”曾国藩之言曰:“近世缀文之士,颇称述熙甫,以为可继曾南丰、王半山。自我观之,不同日而语矣。或又与方苞氏并举,抑非其伦也。”而王庆麟之《书望溪集后》则曰:“知取道之大原,不专主于为文而文诣极者,于唐得韩愈氏,于本朝得方苞氏。”由此观之,桐城之文,上者宗昌黎、中者法永叔、下者师震川,而昌黎以前之文,则皆匪我思存矣。夫昌黎、永叔各家之所谓道,离制度名物而无所依附,徒标其名曰尧、舜、禹、汤、文、武、周、孔,而最大之表现则在辟佛,而桐城宗之。故桐城之根据实在于文而不在学,文之旨归则唐、宋而止。盖韩、欧发源之始,仅求免于时文之弊,故所诣如此也。

然自近论之，则望溪至于梅、管已百余年，自远论之，上至昌黎，则相传之久殆无其比，而文字之间形式成矣、派别定矣。文既成派，后之学者就派以求，纡徐以为妍，曲折以达意。譬如构屋，其间架尺寸皆有一定，户牖方向绝无异同，易则易矣，空疏之病日中于人心，摹仿之习深入于俗见。既有束缚人才之弊，复启不学无术之途。桐城之末流乃有张裕钊《濂亭文集》等文字，吁，可慨已！桐城文学贯穿清代，而按其造诣，讲学则不及汉学诸家之实在，言文则并无天趣才调之可言。盖所依凭者有似乎宋学，而实则韩与欧阳之学去宋学尚有间也。以文为招，历年至久，庸有不敝之理耶？

第六章　咸同文学概述

咸、同间之文家，曾氏国藩实为巨擘。国藩，字涤生，湖南湘乡人。生嘉庆十六年(1811)，卒同治十一年(1872)。以团练湘勇削平洪、杨，为中兴首功。其文雄伟，远绍昌黎。尝欲以戴震、段玉裁、钱大昕、王念孙之训诂，作扬雄、班固、《左传》、《国策》之文章。自言初解文法，由姚姬传启之，故极推崇，至列入圣哲画像。又序述桐城流派，称为“文章正轨”。彼实本非桐城，而托迹于桐城者(道光之季，梅伯言在京师，为文坛老宿，一时依附颇众，公不为然，亦可见一端)。其著名作品为各昭忠祠记及殉难诸碑志，此盖以当时诸公率皆同起行间，患难相共，或死事至惨、或中道殂谢，以身总戎机之人，为死者写恨，为生者劝忠，其哀切矣，其情至矣。夫世间所谓至文者，皆至情所发也，情有不至，文虽工而犹为下乘。故尝以为昌黎《平淮西碑》，不若涤生诸昭忠碑记。《淮西碑》，昌黎自居于作文之士，执笔大书，颂天子宰相之功烈，文至而情不至；昭忠诸记，情余于文，文偁其情，故为独绝。公开府辟属垂二十年，并时群彦几尽罗入戎幕，于戎马倥偬之际犹能提倡文学，自是难得，惜乎其未及为学术上之提倡耳。

并时与公上下其议论者，则有巴陵吴敏树南屏。南屏文字饶有淡远之神，雅不欲以桐城流派自居，盖亦矫然能自树立者。著有《柈湖文钞》。幕中能文之士推平江李元度次青、湘潭王闿运壬秋、桐城吴汝纶挚甫。次青之文参于全绍衣、魏默深之间，所编有《国朝先正事略》。壬秋则薄唐宋不为而欲上宗汉魏者也，著《湘军志》及《湘绮楼集》。挚甫则确守其乡先生义法，而求广于涤生者也。

尔时治经学者，则有德清俞樾荫甫、戴望子高、仪征刘毓崧北

山、寿曾恭甫父子；治词章者，则有会稽李慈铭悉伯，赵之谦㧑叔，皆能绍述前修，传之后世。俞氏著述最富，瑕瑜互见。戴氏享年不永（仅三十七）。李氏、赵氏意气未平，以中表而互相攻讦，文人之习未除也。

第七章　光宣文学概述

咸、同以还，国步维艰。迄于光绪，外患日亟，时局之变，一瞬千里，往昔学说论议，举不切于时势。学士大夫蒿目时艰，发抒谠论，而文习因之大变，其结果则为戊戌政变之局。迨庚子祸作，国命既岌岌不可终日，革命维新之论勃然并兴，风发泉涌而不可复遏。于时虽有张之洞以方面大臣宏奖风流，吴汝纶以大学总教主持文柄，而时代思潮固已趋向有自，曾不稍顾及之矣。其结果则为辛亥革命之局。故知文字鼓吹之力，亦足以左右世变，而光绪之季实乃文体解放之发动期也。

述康有为

戊戌之际，新党之气甚锐，而康有为实为之魁。有为，字广厦，又字长素，广东南海人。少孤，年十八从朱次琦学。次琦，字子襄，亦南海人。其学以理学为体，以经济为用，宗程、朱而兼采陆、王，有为则独好陆、王。及游京师，经香港、上海，见西人殖民政治之完整，因思所以致此者必有道德学术以为之本源，乃悉购江南制造局及西教会所译出各书尽读之。既而讲学于长兴学舍（万木草堂），讲学于桂林。光绪十五年，以诸生伏阙上书，极陈时局，请及时变法以图自强，书格不达。甲午败后，又联合公车千余人上书申前议，亦不得达。会常熟翁同龢为德宗师傅，方柄用，荐之。德宗以为贤，遂有变法维新之举。仅百日而西太后复垂帘听政，囚德宗于瀛台，诛杀谭嗣同、刘光第、杨深秀、杨锐、林旭及有为弟广仁等六人，所谓“戊戌六君子”也。有为与弟子梁启超出亡海外。有为为人主观极强，治经宗公羊学，著《新学伪经考》及《大同书》等。其思力突过古人，具

冲锋摧坚之大勇，实有不可及者。其文亦流动发王，不拘拘于格调，而自有独到之处，并非策士干进之俦也。然于文字上改革之功，则不及其弟子梁启超。

述梁启超

当戊戌维新，康氏既得君甚专，日夜谋所以削太后之党，建设新政，日不暇给，遑论文字宣传之力。而启超则与谭嗣同等各抒其怀抱，著书立说以相鼓吹者也。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年十八，从康有为游。乙未七月，有为创强学会于北京，启超任书记。明年，汪康年开时务报馆于上海，聘任公专任撰述之役。丁酉，任湖南时务学堂讲席。戊戌九月去国。其去国之前所著文字，尚未明了世界大势，且对于清室亦未尝公然言其过失。去国十余年，至日本、至美国、至夏威夷、至印度、至澳洲，所见异，所闻异，所撰述亦异矣。其言曰："当乾隆改元，满洲入中国殆百年矣，民气既静，外侮未来，以高宗纯皇帝之才，当此千载一时之遇，我国民最有望者，莫彼时若矣。乃高宗不用其才为我中国开文明政体之先河，乃反用其才为我中国作专制政体之结局。"又曰："高宗以操纵群臣、愚弄士民为生平第一得意事业。六十年中，兴文字狱以十数，如胡中藻、汪景祺等之狱，毛举细故，株连满廷。"又曰："开四库馆以奖励伪学，手批《纲鉴》以诋諆名节。"又曰："中国未尝识字，而即授之以经。未尝辨训、未尝造句，而即强之为文。开艺未及一月，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之语腾跃于口，洋溢于耳。夫记者明揭之曰'大道之学'，今乃骤以施之乳臭小儿，何为也？'明德'二字，汉儒据《尔雅》、宋贤袭佛典，动数千言，未能悬解。今执负床之孙而语之，彼乌知其作何状也！"又曰："古人之言即文也，文即言也。自后世语言文字分，始有离言而以文称者。然必言之能达而后文之能成，有固然矣。今之为教者，未授训诂、未授文法，闯然使代圣贤立言。朝甫听

讲，夕即操觚。又限其格式、诡其题目，连上犯下以钤之，擒钓渡挽以凿之。意已尽而敷衍之，非三百字以上勿进也；意未尽而桎梏之，自七百字以外勿庸也。百家之书不必读，惧其用僻书也；当世之务不必讲，惧其触时事也。”又曰：“中国以文采名于天下，而教文法之书乃无传焉。意者古人语言与文字合，如《仪礼》、《左传》所载辞令皆出之口而成文者也。故曰：‘不学《诗》，无以言。’而传记亦屡言将命应对之事，盖学言即学文也。后世两事既分，而斯义不讲。自魏文帝、刘彦和始有论文之作，然率为工文者说法，非为学文者问津，故后世恒有读书万卷而下笔冗沓弇俗不足观者。”综上所述，则知当时之任公对于中国文学之观念凡有三点：一，痛恨思想之束缚，而归罪于乾隆之操纵臣下、愚柔士民。二，痛恨教法之失宜，而归罪于读书之不当、制艺之误人。三，痛恨言文之分离，而归罪于训诂之不明、文法之不讲。究其所言是否定论，虽任公本人恐亦有思想变迁之日，而所攻之短、所揭之病，则固当时深中肯綮之言也。夫恨束缚思想，则不独乾隆当攻，汉宋之学亦可以攻矣；望文言合一，则不独魏文帝、刘彦和之论为不足取，即汉、魏、唐、宋之文亦不足言矣。揭此论以告全国，庸讵有文习不变之理耶？且彼时所著之文，又多为政治学术宗教教育西方先哲之遗言遗行，而行文充裕畅达，略无遗义，此其所以风行海内，遂为清代古文学改革之功臣也（所引梁氏之言皆见清代所著文内，入民国后所著之文不预）。

同时有文名者则为谭嗣同。嗣同，字复生，湖南浏阳人。父继洵，官至湖北巡抚。嗣同天禀英伟，博综群籍，而又深谙内典。其学术思想大都见于《仁学》一书，梁任公尝目为思想界之彗星。其他所著有《寥天一阁文》二卷、《莽苍苍斋诗》二卷、《远遗堂集外文》一卷、《兴算学议》一卷。未刻者有《思纬吉凶台短书》一卷、《壮飞楼治事》十篇、《秋雨年华馆丛脞书》四卷、《剑经衍葛》一卷、《印录》一卷。其稿皆任公所藏，今任公已亡，不知谭氏遗稿如何矣。戊戌死

国时，年三十三。

述严复、林纾

自鸦片战役以来，国人已知泰西各邦之不可忽视，思进而求其立国之内容，于是译述西书之业渐兴。惟所译者无非格致书及历史、政法书，如《泰西新史揽要》、《万国公法》等而已，他若哲学、文学之书则尚少注意及之者。自严复、林纾以古文翻译哲理文艺之作，而其业乃大盛。

严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人。光绪初，官费派往英国学海军。归国后，鉴于我国"风气渐通，士知弇陋为耻，西学之事，问途日多。然亦有一二巨子，訑然谓彼之所精不外象数形下之末，彼之所务不越功利之间，逞臆为谈，不咨其实。"觉讨论国闻，审敌自镜之道，断断乎不如是。以英儒赫胥黎所著《天演论》为西人新得之学说，又为作者晚出之书，首先迻译，以饷国人。作始于光绪丙申(1896)，出版于戊戌(1898)。由是中国学者始知西人于器械精利之外，犹有湛深精辟之哲理思想，可为吾人取鉴者在焉。复之译是书也，行文力模周秦诸子。尝谓："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今是书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审择于斯二者之间，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可知其用力之勤矣。后又译出《原富》、《社会通诠》、《群己权界论》、《群学肄言》、《法意》等书。复之文章既高，而诸书内容又远胜彼言之无物、自诩载道之古文，其能博学士大夫之钦仰，岂偶然哉？

林纾，字琴南，福建闽县人。为古文规仿桐城，试即其《畏庐文

集》而读之，琢句亦颇精卓，而格局逼窄、气机差涩，殊少当者。然以古文翻译西方说部，则精采奕奕，自标风味。彼本不谙原文，皆凭人口述而为之，然于原书之诙谐风趣，往往有深刻之领会，于此并力描写，遂能倍见神采。胡适尝谓："古文不曾做过长篇小说，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一多百种长篇小说。古文里很少滑稽的风味，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欧文与迭更司的作品。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茶花女》与《迦茵小传》等书。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种大的成绩。"琴南能为古文辟一种新境界，非特可为介绍西洋近世文学之第一人，实足以开中国古文学应用之新纪录。我国翻译文学，自六代所为佛经而外，吾必以严氏、林氏为巨子矣。

述王国维

光、宣之季，古文之体制格局虽逐渐解放，至其具透切之见解、识文学之价值，为彻底的改革论者，则惟王国维而已。国维，字静庵，浙江海宁州人。生光绪三年(1877)，卒民国十六年(1927)。静庵一生学问，截然分为两期：民国以前，则治文学兼攻哲学；民国以后，则专治国故。其友罗振玉叔蕴尝序其遗著云："余交君二十有六年，于君学问之变化，知之为最深。光绪戊戌，始与君相见于上海，时余年三十有三，君年二十有二。君方治东西文字，既又治泰西哲学，逮岁丁未，有《静庵文集》之刻。戊申以后，与君同客京师，君又治元、明以来通俗文学，时则有《曲录》之刻，而《宋元戏曲史》亦属稿于此时。然君治哲学，未尝溺新说而废旧闻；其治通俗文学，亦未尝尊俚辞而薄雅故。辛亥之变，君复与余航海居日本，自是始尽弃前学，专治经史。"其治国故，新得之富、创获之多，突过前儒，兹姑不叙，而述其对于文学之见解。静庵以为："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何则？政治家与国民以物质上之利益，而文学家则与以精神上之利益。夫精神之与物质二者孰重？物质上之利益，一时的

也；精神上之利益，永久的也。前人政治上所经营者，后人得一旦而坏之。至古今之大著述，苟其著述一日存，则其遗泽且及于千百世而未沫。故希腊之有鄂谟尔也，意大利之有唐旦也，英吉利之有狭斯丕尔也，德意志之有格代也，皆其国人人之所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者，而政治家无与焉。彼等诚与国民以精神上之慰藉，而国民之所恃以生命者，若政治家之遗泽，决不能如此广且远也。试问我国之大文家，有足以代表全国民之精神如希腊之鄂谟尔、英之狭斯丕尔、德之格代者乎？我人所不能答也。殆无其人欤，抑有之而我人不能举其人以实之欤？二者必居一焉。由前之说，则我国之文学不如泰西；由后之说，则我国之重文学不如泰西。前说我所不知，至后说则事实较然，无可讳也。我国人对文学之趣味如此，则于何处得其精神之慰藉乎？"提高文学价值，即其主张改革之根本见解也。又以文学为美术，与哲理同为满足慰藉人类知识感情之具，而"美术中以诗歌、戏曲、小说为其顶点，以其目的在描写人生故"。然转而观我国"诗歌之方面，则咏史、怀古、感事、赠人之题目弥满充塞于诗界，而抒情、叙事之作什伯不能得一。其有美术上之价值者，仅其写自然之美之一方面耳。甚至戏曲、小说之纯文学亦往往以惩劝为旨。其有纯粹美术上之目的者，世非惟不知贵，且加贬焉"。则直以古今人为无一得文学之真解者，真痛切之言，大胆之论也。

静庵既知文学之内含为情感，目的为描写人生，故特标举"自然"为文章之鹄，而曰："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尝"读元人杂剧而善之，以为能道人情、状物态，词采俊拔而出乎自然。盖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仿佛也。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元南戏之佳处，亦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申言之则亦不过一言，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目前，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夫文章既以自然为贵，则凡一切格律、典故、对偶、浮词、绮语，足以拘束自然者，皆在

排除之列，而造句遣词，用俗语必远胜于古语。故静庵以为，“古代文学之形容事物也，率用古语，其用俗语者绝无，又所用之字数亦不甚多。独元剧以许用衬字故，故辄以许多俗语，或以自然之声音形容之，此自古文学所未有也”。又曰：“元剧实于新文体中自由使用新言语，在我国文学中，于楚辞、内典外得此而三。其写景、抒情、述事之美，所赖于此者实不少也。”此言俗语之体接近自然，胜于古语也。静庵又曰：“日本人多用双字，其不能通者则更以四字表之，中国则习用单字。精密不精密之分，全在于此。”俗语无单语，其质之胜于古语亦如日本语耳。国人筑旧之见，辄谓古语尔雅，俗语鄙俚，而静庵则谓：“雅俗、古今之分，不过时代之差，其间固无界限也。”由是以观，静庵所见，与后此十余年间胡适之、陈仲甫辈所倡之文学革命论不谋而合。惜乎世无表而出之者，而静庵亦既引其端而不肯自竟其绪也（所引静庵言论皆系辛亥以前所著者）。

第八章　清诗概述

清初诗家当以钱牧斋、吴梅村为最。牧斋才力富健，出入李、杜、韩、白、苏、陆之间，沉郁而藻丽。高情逸致，流露篇什，允推宗工，固不可以人废言也。梅村，一字骏公，江苏太仓人。生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崇祯进士，尝为东宫侍读。明亡，退居乡里，后为当局所迫，出仕新朝，为国子祭酒。康熙十年(1671)卒。平生以枉节自恨，临没，遗言敛以僧服，墓前树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足矣。梅村少作大抵才华艳发，吐纳风流，有清丽芊眠之致。及遭国变，阅历兴亡，激楚苍凉，风骨弥为遒上。其歌行一体尤为擅胜，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如《永和宫词》、《圆圆曲》等一时传诵，至谥为诗史云。他如顾亭林诗有金石气，吴野人(名嘉纪，江苏泰州人，著《陋轩集》四卷)诗有姜桂气，偶然落墨，天真流露，同时名辈皆未能臻此境也。遗民与遗臣之气味，固有大不相侔者欤。

钱、吴而后，则推宋琬、施闰章。琬，字玉叔，山东莱阳人。闰章，字愚山，安徽宣城人。二人雄视南北，有"南施北宋"之目。琬诗以雄浑磊落胜，闰章诗以温柔敦厚胜。颉颃施、宋之间者，则有朱竹垞(号彝尊，浙江秀水人，有《曝书亭集》)。竹垞学最综博，为诗兼擅众体，惟未纯耳。至王士禛起，独标神韵，遂为一朝盟主。士禛，字贻上，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人，生明崇祯七年(1634)。顺治进士，累官至刑部尚书，康熙五十年(1711)卒。渔洋少掇巍科，所至与诸文士唱和，研求既久，造诣颇深，而一以神韵缥缈为宗。尝选《唐贤三昧集》，不录李、杜一首，而取王右丞独多，可以见其旨趣所在。然实不免摹拟，故其甥婿赵秋谷诋为清秀李于鳞，而洪北江亦讥其太讲

格律，学古人略得其神而不能遗貌也。秋谷，名执信，山东益都人。康熙进士，旋以国恤宴会被放归，年未三十。自是徜徉林泉逾五十年，年八十三始卒，实乾隆九年(1744)也。作《谈龙录》以攻渔洋。其诗以思路巉刻为宗，欲以救渔洋一派肤廓之弊也。渔洋所著曰《带经堂集》，世又别录其诗，称《精华录》。

赵翼《瓯北诗话》尝称查初白堪以继梅村之后。初白者，名慎行，浙江海宁人。少受诗法于钱澄之，又从黄梨洲游，梨洲方之为陆放翁。登康熙癸未(1703)进士。圣祖巡幸南海子捕鱼，命群臣赋诗，初白有"笠檐蓑袂平生梦，臣本烟波一钓徒"句，圣祖称善，诏宣"烟波钓徒查翰林"，由此得遇。其论诗也，谓："诗之厚，在意不在词；诗之雄，在气不在貌；诗之灵，在空不在巧；诗之淡，在脱不在易。"盖自明人喜摹唐诗，至将亡而积弊深矣，窠臼成矣。故牧斋救之以沉郁，梅村救之以风华，初白复救之以轻灵也。初白踪迹所及甚远，诗篇丰富，汇为《敬业堂集》五十卷。

浙西诗人自朱竹垞、查初白宗法宋贤，继之者复有钱塘万鹗太鸿、仁和杭世骏大宗。而鹗尤精熟宋诗，著有《宋诗纪事》一百卷。其所为诗幽深峭洁，截断众流；世骏则学步子瞻，并工力绝深。诸人之诗，气韵大体相似，遂有"浙派"之名。同时长洲沈德潜归愚虽倡为格调之说，有《清诗别裁》之选，其所为诗亦相似也。浙派之为诗，实在矫明之弊。夫明之宗唐，但求词句之相似，不思情理之难通，可议之处多矣。其下者则鄙险不复成诗，矫之诚是也。然矫之则必自唐入宋矣。宋之为诗，刻画清新，乃其本色，顾亦有以豪迈见者。独是当时法网既密，文字之狱接踵继兴，文学之士，岂敢复矜才气以取祸？藏锋敛才以求免戾，外托温厚和平之旨，实为隐身躲避之谋，由是诗学日流于肤浅矣。此乾隆三家所以又起而救之以才气魄力也。

乾隆时，渔洋一派肤廓浅陋之弊既日著，于是沈归愚倡为格调之说，袁子才又倡为性灵之说。子才之诗，才气纵横，灵动畅达，自

是名家。同时赵翼、蒋士铨气体亦复相类，故并称三大家。惟子才时有轻佻之处，翼诗间亦有然，士铨则具凄怆激楚之概，较为别致。洪北江尝论三人之诗曰："袁简斋如通天神狐，醉便露尾。赵云松如东方正谏，时带谐谑。蒋心余如剑侠入道，尚余杀机。"又可识其个性矣。翼，字云松，号瓯北，江苏阳湖人。登乾隆二十六年(1761)进士。卒嘉庆十九年(1814)，年八十八。著有《瓯北诗钞》五十三卷，兼好考证之学，有《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等书。士铨，字心余，江西铅山人。乾隆二十二(1757)年进士。四十九年(1784)卒，年六十。著《忠雅堂诗文集》三十九卷。

三家之诗虽以才著，然实未能出宋人之范，能宗唐人而具机抒者惟黄仲则一人耳。仲则，名景仁，江苏武进人。与洪亮吉同受业于昭文邵齐焘。专工于诗，刻意苦吟，年未三十，须发皓然。著有《两当轩集》。卒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才三十五也。其为诗也，初学宋人，后宗李白，成就不减青丘，当时推为第一。自此之后，以诗名者咸推王仲瞿与大兴舒位铁云、昭文孙源湘子潇三君，而仲瞿尤雄健奇肆。

咸、同之际，王壬秋号称诗宗。值时丧乱，生人憔悴，而《湘绮楼集》中十九为拟古篇章，其忧时伤感之什反绝少见，诗人之性情固如是其淡漠耶？降及光绪，作者竞法宋贤而乃力摹江西诗派，又好雕琢，是皆传李于鳞之衣钵，徒现面貌而窒煞性灵者也。能矫然特立者，仅一黄公度耳。公度，名遵宪，广东嘉应人。生道光二十八年(1848)，卒光绪三十一年(1905)。少好为诗，即能独出心裁，尝斥"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古人弃糟粕，见之口流涎。沿习甘剽盗，妄造丛罪愆"。而主张"我手写我口"，以为"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烂斑"。既卜仕，历官日本、英、美各国参赞公使。见闻既广，思想更新，诗材益富，凡有咏歌，类以新思想运新诗材，遂能独辟蹊径。所著有《人镜庐诗

草》十一卷。自云:“人各有面目,正不必与古人相同。吾欲以古文家抑扬变化之法作古诗,取《骚》、《选》、乐府、歌行之神理入近体诗。其取材以群经三史、诸子百家及许、郑诸注为词赋家不常用者,其述事以官书会典方言、俗谚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举吾耳目所亲历者皆笔而书之,要不失为以我之手写我之口。”此公度最确当之自白也。其宗唐者则有康长素。长素雅好杜甫,其律体流转自如,空灵动荡,而不虚怯。戊戌以后,漫游世界,触景生情,一以诗发之。其放歌长古,浩瀚滃渤,纯任才气,肆而能检,放而不佚,诚足雄视一世矣。夫才力雄健,黄不如康;标新颖异,康不如黄;并驾齐驱,驰骋坛坫。晚清诗界得此二美,洵足放一异彩矣。夫诗之为物,陶写性情,寄托怀抱。人之性情,万有不齐;人之怀抱,后先互异。随感而发,天地间最纯粹最自然之心声也。自唐以前,本无拘束:童谣击壤,尽是至文;渔唱樵歌,皆含天趣。唐代以此取士,于是操觚者多矣,于是诗道亦日渐陵夷矣。盖束齐女之腰,广楚宫之袖,腰诚细矣,袖诚长矣。究之乱头粗服,仍是西施;抹粉涂脂,终为嫫母。在上者何必以此桎梏天下之士,为士者何必以此自窒其性灵耶?清之初虽不以诗取士,而鸿博一科亦尚诗赋,南巡数次,献诗者亦蒙优奖,此所以学诗者多,而诗亦互相仿效以成派别也。噫!不为名利所驱,不为时尚所动,渊明生于华丽之时,工部自作有韵之史,此其所以旷千古而无其匹也。

第九章　清词概述(附戏曲)

清初诗人类善倚声,如吴梅村之流丽稳贴,毛大可之准绳乐律,孙豹人(名枝蔚,陕西三原人)之激壮高亢,宋玉叔多商羽之音,王渔洋有冠带之概,皆其可取者,而朱竹垞、陈其年声闻尤著。两君才华富丽,尝合刻所作为《朱陈村词》,名重禁中,流传海宇,向往之者实繁有徒。然竹垞好使典,不免于碎。其年好使气,不免于率,究非大家。求其戛戛独造,足为冠冕者,其纳兰性德乎!而顾贞观、曹贞吉抑其亚也。性德,字容若,满洲正黄旗人,康熙朝权相明珠之子。虽生席纷华,聪明早达,而所为词凄楚哀艳,情致悱恻,逼近南唐二主,令人不忍卒读。此非第别有怀抱,抑亦情感独深也。著有《饮水词》、《侧帽词》共五卷。贞观,字梁汾,江苏无锡人。著《弹指词》三卷,极情之至,出入南北两宋而奄有众长。其友吴兆骞谪戍东北,梁汾尝谱《金缕曲》两阕寄之,见者无不叹为绝唱,容若感焉,力为纳锾救归,亦艺林中豪侠之行也。贞吉,字实庵,山东安邱人。著《珂雪词》二卷,不为闺襜靡曼之音,而气韵自然,幽细绵丽,在方回、美成之间。要之尔时士夫善言风怀,此虽小道,尚存古意。自是以降,作者虽众,往往文胜而意浅,若厉太鸿、汪对琴、张皋文诸家乃较称工者。太鸿词如其诗,有一种幽茜之美。对琴,名棣,江苏江都人。有《春华阁词》,生峭之致,奥折之趣,盖与太鸿为近。皋文尝为《词选》一书,倡言内意外之旨。其所谱上焉者亦沉郁疏快,悱恻缠绵,惜未能全称耳。晚近竞效梦窗,然貌合神离,则摹拟之习为之,其可观者盖寡矣。

清初诗人亦偶为戏曲,《渔洋诗话》云:"梅村先生之《通天台》,尤悔庵之《黑白卫》、《李白登科》,激昂慷慨,可使风云变色,自是天

地一种至文，不敢以小道目之。”然世俗所流传，则以孔东塘之《桃花扇》、洪昉思之《长生殿》为最盛，其次则李笠翁之十种曲。东塘，名尚任，字季重，自署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所演《桃花扇》共四十四出，借侯朝宗与名伎李香君之情事，以写明末兴亡之恨，亦激昂，亦缠绵，故能脍炙人口。昉思，名升，浙江钱塘人。以太学生学诗于渔洋，颇著才名。因白香山《长恨歌》演曲五十出。初成扮演，置酒高会，名流咸集。时尚在国恤，或以上闻，遂与赵秋谷并遭斥革。然自是朱门绮席，酒社歌楼，莫不奏之云。笠翁，名渔，浙江兰溪人，寄籍钱塘。著曲十种，曰《风筝误》、《慎鸾交》、《奈何天》、《怜香伴》、《比目鱼》、《意中缘》、《玉搔头》、《蜃中楼》、《巧团圆》、《凰求凤》，皆喜剧也。词采明浅，滑稽动听，流俗多用之。以言文学，则去《桃花扇》、《长生殿》远矣。

尔后惟蒋心余之《藏园九种曲》最著，曰《一片石》、《空谷香》、《桂林霜》、《四弦秋》、《雪中人》、《香祖楼》、《临川梦》、《第二碑》、《冬青树》。大抵根据事实，演以寄慨。短者数出，长者或数十出，典丽婉转，不矜才使气，自有一种蓬勃茂盛气概，而《空谷香》尤足为代表作品。余如舒铁云之《瓶笙馆修萧谱》亦饶有古致，陈文述《舒铁云传》言：“铁云能吹笛，鼓琴度曲，不失分刌。所作乐府院本脱稿，老伶皆可按简而歌，不烦点窜。”则周美成之流亚矣。道、咸以降，皮黄盛行，谱曲者乃不数数觏。

王静庵有言：“我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若《牡丹亭》之‘还魂’，《长生殿》之‘重圆’，其最著之一例也。”此则我国旧戏曲思想之通病，吾人所当领会者也。

第十章 结 论

综观清代文学，有大异于前者三事焉：一曰文字学之修述。我国造字，原本象形，后世孳乳，音义代有变迁。夫殊方异言，古今异解，不通训诂则古书不易卒读，且申说事理，必赖夫词。人事日蕃，词亦愈夥，词富则意易达，词窘则意常窒。而词之基本为字，不通字学则文不精切，不能行远，吾儒所以贵博学而多识也。后进颓废，不务博习，不究字义，学殖荒落，文章谫陋，所由来也。至清代汉学大师，考古之绩越度前代，探求声音训诂之义蕴而一一董理之，于是文字之读解，厘然有当于吾心，古今间隔，洞然大启。若据以行文，确切之词俯拾即得。故曾涤生氏尝欲以戴、段、钱、王之训诂，发为扬、班、《左》、《国》之文章。惜乎其未有所就耳。

二曰文法学之创作。夫无论何种文字，其范字以为词，规词以为句，积句以成文，必有其公认之律令，遵之则合，违之则乖，所谓文法是也。我国文字形成一种公式，为时已历二三千年，虽古今递变，略有不同，而大致相去不甚悬殊。然论文之书盈千累万，率皆侈谈篇章，语多表象。即偶涉单字，亦仅分别虚实而止。自王引之作《经传释词》，而虚字之作用始明；自马建忠作《文通》，而约定俗成之文法以立。承学之士，于以考见古文古语之成例，而无扞格不通之虞矣（建忠，字眉叔，江苏丹徒人。游学法国，归而仿泰西格剌玛之法而作《文通》十卷）。

三曰新体文之初兴。自唐宋以来，古文家之所以自重其文，莫不曰文以载道、文以经世。然求其实际，则其所谓载道者，无非称道仁义道德以自附于圣贤之徒，而非能树义析理，有条成贯，以成一部著述也；其所谓经世者，无非论议得失成败以自骋其纵横之辩，

而非能核论政事，订议典宪，以裨家国建树也。其所孳孳讲求者，格也，律也，声也，色也，神也，理也，气也，味也。旨趣所在，唯以求文辞之工，可耀观览而已，其不适用直与骈俪等量。自方望溪氏建为义法，崇尚冲穆，而规模益隘，枯虚愈甚。末流沉溺，束缚拘挛，曾不少异于时艺。故古文之敝，清末而极。有识之士起而力谋改革，适值中外沟通，新学新知纷纷输入，学者偶有称述，新学名词时见篇章。继考欧西文字精细缜密，剖析入微，以之紬绎名理，实有大胜于我者，故属句行文，初亦仿效其法，久乃与之俱化，而新文体遂以形成焉。予窃以为，我国文字数千年一脉相承，至什法师等翻译佛经，而始有别出之内典文学。佛法广大，佛说善喻，南北朝野并深慕仰。好尚既专，思潮以成，文字亦汲其流而别具一种气象。此为第一次大变易，至清末之新文体为第二次大变易。然而内典文学，特殊文学也，其诵习究不出于缁徒，犹之寒流热流，独往独来，不害其为汪洋大海也。新体文学，普通文学也，其应用遍被于全民，犹之洪涛澜汗，激荡奔迸，无不受其震撼者，故其变易之度，又视六代文学为独高也。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中国大文学史 （上册）
作者＝柳存仁等著
页数＝８５７
石头

目　　　录

五代文学
（杨荫深）

宋代文学
（柯敦伯）

辽金元文学

（吴　　梅）

第七章光宣文学概述
第八章清诗概述
第九章清词概述（附戏曲）
第十章结论